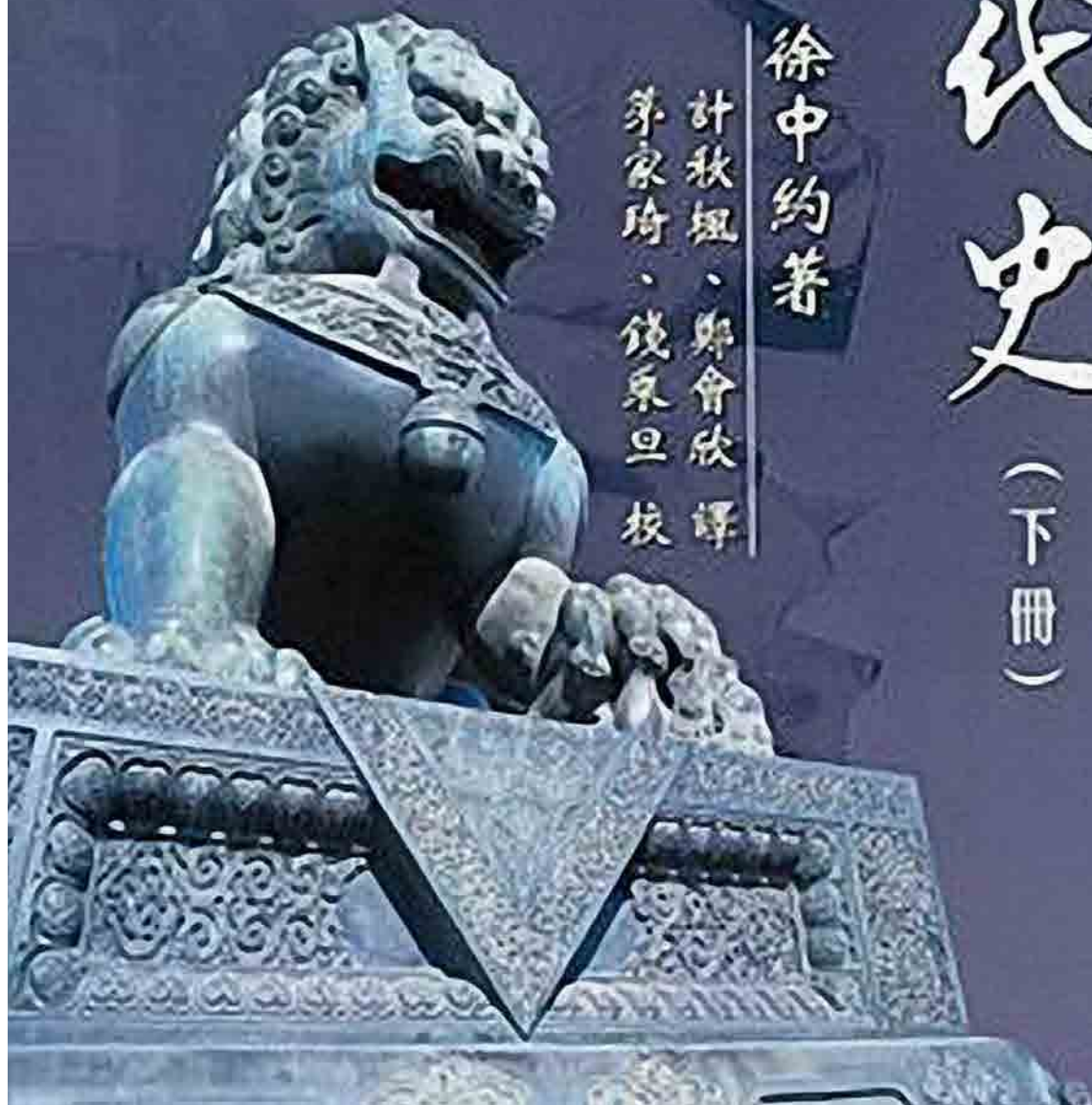


中國近代史

(下冊)

徐中約著

計秋姬、鄭會欣譯
茅家琦、錢東旦校





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攝於1960年。



著名作家和社會批評家魯迅



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李大釗



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陳獨秀

思潮澎湃和反帝運動中的國家統一

思想革命之後，兩個重大的政治事件發展起來，作為對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 (Bolshevik Revolution) 的反響。一件是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另一件是國民黨的改組。兩個事件的發展對塑造中國現代史的進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1921年

中國人接觸馬克思主義大約開始於1905年左右，這時《民報》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馬克思 (Karl Marx) 的傳記。1908年初，無政府主義雜誌《天義報》刊登了譯自日文版本的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寫於1888年的〈共產黨宣言序言〉，也即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和節選自恩格斯《家庭的起源》的片段。儘管中國人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學社會主義」創建之父有了初步認識，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仍很微弱，一直要到五四運動時期、布爾什維克革命在俄國取得成功，才充分顯示這一思想的威力。在凡爾賽會議上，外國宣佈對山東問題的處置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國家失去了信任，並且發覺很難將西方同時間地看成為導師和壓迫者。因此，批判西方的理念和思想成為當時的風氣，而知識分子中極有影響力的人士受到聖西蒙 (Saint-Simon) 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和巴枯寧 (Bakunin) 的無政府主義，以及馬克思的革命哲學所吸引。社會主義吸引人的地方，在於能夠提供摒棄「中國昔日傳統和西方今日操縱」的實踐思想。¹ 此外，社

¹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Utica, 1976), 111, 137;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1976), 100.

會主義所追求的理想目標還沒有在西歐和美國出現，中國如能接受社會主義，將可以在思想上領先於資本主義國家。這一微妙的心理滿足感，來自與西方打交道時的普遍失落感及為克服這種情緒的內在欲望，因此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特別具吸引力。

馬克思主義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吸引力，因為有蘇維埃的友好示意和誘人的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而進一步增強。莫斯科急於要贏取友誼和樹立新形象，兩次宣佈——1918年和1919年²——願意放棄舊沙皇在中國的特權和利益。儘管在1920年的時候，蘇維埃的立場有些改變，並且建議透過談判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為贏取中國承認的方法——但蘇維埃的舉動最終還是帶來了良好的影響，因為這不僅顯示了一種主動和單方面的友好姿態，而且與傲慢貪婪的帝國主義列強的行為完全不同。

在這種友好示意之外，還有那振奮人心的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列寧宣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不可避免的產物；當資本主義到達頂點時，正如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那樣，便不得不追求海外市場，以銷售過剩產品及購買原材料。此時，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相互猜忌與競爭，必將導致衝突和最終滅亡。因此，亞洲和其他不發達地區的受壓迫人民，應該奮起反抗外國帝國主義，加速擺脫外國枷鎖。列寧主義的理論，給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慰藉，因為它不僅譴責西方應為中國的苦難負責及預言資本主義的即將滅亡，而且也在世界革命中給亞洲一個席位——反駁了大多數歐洲馬克思主義者先前的立場，堅持認為世界的問題只能在西方及靠西方來解決。

事實上，馬列主義在思想上的吸引力、蘇維埃政權的主動示好及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實際成功，共同在中國創造了一股澎湃的思潮。馬列主義研究小組開始大量湧現，以追求知識和言論自由而著稱的國立北京大學成為激進主義的溫床。早在1918年中期，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便公開承認信奉馬克思主義，並且稱讚布爾什維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同樣重要，是一種「偉大的、世界性的及基本的力量」。他預示中國將

² 通過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 (G. V. Chicherin) 於1918年7月4日和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 (Leo Karakhan) 於1919年7月15日宣佈。

經歷一場更偉大的再生革命，並於1918年秋創建了新潮社，不久又創建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李大釗在1918年11月號的《新青年》上，撰文慶祝「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又於1919年編輯了一期馬克思主義專號。他在圖書館的辦公室也幽默地冠以「紅樓」的名稱，年輕而熱切的追隨者經常到這裏來拜訪，包括他的學生瞿秋白和張國燾，以及他在圖書館的助手毛澤東——這幾個人注定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領導人。

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衝擊，與五四運動的力度一樣，產生令人震驚的效果。然而初期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熱烈支持民主、自由和國際主義，而沒有太關注帝國主義問題，現在他們堅決地切斷對西方的依賴，並發誓要將中國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政治上的行動主義成為新的口號。在這批如夢初醒和熱情好戰的知識分子中，最重要的是陳獨秀。他深受五四運動中學生所起的作用的強烈影響，也參加了隨後的遊行，但於1919年6月11日被投進了監獄。他於9月時獲釋後，在保守派的壓力下辭去大學的職位。他以上海為其新居所，更加沉湎於馬克思主義。到1920年中期，他對西方的信任已徹底破產，並且認為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用來「欺騙人類以保持政治力量」的工具。³ 陳獨秀成為第二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人物，並於1920年5月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8月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些組織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前身。

與此同時，另一個小組也聚集在李大釗周圍，1919年12月，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改由社會主義研究會代替。1920年3月，北京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小組聯合組成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19年，兩名俄國人穆勒(A. A. Muller)和布林特曼(N. Bortman)給李提供了幫助，但組黨的具體步驟，一直要到1920年初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來華後才開始，他是第三(共產)國際或簡稱「共產國際」的代表。3月，他和李就組黨一事進行交談；不久，前往上海與陳商談。這兩次重要會談的結果，主要是決定在上海建立由陳領導的黨支部，在北京建立另一個由李領導的黨支部。只要聯合兩個黨支部，便可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統一起來。

³ Meisner, 113.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後來稱為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寄宿學校召開。⁴ 代表57名黨員的12名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⁵ 但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沒有出席——陳在廣州，周佛海代表其小組，而張國燾代表李的小組。儘管他們兩人都缺席，但41歲的陳獨秀和32歲的李大釗仍然被尊稱為黨的共同創始人。雖然中央黨部在上海建立，但李在北京的支部卻仍然保持著實際上的獨立地位。「南陳北李」的說法顯示了緊密統一的黨組織還沒有誕生。

他們不僅形成兩個地方派系，而且對於工人和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的看法也大相徑庭。陳獨秀贊同歐洲馬克思主義者重視工人及明顯貶低懶散的農民大眾的普遍看法。他認為進步的城市力量應充當運動先鋒，而落後的農民應順服的跟從，並說：「農民分散，力量不易集中，文化低落，生活欲望簡樸，並且易傾向保守主義……這些環境因素使農民難以參加革命運動。」⁶ 瞿秋白同樣不接受農民能在改造中國社會中充當領導的想法。另一方面，對社會變化充滿浪漫想法的李大釗卻持相反的觀點，強調農民的重要性：「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佔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總人口中，他們佔據了重要地位，農業依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因此，當我們估計革命力量時，我們必須強調農民是重要一部分。」⁷ 李大釗對鄉村的純樸有著天生的熱愛之情，而深厭城市生活的腐化。他督促年輕的知識分子，要以俄國民粹運動* 的精神到農村去解放農民，激發他們的革命能量。實際上，他在農民的解放中看到了中國的解放。⁸

* 譯者注：民粹運動 (narodnik) 產生於十九世紀六十到七十年代的俄國，許多革命青年受到當時「到民間去」的口號影響下，紛紛到農村去，發動農民反對沙皇制度，代表當時農民群眾推翻專制政權的革命要求。

⁴ 博文女校。

⁵ 包括毛澤東，但在法國的周恩來和在德國的朱德沒有參加。

⁶ Meisner, 242.

⁷ Meisner, 239.

⁸ Meisner, 81.

儘管黨支持陳的立場，但李的看法卻也提供了另外一種強有力的選擇，並且深刻影響了年輕助手毛澤東的思維。1918年，李向毛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並且成功地以民粹派對農民在革命中的角色的民族主義觀點激發了他。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遭軍閥張作霖處決後，毛澤東堅持農民鬥爭，將其導師的理念付諸實踐。

國民黨的改組，1923–1924年

布爾什維克革命不僅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而且促進了國民黨的改組。長期以來，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對於黨內缺乏團結與紀律，以及西方不願意幫助他發展中國，深感失望。自從1912年民國建立以來，他面臨著黨內的阻力和抗命，而且難得有合作的機會。兩次重大改組——從同盟會到1914年的中華革命黨，再到1919年的中國國民黨——之後，黨內合作仍無改進。孫中山依然不斷受到明目張膽的反叛行為的困擾，比如1922年陳炯明的軍事政變及先前發誓對他效忠的南方督軍的公開阻撓。

同樣令孫中山困惱的是，西方只是支持軍閥，而對他制定的國際發展中國計劃則不感興趣。早在1913年，西方帝國主義者就透過五國銀行團，贊助袁世凱2,500萬英鎊的貸款，袁用這筆貸款鎮壓了「二次革命」。特別是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提供軍火給袁世凱，阻撓孫中山和黃興在香港登岸。袁死後，帝國主義者支持各地軍閥，煽動國內衝突，對孫中山的求助裝聾作啞。巴黎和會對中國在山東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而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見本書第534頁)也只不過是平息了英美兩國和日本的關係，遑論解決中國的問題，這一切都證明西方欠缺誠意。

民國期間，孫中山受到三方面問題的折磨：外國帝國主義、黨內紛爭和國內衝突。對這幾個問題，他難以迴避，但也無能為力。在挫折中，他發現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輝煌成就倍加令人鼓舞，蘇維埃的友好示意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教人歡欣振奮。正如他將俄國的成功歸於良好的黨組織和嚴格的紀律，孫中山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紀律腐敗、

組織鬆散及思想灌輸不力。孫中山急於採取蘇維埃的成功模式來改組國民黨，並且為其國民革命尋求蘇維埃的援助。

孫中山還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個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它已經和勞工組織形成密切聯繫；另一個是五四運動後，年輕一代人所懷抱的熱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高漲的民眾精神。因為兩種力量都與他一樣，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主義」的共同目標，所以孫中山準備將新鮮血液注入他那有些陳舊的組織。

然而，孫中山需要等候時機，才可以學習蘇維埃成功的秘密和改組國民黨，因為孫中山只不過是廣州革命政府而不是北京合法政府的領袖，所以不可能是莫斯科與之談判的首選對象。1920年，俄國派遣了優林 (M. I. Yurin) 和巴伊開斯 (A. K. Paikes) 到北京談判一項條約，但軍閥政府在英國和日本的建議下，婉拒了這個友好的示意。蘇維埃又轉向了強勢軍閥吳佩孚，並且順勢地將其改稱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然而，在英國的壓力下吳佩孚沒有做出回應。在這個情況下，蘇維埃才「重新想起」孫中山，據說他於1918年發送了祝賀電報給列寧，而令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深受鼓舞。⁹

1921年春，共產國際的荷蘭代表馬林 (H. Maring) 與孫中山在廣西會面，他對孫的民族主義者精神和革命觀點，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孫中山而言，他很高興得知蘇維埃的新經濟政策，而且天真地比作自己的實業計劃。不久，馬林深信國民黨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而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利用國民黨已經建立的基礎，發揮其影響力。他鼓勵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理由是國民黨本身不只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而是所有階級的聯盟。陳獨秀和李大釗勉強地屈服於他的壓力，1922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李大釗通過國民黨要員張繼的介紹，首先加入國民黨。

孫中山願意接受共產黨員的原因很多。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感

⁹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 (New York, 1956), 138.

到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有權參加其國民革命。實際上，他想利用共產黨與工農的聯繫和蘇維埃的援助來改組國民黨。此外，孫中山也確信在蘇維埃的庇護下，進行階級鬥爭的共產黨如果迅速獨立的成長，將最終顛覆他的國民革命事業，因此，吸收他們入黨內並及時同化他們是很明智的。最後，孫中山也憂慮蘇維埃可能援助一些對他不友善的軍閥；李大釗和陳獨秀已經在蘇維埃的指示下與吳佩孚和陳炯明發展聯繫，而這兩個人都是國民革命不共戴天的敵人。與蘇維埃和共產黨的友好和聯盟政策將削弱這些軍閥。¹⁰

共產國際派遣了越飛 (Adolf Joffe) 來中國，精心策劃「蘇維埃—國民黨—共產黨」合作的基礎。1922年8月12日，越飛到達北京。他受到了新潮社和其他十三個組織非常熱烈的歡迎，這令西方公使團很是嫉妒，也令軍閥政府十分不悅。隨後，他與孫中山進行了長期的通信和談判；此時，孫已決定了「聯俄容共」的政策。9月4日，五十三名國民黨領導人在上海的會議上批准了這一政策。這項政策也成為國民黨改組的最重要的原則。一個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九人委員會獲任命掌管改組之事，並於1923年1月1日公佈了一份由胡漢民起草的宣言。

1月12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並參加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陳獨秀勉強地接受了這個命令，因為他擔心國民黨會對中國共產黨中的工人農民黨員產生腐化影響。陳評論道：「只不過是因為第三國際的壓力，中國共產黨才勉強承認在國民黨內開展活動的必要性。」¹¹ 然而，中國共產黨本身並沒有解散；共產黨員是以個人而不是以集體名義加入國民黨，並同意接受國民黨領導者的命令。在公開場合，中國共產黨承認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領導和中心力量。

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和越飛談判達成一項聯合宣言，包括四個要點：(1) 目前在中國不適宜實行共產主義或蘇維埃體制；(2) 蘇維埃政府再次確認早在1920年9月27日有關放棄在華特權與利益的宣

¹⁰ 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臺北，1963），第2-3頁。

¹¹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58), 53, 60.

言；(3)就未來中東鐵路的管理與重組達成相互諒解；(4)蘇維埃否認在外蒙古有任何帝國主義企圖或政策。¹²

孫中山在與越飛的談判中，展現了一位冷靜務實的政治家的風采。儘管他急於尋求蘇維埃的援助，但他拒絕用共產主義代替三民主義；也沒有把領導權放棄，交由馬克思主義者來執行紀律和命令。他決不懷疑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佔據領導地位，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是相反。共產黨人是以個人而不是以集體名義加入，目的是避免「黨內集團」或「黨內有黨」的尷尬情勢。從表面看來，孫中山是以自己的條件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蘇維埃在孫中山和越飛的協定之後，派遣經驗豐富的外交家鮑羅廷(Mikhail Borodin)來中國，幫助孫改組國民黨；另外，派遣格林(Galen)來幫助訓練一支黨的軍隊。此外，隨行的還有約四十位蘇維埃專家。1923年8月，孫中山委派年輕的將軍蔣介石*直接赴蘇維埃學習軍事體制、紅軍的政治思想，以及布爾什維克黨內的紀律方法。蔣介石經過三個月的訪問後回國，不久，孫授命他組建位於廣州城外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第一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於1924年1月20日至30日舉行，共有165名代表參加。孫中山在大會上強調黨內團結的重要性，以及為了民族統一和重建而發展一個強大的組織。他號召黨員為了革命目標，應不惜犧牲個人自由和無私奉獻自己的才智。會議期間，列寧於1月25日逝世的消息傳來，大會休會三天，以示悲傷和悼念——這是公開確認與蘇維埃友好和結盟的新政策。

當然，儘管有些國民黨黨員不反對與蘇維埃結盟，但卻不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孫中山耐心地向他們解釋，既然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致力於反帝反軍閥，那麼在共同的鬥爭中兩黨就應該聯合起來。1924年1月28日，李大釗技巧地宣佈，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為了獻身革命，並沒有任何推動共產主義事業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共

* 即蔣中正。

¹² 完整文本見Conrad Brandt, Benjamin I.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London, 1952), 70–71.

產黨員是以個人而不是以集體名義加入；因此即使他們有雙重黨員身分，也不能譴責他們在國民黨內形成「黨內集團」。李反復強調，只要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他們將會遵守其命令，並接受其訓練行動。他強烈否認從內部滲透和推翻國民黨的任何企圖。¹³ 儘管李大釗已解釋，但不變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本身並沒有解散，加入國民黨的成員也沒有失去共產黨員資格。事實上，國民黨內有了一個共產集團。

孫中山為了革命的利益，接納了共產主義者，但他似乎沒有認識到其行動的全部含義。他仍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認為共產國際既然贊成這樣一個聯合，那麼就會幫助他控制共產黨員，甚至會教導這些人服從他。他還抱有幻想，以為在適當的時候，少數共產主義者有可能會納入在人數眾多的國民黨的官僚組織內。孫中山沒有認識到的是，莫斯科的真正意圖是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嫁接到已經成長的國民黨的身軀上，這樣共產黨就能夠從內部顛覆國民黨，奪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像榨「檸檬」一樣將右翼分子排擠出去。¹⁴

同時，大會還創建了一個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五人主席團。¹⁵ 大會以一份宣言結束。這份宣言強調反帝反軍閥的立場，致力於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宗旨，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決心。

國共合作只不過是一場追求利益的結合，雙方都需要對方，但也厭惡對方。國民黨在振興黨、發展一支黨的軍隊和進行國民革命中渴望得到蘇維埃的援助；並且期望利用共產黨與工人、農民和人民大眾的聯繫。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想利用國民黨的基礎來擴大影響，並最終從內部顛覆國民黨。在這微妙的關係中，只要對雙方有利，合作就會持續下去；而雙方都希望在對方表現不濟時，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孫中山的地位與威望是把各種成分連接在一起的決定因素，但一旦他去世，分裂勢力就不受約束，日益坐大。

¹³ Wilbur and How, 149.

¹⁴ Schwartz, 80.

¹⁵ 其他成員包括孫中山本人、胡漢民、汪精衛和林森。

北伐與國共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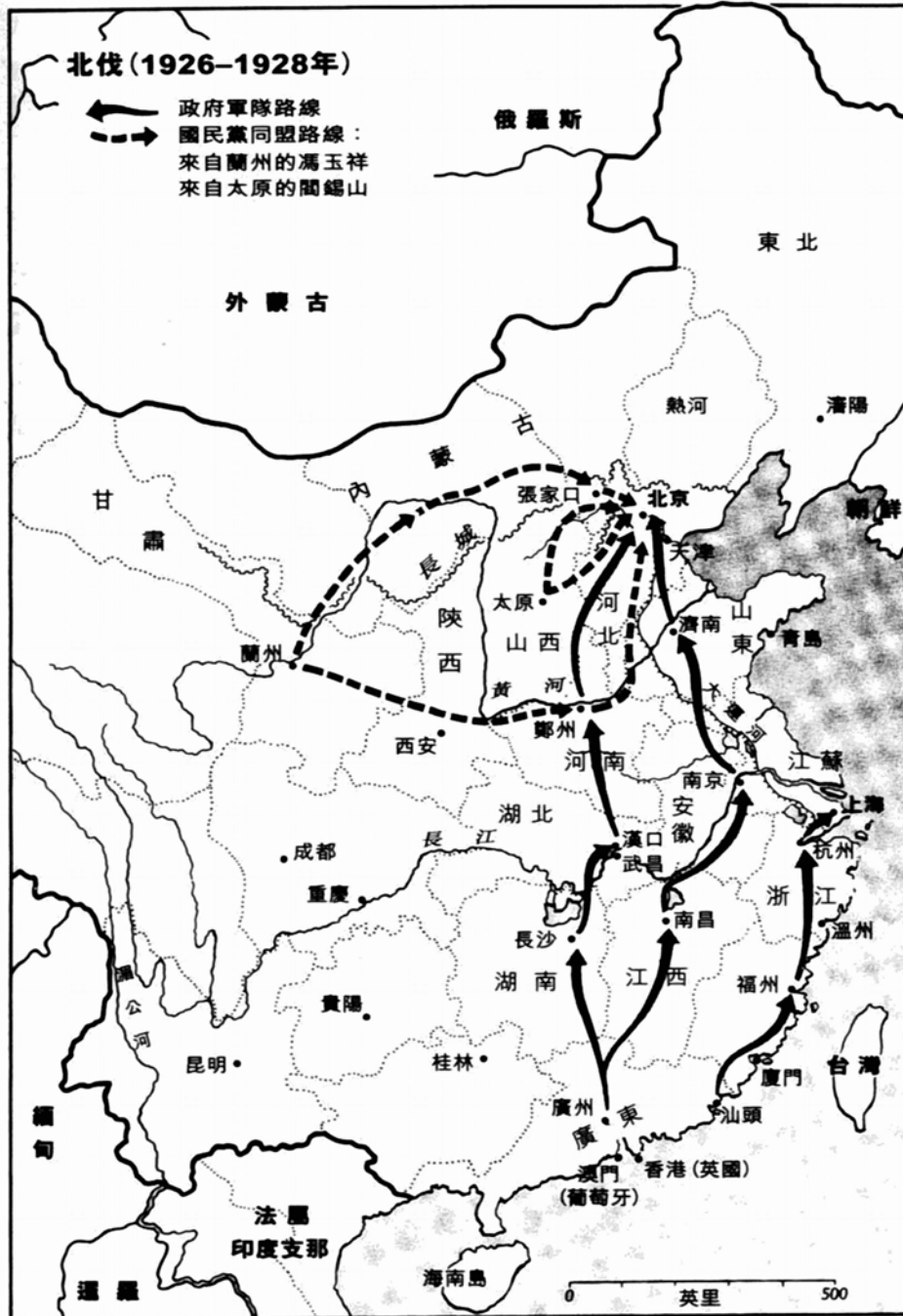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之後，急於恢復拖延已久的北伐來掃蕩軍閥，並挫敗軍閥背後的帝國主義支持者。但他於1925年3月12日去世使這個計劃流產。

孫中山的政治重任就落在汪精衛和胡漢民身上，兩人分別是國民黨的左派和右派領導人。但是軍權卻為蔣介石把持，蔣是黃埔軍校的校長，負責發展軍官團體以充實黨新建立的軍隊。軍官在接受軍事訓練的同時也受到政治思想教育，以便士兵在革命的政治使命方面得到正確的教導。孫的親信廖仲愷擔任黨代表，何應欽是軍事總教官。在軍校及黨的軍隊中，一切命令和規章都要經過黨代表的連署，才可以生效及由校長執行。軍校政治教育部的副主任正是年輕的共產黨員周恩來，第四期畢業班的學生中有一位就是林彪。

軍官很快成為勢力強大的軍事力量。他們鎮壓了1924年10月的港粵商團叛亂，¹⁶ 驅逐了叛變省長陳炯明，挫敗了各種各樣的西南軍閥。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這處與敵對軍閥的對抗中相對安全，並與北京軍閥政府相對立。汪精衛獲選為主席。隨後國民政府在廣東和廣西進行了一系列平息軍事叛亂運動，到1926年2月兩省的所有反抗勢力都遭到鎮壓。國民政府決意再度北伐，並於6月25日任命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包括6,000名黃埔軍官和85,000人的軍隊。7月27日，蔣開始了著名的征伐北方軍閥的軍事行動。當時北方軍閥分佈如下：

1. 直系軍閥吳佩孚控制著河南、湖北，直隸和湖南的部分地區，以及京漢鐵路。
2. 奉系軍閥張作霖已在北京自封為總司令，控制著東北、直隸、山東，以及京奉鐵路和津浦鐵路。
3. 已從直系退出的孫傳芳在南京自立，統治著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和安徽東南五省。

¹⁶ 由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組織的。



此外，西北還有兩派獨立的武裝力量，既不屬於那些軍閥集團也不屬於革命軍隊，然而，他們傾向同情後者。分別是：

1. 馮玉祥的「國民軍」，早已撤退到西北而受直系和奉系勢力的壓迫。
2. 閻錫山在山西所建立的穩固根據地，沒有參加國內戰爭。

蔣介石的戰略是首先討伐吳佩孚，然後是孫傳芳和張作霖。由於得到蘇維埃的援助，¹⁷ 共產黨的先遣代表又組織農會、工會，並在城市中發動罷工和破壞，加強了國民革命軍的力量。從廣州到華中，北伐軍勢如破竹，1926年9月攻下武漢，11月拿下南昌，12月佔領福州，1927年3月進駐上海和南京。九個月內，佔中國半個部分的南方被攻佔了。軍事行動成績斐然，前途一片光明。就在此時，國共分裂的徵兆出現了，威脅著要破壞黨、中斷北伐。

爭論主要是發端於雙重身分的問題，以及由此而來的「黨內有黨」的推論。國民黨員接納了個人身分的共產黨員，希望他們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及服從命令。但是，共產黨要求其黨員接受自己的命令，在國民黨內部形成一個秘密集團。簡而言之，持有雙重身分者被期望成為名義上的國民黨員而在實際上是共產黨員。衝突的命令自然引起涉及紀律這一敏感問題的摩擦。儘管緊張氣氛持續上升，但孫中山在世時，公開破裂仍是沒有發生。

1925年8月廖仲愷遭刺殺後，大約15名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右翼成員¹⁸ 離開廣州，前往北京城外的西山，並於11月23日在孫中山的靈柩前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在這裏，他們發佈了一個宣言，號召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在廣州的國民黨左派以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通過有效決議而譴責西山會議派。左派召開自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譴

* 譯者注：實際上與會者為14人，戴季陶聲明與會但沒有出席。

¹⁷ 1924年10月至1925年12月蘇維埃給國民黨的援助達200萬盧布。參見Wilbur and How, 169。

¹⁸ 包括戴季陶、林森、居正、張繼、鄒魯。

責西山會議派的決議，並且要求於1926年1月1日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鮑羅廷的權勢非常懾人。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監察委員會中贏得了新的席位，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成員也增加了。在執行委員會的九人常務委員會中，三人是共產黨員，三人是共產黨的支持者。國民黨中央黨部九個部中有五六個是受共產黨員的控制：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海外部和青年部。¹⁹ 面對這些發展，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建立自己的黨部，這標誌著與廣州黨部的分裂。

火上澆油的是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這一天受中國共產黨影響的中山艦船長綁架蔣的企圖失敗，蔣反過來解除了船長、所有的蘇維埃顧問、第一軍中的黨代表及其隸屬的軍事人員的職務。在一定意義上，這是蔣與共產主義者決裂的第一步，然而，為了即將到來的北伐的利益，沒有宣佈公開分裂。但是蔣很快採取了針對共產黨員的一些限制性措施。1926年5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九項決議，限制所有委員會內共產黨員的名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而且從中央黨部部門的領導職務上清除共產黨員，並禁止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儘管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拒絕這些決議，並決定組織自己的軍事力量，但史太林(Stalin)不希望在這時候加速分裂，因此命令中國共產黨為了留在國民黨內而忍受這些決議。²⁰

在國民黨成功地將這些限制強加給共產黨之後，蔣於1926年7月開始北伐。如前所述，蔣的軍隊進展神速，平定了華中之後，國民黨決定於1927年1月1日將政府從廣州遷往武漢。同時，中國共產黨收到了史太林的一項日期標註為1926年11月30日的命令，指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軍隊中強化政治工作，改善軍事知識，以待軍中要職。

武漢政府處於鮑羅廷和國民黨左翼的統治下，兩個重要的部門工人部和農民部皆由共產黨員負責。²¹ 後者積極執行史太林1927年3月3

¹⁹ 蔣永敬，第10-11頁。

²⁰ Conrad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Cambridge, Mass., 1958), 76.

²¹ 分別是蘇兆征和譚平山。

日的新命令，這項命令號召強化群眾運動，武裝工農，並動員群眾，擾亂及攻擊國民黨右派。這些額外的活動在武漢的控制區，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特別明顯。

蔣同時指揮了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迅速地在中國東部和東南部建立了權力基礎。他故意對鮑羅廷所提出跳過上海以便進攻北方的建議置之不理，反而揮軍直攻那個金融中心的大門。在上海，共產黨控制的總工會已經發動了一場破壞性的罷工，動員其武裝的糾察隊，進攻地方要塞，並從內部成功地控制了城市。他們不知道是否應該與蔣介石合作，只好等待莫斯科的命令。史太林仍然希望避免分裂，要求上海工人「埋起武器」與蔣「避免任何衝突」。這樣，3月22日，蔣的軍隊未遇反抗就開進了城裏。²² 北伐軍乘勝繼續進攻，3月24日攻佔南京，隨後控制了福建、浙江，以及江蘇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區。很明顯，武漢和南京形成國民黨統治階層內的兩個權力中心。分裂迫在眉睫了。

蔣在寧滬金融財團的支持下，下定決心懲罰共產黨。1927年4月10日一場「清黨」運動組織起來了，並且發佈命令，解散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部。從4月12日開始，全面的清除共產黨的運動開始了——首先是在上海，然後是在南京、漢口、福州、廣州和其他一些地方。國民黨的軍隊、警察和特務襲擊共產黨小組，槍擊可疑者，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及解散工會。當清黨運動結束時，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令人吃驚的是，蔣在清黨期間公開宣稱與莫斯科的友好關係，顯示他的爭執只是局限於與本土的共產黨。

在共產黨的抗議下，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武漢政府於4月17日解除了蔣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蔣對此不可能置若罔聞；一天以後，在胡漢民的幫助下，他在南京組織了自己的國民政府。兩個權力中心之間的裂痕擴大成為不可跨越的鴻溝。

鮑羅廷為了與蔣在上海和南京的成功互相抗衡，建議武漢政府應自己向北京發動「二次北伐」，²³ 以尋求與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合作。

²² Brandt, 112–113.

²³ 從廣州到武漢的軍事行動被稱為「第一次北伐」。

這個計劃受到共產國際的新代表羅伊 (M. N. Roy) 的反對，理由是依靠馮和閻的支持太危險了。羅伊和鮑羅廷之間發生了尖銳而相互貶抑的交鋒。4月18日，汪精衛領導下的武漢政府決定雙管齊下，先發動北伐，隨後發動東征。這個軍事計劃的部署，是武漢軍隊與馮玉祥軍隊在京漢鐵路會師的三個月後佔領北京。²⁴

如計劃所定，武漢軍隊成功攻進河南，重創奉系軍隊，與馮玉祥在重要的鐵路中心鄭州會師。然而，馮一旦在河南站穩腳跟，就比鮑羅廷所想的更為獨立。閻錫山的問題也更為棘手；閻拒絕聯合，因為武漢代表了共產主義政權而南京是真正的國民政府。同時，蔣沿津浦鐵路成功地進行了自己的北伐，並於1927年6月2日佔領徐州。

這時，馮玉祥建議由蔣、武漢和他自己進行聯合北伐。對鮑羅廷和陳獨秀而言，聯合北伐就意味著「聯合清共」，因此他們斷然拒絕了這個提議。隨後，馮玉祥於6月20-21日在徐州拜會蔣，表面上是要在南京和武漢之間進行調停，實際上是要協力進行反共行動。²⁵ 會議以馮玉祥公開要求驅除鮑羅廷和共產黨員而結束。

馮玉祥的變節和閻錫山的拒絕合作，不僅粉碎了鮑羅廷的北伐，而且使武漢陷入敵對勢力的包圍中。雪上加霜的是史太林與托洛茨基 (Trotsky) 權力鬥爭的影響。隨著蔣的勝利，托洛茨基指責史太林在中國的拙劣領導及違反列寧最重要的原則，即只有當共產主義者保留他們的組織獨立性和行動自由的時候，與資產階級分子的暫時合作甚至是結盟才是允許的。托洛茨基問道，在國共合作中，共產黨的行動自由何在？為了證實他的中國政策是正確的，史太林極度需要一場勝利。1927年6月1日，他發了一封電報給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命令他們：(1) 組織一支包括二萬名共產黨員和五萬名工人農民的新的武裝力量；(2) 在武漢重組國民黨；(3) 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增加工農成員；(4) 不待武漢政府的命令，沒收當地土地；(5) 設立一個國民黨特別法庭，審判反革命者，而不可涉及共產黨員。事實上，它是號召組

²⁴ 蔣永敬，第196-199；202頁。

²⁵ 蔣永敬，第381頁。

建一支獨立軍隊，把武漢變成一個僅置於汪精衛傀儡領導之下的共產主義政權。鮑羅廷和陳獨秀認識到這個命令是行不通的，於是就要求羅伊去執行。為了顯示他的善意和誠信，羅伊就向汪精衛展示了這封電報。到這個時候，汪精衛才認識到史太林的真正意圖是要摧毀國民黨左翼，把武漢政權變成共產主義的傀儡。然而他沒有立即採取行動來阻止這個陰謀。相反，他於6月6日會見了在鄭州的馮玉祥；馮提出在汪與蔣之間進行調停。

7月13日，鮑羅廷宣佈共產黨員將退出政權，但不退出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將黨部遷往江西九江，並且對武漢的攻擊也逐步升級。7月14日，汪做出了報復，宣佈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在言語和行動上，都違反了國民黨的政策和思想，是有罪的，並且將會受到嚴厲懲罰。兩天後，他進一步宣佈，如果共產黨員退出武漢政府，就要同時退出國民黨、軍隊和各級政府。

儘管看起來汪精衛已經和共產黨分裂，但還能夠容忍他們，沒有立即進行清洗，也沒有將共產黨從國民黨內和軍隊內強制解散。直到7月26日，武漢主席團才在共產黨繼續不斷的辱罵聲中，命令從國民黨內和政府職位上驅除共產黨員，除非他們放棄共產黨員資格。同時，國民黨員不允許參加其他黨派。在這些不利的情況下，鮑羅廷別無選擇，只好於1927年7月27日離開武漢，經蒙古返回俄國。

8月1日，共產黨員借著國民黨左派的名義在南昌起義，最終引致致命的打擊。汪決定命令全面清洗共產黨員，重組重要組織，比如總工會、農會、婦女協會和商會。

既然南京和武漢都清洗了共產黨，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就提議和解。一個特殊的中央委員會在南京成立，行使黨部的權力。在12月10日，武漢和南京之間的所有分歧都解決了：蔣被重新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汪精衛宣佈了出國計劃。

儘管1928年2月武漢政府解散，但政治委員會的一個支部繼續存在著。隨著黨內衝突的最終解決，蔣重新開始北伐。儘管在山東省濟南市受到了日本軍隊的阻遏，蔣仍然能夠越過障礙。在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幫助下，蔣向當時為奉系軍閥張作霖佔據的北京進軍。張逃往東北，1928年6月4日，日本在瀋陽附近的皇姑屯製造火車事故，把他炸

死。²⁶ 7月，他的兒子張學良少帥宣誓效忠國民政府。此後，12月31日，他支持三民主義，「放棄」對東北的地方控制，並且使用國民政府的旗幟，顯示支持國民政府。1929年初，在經過十三年內亂後，蔣統一了中國，或者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由於南京是新的政府所在地，舊首都北京重新命名為北平。

回顧歷史，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國共分裂證明了史太林政策在中國的徹底失敗。史太林想攫取無產階級在國民黨內的優勢，像榨「檸檬」一樣將國民黨右派排擠出去，但是他似乎沒有認識到改組的國民黨，不再是他曾經認為的那樣鬆散和低效的群體。鮑羅廷恢復了黨的結構，而黨的軍隊在格林的幫助下也接受了訓練。最重要的是史太林沒有看到共產黨並未控制軍隊。而且，蔣的政治敏感力看起來處於顛峰，行事果斷堅決，在遠在千里之遙的史太林有機會回擊之前就排擠了共產黨。²⁷ 十年後毛澤東對一位美國記者評論此事時說，鮑羅廷猶豫不決，羅伊是個只說不做的蠢人，而陳獨秀則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²⁸

民族主義外交

在中國，思潮和政治醞釀的時代，也就是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在外交與國內戰線上，中國人的行為受強烈爆發的民族主義情緒所支配。在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人為了獨立與國際尊嚴，努力拼搏；而在會後的時期內，中國人為了關稅自主、取消治外法權和廢除外國租界，不斷地與帝國主義列強作鬥爭。中國人要求廢除這些國恥的強烈願望，導致了與外國警察和雇傭軍之間許多的衝突，而

²⁶ 這個陰謀的主使者是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上校，他想渾水摸魚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秩序。東京事先並不知曉這個陰謀，當得知此事時，田中義一首相哀歎道：「愚蠢！他們（關東軍）像孩子一樣行事，卻不知曉父母如何處理。」Takehiko Yoshihashi, *Conspiracy at Mukden: The Ris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New Haven, 1963), 50-51.

²⁷ Schwartz, 80.

²⁸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38), 165.

且經常遭到高壓和不必要的殘酷鎮壓手段，結果就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充滿了中國人憤怒地稱之為「慘案」的事件。民族主義是十九世紀歐洲的動人精神，最終也在中國燃起熊熊烈火，推動人民走向新的使命，將國家從帝國主義和軍閥混戰的雙重苦難中拯救出來。

華盛頓會議 巴黎和會在平等解決山東問題和處理許多太平洋爭端上的失敗，使美國背上沉重負擔。美國為了糾正錯誤及解決巴黎和會的遺留事項，於1920年開始計劃召開另一場國際會議，這就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的華盛頓會議。在遠東和太平洋有切身利益的九個國家參加了會議，即英國、美國、法國、義大利、日本、中國、比利時、荷蘭和葡萄牙。

中國代表團滿懷希望而來，並提呈了一份九點建議書，要求與會國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相互之間停止締結有關中國的條約，尊重中國在未來戰爭中的中立權，廢除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對中國的所有限制；再次審查外國在中國的所有特權、治外法權和租界，為其承諾設定時間期限。這個提議從美國和歐洲代表團那裏得到熱切而同情的回應。

在美國的支持下，中國的建議被合併為四項總原則，而且最終被寫進了1922年2月6日九國公約的文本中。簽約國同意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放棄進一步追求勢力範圍的企圖，尊重它戰時的中立，尊重所有國家的平等商業機會。列強也分別同意於1923年1月1日關閉除了租借地之外的所有在華的外國郵政所，允許中國增加進口關稅，從按照價格的3.5%到按5%徵收。

至於山東問題，則由中日兩國在英國和美國的善意幫助下直接談判。世界輿論，尤其是美國官方和非官方的壓力，使日本放棄了山東，而只保留了一些經濟權利。允許日本保留在山東的日本社團所需要的一些土地和房屋，比如領館建築、公眾學校、墓地和神像。日本國民應被任命為各種公用設施、畜欄和重要企業的顧問；他們也可以在膠濟鐵路擔任五年的總工程師、交通經理和總會計師，而膠濟鐵路由中國用日本貸款購回。總的說來，中國達到了大部分目標，雖然沒有徹底解決所有問題。

年上海一家日本棉紡廠的中國工人為反對低工資而舉行的罷工。商會和其他民間團體達成了初步解決方案，隨後為日籍工廠主人拒絕。工人繼續進行第二次罷工，5月15日又派八名代表與管理層談判。這種對抗造成的結果就是一場暴力衝突，導致一人被殺，另外七人受傷。英國控制的工部局不但沒有懲罰開火的日本人，反而逮捕了許多中國工人，控以擾亂治安的罪名。5月22日，為數眾多的大學生和工人為被屠殺者舉行公開追悼會，並發表街頭演講，譴責日籍工廠主人。其中許多人被警察逮捕，這引發了5月30日南京路上三千名學生的遊行，抗議英日的暴行。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名英國中尉捕頭下令手下開槍，殺死11名中國人，射傷幾十人。此外，約50名學生被捕。

「五卅慘案」激起全國學生、工人和商人的抗議、罷工和抵制日貨運動。直到12月，當英國籍巡捕房總巡及其中尉捕頭被解職，以及工部局給死者和傷者賠償75,000中國銀元，眾怒才得以平息。五卅慘案之後，民族主義騷動在國內不同地方風起雲湧，與帝國主義爆發衝突。

在這些爆發事件中，上海公共租界內的中國人不遺餘力地抗議「交稅卻無代表權」。1926年，外國選民作出讓步，決定允許三名中國人被選入先前由九名外國人控制的工部局。但這個提議一直要到1930年中國人的名額增加到五名的時候才被接受，而外國人的名額則保持不變。

在反帝運動的其他領域裏，中國人成功地收復了許多城市的外國租界地，以及很大程度上的關稅自主權（見下一章）。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民族革命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外國帝國主義遭到了沉重打擊，北伐也減緩了國內軍閥割據的情況。

南京國民政府

隨著1928年北伐的成功，孫中山三階段革命論中的軍事階段完成了，第二個階段即訓政階段也到了實行的時候。1928年10月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一部臨時憲法，稱為《訓政綱領》，目的是令國民黨對政府的指導成為合法。國民黨獲授予雙重責任：督導人們

行使四權——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並監督政府行使五權——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和考試。黨的最高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權力將委託給中央執行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又設有常委會——權力的真正所在地。與中央執行委員會並列的是中央監察委員會，負責紀律事務和監察財政。

政府的主要特色是民國主席之下的五院結構。³⁰ 五院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院，即通稱為「內閣」的行政管理機構。行政院包括十個部，每部由一位部長和兩位副部長領導，另外有一些特別委員會，負責國民建設、海外事務和蒙藏事務等。³¹ 與西方的慣例相反，行政院不對政府的立法機構負責，而是對黨和國家主席負責。

立法院包括44名到99名委員，他們是按照地理區域大小選舉出來，任期兩年。立法院與西方國會不同，本質上是法律起草機構，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採用的立法原則變成法律，職責則包括審查法律、預算、特赦、宣戰，以及締結和平條約。

司法院是國家的最高司法機關，負責解釋法律命令，發佈赦免、減刑及民權賠償，協調法庭體制。然而，卻不干涉法庭裁決。

考試院設定為政府的一個獨立機構，一定程度上是承襲自傳統的科舉考試。屬下有兩個部：考試委員會，管理不同類型的政府考試；人事部，掌管公務員評比。

監察院在功能上與舊的都察院相似，包括19至29名成員，監察政府運作，審計預算，彈劾瀆職官員。

五院各由一位院長和一位副院長領導，通常是國民黨的高級成員。國民政府關鍵官員的首份名單如下：

民國主席：蔣介石（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譚延闓 副院長，馮玉祥

立法院：院長，胡漢民 副院長，林森

³⁰ 胡漢民根據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提出的建議創建的。

³¹ 內政部、外交部、軍政部、財政部、農礦部、工商部、教育部、交通部、鐵道部及衛生部。

司法院：院長，王寵惠	副院長，張繼
考試院：院長，戴季陶	副院長，孫科
監察院：院長，蔡元培	副院長，陳果夫

新政府致力於完成孫中山的遺願——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國民建設大綱，以及孫中山彌留時的呼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須努力！」為執行革命的未竟事業，新政府誓言對外要爭取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令中國贏得一個與列強平等的地位；對內要發起民主建設和社會改革。大家希望六年的訓政時期在1929年結束時，國家可進入憲政時期。

三階段革命——民族的、民主的、社會的革命——的挑戰確實重重，政府的責任重大，其能力是否堪當其任，還要拭目以待。

參考書目

- Adshead, S. A. M.,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 1900–1920* (Cambridge, Mass., 1970).
- Bernal, Martin,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Utica, 1976).
- Bianco, Lucien,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1971).
- Borg, Dorothy,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New York, 1947).
- Brandt, Conrad,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Cambridge, Mass., 1958).
- , 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London, 1952).
- Chan, F. Gilbert, and Thomas H. Etzold, *China in the 1920's: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76).
- Ch'en Jerome. "The Left Wing Kuomintang — a Defini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XXV: Part 3: 557–76 (1962).
- Chesneaux, Jean,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tr. from the French by H. M. Wright (Stanford, 1968).
- Chiang, Kai-shek, *China's Destiny* (New York, 1947).
- ,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New York, 1957).

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臺北，1963年）。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1978).

Elleman, Bruce A., *Diplomacy and Decepti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7* (Armonk, N.Y., 1997).

Fewsmith, Josep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1984).

Hofheinz, Roy, Jr., "The Autumn Harvest Insurre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32: 37–87 (Oct.–Dec. 1967).

———,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Eng., 1977).

Holubnychy, Lydia, *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5*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for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9).

Honi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1986).

Hsiao, Tso-liang, *Chinese Communism in 1927: City vs. Countryside* (Hong Kong, 1970).

Iriye, Akira,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Mass., 1965).

Isaacs, Harold R., *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1951).

Jacobs, Dan N.,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1).

Jordan, Donald A.,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Honolulu, 1976).

Kagan, Richard C., "Ch'en Tu-hsiu's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 *The China Quarterly*, 50:295–314 (April–June 1972).

Kasanin, Marc, *China in the Twenties* (Moscow, 1973).

King, Wunsz, *China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1921–1922* (New York, 1963).

Kovalev, E. F., "New Materials on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II:3:19–36 (Spring 1974).

郭華倫，〈中共史論〉，4卷本（臺北，1969–71年）。

Kuo, Thomas C., *Ch'en Tu-hsiu (1879–1942)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South Orange, N.J., 1975).

- Kuo, Warren,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ipei, 1968), 2 vols.
- Kwei, Chung-gi,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 1922-1949* (The Hague, 1970).
- Landis, Richard B., "The Origins of Whampoa Graduates Who Served i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Studies on Asia*, 149-63 (1964).
- Lee, Chong-sik,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2-1945* (Berkeley 1983).
- Lee, Feigon, *Chen Duxiu: The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1983).
- Leong, Sow-theng,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9-1926* (Honolulu, 1976).
- 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 York, 1971).
- Loh, Pichon P. Y.,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New York, 1971).
- MacFarquhar, Roderick L.,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Papers o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Vol. 9 (1955).
- McDonald, Angus W.,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1911-1927* (Berkeley, 1978).
- Meisner, Maurice,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1967).
- Nathan, Andrew,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Berkeley, 1976).
- North, Robert C.,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Stanford, 1952).
- ,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1953).
- , and Xenia J. Eudin,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Berkeley, 1963).
- Rea, Kenneth W. (ed.), *Canton in Revolutio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Earl Swisher, 1925-1928* (Boulder, 1977).
- Roy, M. N., *My Experience in China* (Calcutta, 1945).
- ,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Calcutta, 1946).
-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58).
-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38).
- So, Wai-chor,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Hong Kong, 1991).

T'ang, Leang-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20).

——, *The Suppression of Communist Banditry in China* (Shanghai, 1934).

Thornton, Richard C.,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mintern Strategy for China: 1928," in M. M. Drackhovitch and B. Lazitch (eds.), *The Comintern: Historical Highlights* (New York, 1966), 66–110.

——, *Chin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1917–1972* (Bloomington, 1973).

Trotsky, Leon,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3rd ed. (New York, 1966).

王聿均, 《中蘇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臺北, 1963年)。

Whiting, Allen S.,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1954).

Wilbur, C. Martin, "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1937,"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 *China in Crisis*, Vol. I, *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Chicago, 1968), Book I, 203–63.

——,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New York, 1985).

——, and Julie Lien-ying How (eds.),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 (New York, 1956).

——,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1989).

Willoughby, W. W., *China at the Conference* (Baltimore, 1922).

吳相湘, 《俄帝侵略中國史》(臺北, 1957年), 第2卷, 第1–2章。

Wu, Tien-wei, "Chiang Kai-shek's March Twentieth Coup d'état of 1926,"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I:3:585–602 (May 1968).

Xing, Jun,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 1919–1937* (Bethlehem, Penn. 1996).

Xu, Xiaoqun, "The Fat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Republican China, 1912–1937," *The China Quarterly*, 1–28 (March 1997).

Yoshihashi, Takehiko, *Conspiracy at Mukden: The Ris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New Haven, 1963).

第二十三章

國民政府：挑戰重重的十年， 1928–1937年

從1928年成立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南京國民政府一直受到內部紛爭和外來入侵的困擾，幾乎沒有一天享受到安寧。成立之始，國民政府就發現受國民黨黨內不同派系的政客和桀驁不馴的「新軍閥」之挑戰。還有兩個更重大的威脅與這種混亂交織在一起：共產黨在東南部地區不斷壯大的對抗和日本在東北、上海和華北日益加劇的侵略。要談論的這十年，真可謂充滿著「內憂外患」。部分原因是由於國民黨在這種勢不可擋的環境下，未能開展急需的社會經濟改革，緩解農民的苦難——這一疏忽將在十年以後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儘管局勢如此不濟，國民政府還是在現代化方面取得了相當進步——尤其是在金融、交通、教育、國防和輕工業等領域。關於這十年國民黨統治的蓋棺定論，還有待於新的檔案資料的開放，然而我們仍是可以比較深入地、準確地追溯這個時期的主要發展線索。

「新軍閥」和派系政客

北伐所取得的國家統一只是徒具表面罷了。儘管有許多北方軍閥被殲滅，但仍有一些軍閥以支援北伐的名義而可以繼續享有權力。蔣中正急於要達成全國統一而與這些軍閥談判，最後達成協議，授予確認軍閥地方性半獨立地位的委任狀，換取他們承認南京政權為中國的中央政權。

其實，部分軍閥在觀念上是相當「進步」的，他們在轄區內大力推動現代化。但他們缺乏效命國家的意識，因為對國家負責就等於失去半獨立的地位。只要與南京之間沒有利害衝突，他們就可以長時間地

與南京合作；但一旦發生利益衝突，這些軍閥就將見機行事，甚至還會與南京國民政府展開較量。他們被稱作為「新軍閥」，統轄的地盤如下：

1. 以李宗仁和李濟琛為首的桂系，控制廣西、廣東、湖南和湖北等省份。
2. 馮玉祥和他的「國民軍」在山東、河南、陝西、甘肅、青海和寧夏等華北和西北省份佔據優勢地位。
3. 少帥張學良控制著東北(滿洲)和熱河。
4. 閻錫山在山西建立了一個穩固的根據地，將勢力擴展到河北、綏遠和察哈爾。

各人都擁有一支龐大的軍隊，既用來擴張地盤，也用作自保。他們抽走了一大部分國家本來就很貧乏的資源，而這些資源是國家重建所迫切需要的。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強調：「一切軍政軍令之權，皆完全屬於中央最高軍事機關掌握，務求軍事絕對統一。」決議還規定將地方財政管理系統集中起來，以防各省挪支法律上屬於中央政府的收入。新軍閥認為這些決議的目的，在於剝奪他們的權力，故要求蔣中正率先裁遣軍隊。但蔣把他的黃埔系將佐和軍隊視為新國軍之骨幹，堅持要從各省部隊開始裁遣。雙方各執己見、互不相讓，全會決議從一開始便注定無效。¹

除了有這些新軍閥的麻煩外，國民黨還受著派系傾軋的嚴重困擾。由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和西山會議派領導的右派，² 與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³ 持續爭鬥；而掌握軍權的後起之秀蔣則代表了一股第三勢力。蔣在黨內地位遜於胡、汪兩人，因此他根據政治需要和權宜之計，定出交替支持左右兩派的權術。蔣在南京新政府中與胡漢民合

¹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1950), 101.

² 包括吳稚暉、張繼、孫科、林森和戴季陶。

³ 包括孫夫人宋慶齡和陳友仁。

作，並推選胡為立法院院長，而汪精衛及其左派門徒則被排擠在外。左派因此抨擊蔣背叛孫中山先生的原則和主張，要求按1924年一大宣言的精神改組國民黨——故被冠以「改組派」的別名。

當南京召開國民會議討論訓政時期臨時憲法（《訓政約法》）時，汪精衛與陳友仁等人於1931年5月，在廣州成立了一個分裂的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進行抗議。面對一個對立的政府和不利輿論之壓力，蔣於12月辭去了南京政府主席之職。接任的是溫和的元老人物林森，而孫科（孫中山之子）則出任行政院院長。這樣的改組之後，廣州方面同意自行解散組織。新的領導人懇請蔣和汪為了國家的利益捐棄前嫌，蔣汪在杭州會晤，並相偕前來南京以示「和解」。1932年1月25日，孫科辭去行政院院長之職，留待汪精衛接任，而蔣則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值得注意的是，汪蔣之所以能夠和解，是由於蔣已在1931年3月與胡漢民分道揚鑣。⁴

這次政治改組在國民黨黨內恢復了某種和平，但並沒有給國家帶來和平。1933年在福建又發生了一場事變，發動事變的是廣東十九路軍的將領，⁵ 該部曾於一年前在上海英勇地抗擊了日軍（參見下一節）。在1932年5月的上海停戰以後，十九路軍被調往福建與中共軍隊作戰，但一到那裏，該部將領便被共產黨的宣傳和野心勃勃的華南政客⁶ 招攬了過去。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州成立了一個「人民革命政府」，將所屬部隊改名為「人民革命軍」，並於1933年11月起反抗中央政府。他們號召對日本開戰，並與中共和蘇聯合作。雖然這場運動具有清晰的左派傾向，但它卻未能從中共那裏獲得援助，中共自己也受到國民政府軍的強大壓力（參見後節）。由於沒有得到關鍵性的支援，福建事變在1934年1月遭到鎮壓，十九路軍被改編為國民軍第七路軍。

我們從以上的概述中可清楚地看到，南京政府在其最初十年中，一直受到內部傾軋和內戰的困擾。雖然應付了這些危機，但本來可用

⁴ 兩人在訓政約法問題上產生了分歧，蔣中正想要搞約法，但胡漢民堅持約法沒有必要。

⁵ 蔡廷鍇將軍和蔣光鼐將軍。

⁶ 李濟琛和陳銘樞。

於國家重建的精力和資源，卻被大大消耗掉了。南京政府要不是兩次從少帥處獲得了幫助的話，命運或許就更不一樣了。然而，正是由於張學良將所有部軍隊調赴華北，而使東北處在一種易受攻擊的境地。日本人很快便注意到了這一點。

日本對東北的侵略

富饒的中國東北地區，以農產豐盛和礦藏豐富而著稱。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日本就一直覬覦這個地區。日俄戰爭後，日本獲取沙俄從前在東北的權益，更加助長了它的野心。隨著1910年吞併朝鮮，許多日本人「順理成章」地把東北看作下一個征服目標。日本人三次——1912年、1916年、1928年——策劃挑唆「滿蒙自治運動」，儘管這些企圖歸於失敗，但那種「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⁷的觀念卻越演越烈。

日本的活躍分子普遍認為中國的混亂無序，將可使計謀得逞；因此任何統一中國的努力都必須予以制止。他們得到了駐東北關東軍的同情和鼓勵。關東軍是日本軍事建制中頗不尋常的一個單位，而它的緣起可追溯到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以後。作為和約安排的一部分，日本接管了遼東半島的俄國租借地和沙俄在東北的鐵路及經濟權益。1906年，日本將包括旅順和大連在內的遼東南部地區更名為關東租借區，受一名總督的節制，該總督的轄區還包括東北的鐵路路區。在十三年時間裏，充任總督的將軍同時也出任當地軍隊的司令。1919年，總督一職改由文官擔任，而另設立關東軍司令部，負責守戍租借區和東北鐵路路區。關東軍效法俄國人以「鐵路護路隊」名義駐紮下來，在東北站穩了腳跟——事實上，由於地位非常穩固，所以在1928年將其

⁷ 這段話經常被說成是出自1927年的「田中奏摺」，這份奏摺實際上並不存在；但是，這份所謂的奏摺包含的想法卻在日本人中間非常流行。事實上，1927年的大連會議便採納了包含這些思想的決議。參見梁敬錚：《九一八事變史述》（香港，1964年），第2-3、197、199、218頁。

司令部從旅順港遷到了瀋陽。關東軍基本不受日本國內的控制，而且享有一種半獨立的地位，自行展開從中國搶奪東北的使命。⁸

關東軍的這一自我設定的使命，在1928年10月石原莞爾中佐及1929年7月板垣征四郎大佐到來後獲得了新的動力。這兩個謀略家很快便成為關東軍的靈魂人物，完全架空了關東軍司令官和參謀長。板垣和石原公開宣揚佔領東北，聲稱要將東北用作對抗蘇聯南進的緩衝地帶和一旦與美國開戰時的補給基地。此外，東北遼闊的領土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緩解日本的人口過密和資源不足，提供商業機會並減輕國內的失業難題。為了辯解這一掠奪行徑，關東軍聲稱東北的三千萬受苦民眾，正殷切期待日本將他們從軍閥和貪官污吏的暴政下解放出來。⁹ 他們認為1931年行動時機非常有利，因為中國正深深地陷入內部動盪和自然災害的困境。中共的威脅日趨嚴重，中央政府投入了一連串代價高昂的圍剿（參見下一節）。大運河、長江和淮河水災肆虐，致使中部十個省份十四萬人被淹死、二十五萬人流離失所，更是雪上加霜。

在國際形勢上也同樣有利。西方列強受大蕭條的沉重打擊，忙於國內事務，無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而國際聯盟（簡稱「國聯」）也毫無力量進行干預。1922年的九國公約保證中國的政治和領土完整，1928年的凱洛格—白里安（Kellogg-Briand）（巴黎）公約擯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但這兩個公約沒有力量執行其目標，因而淪為一紙空文。

在日本國內，經濟和社會困難的不祥之兆，在蕭條衝擊之前就不斷顯現。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獲得巨大發展的工業正承受著生產過剩的影響，導致了企業失敗和失業增加。1927年，包括臺灣銀行等大銀行在內的三十五家銀行倒閉，而在1929年7月到1930年6月之間，約有六十六萬人丟掉了職業。¹⁰ 此外，世界性的大蕭條急劇地削減了日本

⁸ Sadako N. Ogata, *Defiance in Manchuri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931–1932* (Berkeley, 1964), 3–4; Takehiko Yoshinashi, *Conspiracy at Mukden*, 37, 130–31.

⁹ Ogata, 42–45.

¹⁰ Yoshinashi, 12, 116.

與美國、英國和中國的貿易。許多擴張主義分子利用由此產生的經濟和社會動盪，鼓吹征服東北將可使國家擺脫困境。言論得到了陸軍和財閥的讚許。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前，軍人傳統上是遠離政治的。但隨著田中義一將軍在1925年被推選為政友會總裁及在1927年出任首相，軍方領袖便呈現為國家政策中的一股強大勢力，損害了政黨政府機制。軍方領袖指責文職領導人失職無能，尤其是接受華盛頓會議(1922年)設置的「侮辱性」的5：5：3海軍噸位比例，並批准了確認這一比例的倫敦海軍協定(1930年)。軍方抨擊、嘲笑、欺凌文官政府，大肆叫囂要推出一項令日本控制中國，並最終控制世界的極端政策。他們堅稱這項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征服東北。由於東北75%的外國投資出自日本，儘管財閥傾向於和平滲透而非赤裸裸的軍事征服，但也支持加緊行動。

東京的軍事當局設定1932年春為佔領東北的行動時間，但關東軍急不及待。按例行規定，1931年夏季板垣和石原可能調任其他職務，這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關東軍的迫切感。1931年6月，派往東京請求立即入侵東北的花穀正少佐，成功地贏得了最有影響力的軍方人物之贊同。

日本天皇擔心軍方桀驁不馴的行為，於是在9月10日和11日一再敦促謹慎忍耐。9月15日，陸軍大臣南次郎派遣參謀本部的建川美次將軍前往瀋陽「約束關東軍不要採取鹵莽行動，並警告他們不能指望從政府方面獲得支援」。當這項使命的消息被參謀本部的第二部偷偷傳給了關東軍時，板垣和石原斷然決定在建川信使得以發佈約束指令之前策劃事變。建川於9月18日抵達瀋陽，他被狡猾的板垣迎去出席一個豐盛的酒會，隨後被灌得不省人事。據說建川私下裏贊同關東軍的陰謀，故他聽憑自己落入延誤發佈指令的圈套。¹¹

晚上十點，一枚炸彈在瀋陽郊外的南滿鐵路路段爆炸。事實上炸彈的損害微乎其微，並沒有中斷正常的鐵路運營，但日本巡邏隊聲稱爆炸過後中國士兵從野地裏開火，所以別無選擇，只得還擊「自衛」。

¹¹ Ogata, 58–59.

至翌日凌晨三點四十分，瀋陽城牆遭攻破，該城被佔領。9月19日長春被佔，20日安東和營口被佔，21日吉林被佔。

東京與本莊繁司令官都知道這次蓄謀已久的入侵陰謀，但沒有採取行動予以制止，聽由關東軍的戰地官佐掌握了日本的命運，並把日本帶上了軍國主義、征服和最終敗亡之路。許多人認為1931年9月18日的瀋陽事變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事變的消息於9月19日凌晨兩點正傳到了東京。政府在未來行動方針上發生了分歧。陸軍大臣和參謀本部要求支援關東軍，理由是該部官佐的愛國熱情不應受打擊。以若槻為首的文職內閣原則上反對軍事佔領東北，他們對關東軍的頑固舉動大為頭疼，但無力予以阻止。9月19日中午時分出現了難以挽回的分裂局面，此時，內閣宣佈了一項不侵略政策，而陸軍大臣卻宣稱陸軍毋需就未來計劃與內閣商議，而將依靠關東軍的判斷行事。儘管內閣駁回了本莊繁要求增援三個師團的請求，並禁止朝鮮駐軍統帥部派軍隊赴東北，但關東軍卻繼續獨自推進，朝鮮統帥部也在9月21日違抗命令，派遣援軍前往東北。若槻一度扣押了朝鮮征討部隊的軍費以作抗爭，但9月23日最終屈服於軍方的壓力，這樣便實際贊同了東北事變。當國家亟需政治領導之時，若槻沒能提供這種領導。¹² 此後出現了一段「互不信任」時期，文官政府一再宣稱它不擴大戰事的政策，而軍方則繼續在東北推進。若槻一步一步地被迫接受陸軍的「既成事實」，由此而來的尷尬導致了這屆內閣在1931年12月垮臺。

國際制裁姍姍來遲。新一屆英國政府上臺才一個月，便受困於國內難題。英國公眾輿論令人驚訝地偏向於日本，認為日本在東北的行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倫敦《時報》聲稱「日本有充足的理由，但卻令人遺憾且毫無必要地把自己放在了做錯事的位置上」。美國採取寬容的姿態，稱東京不可能對這一破壞巴黎公約的行徑負責，因為關東軍是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行動的。蘇聯只需西伯利亞邊境不受侵犯，也就不採取任何行動。¹³ 這樣，就只剩下中國單獨面對敵人了。

¹² Ogata, 65-69; Yoshihashi, 9, 235.

¹³ Ogata, 7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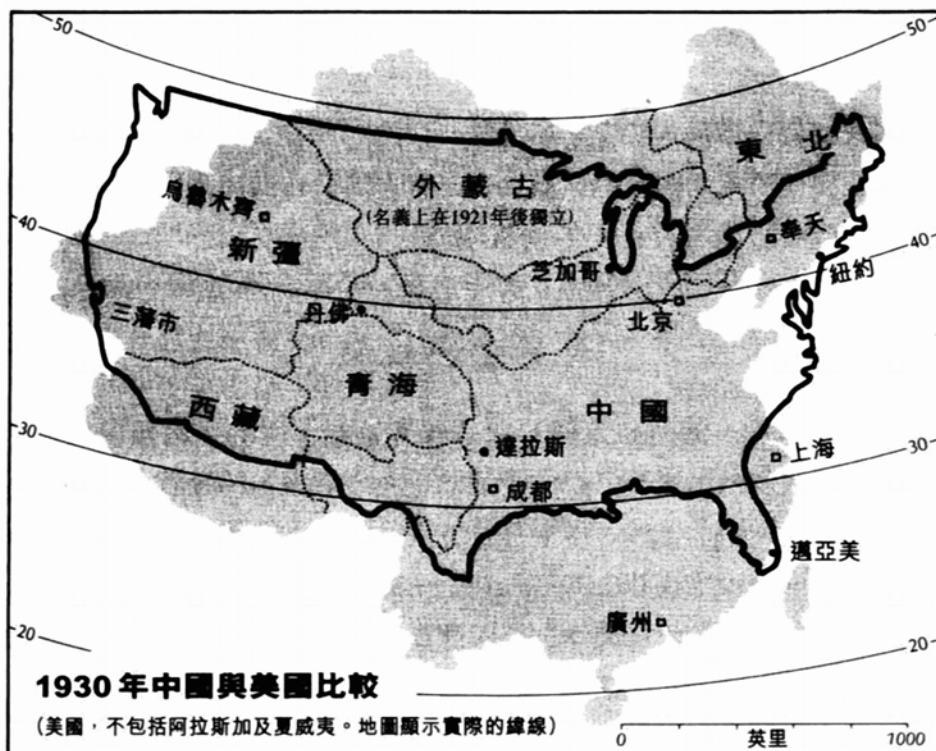
事實上，日本的進攻在中國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1931年9月11日，蔣中正告誡少帥不要與日本人交戰，9月15日，駐瀋陽的東北軍主力被調離開。當9月18日衝突爆發時，病倒在北京的少帥再次請示，但再一次受命不作抵抗。深深陷入內部爭鬥的蔣中正經不起一場對外戰爭。於是他決定向國聯呼籲，儘管他完全明白國聯沒有力量實施干預，但他找不到其他任何辦法。他指望通過向這個國際組織呼籲來拖延時間，組織防禦，並等待日本國內政治發生有利於他的轉折。處於某種不得而知的原因，他並沒有尋求與東京直接談判。南京政府的這種政策經常被簡單化地稱作不抵抗政策，但實際上它是一種「不抵抗、不妥協和不直接談判」的混合。這樣一種消極的方法是很難達到積極的結果的。要是南京政府授命東北軍抵抗入侵者，侵略的氣焰或許會被壓制一下，從而給東京較為溫和的文官政府，提供一個在中國問題上擁有更大發言權的機會。此外，要是南京執行一項與東京談判的積極政策的話，也許可能獲致更為有利的結果。¹⁴ 不幸的是，南京沒有遵循這兩種方針中的任何一種。相反，它依賴於向東京抗議和向國聯呼籲。12月10日，國聯決定派一個調查團前往東北。

美國方面則於1932年1月7日借國務卿史汀生 (Henry Stimson) 之口宣佈了「不承認主義」。通過這個宣言，美國宣佈不承認任何與1928年凱洛格—白里安 (巴黎) 公約條款和義務相悖的手段所獲致的狀況、條約和協定，該公約擯棄了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

在未遭受任何有效的國際制裁和中國方面協調一致的抵抗的情況下，日本軍隊在五個月裏席捲了整個東北。中國方面僅有的英雄主義閃光發自於一位地方將領——黑龍江代省長馬占山——他不顧眾寡懸殊的不利局勢頑強抗擊敵人。他挫敗入侵者的能力激勵了地方民團和「義勇軍」的興起，他們盡最大努力打擊日軍。然而，這些零星的、缺乏協調的抗日運動最終都沒有能抵制住敵軍的侵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開闢了第二條戰線，企圖將國際視線從東北轉移開來，但在那裏遇到廣東第十九路軍和現代化的中央軍第五軍的猛烈抵抗。與敵軍周旋達一個多月後，中國的防線崩潰了。

¹⁴ 梁敬錚：前言，第iii、vi頁。



南京政府撤退到中原的洛陽。後來，通過國際調解，1932年5月5日達成了一項停火協定，據此，日本人同意撤出上海和吳淞的佔領區。

為使赤裸裸的侵略合法化，日本人在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滿洲國」為傀儡國，以圖給即將來臨的國際聯盟調查委員會留下東北事變具有「地方特性」的印象。1912年遜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受冊立為執政，一幫大清遺老文士充任大臣。¹⁵ 由印度代理總督李頓 (Lytton) 勳爵率領的委員會在東北逗留了六個星期 (4月21日-6月4日)，至9月提交了調查報告。委員會沒有被假象蒙騙，譴責日本為侵略者，並駁斥日本方面聲稱「滿洲國」乃東北自發運動。報告還反駁了日方所謂的在東北的軍事行動純為自衛所必需的論調，並將「滿洲國」標明為在日本文武官員控制下的一個傀儡國家。因此，國聯拒絕承認「滿洲國」的合法性；但除了這個道義譴責之外，根本沒有其他任何事情可做。

日本的反應是極其傲慢和無禮的：它撤出了國聯。

¹⁵ 其中包括出任國務總理的詩人兼書法家鄭孝胥。

日軍的推進最後因為有1933年5月31日簽定的《塘沽協定》而告一段落，該協定將冀東劃為非軍事區，中日軍隊從該區撤走。結果，北平和天津的防禦便失去了屏障。

在完成了東北四省的征服以後，日本人於1934年3月1日讓溥儀登上偽「滿洲國」的皇位，定年號為「康德」。

共產黨的挑戰

除了受日本的外來入侵、派系政客及新軍閥的內部傾軋之威脅外，國民政府還面臨著來自共產黨的更大、更根本的挑戰。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中共分成了兩個性質各異的實體：由莫斯科培養的黨員所領導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轉入地下活動，而毛澤東則在湖南和江西農村自行其是。政治局遵循共產國際在城市中發動罷工、怠工和暴動的策略，但毛澤東卻在遠離國民黨控制的地方組織農民力量及發展蘇維埃區。毛澤東所採取的非正統做法，令他處在了與莫斯科和中共政治局「對立」的地位；然而他最終取得了共產黨採用的所有策略中最大的成功。

共產國際的政策 中共的革命策略基本上是由史太林在幾千英里以外遙控的，而他的指令時而是憑空想像的產物，時而是與托洛茨基爭吵的結果。在國共分裂以後，托洛茨基宣稱中國革命已跌落到了低潮時期，所以要求採取一項謹慎的和平滲透政策。但是，史太林卻堅持說中國正經歷著一個革命高潮，故完全應當開展武裝活動，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史太林在蘇聯權力鬥爭中擊敗托洛茨基，確保了他的路線得勢，於是向中共發來了舉行武裝暴動的指令。

1927年8月1日，一批共產黨人¹⁶在一支新建的一萬五千人工農軍隊的支援下在南昌發起暴動。他們控制了南昌城三天，隨後國民黨軍隊就將他們團團圍住了。8月5日，共產軍衝破封鎖逃至粵閩贛交界地區。南昌起義這個史太林空想的產物完全失敗了。

¹⁶ 包括賀龍、朱德和周恩來。

就在這時，中共領導層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改組。在1927年8月7日召開於漢口的一次緊急會議上，陳獨秀因提倡「投降主義」而遭罷免了黨的領導權，由史太林的一個門徒瞿秋白以中央政治局總書記的身分接替。中央政治局是一個取代中央委員會角色的新設機構。史太林中意的另一人李立三被推選負責宣傳工作。在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明納茲(B. Lominadze)的指導下，這些領導人接受了莫斯科稱在中國發動武裝起義和建立蘇維埃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教條。備受屈辱的陳獨秀在譚平山的支持下組織了第三黨。

毛澤東自行進入了湖南，鼓動民眾的不滿情緒，這種激憤孕育成了1927年9月7日的秋收暴動。在毛澤東的鼓舞和指導下，暴動農民搗毀了粵漢鐵路的一些路段，控制了湘省的幾個地方，開展「清算鬥爭」和土地革命。然而，毛澤東發動的這第一次暴動遠算不上成功。在政府軍的進攻下，毛澤東被迫逃往湘贛交界處的井岡山整頓隊伍。素不贊同農民運動的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11月會議上，主持通過了一項決議，稱「沒有工人階級領導和幫助的純粹的農民暴動，不可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¹⁷ 秋收暴動的失敗使毛澤東丟掉了政治局委員的職位。

為加強武裝暴動，莫斯科派聶伊曼(Heinz Neumann)¹⁸ 前來中國。在他的指導下，1927年12月11日，廣州爆發了一場暴動。¹⁹ 共產黨人控制了廣州城三天，建立了「廣州公社」和一個蘇維埃政權。但這個勝利維時很短暫，在政府軍和廣州工會工人的聯合進攻下，暴動遭突然鎮壓了。

隨著這些城市暴動接連失敗，毛澤東在農村的活動開始呈現出重要性。1928年1月23日，朱德和陳毅前來井岡山與他會師，他們合併後的部隊組成了紅四軍，以朱德為司令，毛澤東為「黨」代表。從此誕生了聞名遐邇的朱毛領導。7月，他們將司令部遷至江西瑞金，在那裏

¹⁷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58), 104.

¹⁸ 一名德國間諜，化名A. Neuberg。

¹⁹ 由張太雷和葉挺領導。

建立了一個蘇維埃政權。²⁰ 在陝西，劉志丹和高崗也創立了另一塊共產黨根據地。這兩個邊區中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管轄範圍以外活動。

在1928年7月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為避免國民黨的襲擊，也為了與共產國際的國際代表大會同地舉行，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之召開是為了清除托洛茨基的影響——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受到了批判，而瞿秋白則因他的「左傾偏離主義」受到抨擊。大會號召（一）推翻國民政府及摧毀其軍事力量；（二）在中國建立蘇維埃；（三）開展土地革命及沒收地主財產；（四）通過驅逐帝國主義者以達成中國的統一。朱毛在江西—湖南腹地的活動被承認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合法的（雖然並不是模範的）手段。大會選舉向忠發和李立三為新的領導人，前者擔任總書記，後者擔任宣傳部長。黨的總部機關仍秘密留在上海。

在上述兩人中，李立三充滿活力和口才出眾。他在1929年6月到1930年9月之間上升為黨內的強人。1929年10月，共產國際告誡他應充分準備好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之來臨。不久，1930年7月，在華中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內戰，李立三利用這種形勢發動罷工和怠工，並在彭德懷率領下派新組建的紅軍，進攻湖南省會長沙。長沙城被攻克了，但這個勝利轉瞬即逝。三天之內政府軍就奪回了長沙並給予作亂者以重創。鹵莽的「立三路線」之失敗，導致共產國際代表米夫 (Pavel Mif) 請求莫斯科解除李立三的職務，米夫對李立三嚴密控制中共的做法很是不滿。共產國際派瞿秋白調查這件事，但他攻擊李立三就必然要批判克里姆林宮 (Kremlin) 的政策。進退維谷的瞿秋白於是作了隔靴搔癢式的指責。但是，共產國際和「留學生幫」(參見下文) 對李立三發起了一場來勢洶洶的大批鬥，指責他的（一）「機會主義的消極態度」，因為他一味依賴世界革命的前景；（二）「小資產階級沙文主義」和「大中華主義」，因為他誇大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三）「冒險主義」，因為他錯

²⁰ 不過，這並非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最早的蘇維埃於1927年11月在廣州附近的海陸豐地區建立。參見Etō Shinkichi, "Hai-lu feng: The First Chinese Soviet Govern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8:163–83 (Oct.–Dec. 1961); 9:149–81 (Jan.–March 1962).

誤理解了「高漲」和「直接革命」的意思；(四) 托洛茨基傾向，因為他提到了將中國革命直接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²¹ 作為史太林在中國的失誤的代罪羔羊，李立三被送往莫斯科作檢討。他在那裏受到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嚴厲譴責，並被送到列寧大學學習以糾正錯誤。瞿秋白的遭遇更慘；他被指責為兩面三刀、宗派主義、「見風使舵」，以及受鮑羅廷、陳獨秀和其他那些討厭人物的影響，在農村和農民問題上持錯誤觀點。²² 一個月後瞿秋白被排擠出中共政治局。

黨的領導權落入了王明(陳紹禹)和博古(秦邦憲)手裏，他們是中共內部「國際派」的領導。該派由二十八個曾於1926–1930年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留學生組成，在1930年初回國後，被稱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的史太林派」。1931年1月，他們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接管了政治局。

毛澤東的自行其是 相對來說，在中共中央機關管轄範圍以外活動的毛澤東和朱德，沒有受黨內鬥爭的影響。他們在江西和湖南腹地，開展著獨立的、相對來說不太正統的活動，組織農民和創建蘇維埃。他們採取了游擊戰術，發動了「平均主義」的土地革命，將重新劃分的土地一視同仁地分配給富裕和貧窮的農民。他們在不依靠共產國際或駐上海黨領導人之幫助或指導的情況下，發展了一塊自給自足的根據地，而對駐上海的中央領導人保持一種「陽奉陰違」的態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從來沒有真正贊成毛澤東的活動，而莫斯科也僅僅是因為中共領導的其他所有起義均告失敗才勉強容忍它而已。毛澤東日益壯大的力量和越來越強的獨立性，與黨中央機關的處境形成鮮明對照，中央機關備受領導層不穩定、從自身埋頭作經濟重建的蘇聯那裏得不到財政支援，以及國民黨大肆迫害等因素的困擾。國民黨大肆搜捕共產黨，以致中共在漢口的秘密機關首腦²³ 遭逮捕並被迫供出了黨

²¹ Schwartz, 151–63.

²² John E.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 (Stanford, 1966), 241.

²³ 顧順章。

人的名單。這也使總書記向忠發在1931年6月24日被捕及隨即被處決。黨的命運一落千丈。

毛澤東意識到政治局處境的狼狽，因此大膽邀請政治局委員出席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降格地駕臨毛澤東的首都，他們的意圖不是來支援他的運動，而是來改變他的非正統行為。在大會召開之前，他們召集了一次黨內會議，會上通過決議，譴責毛澤東沒有採取堅定的「階級和群眾路線」、搞游擊戰術、在土地革命中持「富農」思想等錯誤。他們指責毛的狹隘的經驗主義、「機會主義的實用主義」和「總體的理論貧乏」。會議結束時，他們號召無產階級領導土地改革、擴大紅軍、開展正規戰爭以替代游擊主義。這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完全地擯棄毛澤東式的方法，並企圖取代他建立的機制。²⁴

但是，毛派分子在代表大會上完全控制了局面。在粉碎了國民黨的頭二次圍剿（見下文）以後，他們充滿著成就感和自信心。由於他們控制了大多數選票，所以輕鬆地挫敗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並且保住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位。一些前任的黨領導人被吸收進他的政府，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職位分配中受到冷淡對待。他們中只有三個人，包括缺席的王明，被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博古則沒有獲得任何職位。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取得重大的勝利，以及使他的活動贏得更多的承認，並非靠蘇維埃政府的護佑，而是由於他自己根據五個重要原則發展起的一套非常現實的策略：（一）農民大眾的支持；（二）他自己的黨政機關；（三）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四）一塊遠離國民黨控制的穩固的根據地；（五）自給自足。²⁵ 但是，毛澤東的勝利還是不徹底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嚴密把持著政治局，不讓毛澤東進去。毛澤東仍然是一個處在與中共中央機關對立地位的「局外人」。在代表大會以後，博古和大多數政治局委員返回了上海，籌劃與毛澤東的下一輪較量。

²⁴ John E.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 (Stanford, 1966), 247-248.

²⁵ Schwartz, 189-190.

布爾什維克與毛派在一些非常根本而難以調和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在土地改革問題上，毛澤東主張將各類土地一視同仁地平均分配給小地主、富農和貧農，而政治局委員們卻堅持要徹底剝奪地主，並按犧牲富人偏袒窮人的原則重新分配土地。他們指責毛澤東持落後的農民思想，階級意識動搖及薄弱。在軍事戰略上，毛澤東傾向於誘敵深入的靈活的游擊戰術，紅軍在根據地內「集中優勢兵力攻敵之薄弱點」，確保「各個擊破，每戰務殲滅敵軍或大或小之一部」。通過「急速迂回包抄」，紅軍可以迷惑敵人，贏得戰鬥。²⁶ 相反，政治局則堅持打陣地戰以保衛根據地，並向白區推進而非等待敵人入侵紅區。在日本侵略的敏感問題上，毛澤東宣稱他願意結成統一戰線，建立一支由所有願意抗擊敵人的武裝力量組成的聯合軍隊，而政治局則拒絕與改良派合作，主張迅速擴大紅軍隊伍，以便當需要來臨時，紅軍能擔當起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進攻的崇高職責。毛派與布爾什維克之間的隔閡非常之大，因此要達成「和解」似乎不太可能。

毛澤東的問題不光是面對政治局；他還必須對付國民政府的進攻。確實，蔣一直在馬不停蹄地組織對中共的清剿。

國民黨的圍剿 蔣在1927年驅逐俄國軍事顧問後，越來越多地尋求德國的幫助以發展軍隊。1928年，他任命一次大戰期間魯登道夫(Ludendorff)將軍的助手鮑爾(Max Bauer)上校為他的顧問，從此一個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逐漸開始成形。1933年，著名戰略家席克特(Hans von Seeckt)將軍前來協調對中共的圍剿，次年他負責德國顧問團。1935年3月他因身體欠佳被迫辭職，此後顧問團便由福根浩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將軍領導。通過這些顧問的努力，蔣發展起了一支五十多萬人的德式中央軍。

從1930年到1934年，蔣對中共發動了五次圍剿。²⁷ 前四次從1930

²⁶ Rue, 272.

²⁷ 關於這些圍剿的日期和國民黨軍投入圍剿的兵力，各種記載有所不一。我的資料主要引自國民黨的官方資料；參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臺北，1965年)，第2卷，第20章。

年12月19日到1933年4月29日，均告失敗。就在此時，中共內部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1932年下半年或1933年初，博古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²⁸抵達瑞金，他們的目的是打擊毛澤東的威信，並撤換他在軍隊和黨內的親信。他們斥責毛澤東的「平均主義」方法，強行開展一場激進的土地調查，以求消滅地主、打擊富農、使中農中立，並使貧雇農站到黨的一邊。從這場運動中籌集到的資金將用於擴大紅軍。毛澤東無奈地同意此舉，因為他無法反對支撐和擴大紅軍的資金需要。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正組織第五次圍剿，戰事開始於該年10月，共有七十萬人參加。蔣在與德國顧問商討後，採取了一種「戰略進攻和戰術防禦」的態勢，命部隊步步為營，並依靠封鎖和步步進逼的經濟扼殺手段。部隊在推進中修築要塞碉堡，不斷加緊圍困，直至切斷紅區的所有外來補給。蔣宣稱中共問題的本質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故他在光復地區大力推行鄉村重建和保甲制度。這次圍剿進展很慢，但很穩健。

此時的毛澤東面臨著一種極其危難的處境——不僅是國民政府正在實施猛烈的進攻，而且政治局委員也在竭盡全力地從內部詆毀他。在第二次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幾乎喪失了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支配權。雖然他在1934年1月再度當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但他卻失去了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控制，該委員會被置於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佔優勢的十七人主席團之下，其中的一位張聞天從毛澤東手裏拿走了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該職務相當於蘇維埃政府的總理。儘管毛澤東保留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之職，但這一職位已被布爾什維克架空為某種虛銜，他們一意要讓毛澤東成為有名無實的領導。最後的致命打擊發生在1934年7月，其時，在瑞金的博古和在莫斯科的王明合謀從共產國際獲取了一份指令，將毛澤東隔離起來，禁

²⁸ 他的真名是布勞恩 (Otto Braun, 1900–1974年)；參見他的回憶錄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Stanford, 1982), 278。由Jeanne Moore從德文翻譯成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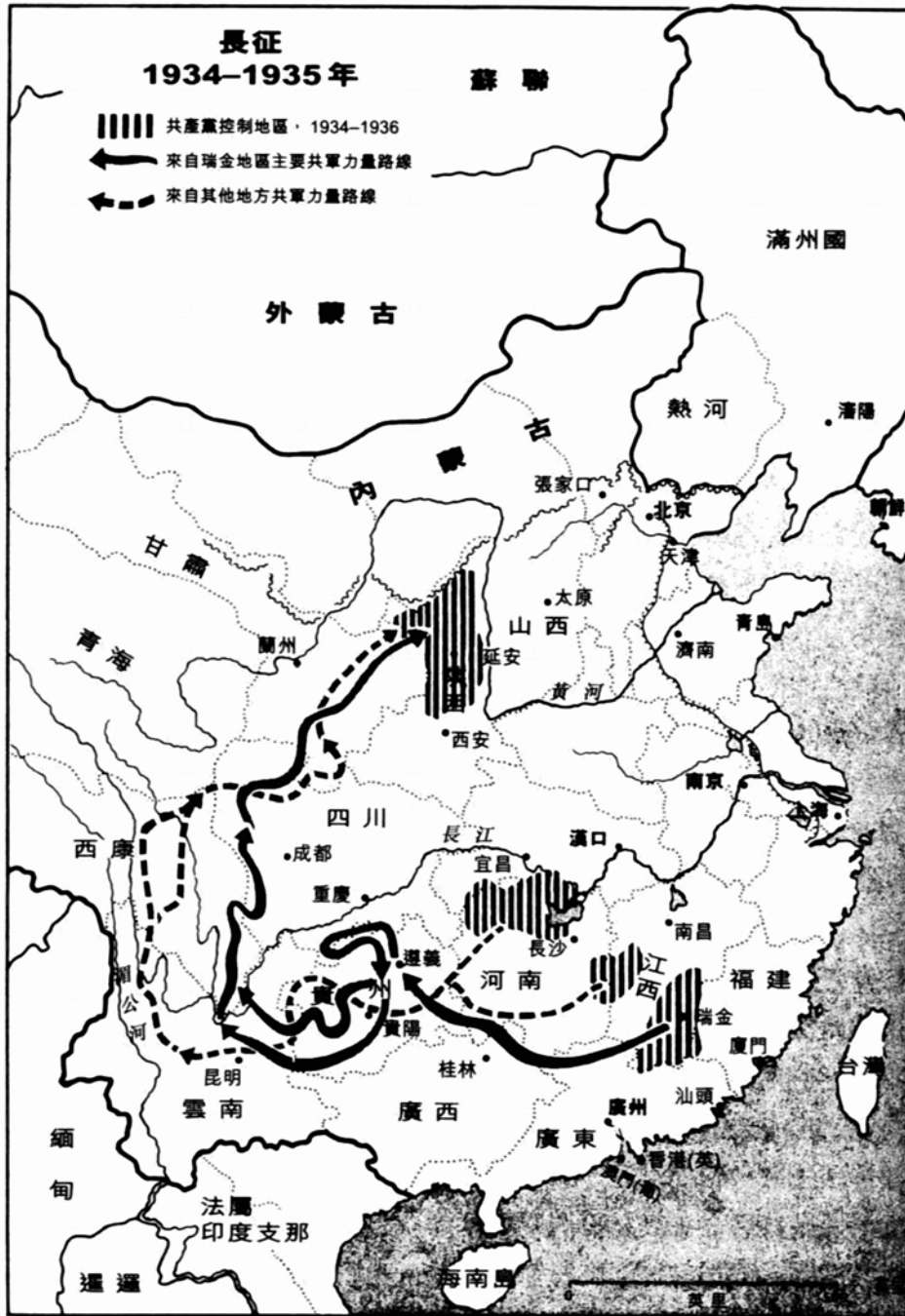
止他出席黨內會議。從7月開始的三個月裏，他被軟禁在瑞金以西六十英里處的雩都，直到是年10月長征開始時才被釋放。²⁹

長征和遵義會議 國民政府的第五次圍剿，將敵人趕出了創建十七年之久的江西根據地。從軍事角度來說，中共的失敗主要是由於李德的戰略錯誤，他以陣地戰取代了毛澤東的經受考驗的游擊戰。在1934年上半年，紅軍一直承受著難以計算的損失，到了年中，幾乎要被打垮了。毛澤東想讓紅軍突破包圍及化整為零開展游擊戰，但李德控制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紅軍以整軍而不是分散成小股游擊隊突圍。身體強壯者獲准參加突圍，而傷病者則受命留下。1934年10月15日，長征正式開始，參加者有八萬五千名戰士、一萬五千名黨政幹部和三十五名高級領導人的妻子。一些不受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喜歡的毛派分子和黨的前任領導人被留下來保衛根據地，其中有粟裕、陳毅和瞿秋白。毛澤東的兩個孩子也被留了下來。1934年11月10日，瑞金落入國民政府之手。

最初指揮長征的是由李德、博古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部隊的士氣非常低落，政府軍的狂轟濫炸，促使一些軍政領導人逐漸對李德和博古的無能領導感到失望。這些人感到奇怪，為甚麼共產黨能在前三次反圍剿中戰勝國民黨，卻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敗得那麼慘。此外，他們對李德的傲慢和專橫作風也很不滿。他們認為，李德的做法儼然是總司令，而他實際上只不過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一個軍事顧問而已。更糟糕的是，全面負責的黨總書記博古與他沆瀣一氣排擠他人。各人強烈地感到必須把這兩人趕下臺。

一位主要的政治局委員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率先表達了這種感受。王稼祥認定李德和博古必須「拉下來」，並向毛澤東透露了他的憂慮。毛澤東表示贊同，但竭力主張謹慎行事，先仔細作準備再最後攤牌。隨後王稼祥對幾個重要幹部進行了游說，並贏得了他們的支持，這些人中有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紅軍總司令朱德和中央革

²⁹ Rue, 263–64.



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他們全都對李德的領導懷有相似的疑慮。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黨的領導人在會上決定不久後將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檢討自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和西征(長征)以來的軍事形勢。此時，兩種趨勢變得非常明顯：第一，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希望改組領導層，第二，毛澤東的威信大增，因為他代表了與李德和博古相對立的正確路線。

1935年1月7日，紅軍佔領了貴州省的第二大城市遵義，兩天後，中央機關進入該城。經過幾天密鑼緊鼓的籌備，1月15-18日，在一個從前軍閥(柏輝章)的公館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共有十八個正式成員和兩個列席成員參加會議。與會者全都是中共黨內和紅軍內的重要幹部，即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及主力部隊的司令和政委。³⁰會議主持人博古首先作了政治報告，接著周恩來作了補充的軍事報告。隨後，毛澤東對李德和博古的軍事領導錯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指責他們犯了「左傾冒險主義」，並堅稱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根據地的丟失和紅軍的差點毀掉應由這種冒險主義負責。

毛澤東說話完畢，王稼祥就發言強烈支持毛澤東。其他人，包括張聞天、周恩來和朱德都發表了相同的看法。在猛烈的批評面前，博古無法否認失敗的鐵定事實；他就一些客觀困難作了蒼白無力的辯解(即：帝國主義對國民黨的支援、敵人的優勢兵力等等)。李德拒絕承認錯誤；他與翻譯坐在門口絕望地一根接一根抽煙。³¹只有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為他辯護，但無濟於事。木已成舟，李德和博古必須讓道。沒有記錄表明會議結束時作過投票表決，儘管毛澤東後來說過王稼祥投了「關鍵一票」，但這或許是指他在安排召開遵義會議中所

³⁰ Benjamin Yang, "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 A Survey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hina Quarterly*, 106:241 (June 1986)。李德和翻譯伍修權作為列席代表出席了會議。目前中共官方公佈的與會者名單中包括《紅星報》主編鄧小平。

³¹ 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星火燎原增刊》，第1卷，第19、26頁(1982年)，由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起的作用。同樣，當時也沒有通過任何決議，雖然後來張聞天起草了一份決議總結了會議議程。³²

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會委員及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³³ 1935年2月5日，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3月又成立了一個新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是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在這三人中，王稼祥病得很重，而周恩來則唯毛澤東是從，毛澤東現在成為了同僚中的首要人物；因此，本質上他掌握了實權。不久，在張聞天的幫助下，毛澤東取得對軍事的絕對控制權，這成為他權力的基礎，以後再也沒有放棄這個控制權。

遵義會議並沒有給予毛澤東徹底的勝利，但它卻是他爭取最高權力道路上的一大躍進。然而即使在他大獲全勝之際，毛澤東仍然免不了經受挑戰。中共元老張國燾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他拒絕承認會議決定。他對選擇陝北作為長征的最終目的地有異議，而主張向南或向西朝西康或西藏方面發展。分裂發生了，張國燾率所部進軍西康，而毛澤東和大部分政治局委員及所部推進陝北，在那裏，高崗和劉志丹已建立了一塊蘇維埃根據地。

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領的部隊在經過一段時間極其艱難的爬山涉水之後，到達了保安縣的吳起鎮。在這場史詩般的二萬五千里（六千英里）長征結束之時，毛澤東所轄的部隊只剩下了八千人。此後，由賀龍、張國燾和朱德率領的其他隊伍陸續到達，加上當地的中共武裝，隊伍擴充到三萬人。1936年12月，中共首腦機關遷到了延安；毛澤東在那裏以自己為核心整頓了黨和軍隊，並從事理論著述。他現在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實際領袖。1938年，毛澤東獲得了另外兩項對他權威的承認：蘇聯的一部百科全書承認他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當選為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的籌備委員會主席，七大後來於1945年召開。就是在

³² 博古相當「體面」地承認了失敗，後來他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作了一次自我批評。他在1946年死於空難。但是，李德卻死不認錯，他一度無事可幹；後來他在延安被派去訓練騎兵及在紅軍大學執教。1939年他搭乘載周恩來赴莫斯科接受治療的同一架飛機離開了。他在1974年死於東德。

³³ 其他政治局常委委員是張聞天、陳雲、周恩來和博古。

這個時候，毛澤東才完全勝利：他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和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另外，他的思想被接受為黨的指導原則。

回顧歷史，遵義會議必須看成為一次政治會議而非一場軍事政變。³⁴不過，有那麼多身為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及部隊指揮員的軍事領導人出席了會議，這本身就極大地支持了毛澤東對李德的錯誤軍事戰略進行批判。嚴格來說，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開是史無前例的，因為不符合黨章或黨內規則和附則；但不管怎樣，它是中共黨史上和毛澤東上升到權力頂峰之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西安事變和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地位的急劇改變，與共產國際世界革命戰略的根本轉變相符合。共產國際在歐洲面臨著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的崛起，而在亞洲則面臨著軍國主義日本之崛起；在1935年8月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共產國際敦促各國共產黨與左派和反法西斯團體組成聯盟，反對那些布爾什維克和馬克思主義的公開敵人之威脅。在中國，組建統一戰線的政策還可以有緩解國民政府對中共之進攻的好處。

從1936年起，中共開始提倡與各方黨派、團體和軍隊結成一個反日大同盟。在中共的倡導下，「全國抗日解放聯盟」、「人民抗日同盟」和「全國救亡社」等民間組織應運而生。一些頗具說服力的口號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和「立即對日開戰；停止剿共」等廣為流傳，在愛國民眾尤其是在北平、南京和上海的青年中激起了強烈反響。民眾的壓力激烈高漲，要求停止內戰，將槍口轉向日本人。

如前所述，南京政府已定下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略。隨著共產黨突入西北孤地，蔣急切地想一勞永逸地消滅他們，於是自信地下令張學良督率的東北軍³⁵和楊虎城統率的西北軍對中共發動進攻。但戰事

³⁴ Yang, 250.

³⁵ 該部在1933年的塘沽停戰協定以後從平津地區調防到了陝西。

無所進展。思念家鄉且厭惡內戰的東北軍官兵越來越受統戰宣傳的影響。中共代表開始滲透到東北軍的軍官訓練團，到1936年夏季，張楊兩位統帥也被招攬到了統一戰線一邊。

12月3日，蔣飛抵張楊駐節地西安，希望穩定那裏的不安局勢，並加強圍剿力度。在那裏，12月12日拂曉，東北軍第一零五師和張學良的衛隊第二營發動了兵變。蔣被囚禁，少帥提出了八項主張：

1.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派各黨共同負責救國。
2. 停止一切內戰。
3. 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將領。
4. 釋放一切政治犯。
5.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之一切政治自由。
6. 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7. 確實執行孫總理遺囑。
8.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12月14日，東北軍、西北軍和中共軍隊組成了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張學良出任委員會主席，表明他或許抱有某種領導統一戰線的秘密野心。

西安事變和綁架蔣震驚了中外。國民黨右派領袖立即決定進行討伐，並派飛機到西安展示實力。中國再一次處在了內戰的邊緣。此刻共產黨發覺發動兵變者急於反蔣甚於抗日，並且料定任何大規模的國民黨進攻將必然把他們(中共)捲入其中，從而損害他們的事業。莫斯科也意識到中國的內亂只會有利於日本，蔣應該被放出來領導抗日。中日開戰肯定將緩解日本對蘇聯的壓力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壓力。在這些考慮的促動下，周恩來從幕後現身前臺進行調停。中共的態度一夜間從「反蔣抗日」轉變為「聯蔣抗日」。

這一轉變令少帥措手不及，迫於輿論壓力，他終於同意釋放那位本想待價而沽的俘虜。1936年12月25日，蔣在一度囚禁他的人之陪同下飛回南京。張學良自願聽從懲罰。一個特別軍事法庭判處他十年監

禁外加剝奪五年公民權，但蔣以張學良迅速悔過為由出來說項，由此監禁處罰被免除。但他還是被軟禁起來。³⁶

儘管蔣堅持不會以獲釋為條件而簽署任何協定，但他最終還是承諾，只要共產黨答應支持三民主義，就可以參加未來的抗日戰爭。剿共停止了，但政府對西北紅區的封鎖仍然繼續。

西安事變可以說是一件不幸中之大幸的事，既幫助統一了國家，也停止了內戰。蔣中正不再被看作是抗擊日軍的絆腳石，而是具新使命的民族英雄，領導中國統一戰線以抵抗外來侵略者。

成敗得失：十年回顧

雖然國民政府處在無窮無盡的內外交困境地，但卻努力繼承孫中山重建國家的遺志。這頭十年結束時的記錄，表明了金融、交通、工業發展和教育領域的一些進步。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卻忽視了十分急需的社會和經濟根本改革，並推行一種不負責任的財政赤字政策——這兩點都造成了根本性的深遠影響，最終導致災難性後果。以下是對這十年得失的簡要回顧。³⁷

金融改革 最顯著的成就是用銀元代替銀兩，與推行紙幣「法幣」為合法貨幣。儘管在1914年就推行銀元為基本的貨幣單位，但由於傳統及感覺上的便利，銀兩仍然在商業活動中使用。這兩種交換媒介的並行引起了混亂和糾葛，因為兩者之間的兌換率受地區和季節的不同而變化。1933年4月4日，國民政府斷然廢除銀兩，以0.715（兩）兌換一（元）的比值用銀元來取而代之。

這個改革剛剛推行就出現了新問題：世界市場上銀價的急劇上揚

³⁶ 他長居臺灣。（譯者注：張學良已於2001年10月15日病逝於美國夏威夷，享年101歲）。1991年他以九十歲高齡接受了Nicholas D. Kristof的採訪，參見*The New York Times*, Feb. 20, 1991。

³⁷ 這一節的資料主要引自：《抗戰前十年之中國》，由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撰，重版（香港，1965年）。

導致白銀迅速從中國外流。持續的外流引起了通貨膨脹、高利率、貨幣短缺、股市跌宕、房地產蕭條和企業倒閉。1935年11月3日，政府最終採取了白銀國有化的大膽措施，並由四大國家銀行以25%的儲備銀發行了一種新的紙幣——法幣。此後，在1936年2月，一套十進位制的鎳幣代替紙幣的輔幣投入流通，這套鎳幣分成五分、一角和兩角，另外還有半分和一分兩種銅板。

四家國家銀行被賦予了不同的職責。其中最大的一家，1934年擁有一億元資金的中央銀行，成為負責保持貨幣穩定的國家核心銀行。擁有四千萬元資金的中國銀行負責外匯管理，而擁有兩千萬資金的交通銀行則委以協助國內工業企業的重任。中國農民銀行經營價值五千萬的農村信用和土地抵押業務。前三家銀行獲准無限制地買賣外匯，目的是穩定匯率。這樣，外匯就由政府銀行控制了，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關稅自主 鴉片戰爭後強加給中國的值百抽五的固定關稅率，時時刻刻讓人想起中國之半殖民地地位，而且刺激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不斷高漲。廢除關稅限制是國民政府自成立起就一直想要實現的目標。國民政府以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為後盾，在1928年7月7日宣佈了兩項指導原則：業已過期的條約和協定將由新的條約和協定取代，而尚未過期的條約和協定將根據法律程序予以廢除或重新簽訂。美國率先在7月24日與中國簽訂了一項平等友好的關稅協定，隨後德國（8月17日）、比利時（11月22日）、義大利（11月27日）、英國（12月20日）、法國（12月22日）和日本（1929年5月6日）迅速仿效。根據這些協定，列強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並進而在原則上同意放棄領事裁判權。

收回外國租界 配合爭取關稅自主，國民黨成功地收回了一些外國租借地。英國在1927年2月同意放棄漢口和九江的租界，1929年2月放棄了鎮江租界，1930年4月放棄了威海衛租界，同年9月放棄了廈門租界。比利時在天津的租界也在1931年1月收回。中國收回損失的權益一直到1943年才得以完成，是年，美國和英國帶頭自動廢除所有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從而結束了中國長達一個世紀的屈辱。

交通 改善交通體系是國民政府的另一項建設性成就。1928年成立了鐵道部，指導改善現有的線路及鋪建新線路。最突出的工程有東西主幹線隴海鐵路在1934年延伸到西安，1935年延伸到寶雞，1936年中南主幹線粵漢鐵路竣工。其他一些重要的成就，包括在南京建成一套渡輪體系，將京浦鐵路和滬寧鐵路連接起來，1937年在錢塘江上建造了一座鐵橋，將浙贛線和滬杭甬（寧波）線連接起來。可與這些全國性的成就相媲美的，是各省完成的一些小型工程。從1928年到1937年，鐵路網絡從八千公里增加到一萬三千公里。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公路的修築，因為公路成本較低——大約是鐵路成本的二十分之一。1936年，公路網絡總長度為115,703公里，而1921年僅有一千公里。

現代航空也起步了。1930年籌建了中國航空公司，由中美聯合投資，在上海和成都、上海和北平、上海與泉州、四川與昆明之間開通了四條航線。第二大的是中德聯營的歐亞航空公司，在1931年開通業務，經營上海至新疆、北平至廣州、北平至蘭州和西安至成都的四條線路。第三大的西南航空公司由西南各省當局創辦於1933年，在廣東和廣西兩省內通航，並經營兩廣至昆明和福州的航線。

在這十年間，郵政和電訊有很大的改善與擴展。1921年郵政局的數目不到一萬間，郵路總長40萬里。到1935–1936年，郵政局增加到了14,000間，郵路總長584,800里。在軍閥統治時期遭受嚴重損害的電報線路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擴建；到1936年，電報線路總長達95,300公里。同時，長途電話線路從1925年的4,000公里增長到1937年的52,200公里。

工業發展 人們普遍承認，經濟發展是建立現代化國家所必不可少的。雖然丟失了東北，而日本對上海的進攻也對這個樞紐港口的外貿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但重型機械的進口卻從來沒有減少。在1927–1937年期間，工業設備的進口總計達五億元，儘管這個數目以西方標準來看是較小的，但在一個兵燹肆虐、貧窮不堪的國家，卻代表了相當大的努力。雖然在工業化方面沒有取得顯著的突破，但在一

些輕工業如棉紡織、麵粉製品、鐘錶、水泥和化工製造等領域還是出現了頗大的進展。

教育 教育領域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教育部將一些公立大學、學院和專科學校重組合併成了十三所國立大學³⁸、五所學院和九所省立大學，並把經費資助擴展到一些水平較高的私立學校，³⁹用於開設新學科和購置設備。在二十所私立大學和三十三所私立學院中，1934年和1935年有三十二所獲得了資助，1936年有四十所獲資助。不應低估的成就是，在這十年中，中等教育也取得了四到五倍的增長。到1937年，有2,042所中學、1,211所師範和370所職業學校，就讀學生達545,207人。

新生活運動 為了實現恢復民眾道德素質、實現思想覺醒的目標，國民政府於1934年發起了新生活運動。這場運動強調培養衛生習慣、雷厲風行、信守諾言、禮貌待人和禮義廉恥這四種傳統的價值觀。學者和官員被督促去研讀十九世紀政治家曾國藩的著述，培養精忠報國的精神。雖然年輕一輩人並不把這些老派的價值觀當一回事，⁴⁰但新生活運動和一些相關的活動，如體格健壯者接受軍事訓練和在學校開設軍訓科目等，確實造就了某種蓬勃向上的朝氣和在日本人入侵面前有所作為的情感。

文學界 回顧這十年，文學活動非常活躍，大多數作品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一個聲勢浩大的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共的贊助下於1930年成立，旨在佔領中國的文學舞臺。左聯的成員抨擊國民政府，嘲弄右派作家和那些偏愛傳統文化藝術的人；批評英

³⁸ 其中最孚盛名的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

³⁹ 其中最有名的是燕京大學、東吳大學、上海大學、嶺南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全是教會學校。

⁴⁰ 關於新生活運動的一個婦孺皆知的笑話是它告誡行人應靠街道右邊行走。據說山東省省長、軍閥韓復榘批評說：「要是每個人都靠右走，那誰走左邊呢？」

美學派的作家，謳歌蘇俄文學和左派創作。左聯的靈魂人物就是下臺的中共領袖瞿秋白，而代言人則是著名作家魯迅。左聯通過本身眾多的出版物⁴¹ 贏得了對文學界相當有力的控制。

不過，有兩個派別堅定地站在左聯的對立面，並通過他們自身的特長贏得了喝彩。一個派別以林語堂為首，他創辦的那些談諧、諷刺且稍帶戲謔的出版物如《論語》、《人世間》和《宇宙風》等，一直在出版界大受歡迎。第二個派別主要以北平高等院校的教職員為核心，出版了《文學季刊》和《大公報文藝副刊》。他們之所以贏得廣泛的讀者，是由於他們有見解的批評態度和採用了西方作家先進的寫作技巧和策略。這三個主要派別的競相爭鳴，造就了一個異常活躍的文學氛圍，使這十年成為「現代中國文學最為昌盛的時期」。⁴²

這十年中最重要的作家是魯迅(1881–1936年)，⁴³ 儘管他可能已過了創作的顛峰。他是以對舊秩序和現狀之頹廢和不公正進行尖銳的、諷刺的揭露而著稱，批判傳統生活的虛偽和殘忍。

魯迅最有名的作品或許是〈阿Q正傳〉，其中的主人公象徵著一種國民弊病。出身非常低賤的農村野小子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他不斷遭受同村人的欺凌。無力與他們對抗的阿Q為自己想像出了一個夢幻的世界。一當受辱，他便擺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裝出贏得了一場「精神勝利」。為擡高自己的聲譽，他進城盜竊，回鄉後卻向村民誇耀自己新近參與了革命。當真的革命者到村裏來時，他們與紳士們合謀，以偷盜罪將阿Q送官治理。這篇小說的寓意是，阿Q乃是中國國民弊病的縮影，而那場革命則與舊的勢力妥協，丟棄了它所宣稱的進行社會改良的目標。

另一位重要的左翼作家是茅盾(1896–1981年)。⁴⁴ 他是《短篇小說》

⁴¹ 《世界文化》、《萌芽》、《拓荒者》、《北斗》、《現代小說》、《大眾文藝》、《文學月報》、《文藝新聞》和《文學》。參見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New Haven, 1961), 125.

⁴² Hsia, 138–39.

⁴³ 原名周樹人。

⁴⁴ 原名沈雁冰。

的主編，創作了好幾部長篇小說，包括《幻滅》、《動搖》和《追求》三部曲。他的主要作品《子夜》描寫了上海的一個民族工業家徒勞的拼搏，這個工業家面臨著隨共產黨起義而來的經濟衰退和生意失敗，於是投身股市以求挽回損失，但被一個由洋人撐腰的買辦欺騙，蝕了大本而破產。作者暗示，這個工業家因為沒有能力去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故注定是要失敗的。⁴⁵

如果說茅盾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的話，老舍(1898–1966年)⁴⁶則相信愛國主義和個人責任。他曾在倫敦住過五年(1925–1930年)，深受英國作家的影響。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駱駝祥子》(1937年)，英譯本書名為*Rickshaw Boy*，內容描寫一個人力車夫不斷的抗爭，夢想通過純粹個人的努力——拼命工作、與老闆之女結婚等等——來改善自己的處境，但卻發覺社會障礙大得難以逾越。他灰心喪氣，只得認命，開始抽煙喝酒，安於舊的狀況，淪落為一個哭喪人。小說的寓意很清楚：在一個病態的社會裏，個人的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只有聯合的行動才能改善窮人的生活。

另一個非左翼作家是巴金(1904年—)，⁴⁷他是一位多產作家，到1937年時已寫了十二部長篇小說和四本短篇小說集。巴金出生於四川省的一個小康之家，他的創作帶有一種傷感主義色彩，經常取材於愛情與革命、善與惡、英雄與懦夫、勇敢與怯懦等主題。他的《愛情三部曲》——《霧》、《雨》、《電》——直接地震撼了年輕一代，而他的自傳體三部曲——《家》(1937年)、《春》(1938年)、《秋》(1940年)——則是對一個大家族中年輕成員之困厄磨難的感人描述，贏得了廣泛的喝彩，這些年輕人努力想擺脫他們的長輩，卻遇到了頑固的反對和悲慘的結局。在這部作品中，他讓讀者理解了這樣的啟示：中國社會中的弊病必須由中國罪惡的制度負責。

無論他們的政治信念如何，三十年代的作家有兩樣是共同的：他

⁴⁵ Hsia, 156–57.

⁴⁶ 原名舒慶春。文化大革命期間自殺身亡。

⁴⁷ 原名李芾甘。其筆名巴金由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人這兩個中文譯名的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組成。參見Hsia, 238。

們都懷有強烈的說教喻世意識；作品都反映社會現實。他們通過諷刺、挖苦和同情來揭露舊社會的頹廢和落後。也許，在一個正在發生革命性變革而傳統也在不斷與現代性對抗的轉型時期，這些作家不可避免地投身於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的作品代表了一種對現存秩序的合理控訴和社會抗議。

對社會和經濟改革的忽視 與在金融、交通、關稅自主、工業發展和教育等領域取得的種種成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民政府非常粗心地忽視了古老的地主所有制問題和農民的困苦，而農民人數佔中國總人口的80%以上。這一失誤，部分是由於北伐以後與「新軍閥」的妥協。急於迅速取得勝利而統一國家的蔣中正與比較「進步的」軍閥談判，接納他們加入政府。這些軍閥對民眾的利益和農民的苦難漠不關心，進入國民黨統治層之後淡化了該黨的社會意識。此外，相當一部分國民黨的將領和官員本身也與土地利益聯結在一起；因此並不急於開展任何將危及他們地位的急進改革。中產階級——主要是各種商人、實業家和高利貸者——在這方面也同樣無所用心。他們生活在條約口岸或作為高利貸者在農村活動，是現存秩序的受益者，不希望發生任何將激起波濤的改變。國民政府賴以支撐的正是這些人——軍閥、將領、官員、商人和高利貸者。因此國民政府不能開展所宣揚的社會和經濟措施也就不足為怪了。事實上，在許多躊躇滿志的國民黨人中盛行著這樣一種普遍的感覺，農民已經世代地受苦受難，因此要他們再等待一段時間並無所謂——讓他們等到政府解決了更為緊迫的內憂外患問題時再說好了。

可是農民的苦難已經到達了極端危急的地步。國際聯盟的一份調查表明，華南地區的雇農和半雇農佔了農村人口的60–90%，他們除了將年產莊稼的40–60%交作地租外，還要替佃主交納正常的地稅和附加稅——附加稅為正常地稅的35%到350%不等。⁴⁸ 農民被剝削到了極限；只有一場革命能解救他們。但國民黨所做的僅僅是在1930年通過

⁴⁸ Swarup, 52.

了一項將地租降低到主要作物之37.5%的決定，而即使是這一適度的措施也從未真正兌現。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從未實現。

財政上的不負責任 以下的事實同樣反映了國民政府對土地問題的漠不關心：國民政府將地稅這個舊王朝時代最基本的收入來源委託給了各省行政機關辦理，而依靠關稅和商業稅作為自己的財政基礎。國民政府以沿海地區為根基，並起用宋子文和孔祥熙等西方培養的金融家來確定經濟方針，從來不接近農民和土地，或許壓根就不關心或理解土地問題的嚴峻。在1928–1935年間，國民政府42.23%的收入取自關稅，17.13%取自鹽稅，9.16%取自商業稅。然而，這筆總收入只能支付80%的開銷，這些開銷主要包括軍費(40.3%)和債務(25–37%)。⁴⁹ 在這些年裏，政府從未達成財政均衡，而是靠赤字開支來維持。年復一年的預算不平衡導致了濫發紙幣，這在日後的中日戰爭和內戰中將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促使1949年國民政府的經濟崩潰。

綜合地看，國民政府在頭十年結束的時候，外表顯得比內裏更強大。表面上，它似乎正在從混亂狀態中鍛造出一個新秩序——綏靖了新軍閥和派系政客，並與他們達成了可行的協定；將共產黨逼到了西北一角；訓練了一支德國式的中央軍；在上面提到的一些領域裏開展了某些現代化規劃；與各黨各派結成了反對日本侵略的統一戰線。粗淺的觀察家可能會說一個新的中國正在呈現。但在這進步的表象之下，存在著社會經濟不公正和積年財政虧空等嚴重的根本性問題。在1928年確立的三項目標中——民族主義革命、內部重建和社會改革，國民政府到1937年時在第一項上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在第二項上稍有進展，而在第三項上則徹底失敗。此外，國民政府以內憂外患為藉口，延長原定起自1929年的六年「訓政時期」之舉，也令自由派分子心寒，他們逐漸把這種延長看作是國民黨試圖以犧牲憲政為代價，拖延獨裁專制期限的伎倆。

我們所回顧的這十年可以用一個簡潔的詞語來概括：外強中乾。

⁴⁹ Shun-hsin Chou,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7–1949* (New York, 1963), 40–42.

參考書目

- Alitto, Guy S.,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1984).
- Atwell, Pamela, *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 (New York, 1986).
- Bisson, Thomas A., *Japan in China* (New York, 1938).
- Bonavia, David, *China's Warlords* (Hong Kong, 1995).
- Borg, Dorot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Mass., 1964).
- Braun, Otto,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tr. from the German by Jeanne Moore (Stanford, 1982).
- Chan, Anthony B., *Arming the Chinese: The Western Armaments Trade in Warlord China, 1920–1928* (Vancouver, 1982).
- Chang, Maria Hsia,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Fascism and 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 (Berkeley, 1985).
- Chang, Sidney,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s of Ch'en Li-fu, 1900–1993* (Stanford, 1994).
- Ch'i, Hsi-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1976).
- Christopher, J. W., *Conflict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from 1928–33* (Leiden, 1950).
- Chu, Pao-chin, V. K. Wellington Koo: *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 1912–1966* (Hong Kong, 1981).
- Coble, Parks M., Jr., "Chiang Kai-shek and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hina: Zou Tao-fen an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1931–193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V:2:293–310 (Feb. 1985).
- ,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Mass., 1992).
- ,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1980).
- Crow, Carl (ed.), *Japan's Dream of World Empire, The Tanaka Memorial* (London, 1943).

- Eastman, Lloyd E.,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1974).
- ,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1984).
- Eastman, Lloyd (ed.),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Eng., 1991).
- Fairbank, Wilma,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Philadelphia, 1994).
- Forbes, Andrew D. W.,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Eng., 1986).
- Furth, Charlotte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6).
- Furuya, Keiji,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1981). English abridged version by Chun-ming Chang.
- Galbiati, Fernando,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1985).
- Gamble, Sidney D.,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New York, 1954).
- Gillin, Donald G.,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1967).
- Heinzig, Dieter, "The Otto Braun Memoirs and Mao's Rise to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46:274–88 (April–June 1971).
- Hsia, C. T.,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New Haven, 1961).
- ,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 (New York, 1971).
- Hsia, T. A., "Chü Ch'iu-pai'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The Making and Destruction of a 'Tender-Hearted' Communist," *The China Quarterly*, 25:176–212 (Jan.–March 1966).
- Hsiao, Tso-liang, *The Land Revolution in China, 1930–1934* (Seattle, 1969).
- ,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 (Seattle, 1961).
- Huang, Philip C. C., et al.,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 1927–1934* (Berkeley, 1978).
- Huang, Sung-k'ang, *Lu Hsün and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 (Amsterdam, 1957).

Hung, Chang-tai,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Mass., 1985).

Isaacs, Harold R.,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vised (Stanford, 1951).

Israel, John,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37* (Stanford, 1966).

Kahn, Winston, "Doihara Kenji and the 'North China Autonomy Movement,' 1935–1936," *Occasional Paper*, No. 4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empe, Nov. 1973).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抗戰前十年之中國》，重版（香港，1965年）。

Kapp, Robert A.,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1973).

Kataoka, Tetsuy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1974).

Kim, Ilpyong J.,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 (Berkeley, 1973).

Kirby, William C.,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1984).

郭華倫：《中共史論》，共4卷（臺北，1969–1971年）。

Kuo, Warren,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aipei, 1968), 2 vols.

Lang, Olga, *Pa Chin and His Writings: Chinese Youth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 (Cambridge, Mass., 1967).

Lao, She, *Rickshaw: The Novel of Lo-t'o Hsiang Tzu*, tr. by Jean M. James (Honolulu, 1979).

Lary, Diana,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Mass., 1974).

Lattimore, Owen,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1935).

Lau, Joseph S., *Ts'ao Yu, The Reluctant Disciple of Chekhov and O'Neill* (Hong Kong, 1970).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of the (Lytton) Commission of Enquiry* (1932).

Lee, Feigon, *Chen Duxiu: The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1983).

Lee, Leo Ou-fan,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ss., 1973).

———,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1987).

- , (ed.), *Lu Xun and His Legacy* (Berkeley, 1985).
- Li, J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trans. from Chinese and intro. by Stuart Schram in 34 pp. (White Plains, N.Y. 1977).
- 梁敬錚：《九一八事變史述》（香港，1964年）。
- Linebarger, Paul, *Government in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1938).
- Liu, F. 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1956).
- Lyell, William A., Jr., *Lu Hsün's Vision of Reality* (Berkeley, 1976).
- Martin, Brian G.,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1996).
- McCormack, Gavan,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Stanford, 1978).
- Nieh, Hua-ling, *Shen Ts'ung-wen* (New York, 1972).
- North, Robert C.,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1963).
- Ogata, Sadako N., *Defiance in Manchuri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1964).
- Peattie, Mark,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Princeton, 1975).
- Pickowicz, Paul G., "Ch'ü Ch'iu-pai and the Chinese Marxist Conception of Revolutionary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The China Quarterly*, 70: 296–314 (June 1977).
- ,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The Influence of Ch'ü Ch'iu-pai* (Berkeley, 1981).
- Rappaport, Armin, *Stimson and Japan, 1931–33* (Chicago, 1963).
- Ristaino, Marcia R., *China's Art of Revolution: The Mobilization of Discontent, 1927 and 1928* (Durham, 1987).
- Rue, John 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 (Stanford, 1966).
- Salisbury,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1986).
- Schram, Stuart, *Mao Tse-tung* (New York, 1966).
-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1958), chs. 4–13.
- Semanov, V. I., *Lu Hsün and His Predecessors* (White Plains, N.Y., 1980).
- Sheng, Yüeh,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Lawrence, Kansas, 1971).

- Sih, Paul K. T., *The Strenuous Decade: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 1927–1937* (Jamaica, N.Y., 1970).
- Smith, Sara M., *The Manchurian Crisis, 1931–1932* (New York, 1948).
- Stimson, Henry J., *The Far Eastern Crisis* (New York, 1936).
- Stranahan, Patricia,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Lanham, Md., 1998).
- Strong, Anna Louise, *China's Million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 (New York, 1935).
- Thomson, James C.,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Cambridge, Mass., 1969).
- Thornton, Richard C.,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28–1931* (Seattle, 1969).
- 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1972).
- Tong, Hollington K., *Chiang Kai-shek, Soldier and Statesman* (Shanghai, 1937), 2 vols.
- Wakeman, Frederic, Jr.,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1995).
- ,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sis, 1937–1941* (New York, 1996).
- , “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jing Decade: Confucian Facism,” *The China Quarterly*, 150: 395–432 (June 1997).
- Waller, Derek J., *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Mao and the National Congresses of 1931 and 1934* (Berkeley, 1973).
- Wang, Chi-Chen (tr.), *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New York, 1941).
-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臺北，1965年），3卷。
- Wei, William,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The Nationalists in Jiangxi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Ann Arbor, 1985).
- Wilbur, C. Mart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New York, 1985).
- Willoughby, W. W.,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altimore, 1935).
- Wong, Wang-chi,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36* (Manchester, Eng., 1991).

- Wright, S. F., *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 1843–1938* (Shanghai, 1938).
- Wu, Tien-wei, *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n Arbor, 1976).
- Yakhontoff, Victor A., *The Chinese Soviets* (New York, 1943).
- Yang, Benjamin, "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 A Survey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Party," *The China Quarterly*, 106: 235–271 (June 1986).
- Yeh, Wen-hsin, "Shanghai Modernity: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a Republican City," *The China Quarterly*, 150: 375–394 (June 1997).
- Young, Arthur N.,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s,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Stanford, 1971).

第二十四章

中日戰爭，1937-1945年

中國統一起來反對外來侵略的前景，令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極端分子擔憂在大陸的擴張政策之前途。與1931年一樣，急於在中國變得強大之前展開攻勢的人，仍然是關東軍中的少壯派軍官。這些軍官受輕而易舉地征服東北、沒有遭到國際制裁及法西斯和納粹在歐洲崛起等因素的鼓勵，急於將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並在那裏建立一個日本的大陸基地。在西安事變和中國採取統一戰線政策後僅僅半年的時間，即1937年7月7日，這些軍官就在距北平以西十英里的蘆溝橋策劃了一次事變，突然與中國駐軍發生衝突。一當戰事開始而所有和平解決的希望破滅，中國政府為了生存，痛下戰鬥到底的決心。日本人原本指望的一場征服華北的短期戰爭，轉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一直延續到1945年。在不到半個世紀裏爆發的這第二場中日戰爭，¹對兩個國家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導致了日本在現代歷史上的第一次失敗，也徹底消耗了中國國民政府的勢力，同時又給了中共一個擴展軍隊和政黨組織力量的機會，並最終奪取政權。

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興起

雖然1937年的「中國事變」表面上是由關東軍策劃的一個地方事件，但實際上卻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有預謀的陰謀。這次事件令日本軍方與文職政府之間，以及軍方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一連串衝突達到了頂峰。自從關東軍成功侵佔東北以來，軍國主義者就以犧牲文官政府

¹ 第一場戰爭在1894-1895年間進行。

為代價，一舉躋身於國家政治。這些少壯派軍官對軍人不應干政的傳統戒律置若罔聞，並公開抨擊黨派政治家不懂處理國務，從而降低了日本的國際地位。在沙文主義熱情的刺激下，他們奚落官僚的無能和腐敗，並言之鑿鑿地責難財閥們造成了經濟蕭條。這些少壯派軍官自許為國家的救星，發誓要清除這些邪惡勢力並開創一個「昭和維新」，在這個維新中，天皇將通過軍隊重新建立與農民和全體人民之間的直接關係。這個使命非常「神聖」，令少壯派成功地構建了一種形象，即不允許讓任何事情損害軍隊的威望和地位。他們冷酷地追求權力，公開宣揚擴張，樂意訴諸謀反、陰謀、恐嚇和暗殺等手段，這暗示了某種「非正常行為」。² 確實，他們桀驁不馴的行為連講究軍紀的老派軍官也難以容忍。然而少壯派很難被遏制，因為他們聲稱代表著人民的心聲和日本的前途，還得到極端派政客和秘密會社的支持。在1932-1936年間，軍國主義者始終在國家政治中穩步崛起，直到他們完全將文職政府駕空。這是現代日本的一段悲劇。

1932年的「五·一五政變」 軍國主義者的迅速崛起，部分是通過政變和暗殺等殘酷手段實現的。在1931年春兩次流產的政變之後，少壯派採用了政治暗殺的手段，在1932年春，他們有效地清除了前藏相和日本銀行總裁兼三井財閥領導。³ 隨後，1932年5月15日，一幫陸海軍軍官進攻東京警察廳、銀行和政黨總部，成功地謀殺了犬養毅首相，此人反對在中國的軍事行動，贊同以談判解決事端。厚顏無恥的暗殺者公然藐視事件的後果，事後他們向警察自首。隨後的審判變成了一個向公眾散佈謀反者之哲學的場合——通過消滅軟弱的政客、腐敗的官僚和自私的財閥來拯救國家。他們的論點激起了廣泛的同情，以至於連起訴人和報紙都把謀反者當作是英雄而非暗殺者。自1918年起就存在的政黨政府遭受了致命的打擊，直到二戰以後才能復元。

² 關於這段時期日本人行為的啟發性研究，參見丸山正男：《現代政治思想和行動》，第1卷（東京，1961年），第7-148頁。

³ 分別為井上准之助和團琢磨男爵。

1936年的「二·二六政變」 儘管軍隊在反對文官統治上團結一致，但也存在著內部紛爭。一些年長的、較有責任心的軍官嚴守避開政治的傳統律令，但許多人卻變得滿腦子政治，一心要干政。後一種人中有兩個派別。一派是皇道派，由少壯派活躍分子、校級軍官組成，首領是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參謀次長真崎甚三郎和憲兵司令火田俊六。他們要求建立軍事獨裁、控制國家預算、擴充陸海軍、基礎工業國有化、在亞洲作領土擴張、在中國採取直接行動。另一派是統制派，成員是一些年紀較大的、更講軍紀的高級軍官，如長田鐵山將軍、阿部信行將軍，但奇怪地，東條英機將軍也包括在內。他們也想採取堅定的對外政策，擴張日本在亞洲的霸權，但他們不贊成直接的和恐怖主義的方式，而傾向於通過合法手段和正當途徑來取得成效。

軍隊內部的紛爭造成了動盪和混亂。在1933年7月，一夥少壯派軍官不滿於齋藤首相無力推行皇道派所要求的改革，密謀殺死所有的內閣大臣和政黨領袖。雖然這場瘋狂的陰謀被及時發覺從而避免了大規模的流血，但在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甚囂塵上的環境中，四十四名被告卻在1937年前逃脫了審判並在1941年獲釋放。不過，這場政變的失敗還是使統制派得以在權力鬥爭中佔了上風。荒木將軍的陸軍大臣職務由林銑十郎將軍接替。為了緩解兩派之間的水火之勢，1935年7月，林銑十郎起用一位比較溫和講理的軍官渡邊重太郎中將替代真崎將軍擔任了教育總監。這次改組的策劃人是統制派的永田將軍，他春風得意的時光只持續了一個月——1935年8月12日，一個少壯派激進分子相澤三郎中校將他刺殺了。可是，對這個刺殺者的死刑判決根本沒能挫傷少壯派軍官的狂熱情緒。當1936年1月大藏相削減了軍隊預算之時，他們決定再次行動。

2月26日，一幫少壯派軍官和1,400名士兵由安藤哲郎上校率領，奪取了對東京中樞要地的控制，佔領了國會議事堂、警察廳和陸軍省。他們襲擊首相官邸，誤殺了首相的內弟。其他被殺者包括一位前首相、⁴大藏相⁵和教育總監。⁶直到忠於政府的軍隊包圍了兵變者並

⁴ 海軍上將齋藤實。

⁵ 高橋是清。

⁶ 渡邊重太郎將軍。

宣讀了天皇命他們返回軍營的聖旨之後，政變才得到了控制。隨後的審判處決了十三名少壯派軍官，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被判處監禁。

隨著1936年3月岡田上將辭去首相之職，廣田弘毅接管了政府權柄。他自1933年秋起就擔任外相，並以其與極端分子過從甚密及支持對中國侵略的政策而著稱。在軍國主義者的支持下，他承諾要「革新」政府，並任命了許多軍隊認可的人進入內閣。⁷

廣田弘毅的對華政策 廣田弘毅的政策旨在使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分離開來，以便壓迫中國屈服。在華北的日本人策動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和山東五省的自治運動，並於1935年12月建立了一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中國政府則成立了總部設在北平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以作制衡。但是，隨著日本浪人、朝鮮人和臺灣人公然從事大規模的白銀和毒品走私，摩擦不斷加劇。顯然，華北正開始顯得像第二個東北。

中國民眾要求抵抗日本的呼聲日益高漲，全國性的抵制日貨運動成功地削減了三分之二的貿易。廣田為滿足民政黨佔優勢的國會之願望，在1936年夏開始與中國談判，建議：(1) 取締中國的排日活動；(2) 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地位；(3) 中日聯合防共，特別是在外蒙古地區；(4) 中日經濟合作；(5) 日本向中國政府各部門派駐顧問。這些條件，尤其是帶有1915年「二十一條」味道的最後一條，遭到了中國政府的拒絕，中國提出反建議：(1) 終止日本人、朝鮮人和臺灣人的走私；(2) 日本軍隊從冀察兩省撤離；(3) 壓制日本人策動的自治運動。談判於1936年12月破裂。

在國際上，廣田採納一項朝向孤立蘇聯、準備對美英開戰及與德義合作的政策。日本在1936年與德國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一年後又與義大利簽訂了同樣的協定，越來越走近戰爭的邊緣。

⁷ 比如，他的藏相馬場金英一便是一個軍隊的傀儡。新任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男爵則是一個公開的法西斯主義者和極端分子。他的陸相寺內壽一將軍和海相永野上將也都是擴張主義分子。

廣田政府在1936年12月倒臺，次年2月林銑十郎將軍出任首相。新任外相佐藤尚武建議通過恢復經濟關係，並在一些次要爭端上達成初步協定來爭取與中國和解；但華北仍將保持為一個特殊地區。此時中國已經形成了統一戰線，無意作進一步的妥協。四個月後林銑內閣垮臺；以近衛文麿公爵為首的繼任內閣完全受軍隊的左右。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鼓吹對中國使用武力。雖然他的想法遭東京拒絕，但駐華北的日本軍隊決定自行其是，在1937年7月7日挑起了衝突。

不宣而戰，1937年

根據1901年《辛丑條約》關於允許外國簽字國在北平(北京)到渤海灣之間駐紮軍隊的條款，駐華北日軍於1937年7月初在北平郊外蘆溝橋附近舉行了一場實戰演習。日軍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在7月7日午夜前進入附近的宛平縣城進行搜查。在遭當地中國駐軍——宋哲元將軍麾下的第二十九軍——拒絕後，日軍轟擊了宛平城，並於7月8日凌晨4:30佔領了該城，這樣就挑起了兩國之間的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

戰雲一起，來自東北和日本本島的日軍增援部隊便擁至華北，佔領了北平周邊的所有戰略要點。顯然，蘆溝橋事件只不過是一個更大圖謀的開端而已。已投身於抗日統一戰線的南京政府決定抗戰。1937年7月17日，在廬山牯嶺召開的一次暑期會議上，蔣中正果斷宣佈，到最後關頭時，中國別無選擇，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自1931年起一直被推延的抗戰終於具備了內聚力和意義。中國人民和各個黨派——國民黨、共產黨、青年團等等——都熱忱地宣誓支持抗戰。

雖然中國準備進行一場持久戰，日本卻不想陷入亞洲大陸的泥潭；在參謀本部的心目中蘇聯仍然是主要敵人。日本企圖速戰速決奪取華北及迫使南京同意經濟合作。日本軍方藐視中國作全面抗戰的能力和意志，許諾要在三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從嚴格的軍事角度來看，他們的預言似乎是很正確的。

現代化的日本軍隊顯然遠勝於中國軍隊。在予二十九軍以重創之

後，日軍在7月下旬作好了進攻北平的準備。為保衛這個古代文化珍寶名城而作任何有效的抵抗，無疑會給珍貴無價的歷史遺產和藝術品帶來無可估量的損害。國民政府決定讓北平免遭這樣的可怕命運，於是在7月28日下令軍隊撤離該城。兩天後天津也淪陷了。

8月13日，日軍在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開闢了第二條戰線，以圖摧毀中國進行戰爭的經濟能力。出乎意料的是，蔣在那裏投入了最精良的德式訓練的部隊——第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該部相當成功地阻擋了敵軍的推進達三個月之久。但日軍迂迴包抄中國守軍的計謀最終得逞，引起了中國軍隊防線意想不到的迅速瓦解。通往南京的道路暴露無遺，敵軍迅速向中國首都的大門推進。

蔣將首都遷至四川重慶，那裏崎嶇的地形、陡峭的峽谷和湍急的長江使它幾乎不可能被敵人突破。蔣自己作為中國軍隊統帥留在戰略重鎮武漢指揮作戰，而學校、工廠和淪陷區的其他設施則被敦促遷至內地。西南成為了一個新的抗戰基地，破毀了日軍速戰速決的夢想。

南京淪陷後發生了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約有十萬平民遇難，同時還有難以計算的婦女受辱。這個後來被稱為「南京大屠殺」的事件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致連日本軍國主義者也向國內公眾隱瞞了真相。當真相最終在戰後的東京國際戰犯法庭揭露出來後，日本人民都為這種暴行感到羞恥不已。

在攻陷南京後，日軍主力向北進取重要的交通樞紐徐州。但在徐州附近的台兒莊，1938年3月底到4月初，他們遇到了中國軍隊的英勇抵抗，傷亡達三萬人之眾。這是自南京淪陷後中國方面的第一個大捷，但中國軍隊最終在5月19日不得不撤出了徐州。稍後，在6月份，中國人炸毀了黃河岸堤以阻擋敵軍的推進。

接下來的會戰在蔣的行轅所在地武漢展開，日軍十二個師團從長江和淮河沿線兩個方向合擊該地。經過四個半月大小數百次戰鬥，武漢最終在1938年12月25日棄守。武漢的丟失加上10月21日廣州的陷落，把一些不堅定的國民黨領導人推到了絕望沮喪的地步，但蔣一如他宣誓的那樣堅持抵抗。

武漢的失陷標誌著持續十六個月的戰爭第一階段之結束。在這一

階段，中國以空間換取時間，將敵人引入了內陸。日軍深深陷入中國腹地的泥潭，再也無法自拔。

國際制裁姍姍來遲，因為歐洲本身受著納粹和法西斯的威脅，而美國則還嚴守其中立。然而，無論形勢如何，日本人卻不能立即贏得戰爭。東京聽憑自己陷入僵局，採取了靠傀儡政府幫助來維持佔領區的政策。1937年10月29日，在察哈爾和綏遠建立了一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以內蒙古的德王為前臺的統治者。12月14日，另一個傀儡「臨時政府」在北平建立，以王克敏為前臺人物，管轄河北、察哈爾、綏遠、河南和山東五個北方省份。1938年3月28日，第三個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梁鴻志為形式上的首領，管轄江蘇、浙江和安徽華東三省。但這三個首領都沒有獲取統一所需的全國性威望；因此日本人加緊尋找一個名望更大的人物。

汪精衛的和平運動

1938年11月3日，為紀念明治天皇的生辰，日本首相近衛親王宣佈了一項「亞洲新秩序」聲明，其基本的六個原則如下：(1) 東亞的永久和平；(2) 善鄰友好和國際正義；(3) 聯合防共；(4) 經濟合作；(5) 創建新文化；(6) 世界和平。這是一種日本式的「門羅宣言」(Monroe Doctrine)，顯示了日本人由來已久的統治亞洲的渴望，這種渴望曾體現在十六世紀後期豐臣秀吉征討朝鮮和中國的戰役中，也反映於二十世紀初日本領袖們的泛亞主義思想中，更表現在1927年所謂的「田中奏摺」中。

對於那些因看不到勝利或和平的前景、因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生活日益困苦而沮喪不已的中國政客們來說，近衛的聲明似乎提供了迅速解決事端的一縷希望。汪精衛與其他一些人一樣，覺得日本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他於1938年12月18日飛離重慶，前往河內開展一場和平運動。四天以後，近衛宣稱日本決定摧毀國民政府，在以下幾個條件的基礎上與一個「新的」中國政權調整中日關係：(1) 親善友好：日本將不僅不提任何領土或賠償的要求，而且將把所有的割讓地和租借地交還給中國，並廢除治外法權；(2) 按照軸心國之間反共產國際協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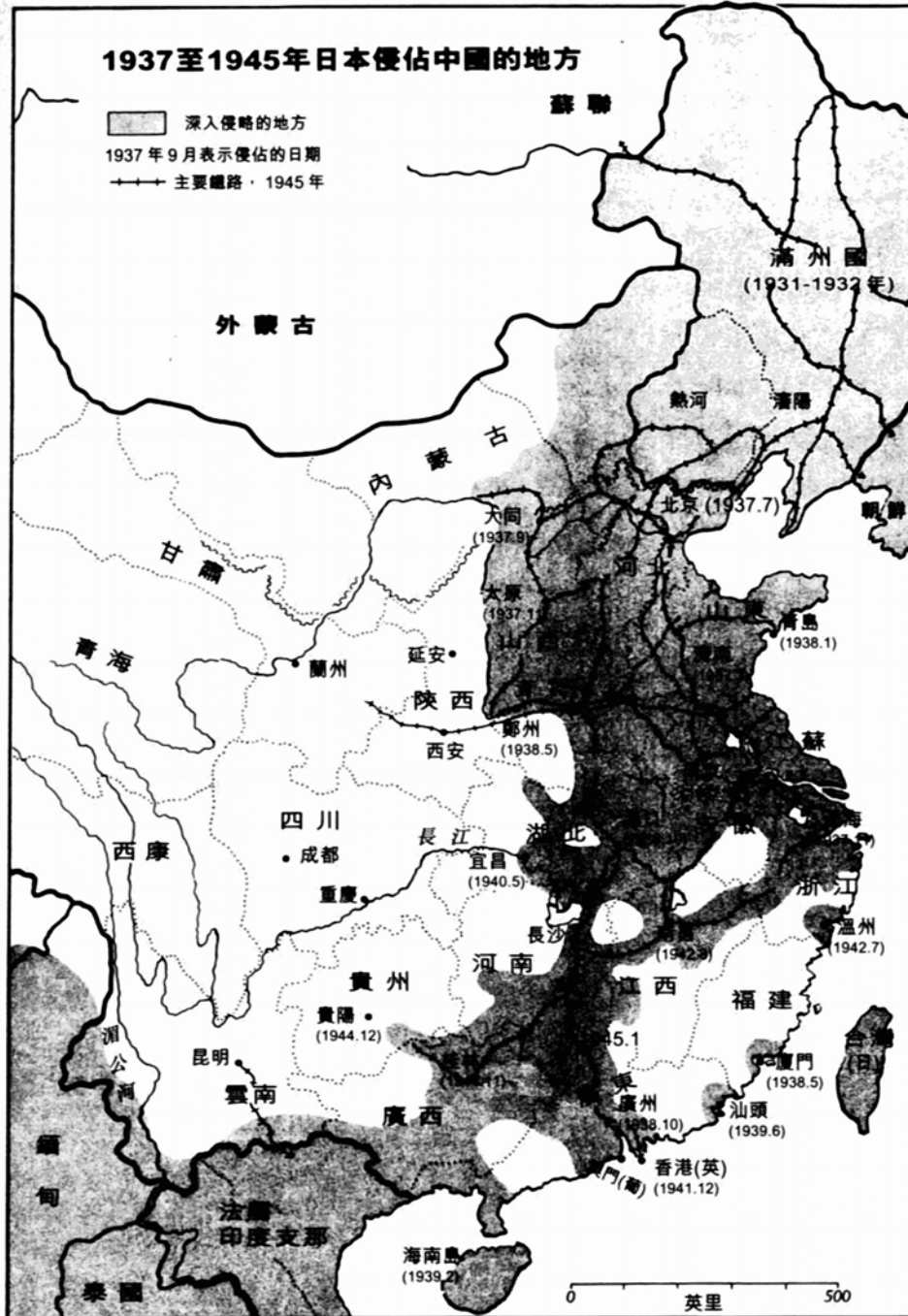
之同樣的精神共同防共；(3) 經濟合作，日本一方決無壟斷中國經濟的意圖。

汪精衛敦促重慶政府接受這些條件為和談的基礎。蔣乾脆俐落地否決了這個主意，並勸說國民黨開除了汪精衛的黨籍。隨後汪精衛與日本簽訂了八項協定，包括承認滿洲國及允許日本在中國駐軍以便於聯合防共。協定的其他方面，包括承認日本根據一項「經濟合作」協定控制中國的自然資源，以及日本有權在中國的教育和文化事務中指派顧問。

1940年3月，在日本的卵翼之下，汪精衛在南京建立了一個五院制的政府，該政府吸納了北平和南京原有的傀儡政權。這個政權得到了「滿洲國」、三個軸心國及其僕從國⁸的承認，但主要的西方國家都不承認。

人們自然會產生這樣的疑問，汪精衛這個孫中山的親密信徒及國民黨內和國民政府內的第二號人物，為甚麼會不顧聲譽叛變投敵？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他在失敗主義的驅使下認定中國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在徹底失敗之前以談判實現和平將更為現實。第二，他曾與蔣進行過權力鬥爭，因此認為蔣篡奪了他作為孫中山接班人的位置。第三，他關心日佔區人民的利益。他的主要助手周佛海則提供了第四種饒有趣味的解釋，周佛海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狡猾地辯解說，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不會損害中國；如果蔣打贏了這場戰爭，汪精衛與日本的協定將自然被取消；而如果蔣不能贏得戰爭，那他將來與日本達成的和約，就不可能超過由汪精衛取得的條件。處心積慮地博取同情的周佛海接著提了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如果汪精衛沒有站出來負責，誰會來照料淪陷區的芸芸眾生？人們或許會推測，汪精衛在失敗主義和對蔣的嫉妒之驅動下，決定充當兇殘的日本征服者與無助的中國百姓之間的緩衝物。也許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和平使命從長期來看不會傷害中國，而在短期內又可實實在在地減少大量的苦難。他的真實動機究竟如何也許永遠不得而知，因為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幾個月就死掉

⁸ 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丹麥。



了。雖然他逃脫了公審的下場，但他的高級同僚卻在戰後很快被當作賣國賊槍決了。

國民黨的抗戰建國計劃

在抗戰初期，國民黨黨內和政府內發生了一些重要的進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是，1938年4月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及該大會通過的四項重要決議：(1) 設立新的總裁職位為黨的領袖，以蔣中正為首任總裁；(2) 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把青年訓練成抗戰建國的基本力量；(3) 設立國民參政會取代全國國防參議委員會，以作為戰時國家最高民意機構；(4) 通過「抗戰建國綱領」。

在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之後，國民參政會成立，容納了持各種政治見解的成員，包括毛澤東和其他一些共產黨領導人。成立大會於1938年7月7日到15日在武漢召開，共有162名代表與會，他們莊嚴宣誓，所有中國人，無論其黨派、宗教、信仰和職業如何，都有責任支援抗戰直到贏得最後勝利。

中國在抵抗日本的鬥爭中聯合了起來，但在這全民團結的激昂表象背後卻隱藏著深刻的裂痕和不和諧的種子，在涉及共產黨問題時尤其如此。

統一戰線及其衰敗

在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即1937年9月22日，中共就發表了一個題為「共赴國難」的宣言，解釋它在戰時的立場：

1.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共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2. 中共將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 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4. 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⁹

蔣歡迎共產黨的誓言，表示希望中共通過對抗戰和國民革命事業的實際貢獻來證明其忠誠。三萬名紅軍被改編為第八路軍——後更名為第十八集團軍——由朱德和彭德懷統率。該部被派往山西北部抵抗日軍。稍後，在1937年12月，共產黨在長江以南的隊伍被整編為新四軍，由葉挺和項英統率，全軍一萬人。如前所述，國共合作的又一個象徵，是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在1938年被選入國民參政會。這樣，兩黨在日本侵略面前再一次合作了。

然而，如同前一次1923–1927年間的聯盟一樣，這一次的聯盟也是命運悲慘。從一開始，共產黨就把它看作是一種純粹為了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避免國民黨的進攻並在抗戰期間積蓄力量的手段而已。為了不使黨內的任何成員誤解這些秘密的目標，毛澤東告誡幹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戰爭的時機壯大自身。他說：「我們確定的政策應當是百分之七十作擴張，百分之二十對付國民黨，百分之十抗日。」¹⁰ 幹部們被要求根據這個原則相機行事，即使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絡時也應如此。毛澤東非常清楚地表明，與國民黨的暫時合作並不是背叛原則，也不是向敵人投降，而是進行休整及為將來保存革命力量的一種現實手段。他向追隨者們重申，將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及以邊區政府來替代蘇維埃政權是換湯不換藥。總之，與國民黨的合作給中共提供了一個機會作休整擴充，並採用新的方式來替代業已證明不很成功的老方式。

既然要充分利用統一戰線，毛澤東便設計了一套分三步走的策

⁹ 這份宣言的基調包含在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份電文中。參見Peter Schran, *Guerrilla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 1937–1945* (New York, 1976), 183.

¹⁰ 這段話時常被人引用。參見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29* (Princeton, 1956), 206;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Up at Seventy* (New York, 1957), 85; 和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Mass., 1963), 58.

略：第一步，與國民黨妥協以求保護中共的存在；第二步，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第三步，向華中滲透，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以便發起反攻，奪取國家的最高權力。

依照這些解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甚麼共產黨專意做自我發展和擴張、努力完成招募「百萬紅色戰士和百萬黨員」的目標了。¹¹ 1939年3月，共產黨創建了他們自己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後來又建立了晉察冀綏邊區政府。國共兩黨軍隊之間的摩擦開始越來越頻繁發生。

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給國共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火上加油。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隨後1941年4月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除去了統一戰線的學說基礎和權宜之利。國共衝突變得越來越嚴重。在新四軍駐紮的魯西地區和江蘇，局勢尤為嚴峻。1941年1月5日，新四軍與國民黨第四十師之間發生了一場大規模衝突，致使政府在1月17日決定解散新四軍，並拘捕該軍軍長送交軍事法庭。中共立即任命了另一位軍長¹²並報之以將新四軍的規模擴充至七個師。這次「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幾乎毀壞了統一戰線，國民參政會中的中共代表拒絕出席該會會議。1943年3月兩黨重開談判，但終因共產黨要求獲得四個軍十二個師的正式編制而歸於破裂。到1943年年底，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離開了重慶。

在此後的抗戰歲月裏，國共衝突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雖然蔣一再宣稱中共問題本質上是政治問題，因而應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¹³但他卻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隊封鎖了西北的共產黨地區，其意圖是一當對日戰爭結束後爆發內戰即動用這部分部隊。共產黨方面也不停地擴充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在根據地實施一些意義深遠的綱領，為未來的對抗作準備。

¹¹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宣稱在1943年和1944年，他的部隊分別抗擊了64%和56%的日本軍隊和95%的「偽軍」。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43-1044頁。

¹² 陳毅。

¹³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1949), 135.

延安經驗與外國的觀察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年)為毛澤東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難得的時間，整頓政黨和軍隊，組織民眾，創設新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毛澤東正處在創造力的頂峰時期，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形勢和中國革命實踐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結合了起來。所以，延安經驗對於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來說就具有創新的意義；正是在延安經驗中種下了毛澤東最後勝利的種子。

延安道路的核心是完善群眾路線和在農村加強革命的民族主義，這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兩大支柱。¹⁴當然，這些思想在江西時期就已先行發展，¹⁵但由於來自外部的國民黨之不斷進攻和來自內部的黨內之不斷傾軋，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表達。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等莫斯科培養的中國共產黨人反對毛澤東的政策，鼓吹傾向城市的蘇聯模式之無產階級革命。現在，在延安，毛澤東已解決了外來進攻和內部紛爭，因此得以推行他自己的戰略及發揮他自己的工作方法。這些戰略與工作方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特色標誌。

根據他的群眾路線方法，毛澤東熱忱地關注農民的需要，開展土地改革和減租減息，促使農民全面地參與根據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組織。確實，陝西和邊區的貧瘠刺激而非阻礙了「農民激進主義」的誕生，¹⁶而抗日戰爭則給予了革命的民族主義以新的動力。因此延安時期乃是一個最終奪取政權的壯大和準備時期。

為了動員起缺乏經驗的農民階層，毛澤東在鄉級以下創立了貧農團和農會，鼓勵他們積極參加分地運動。農民直接參加針對農村貧窮和壓迫等地方問題的群眾性社會政治動員，不僅加強了階級意識，也

¹⁴ James P.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 1972), 514.

¹⁵ Ilpyong J. Kim,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 (Berkeley, 1973); "Mass Mobilization Policies and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in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New York, 1969), 78–98.

¹⁶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1), 28, 90, 100.

迫使他們驅走傳統的怯懦心理。此外，在1937-1941年，所有16歲或以上的農民，都通過不記名投票的平等直接普選機制，加入了政治活動的潮流。毛澤東認為「所有人都能超越階級、經驗和思想的界限，創造性地參加建設一個新的中國。」¹⁷ 他還闡述了「三三制」，該項制度將參加邊區政府和參議會的中共黨員限制到三分之一，將其餘三分之二的席位讓給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分子及其他人士。至少在表面上，統一戰線政策給邊區一種民主的色彩。

生產自給運動 根據合作和參與的原則，延安時期發起了六場大的運動；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日後政策的許多主要特徵。

1. 採納了「精兵簡政」原則，精減軍隊和政府機關。
2. 推廣「下鄉」運動，使知識分子及黨員幹部與工農相結合。
3. 在不搞土改的地方實行減租減息，減少額度在25%到40%之間，以便使地租不超過田地年產量的三分之一。
4. 推行互助合作運動，改組鄉村經濟。
5. 推行「組織性經濟」，使各個組織和幹部參加經營和體力勞動。
6. 開展新式的教育運動，促使農業社會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改造。¹⁸

這樣，在政治、經濟、戰爭和革命各方面開展的群眾路線方法，在領導人和人民之間鍛造了一條緊密的紐帶，成為延安經驗的核心。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花了很多時間就黨和國家面臨的問題及奠定最終勝利之基礎的策略進行思考、理論化和寫作。年屆40多歲的他精力極其旺盛，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經常熬夜到凌晨時分。1938年他曾幾乎沒有間斷地工作九天九夜寫就了《論持久戰》一文，當脫稿時他已筋疲力盡。這段時間裏他寫的其他許多重要的著作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

¹⁷ 同上註，210。

¹⁸ 同上註，210-11, 212-74; Jerome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65), 204.

(1937年9月)、《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1937年10月)、《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論持久戰》(1938年5月)和《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在大約兩年的時間裏，他撰寫的論著有200頁是關於戰略方面，165頁關於政治，55頁關於哲學。¹⁹此後，他還撰寫了許多其他著名的作品，包括：《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和《關於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949年7月他寫了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

這個擁有自己的領土、政府、紀律嚴明的政黨和軍隊，以及卓越的領導層的「另一個中國」之存在，吸引了外國人的好奇心，他們想親眼一睹這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到底與國統區有甚麼不同。結果，一些外國來訪者進入到中共控制的地區，並報道了他們的發現。

外國觀察家 1936年7月，斯諾 (Edgar Snow) 衝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進入共區。此前他曾把中國的共產主義描述成一種「農村共產主義」，但在他訪問了延安並與毛澤東交談後，他把中國共產黨擡高到了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地位。斯諾批駁了所謂中共不過是從屬於莫斯科之傀儡的看法，斷言中國人已發展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他的《西行漫記》是一部經典性的新聞體著作，它曾對美國大眾關於紅色中國的觀念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在這部書中，斯諾把共產黨人描述成儉樸的愛國者，而國民黨人則是腐敗的不可信賴者。他的妻子在比較國共兩黨時則更為坦率。她曾於1937年訪問了延安，並把這次旅行說成是「一次發現了……一種新的精神和一群新的人類的旅行，這些人正在地球上最古老、變化最小的文明之心臟地帶

¹⁹ Jerome Ch'en, 209, 216–17. 陳志讓對這段時間裏毛澤東著述數量的統計是不全面的，因為他沒有把毛澤東的許多其他著作包括在內，如：《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5月)；《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1937年7月)；《矛盾論》(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以及大量零零散散的著作。參見《毛澤東選集》(北京，1967年)，第1、2卷。

創建一個新世界。」在她看來，中國共產黨人是一種「新型的」中國人，他們「極富人情味」——這種性格特徵「深深地」感染了她。²⁰她甚至說中國共產黨人看起來「更像我們（美國人）。」他們正「通過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觀念架起一座通向西方世界的橋樑，並試圖成為他們自己時代的主人」。她讚揚中共努力「摧毀封建主義及建立一個現代社會」，並斷言稱中國共產黨人「屬於同我自己一樣的那類人。」²¹

大多數外國記者都懷有對國民黨反感和對中共傾心的感覺，只有一個天主教神甫比較明顯地例外。²²雖然這些來訪者中有些人抱有偏愛紅色中國的先入為主的觀念，但總體來說，他們代表著不同的政治信念。共產黨人的活力、希望、誠實及對大眾的關心，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畢恩來把國民黨的「封建中國」與共產黨的「民主中國」作了區分。美聯社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慶稱為「哀怨之城」和「一場噩夢」。從延安飛往重慶猶如「從中國的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²³《時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國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強壯健康」，而合眾社和《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爾曼則在1943年認為紅軍戰士「大約是我所曾見過的營養最好的部隊」。²⁴

²⁰ Nym Wales (Helen Foster Snow), *Inside Red China* (Garden City, N.Y., 1939), xi, 38.

²¹ Kenneth E. 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1945: A Persuading Encounter* (Ithaca, N.Y., 1971), 338-39.

²² 這些來訪者包括阿特金森 (Brooks Atkinson)、貝特蘭 (James M. Bertram)、畢恩來 (T. A. Bisson)、卡爾遜 (Evans F. Carlson)、愛潑斯坦 (Israel Epstein)、福爾曼 (Harrison Forman)、賈菲 (Phillip J. Jaffe)、賴樸吾 (Ralph Lapwood)、林邁可 (Michael Lindsay)、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斯諾 (Edgar Snow)、海倫·斯諾 (Helen Snow)、斯坦恩 (Gunther Stein)、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和白修德 (Theodore H. White) 等人。那位例外的天主教神甫是為《中國通訊》(*China Correspondent*) 和許多其他天主教出版物工作的沙納漢 (Cormac Shanahan)。

²³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New York, 1945), 5, 88, 460; Shewmaker, 340.

²⁴ Jerome Ch'en, 248.

用作比較的標準不是共產黨中國與美國，而是重慶和延安。前者代表著「舊中國」——死氣沉沉、頹廢衰微、自私自利、逆來順受、對普通百姓漠不關心、貧窮落後、不講人道、任人唯親，而後者則代表「新中國」——滿懷希望、朝氣蓬勃、效率卓著、鬥志昂揚、綱紀嚴明、熱情洋溢。斯諾稱一顆紅星正在中國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則認為國民政府正因其行為不當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淪喪和濫施暴政而腐朽枯萎。雖然白修德「不信任共產黨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國被淹沒在紅色浪潮中」，但他還是認為國民黨「頹廢衰微」而共產黨則「生氣勃勃」——「相形之下」後者「光芒四射」。²⁵

美國記者們出於偏向窮人敵視富人的態度而覺得共產黨人是一些比國民黨人「更好的」或「不那麼壞的」人。這些記者來自一個習慣於憧憬社會改良和民主進步等理想的社會，故他們期待著人民大眾的福利和智力能有不斷升級的改善。因此，與中共的價值觀相比，國民黨的傳統價值觀不太適合他們的品味，而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樂觀主義和烏托邦式的唯物主義則與他們產生了某種共鳴。²⁶ 在記者的報道中，中國共產黨人顯得像是「超人」，猶如「穿草鞋的勇士」一般；他們與中共的相遇被說成是「令人誠服的」，而他們與國民黨的相遇則是「令人討厭的」。²⁷

根據外國來訪者對邊區的觀察，他們對這裏實行的「三三制」、選舉程式、民眾之參與政治進程，以及公民權的擴大等事物的印象極為深刻，以致他們認定紅色中國稱得上是「一種民主制度」。²⁸ 他們描述中國共產黨人是「社會改革家和愛國者」或「農民改革家」，實行著「代議制民主」、「農村或農民民主」或一種「有效的大眾民主」。中國共產黨人乃「農村改革家」及有別於俄國共產黨的神話在美國人的心目中變得非常普遍。

回顧歷史，人們會傾向於認為，這些外國報道者是一些新聞記

²⁵ Shewmaker, 340-46.

²⁶ 同上註，345-46.

²⁷ 同上註，183, 191-99, 339.

²⁸ 同上註，211, 215.

者，他們寫下所見所聞，而不像訓練有素的政治學家們那樣，有能力去精確地把握中共的理論本質和最終目標。這些記者們沒有能力在民主的手段和中共的目的之間作出區分，也沒能意識到統一戰線政策只是推延了而非拋棄了奪取政權和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則。²⁹

如同人們意料的那樣，蔣中正叱責這些報道「不公正……帶有偏見」。³⁰ 毛澤東也駁斥有關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他向外國記者澄清說中共「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是支持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主義者。斯諾據此報道稱中共的改良主義傾向「僅僅是一個非常暫時的事務」，其最終目標仍然是建立「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概念的真正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³¹ 但儘管有毛澤東的抗議和斯諾的報道，那種中國共產黨是「農村改革家」的形像還是無法從美國人的心目中消除。

外國觀察家自然對俄國與中國共產黨之聯繫的問題感興趣，但他們只發現1937-1938年間有一個塔斯社記者在山西，1944年夏有三名俄國人在延安：兩人是塔斯社記者，一人是外科醫生，全都是經國民政府的准許到那裏去的。西方記者很滿意地看到那裏沒有甚麼蘇俄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迹象。確實，毛澤東在1945年4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稱，中國的制度必須根據中國的歷史來建立，正如俄國的制度是根據俄國歷史建立起來一樣。³²

迪克西使團 經蔣中正批准進入共區的第一位美國軍官是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卡爾遜 (Evans F. Carlson)，此人曾於1927-1928年及1933-1935年間在中國擔任過情報官。他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被派來考察中共的軍事行動，並且頗為同情地把中共武裝與美國革命戰爭時的民兵相提並論，讚揚他們的「道德教訓」做法，在他

²⁹ 同上註，215-16, 227.

³⁰ Jerome Ch'en, 242.

³¹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61), 188; Shewmaker, 249, 251, 255-56.

³² 同上註，231-32, 238.

看來，這種做法意味著較高的政治覺悟、道德行為和官兵之間更加民主的情誼。他關於中共軍隊與人民之間緊密相連和「有機結合」的報告同樣地充滿熱情：「八路軍和人民如魚得水」。³³

1943年初，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將軍 (見下節) 的政治顧問戴維斯 (John P. Davies) 建議派遣一個美國軍事觀察團前往中共控制區，但這個建議沒有被史迪威採納。戴維斯在1943年6月24日和1944年1月15日再次向史迪威和國務院遞呈了他的建議；他指出中共軍隊是華北地區最有凝聚力、紀律最嚴明也最有進取心的抗日部隊，而華北也正是未來蘇聯參戰時蘇軍最有可能進入的地區。向延安派遣一個美國使團可以搜集軍事情報、判斷蘇聯的意圖，或許還可以消除俄國對中共的影響力。³⁴ 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雖然對這個建議很感興趣，但由於蔣的反對，他將這件事擱置了起來。美國國務院外交官謝偉思 (John S. Service) 作了另一項提議，他報告說中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下中國境內最有活力的力量，建議華盛頓應利用中共來平衡蘇聯在中國和東亞的影響。最後，在1944年6月23日，羅斯福獲得蔣中正同意，派一個軍事觀察團前往延安。³⁵

第一支美國派遣隊於7月22日抵達中共的首都，第二支則在8月7日到達。這個團隊被稱為「迪克西使團」，共有十八名成員，帶隊的是包瑞德 (David D. Barrett) 上校，他曾是一名漢語教官和派駐北京的武官。使團的主要目的成了「了解這些人」，「判斷他們未來如果裝備美式器械將具備的作戰潛能」，評估「〔中國〕共產黨對戰爭的潛在貢獻」。³⁶

包瑞德發現「〔中共的〕訓練方法基本上是程式化的，按我們的標準來看沒有多大價值。」他得出結論說「他們是一些出色的游擊戰士，但就大規模作戰而言……他們決無能力與強大的日軍硬碰硬地較量並

³³ 同上註，105, 194-95, 197.

³⁴ David D. Barrett,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anan, 1944* (Berkeley, 1970), 22-23.

³⁵ 同上註，26-27.

³⁶ 同上註，13, 27-28.

取勝。」但是，如果他們得到美國的訓練和美式的裝備，就能夠與日軍打正規戰。³⁷

中共領袖們親切地接待了迪克西使團，並於1944年8月底，謝偉思對毛澤東主席作了那次被長期壓住的著名採訪。毛澤東宣稱他希望避免內戰，但只有當美國人能夠實施干預以迫使蔣中正接受妥協時才有可能。這樣的干預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沒有美國的援助，國民黨是無法用武力壓服中共的。內戰「在所難免但也不一定要爆發」，這最終要由美國人來決定。毛澤東又補充說，無論怎樣，美國自己先得將中國從日本解放出來，而在這一點上，他的軍隊之支援是至關重要的。戰爭的影響將在軍事上以及在戰後時期限制蘇聯的幫助。³⁸ 華府閱讀了謝偉思的報告，但置之不理。美國繼續扶持蔣作為中國合法政府的首腦，同時希望他能革新他的政權以求挫敗中共。不過，美國希望在可能的條件下將中共的部隊融合進對日本的戰爭。

戴維斯和謝偉思確信蔣消滅不了共產黨，極有可能的是共產黨打垮了他，除非國民黨實行激烈的改革。1944年11月初，接替謝偉思在延安的戴維斯得出結論，「共產黨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由蔣掌握，而是掌握在共產黨手裏。」³⁹ 戴維斯和謝偉思確信支援中共比支援國民黨意義更大。他們考慮了各種選擇，包括利用中共的民族主義特徵盡可能地把中共與俄國人分隔開來。但在最後，他們相信蔣不會改革他的政權，而他們也擔心美國會把蔣一腳踢開。戴維斯向華盛頓建議「我們現在不應該拋棄蔣介石。在目前時刻這樣做，我們將得不償失。」⁴⁰

在這種模稜兩可的背景下，美國駐華人員考慮暗中與中共建立關係，儘管蔣的反對是眾所周知的。在延安的軍方使團把共區稱作是「一

³⁷ 同上註，34, 41, 91.

³⁸ John S. Service, *The Americ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Berkeley, 1971), 172-73.

³⁹ 同上註，162.

⁴⁰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1949), 574.

個不同的國家」，延安是「中國最現代的地方」。美國人一再注意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實用主義，在1944年秋，他們就預見到中共非常有可能取得最後勝利。就連那位以親國民黨立場著稱的羅斯福總統駐華特使赫爾利 (Patrick Hurley) 也在1944年11月訪問延安後評價說，中共是「中國唯一真正的民主分子」，他們「事實上不是共產黨；他們正在為民主原則而奮鬥。」高斯 (Clarence Gauss) 大使也認為他們可能贏得最後勝利；高斯主張「退出中國政局，聽憑它 (國民政府) 垮台，自行了結」。⁴¹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魏德邁 (Albert C. Wedemeyer) 將軍的一些參謀人員與戰略情報局合作，決定向中共建議一項武裝兩萬五千名游擊隊和更多民兵的計劃。美國特種部隊將前來訓練這批人，並率領他們進攻一些由魏德邁選定的戰略要點，所有中共軍隊將與魏德邁將軍合作。但是，美國駐華情報機關中最保守、與國民黨秘密警察淵源也最深的美國海軍情報局將這一消息透露給了蔣。魏德邁和赫爾利都聲稱對這一計劃的擬議一無所知而委過於包瑞德，包瑞德因此被剝奪了晉升准將的機會及被迫承受許多其他的屈辱。⁴²

延安的經驗在中共歷史上是極其重要的。就內部而言，它根據群眾路線創立了一套新的社會政治制度，同時毛澤東創造性地為他的革命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就外部而言，它吸引了一個美國軍事觀察團、一些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和一個美國總統特使前來訪問，另外還有大批外國記者前來採訪。它實際上取得了一種半國際承認的地位。到1945年，延安控制著十八塊根據地，共有一百萬平方公里，約一億人口。它擁有一百萬黨員和相同數量的武裝力量。毛澤東事實上建立了與國民政府爭奪國家最高政權的另一個中國。按一位著名歷史學家的

⁴¹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1953), 222; U.S. Senate, Committee on Judiciary,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Morgenthau Diary: China* (89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Washington, D.C., 1965), 1380, 1381, 1247-48, 1304-08, 1318-21.

⁴² 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C., 1959), 73-76, 250-54; Barrett, 91-92.

觀點，毛澤東的政策中，沒有哪一項比「在抗戰環境下的第二次統戰政策」更有益於他的最後勝利。⁴³

戰時外交與美國捲入中國事務

從1937年7月戰爭爆發到1941年12月日本襲擊珍珠港，中國都是獨自進行抗戰。儘管它從西方國家那裏得到了同情、道義支持和一些小筆貸款，但唯一給予中國實際援助的國家是蘇聯。由於中國的戰爭，蘇聯直接免除了來自日本的壓力，所以在1937年8月主動與中國簽訂了一項互不侵犯條約，向中國派來了一些「志願」飛行員，並三次向中國提供了總額達2.5億美元——1937年和1938年各5,000萬，1939年1.5億——的3%低息貸款。到1939年年底，蘇聯已提供了一千架飛機，派遣了大約兩千名飛行員和五百名軍事顧問。事實上，蘇聯的一些最優秀的軍事專家都參與了援華專案。⁴⁴

同一時期西方的援助少得可憐——這是由於美國的孤立主義和歐洲的動盪局勢所致。西方的援助總共才2.635億美元——剛剛超過俄國的2.5億——其中美國提供了1.2億美元用於購買非軍需品、5,000萬美元用於穩定貨幣，而英國和法國則分別提供了微不足道的7,850萬美元和1,500萬美元。不過，美國在1937年戰爭爆發前後購買的中國白銀達3.5億盎司，價值2.52億美元，這間接地幫助緩解了沉重的軍費負擔。然而，荒謬的是，在1939年7月日美商務條約終止之前，美國是日本絲綢的大買主及石油、廢鐵和汽車零部件的主要供應者；它還滿足了日本對金屬、棉花和紙漿總需求的將近40%。⁴⁵毫無疑問，日本與美國市場的關係，直接和間接地支持了它在中國的戰爭行動。

但是，1939年9月歐洲爆發戰爭，極大地改變了外來援助的格局。俄國的援助不斷減少，直到最後竟至斷絕，而英國和法國也縮了

⁴³ Jerome Ch'en, 213, 255.

⁴⁴ 如伏羅希洛夫 (Kliment Voroshilov) 元帥、朱可夫 (Georgi Zhukov) 將軍、崔可夫 (Vassily Chuikov) 將軍等，他們全都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名。

⁴⁵ Young, 144, 206–7, 350, 440–41.

回去，以免開罪日本。在日本的壓力之下，法國在1940年6月中斷了越南至雲南的鐵路運營，一個月後英國也關閉了滇緬公路，從而完全把中國與外部世界隔離了開來。這種局勢，因美國隨日美關係的惡化逐漸加大對華援助的力度而稍有改善。1941年3月，羅斯福總統將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雖然在1941年對華租借的總額只有2,600萬美元，只佔租借給所有國家之總額的1.7%，但這畢竟代表了一個重要的開端。此外，美國和英國的其他一些貸款期限也獲得了延長，以幫助穩定中國的貨幣和外匯匯率。

襲擊珍珠港改變了中國戰爭的性質，也改變了外來援助的結構。英美對日宣戰和中國對軸心國的宣戰，使亞洲的戰爭成為一場世界規模的反侵略和反獨裁鬥爭之組成部分。同盟國成立了中—緬—印戰區，以蔣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自1942年1月5日開始生效。早年曾在北平當過語言教官的史迪威將軍被派到重慶擔任蔣的參謀長。而且，自1941年8月起就一直在昆明參戰的一批美國「志願者」飛行員——飛虎隊——在1942年7月4日併入了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以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將軍為司令。⁴⁶從此時起，美國的援助大幅度增加。從1942年到1945年戰爭結束，美國對中國的貸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5億美元。租借法援助也相應地增加到13億美元，加上1941年的2,600萬美元和1946年的2.1億美元，租借總額高達15.4億美元，佔對各國租借總額的3%。

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相繼攻佔了香港、新加坡、緬甸和菲律賓。盟軍黯然失色的表現與中國的長期抗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的抗戰現在贏得了西方新的尊重。國防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對羅斯福稱「中國人已經作的和正在作的對侵略之卓越抵抗，以及他們對共同事業的貢獻，值得我們給予所能給予的最充分的支援。」華盛頓不僅向中國提供了一筆3億美元的貸款，用於貨幣穩定，而且還說服倫敦在1943年1月11日發表一項聯合聲明，宣佈廢除過去一個世紀裏的一切不平等對華條約。此外，羅斯福和國務

⁴⁶ 1991年5月3日，美國政府終於承認，「飛虎隊」是在白宮和國防部指揮下的美軍在華秘密行動(*Los Angeles Times*, July 6, 1991)。

卿赫爾 (Cordell Hull) 還決心不顧英國和蘇聯的反對，讓中國成為四大國之一。英國外交大臣艾登 (Anthony Eden) 「不喜歡讓中國人在太平洋到處奔跑」，而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 (V. Molotov) 則堅持中國在歐洲根本沒有利權可言。最後這兩國都聽從了美國的勸說，接納中國為1943年11月1日莫斯科宣言的簽字國之一。這個重要文件是四大國所作的一個不間斷地進行戰爭直到贏得最後勝利的誓言；它特別否認了任何與敵國簽訂單獨和約的意圖。⁴⁷

1943年的開羅會議 羅斯福喜歡與世界領導人會晤，並就戰爭目標和未來和平方案做出重大決定。同樣，各國領導人也急於同他會晤，以便保證得到美國更強有力的援助。在這樣的環境下，羅斯福很想與蔣中正和史太林面談，但中國領導人蔣中正卻不太願意同這位俄國領袖照面，因為1941年的日蘇中立協定及據稱的蘇聯對中國共產黨之支援令他怨恨。蔣請求首先獲得單獨會見美國總統的機會，如果不能安排這個會晤的話，那他寧可推延會見。於是羅斯福和丘吉爾安排了兩次會議，在開羅會見蔣及在德克蘭 (Teheran) 會見史太林。

在同盟國的大戰略上，歐洲位居第一，太平洋其次，中國居第三。丘吉爾擔心美國總統對中國的偏愛，而可能對蔣作出過分的承諾，從而使歐洲的戰爭受損，故他請求首先與羅斯福舉行預備性的會談。但羅斯福害怕這樣一個舉動會引起中國和俄國的懷疑，便徑直前赴開羅。蔣與羅斯福舉行了長時間親切的會談，由畢業於威爾斯利女校、英文非常好的蔣夫人充任翻譯，但這卻令丘吉爾惱悔不已，他評價說：「英方與美方人員的會談令人苦惱地被中國的事情攪亂了……總統……很快就關起門來與〔蔣〕委員長長談。勸使蔣及其夫人去參觀金字塔放鬆放鬆自己，直到我們從德克蘭返回的一切希望，都付諸東流了，結果，原本在開羅最次要的中國事務，竟佔據了首要位置。」⁴⁸ 蔣要求立即收回所有失地的請求，獲得了羅斯福的贊同，並隨後得到了丘吉爾和史太林的認可。總統進而同意增加飛越駝峰 (喜馬拉雅山) 供

⁴⁷ Feis, 20–21, 96, footnote.

⁴⁸ Feis, 103.

應中國的運輸航次，執行對日本的遠端轟炸，給予中國在未來的聯合國組織中較高地位。羅斯福總統感到，通過給予中國體面的獎賞，中國會加強對敵作戰。

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第一次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全部歸還中國被日本搶去的失地，歸還日本在本土以外的領地，即薩哈林島和庫頁島歸還給蘇聯、一些日本在太平洋的託管地交給美國。美國總統在向美國人民發佈的聖誕賀詞中，熱情地宣佈：「今天，我們與中華民國在深厚友誼及共同目標方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站在了一起。」⁴⁹

史迪威危機 中美關係內部的一個危機，是蔣中正的美方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性格。綽號為「醋約瑟」的史迪威倔強固執，缺乏他的職位所需要的軍事外交官之素質。1943年9月6日，他提了一項雖然在軍事上頗為合理但在政治上卻極為敏感的建議：蔣應解除對西北共區的軍事封鎖，並允許第十八集團軍與政府軍一起對日作戰。美國駐重慶的使館人員估計，至少有20個師、或許多達40萬人的蔣中正之最精銳部隊受命去封鎖中共區域，他們本可以用於打擊日軍的。史迪威干涉中國政治的行徑激怒了蔣，蔣打算請求美國將他召回，但蔣夫人勸阻了，理由是這樣一個行動將在美國不受歡迎。蔣史兩人之間的關係因為在緬北戰略上的分歧而更加惡化，史迪威一直在緬甸北部訓練中國軍隊，以圖打開一條通往自由中國的新的供應線。⁵⁰ 在日軍發起的1944年總攻（「一號攻勢」）面前，爭吵白熱化了，日軍的這次攻勢旨在開闢一條自華北經華南到印度支那的「大陸走廊」。在這場進攻中，日軍前進至廣西省的重要城市桂林。此前供美軍B-29轟炸機用作轟炸日本的飛機場失陷了，而且重慶本身也受到了威脅。史迪威重新提出了利用中共部隊的建議，而蔣則予以頑固拒絕。兩人之間的關係惡化到難以修復的地步。

⁴⁹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37.

⁵⁰ 主要由於史迪威的努力，利多公路和緬甸公路最終在1945年1月竣工了；他們被重新命名為「史迪威公路」。

對中國的共產黨問題及中蘇的總體關係深切關注的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 (Henry Wallace) 前來中國，並訓令駐莫斯科大使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 向史太林灌輸需要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觀念。史太林和莫洛托夫答稱，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人造奶油共產黨」、「捲心菜型共產黨」和「蘿蔔型共產黨」——意謂紅皮白心。⁵¹ 當蔣聽到這些描述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共產黨表面上是天真的農村民主分子，但實際上他們比俄共更共產主義化。他向華萊士保證，他將採取政治手段來解決中共問題，但希望中共放棄它獨立的軍隊和領土，將其併歸國民政府。關於中蘇關係，他起誓如果羅斯福總統同意充當「仲裁者」或「中間人」的話，他甚至願意前赴蘇聯會晤史太林。⁵²

蔣嚴厲地控訴史迪威缺乏合作和判斷力。為了與白宮建立直接的關係，他請求美國總統派一名私人特別代表前來重慶。⁵³ 他希望通過這種策略繞開給史迪威撐腰的國務院和國防部。華萊士評價說：「我被一位身處困境之人的這種吶喊深深地感動了。」

隨著日軍的進攻迫近重慶，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史迪威的勸說下，請求羅斯福總統要求蔣把包括中共武裝在內的所有中國軍隊之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蔣的自尊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他對羅斯福說可以接受這個「苛刻的但也真誠的」建議，不過必須首先滿足三個條件：(1) 明確界定史迪威的權力；(2) 中共軍隊不包含在他的指揮中；(3) 由蔣中正本人完全掌握和分配租借物資。羅斯福總統對參謀長聯席會議稱：「蔣委員長的話相當有理。」⁵⁴

胡佛 (Hoover) 總統時期擔任過國防部長的赫爾利 (Hurley) 將軍，以總統特使的身分被派來重慶，協調史迪威與蔣中正的關係，並幫助史迪威出任中國軍隊統帥之職。溫文爾雅、循循善誘的赫爾利保證了蔣同意將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儘管蔣堅持要保留在重大戰略決策上最

⁵¹ Feis, 140–41, 180.

⁵²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558.

⁵³ 丘吉爾在重慶就派駐了一個私人代表維亞 (Carton de Wiart) 將軍。

⁵⁴ Feis, 153, 172.

終定奪的權力，以免史迪威的權力超過他。就在這個節骨眼上——9月19日——「酷約瑟」前往中國領袖蔣中正的官邸，並且不聽赫爾利的勸告，傳達了一條羅斯福總統發來的措辭強硬、含有指責味道的電文，要求蔣立即給予史迪威對中國軍隊的「無所限制的指揮權」，否則蔣就應對中國迅速惡化的軍事局勢承擔「個人責任」。赫爾利評價說，這份電文好像「在蔣的太陽穴上狠擊了一下」那樣令他頭暈目眩。

蔣告訴羅斯福總統，雖然他願意接受一位美國將軍及重組自己的軍事指揮系統，但他卻不能將如此重要的責任託付給史迪威，此人想要控制他而不是與他合作。蔣直截了當地請求將史迪威召回。擔心可能丟掉指揮權的史迪威緩和了態度，同意取消使用中共部隊一項。但木已成舟，蔣不會改變立場。

儘管聯席參謀長在這場爭吵中繼續支持史迪威，但赫爾利的一份巧妙的報告打消了羅斯福總統或許有過的任何疑慮，赫爾利寫道，他相信蔣是可以被說服並接受領導的，但史迪威卻認定蔣委員長非得靠逼迫才會行動；故而史迪威的任何動作都會被當作是要制服蔣而非與他合作。赫爾利機敏地告訴總統：「若是沒有史迪威的話，您與蔣之間就毫無糾紛」；「竊以為，如果您在此次爭端中支持史迪威的話，您或將失去蔣，而且會因失去他而失去中國。」報告的結尾稱他相信，如果委派另一位美國將軍來接替史迪威，蔣將會與他合作並規劃出制止日軍推進的方案。赫爾利的建議證明是決定性的，於是史迪威在1944年10月19日被召回。⁵⁵

接替史迪威的魏德邁中將被任命為駐華美軍總司令兼蔣的參謀長，但不是中國軍隊的司令。魏德邁謙和體諒的舉止與史迪威剛愎自用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這使他立即得到了蔣的接納，中美關係轉眼就改善了。奇怪的是，日軍的攻勢也在此同時自行減弱了，原因是日本將其部隊轉調至太平洋與美軍作戰。從此以後，駐華日軍再也沒有發起大規模進攻。

⁵⁵ Feis, 191, 198.

赫爾利的調停，1944—1945年 因國共摩擦妨礙了中國的戰爭效率並威脅到未來的國家統一和重建，赫爾利尋求促成兩黨和解的方法。1944年11月7日，經蔣和美國總參謀部的同意，赫爾利飛赴延安與毛澤東舉行了兩天的會談。中共因赫主動倡議這趟行程而動容，並給予了熱情的接待。隨後的討論在11月10日達成了五點建議。建議倡導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中共代表參加一個全國聯合軍事委員會、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實行公民及政治自由，以及在一個全國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合併所有的武裝部隊。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在建議書上簽了字，赫爾利則以「合眾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身分簽了字，雖然美國國務院後來堅持他只是作為一個「證人」簽的字。⁵⁶ 為表示對美國之努力的感謝，毛澤東在11月10日致函羅斯福：「與蔣介石委員長達成一項將促進中國人民幸福的協定一直是我們的願望。通過赫爾利將軍的斡旋，我們突然看到了實現這一願望的希望。」⁵⁷ 延安訪問後使赫爾利相信，「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所秉持的原則與中國共產黨所秉持的原則之間，即使有所分歧的話，分歧也不是很大。」⁵⁸

但是，蔣卻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中共問題。對他來說，聯合政府意味著國民黨訓政的失敗，並為共產黨滲透進政府開了方便之門。當他提出自己的三點方案時，他明白無誤地拒絕了五點建議。三點方案要求中共接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將他們的軍隊交給國民政府，而國民政府則將給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及在全國軍事委員會中的代表權，同時實行一些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總之，他要求毛澤東交出軍隊並信任國民黨在未來政治權力分配中的誠意。毛澤東在他的《論聯合政府》中評論說：

這些人〔即蔣及其部下〕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然而他們

⁵⁶ Tang Tsou, 290; Jerome Ch'en, *Mao*, 266.

⁵⁷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Washington, D.C., 1967), vol. 6 (1944), 689.

⁵⁸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748. 1944年12月24日赫爾利致國務卿斯退丁紐斯 (Stettinius) 函。

沒有自由……正因為他們〔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軍隊，同時他們也一概沒有自由。⁵⁹

迫於公眾輿論和美國建議的壓力，蔣同意召開一次國是會議，它將包括所有黨派的代表和無黨派人士。表面上，這次會議將商討結束國民黨訓政、制定憲法、草擬共同政綱及在憲法正式頒佈之前所有黨派參加政府等相關事宜。但實際上，聯合政府是蔣和國民黨極其討厭的事物；他們暗中策劃阻撓聯合政府的產生。1945年3月3日，未經與共產黨的事先磋商，國民政府宣佈將在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來通過一項新憲法。由於這次大會的代表是1936年在國民黨操辦下選舉產生的，因此蔣能夠指望通過一部有利於國民黨的憲法。周恩來譴責國民黨這個行動的「欺騙」性，毛澤東則拒絕承認1936年國民大會的合法性。事態陷入了僵局，談判破裂了。⁶⁰

1944年11月17日，高斯大使辭職，由赫爾利接任為駐華大使，但他沒有得到使館人員的完全支援，許多使館人員已開始公開批評蔣及其政權。他們敦促華盛頓繞開國民政府直接與中共及其他對日作戰的黨派打交道。羅斯福總統否決了這個想法，並贊成赫爾利無條件完全支持蔣的政策。但是，到1945年5月，那種向蔣施加壓力促使他與中共達成協定並擴大其政府的主張，越來越得到華盛頓的贊同。與此同時，在國際層面上，與對日戰爭之高潮相關的重要決策正在制定之中。

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 到1944年底，德國的戰敗已經在望，同盟國領袖們將戰略重心轉向了日本。華盛頓已經決定直接從太平洋進攻日本，而不是像原先計劃的那樣從中國發起進攻。參謀長聯席會議估計，在德國戰敗之後的十八個月裏就能取得對日本的勝利，而德國的戰敗預計將發生在1945年7月1日到12月1日之間。對日本實力的

⁵⁹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73頁；Carsun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1952), 136; Tang Tsou, 292.

⁶⁰ Jerome Ch'en, *Mao*, 269.

過高估計，導致了討論邀請蘇聯參戰以縮短戰爭時間，並減輕盟軍的犧牲。光復了菲律賓的麥克阿瑟 (MacArthur) 將軍估計，摧毀日本在東北的駐軍將需要蘇軍的60個師。為了確定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條件，1945年2月在雅爾達 (Yalta) 召開了一次三巨頭會議。

在會上，史太林同意在德國戰敗後兩至三個月內，參加對日本的戰爭，條件是1904年被日本侵佔的所有俄國從前的權利及俄國在東北的特權歸還給蘇聯。具體地說，他要求得到庫頁島、南薩哈林島、大連和旅順等不凍港、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以及對外蒙古現狀的支援。他告訴羅斯福：「很清楚，如果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他和莫洛托夫很難向蘇聯人民解釋俄國為甚麼要參加對日本的戰爭。」⁶¹ 由於許多條件都涉及到沒有與會的中國之主權，保證中國同意這些條件的事宜就託付給了羅斯福。在史太林方面，他同意將尊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並與蔣簽訂一項承認他為中國唯一領袖的條約。

羅斯福此時病魔纏身，非常疲勞，他沒有在雅爾達會議上據理力爭。他認為自己已完成了會議的主要目標，即史太林同意 (1) 在德國戰敗後三個月內參戰；(2) 支持蔣為中國領導人；(3) 承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然而，他又確實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簽字讓與」了中國在東北的主權權益。英國外交大臣艾登 (Anthony Eden) 堅持完全沒有必要為讓蘇聯參戰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因為蘇聯或許會根據自己的需要參加戰爭。但是，丘吉爾否決了艾登反對簽署雅爾達協定的建議，以表示他對羅斯福總統判斷力的信賴並保護英國在遠東的利益。

雅爾達協定的具體條款瞞過了蔣和赫爾利，但這兩人都間接地獲悉了某些部分。赫爾利感到被駕空及受到侮辱，因此決定在1945年3月返回華盛頓時質問總統。令他吃驚的是，他在與羅斯福握手致意時覺得總統的手「骨瘦如柴」，臉頰上的皮膚「像是貼在顴骨上一般」。赫爾利日後表白說：「你知道，我胸中曾有的所有鬥志都垮掉了。」⁶² 4月12日，羅斯福去世，杜魯門 (Harry Truman) 在對雅爾達協定一無所知

⁶¹ Feis, 243.

⁶² Feis, 279.

的情況下就任總統，那份協定收在海軍上將李海 (Leahy) 的特別檔案中。

蘇聯已在4月5日照會日本，兩國之間的1941年中立協定已失去了意義；故「不可能」再持續。事實上，根據協定條款，它將在這份照會發出以後的一年內仍然有效，蘇聯顯然不願再等到那時了。現在事態發展迅速。5月1日希特拉 (Hitler) 自殺，一星期後德國投降。蘇聯軍隊開始從歐洲轉移到亞洲。

蔣派妻舅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以圖在蘇軍進入東北之前與史太林達成一項協定。史太林向中國提議訂立一項為期三十年的反對未來日本侵略的友好同盟條約。史太林承諾支持蔣為中國的領袖，保證不支持他的敵人，蘇軍在日本投降後三周之內撤離東北，兩到三個月內完成撤軍。作為回報，中國應在東北給予蘇聯許多重要的讓步：在一個包括旅順、大連及鄰近地區的軍事區裏駐紮海空軍的權利、擁有東北鐵路及相關企業、中國承認外蒙的獨立。在這些條件被寫成一項正式的條約之前，史太林前往波茨坦 (Potsdam) 會晤丘吉爾和杜魯門。具有重大意義的是，他在離開時得悉了日本已在7月6日請求他調停，以謀求日本與同盟國達成和平。

在1945年7月16日波茨坦會議第一天的晚上，第一顆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⁶³ 消息傳到了杜魯門那裏。曾在丘吉爾和史太林面前頗不自在的杜魯門總統「因它(這個消息)而膽氣大壯……並稱它給了他一種全新的自信心。」丘吉爾以詩一般的華麗語言說：「炸藥還有何用？一錢不值。電力又有何用？毫無意義。原子彈是二次(基督)降臨。」⁶⁴ 這位英國領導人確信，戰爭將在一兩次原子彈的猛烈轟炸中結束，故不再需要請求蘇聯參戰了。美國的軍方將領同意這個觀點，但他們堅持說蘇聯的參戰將更快地結束戰爭而相應地減少生命犧牲。無論如何，當時存在著一種固執的感覺，蘇聯對東北的控制無法阻

⁶³ 一枚內向爆炸型的炸彈，稱為「胖男孩」。

⁶⁴ Herbert Feis, *Japan Surrendered: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1961), 72-73, 75.

止，除非美國願意以戰爭來保衛東北；否則最好還是讓俄國作戰而賺得他們的酬勞。

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招致迅速徹底的毀滅」。當東京對這個警告置之不理時，8月6日在廣島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彈。兩天以後蘇聯參戰。8月9日，第二枚原子彈落在了長崎，一天後日本政府宣佈有條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同一天，史大林警告宋子文，如果同盟條約不盡快簽訂的話，東北將處在落入中國共產黨之手的危險中；於是在8月14日條約簽了字。⁶⁵ 蘇聯同意給予蔣中正為首的中國中央政府以道義的、軍事的和物質的支持；尊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在日本戰敗後三周之內蘇軍撤離，三個月內完成撤軍行動；不干涉新疆事務；承認外蒙古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中國方面則同意讓外蒙古通過全民表決行使自決，承認在三十年之內與蘇聯共同控制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三十年之後它們將無需作任何賠償自動轉歸中國。大連將在三十年之內作為一個對所有條約國家開放的自由港，而旅順港則將成為中蘇共同使用的海軍基地。

雖然這項條約代價昂貴，但卻被蔣滿意地接受了，因為它為中國保證了北方邊界的和平，並使蘇聯承諾了承認中國對東北和新疆的主權，並且不支持共產黨反對國民政府。誠然，與蘇聯的和平對中國的戰後重建是至關重要的，蔣感到即使蘇聯不履行其條約義務，這項條約也可以當作是一個檢驗其行為的標準。⁶⁶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發佈了一項結束戰爭的詔書，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 (*Missouri*) 戰艦上簽署了投降書。在經過八年抗戰以後，中國終於勝利了。蔣的威信空前地高，因為他領導中國渡過了最艱難的戰爭歲月而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從未像現在這樣地受人尊敬——它已完成了最漫長的反侵略和反極權主義的抗戰。

⁶⁵ 中方在條約上簽字的不是宋子文，而是外交部長王世傑；宋子文擔心簽約會損害他的政治前途。

⁶⁶ Chiang Kai-shek, 228.

中國為戰爭的結束歡呼雀躍，並急切地盼望相當時間的和平和重建。然而在歡欣激昂的表象下面，卻存在著對仍未解決的共產黨問題及內戰可能性的深切關注。確實，毛澤東再也不能耐心等待而要奪取政權了。

戰爭的後果

戰爭對中國、日本和東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如下：

東亞的國際新秩序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開創了東亞的一個新時代。中國通過長期的反侵略鬥爭，取代了日本的主導國家地位，從戰前的半殖民地狀態一躍而為五大國之一及聯合國的創始國，擁有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和一票否決權。在其近代歷史上，中國的國際威望從來沒有像此刻那樣崇高。與此相對，日本不再是國際政治中的大國了，並且要在美國的佔領和指導下重建經濟。雖然老牌的歐洲殖民列強——英國、法國和荷蘭——在戰爭中獲勝，但昔日的威望卻大大降低，因為這些國家在戰時被日本趕出了在亞洲的殖民地，而且從前的殖民地印度、緬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亞都吵鬧著要獨立。始於十六世紀的歐洲在亞洲之殖民主義時代終於走到了盡頭。另一方面，美國憑藉其在打敗日本中發揮的主導作用，崛起為最強大的太平洋國家。這一轉折預示著亞洲國際關係發展中一個全新篇章的開始。

國民黨的衰竭 儘管對日本的勝利主要由美國人取得，但中國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在整個戰爭期間，中國牽制了相當比例的日本軍隊，令他們不能投入到其他地方。從1937年到1941年，中國獨力抗戰，抗擊了在中國本土的50萬到75萬敵軍——大約是日本總軍力的一半——此外還有20萬到70萬的駐東北關東軍。在1945年戰爭結束時，230萬日本的海外派遣軍中有120萬被釘在了中國。在中國的戰事耗費了日本戰爭總開支的35%——即340億美元中的120億——另外還

有396,040名日本人戰死，更多數量的日軍受傷。⁶⁷ 在中國一方，中國動員了1,400萬人，總傷亡達3,211,419人——包括1,319,958人陣亡、1,761,355人受傷、130,126人失蹤——而且還招致了14,640億元法幣的可怕戰爭債務。⁶⁸ 平民的傷亡和財產損失更是難以計算。在交戰中首當其衝的國民政府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消耗非常慘重，導致無力應付戰後時代新的挑戰。

經濟災難 國民政府自1928年建立起計，就一直受連年的赤字開支的困擾，在抗戰期間，由於軍事開支的不斷增加和沿海省份落入敵人之手，導致關稅收入喪失，財政赤字更加嚴重。下列三個典型年份的統計資料，清楚地表明了收入與開銷之間巨大的差距：⁶⁹

	(百萬元法幣)	
	戰爭開支	收入
1937	1,167	870
1941	10,933	2,024
1945	1,268,031	216,519

政府沒有辦法彌補這個差距，只有採取公認為不明智的增加紙幣發行量的手段，儘管明知道這種做法將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貨膨脹。紙幣發行量從1937年戰爭爆發時的19億元法幣猛增至1941年底的158.1億法幣、1945年時的10,319億法幣。濫發紙幣的後果是暴升的通貨膨脹和平均零售價的急劇上揚：⁷⁰

⁶⁷ Young, 417-18.

⁶⁸ Chiang Kai-shek, 131.

⁶⁹ Young, 435.

⁷⁰ Young, 436.

	零售價的上揚 (%)
1937年(開戰後的頭九個月)	29
1938年	49
1939年	83
1940年	124
1941年	173
1942年	235
1943年	245
1944年	231
1945年(至8月)	251
1945年(自8月到年底)	230

通貨膨脹最終損害了軍隊的士氣，打擊了行政效率，破壞了平民的生活，並使中產階級淪為貧民。由通貨膨脹引起的經濟災難，使大部分中國人與政府離心離德，尤其是知識分子，他們譴責政府的管理失措和不負責任。儘管通貨膨脹是維持戰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弊病，但它在戰後時期便成了一種禍根，損毀了政府根本的經濟基礎。

心理的疲憊 在耐心地忍受了八年抗戰的一切困苦之後，中國人民疲憊不堪，一當贏得了勝利，便再也不想進行任何類型的鬥爭了。他們期待著和平安定與休息養生，而一旦這種願望得不到滿足，便怪罪政府和執政黨。毛澤東早在抗戰初期，就正確地預見到了這種事態的轉折，敏捷地利用了民眾的這種不滿。一當和平恢復，他便立即開始挑戰國民黨的統治權。內戰的陰霾再一次不祥地籠罩了神州大地，令這個筋疲力盡的民族之未來繼續充滿了動盪。

參考書目

- Barrett, David D.,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 1944* (Berkeley, 1970).
- Bisson, Thomas A., *Japan in China* (New York, 1938).

- Borg, Dorot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Mass., 1964).
- Boyle, 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1972).
- Bunker, Gerald E.,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1* (Cambridge, Mass., 1972).
- Chang, Iris,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7).
-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New York, 1958).
-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1986).
- 蔣介石 (Chiang, Kai-shek) : 《蔣總統秘錄》(臺北, 1974年)。
- Chiang, Kai-shek, *China's Destiny* (New York, 1947).
- ,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New York, 1963).
- Chou, Shun-hsin,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7–1949* (New York, 1963).
- Clemens, Diane Shaver, *Yalta* (New York, 1970).
- Clifford, Nicholas R.,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Seattle, 1967).
- Colegrove, Kenneth, "The New Order in East Asia," *Far Eastern Quarterly*, I:1: 5–24 (Nov. 1941).
- Conn, Peter,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 (New York, 1996).
- Denning, Margaret B.,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 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 Communists, and Americans* (Berne, 1986).
- Doenecke, Justus D., *The Diplomacy of Frustrati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of 1931–1933 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Stanley K. Hornbeck* (Stanford, 1981).
- Esherick, Joseph W.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1974).
- Feis, Herbert, *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1953).
- , *Japan Surrendered: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1961).
- Fishel, W. R.,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Berkeley, 195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Washington, D.C., 1955).

——, *1942, China* (Washington, D.C., 1956).

——, *1943, Vol. VI, China* (Washington, D.C., 1957).

——,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eran* (Washington, D.C., 1961).

——, *1944, Vol. VI, China* (Washington, D.C., 1967).

——, *1945, Vol. VII, The Far East–China* (Washington, D.C., 1969).

Garver, 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New York, 1988).

——,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hina Quarterly*, 113:29–59 (March 1988).

Gunn, Edward M.,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1980).

Head, William P., *America's China Sojour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2–1948* (Lanham, Md., 1983).

——, *Yenan: Colonel Wilbur J. Peterkin and the Dixie Mission, 1944–1945* (Chapel Hill, 1987).

Hung, Chang-tai,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1994).

Israel, Jerry, “Mao's Mr. America: Edgar Snow's Images of Chin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XLVII: 1:107–122 (Feb. 1978).

Jansen, Marius B.,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1975).

Jones, F. C., *Manchuria Since 1931* (London, 1949).

Jordan, Donald A., “The Place of Chinese Disunity in Japanese Army Strategy during 1931,” *The China Quarterly*, 109:42–63 (March 1987).

Kataoka, Tetsuy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1974).

Lee, Bradford A.,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1973).

Lensen, George A., *The Strange Neutrality: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1945* (Tallahassee, 1972).

梁敬鎔 (Liang, Chin-tung) : 《史迪威事件》(臺北, 1971年)。

Liang, Chin-tung, *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1942–1944: The Full Story* (Jamaica, New York, 1972).

- Linebarger, Paul M. A., *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 A Political Study* (Boston, 1941).
- Liu, James T. C., "Sino-Japanese Diplomacy during the Appeasement Period, 1933–1937"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50).
- Lohbeck, Donald, *Patrick J. Hurley* (Chicago, 1956).
- Lowe, Peter,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 (New York, 1977).
- McLane, Charles,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 (New York, 1958).
- Miles, Milton E., U.S.N.,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The Little Known Story of the Combined Guerrilla Forces Created in China by the U.S. Navy and the Chi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Garden City, N.Y., 1967).
- Morton, William Fitch, *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 (New York, 1980).
- North, Robert,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1953).
- Reardon-Anderson, James,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1946* (New York, 1980).
- Romanus, Charles F.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1956).
- ,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1953).
- Rosinger, Lawrence K., *China's Wartime Politics, 1937–1944* (Princeton, 1945).
- Schaller, 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New York, 1979).
- Schran, Peter, *Guerrilla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 1937–1945* (New York, 1976).
- Selden, Mark,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1).
- Service, John S., *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Berkeley, 1971).
- Sheng, Michael M.,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37,"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2, 149–83.
- Shewmaker, Kenneth E.,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1945: A Persuading Encounter* (Ithaca, 1971).
- Sih, Paul K. T.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Hicksville, N.Y., 1977).
- Snow, Edgar,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1972).

- ,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38).
- ,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ambridge, Mass., 1957).
- Stewart, Roderick, *Bethune* (Don Mills, Ontario, 1973).
-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The Formation of Maoist Leadership: From the Return of Wang Ming to the Seventh Party Congress* (London, 1994).
- Throne, Christopher,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1978).
- Truman, Harry S., *Memoirs*, Vol. I: *Year of Decisions* (Garden City, 1955).
- , *Memoirs*, Vol. II: *Years of Trial and Hop* (Garden City, 1956).
- Tuchman, Barbara W.,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1970).
- Van Slyke, Lyman P.,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1967).
- Varg, Paul A., *The Closing of the Do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36–1946* (East Lansing, 1973).
- Vartabedian, Ralph, "One Last Combat Victory: The Flying Tigers," *Los Angeles Times*, July 6, 1991.
- Vincent, John Carter, *The Extraterritorial System in China: Final Phase* (Cambridge, Mass., 1970).
- White, Theodore H. (ed.),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1948).
- ,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1946).
- Wylie, Raymond F.,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1936–38," *The China Quarterly*, 79:447–480 (Sept. 1979).
- ,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Stanford, 1980).
- Young, Arthur 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Mass., 1963).

第六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興起

第二十五章

內戰，1945–1949年

日本遭到兩枚原子彈打擊後的崩潰來得比預期的快得多，令到國民政府對戰爭突然結束所帶來的後果完全措手不及。一些緊迫的問題急等著解決，其中最逼切的是，中共進入日軍佔領區收繳敵方武器的威脅。然而更可怕的是東北的局勢，蘇聯軍隊已深入到那裏的腹地，並拒絕隨日本的投降而停止推進。儘管史太林許諾將在三個月之後撤軍，但蘇軍的意圖仍然是秘而不宣的。因此，戰爭的結束給國民政府造成了極其危急的軍事形勢。

隨著日本的投降，政府軍隊與中共軍隊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競賽，雙方都力爭首先到達敵佔區接受日軍的投降，從而收取大量的敵方武器和軍事裝備。在這場競賽中，中共似乎佔有明顯的地理優勢。中共在華北、華南和華中控制著人口達一億之眾的十八個「解放區」，並聲稱擁有一百萬正規軍和兩百萬民兵，¹分佈在黃河、長江和珠江流域的廣大農村。位於這些江河流域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漢口和廣州的大都市，成了中共控制下農村海洋中的城市孤島。為充分利用這個有利形勢，毛澤東在1945年8月9日——即蘇聯參戰後的第二天——宣佈，日本的崩潰在即，中國共產黨發動全面進攻的時機已經來臨。8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命令所屬部隊，奪取日軍佔領的所有城鎮和交通中心，並接受敵軍的投降及其軍事裝備。8月11日，林彪率一支十萬人的大軍沿平瀋鐵路突入東北。在日軍投降後的兩星期之內，中共的地盤從116個縣擴展到了175個縣。²

¹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1963年），第4卷，第1,157頁。

²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119頁；Jerome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65), 261。

政府軍隊分散在幾條戰線和中國的西部地區，所以在這場競賽中處在很不利的地位，但蔣中正決意不讓勝利果實從他的手指縫間溜走。8月10日，他要求中共領導人不得獨自行動，並命日本軍隊和偽軍堅守陣地對付非國民政府軍隊。朱德譴責蔣的行為是「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和漢奸」，並直接命令駐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要向中共代表投降。為壓倒中共的地理優勢，蔣請求美國支助，將部隊空運和海運至淪陷區。

美國立即前來援助，命令將政府軍隊運輸到淪陷區，並派五萬名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到一些重要港口和交通樞紐，等候政府軍隊的到達。政府的三個軍被空運到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隨後有總計五十萬部隊運到了全國各地。此外，華盛頓對東京的總一號命令明確指示駐中國（東北除外）、³臺灣和北緯十六度線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的日本軍隊向蔣和他的代表投降。8月15日，蔣親自命令岡村寧次在淪陷區內維持秩序及控制所有軍事裝備。8月22日，岡村進一步受命只允許政府軍隊進駐淪陷區。這位日本司令官完全服從了這些指令。

國民政府依靠美國的幫助和日本的合作，在第一輪競賽中取得了勝利。政府重新獲得對華中、華東和華南幾乎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樞紐的控制，而中共的部隊則暫時撤退至鄉村。然而，儘管中共遇到了這個挫折，但在競賽的頭兩個星期內也設法取得一些收穫，贏得59個大部在華北的城市及廣大鄉村地區的控制。⁴

東北呈現出一幅特別火爆的場面。8月8日，馬林諾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總司令率領的蘇聯軍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入東北，兩天後又與從外蒙古前來增援的突擊部隊會師。蘇軍沒有追隨8月14日日本的投降而停止推進；也沒有在東北的地理界線上停頓下來。蘇軍深深滲入至熱河和察哈爾腹地，以便幫助中共部隊進軍東

³ 在東北蘇軍受命接受日本的投降。

⁴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51頁。毛澤東在1945年8月26日發佈的通知。

北。蘇聯人將相當數量投降日軍的武器交給了中共軍隊。⁵然而，蘇軍並沒有讓中國共產黨接管東北。

為設法解決這些棘手的難題並與中共達成和解，蔣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會談。儘管毛澤東很不情願前往和擔心國民黨的詭計，但在美國特使赫爾利赴延安擔保他的安全之後，最後還是決定前往。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赴重慶。充滿盼望和感到困倦的中國人民，全神貫注於這次歷史性的會談，期盼會談達成一個和解的結局，從而可以避免一場內戰。

毛澤東在重慶

毛澤東在離開延安前就精心部署了談判的策略。雖然國民政府在收復大城市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毛澤東堅信中共將最終控制長江下游和淮河以北的地區——山東、河北、山西和綏遠大部，熱河和察哈爾全部，以及遼東一部。但是，他預見到了在不遠的將來還存在許多困難；他決定在重慶採取一種靈活妥協的行動方針，但在一些根本利益的問題上則堅持立場。⁶因此，他在逗留國民政府戰時首都期間千方百計地表現出通情達理，願意作讓步——這種姿態旨在贏取公眾輿論和中間派的同情。他處處表現出是一個友善、熱情的人，而不是一個強硬暴躁的革命者。在外表上，賓主雙方都顯得友好客氣，這激發起了公眾對和解及和平的期望。

在正式的談判中，毛澤東樹立了通情達理和願意妥協的形象。他不再堅持聯合政府，但要求召開國是會議⁷來研究與建立聯合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相關的問題。

在國共兵力及改編雙方兵員為一支國家軍隊的問題上，毛澤東提

⁵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34頁；Tang Tsou, *American'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Chicago, 1963), 315–16。三十萬枝步槍、138,000挺機槍和2,700門火炮等等。

⁶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51–54頁。

⁷ 該會議後來叫做政治協商會議。

議只要國民政府同意將其部隊裁減到一百二十個師，共產黨將只保留二十到二十四個師的兵力。⁸

在解放區問題上，毛澤東基本上要求在華北、內蒙古和一些重要城市不受約束。當國民黨不同意這個想法時，他建議暫時保持解放區的現狀，以待憲法的通過，憲法將規定民眾選舉產生地方政府的事宜。顯然，毛澤東努力想保持對解放區地方事務的控制；但在這一點上，國民黨頑固地拒絕讓步。

至於接受日本投降問題，國民政府堅持有收繳敵方武器的壟斷權利，而共產黨則要求在本身已經有積極活動或包圍了敵軍的地區享有同樣的權利。在這一點上也沒有達成協定。

六個星期的談判無疑沒有取得甚麼進展。儘管毛澤東表面上持和解的姿態，但他並不想在那些涉及中共根本地位的基本點上讓步。另一方面，國民政府憑藉實力進行談判堅拒妥協，以免自己的特權地位受到損害。蔣的威信正處在頂點，因為他已領導國家頂住似乎難以克服的厄運而取得了抗戰勝利。此外，蔣除了擁有對其敵手的巨大軍事優勢⁹外，還得到了美國的援助和支持，並與史太林簽訂了一項友好同盟條約。蔣對毛澤東此刻願意達成的某種和平「臨時協定」毫無興趣。

蔣已承受住了八年退卻的艱難，現在他要求得到大部分的（即使不是全部的）勝利果實。他絕對不想與共產黨分享他的榮耀。如果赫爾利更加積極地勸說蔣接受一項符合毛澤東胃口的權宜妥協的話，也許共產黨將會被限制在華北地區。但赫爾利決定做一個消極的和平締造者，他一絲不苟地保持中立態度；他最想要做的是敦促雙方領導人首先在「基本原則」上努力達成協定，然後再釐定「細節」。但恰恰是在這些細節問題上兩黨無法靠攏。

由蔣和毛在10月10日發表的最後協定，強調他們同意召開一次政治協商會議，並共同認識到和平建國的重要性。他們之間分歧的程度沒有透露給公眾，但顯然談判未能產生具體的結果。在返回延安後，

⁸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55-64頁。

⁹ 據國民黨國防部長稱優勢的比例為11比1。

毛澤東號召黨人通過發動群眾、擴充人民軍隊去締造一個新中國來加強「和平」努力。他的這一膽大氣壯的態度，部分源於東北事態的新發展。

蘇聯在東北的行動

蘇聯在東北的活動，完全違背了史太林在雅爾達和中蘇條約談判中所作的將在佔領後三周內撤離、三個月內完成撤軍的承諾。他在1945年2月和7–8月間做出這樣的承諾時，似乎沒期望中國共產黨立即起而奪取政權。他好像並不在意美國在中國的調停，實際上他建議毛與蔣達成某種協定。毛表面上聽從史太林的告誡，但私下裏卻決定與國民政府展開軍事對抗。¹⁰ 史太林本人後來也承認自己錯誤地判斷了中國的形勢。¹¹

戰爭開始後不久，中共的魄力和智謀給史太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此時的態度明顯地發生了激烈的轉變。一當由雅爾達協定和中蘇條約確定的蘇聯在東北的特殊利益和特權，因蘇軍的實際佔領而確保之後，史太林便覺得無需遵守諾言了。蘇軍洗劫了東北的工業廠礦，將價值二十億美元的設備當作「戰利品」運往俄國。¹² 他們採用了各種各樣的藉口，以阻撓國民政府部隊進駐東北。

蔣決意收復東北，他稱此舉乃中國進行八年抗日戰爭的根本原因。魏德邁將軍懷疑國民黨是否有能力控制東北，他曾建議蔣首先鞏固長城以南和長江以北的地區，以及確保華北的交通線。蔣否決了這項建議，把最精銳的近五十萬部隊投入東北——他日後將為這個決定而後悔不已。¹³ 最後，蘇軍統帥允許（美國）空運國民政府部隊到東北

¹⁰ 林彪在1960年回憶說：「國內和國外〔指史太林〕的一些好心朋友……為我們擔心」，但毛主席正確地估計了形勢，並將一切反動派當作「紙老虎」。參見Tang Tsou, 326。

¹¹ 對鐵托的助手卡德爾 (Eduard Kardelj)。

¹² 此據「盟國間賠償委員會」美方委員波利 (Edwin Pauley) 所作的估計。

¹³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at Seventy* (New York, 1957), 232–33.

的大城市，於是政府軍在1946年1月5日進駐了長春，三星期後進駐了瀋陽。同一時間，中共軍隊幾乎已完全控制了這幾個據點以外的農村，以此來對抗處於困境的國民黨。蘇聯軍隊最後於1946年5月撤離了東北。

馬歇爾使華

到1945年11月，華盛頓已採取了一項新的政策，該政策繼續支持國民政府，條件是國民政府不可使用美國武器進行內戰，並且努力與中共達成協定。實際上，這一政策轉變代表著推翻了以前那種無條件支援國民政府的政策。幻想破滅的赫爾利在11月27日辭職以示抗議，指責國務院裏的那些職業官僚在他背後搞鬼及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邊。杜魯門總統於是任命二戰期間最傑出的美國軍人馬歇爾 (George C. Marshall) 將軍擔任總統駐華特使。¹⁴ 馬歇爾受命協助國民政府盡可能廣泛地重建其權威，包括在東北的權威，但不得使美國捲入任何直接的軍事干涉。他還應敦促蔣召開一次由各主要黨派參加的國民大會，仔細審議停止內戰和統一國家等事宜，其目的是期待一個「強大、統一和民主的中國」之出現。最後，他還要向蔣闡明，大規模的美國援助將依據達成一項停火和實現國家統一的情形而定。¹⁵

馬歇爾於1945年12月中旬抵達中國，他發現兩黨代表都接受調停及準備承認三項即時目標：(1) 內戰停火；(2) 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討論建立聯合政府；(3) 將國共兩黨軍隊編成一支國家軍隊。這兩個敵對政黨殷切的歡迎和守諾的支持是令人振奮的表示，但明擺著的是，它們除了這樣也別無他途。馬歇爾崇高的威信、顯露的真誠，幫助中國取得和平、統一和民主的公開目標，以及最關鍵的是美國之巨大權勢，足以促使國共兩黨表現出誠摯的舉止。然而，在這熱情和感謝的表象底下，兩黨的極端分子都認為這是美國干涉之典型例子，因而抱有反感的情緒。

¹⁴ 根據1945年11月27日內閣會議上農業部長安德森 (Clinton Anderson) 的建議。

¹⁵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133, 605-7.

國共兩黨互不信任的程度非常深，國民黨在1946年初擁有比共產黨多五倍的軍事優勢，自信有能力一舉摧毀敵方。另一方面，共產黨輕蔑地稱國民黨為「紙老虎」，並且肯定自己能在一場延長的鬥爭中，將這隻紙老虎撕個粉碎。雙方都堅持一套對方無法接受的合作條件。國府要求共產黨在建立立憲政府之前交出軍隊，¹⁶而共產黨則堅持這樣的合併應在立憲政府建立之後實施。國府鼓吹在聯合政府中實行總統制；中共則堅持要內閣制。由於國民黨最有可能控制中央政府，特別是其執行部門，所以共產黨堅決要求較程度的省級自治和強有力的立法機制來制衡行政機構。如果要控制住日益加強的好鬥情緒，就必須使這些關鍵的爭端得到雙方滿意的結果。

馬歇爾積極的調停產生了迅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結果。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同意召開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立即停火及恢復交通。此外，成立了一個三人軍調處執行部，由一個國民黨代表、一個共產黨代表和一個美國代表組成，以美方代表為主席；執行部的決定需全體一致同意。同樣，為監督停火事宜，也由三方代表組成的調查小組將派往戰場巡視。

政治協商會議在1月10日到31日停火期內召開，由三十八名成員組成：八名來自國民黨、七名來自共產黨、九名來自民主同盟、五名來自青年黨及九名來自無黨派人士。經過冗長的磋商達成了這樣的決議，即國家的最高機構為擁有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多黨參與之國府委員會。該委員會將由四十名委員組成，其中一半人將由國民黨提名，另一半由各黨派和無黨派提名。國府委員會的決議在涉及改變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時應得到三分之二多數票的同意；這樣，任何黨派或集團只要能湊集到三分之一票數——準確地說是十四票——就享有否決權。共產黨和他們的同路人，主要是民主同盟，自信能夠集合必需的票數來挫敗國民黨任何修改政協決定的企圖。

政治協商會議採納了內閣政府制，當中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這樣進一步確定了未來的憲法將承認各省為地方政府的最高機構，而且

¹⁶ 採取了「統一軍令」的委婉說法，即將中共武裝編入國民黨軍隊。

擁有民選產生的省長和自己的憲法，以確保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適當的權力分配。

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有利於共產黨而非國民政府，這反映了渴望和平和民主統治的普遍願望。馬歇爾雖然沒有參與政協的討論，但他贊同這次的成果是「一部自由和向前看的憲章」。自抗戰結束以來，第一次出現了一縷和平建國的希望之光。

馬歇爾取得的另一個重要的成就，是1946年2月25日達成的關於國共雙方相對兵力及其合併為一支國家軍隊的協定。該協定規定在一年之內國民黨軍隊裁減到九十個師，共產黨軍隊裁減到十八個師，在此後六個月內雙方繼續將軍隊分別裁減到五十個師和十個師。裁減後的軍隊分佈如下：東北：國民黨十四個師，共產黨一個師；華北：國民黨十一個師，共產黨七個師；華中：國民黨十個師，共產黨兩個師；華南（包括臺灣）和西北：國民黨分別為六個師和九個師，共產黨沒有任何部隊。¹⁷顯然，國民黨從這個軍事安排中獲利甚豐，因為共產黨在東北和華北的影響被大大地削減了。同樣，國民黨還得以接管共產黨在西北的根據地，從而阻隔了中共與蘇聯之間的直接接觸。

馬歇爾的迅速成功導致杜魯門總統在1946年2月25日宣佈，成立由魏德邁將軍率領一千名官兵組成的美國駐華軍事使團。根據馬歇爾早前的承諾，人們理解到，中共的部隊將包括在美國訓練計劃之內，而且將在編入國民政府軍隊之前獲得美國的裝備。1946年3月11日，心滿意足而一身輕鬆的馬歇爾返回美國，操辦一筆由進出口銀行提供的五億美元貸款。正是在他這段短暫離開中國期間，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誠意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相互不信任對方，因為各自是追求不同目的的革命政黨。除非是在暫時的或權宜的基礎上，否則兩黨的合作幾乎是不可能的。雖然馬歇爾初期的成功，主要是由於他積極的勸說和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但同樣真切的是，這兩個對立政黨都發現不討好他會

¹⁷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141。但是，蔣非常懷疑共產黨是否有將這個改編付諸實施的意願。他對馬歇爾稱國共軍隊的合併是一項「『與虎謀皮』式的艱難任務」。Chiang Kai-shek, 162.

是錯誤的策略。在私下裏，兩黨內的極端分子都覺得他阻礙了雙方各自獲勝的道路。被馬歇爾稱作「自私自利的不肯和解者」的國民黨CC系¹⁸強烈地感到與中共的這些協定，是馬歇爾強加給國民黨的，要是沒有他的干涉，國民黨可能早就取得對敵人的勝利了。在共產黨一方，只要協定基本上對他們有利或並非不能承受地有害，便盡可能長時間地敷衍馬歇爾；但他們決沒有減弱在私下裏擴充軍隊和地盤的活動。僅僅是馬歇爾的在場防止了兩黨撕破合作的臉面。但一當他離開，他們便藐視停火協定，尋求改善在戰場上的態勢，以便在最終協定無法實現時自己能處在更有利的位置上。開始時的地方性衝突很快在1946年4月升級為大規模的戰鬥。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仍然是一紙空文。

東北的戰事尤為激烈。中共軍隊對政府軍隊發起了毀滅性的打擊，並於1946年4月18日佔領了戰略重鎮長春。中共仰仗這個巨大的勝利，要求在東北與國民政府的駐軍比例從1：14個師提高到5：14。蔣惱怒地拒絕了這個要求，下令發起全線進攻，結果在5月份奪回了長春。要不是此刻返回了中國的馬歇爾之規勸，戰事可能就迅速地失控了。6月6日達成了一項為期15天的停火協定。兩黨都受到了戰爭狂熱的支配，那種覺得馬歇爾妨礙了他們最終勝利的情緒日益普遍。1946年7月初，蔣告訴馬歇爾說「首先必須強硬對待共產黨，然後，在兩、三個月後再採取一種寬大的態度。」他在另一個場合說：「如果馬歇爾將軍耐心的話，共產黨會呼籲一項協定，並會願意做出協定所需的讓步。」¹⁹ 共產黨方面同樣相信能最後取勝，所以譴責美國玩弄兩面派手法，一邊裝作是不偏不倚的調停者，一邊又援助國民政府。他們要求美國軍隊撤出中國。國共兩黨似乎都在1946年中期的某個時刻決定採取一種新的行動方針，置馬歇爾的調停於不顧。馬歇爾的影響跌落到了最低點。

國民政府乘勝追擊，於1946年7月4日單方面宣佈將在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公然藐視了政協會議關於不在建立聯合政府之前召開國

¹⁸ 因其首領陳立夫和陳果夫而得名。

¹⁹ Tang Tsou, 425.

民大會的決議。中共和民主同盟宣佈抵制這個「非法」大會；此外，毛澤東還號召展開一場自衛戰爭。原有的裂痕已擴大成了難以彌合的鴻溝。馬歇爾呼籲中國人民對國共兩黨施加壓力以促成和解，但他的呼籲猶如荒野中孤獨的哀鳴，雖然贏得了極大的同情，卻毫無結果。他警告蔣，經濟可能會出現崩潰而共產黨可能取勝，但這個警告也無所成效。蔣委員長依然相信，通貨膨脹雖然迅猛可怕，但並不會造成經濟災難，因為中國的農業經濟受著一些不同於西方工業國家之因素的支配。²⁰

從1946年的7月到9月，國民政府軍隊實際上打贏了每場戰役，這個事實似乎加強了那種認為馬歇爾推遲了國民政府勝利的觀念。暫時退下來的共產黨，公開指責美國在支援蔣打內戰的同時利用調停來施放煙幕。由於他的信譽受到了懷疑，馬歇爾於10月1日警告蔣，除非停止作戰，否則他將終止調停回國。繼續在戰場上獲勝的蔣拒絕停戰。隨後，他以一種寬宏大量的傲慢姿態在11月8日——國民大會召開前幾天——宣佈暫停進攻，以便讓共產黨和民主同盟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蔣深信自己的方針正確和獲勝的能力，以致他在1946年12月1日對馬歇爾說，敵軍將在八至十個月內被消滅。²¹

馬歇爾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已經可悲地失敗了。1947年1月6日，杜魯門總統宣佈將他召回。在對中國人民的告別辭中，極其失望的馬歇爾譴責國民黨內的「不妥協集團」「對中國實行封建統治」，缺乏履行政協決議的興趣；他也批評共產黨「不願意作公平的讓步」。他說，中國的希望依賴於自由主義分子，但他們缺乏行使「控制性的影響」力量。²² 和平統一的前景確實很黯淡，美國在中國調停之夢就結束了。

馬歇爾回國後出任國務卿，但在華的經歷令他怨恨自己無力制定一項積極的對華政策。²³ 他採取了一種「等著瞧」的態度，希望事情會

²⁰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212.

²¹ 同上註。

²² "Personal Statement by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esident (Marshall), Jan. 7, 1947," in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686–89.

²³ Tang Tsou, 445.

在中國自行了斷。唯一一個顯得有點積極的行動，是1947年7月在共和黨議員周以德 (Walter Judd) 的建議下，派遣了魏德邁去華執行一項調查使命。周以德從前是一名來華傳教士醫生，是蔣的堅定支持者。魏德邁在中國逗留了一個月，努力想說服蔣進行改革，但徒勞無功；他回國後遞交了一份報告，建議在一萬名美軍官兵的監督下，向國民政府提供「充足和迅捷的援助」。報告還進而籲請提供為期五年的經濟援助，將東北置於美國、蘇聯、法國、英國和中國的五國保護之下，如果這樣辦不成，便由聯合國來「託管」東北。馬歇爾彬彬有禮地收下了這份報告，然後將其束之高閣，他想不出有甚麼辦法美國能夠在迅速裁軍只剩下一又三分之一個師²⁴ 的兵力之時，抽調出一萬名部隊來華。顯然地，魏德邁的使命沒有對蔣和馬歇爾產生甚麼影響，確實令人沮喪。

內戰

1946年中期以後，蔣決定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共產黨問題，以便證明如果不是受美國調停的妨礙的話，他可輕而易舉地消滅敵人。勝利將證明他的判斷正確，並表明美國人要中國建立聯合政府的浪漫之夢不切實際。儘管美國一再警告不會支援他打內戰，蔣卻無法說服自己相信華盛頓會偏向共產黨而非他本人。國民黨內有一種普遍的感覺，認為美國不會無視中國落入共產黨之手；因此，美國的警告是不能當真的。如果局勢變得十分惡劣的話，美國人將別無選擇地前來援助國民黨。

在內戰初期，政府軍在各個戰場上取得了勝利。另一方面，共產黨預見到在取得最後勝利之前將要度過許多艱難歲月。毛澤東在1946年預言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打倒國民政府，中共準備好要進行一場長期艱苦的鬥爭。²⁵

從1946年7月到12月，國民政府從共產黨手裏奪取了165座城鎮和

²⁴ 1947年6月時，美軍的總兵力為925,163人。參見Tang Tsou, 459。

²⁵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64頁；Jerome Ch'en, *Mao*, 291–92。

174,000平方公里土地。1947年3月國民政府取得了最大的勝利，攻佔了共產黨的基地延安。蔣充滿信心地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 (Leighton Stuart)，敵人將在八、九月份被徹底打敗或被趕到偏僻腹地。確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機關被迫暫時退卻。他們於3月18日撤出了延安逃匿起來，背後有40萬國民政府大軍在拼命追趕。²⁶ 到1947年6月第一年内戰結束之時，共產黨的「解放區」減少了191,000平方公里面積和1,800萬人口。²⁷

受一連串軍事勝利的鼓舞，蔣非常自信地發起了政治攻勢。1946年11月15日，他不顧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的抗議，召開了國民大會。大會的1,744名代表在聖誕節通過了一項含十四章175條的新憲法。這份在1947年元旦頒佈的文件，重申三民主義為國家的基本宗旨，確立五院制政府，保障人民創議、複決、選舉和罷免的四大自由。民國總統將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六年。文件中還規定了行政首長經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院長，以及經行政院院長推薦，任命該院部長的權利。立法院委員按地域和職業基礎選舉產生，任期三年。司法院擁有解釋憲法的權利，從而在中國的法律制度中確立了司法審查的獨立性。從根本上來說，這套政府結構既非完全的總統制、也非完全的內閣制，而是兩者的混合。比如，行政院經民國總統同意，可以否決立法院的決議，但如果立法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駁回否決，則行政院必須接受該決議，否則便應辭職。至於地方政府，憲法中有公民選舉產生省長和縣長的條文。

不出所料，共產黨激烈地抨擊這部憲法是非法的。國民政府對這些指控泰然處之，他們在1947年11月著手選舉新一屆國民大會和立法院委員。大會在1948年3月29日召開，並於4月19日選舉蔣中正為民國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隨著這次選舉，長達二十年的國民黨訓政期——最初設定只延續六年——正式告終了。但正是在蔣中正接任總統職位之時，內戰進入了一個對國民政府來說十分關鍵的階段。

1947年年中似乎標誌著戰爭形勢的一個轉捩點。取得了充分勝利

²⁶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238; Jerome Ch'en, *Mao*, 283-84.

²⁷ Jerome Ch'en, *Mao*, 299-300.

的政府軍隊出現了問題，部分原因是由於越來越多的部隊擔任起守戍克復地區的職責，實際作戰部隊便相應地減少了。相反，共產黨軍隊的規模已穩步地擴大，1947年6月達到了195萬，而政府軍隊則為373萬。²⁸ 共產黨在1947年下半年發起了全面進攻，在河南和河北取得了一些勝利。

對國民政府最嚴重的打擊發生在東北。在1947年聖誕節以後的三個月內，林彪的部隊使國府的精銳部隊遭受了十五萬人的損失。餘下的部隊被壓迫到瀋陽、長春和錦州一線的一小塊三角地帶，只佔東北總面積的不到1%。要守住這樣一塊無法堅守的陣地是毫無希望的，但蔣決定血戰到底。到1948年年中，林彪將敵軍圍困得密不透風，足以令敵方窒息。在消滅了十萬名政府軍後，林彪於10月14日佔領了錦州，10月18日攻取了長春，11月2日攻克了瀋陽。東北的戰役令蔣損失了四十七萬最精銳的部隊，²⁹ 並對整個政府軍的士氣給予了致命的打擊。用巴爾 (David Barr) 將軍的話來說，它「揭開了國民政府崩潰的開端」。³⁰

在東北戰役進行的同時，由陳毅率領的另一支中共野戰軍發動攻勢，在1948年9月26日的濟南大戰之後佔領了山東。一當取得了這樣的戰果，中共五十五萬的大軍便進取位於津浦線和隴海線交匯處的古戰場徐州。蔣部署了四十萬配備有坦克、重炮和裝甲車的機械化部隊，來保衛這個通向南京的門戶。但在敵軍不懈的猛攻之下，蔣手下的許多軍官鬥志全失；再加上暴雨和風雪，令機械無法操作。1948年10月淮海戰役³¹ 剛一打響，國府兩整個師便叛變了。從11月11日到22日，十萬名政府軍被殲滅了。徐州於12月15日丟失。到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時，國民政府已損失了不下二十萬部隊，而兩位著名的將

²⁸ 到1948年6月，中共部隊達到了280萬，而國民黨則為362萬。是年11月，中共軍隊實際上超過了國民黨軍：300萬對290萬。1949年6月，中共已取得了對國民黨的絕對優勢：400萬對150萬。參見Jerome Ch'en, *Mao*, 374.

²⁹ 國民黨承認損失了30萬人。

³⁰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335. 巴爾將軍是美軍駐華顧問團的首領。

³¹ 「淮海」是由淮河和隴海鐵路合在一起而得名。

領³²更被敵方俘虜了。洋溢著成功激情的毛澤東信心十足地預言一年內取得勝利。³³他的軍隊現在向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進逼。

與此同時，林彪的八十萬大軍從東北的戰事中騰出手來，與中華北軍團³⁴一起，在1948年12月形成了鉗形合擊態勢對付平津。國民政府的平津守衛者、曾在綏遠擊敗過共軍的傅作義將軍手頭有五十萬人。但當他的防禦計劃被司令部裏的一名共產黨間諜³⁵偷走時，所有的抵抗希望全泡湯了。政府軍隊在戰略上處於劣勢，在數量上也毫無希望地遠遠少於對手，於是，駐天津和北平的守軍分別在1949年1月15日和23日投降了。傅作義將軍自己率二十萬軍隊投誠。從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政府損失了一百五十萬人。³⁶在如此驚人的損失面前，國府兵敗如山倒。

政府的前途如何？蔣中正在黨內主和派的壓迫下於1949年1月21日辭職，副總統李宗仁以代總統身分接管了政府。仍指望保住長江以南半壁河山的李宗仁試圖與共產黨開始談判，但無法實現。勝利在握的毛澤東覺得沒有理由作出妥協。4月21日，他的部隊渡過長江，三天後佔領了南京，迫使國民政府逃往廣州避難。現在中共軍隊向各個方向迅猛推進，根本無法抵擋。在整個中國尚未征服之前，毛澤東就於1949年10月1日宣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民政府於10月13日從廣州逃往重慶、又於12月8日逃往臺灣之時，共產黨完成了對中國大陸的征服。經過二十八年(1921-1949年)的奮鬥，毛澤東登上了權力頂峰。

美國的作用

美國在中國內戰期間做了些甚麼？它因所做事情而犯的「罪責」或

³² 杜聿明將軍和黃維將軍。

³³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64頁。

³⁴ 由聶榮臻將軍統帥。

³⁵ 鄧寶珊。

³⁶ Jerome Ch'en, *Mao*, 307.

它因袖手旁觀而犯的「罪責」又到底是甚麼？首先必須聲明，當杜魯門總統於1945年12月派馬歇爾來華時，他非常明確地表明，大規模的對華援助將以國家統一的實現為條件。馬歇爾自己也在1946年年中一再警告蔣中正，美國不準備支援一場中國的內戰，而急劇上升的通貨膨脹將導致經濟崩潰。當蔣不聽這些警告一意孤行地開戰之時，木已成舟矣。

華府的主要錯誤，是未能制定一項積極的對華政策。它既沒有聲明脫離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也沒有使自己從中國完全解脫出來，而是執行一種部分撤離和有限援助國民政府的方針——諸如在1947年10月提供2,770萬美元經濟援助和成立一個為國民政府提供諮詢的小型軍事顧問團等。這種聽天由命的政策，促使蔣在華府的朋友及「中國遊說團」的活動，阻撓歐洲復興計劃，以便倡議一項富有意義的援華方案。麥克阿瑟將軍強烈要求向中國提供更大援助，並嘲笑美國要求國民政府在打一場內戰的同時實行改革的壓力：「這兩件事是不可能同步進行的，就如同在一所房子被火焰吞沒時，要求改變這所房子的結構式樣一樣。」³⁷

1947年年底，國民政府請求美國提供一筆15億美元的四年援助計劃——其中第一年將撥出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1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為回應這個請求，杜魯門在1948年2月18日建議在十五個月內撥款5.7億美元，用以制止中國的經濟崩潰。援華議案在國會通過時削減了13%，援助總額減少到4億美元，但這項撥款一直到1948年下半年國民政府幾乎垮臺時還未兌現。這筆援助既是太少也來得太晚。1948年7月30日，毛澤東宣佈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已「不太遙遠了」。據報道，馬歇爾在8月13日曾說：「我從這個問題上抽身，這個問題已經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和做出判斷的能力。」³⁸

國民黨的厄運還因為與正在選舉之年的美國政治糾纏在一起而變得更加複雜。國民政府的外交官對民主黨政府感到失望，並預測1948

³⁷ Tang Tsou, 466, 468.

³⁸ Tang Tsou, 446, 473, 478.

年的大選將導致政府的更替，而竭力結交共和黨人。紐約州州長、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 (Thomas Dewey) 在1948年6月25日宣佈如果他當選，他將對中國提供大規模的財政和軍事援助。但杜魯門卻在選舉中大獲全勝，令全世界——以及蔣——不知所措。杜魯門就任總統，在1948年11月和12月兩度拒絕了國民政府的援助請求。³⁹ 在1949年1月蔣辭職以後，華府存在一種強烈的感覺，覺得美國應盡快地從中國脫身。

回顧歷史，美國雖然因許多失職行動和錯誤舉措而「有罪」，但卻不能要它對「丟失」從未「擁有過」的中國負責。中國共產主義是一場經歷了三十年之久、有著巨大生命力的內部力量，外國的干涉不太可能改變它的方向。在1948年春季以前，美國積極的武裝干涉可能會暫時延緩共產黨的勝利，但絕對不能永遠地制止它。按一位中國問題專家⁴⁰ 的觀點，這樣一種干涉將需要投入十五萬美國軍隊，當然根據日後韓戰和越戰的經驗，一百萬或兩百萬似乎更實際。接著就有另外一個問題：當美國國內已確定了部隊復員和回復正常生活秩序之時，美國軍人能在中國駐守多久？

就事實而論，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想捲入中國的內戰。華府明確地聲明，大規模的干涉「既不可行也不可望」，因為它將「要求我們(美國)參加這場內戰，並擔負起指導軍事行動和行政管理的責任。」⁴¹ 中國的戰略價值未能支持美國發動大規模的介入決定，即使俄國有可能控制中國，也不能改變華府的立場。⁴² 華府覺得共產主義中國的興起雖然不合意但還能容忍，因為中國人不會對美國的安全在幾年或甚至幾十年內構成威脅。調停的失敗使美國人別無選擇，只得接受中國局勢的現實。

³⁹ 第一次是要求派遣一個美國顧問團；第二次是請求一項為期三年的三十億美元援助計劃，由蔣夫人親自提出。

⁴⁰ 哥倫比亞大學的佩弗 (Nathaniel Peffer) 教授。

⁴¹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VII, The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1972), 855.

⁴² 同上註，854。

對美國政策的重新評價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美國對華政策，必須放在美國全球戰略的更大背景中、特別應根據美國對待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態度來進行考查。儘管在公開場合大講中國的友誼，但美國政策的長期目標，肯定不是建立在利他主義或依戀中國文化或中國人民的感情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美國對戰後東亞戰略和經濟利益的實際考慮之上。⁴³

華府想要在太平洋和東亞地區建立一種新的均勢，而美國在其中將佔據支配性的地位。然而，由於歐洲是戰後全球關注的核心，美國人便想到用最低限度的資源投入來達到他們在東亞的目標。這樣一種政策要求與該地區的一個大國結成堅強的同盟。1944年，國務卿赫爾推想中國將佔「任何安排中的中心地位」，但他也認為中國只有一半的機會成為一個大國。⁴⁴ 隨著赫爾從國務院退休下來，以前擔任過美國駐東京大使、懷有公開的親日情緒的格魯 (Joseph Grew) 出任代理國務卿，他傾向於將復興的日本看作是美國中意的選擇對象——如果證明中國不能充任它在美國戰略中指定的角色的話。⁴⁵ 1945年春，海軍部長福雷斯特爾 (James Forrestal) 直截了當地詢問國防部長史汀生：「我們對俄國影響遠東的政策是甚麼？我們是不是希望有一個對抗這種影響的抗衡者？這個抗衡者是中國還是日本？」⁴⁶ 當時沒有作出任何決定，但根本的問題仍然擺在美國的東亞政策訂定人面前：如果中國能夠符合他們的設想，就值得美國予以支援；如果不符合，一個復興的日本也可以充當美國在東亞利益的支撐者。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杜魯門總統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會議上，堅持佔領日本應完全由美國來操辦，而不應與蘇聯或其他大國搞甚麼分區佔領。⁴⁷

⁴³ 同上註，790。

⁴⁴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1948), 1,586–87.

⁴⁵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Hearings, *Morgenthau Diary* (China), 89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Washington, D.C., 1965), 1,394.

⁴⁶ 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New York, 1951), 52.

⁴⁷ Harry Truman, *Memoirs*, Vol. I, *Year of Decisions* (Garden City, 1955), 551–52.

美國的長期目標，是鼓勵發展一個有能力抗衡蘇聯，並對美國資本滲透開放的相對強大而友好的中國。⁴⁸ 華府認識到，無論是一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還是一個將招致俄國滲透的虛弱的中國，都不能完成這些目標。因此，羅斯福總統推動讓中國成為大國之一的構想，而國務院也鼓吹幫助造就「一個統一的、民主進步的和合作的中國」之政策。⁴⁹ 正如國務院在1945年指出的那樣，這個目標部分基於這樣的認識，即中國將「為美國的商品和資本提供一個龐大的市場。」⁵⁰ 事實上，早在1939年，財政部官員便恬不知恥地聲稱，中日戰爭為美國人提供了一個「在未來中國貿易中站穩腳跟的大好機會，我們將獲取中國戰後重建工程的大頭……處在和平狀態下，並由一個復興的中央政府統治的中國，將成為未來美國商品和企業的大好市場。」⁵¹

正是出於這些理由，美國向國民政府提供了租借物資、「貨幣穩定」貸款和一些其他形式的軍事和經濟貸款。華府把這些貸款當作是阻止中國的「失敗主義者」叛變投日，並鼓勵中國努力作戰的一種手段，這樣就能把相當數量的日本軍隊釘死在大陸，以免他們調往其他地方與美國人作戰。

華府對中國的軍事能力向來評價不高，只有戰爭初期例外，其時中國獨自抗擊日本的進攻，而同盟國卻在日本皇軍面前接連打了敗仗。1943年年底，參謀長聯席會議在評估中國的能力時總結說：「我們感到，目前最多只有不超過五分之一的中國軍隊有能力進行防禦性作戰，且只有在（美國的）空中支援下才能作戰。」⁵² 此外，財政部長摩根

⁴⁸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Washington, D.C., 1955), 353.

⁴⁹ 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s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C., 1959), 337.

⁵⁰ John W. Dower: "Occupied Japan and the American Lake," in Edward Freeman and Mark Seldon (eds.), *America's Asia* (New York, 1969), 167.

⁵¹ *Morgenthau Diary*, 7.

⁵²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eran, 1943* (Washington, D.C., 1961), 242.

索 (Henry Morgenthau) 評價中國負責金融的官員「全是一幫竊賊」，杜魯門後來也把國民政府領導人說成是「貪污盜竊分子」。⁵³

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五角大樓認真地考慮把中國當作一個美軍向日本本島發起進攻的部隊集結地區。但是，這個戰略隨後受到了質疑，並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被否決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在1944年明確指示史迪威，中緬印戰區的作用是將日本軍隊從美軍的中南太平洋戰場分散和撤走：「雖然通過在亞洲大陸與日本決戰，可以完成擊敗日本的目標，但我們並不打算這樣去打敗日本。」⁵⁴顯然，美國想要避免在中國與日軍展開陸戰，那樣做勝利的代價將是以人力而非物力來衡量。正是這種意願構成了戰爭期間美國在東亞政治和軍事戰略的關鍵性制約因素；它也是美國努力發展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繫，並力邀俄國參加對日戰爭的原因。此外，美國人也意識到，蔣正試圖將美國軍隊拖入他與共產黨的內戰。史汀生宣稱正是「這件事情，我下定決心，打死我也堅決不幹」。⁵⁵

恐懼捲入中國的糾葛，促使美國在國共爭端中採取調停的策略，以平息政治上的紛爭。與此同時，華府強烈地敦促蔣革新他的政府，以求通過改革來挫敗共產黨。但是，蔣不僅拒絕聽取建議，而且還拒絕接受共產黨提出的條件，解決政治上的紛爭。美國在華觀察員非常現實地警告華府，以軍事手段來解決中國內部深刻的問題，將產生巨大的衝力，國民政府無法承受這股衝力；國務院外交官戴維斯和謝偉思大膽宣稱，他們相信中國的命運不是由蔣而是由共產黨掌握著。1945年4月，國務院向杜魯門建議，美國應繼續支援蔣，因為他仍然「代表著統一中國及使中國免除戰亂的最佳希望」，但如果「現政府之權威發生可能的崩潰」，美國在中國的長期利益便要求「保持與其他任

⁵³ *Morgenthau Diary*, 133; Joyce Kolko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1972), 554–55.

⁵⁴ 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1956), 363–64.

⁵⁵ 轉引自 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3–1945* (New York, 1968), 535.

何更有前途的領導集團進行合作的靈活性」。⁵⁶ 6月，國務院在一份政策報告中建議保證中國統一時，絲毫沒有提及國民黨或蔣；只是希望有「一個有力和穩定的政府」——一個將「保護各國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原則的政府」。⁵⁷ 在1947年初召回馬歇爾後，華府全然放棄了對蔣和國民黨的指望。由於歐洲是美國的首要考慮，* 也是美國將投入其主要人力和財力的地區，中國在美國的全球援助次序表上充其量只佔據一個第三的位置；事實上，到1947年5月，參謀長聯席會議已經「把中國放在了應給予援助之國家的順序表中相當低的地位」。⁵⁸ 到1947年下半年，美國已決定將日本重建為美國在東亞勢力的重要基地。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重建日本比起在中國實施干預，所需投入的資源將少得多，且顯得有更多的成功把握。這樣，日本便取代了中國成為美國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之利益的柱石。

美國在中國的調解沒有贏得國共兩黨任何一方的好感。國民黨指責華府毀壞了他們摧毀對手的最佳時機，而共產黨則抨擊美國表面上裝作是中立的調停者，實際上卻支援國民黨。由於蔣追求以軍事手段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因此喪失充當美國在東亞利益之支撐點的機會。他沒有像美國人向他建議的那樣，通過改革來鞏固現有的地位及打擊共產黨；相反，他採取了一項使戰後中國脆弱的社會結構崩離析的策略，並為共產黨奪取勝利打開了大門。蔣設想美國人將不會容忍共產黨做他的繼承者，但美國政策中並沒有任何指示可真切地促使他相信：美國不會拋棄他的政權，即使代價大得難以承受。

美國在中國的冒險事業，不僅未能達到利用國民政府來維護美國在東亞利益的目標，而且還疏遠了共產黨。美國沒有能力正確地評估中共在戰後世界的力量，也沒能與他們建立緩和關係，削弱他們對蘇

* 太平洋第二重要。

⁵⁶ Harry S. Truman, *Memoirs*, Vol. I, 102-3.

⁵⁷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Washington, D.C., 1960), I, 858.

⁵⁸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op. cit.* Vol. VII, 853-54.

聯的依賴。這反映了一種判斷失誤和「在中國喪失了機會」。⁵⁹從根本上來分析，美國的失敗源於它沒有能力跨越其目標與中國現狀之間的差距。

國民政府失敗的原因

評估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垮臺這個重要事件的原因，歷史學家責無旁貸。蓋棺定論或許為時過早，還有待於更徹底地開放檔案資料，但我們也許可以冒著過於簡單化的風險來作一些嘗試性的解釋。國民政府倒臺的最重要的近因是八年抗戰，這場戰爭在軍事上、財政上和精神上徹底消耗了國民政府的元氣。如果沒有抗日戰爭的話，中國的局勢也許就完全不同了。因此，上一章中已討論過的許多抗戰之災難性影響，將繼續在國共鬥爭中折磨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贏取抗戰勝利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導致最終垮臺的首個原因。

虛有其表的軍事力量 雖然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國民政府軍隊在裝備和訓練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精良，但卻是一支疲憊不堪的隊伍。這支軍隊在抗戰最後階段已經顯示出了疲倦的跡象，只是靠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對盟軍即將勝利的憧憬勉力支撐著。日本的投降給了這些部隊一種解脫感和一種完成使命的情緒，他們期盼著放馬南山。對他們來說，再打一場內戰的想法簡直是討厭至極。他們雖然奉命作戰，但士氣卻很低落，體力也很虛弱。他們在1947年年中以前的可靠表現，只是代表著最終崩潰前的最後拼搏而已。

相反，共產黨卻在抗戰期間大大擴充了軍事力量。抗戰的結束也正是他們得到承認的時刻，他們現在生氣勃勃、鬥志昂揚，對前途充滿信心。撇開意識形態不談，國共兩軍鬥志上的差距也影響了國共較量的結果。

除了厭戰問題之外，政府軍隊的戰略也大有需要改進之處。蔣本

⁵⁹ Joseph W. Esherick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1974).

可以集中兵力守衛長城以南的地區，但他卻不聽美國的建議，將大批部隊派往東北，結果只是讓其中的四十七萬人慘遭屠殺或被俘。攻佔延安並將逃亡的中共領導人追剿至戰略意義並不重要的西北山區，是一項注定要失敗的決策，為此又消耗了四十萬軍隊。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指揮不當，再一次導致了無可挽回的兵員損失。從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間的短時期內，國民政府損失了一百多萬部隊；政府軍隊的銳氣燒毀殆盡，餘下的部隊再也無力作戰了。

通貨膨脹和經濟崩潰 急升的通貨膨脹比厭戰情緒和戰略失誤更具災難性，這在抗戰時期就已很猛烈，而到了戰後則完全失控了。這種通貨膨脹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濫發紙幣，流通紙幣從1937年1月的13億元狂升到1948年年底時的245,589,990億元，結果是在1945-1948年間，物價以每月30%的幅度遞增。僅在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之間，紙幣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價指數則上揚了天文數字般的135,742倍。通貨膨脹和財政失措毀壞了千百萬中國人的生計，並徹底破壞了政府的信譽。人民大眾不僅反對國民政府統治，甚至還期盼改朝換代，這是不足為怪的。

失卻民心和政府威信 除了導致急劇通貨膨脹的財政失職外，那些在戰後返回日佔區的國府官員的討厭行為，也對國民政府的威信造成了永久性的損害。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回來，輕蔑地對待淪陷區的民眾，好像民眾都曾是漢奸和叛徒似的。這些官員只是關心私利而接收敵產，卻不理會在日佔時期經受了那麼多苦難的民眾之疾苦。他們堂而皇之地與人民爭利，壟斷有利可圖的商品和財產，公然拍賣救濟物品以中飽私囊。最糟糕的是，他們強行以200：1的比率將華南和華中地區的日偽貨幣兌換成法幣，而比較適當的兌換率應該是此比率的一半。⁶⁰ 民眾的存款和現金積蓄就這樣突然驟減了，他們的直接反應是怨恨不已，尤其是因為幾年前偽政權曾以2：1的比率強迫他們將手頭的法幣兌換成了偽幣。這兩次兌換竟以四百倍的比率將人

⁶⁰ Shun-hsin Chou, 24.

民的現金積蓄淪為廢紙一般！淪陷區的人民等待了八年，盼望國民政府統治的重返，但卻遭遇了這樣殘酷的壓榨和輕蔑的對待，以至於他們困惑地想像，在日本人統治之下生活，是不是還要更好一些。國府官員的不當行為造成的最終結果，是疏遠了千百萬受苦受難的人民。

美國調停和援助的失敗 如果美國在抗戰時期遵循另外一種方針的話，戰後中國的事態發展可能就不一樣了。首先，如果在戰爭頭四年即1937-1941年間美國對華援助的力度更大一些的話，或可使國民政府的財政加強到在較早時期就遏制住通貨膨脹的地步。如果能防患於未然，那後來的失控狀態也許壓根兒就不會發生，這樣就能避免最後的經濟崩潰。其次，如果美國堅持那項通過中國大陸打擊日本的初始戰略，美國士兵將在中國的沿海省份登陸，從日軍那裏搶奪領土，再將收復的領土交給國民政府。但是，這項計劃被拋棄了，原因是1943-1944年間盟軍的戰略發生了變化，提出要完全繞開了中國，從太平洋進攻日本。這項決策將國民黨中國置於一種戰略上無足輕重的地位，而當戰爭突然結束之時，國民政府對不期而來的和平之後果顯得措手不及。

除了這些可能發生的經濟和軍事考慮外，美國至少喪失了三次通過外交對中國發揮決定性影響的機會。第一，如果赫爾利在1945年8-10月毛澤東訪問重慶期間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他或許就能說服蔣接受毛澤東提出的「臨時協定」，從而避免內戰的直接爆發。這個大好機會卻被毫不經意地放棄了。第二，馬歇爾更強硬地「壓迫」國府和蔣遵守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戰事也可能被制止。第三，當1948年春國民政府處於大潰敗之際，美國還有最後一次實施軍事干預的機會，但它卻沒有選擇這樣做。回頭看來，美國似乎由於失誤而喪失了所有這些機會。

社會和經濟改革的遲滯 除了上述這些直接原因造成國民黨的垮臺外，一個更加基本的原因，是當時極其需要的社會和經濟改革之持續遲滯。對改革的忽視或許部分是由國民政府無法控制的總體環境所致。國民政府從一開始就受到「新軍閥」和派系政客的挑戰，當日

本侵略和共產黨起義的威脅日益加劇而令國民政府焦頭爛額之時，它還未解決好新軍閥和派系問題。國民政府動員了它所能動員的全部能量、資源和技巧來規避一場與日本的戰爭，並對共產黨發動了五次圍剿。國府沒有多少時間或意向來應付經濟公平和社會改革等問題。這些問題雖然非常根本，卻似乎並不太緊迫。不僅是民生主義原則——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從未得到實現，就連較為溫和的將地租減至年產量37.5%的規定也從未兌現。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始終只是鏡花水月而已。一當抗日戰爭爆發，軍事就佔據了最優先的位置，進一步把長期耽誤了的社會改革降低到附屬的地位。

儘管有這些難以扭轉的環境，但也可以確切地說，國民政府本身就缺乏發起社會和經濟改革的必要動機。南京政府以遠離內地的沿海地區為根本，依靠海關關稅和城市商業稅來維持生計，因此對農村問題甚少關注。國民政府不理解農民，看不到解決農民困苦的緊迫性，對農民的疾苦也就漠不關心。諷刺的是，國民政府官員繼續生活在儒家關於勞心者與勞力者之區別學說的陰影下，將農民鄙視為毫無生氣、無足輕重的人，所以看不到農民大眾的革命能力，因而也從未嘗試去組織他們。恰恰就在這個被忽視的區域，毛澤東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發揮。一塊造屋者拋棄的石頭變成了另一個人的房屋之柱石。

參考書目

- Beal, John R., *Marshall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1970).
- Beloff, Max,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London, 1953).
- Bland, Larry I. (ed.), *George C. 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Lexington, Va., 1998).
- Borg, Dorothy, and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1980).
- Chan, Lau Kit-ching,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1923–1945* (Hong Kong, 1972).
- Chang, Carsun,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1952).
- 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New York, 1958).

- Chassin, Lionel M.,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1945–1949* (Cambridge, Mass., 1965).
- Ch'en, Jerome,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65).
-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New York, 1957).
- Chou, Shun-hsin,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7–1949* (New York, 1963).
- Fairbank, John K., *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1982).
- Fairbank, Wilma,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 (Washington, D.C., 1976).
- Grasso, June M., *Truman's Two China Policy* (Armonk, N.Y., 1987).
- Griffith, Samuel B., II,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ew York, 1967).
- Harding, Harry,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l., 1989).
- 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北京，1959年)。
-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北京，1951年)。
- Johnson, Chalmer A.,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1962).
- Koen, Ross Y., *The China Lobby* (New York, 1960).
- Kwei, Chung-gi,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 1922–1949* (The Hague, 1971).
- Lee, Chong-sik,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5–1945* (Berkeley, 1983).
- Levine, Steven I.,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Victory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1987).
- Liao, Kai-lung, *From Yen-an to Peking* (Peking, 1954).
- Lippit, Victor 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rmonk, N.Y., 1987).
- Liu, F. 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1956).
- Loh, Pichon P. Y., *The Kuomintang Debacle of 1949: Conquest or Collapse?* (Boston, 1965).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1963年)，第3及第4卷。
- May, Ernest R.,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 (Philadelphia, 1975).

- Melby, John F., *The Mandate of Heaven: Record of a Civil War, China 1945–49* (Garden City, N.Y., 1971).
- Pepper, Suzanne,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1978).
- Porter, Brian E.,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 A Study of British Attitudes, 1945–1954* (London, 1967).
- Purifoy, Lewis McCarroll, *Harry Truman's China Policy: McCarthyism and the Diplomacy of Hysteria, 1947–1951* (New York, 1976).
- Rea, Kenneth W.,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Boulder, 1981).
- Schaller, 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New York, 1979).
- Shaw, Yu-ming,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1992).
- Sheridan, James E.,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 1975).
- 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Chicago, 1963).
- United State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1949).
- Van Slyke, Lyman P.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1968).
- : (intro.),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Arlington, Va., 1976).
- Wedemeyer, Albert (General),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1959).
- Xiang, Lanxin, *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Britain and America in China, 1945–1950* (Armonk, N.Y., 1995).
- Yick, Joseph K. S., *Making Urban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CP-GMD Struggle for Beijing-Tianjin, 1945–1949* (New York, 1995).
- Young, Arthur 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Mass., 1963).
- ,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Mass., 1965).

第二十六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十年

隨著將近完全征服整個國家，毛澤東於1949年9月12日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建立新的政府。政協會議舉行了十二天，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和《共同綱領》。《共同綱領》基本上是一項關於國家目標的宣言。會議還確定了國旗，圖案以紅色為底色，左上角鑲有一顆黃色大五角星，周圍鑲四顆小星。大星象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四顆小星則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聯盟。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以更為北京的北平為首都，一天後得到了蘇聯的承認，其他一些共產主義國家也很快地相繼表示承認。¹ 承認新中國的非共產國家有印度、緬甸、巴基斯坦、錫蘭、英國和法國。² 但是，美國在1979年1月1日之前一直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新中國政府的理論和實踐，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延安整風運動中所表達的理念。《新民主主義論》寫於1940年，是一部重要的理論著作，不單止創造性地使馬克思列寧主義適用於中國的實際形勢，指導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會主義轉變，而且提出了經濟結構將由三個部分組成：國營經濟，政府控制大工業、

¹ 1949年10月3日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10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10月27日東德；11月23日阿爾巴尼亞。

² 在1968年，有51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承認國民政府的中國的國家有65個。但是，到1974年10月，80多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之下只有32個國家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保持著外交關係。1988年，150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約有23個國家承認在臺灣的國民政府。

大礦產、大商業和公共設施；農業經濟，個體農民發展成集體農場；私營經濟，中小資本家獲准經營。在這三者中，國營部門擔負起領導的位置，努力爭取比私營部門更快地發展生產，以消除可能的競爭；此外，負責指導其他部門走向社會主義。政治結構方面，這部著作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四個階級之共存。選擇性地採納外國文化之有用因素是可以的，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應該是民族的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能夠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這個民族的特性」。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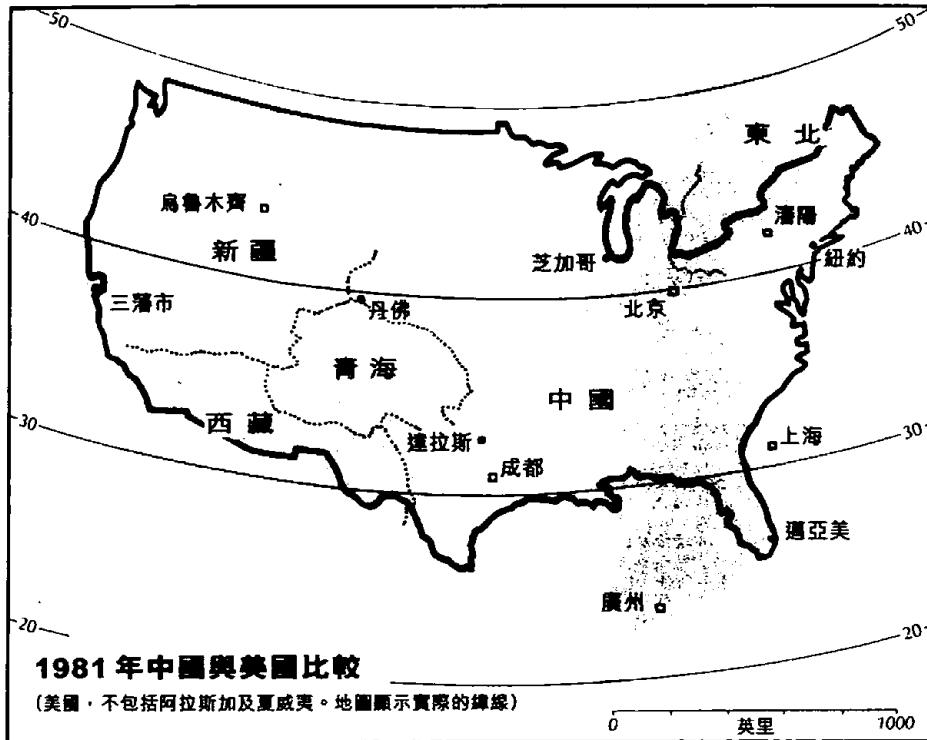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第二個理論貢獻，是1942年的整風運動，用以反對：(1) 主觀主義和不正派學風；(2) 黨內的宗派主義；(3) 黨八股。這場運動旨在向黨員灌輸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總路線的正確理解，避免他們犯上「右傾」和「左傾」的錯誤。這場鬥爭是原則的鬥爭，而非人員的鬥爭，目的是通過教育、思想改造和認識錯誤，將犯錯誤的同志帶回到正確的軌道上。⁴ 中國共產黨希望通過這樣一種糾正思想的運動，來避免重犯蘇聯所特有的不斷清黨的錯誤。

政治組織

1949年的《組織法草案》，非常明確地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像蘇聯那樣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種由中共領導的、以四個階級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四個階級的共存賦予了中共政權「民主」的特性，而對反革命分子堅定不移的態度，則顯出了「專政」的特徵。新政府遵循的一項主要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個制度規定了各級政府擁有普選的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將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官員，呈報上級機關批准。這個過程中的「選舉」部分是「民主的」，而對上級機關的服從則表明了「集中制」。這個詞語也可引申為表示在決策

³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5-704頁。

⁴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3-830頁。



討論中暢所欲言，而一當作出了決定則要不折不扣地堅決服從，無論個人原來的立場如何。

新民主主義時期一直延續到1953年，這一年開展了一項社會主義改造計劃。到1956年，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也就開始了。在某種程度上，這三個階段展示了中國共產主義的進程。⁵

政府結構 根據《組織法草案》，新中國的最高機構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執行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職務。每月舉行兩次會議，審議國家的重大政策。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毛澤東)、六名副主席和另外五十六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產生的委員。在委員會閉會期間，權力委給國家政務院，政務院的二十來個委員組成了類似內閣的班子，對中央政府委員會負責，而在委員會閉會期間則對國家主席

⁵ Charlmers Johnson, "The Two Chinese Revolu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July-Sept. 1969), 39:17.

毛澤東負責。國家政務院以總理周恩來和幾個副總理為首；下屬四個委員會：政法、財經、文教和人民監察。每個委員會領導一定數目的部、委、局，共計有三十個。與政務院並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總檢察署。

處在中央政府之下、但高於省級機關的是六個頗為獨特的大行政區，⁶ 每個區各管轄幾個省。設置這些中介性的機構的目的，大概是為了幫助中央政府鞏固對各省的控制，但正如後來表明的那樣，這些機構逐漸呈現出損害中央權力的離心傾向。於是，這些機構在1953年被取消了，政治結構回復到了傳統的中央、省和縣三級行政體系。

《組織法草案》實行了五年，其間採取了起草憲法的措施。1953年進行了人口普查，頒佈了選舉法，授予除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以外所有年滿18歲的公民以投票權。1954年初舉行了選舉，村和鄉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縣人民代表大會，隨後縣人大選出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再選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9月15日到28日舉行，通過了一部含四章106條的新憲法。第一章重申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四個階級的聯盟，確認了國營、聯營、個體和資本家四種所有制。第二章規定了政府機構，特意取消了大行政區設制。第三章規定了通常的公民權利，但特別的是規定政府有權「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這樣就剝奪了那些不幸而與政府唱反調之人的法律保護。第四章確定北京為首都，並規定了國旗(如前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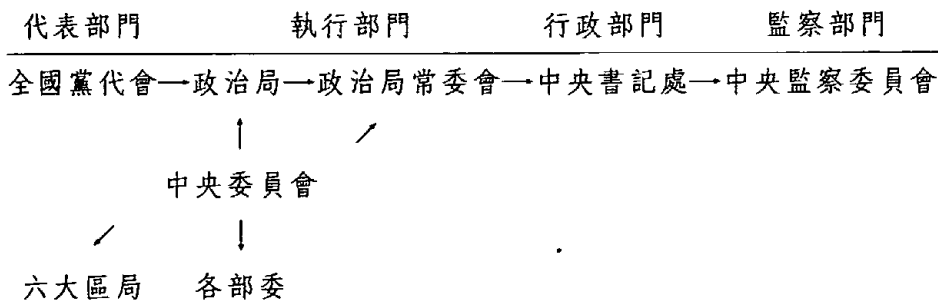
根據這部憲法，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大會應該每年召開，審議重大政策決定及選舉政府最高官員。國家主席(毛澤東)的權力比以前更大了，因為原有的六名副主席減到了一名(朱德)。其他重要的中央機關包括國務院、國防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央政府之下設省、縣行政機構。

政黨 最主要的政黨自然是中國共產黨，該黨在1949年擁有450萬黨員，1961年有1,700萬黨員，1988年有4,600萬黨員。中國共

⁶ 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和西南。

產黨通過代表、執行、行政和監察這四條途徑組織起來。根據1956年的黨章，代表部門的最高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大會代表由選舉產生，任期五年。執行部門有權力極大的中央委員會，⁷也是每五年選舉一次，其首腦是一名主席和四名副主席，1958年又增設了一名副主席。中央委員會每年召開兩次，閉會期間則將權力委託給政治局，⁸政治局又設有常委會，由中國權力最大的七個人組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這七個人包括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五個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林彪)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⁹中央委員會設有六個大區局和一些部委，如組織部、宣傳部和社會部等。

黨的行政部門有中央書記處，監察部門有中央監察委員會。下表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結構的概貌。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黨和政府密不可分，骨幹黨員佔據了政府以及工會、農業合作社和群眾團體等半官方組織中的重要職位。毛澤東在1949年擔任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

⁷ 1956年中央委員會有97名正式委員和73名候補委員；1969年分別增加到170名和109名，1973年增加到195名和124名。

⁸ 1956年政治局有17名正式委員和7名候補委員；1969年和1973年各有21名正式委員和4名候補委員。

⁹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1966), 143, 146.

會主席。但是，在1956年中共改組以後，他辭去了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1959年，他又辭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家主席）職務，改由劉少奇擔任，劉少奇同時兼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在1966年劉少奇被打倒之後，國家主席職位一直懸空，直到1983年李先念當選為國家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而非「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允許一些民主黨派存在。最重要的民主黨派有：(1)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由一批國民黨左派黨員組成，這些人選擇了留在大陸，而不是加入臺灣的國民政府；(2) 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在國共爭鬥期間始終支持共產黨；(3) 第三黨*，曾努力促成國共和解，但未成功；(4) 致公黨，主要由華僑組成，是由舊時的會黨洪門發展而來；(5) 民主建國聯盟（民建）；(6) 中國人民救國會，在三十年代擁有堅決抗日的卓越聲望。

共產黨的專政不承認西方所理解的「忠實的反對派」，也不承認政黨的自由結合，因此，中國的民主黨派基本上是裝飾品，也就是只擁有贊同中共和政府並與之合作的權利。

中國共產主義的特殊性 中國和俄國在革命經驗之間的差距，造成了中國共產主義的許多特殊性質。首先，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是一批獲得農民階級廣泛支持的職業革命家；而在俄國，給予職業革命領導人以決定性支持的是城市工人。中國領導人主要是出身於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純正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只佔很小的比重。中國經驗的成功表明，掌握正確的理論比在形式上保持與無產階級的組織聯繫更加重要。然而，中共領導人堅持稱，雖然他們在社會背景方面稱不上是無產階級，但在精神上卻是無產階級。¹⁰

第二，馬克思主義經典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發展模式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並不存在適當的資本主義階段。於是，

* 譯者注：1947年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

¹⁰ Benjamin I. Schwartz, "On the 'Originality' of Mao Tse-tung," *Foreign Affairs*, (Oct. 1955), 74.

中國共產黨以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階段替代了資本主義階段，提出中國要從這個階段進入一個叫做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時期，然後再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第三，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四個階級將共存共處，允許民主黨派活動，儘管其活動方式很有限。與此截然相反，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只允許一個階級和一個政黨存在。

第四，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基礎是在農村，而且經歷了長期的奮鬥才取得勝利。俄國革命的特徵則是在中心城市發動罷工、怠工和起義，革命取得勝利的時間比中國革命短得多。

第五，蘇聯持續的清黨使得1934年當選的中央委員中有70%被殺，¹¹ 相反，中國則強調進行思想改造。在六十年代中期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的領導層一直非常穩定、團結。唯一引人注目的清黨是與1953–1954年的反黨活動相關，這次陰謀的主角是中共的東北領袖高崗和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

中共革命的成功促使毛澤東宣稱，中國的經驗將為亞洲提供一個革命模式。他想暗示的是否認蘇聯模式具有普遍適用性，而將其貶低為一種歐洲革命模式。中國方面的這種理論對中蘇關係有著深遠的影響，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討論這一點；這種理論可能不期而然地鼓動了東歐衛星國主張「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

經濟發展

1949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經濟爛攤子。通貨膨脹完全失控；洪水影響了30–40%的耕地；工業產量和食品產量分別驟減到戰前最高點的56%和70–75%。因此，首要的任務便是整頓國家的經濟生活，使工農業生產恢復到戰前水平。

為了促進財政穩定，政府在1949年5月發行了人民幣，禁止外幣作為交換媒介流通。此外，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來達到物價和工資的

¹¹ Chün-tu Hsüe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eadership Crisis in Communist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LXXXII: 2:184 (June 1967).

穩定，大幅度削減紙幣的流通，依據米、油、煤、麵粉和棉布這五種基本貨物的價格，實行工人報酬「折實單位工資」制度。由於這些貨物的價格每星期都在波動，「折實單位工資」也相應地增減，這樣，工人平均工資的錢數不斷變化，但實際購買能力卻不變。類似的措施也用來保護儲蓄和銀行存款。此外，解放軍採取了恢復交通線的協調行動，以便保證貨物的交換。另外還推行了一套新稅制，涉及到農業稅、工業稅、商業稅、銷售稅和所得稅等各個方面。通過這些措施，到1950年，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政府的預算趨於平衡。

土地革命和農業集體化 除了消除通貨膨脹和恢復財政穩定的努力外，政府還發動了一場生氣勃勃的農業革命，以圖解決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難題。¹² 1950年6月，政府頒佈了《土地改革法》，號召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沒收地主的財產和農具，重新分配給無地農民。農村人口被劃分成五類：(1) 地主：即那些佔有大量地產、自己不勞動、靠高利貸和剝削他人生活的人；(2) 富農：指那些擁有土地、但自己做農活、同時也僱傭雇工、放債並將部分土地出租給貧農的人；(3) 中農：指那些自己有地，但自己耕種、不剝削他人的人；(4) 貧農：指那些佔有土地或農具極少、不得不靠賣地過活的人，或是那些不得不租用他人耕地的人；(5) 雇農：指那些不佔有土地、不得不靠做工或借貸過活的人。

理論上講，政府允許地主在重新劃分土地時擁有自己的一份田地，也規定富農自己耕種的那部分土地不在沒收之列。但在實踐中，各地方的「控訴大會」做出了許多不公正的和暴力的舉動，這些控訴大會受頭腦發熱的黨員幹部和急於報仇的農民引導，對地主和富農進行了嚴厲的指責。地主和富農在這些大會上遭受了可悲的損失，許多人在草草公審之後就立即被槍決了。在以往傳統社會中充當統治精英和主幹的士紳階層，現在被摧毀了。

¹² 事實上，地主佔有土地的平均面積只有四十英畝。參見T. J. Hughes and D. E. T. Lua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China, 1949–1960* (London, 1962), 143.

到1952年12月，土地革命完成了，約七億畝（一畝合六分之一英畝）的土地分給了三億農民。在人口密度最高的華東和華南，人均土地面積是一畝；在華中是兩到三畝；在華北是三畝；在東北是七畝。總的來說，土地革命犧牲了地主和富農的利益而有利於貧雇農，中農所受的影響則最小。

一當土地革命在1952年12月完成，政府就發起了第二階段的農村改革——1953年的集體化運動。這場運動的宗旨是提高產量、防止富裕農民重新冒頭、爭取更大程度的農業專業化，以及加速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集體化分成幾個層次，最低層次是「互助」組。互助組裏的農民合併或出借農具，並在春耕和秋收季節合夥勞動。第二層次是初級合作社，合作社社員不僅合併農具和勞動，也合併土地，儘管理論上他們仍保留各自的土地所有權。第三層次是高級合作社，類似於蘇聯的集體農莊，所有社員集體擁有土地。到1956年年底，約96%的農戶正式成為合作社社員。當1957年集體化運動完成時，全國總計有76萬到80萬合作社，每社平均含160戶或600到700人。更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推廣。

工業發展 列寧宣稱，「社會主義社會只有一個真正的基礎，那就是大工業。」中共認識到工業化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不遺餘力地爭取這個目標。到1952年，中國的工農業生產不僅達到了戰前的最高點，而且超過了1949年產量的77.5%。1951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籌備工作，到次年秋天，建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由東北行政區主席高崗領導。第一個五年計劃預計在1953年開始啟動，但由於經驗不足，也由於缺乏統計知識、計劃技術和方法，因此不斷被拖延和修改。「一五」計劃一直到1955年2月才最後啟動，比規定開始的時間約晚兩年，因此實際上只是一個兩年半計劃。該計劃號召建設694個工業項目，其中的156個工廠將在蘇聯援助下修建。到五年規劃期結束之時，工業產量預計要翻一番，農業合作社要加以推廣，工商企業的公私合營將要完成，這樣將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在預算總支出中，58.2%投入工業建設，19.2%投入交通、郵政和電訊業，7.6%投入農業、林業和水利業，7.2%投入文化、教育和衛生事業。

1956年的工業產量出現了突飛猛進的增長，超過了前一年的25%，同時資本投入也增加了60%。雖然增長步伐在1957年慢了下來，但根據「1952年的固定物價」，第一個五年計劃仍超額完成了原有目標的17%。鋼產量達530萬噸，生鐵產量達580萬噸，電力產量達190.3億千瓦——各項產量均比原有指標增長了25%。1.22億噸的煤產量超額完成了8%，而糧食產量則超過了指標11.6%。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激勵政府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這個計劃號召到1962年時工農業生產總體增長75%，國民收入增長50%。幾個工農業生產的指標資料體現了計劃者的信心：煤，1.9億–2.1億噸；鋼，1,050萬–1,200萬噸，電力，400億到430億千瓦；原油500–600萬噸；糧食，2.75億噸；棉花，240萬噸。¹³

伴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政府徹底修改了高等教育制度，旨在短時期內培養出大量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為鼓勵技術教育，人文學科受到了抑制，許多所工科學院創辦起來，而綜合性大學則被削減。課程目錄被修訂，院校內的系科得到調整，目的是要讓學生將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專業上。這樣，掌握狹窄領域內的專業知識便優先於接受整體教育。根據一位美國著名科學家的研究，1960年時中國的二十五萬科學家和工程師中，有90%是在1949年共產黨掌權後培養出來的，而在1960年，中國工科畢業生數量大約是美國工科畢業生的75%。¹⁴

「大躍進」和公社 第二個五年計劃剛剛開始，政府就急切投入了一場狂熱的新運動，以圖使業已過熱的經濟加速增長。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佈在今後三年內開展「大躍進」運動，號召在1958年鋼鐵增產19%，電力增產18%，煤增產17%。毛澤東提出要在十五年內（即1972年前）趕上或甚至超過英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在樂觀主義的鼓動下，浮誇的計劃者們在隨後數月裏不斷提高生產指標，希

¹³ Hughes and Luard, 31, 64–65.

¹⁴ John A. Berbere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mmunist China* (Santa Barbara, 1960), 3.

望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長率。鋼鐵生產指標從1958年2月份的620萬噸擡高到5月份的800萬到850萬噸，8月份又上漲到1,070萬噸。人們大膽地預計本年度的工業產量將總體增長33%。¹⁵ 為了達到這種奇迹般的發展記錄，每個人都被鼓動參加工業生產；這樣，每個人，不管其職業是甚麼——政府官員、農民、學生、教授、工人等等——都成了無產階級。到1958年秋，全國樹起了約六十萬座小高爐。

與這場狂熱的工業化運動相伴而行的是，政府通過建立人民公社邁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又一步伐。1958年春，河北、河南和東北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將農業生產合作社逐個合併；到這年7月，這場運動達到了「高潮」，「人民公社」一詞正式出現。毛澤東和其他高級官員視察了河南和河北的一些早期樣板，8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宣佈人民公社的誕生。到1958年11月，出現了26,000個人民公社，容納了98%的農業人口。每個農村公社平均含約三十個合作社，約五千戶人家，也即25,000人。公社擔負起對各村莊的行政管理職權，控制本地的工農業資源，徵集稅收，開辦學校、銀行、託兒所、公共食堂、老人院、公墓等等。公社佔據一切私有財產如土地、房屋和牲畜。但是，家庭結構沒有被摧毀，一家人繼續一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只有那些孤寡鰥獨人等才生活在公社住房中。公社的規模後來減小了，到六十年代初，全國有74,000個公社，每個公社分成若干個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以提高工農業產量。

與農村公社並存的還有城市公社，其中華北鄭州的紅旗公社是個樣板。該公社在1958年8月建立，以鄭州紡織機械廠為中心，包括了4,134戶人家，含18,729人。集體生活開始之時，工人們搬遷到廠區，在廠區周圍，公社開辦了布店、公共食堂、幼稚園、託兒所、醫院、學校、公園、銀行、電影院。另外還有老人院、儲蓄所和為公共食堂種植蔬菜、飼養豬禽的農場。由於80%的婦女上班工作，「家政服務站」和街道服務單位也就必不可少。這些站點由老年人操辦，他們做各類家務，如代交各種費用、縫補衣服、打掃屋子、照看孩子、看

¹⁵ Hughes and Luard, 66-69.

護病人等，收取很小一筆報酬。在組織上，鄭州紡織機械廠廠長兼任公社社長，而廠黨委則同時是公社黨委，對公社進行嚴格控制。公社下設工業、農業、財會、計劃、保衛、福利、衛生、文化等各部門。當然還有各生產團隊，按軍事編制組成，如團、營、排等，任務是提高工業、農業和其他各方面的產量。¹⁶

在歷史上，人們只進行過兩次公社實驗，而這兩次實驗都很快就

不光彩地失敗了。一次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從3月17日持續到5月28日，共七十三天；另一次是蘇聯革命初期的農村公社。1930年，史太林宣稱，公社單位儘管是遙遠未來的理想，但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現狀。毛澤東自然不會不知道這些經驗，但他似乎更多地受到了晚清維新分子康有為所著《大同書》的影響，這部書受古代典籍《禮記》中〈禮運〉篇的啟發。在《大同書》中，康有為倡導建立一個烏托邦，那裏將沒有私家財產，沒有私家產權，沒有土地買賣，沒有私家工業，沒有私家商業；那裏將有公共醫院、公共護士、公共福利、公共教育、公共老人院和公共墓地。這種烏托邦的基本特徵是沖垮家庭，將婦女從廚房的勞作中解放出來。¹⁷ 決非偶然的是，毛澤東稱公社的特點是「大」和「公」，這恰恰就是〈禮運〉篇開頭的基本概念。〈禮運〉的開篇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¹⁸ 中國共產黨歡呼：公社的推廣是「東亞廣闊地平線上初升的太陽」，而且滿懷信心地誇耀：「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現不再是一件遙遠的事情」。¹⁹

由於大躍進和公社的推廣，政府在1958年年底自豪地宣佈，這一年的工業產量超過了1957年的65%。機器製造增長了三倍；煤和鐵翻

¹⁶ Janet Salaff, "The Urban Communes and Anti-city Experiment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January–March 1967), 82–110.

¹⁷ 關於《大同書》的內容，參見Liang Ch'i-ch'ao, *Intellectual Trends*, 95–98. 關於康有為對毛澤東的影響，參見Wen-shun Chi, "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in Communist China," *Pacific Coast Philology*, II (April 1967), 62–78.

¹⁸ 楷體為本書作者所加。

¹⁹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Bloc: A Speculative Reconstruction," *Current History*, 35:208:326 (Dec. 1958).

了一番；石油增長了50%，電力增長了40%。即使這些資料難以避免有誇張的情況，但該年所取得的進步也是很可觀的。然而，正如政府後來自己承認的那樣，對數量的追求犧牲了質量要求。1958年生產的1,100萬噸鋼鐵中，有300萬噸在1959年8月被宣佈不適合用於工業——小高爐根本取代不了大型鋼鐵廠那樣的作用。在這些一步登天的烏托邦夢想中間，一種實用主義情緒開始擡頭，強調計劃中的現實性和技術操作中的專業性。要實現真正的經濟發展，僅僅靠精神的力量還遠遠不夠，這一點變得越來越明顯。

西方的研究一般都同意，五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非常巨大，但六十年代則不那麼大。一位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估計，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人民幣738億元增長到了1959年的人民幣1,234億元，增長了70%，相比之下，1959年到1970年（人民幣1,714億元）間只增長了30%。如果把1952年到1970年看作一個時段的話，其間的年增長率為4%到4.5%，這是相當不錯的了，但卻並不驚人。²⁰

社會和心理控制

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本成分是，不斷組織群眾運動去實現黨預先設定的特定目標。確實，群眾運動的洶湧波濤加速了共產黨中國日常生活的節奏，以往被說成是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現在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組織得更嚴密。實際上，每個中國人都隸屬於某些群眾組織；黨和政府則通過這些組織進行控制，推行國家政策。此外，黨和政府壟斷了通訊媒介，公安幹警和黨員幹部無處不在，使社會變成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封艙。在這樣嚴密的控制之下，沒有所謂自由，除非它可為國家的利益服務。

群眾組織實際上是規模龐大的半政府團體。在1953年，最重要的群眾組織有：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有會員1,800萬人；中華全國

²⁰ 1952年的價格指數；1952年的匯率是人民幣2.46元兌換1美元。Alexandeev Eckstein, "Economic Growth and Change in China: A Twenty-Year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April-June 1973), 54:234-35.

工會聯合會，會員1,020萬人；中華全國婦女民主聯合會，會員7,600萬人；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會員329萬人。此外，接納9歲到14歲之間孩童的少先隊擁有八百萬隊員，而接納14歲到25歲年齡段成員的民主青年聯盟則號稱有1,200萬人。政府通過這些龐大的組織教育人民，並組織他們舉行示威、遊行，投入各項運動，如1951年的抗美援朝運動，1951年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1952年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在1966年，最大的群眾運動也許是將千百萬學生組織成紅衛兵去捍衛毛澤東思想。

社會主義新人 共產黨統治的新社會，鼓勵培養新的作風，造就一代社會主義新人，要求人民不僅要關心他們自己的事情，而且要相互督促思想和行動，出席各種政治集會，參加「學習」班和「批鬥」會。社會主義新人要不講面子，勇於做公開檢討，把國家放在家庭之上；還應自始至終地完全獻身於推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而不是像在封建舊時代那樣尋求個人發達或光宗耀祖。《共同綱領》第四十二條要求社會主義新人有「五愛」——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產。儘管有人擔心，這樣一位社會主義新人可能太嚴肅太不自然——是一位可敬而不可愛的人——但只要發現新人仍然保持著一絲的人性，這種擔心也就可以稍稍緩解了。

心理控制 與培養新作風聯結在一起的是，中共發明了一套極具摧毀力但又很微妙的思想灌輸手段，這種手段在新聞術語裏稱作「洗腦」。²¹ 這是一種以巴甫洛夫(Pavlov)理論為依據的心理壓制過程。巴甫洛夫理論稱，環境控制可以改變人的意志，重塑個人的性格。因

²¹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New York, 1951); Richard L. 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1955), ch. 3; Robert J.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1961).

此，洗腦不僅用來感化敵人、獲取招供，也用來教育黨員幹部，改造知識分子，以便讓他們繼續為國家服務，而不是像革命後的俄國那樣將他們完全清洗掉。

思想灌輸過程通常持續幾個月到一年不等，視受訓目標的重要性而定，但無論怎樣，受訓總是安排在一個偏僻的受管制營地，在那裏，個人與外界完全隔絕，被剝奪了一切安全感。受訓者一到營地，就強烈地感受到，逃避是不可能的。他們被分成一些小組，每個組由一名積極分子帶隊。他們被指派去做重體力勞動，以便使他們筋疲力盡，這樣他們的抗拒意志也就削弱了。他們在這樣的條件下學習、相互批判出身和履歷。這個開始階段約持續兩個月，其間伙食和住宿條件很差。

下一階段持續三、四個月，其間伙食和住宿條件有所改善，而體力消耗也有所減弱，但依然足夠保證在一天勞動之後人很疲勞。這一階段的學習班和小組會議增多了，這些會議強調個人的無足輕重、黨組織的無所不能。馬克思、列寧、史太林和毛澤東的著作成了新的《聖經》。過去的生活被斥責為黑暗、腐朽和墮落，而共產黨政府下的新生活則代表了解放和進步，為新的、有意義的生存提供了機會。階級鬥爭和共產黨必定取得最終勝利的思想被不斷灌輸給受訓者。

在第二階段結束之時，受訓者十有八九會經歷一場精神危機。經過這場思想鬥爭，他會得出結論，隱瞞和抗拒毫無意義，無論如何黨將取勝。於是他尋求解放，拋棄自己的情感，全心全意地接受黨和黨代表的一切。這樣，他就丟掉了包袱，獲得了再生。他在共產黨的術語和宣傳中找到了新的含義，並急於去幫助與他有相似經歷的人，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轉變完全正確。鞏固這種心態大約需要四個月。當受訓結束時，四分之一的畢業學員將調派去開辦新的學習班，而其餘的人則深入社會組織和領導群眾。事實上，整個社會就是一座控制大眾的實驗室。

通過群眾組織、秘密警察、大眾通訊媒介和思想灌輸，政府成功地控制並改造了社會和人民，其程度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聞的。曾經是個人主義色彩很重的中國人成為了世界上最受節制的民族。

對外關係

雖然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深深地加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在心底裏卻是懷著民族主義的共產黨人，熟知中國在過去一百年裏遭受的災難。他們像其他持各種不同信仰的中國人一樣，急切地想要恢復中國在世界上的合法位置，爭取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被剝奪的大國地位，並力圖重振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屢遭外來屈辱的一個世紀裏，中華民族已喪失了自信和自尊。中共新政府從一開始就對西方列強採取了強硬的姿態，並清楚地表明它與在帝國主義炮艇面前卑躬屈膝的滿清王朝和國民政府不同，不懼怕西方列強。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主要的力量來源，是與蘇聯的緊密聯繫。毛澤東在1949年毫不含糊地宣佈他的「一邊倒」政策：「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推出這一政策不僅有意識形態的共性，也有實際的考慮：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需要依靠蘇聯的援助和保護，以防止像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發生在西伯利亞的那種西方列強的干預。因此，毛澤東在1949年掌權後不久，就前往蘇聯尋求一項友好同盟條約——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國。「莫斯科—北京軸心」正式締結於1950年2月14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十年大部分時間裏對外政策的基石。史太林給予毛澤東一項軍事同盟和三億美元的貸款，並答應派遣專家幫助中國進行工業化和軍事現代化。毛澤東在1952年讚揚這個軸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而劉少奇則這樣熱烈地歌頌中蘇同盟：「與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固有的情形不同，在我們之間沒有爾虞我詐，也不存在一國對另一國的壓迫和掠奪。」儘管蘇聯人自己也很窘迫，但他們仍向中國派遣了大量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軍事顧問：1953年，在中國的空軍和海軍中各有一千到兩萬五千名蘇聯顧問，在陸軍中則有五千到一萬蘇聯顧問；到1954年2月，中國的各種共礦企業中約有四十萬蘇聯專家。當1954年赫魯曉夫 (Khrushchev) 和布林加寧 (Bulganin) 訪問北京之時，他們同意援建一百五十六個生產企業。到1955年，莫斯科加封中國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副帥，正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部長會議上宣稱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結

果，是組成了以蘇聯為首的——更正確地說是以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首的——世界社會主義民主陣營，與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平起平坐。」²²

中蘇相互表達的友誼和熱誠反映在許多方面。蘇聯方面表示友誼的行動包括：1952年將東北「戰利品」交還給中國，1953年將蘇聯對中東鐵路的聯合所有權還給中國，1955年宣佈廢除蘇聯將旅順港用作海軍基地的權利，並放棄蘇聯在新疆企業中的「聯合股份」。1957年，蘇聯人做出了又一個慷慨表示，同意援助中國開發核技術；一年後又贈送給中國一個重水反應堆。北京方面則在1956年調停莫斯科與其東歐衛星國之間的糾紛，以幫助維持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這件事我們將在以後討論。

北京與其他亞洲國家發展關係，反映出它急於爭取對亞洲的領導權。在這一方面，歷史上中國與其周邊小國的關係，尤其是與明清時期最重要的藩屬國朝鮮和越南(安南)的關係，顯然影響了毛澤東和他的同僚。1950年，當他們自己剛剛建立起政府之時，就毫不猶豫地派出了一百萬「志願軍」援助朝鮮抗擊美國的「侵略」。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他們充當了北越的「老大哥」，而在北越對南越和美國人的戰爭中，他們向北越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對於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緬甸、老撾和柬埔寨等亞洲的非共產國家，北京試圖通過強調和平共處原則使他們保持中立。和平共處原則是：(1) 互相尊重領土主權；(2) 互不侵犯；(3) 互不干涉內政；(4) 平等互利；(5) 和平共處。通過這五項原則，北京在很大程度上使這些國家與西方保持距離。在1955年二十九個亞非國家召開的萬隆會議上，重申了和平共處原則，周恩來因此而贏得了崇高的聲望，獲公認為亞非國家民族主義的支持者和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鬥士。事實上，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使中國取得了亞非國家集團領袖的地位。作為一個弱者，中國找到了一條扭轉自己的命運及迅速提高國家地位的可行途徑，這樣，北京便成了一些不發達國家的鼓舞和靈感。

從以上的概述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的對外政策至少有五個基

²² Peter S. H. Tang, *Communist China Today* (New York, 1957), 378-81, 383.

本動因：(1) 民族主義和爭取大國地位的努力；(2)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3) 內政考慮；(4)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5) 「基於『傳統空間—意識形態』世界秩序之上的『戰略—政治』想像」。²³

初期緊張的徵兆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的十年，成果豐碩，但也不無壓力和緊張。第一次的內部衝突出現在1953–1954年，其時，兩位權勢顯赫的地方領袖對中央政府中的第二號和第三號領導人提出了挑戰。中共的東北領導高崗²⁴和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²⁵聯手倡議採納蘇聯的經濟發展制度，黨組幹部與企業脫鉤，在各級工業管理上實行「一長制」。這個建議實際上是在指責劉少奇和周恩來的現行政策。周恩來抵制這個建議，提出要在工業管理上實行「集體領導」。挑戰者要求劉、周兩人及總書記鄧小平下臺，於是衝突達到了頂點。三位應戰者靠北京市長彭真的幫助，指控兩位挑戰者搞反黨活動及妄圖建立「獨立王國」，於是在1954年把兩人趕出了中央委員會。高崗最後自殺身亡，饒漱石被囚禁，第一次權力鬥爭告終。

1956年，民眾方面出現了對政府的第二次挑戰。共產黨長達七年的嚴密統治已經引發相當嚴重的不滿和受壓制情緒，最終在匈牙利叛亂之後爆發出來。如毛澤東描述的那樣，「千萬人上街反對人民政府」。²⁶一方面為了給人民提供一個發泄怨氣的機會，以免匈牙利式的叛亂在中國重演，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誘導出真正的批評，毛澤東精明地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許多知識分子天真地誤認為這個口號

²³ Albert Feuerwerker,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uly 1972; *China in the World Today*, 5.

²⁴ 他兼任國家副主席和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²⁵ 他也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²⁶ Gene T. Hsiao,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VII:6 (June 1967), 393.

意味著言論自由，於是就袒露出他們的心迹。由此引出的批評超過了政府的預期。毛澤東發現局勢難以容忍、極為不利，於是迅速予以鎮壓。提意見的人被揪住不放，雖然他們為自己的鹵莽後悔不已，但要收回說出去的話就太晚了。許多人被送往勞改隊，或者被迫簽署一份「社會主義自我改造決心書」以改正立場。在這場反右運動剛結束時，政府於1957年在工農業人口中，發動了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接著又派軍政幹部從事體力勞動，為人民群眾樹立榜樣，更多地強調思想意識的「紅」而非「專」。

綜合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十年的成就相當卓著。在對內方面，鞏固了對國家的控制，並取得了相當的經濟增長。在對外方面，與蘇聯和東歐衛星國保持緊密的聯繫，與聯合國軍隊在朝鮮打成了平局（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在日內瓦和萬隆會議上扮演了大國的角色，調停了蘇聯和衛星國之間的糾紛。另外，核技術開發也已經起步。正是在這樣一種歡快愉悅的心態之下，毛澤東推行起人民公社，希望把中國帶到一個比蘇聯更高的意識形態層面上，並在邁向共產主義大門的競賽中超過蘇聯。

然而，在這輝煌成就的表象之下，已經出現了關於經濟政策的內部分歧和對「莫斯科—北京軸心」的分離傾向。隨著1959年第二個十年的開始，政府面臨與蘇聯關係惡化和高層領導人中間出現權力鬥爭的雙重挑戰。

參考書目

- Agunsanwo, Alaba,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71* (Cambridge, Eng., 1974).
- Arkush, R. David,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0).
- Bao, Ruo-wang (Jean Pasqualini), and Rudolph Chelminski, *Prisoner of Mao* (New York, 1973).
- Bennett, Gordon, *Yundong: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Berkeley, 1976).
- , *Huadong: The Story of a Chinese People's Commune* (Boulder, 1978).

- Bianco, Lucien,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tr. from the French by Muriel Bell (Stanford reprint, 1972).
- Boardman, Robert,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 (New York, 1976).
- Buck, David D., *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Madison, 1978).
- Burki, Shabid J., *Study of Chinese Communes, 1965* (Cambridge, Mass., 1970).
- Chai, Winberg,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1972).
-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1984).
- Chan, Leslie W., *The Taching Oilfield: A Maoist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berra, 1974).
- Chao, Ka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5* (Madison, 1971).
- , *Capital Formation in Mainland China, 1952–1965* (Berkeley, 1974).
- Ch'en, Jerome (ed.), *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London, 1970).
- Ch'en Theodore H. E., *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Hong Kong, 1960).
- , *The Maoist Education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4).
- Chesneaux, Jean et al.,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49–1976* (New York, 1979).
- Chiu, Hungda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Law of Treaties* (Cambridge, Mass., 1972).
- Chow, Gregory C., *The Chinese Economy* (Hong Kong, 1985).
- Clark, M. Gardn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eel Industry and Soviet Technical Aid* (Ithaca, 1973).
- Clough, Ralph N.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Arms Control* (Washington, D.C., 1975).
- Cohen, Arthur A., *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 (Chicago, 1964).
- Cohen, Jerome A.,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ss., 1968).
- (ed.), *The Dynamic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1970).

- et al., *China Trade Prospects and U.S. Policy*, ed. by Alexander Eckstein (New York, 1971).
- David, Delia,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1976).
- Dittmer, Lowell,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Berkeley, 1987).
- Domes, Jürgen,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72* (New York, 1973).
- ,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PRC* (Boulder, 1985).
- Dreyer, June Teufel, *China's Forty Mill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6).
- Dulles, Foster Rhea,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The Historical Record: 1949–1969* (New York, 1972).
- Eckstein, Alexander, *Communist China's National Income* (New York, 1961).
- , "Sino-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 A Reappraisal," in C. D. Cowan (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1964), 128–59.
- ,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New York, 1966).
- , "Economic Growth and Change in China: A Twenty-Year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54:211–41 (April–June 1973).
- Feuerwerker, Yi-tsi Mei, *Ding Ling's Fiction: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1982).
- Fitzgerald, Stephen,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0* (Cambridge, Eng., 1973).
- Fokkema, D. W., *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 (The Hague, 1965).
- Frolic, B. Michael, *Mao's People: Sixteen Portraits of Lif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0).
- Galbiati, Fernando,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1985).
- Gamberg, Ruth, *Red and Expert: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1977).
- Gittings, John,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London, 1967).
- Griffin, P., *Chinese Communist Treatment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Princeton, 1976).
- Gurley, John R., *China's Economy and the Maoist Strategy* (New York, 1976).

- Hao, Yufan, and Zhai Zhi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0, 94–115.
- Harding, Harry,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ford, 1981).
- Harrison, James P.,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 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1971).
- ,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72* (New York, 1972).
- Hinton William,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1966).
- Ho, Kan-chih,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Peking, 1959).
- Howe, Christopher, *Wage Patterns and Wage Policy in Modern China 1919–1972* (London, 1973).
- Hsiao, Gene T.,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Policy, Law, and Practice* (Berkeley, 1977).
- Hsiao, Katharine Hua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1971).
- Hsiung, James Chieh, *Ideology and Practice: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1970).
- , *Law and Policy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 Study of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1972).
- (ed.), *The Logic of "Maoism": Critiques and Explication* (New York, 1974).
- Hsü, Kai-yü, *Chou En-lai: China's Gray Eminence* (New York, 1968).
- Huang, Joe C., *Heroes and Villai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 as a Reflection of Life* (New York, 1973).
- Huck, Arthur, *The Security of China: Chinese Approaches to Problems of War and Strategy* (New York, 1970).
- Israel, John and Donald K. Klein, *Rebels and Bureaucrats: China's December Wars* (Berkeley, 1976).
- Johnson, Cecil, *Communist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1959–1967* (New York, 1970).
- Johnson, Chalmers, "Building a Communist Nation in China" in Robert A.

- Scalapino (e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Englewood Cliffs, 1965), 47–81.
- (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1973).
- Kahn, Harold, and Albert Feuerwerker, “The Ideology of Scholarship: China’s New Historiography,” *The China Quarterly*, 22:1–13 (April–June 1965).
- Karnow, Stanley, *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1973).
- Kau, Ying-ma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s Nation Building* (White Plains, N.Y., 1973).
- Kierman, Frank A., J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Mass., 1974).
- Kirby, R. J. R.,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 A.D.* (New York, 1985).
- Kuo, Leslie T. C., *Agri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1976).
- Lall, Arthur, *How Communist China Negotiates* (New York, 1968).
- Lardy, Nicholas R.,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Eng., 1983).
- , and Kenneth Lieberthal (eds.), *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rmonk, N.Y., 1983).
- Larkin, Bruce D.,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1971).
- Lee, Chae-jin, *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Stanford, 1994).
- Lee, Rance P. L., and Lau Siu-kai (eds.), *The People’s Commune and Rur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81).
- Lewis, John Wilson,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1963).
- (ed.),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Cambridge, Eng., 1970).
- Leys, Simon, *Chinese Shadows* (tr. from French ed., 1974), (New York, 1977).
- Li, Choh-m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munist China: An Appraisal of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Industrialization* (Berkeley, 1959).
- , *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1962).
- Li, Tien-min, *Chou En-lai* (Taipei, 1970).
- Li, Victor H. (ed.), *Law and Politics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Seattle, 1977).

- , *Law without Lawyers: A Comparative View of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oulder, 1978).
-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湖南：長沙，1989年）。
- Lifton, Robert J.,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1961).
- Liu, Alan P. 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1971).
- , *Political Culture and Group Conflict in Communist China* (Santa Barbara, 1976).
- Liu, Ta-chung,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Princeton, 1965).
- Lowe, Donald M., *The Function of "China" in Marx, Lenin, and Mao* (Berkeley, 1966).
- Lyons, Thomas P.,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lanning in Maoist China* (New York, 1987).
- Ma, Laurence J. C., and Edward W. Hanten (eds.),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1981).
- MacFarquhar, Roderiek,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1960).
- ,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1983).
- Mao, Tse-tung, *New Democracy* (New York, 1945).
- ,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4 vols. (London, 1954).
- "Mao's 2 Telegrams on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6, 1992, A4.
- Madsen, Richard,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1984).
- Marshall, Marsh, *Organization, and Growth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1985).
- McDougall, Bonnie S. (e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erkeley, 1984).
-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1977).
- Moody, Peter R., *Opposition and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1977).
- Mozingo, David,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49–1967* (Ithaca, 1976).

- Mu, Fu-sheng, *The Wilt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under Mao* (New York, 1962).
- Mueller, Peter G., and Douglas A. Ross, *China and Japan: Emerging Global Powers* (New York, 1975).
- Munro, Donald J., "Chinese Communist Treatment of the Thinkers of the Hundred Schools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24:119–40 (Oct.–Dec. 1965).
- Nee, Victor, and David Mazingo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1983).
- Nelsen, Harvey W., *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oulder, 1977).
- Oksenberg, Michel (ed.),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New York, 1973).
- Orleans, Leo A., *Every Fifth Child: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Stanford, 1972).
- , *China's Experience in Population Control: The Elusive Model* (Washington, D.C., 1974).
- , (ed. with intro.), *Chinese Approaches to Family Planning* (White Plains, N.Y., 1980).
- Parish, William L., and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1978).
- Perkins, Dwight H., *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6).
-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1975).
- (ed.),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1977).
- Perry, Elizabeth J.,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1980).
- Pincus, Fred L.,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ltimore, 1975).
- Price, Jane L., *Cadres, Commanders and Commissars: The Train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1920–1945* (Boulder, 1976).
- Printz, Peggy and Paul Steinle, *Commune: Lif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1973).
- Rádványi, Jáno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43:121–29 (July–Sept. 1970).
- Rice, Edward E., *Mao's Way* (Berkeley, 1972).
- Schram, Stuart 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1963).

- , *Mao Tse-tung* (New York, 1966).
- , “Mao Tse-tung and the 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1958–69,” *The China Quarterly*, 46:221–44 (April–June 1971).
- (ed. and intro.),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 (New York, 1974; English edition: *Chairman Mao Unrehearsed*).
-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1966).
- Schwartz, Benjamin, I, “On the ‘Originality’ of Mao Tse-tung,” *Foreign Affairs* (Oct. 1955), 67–76.
- , “The Maoist Image of World Order,” in John C. Farrell and Asa P. Smith (eds.), *Image and Real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68), 92–102.
- ,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Mass., 1968).
- Selden, Mark (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1979).
- Shabad, Theodore, *China’s Changing Map: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1956).
- Sit, Victor F. S. (ed.), *Chinese Cities: The Growth of the Metropolis since 1949* (Hong Kong, 1985).
- Solinger, Dorothy J.,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1949–1954: A Case Study* (Berkeley, 1977).
- , *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Commerce, 1949–1980* (Berkeley, 1984).
- Stacey, Judith,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1984).
- Starr, John Bryan,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 The Paris Commune Through Chinese Eyes,” *The China Quarterly*, 49:106–25 (Jan.–March, 1972).
- ,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Princeton, 1979).
-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White Plains, N.Y., 1980).
- Thaxton, Ralph A., Jr., *Salt of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1997).
- Townsend, James 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1967).
- , *Politics in China* (Boston, 1974).

- Tsou, Tang, *Embroidment over Quemoy: Mao, Chiang, and Dulles* (Salt Lake City, 1959).
- Tucker, Nancy Bernkopf,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ew York, 1983).
- Vogel, Ezra F.,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ss., 1969).
- Vohra, Ranbir, *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74).
- Wakeman, Frederic, Jr.,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1973).
- Waller, Derek J.,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ommunist China* (Garden City, N.Y., 1970).
- Watson, James L.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1984).
- White, Lynn T., III, *Careers in Shanghai: The Social Guidance of Personal Energies in a Developing Chinese City, 1949–1966* (Berkeley, 1978).
- Whiting, Allen S.,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68).
- Whitson, William W., *Chi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China, 1956–1971* (New York, 1972).
- Wittfogel, Karl A., "Some Remarks on Mao's Handling of Concepts and Problems of Dialectics,"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III:4:251–77 (Dec. 1963).
- Wolf, Margery,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1975).
- Wong, John, *L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Agriculture* (New York, 1973).
- Yang, C. K.,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59).
- Yin, John, *Government of Socialist China* (Lanham, Md., 1984).
- Young, Marilyn B., *Women in China* (Ann Arbor, 1973).
- Young, Kenneth T.,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1967* (New York, 1968).
- Yu, George T., *China's African Policy: A Study of Tanzania* (New York, 1975).
-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2, 103–122.

Zhang, Shu Gu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Lawrence, 1995).

第二十七章

中蘇分裂

「莫斯科—北京軸心」這個象徵著牢固的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陣線，到五十年代末迅速地惡化了。曾被稱為「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一種關係，竟這麼快就變質成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和激烈的邊界衝突，打破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團結一致的神話，並使社會主義陣營面臨分崩離析的威脅，這真是一個謎。歷史學家對如何解釋這一複雜的事態進展興趣盎然。

衝突的歷史根源

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誕生之時起，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接觸就既不愉快也不滿意。他依靠在農村發動農民來開展革命，這被看作是非正統的革命手段。莫斯科容忍他在革命運動中的合法地位，僅僅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其他各種類型的暴動都失敗了。史太林始終不認為毛澤東的方法適合中國革命。史太林繼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等在蘇聯留過學的中國人，責成他們領導中國共產黨，而把毛澤東排斥在中央委員會之外。即使到1936年長征結束、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人之後，史太林仍然不願意承認他的領導地位。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38年。即使在1938年到1945年間，史太林還繼續把王明看作是可能取代毛澤東的候補性領導人。

毛澤東雖然尊重史太林是社會主義的締造者，但他親眼目睹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愚蠢政策。因此，他不信任莫斯科的判斷，不承認史太林「為中國革命制定政治和軍事策略的權

威」。¹ 1962年，毛澤東在回憶過去三十年的事情時宣稱：「理解中國客觀現實的是中國人，而不是共產國際中那些關心中國問題的同志。共產國際的那些同志一點不理解，或者我們可以說他們完全沒有去理解中國的社會、國情和中國的革命。」² 只有一個知道如何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國人，才能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因此，毛澤東以他自己的方式進行奮鬥，取得成功，並不是靠史太林的支援。毛澤東與史太林的關係很不和睦；事實上他們之間存在著暗地裏的相互不信任和相互厭惡。史太林認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限，缺乏國際眼光，局限於自己的革命經驗。³ 赫魯曉夫回憶說，「史太林一直對毛澤東有批評」，把他稱作「仿造的馬克思主義者」。⁴ 其他一些蘇聯的說法稱中共是「捲心菜型共產黨」和「蘿蔔型共產黨」，意思是紅皮白心，以此來貶低中國共產黨，破壞毛澤東的威信。早在1936年，毛澤東便告訴斯諾：「我們努力解放中國肯定不是為了把本國交給莫斯科！」⁵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之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期待最終避免完全依附於蘇聯。1945年1月，他們秘密提出建議，希望「以中國重要政黨之領導人」的身分訪問華盛頓，與羅斯福會晤。他們希望讓羅斯福相信，代表著中國的未來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他們期望建立一個聯合政府，按鐵托(Tito)的模式接受美國的援助，獲取美國承認中共為主要政黨而非非法政黨，及中共具有交戰者地位，從而參加戰後中國的安排和聯合國的組建。最重要的是，他們想知道，如果蔣中正拒絕聯合政府，美國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可能性有多少。⁶

¹ Benjamin Schwartz,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1949-72," in Michel Oksenberg (ed.),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New York, 1973), 19.

² Stuart R. Schram, "Introduc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Stuart R. Schram (ed.),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Eng., 1973), 15-16.

³ 同上註，16-17。

⁴ Nikita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1970), 462.

⁵ Schram, 18.

⁶ Barbara W. Tuchman, "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 An Essay in Alternatives," *Foreign Affairs* (Oct. 1972), 44, 50-51, 58.

毛澤東的請求在赫爾利大使那裏耽擱了一段時間才遞交給羅斯福，赫爾利在呈遞建議時評論說，與延安的軍事合作將構成「承認中共為交戰者」，並將導致「國民黨政府的垮臺……混亂和內戰，使美國對華政策失敗」。⁷ 羅斯福總統在1945年1月14日收到了這份報告，其時他正埋頭於籌備雅爾達會議和因盟軍即將獲勝所產生的問題，包括戰後對德國的處置、戰犯問題、蘇聯要求在聯合國中取得十六個席位問題和波蘭邊界問題。另外，在召回史迪威剛過去五個月之時，他不想在與蔣中正的關係中再添波瀾。於是，羅斯福總統不接受毛澤東的請求。⁸

雖然訪問華盛頓的指望落空，毛澤東繼續與駐延安迪克西使團的政治官員謝偉思討論美國援助的需要。毛澤東在1945年3月13日指出：

中國戰後最大的需要是經濟發展。它自己缺乏開展這項任務所需的資金……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相互補充：它們不會競爭。

中國需要建立輕工業以供應它自己的市場，提高其本國國民的生活水平。

美國不僅僅是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最合適的國家：它也是唯一有能力參與中國經濟的國家。從任何角度來看，中國人民和美國之間不應該也不可能有任何衝突。⁹

把美國稱作援助中國戰後經濟發展的「最合適」和「唯一的國家」，強調了毛澤東不想只依靠蘇聯援助的願望。美國人對他的暗示毫無反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蘇聯軍隊突入東北，將價值20億美元的工業設施當作「戰利品」掠走，並沒收了30億美元的金條和8.5億元偽

⁷ 同上註，55。

⁸ 同上註，50-51, 56。

⁹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Vol. V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1969), 273 ff, report by John S. Service on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March 13, 1945.

滿幣。¹⁰ 儘管蘇軍交給了中共軍隊大量日軍武器，但他們卻不讓中共控制東北，實際上他們有時還與中共軍隊發生摩擦。¹¹ 毛澤東對蘇聯與蔣中正簽訂的友好條約很不高興，這項條約大大貶低了他的地位。史太林還建議中共與國民黨合作，這也令毛澤東不快。1962年9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抱怨：

[中蘇爭執的]根子早就埋下了。他們[蘇共]不讓中國搞[共產主義]革命。那是在1945年，史太林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說我們不應該打內戰，必須要同蔣介石合作。不然中華民國就要垮臺。那時我們沒有聽他的，結果革命勝利了。¹²

即使在1949年毛澤東完成了對大陸的征服之時，史太林還策劃讓新疆宣佈獨立，就像1921年外蒙獨立那樣，他保證將在外交上承認新疆獨立，並將隨後使它作為一個自治共和國併入蘇聯。由於新疆國民政府軍司令¹³ 不予合作，這個計劃失敗了。新疆因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僥倖逃脫了外蒙古的命運。

1949年12月，中共勝利後不久，毛澤東前往莫斯科祝賀史太林的七十周歲壽辰，並尋求獲得援助和同盟。史太林有好幾天對毛澤東不予理睬，直到毛澤東威脅要回國。¹⁴ 只有在這之後，這位蘇聯領導人才同意談判，但隨後進行的談判卻是一場持久和艱苦的拼搏。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相關協定，表面上代表著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一致為基礎的堅固「莫斯科—北京軸心」之形成；但實際上，這個同盟更主要是一個事實上的需要，而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體現。¹⁵ 與他期望的相比，毛澤東得到的太少，而付出的卻太

¹⁰ Tai-sung An, *The Sino-Soviet Territorial Dispute* (Philadelphia, 1973), 62.

¹¹ James B.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 1972), 379.

¹² Quoted in Tai-sung An, 63.

¹³ 陶峙嶽。

¹⁴ “Khrushchev’s Last Testament: Power and Peace,” *Time*, May 6, 1974, 44.

¹⁵ John Gittings, “The Great-Power Triangle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China Quarterly* (July–Sept. 1969), 39:44–45.

多。毛澤東獲得了一項同盟以及五年內區區三億美元的貸款，而他付出的卻是被迫承認外蒙獨立、中蘇聯合開發新疆礦產資源、共同管理長春鐵路（即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加在一起）、共同使用旅順和大連港。史太林的所作所為像個「新沙皇」，就連赫魯曉夫也覺得他的行動「不明智」、「侮辱了中國人」。¹⁶ 蘇聯人直到1952年才歸還了東北「戰利品」，1953年才歸還東北鐵路，1955年歸還旅順、大連港和在新疆企業中的「聯合股份」。毛澤東對史太林要求獲得在華特殊利益行為的憤恨，清楚地反映他在1962年9月28日八屆十中全會上作的報告中：

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以後，史太林還害怕中國會成為南斯拉夫，我會成為又一個鐵托。後來，1949年12月我到莫斯科去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年2月14日），這裏面也展開了一場鬥爭。史太林不想簽，但經過兩個月的談判他最後同意了。史太林什麼時候開始相信我們的呢？那是在1950年冬天，我們國家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史太林到那時才相信我們不是南斯拉夫，不是鐵托。¹⁷

取得史太林「信任」的代價是高昂的：中國派遣了一百萬「志願軍」介入朝鮮戰爭，為購買這次冒險所需的蘇聯裝備和物資支付了13.5億美元，而毛澤東還在這場戰爭中失去了一個兒子。

在中蘇同盟的初期階段，意識形態爭論的種子就已埋下了。蘇聯人明確反對中國人把毛澤東說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寶庫的創造性貢獻者，也反對把「毛澤東道路」說成是亞洲革命運動的樣板。1949年11月23日，亞澳國家工會會議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在會上發表的講話中宣稱：

中國人民打敗帝國主義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走的道路，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應遵循的道路……這條道路是毛澤東道路。它將是其他許多情況相似

¹⁶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463.

¹⁷ Quoted in Tai-sung An, 66.

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解放的基本道路……這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¹⁸

中國特別堅持「毛澤東道路」的兩個特點：(1) 由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族反帝聯合戰線；(2) 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展持久的武裝鬥爭，從農村包圍城市。

1951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宣稱：

毛澤東的中國革命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中尤其是中國革命中的新發展。毛澤東的中國革命理論不僅僅對中國和亞洲具有意義——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具有普遍意義。它的確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寶庫的一個新貢獻……

帝國主義國家中的革命經典是十月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革命經典則是中國革命。¹⁹

隨後，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讚揚毛澤東推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東方的發展」，並盛讚毛澤東成功的革命方式是「馬克思主義在到達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新的總結」。一本中國的雜誌驕傲地預言，「中國的今天就是越南、緬甸、錫蘭、印度和其他許多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明天。」²⁰

蘇聯的宣傳家們不同意毛澤東宣稱他在理論上具有創造性、他的「道路」適合於亞洲其他地區的說法；他們告誡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僅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連同史太林關於民族及殖民的普遍問題、特別是關於中國問題的觀念得到了運用的必然結果。

¹⁸ Philip Bridgham, Arthur Cohen, and Leonard Jaffe, "Mao's Road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A View from Washington, 1953," *The China Quarterly* (Oct.-Dec. 1972), 52:678, 楷體是本書作者所加。

¹⁹ 同上註，681，楷體是本書作者所加。

²⁰ 同上註，681-82。

在1951年11月12日的莫斯科科學大會上，首席發言人茹科夫 (Ye. Zhukov) 警告說：「如果把中國革命看作是亞洲其他國家人民民主革命的某種『樣板』，將是十分危險的。」就蘇聯論者而言，並無「毛澤東道路」或「毛澤東思想」；亞洲各國人民應遵循的唯一道路，是馬克思、列寧和史太林指出的道路。蘇聯人想方設法限制毛澤東的重要性和貢獻，也努力詆毀毛澤東在亞洲和世界革命問題上的權威。但是，在莫斯科科學大會之後，關於「毛澤東道路」的爭論逐漸平息了，很顯然是由於相互達成了協議。

如果說毛澤東與史太林的關係是很苦澀的話，那他與赫魯曉夫的關係則是辛辣的。史太林至少因為本身的老資格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而贏得某種尊敬，但赫魯曉夫則完全不具備這兩種特徵。毛澤東和周恩來在1954年和1958年兩次試圖與赫魯曉夫討論外蒙古的地位，但卻無法得到任何反應。關於中蘇邊界問題，赫魯曉夫認為中國的地圖「太讓人惱火了，我們氣得把它仍到了一邊。」²¹ 在另一個場合，毛澤東評價說，中國和蘇聯的力量加起來要比西方資本主義的力量大，赫魯曉夫聽後就教訓他說：

毛澤東同志，這種想法到今天已過時了。你不能再根據誰的人數最多來估算力量的大小。放在過去用拳頭和刺刀來解決爭端的時候，誰的一邊人多、刺刀多還有意義……現在，有了原子彈，雙方軍隊數量的多少實際上對決定實力大小和戰爭結果沒有任何意義。一方的部隊越多，被原子彈炸成灰的也越多。²²

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是個膽小鬼。

1959年又出現了不愉快的事件，其時，赫魯曉夫來中國請求獲准在中國領土上開設一座無線電台，以便與蘇聯的潛水艇保持聯絡；他還要求獲准讓他的軍艦在中國加油、維修，讓蘇軍水兵上岸休假。毛澤東憤怒地拒絕這個請求，宣稱：「最後說一遍，不行，而且我也不想再聽到任何這類的事情。」當赫魯曉夫還堅持時，毛澤東宣佈：「不

²¹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474.

²² 同上註，470。

行！……我們不想讓你們到這裏來。我們已經把英國人和其他外國人趕出了我國的領土好多年了，現在我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為他們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們的領土了。」赫魯曉夫述說他失去了耐心，並回憶說，早在1954年他就預見到「與中國的衝突在所難免」。²³

以上的概述表明，毛澤東在三十年裏一直與蘇聯領導人相處不愉快。他最初被史太林排擠出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層，而後又受到了史太林和赫魯曉夫兩人無禮的對待。個人的受傷害感和不滿情緒只會對國家關係造成有害的後果。

意識形態爭論

從外表上來看，中蘇分裂的直接原因，是由於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上批判史太林和抨擊「個人崇拜」。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無所敬意，而且他自己也實行著「個人崇拜」，因此他不贊成蘇聯的事態發展。然而，他表面上還是與莫斯科合作，按蘇聯的樣板將中共中央委員會改組成「集體領導」。「莫斯科—北京軸心」攜手合作的表象保持了下來，但毛澤東確信，是他而不是赫魯曉夫代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掌舵人，中國的經驗為亞洲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提供了革命的樣板。他含沙射影地將蘇聯的道路貶低為一種歐洲模式，否認它具有世界普遍性。

毛澤東決心成為國際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領袖，並使北京成為社會主義集團的新的中心。俄共在史太林死後未能產生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卓越領導人，這種情形有利於他的計劃，而緊隨「非史太林主義運動」在東歐衛星國出現的動盪不安，則為實施這一計劃提供了大好時機。繼1956年匈牙利叛亂之後，波蘭人要求獲得「人民民主」走「不同社會主義道路」的權利。毛澤東抓住這個機會充當社會主義陣營的調停者，並派熱情洋溢的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出使東歐執行緩和使命。周恩來強調，在資本主義威脅面前，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在蘇聯領導下團結一致，以及強調承認各衛星國的情況不同有重大意義。毛澤東的

²³ 同上註，466，472-473。

動作雖然只是個權宜之策，卻制止了共產主義世界的瓦解之勢，並維護了蘇聯在集團中的首席地位。北京第一次在亞洲以外發揮了影響，發出了一種不同於莫斯科的聲音。受這一成就的鼓勵，毛澤東在1957年對鐵托的修正主義發動了一場猛烈的批判，使自己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統原則的捍衛者。到1958年，毛澤東已經使北京成為莫斯科之外的另一個中心。社會主義陣營的堅固結構鬆動了，蘇聯的領導地位也被打破了。

毛澤東的崛起和共產黨中國對蘇聯霸權的挑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世界能不能容忍兩種聲音和兩個中心？不管這個問題如何解答，它無疑造成了兩者之間的緊張局勢，在有關全球戰略和世界革命方式問題上尤其如此。當1957年8月和10月蘇聯成功發射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之時，毛澤東興高采烈地宣佈「東風壓倒西風」。他認為形勢非常有利於推進國際社會主義的事業，但赫魯曉夫卻猶豫不決。1958年，在金門—馬祖危機中，蘇聯人沒有支援北京攻佔這些沿海島嶼的努力。對中蘇關係損害最嚴重的是赫魯曉夫干涉中國的內政；1959年，他鼓動訪蘇的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反對毛澤東，並在同年6月彭德懷回國一個星期之後單方面取消了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意圖削弱毛澤東的地位。²⁴ 1957年的協定規定，莫斯科向中國提供一枚原子彈樣品、科學資料和技術人員，幫助中國研製原子彈。在1958年贈送了一個重水反應堆之後，赫魯曉夫後悔起自己的承諾。原子彈樣品再也沒有送來，而且，在1959年，科技情報的輸送也受到了限制，蘇聯技術人員撤離了中國，帶走了已完成一半的工程藍圖。毛澤東被深深激怒了，他指責赫魯曉夫屈服於美國的宣傳、搞「修正主義」、在戰爭性質和世界革命總戰略上持異端觀點。他以暗示方式，表示懷疑赫魯曉夫是否適合於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意識形態爭論的烈度加強了。

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觀念，認為社會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根據北京的觀點，戰爭將推進而非阻撓共產主義事業。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蘇維埃俄國的出現成為可

²⁴ 有關詳情參見下一章彭德懷下臺一節。

能；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了共產黨中國的建立；第三次世界大戰將使共產黨奪取美國的政權，從而埋葬資本主義世界。

北京宣稱戰爭並不可怕；雖然核武器的災難可能會消滅三億中國人，但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遭遇將更壞。據說，周恩來聲稱，下一場戰爭之後，將剩下「兩千萬美國人、五百萬英國人、五千萬俄國人和三億中國人」。²⁵ 這種大膽的立場也許旨在消除對戰爭的恐懼，防止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烽火熄滅。

赫魯曉夫批駁中國人的觀點，並爭辯說，戰爭的破壞性太大，應設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將徹底毀壞地球，使共產主義的勝利成為毫無意義之事。相反，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具有優越的制度，它將能夠通過和平競賽超過資本主義世界，取得輝煌勝利。在北京看來，這些觀點是離經叛道的。1960年4月，中國人猛烈地批判赫魯曉夫「割裂、背叛、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些行為必將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災難。赫魯曉夫指責毛澤東「像史太林，只記得自己的利益，編造一些脫離現代世界客觀現實的理論」。²⁶ 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爭論促使了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一次由八十一個共產主義政黨參加的大會，試圖來裁決中蘇爭論。

中國代表團奚落和平共處的觀念是個幻想，主張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戰爭和民族獨立運動，貶低和平取勝的機會。蘇聯人反駁說，全球戰爭的危險太大，由於共產主義集團還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戰略優勢，因此就要謹慎行事。此外，經濟競賽將是決定性的因素，時機也有利於社會主義陣營。²⁷ 會議在1960年12月6日發表了最後公報，宣告擁護蘇聯關於和平共處的觀點，另外為安撫中國人作了一些小的改動。北

²⁵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1960), 403.

²⁶ Donald S. Zagoria, "The Futur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1:2:3-14 (April 1961); Edward Crankshaw, "Khrushchev and China," *The Atlantic Monthly* (May 1961), 43-47.

²⁷ 關於莫斯科會議的深入分析，參見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1962), ch. 15.

京很不情願地在公報上簽了字，以維護集團的團結，但在這表象之下，分歧依然存在。儘管蘇聯人在會上取得了勝利，但很明顯，北京已能夠對莫斯科提出挑戰而無被逐出集團之虞。蘇聯的霸權時代已一去不返了。

下面一些事件是使中蘇關係進一步緊張：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莫斯科的單方面行動；莫斯科未經與中國人磋商即接受禁止核子試驗條約；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中拒絕支持中國。²⁸ 到1964年，中蘇之間的敵意已變得非常強烈，其時中國的核武器眼看就要研製成功，赫魯曉夫竟考慮要摧毀中國的原子彈基地。其他一些蘇聯領導人被這個計劃嚇呆了，他們立即通報了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威脅要入侵外蒙古，以表明蘇聯連它的亞洲衛星國都保護不了。衝突在最後時刻避免了。1964年10月15日，比較務實的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和柯西金 (Alexei Kosygin) 在中央委員會中成功地徵集到足夠的支持者，解除了赫魯曉夫的部長會議主席職務。²⁹ 一天以後，中國的第一枚原子彈在新疆爆炸——這是蘇方人員撤走後中國科學家們獨立取得的功績。

儘管中蘇關係暫時改善了，但很快就表明，新的蘇聯領導層並沒有對赫魯曉夫確定的方針改弦更張。北京重新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裂縫擴大了。全世界共產主義政黨中有幾個表示同情北京的強硬立場，而其他政黨則分成了親華派和親蘇派。蘇聯不斷嘗試把中國人驅逐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均沒有成功。

領土爭端

對中蘇邊界4,150英里的領土爭端、沙皇俄國及史太林施加給中國人的嚴重傷害意識，與意識形態爭論和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問題糾纏在一起。毛澤東立意要奪回所有喪失的領土和權利。

²⁸ 外交部長陳毅對一批斯堪的納維亞記者發表的聲明，由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7, 1966 報道。

²⁹ Harold C.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66), 478–82.

中國人對喪失領土的怨恨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與俄羅斯簽訂的最初兩項條約，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和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雖然一般都被認為是公平的條約，但中國仍因此分別丟失了93,000平方英里和40,000平方英里的領土。其餘那些與俄國簽訂的條約毫無疑問是不公平的：1858年的《璦琿條約》將黑龍江流域185,000平方英里的領土割讓給了俄國，這塊地方成了阿穆爾省；1860年的《北京條約》確認了《璦琿條約》，另外還割讓了烏蘇里江以東的133,000平方英里領土，它成了俄國的濱海省；1881年的《聖彼得堡條約》割去了15,000平方英里的中國領土。在1912年民元革命時期，俄國煽動蒙古獨立運動，承認外蒙古的「自治」，將它變成了一個實際上由俄國保護的國家。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中國在1919年重新獲得了對外蒙的控制，但蘇軍在1921年7月入侵蒙古，恢復了它的「獨立」，同時吞併了唐努圖瓦。³⁰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成為蘇聯的第一個衛星國，以庫倫為首都，現被稱作烏蘭巴托(意為「紅色英雄」)。隨後，根據1945年2月的雅爾達協定，以後又經1945年8月14日的中蘇條約確認，蘇聯重新獲得了1905年俄國戰敗後割讓給日本的沙皇在東北的一切特權和特殊利益。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史太林還從毛澤東那裏強行索取了許多屈辱性的讓步。

與中國所有的愛國者一樣，毛澤東一直想糾正中國在以往遭受的傷害。早在1936年，他對美國記者斯諾說，「中國直接的任務是取回我們所有的失地」，包括外蒙，它應成為「中華聯邦」的一個部分。³¹

1963年3月8日，北京開列出一份失地的清單，包括西伯利亞南部、濱海省和俄國中亞地區的至少500,000萬平方公里領土。北京要求蘇聯書面承認，目前的中蘇邊界是諸多「不平等」條約因而也是「不合法」條約的產物。莫斯科否認與任何鄰國存在領土問題，拒絕承認與中國舊有條約的不合法性。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對來訪的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說：「大約一百年前，貝加爾湖以東的地區成了俄國的領土，從那時之後，海參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區才變成了蘇聯的領

³⁰ Tai-sung An, 50-51.

³¹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61), 96.

土。這筆帳我們還沒清算呢。」³² 莫斯科譴責毛澤東的聲明，稱它令人想起了希特拉尋求「生存空間」的說法。赫魯曉夫公開駁斥說，如果說沙皇俄國是擴張主義者的話，中華帝國也彼此彼此；這兩個國家都從別人那裏搶奪了土地，它們的行為應相互抵銷。因此，1964年2月25日在北京開始的邊界談判毫無成效，在同年10月15日就破裂了。在這之後，邊境衝突的頻率越來越高，烈度也越來越大。到1968年11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領導決定對領土糾紛採取強硬態度，大規模衝突顯得不可避免了。

據中國方面聲稱，從1964年談判破裂到1969年3月，蘇聯共侵犯中國邊界4,189次。邊境的緊張局勢日益加劇，進而在1969年3月2日和3月14-15日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爆發了兩次大規模的衝突。中國和蘇聯都聲稱珍寶島是自己的領土，這個島嶼位於東經133°51′、北緯46°51′，大約有一英里長、三分之一英里寬。中國人堅持稱，這個島嶼在歷史上曾是中國江岸的一部分，在晚夏季節低水位期間，中國人徒步涉水就能到達該島，而且中國的漁民一直用它來曬漁網。蘇聯人則爭辯說，他們從1922年起就在這個島上設立了一個哨所，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們於1950年撤銷了這個哨所；此外，中國人定期申請借用珍寶島的事實，就可證明蘇聯擁有這個島嶼。

3月1-2日夜間，約三百名偽裝的中國戰士抵達珍寶島，在一片灌木地帶開挖散兵坑，準備打伏擊。翌日上午約十一點鐘，看上去沒帶武器的中國人列隊走向俄國人；當他們走到敵方面前二十英尺遠時，第一排人迅速閃到旁邊，第二排人便開槍射擊，打死了七名俄國人，包括他們的長官。其他一些中國戰士從隱蔽處衝出，一舉解決了這支蘇軍隊伍，俘虜了十九名士兵和大批蘇軍裝備。俄國增援部隊最後抵達該島，逐走了中國人。雙方都宣稱取得了勝利，同時指控對方進行了侵犯。

3月14-15日的第二次衝突是俄國人發起的報復行動，投入了坦克和許多士兵。戰鬥從上午十點打響，持續了九個小時，造成了六十名

³² Tai-sung An, 76, 82.

俄國人和八百名中國人傷亡。³³ 雙方都竭力渲染衝突事件，舉辦展覽會揭露對方的殘忍，組織龐大的示威遊行以鼓動民族情緒和戰爭恐怖。隨後在黑龍江八岔島和新疆邊境線上發生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了戰爭的急迫感。

戰爭危機

1968年蘇聯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宣稱，如果其他共產主義國家被認為背棄社會主義事業，蘇聯有權干涉這些國家的內部事務。中蘇邊界衝突緊隨著這些事態爆發，衝突引發了蘇聯進攻中國的不祥前景。事實上，莫斯科的一些較為大膽的軍政首腦認真地建議，對中國的原子彈試驗基地實施一場先發制人的核打擊；並試探拉上美國一起幹或至少讓美國默許的可能性。先是蘇聯駐東京和坎培拉(Canberra)使館的武官，後來又是更高級別的官員，向美國提出了聯合打擊中國的建議。但尼克遜(Nixon)總統下令對此作「激烈的、憤慨的反對」。³⁴ 1969年9月1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出席完胡志明的喪禮乘飛機回國，在飛抵伊爾庫茨克附近上空時，接到指令返回北京，在那裏，他與周恩來在機場進行了三個小時的會談。他們達成了以下諒解：應該在不使用武力的條件下簽訂一項協定，維持邊境現狀，防止軍事衝突和摩擦，在有爭議地區隔離軍隊，通過談判解決所有邊界問題，互不侵犯。在這次會晤後，邊界糾紛平息了，並且於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復了高層談判。然而，在1970年7月，蘇聯再次向美國建議，應達成共同協定，以對付中國或其他任何核國家的任何「挑釁行動」。這項建議不僅涉及到中國，還牽涉到北約同盟內的核國家，因此遭到了華府的拒絕。³⁵

³³ Thomas W.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March 1969 Clash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VI:4: 1199 (Dec. 1972).

³⁴ Joseph Alsop, "Thoughts out of China — (I) Go Versus No go,"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1, 1973, 31.

³⁵ John Newhouse, *Cold Dawn: The Story of SALT* (New York, 1973), 188–89.

在北京重新開始的邊界談判中，中國人並不要求全部歸還割讓給俄國的所有領土；但是，他們堅持要以舊的條約作為談判基礎，全面解決邊界問題，另外堅持要蘇聯承認，沙俄的舊有條約是不平等和不合法的。中國人要求，超出沙俄舊條約之外蘇聯得到的所有領土應無條件還給中國，包括烏蘇里江和黑龍江七百個島嶼中的六百個，總計約400平方英里的陸地面積，另外還有在新疆帕米爾山區的12,000平方英里土地。為論證這些要求，北京援用了國際法中的「主航道」原則，即按照界河「主航道」的中心線劃分邊界，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屬於這種情況，據此，中國將擁有這六百個島嶼，包括珍寶島和八岔島。至於帕米爾段邊界，中國人宣稱，它是由俄國軍隊破壞1884年邊界議定書而非法佔領的。³⁶

蘇聯代表主張，由滿清政府與沙俄簽訂的那些條約並非「不平等」，從法律和歷史來說，中俄邊界業已確定。雖然蘇聯人現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來改變邊界，但願意為了表示他們的善意，在一些特殊的邊境地區，也即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新疆和海參崴地區，做一些小的修正。至於帕米爾段邊界和黑龍江、烏蘇里江，蘇聯人則否認在帕米爾有任何非法佔領的情況，同時還反對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按「主航道」原則劃界，堅持那六百個島嶼屬於蘇聯。談判中沒有達成任何協定或可接受的妥協。

顯然，雙方都在利用談判來拖延時間，以達成其他目標。到1973年年中，蘇聯已將他們在中蘇邊境的兵力增加到了二百多萬人，而且配備有導彈和核武器，另外還在太平洋駐紮了至少150艘軍艦。他們還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周圍部署了約一百枚被稱為「加洛什」(ABM)系統的反彈道導彈，以獲取對中國的第一次打擊優勢。³⁷ 與此同時，他們努力尋求與西歐尤其是西德達成諒解，以求避免兩線作戰。中國也

³⁶ Tai-sung An, 109, 114–115; Robinson, 1180–81.

³⁷ Peter S. H. Tang, "Russian Threat to Chin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2, 1972; Shinkichi Etō, "Motivations and Tactics of Peking's New Foreign Policy," 33–34. 在1973年6月24–30日德國東亞研究協會施洛斯—雷森堡 (Schloss Reisenberg) 國際會議上宣讀的論文。

調集至少一百萬人增援邊境地區，並作出了巨大的外交政策轉變，以求與美國、日本達成諒解，打破帝國主義包圍圈，防止美蘇可能勾結起來。避免兩線戰爭是毛澤東的最關心的問題。同時，中國在最壞的可能性上看，在各大城市修建龐大的防空洞網絡，配備有水、食物和醫療設備。坐落在新疆羅布泊的核設施悄悄地搬遷到了西藏腹地某些不知名的場所，而舊的基地則偽裝成很逼真的原子彈設施。中國的短程導彈被部署來打擊海參崴、伊爾庫茨克和其他靠近邊境的蘇聯城市，射程在1,200到2,300英里之間的中程導彈則用來打擊西伯利亞和蘇聯中亞地區的目標。到1973年，射程達3,500英里、能夠打到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中程導彈投入了生產，1980年，中國又掌握了6,000英里射程的洲際導彈。³⁸ 中國迅速發展了第二次打擊能力。從軍事上來說，蘇聯不受懲罰地發動核襲擊的時機早已過去了，而從外交上來說，國際社會也不會容忍這樣一種核打擊。據報道，尼克遜在1972年5月訪問莫斯科時，「以最坦率的措辭」警告勃列日涅夫，蘇聯進攻中國將威脅世界和平，並將被看作是觸犯美國的國家利益。勃列日涅夫直截了當地質問，美國是否有資格充當共產國家間事務的仲裁人。然而，蘇聯盼望獲得美國的小麥、技術和諒解，這大體上阻止了莫斯科對美國的警告置若罔聞。一些強大的歐洲共產黨，如義大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等國的共產黨，也強烈反對蘇聯進攻中國。此後，勃列日涅夫設想了一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試圖通過加強蘇聯與印度、日本、北朝鮮和印度支那國家的聯繫來包圍中國。但除了對印度和越南之外，這個計劃沒有產生甚麼效果。

說到底，中國人正埋頭於社會主義改造、工業發展、領導問題和「接班」等事務，它不想開戰。蘇聯人也對中國問題頭疼不已，不知道究竟怎麼辦。克里姆林宮似乎在恐嚇與和解之間來回搖擺；1973年6月中旬，蘇聯提議簽訂一項互不侵犯協定，遭北京拒絕。³⁹ 隨後，在

³⁸ 據報道，到1973年年中，中國擁有15枚射程為1,200英里的導彈，15到20枚射程為2,300英里的導彈。1980年5月，中國試製成功了兩枚CSS-X-4型導彈，其射程為6,000到7,000英里。

³⁹ Robert A. Scalapino, "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Jan. 1974), 361.

1974年11月初，中國人出乎意料地建議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並提議根據1969年9月柯西金與周恩來之間的諒解，使有爭議邊界地區的雙方軍隊脫離接觸。但勃列日涅夫又對此嗤之以鼻。中蘇關係的狀態反映在1980年中國拒絕續訂三十年前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戰爭危險雖然降低了，但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卻延續了下去，這只能讓三角關係中的另一個主角美國佔便宜。真可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蘇關係受到以下三個障礙的影響：(1) 蘇聯支持越南侵佔柬埔寨，(2) 蘇聯入侵阿富汗，(3) 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重兵。中國堅持，兩國關係正常化應以消除這三個障礙為前提。在1987年蘇聯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慶典上，共產國家中只有中國未派正式的政黨代表團出席。不過，中國密切關注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 (Mikhail S. Gorbachev) 的「公開化」和「政治改組」政策的進展，因為中蘇兩國都在作同樣的努力以振興國內經濟。戈爾巴喬夫把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當作頭等大事。1987年11月，他要求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會晤，但鄧謝絕了這個提議，因為蘇聯還沒有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然而，在蘇聯開始從阿富汗撤出軍隊之後，兩國關係中的升溫趨勢清晰可見。1988年5月，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一項文化交流協定，據此，波爾索芭蕾舞團將赴北京作訪問演出，列寧格勒的修道博物館將與北京的故宮博物館進行交流展出。1988年下半年，所有迹象都表明，戈爾巴喬夫將在1989年5月與鄧小平作最高層次會晤，兩國之間也將隨即恢復正常關係。

參考書目

- Alsop, Joseph, "Thoughts out of China — (I) Go versus No go,"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1, 1973, 31, 100–108.
- An, Tai-sung, *The Sino-Soviet Territorial Dispute* (Philadelphia, 1973).
- Boorman, Howard L. et al. (eds.), *Moscow-Peking Axis: Strengths and Strains* (New York, 1957).
- Bridgham Philip, Arthur Cohen, and Leonard Jaffe, "Mao's Road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A View from Washington, 1953," *The China Quarterly*, 52: 670–98 (Oct.–Dec. 1972).

- Brzezinski, Zbigniew K.,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1960).
- Clubb, Edmund O., *China and Russia: The "Great Game"* (New York, 1971).
- Dittmer, Lowell,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945–1990* (Seattle, 1992).
- Djilas, Milovan,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tr. by Michael B. Petrovich (New York, 1962).
- Doolin, Dennis J.,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Documents and Analysis* (Stanford, 1965).
- Fitzgerald, C. P., "Tension 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Foreign Affairs*, 45:4: 683–93 (July 1967).
- Garthoff, Raymond,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New York, 1966).
- Garver, John, "New Light on 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Memoirs of China's Ambassador to Moscow, 1955–62,"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0, 303–07.
- Ginsburgs, George, *Sino-Soviet Territorial Dispute* (New York, 1975).
- Gittings, John,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Oxford, 1968).
- , "The Great-Power Triangle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China Quarterly*, 39:41–54 (July–Sept. 1969)
- Goncharov, Sergei N.,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94).
- Jackson, W. A., *The Russo-Chinese Borderlands* (Princeton, 1962).
- Jukes, Geoffrey, *The Soviet Union in Asia* (Berkeley, 1973).
- Kao, Ting Tsz, *The Chinese Frontier* (Chicago, 1980).
- Khrushchev, 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1970).
- ,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 by Strobe Talbott (Boston, 1974).
-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1986年）。
- Low, Alfred D., *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Since Mao Zedong: Dispute, Détente, or Conflict?* (Boulder, 1987).
- Maxwell, Neville, "The Chinese Account of the 1969 Fighting at Chenpao," *The China Quarterly*, 56:730–39 (Oct.–Dec. 1973).
- Mayers, David Allan, *Cracking the Monolith: U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55* (Baton Rouge, 1986).

Murphy, George G. S., *Soviet Mongolia: A Study of the Oldest Political Satellite* (Berkeley, 1966).

Patterson, George N., *The Unquiet Frontier: Border Tension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Hong Kong, 1966).

Robinson, Thomas W., "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March 1969 Clash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VI:4:1175-1202 (Dec. 1972).

Salisbury, Harrison 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1970).

Simon, Sheldon W., "The Japan-China-USSR Triangle," *Pacific Affairs*, 47:2:125-38 (Summer 1974).

Tuchman, Barbara W., "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 An Essay in Alternatives," *Foreign Affairs*, 51:1:44-64 (Oct. 1972).

Vucinich, Wayne S., *Russia and Asia: Essays on the Influence of Russia on the Asian Peoples* (Stanford, 1972).

Zagoria, Donald S., "Mao's Role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Pacific Affairs*, 47:2:139-53 (Summer 1974).

———,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1962).

———, "The Strategic Debate in Peking," Tang Tsou (ed.), *China in Crisis: China's Policies in Asia and America's Alternatives* (Chicago, 1968), II:237-68.

第二十八章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大躍進、人民公社、中蘇分裂加劇了中國領導層內部的分歧和緊張關係。一批比毛澤東更加務實的老黨員開始懷疑「領袖」制定的方針。他們覺得這些方針太冒進、太不穩當，並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最初結果感到失望，對毛澤東處理與蘇聯分歧的方式也頗為不滿；他們認為，繼續得到蘇聯的援助對中國的經濟、軍事和科學發展非常重要。他們對農業合作化和工業發展的過快步伐、在技術和軍備領域強調「紅」輕視「專」的做法，以及不斷發動消耗國民精力的群眾運動等事情產生懷疑。這些領導人長期以來協助毛澤東工作，實際控制著黨和政府的日常運作，因此他們認為自己身在其位，比高高在上的毛澤東更準確地瞭解國家的需要。他們憂心忡忡地覺得毛澤東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過於浪漫、過於倉促，決心要巧妙地阻止、規避或放慢他的政策之實施。這兩條路線的衝突在六十年代中後期引發了一場巨大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動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些領導人之所以執意要改變毛澤東的方針，是因為他們已經在過去幾年裏權力大增，尤其是在1956年中共改組以後。這次改組設立了四個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位、一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一個中央書記處。中央委員會主席不再兼任書記處首腦，書記處現由黨的總書記負責。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是權力的核心，它由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四個副主席和黨的總書記組成——代表著六個人的集體領導。毛澤東繼續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但劉少奇成了第一副主席並代行主席職權，鄧小平則被任命為總書記。通過這次改組，毛澤東退居「二線」，而將劉少奇和鄧小平推到了「一線」，大力提高他們的威信和地位。正如毛

澤東在十年後(1966年)回顧時說，他這樣安排的目的是，「在我去見馬克思時，國家可以避免大的混亂」。¹

有了新提升的職位，劉少奇和鄧小平感到有足夠的信心對重大的政策事務大膽發表意見。他們贊成採取較為溫和的行動方針，以求營造較為穩定的社會秩序，並使工業發展優先於農業集體化。而毛澤東卻繼續推進群眾運動，加快搞集體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速度。到1958年，中央委員會已被劉鄧牢牢控制了，它很快發現人民公社的想法「不妥」。1958年12月10日的六中全會通過了兩項決議，一項是修改公社制度，另一項是「接受」毛澤東不再擔任新一屆國家主席(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務的請求。毛澤東提出這項請求的理由是他要擺脫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用更多的時間來鑽研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著作。有關人士千方百計地傳達這樣的印象，即毛澤東是主動作出這個決定的，但實際情況是劉少奇不動聲色地「把他擠出了」國家主席職位。1966年10月，毛澤東本人評價這個事件說：「我對那個決定非常不滿，但我無能為力」。²他進一步抱怨說，他被當成「死人一樣供了起來」。³

1959年的經濟發展政策尤其值得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後果令人非常沮喪。土法上馬造成了巨大的原料浪費和高昂的生產代價，而生產出來的產品卻質量低劣。小高爐煉出的鋼材不能符合工業的要求，許多簡易的高爐還在暴風雨中坍塌。由於水利設施不健全、土壤施肥不當，農業生產也嚴重受損。為了趕上高額生產指標，機器超負荷運轉，又缺乏適當的保養，這造成了生產工具的迅速老化和損壞，而拼命招收不熟練工人也引發了管理上的麻煩。⁴人民公社造成了農業的減產而非增產。糧食產量從1958年的兩億噸下降到1959年的1.65億噸，再下降到1960年的1.6億噸。如果農業生產總指數以1957年為

¹ Gene T. Hsiao,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VII:6:392 (June 1967).

² 同上註，395。

³ James Pinckney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 1972), 477.

⁴ Kang Chao, "Economic Aftermath of the Great Leap in Communist China," *Asian Survey*, IV:5:851-58 (May 1964).

100的話，1958年為108，1959年跌到86，1960年又跌到83。工業生產指數相比之下好一些：假設1957年為100，1958年為131，1959年為166，1960年為161-163，1961年為107-110。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整體情況令人失望，從1958年的950億美元一路下降到1959年的920億美元、1960年的890億美元、1961年的720億美元。⁵總而言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最初幾年的結果是相當不讓人滿意的，人民中存在著巨大的不滿情緒。

務實派人士越來越對毛澤東的政策不滿。他們覺得，毛澤東是在用完全與時代不合拍的游擊戰思想來管理國家，作為一個大國的最高治理者與他原先作為革命家的成功角色相比，相差太遠。開始有人巧妙地暗示他的才能有局限性。確實，「三面紅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已造成經濟混亂和社會動盪，這促使務實派人士內心中對毛澤東路線的疑問與日俱增。他們大膽提出要改弦更張，哪怕冒觸犯領袖的風險。

彭德懷的下臺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委員會召開廬山會議，黨內第五號人物、主要的經濟設計師陳雲在會上主張採取幾項重大的變革，包括從人民公社退回到合作社，制定更切實的經濟發展規劃，與蘇聯進行有限合作，更多地強調「又紅又專」。陳雲的發言也許事先得到了劉少奇的首肯，而這無疑令毛澤東一派的人不快。⁶

國防部長彭德懷提出了更直率批評。彭德懷是毛澤東的老戰友，一名傑出的軍人，他剛剛對東歐作了為期三周的友好訪問回國，其間他在阿爾巴尼亞的地拉那會晤了赫魯曉夫。兩人討論了中蘇關係的惡化。彭德懷為勸說赫魯曉夫不要收回對中國提供核援助的諾言，輕率

⁵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Economic Assessment*,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72), 5. (以下稱作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Report*.)

⁶ Henry G. Schwartz,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Orbis* (Fall 1966), 813-14.

地透露了中國的混亂狀況和大躍進的缺點。赫魯曉夫鼓動他反對毛澤東。在彭德懷回國一個星期之後，蘇聯宣佈終止兩年前與中國簽訂的核技術協定，也許是希望以此來加強彭德懷對抗毛澤東的地位。在廬山會議上，這位鹵莽的國防部長散發了一份「意見書」，批評毛澤東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草率、過分」，指出混亂的原因是推行人民公社，而「小高爐」又浪費了20億元人民幣。他尖銳地批評：

我們被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迷惑了，一些左傾思想擡頭，總想一步跨入共產主義……按一些同志的觀點，政治掛帥就能替代一切……但政治掛帥不能替代經濟規律，更不能替代經濟手段。⁷

他把大躍進比作「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稱它是空想主義的「頭腦發熱」——這肯定諷刺了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彭德懷抨擊十五年超過英國工業產量的想法，斥責中國的經濟「大錯特錯」。他批評黨控制軍隊，呼籲建立一支擁有最新裝備的現代化職業軍隊。由此，他主張與蘇聯保持更密切的關係以便獲得新式武器的供應，他對毛澤東的「人民戰爭」觀念提出質疑，也激烈批評不斷讓軍人參加政治活動而分散其精力的做法。彭德懷的批評雖然尖銳，但他並未鼓動拉毛澤東下臺，只是主張修改他的政策。⁸

陳雲認為這樣批評毛澤東會產生反作用；影響他的更有效方式應該是，把他的政策所造成錯誤的事實和資料擺到他面前，讓他自己做決斷。這樣毛澤東就不會感到受人挑戰，也許就會自行終止或緩和大躍進的進程。⁹

⁷ Stanley Karnow, *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1972), 117–19.

⁸ 關於廬山會議衝突的描述，參見David A. Charles, “The Dismissal of Marshal P’eng Teh-huai,” *The China Quarterly* (Oct.–Dec. 1961), 8:63–76; Robert S. Elegant, “Mt. Lu Meeting Paved Way for Turbulence in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Dec. 17, 1967; Karnow, ch. 6, “The Marshal vs. Mao.”

⁹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Report*, 55.

不出所料，彭德懷的批評之激烈震驚了毛澤東，他稱之為「大有炸平半個廬山之勢」。彭德懷一向以性格急躁著稱，因此，如果他不是剛剛同討厭的赫魯曉夫會晤過的話，他空前尖銳的批評或許能被容納。但是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勾結卻是不可饒恕的，而且很自然地使他成了一個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要求建設現代化裝備的職業軍隊，這種主張將必然導致更多地依賴蘇聯的援助，並使中國有限的資源分散到軍事上去，這就需要重新調整政策重點的主次緩急。毛澤東後來指責赫魯曉夫參與了「反對兄弟黨的幕後分裂活動」，還抨擊彭德懷「賣國」、「在外國唆使下散佈不和」，這表明，毛澤東對彭德懷與赫魯曉夫之間的「曖昧」關係極其惱火。¹⁰ 彭德懷顯然指望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支持，但這兩人都不能給他撐腰，於是他失敗了。

毛澤東對待彭德懷氣急敗壞，但對其他人則持調和姿態。他主動道歉，承認不恰當地倡導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人都有缺點。就連孔子也犯過錯，馬克思也有錯。他認為在他有生之年歐洲會發生革命。我看過列寧的手稿，上面到處有改動。他也犯過錯誤。」毛澤東是個爐火純青的策略家，他不是推卸責任，而是自責對經濟災難負有責任：「我自己專注搞革命，對搞建設不在行，我不懂工業規劃。所以不要寫我領導有方，因為我還從來沒有管理過這些事情。但是，同志們，我應該對1958年和1959年負主要責任。要罵就罵我吧。」¹¹ 他言下之意是，他的錯誤是指導有誤；其他人的責任是跟他犯更多錯誤。然後，毛澤東話鋒一轉，聲稱中共是集體領導，責任必須分攤。¹²

毛澤東堅持，挫折是暫時的——「十年後再回頭看一看，我們是對還是錯」。¹³ 他用一種不可抗拒的氣勢警告說，要是他得不到支持，他就到農村去，再發動一支農民武裝推翻政府。「但是，我想你們是會跟我走的。」事情到了這一步，政治局委員都表示擁護他，毛澤東勝利

¹⁰ Karnow, 116.

¹¹ 同上註，121。

¹²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1971), 395, 400.

¹³ Karnow, 119.

地結束了廬山會議。1959年9月17日，彭德懷元帥被解除了國防部長職務，並由林彪接替。¹⁴毛澤東宣佈大躍進的高速步伐跨完了，「不再允許搞浮誇風」。他至少暫時默認了溫和政策。

緊縮和鬆綁

廬山會議後的三年中，出現了農業歉收、氣候惡劣、工農業減產和蘇聯撤走專家等不幸事件，這種情形使中國不得不採取了鞏固和務實的方針。國家正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失調。1961年春，劉少奇考察了湖南。雖然畢生的鬥爭經驗已經使他性格變得非常堅強，但他還是被人民的赤貧狀態深深打動了。到處是疲倦、辛酸和冷漠的景象。劉少奇私下評論說：「這些問題不是由天災害引起的。它們是人為造成的。」意思是毛澤東造成的。

務實派領導人於是決定開展一項支援農業的緊急計劃，並執行一項鬆綁政策以調動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在劉少奇的指導下，中央委員會於1962年1月通過了「三自一包」的國內方針，以求消除毛澤東「三面紅旗」運動的後果。「三自」包括允許農民耕種自留地、自辦私人小作坊、在自由市場上出售產品。「一包」是農民承包政府規定的農業生產指標，要求保證完成。在對外事務上，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三和一少」政策：「三和」是指緩和與「帝國主義、反革命和修正主義」的衝突，「一少」是指減少對國外民族解放運動的援助。¹⁵

毛澤東警覺到可能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新官僚階級擡頭和與蘇聯修正主義妥協的前景。如果這些趨勢持續下去的話，他畢生所做的動員群眾的努力將付諸東流，黨將會失去群眾基礎，國家將再次淪落到要依賴蘇聯。

毛澤東對黨員幹部不願進行繼續革命的傾向感到憂慮。他覺察到

¹⁴ 彭德懷的助手、總參謀長黃克誠也被解職，接替他的是以前負責警衛工作的羅瑞卿。

¹⁵ 根據1964年下半年周恩來在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引自Solomon, 419。

他們中存在著追求安逸、尋求物質刺激和工資待遇的傾向，這無疑將導致黨越來越官僚化，並促使個人主義擡頭——與之相應，革命熱情將會喪失，一個類似於蘇共「官僚集團」的新官僚階級將會產生。這些官僚將努力維護現狀，拋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損害集體經濟，培養出脫離群眾的精英主義。毛澤東發覺這些傾向極其可怕。中國絕對不能仿效蘇聯模式，赫魯曉夫的那套使政府「自由化」及與西方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思想極其有害，它們的影響必須予以消除。¹⁶

毛澤東同樣擔憂，年輕人中缺乏革命鞭策，教育制度不健全。文藝界中也存在危險的訊號：黨員知識分子不創造反映社會主義改造的作品，許多人似乎退回到了舊的文化傳統。1962年11月，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山東發起了「孔子討論會」，紀念這位哲人逝世2,440周年。在毛澤東派看來，這次活動是處心積慮地宣揚舊的「仁心」仁政觀念，破壞「毛澤東加強政治鬥爭的成果」。¹⁷

為了扭轉這些狀況，毛澤東在1962年9月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強調搞階級鬥爭。幹部和知識分子被下放到農村向群眾學習。他們受鼓勵去創造反映社會主義改造真實面貌的作品。但許多人覺得「下放」運動是一場痛苦的折磨而非值得懷念的經歷。1964年，在毛澤東夫人江青的主持下，一些新的革命文藝形式出現了——比如，戲劇《奇襲白虎團》和芭蕾舞《紅色娘子軍》。但是，對這種新動向出現抗拒。北京市市長彭真公開表示愛好京劇，並贊助一些舞臺作品，與江青的革命樣板戲唱對台。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無所成效，因為執行這場運動的黨不贊成毛澤東的觀點，不回應他的指導。毛澤東逐漸認定，問題不出在他的政策，而是出在黨內的高級領導人身上，他們狡猾地拖延、阻撓、歪曲、沖淡政策的實施。毛澤東堅持認為，大躍進以後出現困難的主要原因是黨的路線錯誤，再加上1959–1961年的農業歉收和1960年夏蘇聯撤走技術援助。¹⁸

¹⁶ 毛澤東在1967年對馬爾羅 (André Malraux) 說的話，引自Daubier, 11。

¹⁷ Solomon, 449.

¹⁸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Report*, 21, 54.

權威問題也變得很敏感。毛澤東有一個根本的信念：「在全國範圍內應該有一個擁有絕對決策權的最高中心權威——『中央』」，而劉少奇一派人的行為則對這個信念提出了挑戰。六十年代中，毛澤東無疑是這種中央權威的生動體現。¹⁹ 但是，如果黨敢於違背他的意志，如果劉少奇執行另一套方針的話，毛澤東的絕對權力肯定要遭到削弱。

說到底，毛澤東感到，他選定的接班人劉少奇正在暗中破壞他畢生建立起來的權威、他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和他的領導風格。中共越來越遠離他，遠離群眾，而且不願開展鬥爭去反對知識分子中的「右派傾向」、農民「搞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和滑向蘇聯修正主義的勢頭。毛澤東無法說服自己去相信，中共和劉少奇能在他死後執行革命任務。他決心給予他們一場徹底的震撼，改變權力結構，促使人民的思想 and 行為方式發生一場「不可逆轉的轉變」。²⁰

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據當時與毛澤東很接近的林彪稱，早在1962年，毛澤東就「最早預見到了劉少奇及其一小撮人反革命陰謀的危險」，他想奪回黨的「一線」控制權，但沒有成功。²¹ 到1964年年中，毛澤東已經非常懷疑劉少奇是否適合做他的接班人——他認為劉少奇會背叛他，就像赫魯曉夫背棄史太林一樣。²² 由於越南戰爭不斷升級，劉少奇建議修復中蘇同盟。這時，毛澤東在1965年1月25日一次黨的會議上決定，必須剝奪

¹⁹ Benjamin Schwartz, "Thoughts of Mao Tse-tung,"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 8, 1973, 29.

²⁰ Stuart R. Schram, "Introduc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Stuart R. Schram (ed.),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Eng., 1973), 85.

²¹ Harrison, 492; Solomon, 453.

²² Solomon, 459.

劉少奇的接班人資格及徹底打破黨的組織，以便隨後對中共進行改組。²³

毛澤東想重新確立他至高無上的權威、他的革命路線和工作作風，激勵年輕人，動員群眾；他想同舊風俗、舊習慣、舊文化和舊思想作鬥爭——他要通過一場直接的清洗來達到目標。對健康的考慮也許加劇了他的緊迫感。1964年，他已年屆71歲，患有帕金森氏綜合症，並可能在該年秋天得了一次中風。他對斯諾說「他很快就要去見馬克思了」，1965年8月，馬爾羅注意到他身邊站著一名護士。毛澤東很有可能感到，他能用來糾正所看到問題的時間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槍是由上海《解放軍報》總編輯姚文元打響的。1965年11月10日的《文匯報》刊登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點名批判吳晗。吳晗曾當過大學教授，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²⁴ 吳晗以前寫過一篇文章「海瑞罵皇帝」，用筆名發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當時是國防部長彭德懷被撤職前不久。海瑞是十六世紀中葉的一位明朝官員，據說曾這樣責罵過皇帝：「天下的人不滿意你已經很久了，內外臣工都知道。一意玄修，只想長生不老，你的心迷惑了；過於苛斷，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為是，拒絕批評，你的錯誤太多了。」²⁵ 這個故事後來被改編成歷史劇，題為《海瑞罷官》，刊登在1961年1月的《北京文藝》上。在這個新編劇中，海瑞被描寫成一個忠臣，他上書要將被富裕地主搶佔的土地還給農民，遭到皇帝的厭惡，由此丟掉了巡撫官職。後來毛澤東一派的人認為，作者是用皇帝來影射毛澤東，用被罷官的海瑞來代表彭德懷。正如毛澤東後來在1967年12月21日說的那樣：「彭德懷就是『海瑞』」。²⁶

北京市政府的另外兩個人批評領袖人物時更尖銳。他們是北京市

²³ Edgar Snow, "Mao Tse-tung and the Cost of Living: Aftermat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ew Republic*, April 10, 1971, 19.

²⁴ 他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民盟成員。

²⁵ Chün-tu Hsüe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eadership Crisis in Communist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LXXXII:2:173 (June 1967).

²⁶ Solomon, 479.

委書記、北京市委理論雜誌《前線》總編、曾擔任過《人民日報》總編(1954-1959年)的鄧拓和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從1961年10月10日到1964年7月期間，吳晗、鄧拓和廖沫沙三個人用「吳南星」²⁷作筆名，在《前線》雜誌上聯合發表了67篇文章，又被毛澤東一派認為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評偉大領袖毛澤東。鄧拓特別敢說話，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之間，他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153篇文章，總標題為「燕山夜話」。發表在1961年6月15日的一篇「夜話」，用譏諷的語調把大躍進比作是建造空中樓閣。另一篇刊登在1962年7月25日《前線》上的文章「專治『健忘症』」中有以下這些話：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無所不有。其中有一種病症，名叫「健忘症」。誰要是得了這種病症，就很麻煩，不容易治好……得了這種病的人……說過的話很快就忘了，做過的事更記不得了……慢慢地變成喜怒無常，說話特別吃力，容易發火，最後就發展為瘋狂……另一個症狀是他有時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為瘋子。如果發現有這兩極化任何一種的現象，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勉強說話做事，就會出大亂子。²⁸

這類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評毛澤東及其政策上的諷刺文章頻頻出現，表明這是由高層人物指導的協調動作。由於這三個作者均為北京市政府的成員，毛澤東一派認為，他們背後的人顯然是北京市市長彭真或黨內職務更高的某些人。毛澤東準備發起反擊，但北京市長將北京控制得密不透風，以至毛澤東覺得「水潑不進，針插不進」。²⁹ 1965年夏天，他悄然出京，前往上海，九月份在那裏召開了一次中央委員會部門工作會議，他在會上號召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一場大規模的反擊作好了準備。在毛澤東及其夫人的授意下，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以批判「海瑞罷官」劇本打響了文化大革命的

²⁷ 「吳」代表吳晗；「南」代表鄧拓的筆名「南邨」；「星」代表廖沫沙的筆名「繁星」。

²⁸ 引自Chün-tu Hsüeh, 175.

²⁹ 這是毛澤東的原話，引自Gene T. Hsiao, 397.

第一槍。吳晗被批判為鼓吹「人道主義」，缺乏「階級觀念」，因為他堅持說統治階級中的官員海瑞能夠理解並幫助另一個階級，也即農民階級。其他針對吳晗、鄧拓和廖沫沙的批判也接踵而至，這三個人被冠以「黑幫」稱號。他們的罪名是偽造歷史人物來諷刺偉大領袖，鼓惑人民學習舊的封建道德，混淆階級鬥爭，鼓吹復辟土地和經濟私有制度。

毛澤東選擇吳晗作為第一個攻擊目標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也是與鄧拓和廖沫沙為伍的重要知識分子，對他進行聲討必然會牽出另外那兩個人，或許還能牽出市長彭真。如果能證明彭真是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黑幫成員的話，彭真的保護人劉少奇也就逃脫不了關係。由於他們對毛澤東經濟措施和「個人崇拜」做法的批評與赫魯曉夫對史太林的批判很相像，他們就能被斥責為修正主義者。這樣，一場文學和文化的革命就擴大成一場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殘酷的權力鬥爭。

全面清洗

吳晗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在1965年12月30日做了檢討，承認在劇本中沒有運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毛澤東派的人仍不滿意，堅持要查明「真相」。劉少奇顯然不知道這場批判運動的深淺，也相信自己能控制黨的機構運轉，他在1966年3月26日離開北京，按預定計劃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進行國是訪問。就在他離京這一天，身為副總理和政治局第八號人物的北京市長彭真銷聲匿迹了。

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是軍隊支持毛澤東及其政策的明確宣言。在劉少奇出訪期間，毛澤東派的人圍攻中共北京市委，要求黑幫認罪。5月初，毛澤東在上海的代言人姚文元控告說，劉少奇一派人企圖用彭真來取代周恩來，並想要犧牲林彪來為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及其修正主義路線平反。5月16日，由毛澤東的私人秘書陳伯達主編的《紅旗》雜誌刊登一篇文章，其中質問說「誰在包庇鄧拓及其一夥？」6月1日，毛澤東派的勢力接管了《人民日報》，該報隨後便姍姍來遲地加入了文化大革命。

與此同時，毛澤東的健康看上去有了好轉：1966年7月，他暢遊長江以顯示他的活力，並鼓勵年輕人與他一道「乘風破浪」，體驗革命經驗。³⁰ 毛澤東證明自己在體力上有能力指揮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依靠軍隊來衝擊黨，這使林彪的權力和威信迅速上升。毛澤東於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此時林彪及其軍隊已確保了北京無虞，林彪成了鐵腕人物和堅決支持毛澤東的頂梁柱。8月1日，毛澤東提名林彪擔任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也即權力階梯中的第二號人物，而劉少奇則跌落到第八號。毛澤東和林彪肩並肩檢閱了正在成立的「紅衛兵」，毛澤東親切地稱林彪為他「最親密的戰友」。8月5日，毛澤東寫了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

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七項重要決定。這次會議將「黨內當權派」和「走資派」定為打倒對象。它號召建立「紅衛兵」，作為推廣運動的「戰鬥隊」，使革命從北京擴大到各省——繞開由劉少奇控制的黨組織和共青團。它號召建立各級長久性的「文化革命小組、委員會和代表大會」，運用毛澤東關於群眾路線、階級鬥爭和矛盾論的思想。1966年11月22日，成立了一個十七人的中央文革小組，由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紅旗》雜誌總編）擔任主任，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這個委員會與林彪控制的軍隊和周恩來控制的國務院一起，成為毛澤東領導下的三頭馬車。林彪的權力尤其大，在文化大革命後半期，他似乎接管了搞清洗的大權。

年輕的紅衛兵把自己看成是「革命接班人」和「革命造反派」，獻身於消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他們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決心清除資產階級的影響和修正主義傾向。他們寫大字報，沒收私人財產，招搖過市，改換街名，批鬥衣著打扮時髦的人，羞辱外國外交官。到1967年春，紅衛兵的胡鬧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³¹

紅衛兵批判劉少奇是修正主義分子、中國的赫魯曉夫，強迫他和

³⁰ Solomon, 464, 476.

³¹ William W. 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 1973), 392.

夫人接受公開批鬥。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在他的住處周圍遊行，要求將他撤職。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宣佈撤銷劉少奇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其他一些重要官員也受到衝擊，遭受羞辱，被撤銷職務，接受改造。他們中有黨的總書記鄧小平、紅軍的創始人朱德、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以及幾百個黨政領導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總理周恩來自始至終扮演了一個卓越的「衝突調解人」的角色。他支持毛澤東，與林彪的軍方和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組保持過得去的關係——與此同時，他努力發揮緩衝力量，以圖將混亂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他多次公開反對紅衛兵的過激行動。

正是由於周恩來的調解，在全國各級革命委員會中成立了由解放軍代表、「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代表組成的三結合班子——這樣就在各種不同派別中間達成了某種調和，不然的話，它們將會自行其是，把事情搞得亂七八糟。周恩來還保護了一些受紅衛兵衝擊的官員和將軍。1968年冬春之際，他保護了指導先進武器研究的國防科工委主任聶榮臻，使其免受好戰派分子干擾原子彈研究和武器計劃的威脅。總之，周恩來孜孜不倦地使文化大革命得到約束。

然而，軍隊的幫助不可或缺。1967年1月，毛澤東指示軍方干預恢復秩序。回顧歷史，這是個意義重大的決定，因為它給了林彪和解放軍一個大好時機，得以填補各級黨組織癱瘓所造成的權力真空，並得以將勢力滲透到工礦企業和其他機構。軍隊史無前例地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

紅衛兵造成的劇烈混亂或許震驚了最初鼓動他們起來的人。1968年7月，毛澤東接見了代表北京各大紅衛兵團體的五個學生領袖，批評他們「持極左傾向，搞派性，瘋狂地自相慘殺」。他含著眼淚說他們讓他傷心。

與此同時，召開自1958年以來第一次黨代會的籌備工作也密鑼緊鼓地進行著。第九屆黨代會最後於1969年4月開幕。這次會議一致推選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主席和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新的黨章重申毛澤東思想是黨和國家的政策指導，並規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中央委員會擴大為170名委員和109名候補委員，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軍隊首長和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

文化大革命回顧

毛澤東派的人歡呼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偉大的勝利，因為它重新確立了毛澤東的權威及其思想體系的絕對地位，毛澤東思想被認為是中國進步所必不可少的。它是一場有計劃的動盪，從一開始就由毛澤東領導部署。它被看成是一場連續不斷的整風運動的組成部分，這場運動必須隔一段時間就爆發一次，以確保黨的純潔和黨的路線的正確。³² 毛澤東在1967年告誡說，今後將要開展「一次、兩次、三次或四次文化大革命」。

顯然，文化大革命使林彪和軍隊得益，但在持久的動亂時期裏，毛澤東的妻子也令人矚目地上升到了國家的領導層上。六十年代初，在毛澤東的贊許下，江青對文藝改革產生了極大興趣，她推出了八部「樣板戲」。隨後她接管了新聞媒體，為爭取控制全國的文化和人民的思想做準備。為她寫傳記的美國作家這樣評價道：「她感到，她需要這樣來控制公眾的意識，包括群眾的承認，以便為她建立個人權力和權威打下基礎。」³³ 毫無疑問，她在背後推動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1965年，她陪同毛澤東去了上海，共同指示姚文元打響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槍；一年後，她被推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的位置上。她火箭式的上升當然是靠了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在清洗他的高級同僚時，無意識地，也可能是故意地，為她和她的追隨者建立權力基礎鋪平了道路，而她則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當她被問及文化大革命是否牽涉到接班鬥爭、是不是一場內部權力爭鬥時，她很爽快地承認說：「這樣說有些道理」。³⁴ 有人可能會說，無論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其他什麼樣的動機，他肯定為把他的夫人推向政治前臺打開了方便之門，使她有了最終爭取接班的條件。

回顧地看，文化大革命導致了十年的動盪和內部爭鬥，把國家推到了一片混亂和崩潰的邊緣。黨組織遭受了沉重的破壞，許多黨的領

³² Solomon, 476.

³³ 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1977), 380.

³⁴ 同上註，297。

導人或被清洗，或被撤職。工農業生產出現了嚴重的倒退，教育系統的癱瘓致使國家損失了整整一代訓練有素的人材。實際上，不僅是年輕一代人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還有許多中老年的學者和科學家也被送往農村幹活，失去了好多年做研究和教學的時光。這個損失影響了三代人。非常諷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竟然是反文化、反知識和反科學的，因為知識被看作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行為的根源。無數官員和百姓被錯誤地斥責為搞反革命活動，被逼得自殺或遭囚禁。然而，對那些一心要革命的人來說，為了確保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改造進程永不變色，無論代價多高、犧牲多大都在所不惜。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對文化大革命的權威性評價(參見第三十六章)。

參考書目

- Ahn Byung-joo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ynamics of Policy Processes* (Seattle, 1976).
- Barcata, Louis, *China in the Thro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 Baum, Richard,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1966* (New York, 1975).
- Bernstein, Thomas P.,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1977).
- Bettelheim, Charle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Changes in Management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New York, 1974).
- Bridgham, Philip,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29:1–25 (Jan.–March 1967).
- ,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to Seize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41:1–25 (Jan–March 1979).
- Brugger, Bii (ed.),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8).
- Chan, Anit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1985).
- Chao, Kang, "Economic Aftermath of the Great Leap in Communist China," *Asian Survey*, IV:5:851–58 (May 1964).

- Charles, David A., "The Dismissal of Marshal P'eng Teh-huai," *The China Quarterly*, 8:63–76 (Oct.–Dec. 1961).
-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5).
- Chen, Jo-hs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1978).
- Cheng, Chu-yüan, "The Root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eud between Mao Tse-tung and Liu Shao-ch'i," *Orbis*, XI:4:1160–78 (Winter 1968).
- Daubier, Jea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r. by Richard Seaver (New York, 1974).
- Dittmer, Lowell,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1975).
- Domes, Jü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London, 1985).
- Fokkema, D. W., *Report From Peking: Observations of a Western Diploma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ntreal, 1972).
- 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1987).
- Goldman, Merle, "The Fall of Chou Yang," *The China Quarterly*, 27:132–48 (July–Sept. 1966).
- Gray, Jack, and Patrick Cavendish, *Chinese Communism in Crisis: Mao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 Hsüeh, Chün-t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eadership Crisis in Communist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LXXXII:2:169–90 (June 1967).
- 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m, Md., 1996).
- Joffe, Ellis,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55:450–77 (July–Sept. 1973).
- Joseph, William A., *The Critique of Ultra-Leftism in China, 1958–1981* (Stanford, 1984).
- Karnow, Stanley, *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1972).
- Klein, Donald W., "Victim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27:162–65 (July–Sept. 1966).
- Laing, Ellen Jornston, *The Winking Owl: Ar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1988).

- Lee, Hong Yu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1978).
- , “Mao’s Strategy for Revolutionary Change: A Case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77:50–73 (March 1979).
- Leys, Simon (Pierre Ryckman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 from French ed., 1972), (New York, 1977).
- 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Man Who Made Modern China* (London, 1994).
- Lifton, Robert J.,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 Lo, Ruth Earnshaw, and Katharine S. Kinderman, *In the Eye of the Typhoon, An American Woma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87).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London, 1974).
- ,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1984).
- Michael, Franz, *Mao and the Perpetual Revolution* (Woodbury, N.Y., 1977).
- Nelson, Harvey, “Military Force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51:444–74 (July–Sept. 1972).
- Oksenberg, Michel et 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in Review* (Ann Arbor, 1968).
- Perry, Elizabeth J.,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1997).
- Raddock, David M., *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gchow* (Tucson, 1977).
- Robinson, Thomas W.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1971).
- Rosen, Stanley, *Red Guards Factionalism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 Social Analysis* (Boulder, 1981).
- Seybolt, Peter J., *The Rustication of Urban Youth in China: A Social Experiment*, ed. with an intro. by Thomas Bernstein (White Plains, N.Y., 1977).
- Schram, Stuart R., “Introduc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Stuart R. Schram (ed.),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Eng., 1973), 1–108.

- Solomon, Richard H.,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1971).
- Starr, John Bryan,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Mao Tse-tung's Theory of Continuous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XI: 6:610–28 (June 1971).
- Thurston, Ann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88).
-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38:63–91 (Apr.–June 1969).
- 20 Years On: Four View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08: 597–651 (Dec. 1986).
- Whitson, William W.,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 1973).
- Wang, James C. 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1976).
- Wu, Tien-wei, *Lin Biao and the Gang of Four* (Carbondale, Ill., 1983).
- Yan Jiaqi,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 by D. W. Y. Kwok (Honolulu, 1996).
- Yue, Daiyun, and Carolyn Wakeman, *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Berkeley, 1985).

第二十九章

林彪的垮臺及其後果

林彪在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取得勝利，並且顯得戰無不勝的樣子。林彪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澤東的接班人，在中共黨史上佔據了獨一無二的地位。中共黨章以前從來沒有規定過接班人的事項，新黨章的這一修改，反映了林彪的巨大影響和毛澤東對他的關愛。毛澤東信任地稱他為「最親密的戰友」，看起來已經選定林彪擔任中國日後的領導人。

林彪的顯赫權勢受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解放軍曾在文化大革命中發揮作用，因此逐漸在中國的政治結構中佔據了關鍵性位置。在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委員中，44.1%是軍方人員。2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4位元帥、6位將軍，還有林彪的夫人葉群——如果這些人在表決時投票一致的話，他們就達到了多數。在各省，軍隊的發言權也同樣巨大。有19名省革委會主任和20名省革委會副主任是解放軍人，這樣就佔據了一半以上的省級最高職務。此外，部隊中省級和地縣級的司令和政委人數，往往比同一級別的黨組書記和政府負責人多出一倍。¹

林彪的崛起

林彪出生於1907年，十幾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20歲不到就成了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長征時期，他一路打先鋒；內戰時期，他

¹ Ralph L. Powell, "Party Still Striving to Retain Control of 'the gun' in Chin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21, 1973, 11。其他研究刊載的數字有少許不同。

又統帥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戰軍，橫掃東北，揮戈直搗華南華東，戰無不勝。1954年，林彪被任命為副總理，一年後又獲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軍銜，並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58年當選為政治局常委。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同時也成為中央軍委的實際負責人，這一職務意味著主管所有的武裝部隊。他運用監督職權，改善部隊的戰備狀況及增強他們的政治可靠性。對全軍指戰員的思想教育，明確提出政治掛帥，黨「絕對指揮」槍。林彪保證部隊的政治委員掌握大權，享受特殊地位。林彪贏得了黨內同志的誇獎，被稱讚為「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思想。1961年他獲得了林「總」這個獨一無二的稱號。² 1962年對印度的自衛反擊戰的勝利，進一步提高了林彪與解放軍的威信和地位。

林彪每取得一點成就，就更加起勁地歌頌毛澤東，稱讚毛澤東思想是任何時候的精神指導。林彪的影響幾乎滲透到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軍人監督黨的活動，尤其是那些關係到生產和經濟管理的事務。這樣，軍隊一改中共滲透到軍隊的做法，反而將自己的影響擴大到黨政機關。核能力的開發進一步提高了林彪的地位和軍隊的威信。1966年10月第四次核子試驗之後所發表的聲明，最引人注目，這份聲明強調，參加這次專案的全體人員都「熱情地」響應了「林彪同志的號召」。³ 1965年9月，林彪發表了兩萬字的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之後，聲望隨之陡然上升，儼然不再僅僅是一個軍人了。林彪巧妙地利用了毛澤東關於組織農民反抗資產階級的思想，並提出處在世界「農村」地區的不發達國家，可以包圍並打敗處在「城市」地區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⁴ 由於這篇文章，林彪成為一名重要的理論家、毛澤東思想的解釋者和宣傳者。⁵

² Ralph L. Powell,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Lin Piao and the Party-Soldiers, 1959-1966," *The China Quarterly* (April-June 1968), 34:44.

³ *Peking Review*, 44, Oct. 28, 1966, special supplement, iii, 41, Oct. 7, 1966, 31.

⁴ Text in *Peking Review*, 36, Oct. 3, 1965, 9-30.

⁵ 《人民日報》，1964年12月29日；Chu-yüan Cheng, "Power Struggle in Red China," *Asian Survey*, VI:9:472-74 (Sept. 1966).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被進一步神化了。人們把毛澤東放到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行列的第一位——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太林都高——有意識地把毛澤東說成是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發展到新的高峰。1967年，林彪熱情地歌頌毛澤東：

正是當代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系統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檢驗經驗，科學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規律，提出一整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分發和政策。毛主席以他偉大的氣魄，高度的智慧，勝利地領導了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到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最大的標誌。⁶

1967年1月，毛澤東決定讓解放軍干預文化大革命以恢復秩序，這個決定對林彪和軍隊來說意義重大。他們通過參加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滲透到工業、農業和教育戰線，同時在全國範圍內擴大他們的權力。黨組織的癱瘓所形成的權力真空迅速地被軍方填補了。到1967年4月，林彪被普遍地稱作毛澤東「最忠實的支持者」和「最好的接班人」。在1969年4月的中共第九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上，林彪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他被指定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澤東的接班人。

林彪是一個精明的陰謀家，非常清楚自己的崛起有悖於毛澤東「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的格言。他明白自己的地位很脆弱，並且意識到，在他真正成為領袖之前，他的成功是不完全、不確定的。在這一時刻來臨之前，他必須竭盡全力保衛勝利的果實，確保繼承權。因此，他在公開場合千方百計地表明他絕對忠於毛澤東，總是像一個謙虛的學生一樣亦步亦趨地跟在毛澤東身後。但是，在這種諂媚舉止的表象背後，他孜孜不倦地擴大對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的控制。他的地位變得非常牢固，因此對他的接班權的任何挑戰都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衝突和混亂。從各個方面來看，林彪在1970年的地位顯得

⁶ *Peking Review*, Nov. 10, 1967；楷體為本書作者所加。

是固若金湯；他需要做的僅僅是耐心地等待權柄傳到他手裏。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充滿了變數，只有時間才能表明毛澤東的心裏究竟想些甚麼。

林彪的垮臺

中共的武裝力量歷來嚴格遵守前面提到的毛澤東的格言，克制自己不參與政治。朱德從1928年與毛澤東會師的那一刻起，就心甘情願地服從身為政治領袖的毛澤東，雖然他率領的部隊要比毛澤東的部隊強大。在隨後的歲月裏，政治掛帥原則從未受到懷疑。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也並不是自動進行干預，而是受毛澤東之命發揮政治作用，儘管這種作用正中林彪的下懷。⁷ 毛澤東這樣做是很不情願的，因為他別無選擇，只能依靠軍隊來衝擊黨，這個黨正在狡猾地敷衍或抵制執行他的政策。

但是，毛澤東已經懷疑林彪的意圖。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寫給妻子的一封信中，對林彪的一些觀點提出了質疑：

我的朋友〔林彪〕……擅長談論政變問題。這類想法以前從來沒有過，它讓我非常不安。我從不相信我的幾本小書能有那樣神奇的力量，但在他的倡議下，全國都來讚揚它們。這就好像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不得不〔同他〕走在一起，好像我別無選擇，只能同意。在重大問題上，這是我第一次違心地同意別人。⁸

隨著林彪繼續利用毛澤東的名義大肆搶權，毛澤東私下裏感到震驚，但他沒有採取任何直接的行動。然而，在九大之後，毛澤東開始改變立場，越來越多地依靠周恩來來重建黨內文職人員的勢力。還有證據表明，1968年秋，在清洗黨內幹部之力度的問題上，毛澤東與林

⁷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July–Sept. 1973), 55:451–52.

⁸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1972年公開發表。

彪已經產生了意見分歧。⁹毛澤東稱自己是「中左派」，並認為軍隊在清洗和對待黨員幹部問題上太積極、太猛烈了。

由於毛澤東對林彪越來越不信任，他在1970年3月決定撤銷國家主席職務。新起草的國家憲法中沒有規定國家主席職務事項，這樣就防止了林彪奪取這一職位。林彪感覺到有可能被剝奪接班人地位，遂堅持要求重設國家主席，但毛澤東卻在六個場合對林彪說，他認為毫無必要。林彪提議要在憲法中列上一條讚揚毛澤東的「天才」，也遭到了毛澤東的否決。毛澤東說：「我不是天才，讀六年孔夫子，讀七年的洋學堂，到二十五歲那年正是1918年開始讀馬列主義。我怎麼能是天才呢？……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¹⁰

1970年8月，在廬山舉行了九屆二中全會，會上第一次公開地爭論了這些問題——設國家主席、甚麼是天才，還有其他一大堆問題。起草新憲法的毛周派人士受到了挑戰，有人對新憲法的思路、權力結構和政治路線是否正確等問題提出了質疑。反對派林彪和陳伯達¹¹得到了一幫軍方要員的支持，其中包括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副總參謀長邱會作。毛澤東在1972年3月17日的一次報告中回憶說：「廬山會議上他們先搞隱蔽，後搞突然襲擊……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¹²這次「突然襲擊」從8月23日持續到8月25日中午，隨後就失敗了。襲擊的性質一

⁹ Claude Julien, "The Lin Piao 'mystery'," *Le Monde*, Dec. 30, 1971, 引自Philip Bridgham, "The Fall of Lin Piao," *The China Quarterly* (July–Sept. 1973), 55:429.

¹⁰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年3月17日第12號，標題為「毛主席視察外地期間與領導同志的談話記要（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全文轉載在1972年8月10日的臺北《中央日報》上。英文本見*Studies on Chinese Communism*, 6:9:18–24 (Sept. 10, 1972)。

¹¹ 陳伯達長期以來一直是毛澤東的私人秘書和講稿撰寫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上升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據稱，他覬覦周恩來佔據的總理職位，於是在反對毛周派集團的權力鬥爭中站到權勢猛增的林彪一邊。

¹²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年3月17日第12號。

直到1973年8月的第十次黨代會上才被揭露，當時周恩來把這次襲擊定性為兩次失敗的暗殺毛澤東行動中的第一次。

廬山會議標誌著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公開分裂，林彪竭力要保住接班人的位置，而毛澤東則努力想收回這個位置。毛澤東知道，如果倉促摧毀反對派勢力的話，勢必要冒觸發叛亂之險；故必須謹慎行事。他沒有直接與林彪衝突，而是把陳伯達當作「極左分子」和「政治騙子」開刀，並讓那幾個林彪手下的軍隊領導人做檢討，批判陳伯達的觀點。當軍隊領導人屈服時，陳伯達就銷聲匿迹了，而林彪也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周恩來隨後組織了一場簡短的運動批「五大幹將」——前面提到的四位加上林彪的妻子葉群，接著便宣佈問題解決了。

為了削弱林彪的地位，毛澤東採取了三種策略，分別被生動地稱作(1)「甩石頭」，即清洗陳伯達以告誡林彪；(2)「摻沙子」，即派他自己的人滲透進中央軍委以監視林彪；(3)「挖牆角」，即在1971年1月重組北京軍區以搗毀林彪的根基。¹³

隨著陳伯達被撤職及幾位幹將失勢，林彪知道下一個目標就輪到他本人。在1970年冬和1971年春，他逐漸得出結論，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武裝政變。¹⁴ 他派遣兒子林立果(空軍少將、空軍作戰部副主任)負責擬訂政變計劃，政變將得到一小撮鐵桿死硬分子的支援。1971年3月22日到24日間，陰謀分子秘密雲集上海，準備了「五七一工程紀要」¹⁵——在漢語中，「五七一」的發音與「武起義」幾個字的發音相近。在這份紀要中，毛澤東被冠以「B-52」的代號，林彪被叫做「首長」，他的追隨者則被稱作「聯合艦隊」。

這份計劃宣稱，「目前敵我雙方都騎虎難下。是生死搏鬥，不是

¹³ 同上註。

¹⁴ Bridgham, 436.

¹⁵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年1月13日第4號，揭露了這份「五七一」計劃，後來，周恩來簡要地對一些外國友人披露了該陰謀。這份紀要轉載在1972年4月13日的臺北《中央日報》上。英文摘要刊登於*Studies on Chinese Communism*, 6: 7:7-12 (1972年7月)。西方觀察家普遍承認這份來自北京秘密檔案的文件的可靠性。參見Robert E. Elegant, "China Politics still haunted by Lin Piao,"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 1973.

我們吃掉他們，就是他們吃掉我們」。¹⁶「紀要」把毛澤東說成是一個「虐待狂，疑心病十足的人」，並接著說：

B-52總是挑動一派鬥一派……他今天可能會對他需要獲得支持的人甜言蜜語，但明天他們可能就會被扣上捏造的罪名往死裏整……一旦他認為某人是他的敵人，他不把這個人整死就不會善罷甘休；只要得罪了他，他就會堅持到底——羅織各種罪名，讓對手承擔他自己犯下的罪行。¹⁷

「五七一」紀要接著談了行動手段：

B-52在我手中，敵主力鑑〔指中央高級負責人〕均在我手心之中。屬於自投羅網式。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先斬（局部）爪牙，逼迫B-52就範，逼宮形式。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轟炸、543〔大約是一種秘密武器，性能不詳〕、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隊。¹⁸

據說，這個計劃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而這也是很有可能的，因為林彪主張與蘇聯靠近，反對毛澤東和周恩來與美國緩和的政策，他的理由是，與華府資本主義勢力的任何妥協，都將構成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背叛。¹⁹

林彪指望他任命的許多外省軍隊領導人會因感激而支援他。但毛澤東是一位爐火純青的鬥爭大師。為了防止發生軍事對抗，於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視察了南京和廣州，向軍區將領們強調他們需要放棄參與政治。這些地方軍事首腦被毛澤東嚴肅的態度懾服，也意識到

¹⁶ 「五七一」檔案。

¹⁷ 譯自臺北*Free China Weekly*, April 16, 1972; Bridgham, 439.

¹⁸ Robert Elegant,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 1973.

¹⁹ 據一份資料稱，白宮通過深入克里姆林宮的以色列情報來源，很驚訝地獲悉了林彪的陰謀及其與莫斯科的秘密關係。尼克遜總統於是決定向毛澤東通報。在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會見周恩來期間，基辛格將這份情報傳遞給了周恩來。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資料出自於華盛頓*Evening Standard*報社駐倫敦記者Jeremy Campbell，其報道轉載在1972年1月30日的臺北*Free China Weekly*上。

反抗沒有用，於是便無奈地採取中立立場。在這次視察途中，林彪的死黨試圖刺殺毛澤東，但未能得逞。暴風雨就要來臨了。

從根本上來說，林彪的力量是依靠毛澤東的庇護和軍隊的支持。當他失去了毛澤東的恩寵和軍隊的大力支持時，只剩下身旁的一小撮鐵桿追隨者了。林彪不顧一切地策劃將「五七一」陰謀付諸實施，但一個同謀者突然告了密，此人叫李偉信，屬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林彪急忙調一架飛機到他在北戴河的避暑地，此地在北京以東175英里處。毛澤東命令所有飛機停飛。林彪的兒子設法搞到了一架編號為256的三叉戟飛機。儘管這架飛機沒有足夠的燃料、沒有駕駛員、連無線電操作員都沒有，但林彪一家三人和其他六人還是登機起飛，飛機朝蘇聯方向飛入蒙古。飛機試圖在外蒙古溫都爾汗附近的一個簡陋機場迫降以便加油，但機翼碰撞到地面，飛機墜毀，機上人員全都死亡。當天是9月13日。²⁰

林彪與毛澤東之間提前來臨的最後攤牌就這樣草草收場了。根據那位告密者的供詞來判斷，林彪的優柔寡斷似乎是垮臺的主要原因。在陳伯達被清洗及「幹將」挨批之後，黃永勝和林彪的妻子感覺到大禍臨頭，他們鼓吹行動，但林彪猶豫不決，喪失了主動權。相反，林彪和兒子考慮調動空四軍和空五軍佔領上海，將上海變為堡壘，以對抗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可能發動的軍事干預。萬一這個意圖失敗，林彪的部隊將撤退到浙江山區打游擊。²¹ 但是，這些計劃都沒有機會落實，因為在最後時刻竟沒有出現對抗。林彪在64歲上背著「叛徒賣國賊」²² 的名聲死掉了，而他的主要支持者則全部從政治舞臺上銷聲匿迹。

²⁰ 周恩來對二十一人組成的美國報紙編輯協會代表團發表的聲明，載於1972年10月12日的*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但是，關於林彪之死的一種非官方說法堅持稱，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澤東派人刺殺的。參見Ming-le Yao, *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 (London, 1983)。

²¹ 李偉信的交待材料附在「五七一」檔案後面，刊登在1972年4月13日的《中央日報》上。

²² 周恩來的聲明，*The New York Times*, Oct. 12, 1972.

毛澤東把林彪事件稱作是中共五十年歷史上第十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路線鬥爭，並告誡說以後還將出現許多次這類的鬥爭。鬥爭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作風，每隔七八年必然要有一次「大亂」（一種七年發作一次的瘁疾？）從這個角度來看，林彪事件是無可避免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鬥爭規律的副產品。言下之意是，所有那些包庇過像林彪這種壞蛋的人都無可非議。

中共十大，1973年

林彪及其死黨垮臺後，黨和政府中出現了許多空缺職位。二十一人政治局只剩下十人，政治局五個常委只剩下三人，即毛澤東、周恩來和病懨懨的康生。因此，有必要召開一次新的黨代會選舉新成員，填補空缺職位，同時也需要正式地批判林彪這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賣國賊、政治騙子和右傾機會主義者。「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意思是以左派的面目出現，實際上是搶班奪權，推行右傾目標。

新的權力結構 第十次黨代會於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開，中央文革小組在會上拼命搶奪權力，顯然是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江青和姚文元被選進了政治局，張春橋則進入了政治局常委會。最令人吃驚的是選舉了37歲的王洪文擔任黨的第二副主席，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王洪文從前是上海的一名棉紡廠工人，是張春橋的門徒。

國內外形勢評估 第十次黨代會上作了兩個重要報告。75歲的副主席周恩來作了第一份報告，37歲的王洪文作了第二份報告。周恩來大概代表了溫和的政府官員和黨員幹部，而王洪文則為激進的文革小組代言。周恩來尖銳地譴責了林彪的反革命活動——包括陰謀「刺殺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另立中央」，背叛九大的路線和政策，充當蘇聯「超級間諜」的賣國角色，企圖將中國淪為「蘇聯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王洪文初次亮相就在黨代會上作重要報告，並宣稱粉碎「以劉少

1921-1973年中國共產黨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基本資料*

大會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日期	1921年 7月	1922年 7月	1923年 6月	1925年 1月	1927年 4月	1928年 6月	1945年 4月	1956年 9月	1969年 4月	1973年 8月
持續(天數)	5						49	13	24	5
地點	上海	上海	廣州	上海	武漢	莫斯科	延安	北京	北京	北京
代表	12	12	27	20	80	84	547	1,026	1,512	1,249
主席團成員								63	176	148
副主席或主席團常委								13	1	5
重要報告							3	3	1	2
中央委員	3	5	9	10	29	31	44	97	170	195
中央候補委員	3		5		11		33	73	109	124
政治局委員						7	9	17	21	21
政治局候補委員								7	4	4
政治局常委								6	5	9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5	1	5
中央委員會全會						6	7	12	2	3
大會間隔(年-月)		1	0-11	1-8	2-3	1-2	16-10	11-5	12-7	4-4
黨員	57	123	432	950	57,967	40,000	1,211,128	10,734,384	—	28,000,000

* 資料引自「中共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資料簡表」，《中華月報》，第697期(1973年10月)，第39頁。略有改動。

資料來源：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The Tenth CCP Congress, Analysis and Documents* (Spring-Summer 1974, pp. 106-7)。經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 Press, Inc. 特別允許後複製。

奇和林彪為首的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就。這樣，就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一個正在進行的過程，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一直進行到九大，並將繼續進行下去，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每隔七八年必然會有一次大亂，因為，牛鬼蛇神出於階級本性，必然要跳將出來。王洪文強調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和培養年輕領導人的重要性。中國的未來在年輕人手裏，鬥爭和繼續革命將是中國人政治生活的重點。²³

參考書目

- Bao, Ruo-wang, and Rudolph Chelminski, "The Case Against Confucius," *Saturday Review/World*, May 18, 1974, 12.
- Barnett, A. Doak, *China After Mao* (Princeton, 1967)
- Bridgham, Philip, "The Fall of Lin Piao," *The China Quarterly*, 55:427-49 (July-Sept. 1973)
-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年1月13日第4號,揭露「五七一」計劃,轉載在1972年4月13日的臺北《中央日報》上。英文摘要刊登於*Studies on Chinese Communism*, 6:7:7-12 (July 1972)。
- ,《中發》,1972年3月17日第12號,標題為「毛主席視察外地期間與領導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轉載在1972年8月10日的臺北《中央日報》上。英文摘要刊登於*Studies on Chinese Communism*, 6:9:18:24 (Sept. 10, 1972)。
- ,《中發》,1973年9月8日第34號,轉載在1974年2月6日的臺北《中央日報》上。
- Chang, Parris, "The Anti-Lin Piao and Confucius Campaign: Its Meaning and Purposes," *Asian Survey*, XIV:10:871-86 (Oct. 1974).
- Domes, Jürge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Crisis: Doom of an Heir," *Orbis*, XVII:3:863-79 (Fall 1973).

²³ 報告作於1973年8月24日,8月28日被通過。全文刊登於*Peking Review*, Nos. 35-36, Sept. 7, 1973, 29-33。楷體為本書作者所加。

- ,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s Between Two Party Congresses* (Berkeley, 1977).
- Feng, Yu-lan, "Criticism of Lin Piao and Confucius and the Party's Policy Towards Intellectuals — My Understanding," *Peking Review*, 12:14–16 (March 22, 1974).
- Joffe, Ellis,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55:450–77 (July–Sept. 1973).
- Kau, Ying-mao, *The Case of Lin Piao: Power Politics and Military Coup* (New York, 1974).
- Oksenberg, Michel, "The Political Scramble in Mao's China," *Saturday Review/World*, May 18, 1974, 10–15.
- 《批林批孔文章匯編》(北京, 1974年)。
- Powell, Ralph L.,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Lin Piao and the Party-Soldiers, 1959–1966," *The China Quarterly*, 34:38–65 (Apr.–June 1968).
- , "Party Still Striving to Retain Control of 'the Gun' in Chin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21, 1973.
- Wich, Richard, "The Tenth Party Congress: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Succession Ques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58:231–48 (Apr.–June 1974).
- Yao, Ming-le, *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 (London, 1983).

中國重入國際社會

中美緩和

1971年7月15日，尼克遜總統透露，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在7月9-11日間秘密去了北京，而他本人接受了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邀請。這個消息顯示中美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尼克遜總統的聲明震驚了國際社會，對日本的震動尤為強烈，因為美國一直阻撓日本與中國發展更密切的關係。這一「尼克遜震動」是外交上的一個重大突破，緩和了二十二年來對中國的敵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構成了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中的一個分水嶺。

美國政策的變遷 當1949年中共在內戰中取得勝利之際，杜魯門總統似乎聽任中共征服臺灣，並考慮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¹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共產中國的崛起雖然不稱心，卻也可以接受，因為它並不一定會威脅美國的安全和霸權。但是，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及隨後中國的參戰，改變了美國對外政策制定者的觀念。中國和蘇聯被看成是鐵板一體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這場運動決意要摧毀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毛澤東征服臺灣就不再被華府看作是中國內戰的必然結局了，相反，它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更大圖謀的組成部分。杜魯門於是派遣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有效地

¹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1971), 201.

阻止了中共佔領臺灣島——這樣就再次把美國推入了中國的內戰。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軍人在朝鮮戰死，華府也越來越敵視中國。杜魯門將遏制政策擴大到亞洲，加緊重建日本以平衡俄國和中國，使得與北京的和解成為完全不可能之事。而中國方面則宣佈執行「一邊倒」政策，表現出對於美國的承認和聯合國會員國身分毫不在意。

艾森豪威爾 (Eisenhower) 政府顯得更激烈地敵視北京。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堅信，共產主義不合人倫，且極具危險性，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尤其如此。美國不僅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還頑固地反對它加入聯合國。美國推行了一項對中國實施軍事包圍的政策，其中包括美國在朝鮮、日本、沖繩、臺灣、南越、緬甸和泰國保持軍事基地。為鞏固這些軍事基地，美國又通過《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與南朝鮮、泰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建立了一系列軍事同盟，並於1954年與臺灣的國民政府簽訂了共同防禦協定。根據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的觀點，「五十年代杜勒斯對北京發動的冷戰根本就是錯誤的、不必要的，它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完全誤解的基礎之上」。²

在國內，艾森豪威爾政府允許並暗中鼓勵麥卡錫主義，這個主義給美國對華政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國務院中的一些官員被指責為對「丟失中國」負有責任，³ 他們被解除職務，飽受羞辱，或是被調到一些無足輕重的職位上，那等於就是被流放。華府的官場中和那些在大學裏的中國問題專家頭上，瀰漫著一種非常不利於自由表達觀點的恐懼感。在這樣的境況中，任何要求與北京和解的建議都將招徠政治災難，並會冒被扣上搞綏靖主義和「同情共產主義」帽子的風險。雖然艾森豪威爾後來試圖與麥卡錫主義劃清界線，但這個主義的影響太強烈，足以阻遏任何積極的對華政策態度。眾所周知，杜勒斯習慣使用

² John K. Fairbank, "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Oct. 1972), 37.

³ 如John S. Service, John Paton Davis, John Carter Vincent, O. Edmund Clubb等人。

諸如「痛苦的重新評估」和「大規模報復」之類的咒罵性詞語，他極其不顧臉面，竟然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拒絕與周恩來總理握手。在1954年和1958年圍繞金門馬祖諸島的沿海危機期間，華府為國民政府撐腰，威脅要對中共使用核武器。⁴ 艾森豪威爾政府就這樣頑固地拒絕與北京改善關係。

雖然甘乃迪 (Kennedy) 政府總體上持自由派觀點，但也繼續執行「遏制和孤立中國」的傳統政策。艾森豪威爾警告新總統說，任何改變對華政策的舉動都將使他重返政壇唱對臺戲。⁵ 甘乃迪也認為形勢不利於搞創新和修改，1961年，他向國民政府保證，美國將繼續投票否決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他的國務卿臘斯克 (Dean Rusk) 認為中國是一個「東歐式的滿州國」(Slovanic Manchukuo)*，比起蘇聯來，中國更具冒險性，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更大。1962年的中印邊界衝突和中國的迅速取勝被大肆渲染，加深了華府的憂慮。因此，甘乃迪政府不僅不考慮緩和中美之間的敵意，實際上還加緊在越南活動，以加強美國在中國南部邊界的壓力，從而增強了中美之間的對峙。

六十年代初，中蘇分歧公開化，這戳穿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鐵板一體的神話，那種認為中國是俄國應聲蟲的觀點難以自圓，這也為同中國恢復邦交開了一個新機會。然而，華府對這種新的可能性視而不見，因為美國政策制定人相信，與中蘇兩國中的任何一方改善關係，將必然引起另一方的怨恨。鑒於毛澤東批判赫魯曉夫與西方和平共處的政策，也鑒於蘇聯對美國的軍事威脅更大，美國方面覺得，與莫斯科而非與北京取得緩和似乎更有利，也更可行。⁶ 據稱，甘乃迪對中國的核武器研製持「極度悲觀的態度」，他甚至考慮與蘇聯聯手發動一

* 譯者註：意思是蘇聯所控制的「共產傀儡政權」。

⁴ Allen S. Whiting, "Statement on U.S.-China Relations," 在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上宣讀, June 28, 1971, 17.

⁵ James C. Thomson, Jr., "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April-June 1972), 50:220-21.

⁶ Cohen, 220.

場核打擊以摧毀中國的核能力。⁷ 儘管這種企圖根本未能兌現，甘乃迪不喜歡中國的態度卻是明白無誤的。

但是，國務院開始作了一些機構調整，表明中國的重要性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承認。1962年，新設了一個「大陸中國事務」科，科員是一些麥卡錫主義時代以後的年輕專家，相反，「中華民國事務」科的職員則是一些年紀較大的中國通。最初，這個新設的科沒有甚麼地位，但一年以後，它升格為完全獨立的「亞洲共產主義事務」司。1963年11月14日，甘乃迪在一些新聞發佈會上宣佈，「我們並不拘泥於一項敵視紅色中國的政策」。據稱，他留在第二次任期內再決定對華政策。⁸

約翰遜 (Johnson) 政府窮於應付越南的緊急事態，將中國問題置於次要的地位——中國在文革期間埋頭於內向事務則加劇了這種形勢。國務卿臘斯克表達了他對「用核武器武裝起來的十億大陸中國人」的「恐懼性看法」。然而，約翰遜在一些意識形態問題上出乎意料地靈活，他似乎想表現出一種跨越太平洋的治國才能，以掩蓋他在越南的步履維艱。1966年7月12日，他宣稱要推行一項與中國「合作而非敵對」的政策。而且暗示了讓北京獲得聯合國席位的可能性，贊成一項「遏制但不一定孤立中國」的政策。約翰遜是自「丟失中國」以來第一位用和解的口氣討論北京政府的美國總統。但是，只有當國務卿鼓勵他時，約翰遜才會採取行動，而臘斯克是不會建議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的。這樣一種行動將被共和黨抨擊為綏靖主義。約翰遜有鑒於國內政治考慮和臘斯克的態度而壓制了自己的情感。據說，他曾幻想在莫斯科或是北京舉行最高層次會談，從而讓自己的總統任期功德圓滿，但是1968年夏天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美國的反應打破了這個美夢。⁹

以上的簡單考察表明，在二十年時間裏，美國的固執和中國的冷漠妨礙了雙方改善外交關係。兩國間存在的唯一接觸是1955年到1967年間在日內瓦和華沙舉行的一百三十多次大使級談判，但這些談判的

⁷ Joseph Alsop, "Thoughts out of China — (I) Go versus No-go,"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1, 1973, 31.

⁸ Thomson, 226, 229.

⁹ 同上註，240—42。

目的僅僅是向對手通報各自在重要問題上的立場。¹⁰ 但是，當1969年尼克遜就任總統之際，改變的時機似乎比較成熟。國際上，中國的核國家地位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承認，日本崛起為美國經濟上的競爭者，而中蘇分裂的加劇則提供了利用來加強美國優勢的機會。在國內，反越戰運動如火如荼，自由派政治家和學者普遍呼籲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商界人士強烈渴望開展對華貿易，聯邦政府承認美國不再是「世界警察」，而想從亞洲撤離。這些情形創造了有利於改善與北京關係的氣氛。在政治上，尼克遜總統歷來就是個強硬的反共分子，他有資本採取一項對中國妥協的政策而毋需擔心被人批評為搞綏靖。尼克遜得到了基辛格的調教，基辛格曾擔任哈佛大學教授，專治十九世紀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 (Clemens von Metternich) 的外交，梅特涅在各國間推行均衡原則，致力於維持一種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只是有限安全而非絕對安全的體系。在基辛格的影響下，尼克遜結束了遏制政策，轉而採取一項新政策，其宗旨是在中國、蘇聯和美國之間建立均衡，同時與日本和西歐保持良好關係。他對均勢概念作了重新解釋，提出現在是一個五極世界，其中的一極便是中國，它應該擺脫孤立局面，這種孤立局面一方面是中國自我設置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美國和蘇聯的包圍所致。由於北京方面也出現了相應的政策變化，中美接近確實成為了可能。¹¹

新均勢 尼克遜—基辛格的世界觀是現實政治的產物。它假設戰後時代以美蘇霸權為特徵的兩極化狀態已經接近尾聲。在未來十年乃至本世紀以後的歲月裏，世界上將存在五個力量中心：美國、蘇聯、中國、日本和西歐。五個力量中心中只有中國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因此，中國重新加入國際社會是「勢在必行」的。由於蘇聯捲入了與中國的敵對，主動權就轉到了華府一邊。美國正在與蘇聯進行限制

¹⁰ Kenneth T.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1967* (New York, 1968).

¹¹ Robert A. Scalapino, "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Jan. 1974), 356.

戰略武器談判，核對抗的前景減少，這使美國的地位得到了加強。此外，美國與日本和西歐保持著和諧的關係。因此，美國只要能打開中國的「大門」，就可以開創一個外交新時代。¹² 自然，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可以更容易地遏制俄國，而經濟上強大的日本則能抗衡中國。在這樣一種「新穎的」外交格局中，美國將獨佔鰲頭，扮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因此，對於尼克遜總統的外交攻勢來說，中國是有關鍵性的重要。

早在1969年1月的就職演說中，尼克遜總統就提出了「從對抗轉向對話」的思想。兩星期之後，他指示基辛格博士研究追求和解的途徑。然而幾次向中國大使建議重開華沙談判的嘗試未能奏效，雖然中國也沒有完全拒絕這個建議。中國方面很謹慎；他們在等待美國政策變化的更明確迹象。尼克遜總統在1970年10月歡迎來訪的羅馬尼亞總統齊

¹² 1971年7月6日尼克遜總統在堪薩斯城(Kansas City)中西部報社及電臺總裁新聞發佈會上發表的評論。全文刊登於*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2, 1971, 46-47。

應當提出，五極世界的概念雖然表述得很精彩，卻不無缺陷。這個概念基本上是建立在國際權勢因素的基礎之上，沒有適當地考慮往往與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的經濟因素。一個貼切的例證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機」中，阿拉伯國家有能力致使日本和西歐的經濟癱瘓，並嚴重損害美國的經濟——日本、西歐和美國是五極中的三極——但是阿拉伯國家卻被排斥在無極之外。各大國越來越依賴第三世界的原材料，可第三世界卻被忽略不計，這也使尼克遜—基辛格的政策構想大可置疑。即使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五個力量中心也不是古典式的平衡，而且，制約當今外交的因素也與十九世紀迥然相異。因此，副國務卿巴爾(George Ball)用懷疑的口氣對均勢概念作了如下評論：「這個概念只適用於十九世紀的專制政府，它們作決定時毋需考慮輿情或議會」。大可設想，中蘇友好就能打破平衡，使這一體系失效。因此，尼克遜—基辛格國際關係觀的可持續性是值得懷疑的。關於哈佛大學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教授以及巴爾等人的觀點，參見“The Kissinger Revisionists,” *Newsweek*, July 30, 1973, 12; Douglas D. Adler, “Kissinger: A Historian’s View,”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30, 1973; and Max Lerner, “Kissinger’s World May Be Coming Unhinged,”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8, 1974.

奧塞斯庫 (Nicholae Ceausescu) 的宴會上，隨後又在1971年2月的《世界形勢報告》中，多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紅色中國」)的說法，以此來表達他的願望。齊奧塞斯庫向北京轉達了美國希望開展對話的秘密資訊。周恩來隨後公開地表示尼克遜使用了中國的「恰當名稱」。與此同時，1970年10月，在一次公開的檢閱典禮上，中國策略地安排到中國作為期六個月訪問的美國記者斯諾，站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中間。毛澤東對斯諾說，中美之間的問題只能通過直接談判才能解決，他將歡迎尼克遜來訪，不管是以總統身分還是旅遊者身分。¹³

不久後就有了「乒乓外交」，周恩來熱情接見了美國運動員。周恩來強調民間外交，宣稱美國乒乓球隊的來訪「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之間關係的新的一頁」，並稱「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尼克遜總統迅速作出反應，宣佈了放鬆對華貿易禁運的五點措施。此後便展開了向中國派遣一名高級使者的秘密動作，因為北京方面向他保證將歡迎這樣一位使者。結局便是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的神秘訪問，以及7月15日總統的戲劇性聲明，稱他已經接受了周恩來總理邀他訪華的邀請。這是尼克遜總統的一個巨大的外交勝利。他向人們表明，是共和黨而不是民主黨嘗試著打開中國的大門，並試圖通過北京和莫斯科找出一條在越南達成和平的通道。此外，這次訪問將安排向公眾作電視直播，這在大選之年將帶來政治利益。但是，總統知道，中國的大門微微張開完全是因為北京方面的首肯。

中國的動機 北京歡迎尼克遜來訪既有實際原因，也有心理原因。雖然中國人以前譴責尼克遜是帝國主義戰爭販子，但現在他們發現他代表了一種可能有用的歷史動力。中國人正是要同這個人討論聯合國席位、美國的承認、臺灣問題的解決、日本潛在的重新武裝、購買美國飛機和科學儀器等事項，最重要的是要同他討論改善國際地位，以遏制蘇聯可能的進攻。無可置疑，這次訪問還將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的心理滿足。

¹³ Edgar Snow,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Life*, April 30, 1971, 47.

蘇聯的威脅 中蘇關係已完全失控了。經過了1949–1958年十年的合作之後，兩國在意識形態分歧、革命策略、核技術共用、蘇聯經濟和技術援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和邊界糾紛等問題上的緊張關係開始凸顯出來。形勢已變得如此嚴重、尖銳，以致蘇聯領導層內的有些派別主張要對中國實施一場「先發制人」的打擊。蘇聯在中蘇邊境地區的軍事部署開始於六十年代中期，在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該地區蘇軍的規模更加膨脹。「勃列日涅夫主義」的提出使局勢變得更加危險。「勃列日涅夫主義」宣稱，如果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被認為背叛社會主義事業的話，蘇聯就有權利干預這些國家的內部事務。在中國人看來，這種理論意味著他們將可能成為蘇聯入侵的下一個目標——這種前景可不是說說而已，特別是當人想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時更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相像，它也處在孤立的境地，也沒有聯合國席位。

1969年在烏蘇里江和新疆發生的邊界衝突，進一步證實了中國人對蘇聯意圖的懷疑，戰爭危險似乎迫在眉睫。蘇聯在1969年裏做出了各種各樣的嘗試，企圖尋求美國同意對中國的核能力發動預防性的打擊，但尼克遜總統生氣地表示反對。北越政府也擔心這兩個老大哥之間可能爆發戰爭，當同年9月中旬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訪問河內時，越南人敦促他避免與中國開戰。很有可能的情況是，蘇聯決定放棄戰爭首先是由於尼克遜的強烈反對，其次是由於河內的呼籲。

1969年夏季，蘇聯部署在中蘇邊境的地面部隊似乎還不夠發起一場成功的進攻。所以，蘇聯將不得不使用戰術核武器，這種武器有可能導致污染日本、朝鮮甚至美國的危險。自1969年撤出戰爭後起，蘇聯大大增加了在東北邊界沿線的地面部隊，部署了帶有核彈頭的導彈和火箭以增強部隊的作戰能力。蘇聯通過跨西伯利亞鐵路運送部隊和輜重的動作是如此猛烈，以致在1970–1972年間非軍事運輸業務多次中斷。¹⁴ 到1973–1974年，蘇聯在中蘇邊境的部隊達到了45到49個師（一百萬人），他們還得到太平洋上的150艘軍艦的支援。毋庸置疑，西

¹⁴ Alsop, 100.

德總理勃蘭特 (Willy Brandt) 的「新東方政策」和他與莫斯科的和解，使蘇聯人得以將部隊從東歐調至中蘇邊境。¹⁵

中國在中蘇邊界沿線部署了至少同樣數量的部隊，並在各大城市挖建防空洞以準備對付敵人的進攻。中國認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比赫魯曉夫壞得多」，因為兩人在中蘇邊境部署重兵，並一心籌劃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支持它入侵中國。另外，北京還回想起1955年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向德國總理阿登納灌輸「黃禍論」——「黃禍論」是德國末代皇帝提出的一種論調。¹⁶

因此，似乎是迫在眉睫的蘇聯入侵促使中國尋求與美國接觸、爭取獲得聯合國席位及廣泛的外交承認。結束孤立狀態將營造一種約束蘇聯貿然動手的國際氣候。此外，中國決心不陷入兩面作戰的境地，而俄國已質變成了中國的主要敵人，故美國就變得對中國的安全至關重要了。

然而，與資本主義美國合作會被稱為是意識形態上的背叛。故北京起勁地談論1945年的國共談判來解釋現行的政策。毛澤東的〈關於重慶談判〉(1945年10月)一文重新拿出來廣為傳達，用來證明中美和解只是策略的改變，而不是世界革命最終戰略的改變，也沒有甚麼出賣原則的問題。

臺灣 根據斯諾的說法，臺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是毛主席「最終的國家統一目標」。毛澤東堅持說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一定要解放，但他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態度相當寬大——「如果蔣介石希望一輩子待在那裏當省長的話，也許可以給予他某種自治地位」。¹⁷ 但是，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要美國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出軍事力量，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原則。北京將通過這種方式不斷孤立國民政府，迫使他們開始談判並最終屈服。

¹⁵ *Strategic Survey 197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London, 1974), 67; Shinkichi Etō, "Motivations and Tractics of Peking's New Foreign Policy," 33, 在德國東亞研究協會舉行的中國問題國際會議(1973年6月24-30日於施勞斯-賴森斯堡)上宣讀的論文。

¹⁶ Alsop, 102-3, 關於同周恩來總理談話的報道。

¹⁷ Edgar Snow, "China Will Talk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Life*, July 30, 1971, 24.

日本的重新武装 北京把日本巨大的經濟增長看作是其重新成為軍事大國的基礎，並且對日本開始向臺灣和韓國施加影響深切關注。中國自1894年以來就遭受日本的侵略，因此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可能復活極其敏感。由於日本受美國核保護傘的保護，中國就必須要同尼克遜討論這個問題。

以上這三個主要問題，加上中國希望恢復在聯合國中的席位、獲得美國的外交承認，以及發展貿易和經濟交往，促使了中國邀請尼克遜訪華。尼克遜訪華是美國這個最強大的西方國家的在任總統首次訪問中國，¹⁸ 它無疑將給中國人帶來極大的心理滿足。一些亞洲人把尼克遜訪華看作是一次朝聖，因為在歷史上，中國皇帝是從不離開本國的；只有藩屬國的國王和使臣前往中國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遜的訪問將給予中國一種新的尊嚴感，同時也使它獲得大國的地位。

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精明傑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歷史。他們知道抓住這個大好時機使其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國探索打開中國大門的努力與他們自己的大構想相吻合，於是尼克遜成了北京歡迎的客人。

尼克遜在北京 尼克遜於1972年2月18日前往中國，乘坐的是剛剛油漆成藍白相間色的總統專機「七六精神號」。他在夏威夷休息了兩天，在關島過了一夜，然後於2月21日飛抵北京。與他隨行的有尼克遜夫人、國務卿羅傑斯和基辛格等人。周恩來總理率一批中國要員在機場迎接他們，但毛澤東沒有露面，也沒有人群和外國外交使團在場。歡迎儀式適當、正規，但氣氛低沉，略帶嚴肅意味，中國人似乎把這件事當作半官方事務一樣對待。在經過了一萬六千英里的飛行之後，尼克遜打起精神，面帶微笑地走下飛機，伸出手與周恩來進行了歷史性的握手，而這是杜勒斯在1954年曾經迴避的事情。尼克遜握手的姿勢有力、親切，好像是要彌補杜勒斯的不友好行為。隨後，總統與其他中方官員一一握手，佇立傾聽軍樂隊奏兩國國歌，並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美國新聞媒體描述十五分鐘的機場歡迎儀

¹⁸ 格蘭特總統在卸任後進行的環球旅行期間曾於1879年訪問了北京。

式「不冷不熱」¹⁹——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說這是恰如其分的，因為華府與北京之間還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尼克遜一行下榻於北京市中心以西五英里處的一座規模宏大的國賓館。那裏懸掛了一面美國國旗，這是二十二年來的第一次。幾小時以後，毛澤東在書房裏會見了尼克遜和基辛格，這是一次事先未經安排的會面，持續了一個小時。總統和他的外交政策顧問走進書房時好像是「去見識一個場合遠大於去拜會一個人」。毛澤東說話「灑脫」，充滿威嚴和自信，樸實巧妙，而周恩來則保持沈默。尼克遜「感受到了毛澤東的魄力」，並表現出從未被新聞媒體見過的「罕見的謙遜和敬畏神情」。²⁰ 這個安排標誌了毛澤東贊成和解，中國人的那種克制且稍稍僵硬的態度立即變得熱情洋溢了。

隨後，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為尼克遜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國宴。總統熱情奔放，而周恩來則是一位誠摯周到的主人。宴會廳裏洋溢著親切愉快的氣氛。周恩來首先登上講臺致辭，強調這次盛會具有史無前例的特性，並強調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周恩來呼籲，在二十多年之後，「友好往來的大門終於打開了」，現在應該爭取關係正常化了。尼克遜顯然是興致勃勃，在答辭中引用了毛澤東的著名詞句「只爭朝夕」，並宣稱：

讓我們在今後的五天裏一同開始一場新的長征，不是裹足不前，而是殊途同歸——實現建設一個和平公正的世界結構的目標，在這個結構中，所有國家將以平等的尊嚴站在一起，每個國家無論大小，都有不受外來干涉和控制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的權利……我們沒有理由做敵人。我們都不尋求控制對方。我們都不想控制對方。

在談判間隙，尼克遜參觀了長城、十三陵、風光綺麗的西湖和上海工業展覽會，而他的夫人則訪問了一些學校、醫院和商店。在整個訪問期間，總統確保讓中國方面領會，他對所見所聞高度讚美，對所

¹⁹ *San Francisco Examiner*, Feb. 21, 1972, A.

²⁰ Hugh Sidney, "The Visit to Mao's House," *Life*, May 17, 1972.

受到的熱情接待非常領情。尼克遜的姿態，如他援用「長征」和「只爭朝夕」等廣為熟知的詞語，在宴會上由衷地迸發出親切的神態等，乃是蓄意要樹立自己的新形象——他是一位知趣領情的客人，完全不同於以往那些妄自尊大的外國政要和帝國主義分子。他的舉止被理解為是深思熟慮的動作，旨在顯示一個世紀以來西方剝削壓迫中國的時代之終結。從這個角度來說，尼克遜的表現值得高度讚揚。

儘管雙方的舉止溫文爾雅，但談判卻非常艱難。清楚地證明這一點的是，在北京經過了五天的會談仍未達成協定。直到第六天在杭州西湖，僵局才打破；訪問的最後一天，在上海發表了一份公報。中國人似乎獲利甚豐，這得益於他們處在較強的談判地位，因為是尼克遜前來恢復關係。他們對外界宣稱沒有作任何讓步，但由於他們急於建立中美友好關係，因此最後的結果表現為是一種妥協。儘管尼克遜看起來讓步較多，但他與中國建立了直接聯繫，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增進了世界和平的前景。

《上海公報》 這份發表於1972年2月28日的文件表達了對未來的希望，而且不同尋常，因為它既寫上了雙方同意的方面，也寫上了雙方存在分歧的方面。公報全文共1,750個字，基本內容如下：

1. 關於臺灣問題，美國方面聲明，它

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顯然，尼克遜作了一個讓步，但它或許是達成一項和解所需的最小讓步。從長遠來看，這項和解使美國得益，它增進了世界和平的前景，減少了蘇聯進攻中國的危險。但是，必須注意到，尼克遜一方面同意「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方面又迴避了把臺灣說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他也沒有對哪個政府代表中國的問

題作出任何承諾。但是，由於大陸比臺灣大得太多，且覆蓋了傳統上被稱為中國的地域，因此，大陸中國是真正的中國的暗示就很明顯了。中國一方的讓步則是沒有堅持要美國宣佈北京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並要它廢除1954年與國民政府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在此前的一項協定中，加拿大寫上了「注意到」北京對臺灣的主權，並同意與國民政府斷絕外交關係。日本在1972年9月更明確地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尼克遜的讓步事實上承認了「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²¹

2. 美國贊成1955年北京方面在萬隆首先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 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2) 互不侵犯；(3) 互不干涉內政；(4) 平等互利；(5) 和平共處。這些原則本身並無害，但由於這些原則是敵視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美國遏制共產主義政策的「不結盟」國家所闡述，美國一直拒絕接受。尼克遜的贊成主要是一種心理上的讓步。但它也降低了蘇聯進攻中國的可能性。
3. 雙方同意不在亞太地區尋求「霸權」。言下之意，它們也反對蘇聯稱霸這個地區。
4. 雙方保證要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並同意「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勾結反對其他國家，或者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勢力範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這段宣言防止了美蘇聯合反對中國的任何可能。
5. 兩國同意為發展相互間的科學、技術、文化、新聞和體育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便利。
6. 兩國同意，將通過各種手段，包括特派一名美國資深外交官前來北京，繼續尋求進一步的關係正常化。1973年4月，美國國務院派了一個先遣小組前往北京建立聯絡處。5月14日，時

²¹ Robert A. Scalapino, "First Results of the Sino-American Détente," 14。在德國東亞研究協會舉行的中國問題國際會議(1973年6月24-30日於施勞斯-賴森斯堡)上宣讀的論文。

年75歲的前駐倫敦、巴黎和波恩大使布魯斯以聯絡處主任的身分進入中國。兩星期以後，66歲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國聲望最高的外交官、前駐法國大使黃鎮前往華盛頓特區就任中國聯絡處主任。

聯合公報反映了合作的氣氛、善意和相互的友誼。尼克遜從前是一名外國帝國主義的死硬分子，而當他離開上海之時，他卻滿懷激情地宣佈：「再也不會有外國統治和外國佔領，降臨到這座城市或中國及世界任何獨立國家的任何部分了」。²² 尼克遜在中國的表現或許是他在任期內的最佳的表現。

和解的成就 中國人顯然對取得的成就感到滿意，周恩來返回北京時受到的盛大歡迎即可表明這一點。尼克遜的「朝聖」尤其讓飽受了一個世紀欺凌的中國人內心感到溫暖，而且這次訪問也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在尼克遜訪華之行前不久，1971年10月15日，中國就加入了聯合國，這表明了追求和解引起的成果。美國贊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反對任何國家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的態度，即使不是消除，至少也是限制了蘇聯進攻中國的可能性。這樣，中國取得了某種程度的安全感，而這正是開展這場外交攻勢的最初目標。

至於臺灣問題，中國取得了一個雖不徹底但卻很實在的勝利，讓美國承認了「一個中國」原則，並使美國承諾隨著該地區緊張局勢的消除，撤出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但是，北京未能使美國完全承認自己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美國也沒有承擔起廢除與臺灣的共同防禦協定。然而，美國的新姿態看起來是間接地承諾以後要承認北京政府。

中美和解使北京得以購買美國的飛機、科學儀器及化學和工農業產品，這些是中國的現代化所急需的東西。學者、記者、運動員、科

²² 《上海公報》的全文載於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lected Documents, No. 9, *U.S. Policy Toward China*, July 15, 1971–January 15, 1979 (Washington, D.C., 1979), 6–8.

學家和官員的交流，方便了觀念和知識的相互流動，改變了二十二年來互不來往的狀態。

另一方面，與資本主義美國的和解在意識形態上顯得有點謬誤，且讓人覺得是損害了世界革命的原則，使中國在其他、尤其是亞洲的共產主義國家面前的信譽受到了懷疑。中美和解可能挫傷了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熱情。

對美國來說，和解開始了與中國的直接聯繫，降低了中蘇開戰的可能性，從而拓寬了世界和平的前景。一個繁榮友好的中國一直被認為符合美國的利益。五極世界的概念眼看就要成為現實。北京承諾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意味著北京將不會對越南實行軍事干預，也不會武力解放臺灣。最後，被中國拘押的美國人獲釋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名被關押了二十多年的中央情報局特工²³和兩名越南戰爭期間在中國上空被擊落的飛行員確實於1973年3月被釋放了。

從物質利益的角度來看，美國最顯著的收穫是中美貿易的增長，這幫助緩解了美國的逆差問題。中國渴望得到美國科技和農業產品的願望遠遠超過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因此美國獲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尼克遜訪華後不久，中國人向RCA全球通訊公司購買了兩套地面衛星接收設備。後來，他們又購買了十架波音707飛機、四十台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生產的噴射機替換引擎、二十台地面飛機牽引車，以及大量小麥、玉米和棉花。中國僅向美國出口數量有限的馬口鐵和錫合金、豬鬃毛、絲綢、植物油和藝術品。下表顯示了中美貿易的趨向：

年份	美國對華出口 (百萬美元)	中國對美出口 (百萬美元)
1972年	60	32
1975年	304	156
1980年	3,755	1,059
1985年	3,855	3,840

²³ John Downey.

總體來看，尼克遜通過中美和解得益匪淺。和解削弱了蘇聯的國際地位，促使蘇聯更急於在一些正在談判中的問題上與美國達成協定。中國將一百萬俄軍拴在了東北—西伯利亞邊境，因而相應減少了蘇聯在其他地區的軍事壓力。這樣，在新的三角關係中，美國明顯保持了平衡。正如英國政治家坎寧 (George Canning) 在1825年「把新世界拉過來矯正舊世界的平衡」一樣，尼克遜在某種意義上把中國拉過來矯正了世界的平衡。尼克遜期待開創一個國際關係的新時代，在這一點上，他仿效了羅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總統為二次大戰後時期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大部分的基礎。

中日恢復邦交

1971年7月15日尼克遜宣佈訪華的聲明和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報》的內容震驚了日本人。他們認為，美國在這樣重大的決策問題上事先不打招呼，是對日本的一種侮辱，日本甚至應對美國的舉動採取報復行動。為了表明他們的獨立性，也為了保護他們的利益，日本人決定用一種比美國的行為更透明的方式與北京達成關係正常化。毫無疑問，在1971年7月尼克遜總統發表那份聲明之前，東京就已經考慮要逐步改善同北京的關係，但「尼克遜震動」大大加快了這一進程。

日本的媒體至少已經鼓動了兩三年時間，要求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繫，而不管美國的態度如何。以下因素促使了這一態度的形成：對國際形勢變化的現實評估、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經濟聯繫的前景、古老的文化紐帶、左翼勢力支援恢復邦交的宣傳。一些日本商社接受了北京在1970年4月19日宣佈的「四項貿易原則」：(1) 與中國通商的公司不得與臺灣和南朝鮮通商；(2) 不得在上述兩地投資；(3) 不得向美國出口武器供在印度支那使用；(4) 不得與美國人在日本開設的公司合資或成為其子公司。雖然兩國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和社會差異，但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卻顯得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尼克遜震動」則提供了加速實現這一前景的動力。

在日本國內，共產黨和日本社會黨堅定地倡導必須與中國恢復外

交關係。一位日本社會黨著名黨員²⁴要求日本為它過去的罪行向中國道歉，以便贏得中國的信任，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1972年3月，外務大臣福田糾夫表示，日本必須對九一八事變和1937-1945年中日戰爭期間所犯的一切錯誤「進行反省並向中國道歉」。²⁵的確，主動向北京發起外交攻勢的時機似乎成熟了。但是，首相佐藤榮作是一個老派的政治家。基於蔣中正在戰後對日本的寬大態度，佐藤在感情上傾向於國民政府，他覺得很難客觀地作出反應。他無力扭轉國際和國內形勢的潮流，於是在1972年6月17日提出辭職，結束了長達七年零八個月的任期。佐藤的辭職，為選舉一位預計將爭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關係正常化的新首相掃清了道路。

田中角榮的對華新政策 田中角榮於1972年7月6日就任首相，他馬上面臨著要求與北京恢復邦交的呼籲。各方利益都在施加壓力：有親華的左翼政治家，有新聞媒體，有基於同中國開展貿易的商人，最後還有北京方面。

中國對日本的態度業已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不再抨擊日本的經濟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復活，而是頻頻向田中表示讚賞，歡迎他來訪。8月11日，田中正式提出了訪華請求，第二天，周恩來宣佈歡迎他來訪的消息。訪問的日期確定在9月25日的一周。為了進一步鋪平復交的道路，周恩來明確向日本政府表示：(1) 中國將放棄戰爭賠償要求（在日本的非官方場合，人們討論將作幾十億美元的賠償）；(2) 中國不認為美日安保協定和1969年11月21日的《佐藤—尼克遜聯合公報》是北京與東京建立外交關係的障礙；(3) 中國將與日本簽訂一項新的和平友好條約，以替代日本與臺灣國民政府的和平條約。²⁶

日本政府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但是，日本不準備就臺灣問題作明確的聲明，因為日本認為，它已經在《舊金山

²⁴ 小林進。

²⁵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 1972, Part I, 7.

²⁶ Gene T. Hsiao, "The Sino-Japanese Rapprochement: A Relationship of Ambival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Jan.-March 1974), 57:109-110.

和約》中放棄了對臺灣的權利，現在再對臺灣問題作出聲明顯得是多此一舉。出於覺得有虧於蔣中正的情感，也出於希望保持或加強與臺灣通商和在臺灣投資的願望，日本人也不願意正式廢除與臺灣的和平條約。田中角榮需要時間來解決分歧，外務省也告誡不要草率和解。

1972年8月，基辛格博士出人意料地對日本進行了為時一天的訪問。華府要確保日本不向北京承擔任何有損於美日安保條約及其對臺灣條款的義務。這項條約簽訂於1951年，又在1960年重訂，它允許美國在維護安全的名義下調動駐日美軍使用到東亞其他地區。1969年，尼克遜與佐藤首相發表了一份包含「臺灣條款」的聯合公報，該條款宣稱臺灣的安全對日本的安全十分重要，因此1960年條約的適用性應擴展到臺灣。當基辛格抵達日本之時，日本政府向他重申，中日恢復邦交將不會損害美日安保條約，但日本拒絕在臺灣問題上作出承諾，堅稱尼克遜的訪華巨大地改變了遠東局勢，因此臺灣問題必須「現實地」解決。

田中角榮必須克服擺在他北京之行面前的三個障礙：(1) 緩解美國方面對日本迅速與中國恢復邦交的擔憂；(2) 確保臺灣國民政府理解日本的立場而不至於危及日臺文化和經濟關係；(3) 克服自民黨內保守派的反對，以便促成該黨一致同意他的對華政策。為解決第一個問題，田中角榮將赴檀香山會晤尼克遜；為消除第二個障礙，他派自民黨副總裁、在臺灣交友甚廣的椎名悅三郎作為特使向國民政府解釋日本的立場；至於第三個問題，他依靠一位前外務大臣²⁷的勸人能力去調解右翼黨員的工作。

田中角榮於1972年8月31日到9月1日出訪檀香山，其時他希望「收買」美國支持他的對華政策。日本對外出口中有30%輸往美國，在日美雙邊貿易中獲得頗為尷尬的38億美元的高額順差，這種事態使田中角榮有能力表現出慷慨大度。

經過兩天的會談，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聲明重申日美安保

²⁷ 小坂善太郎。

條約的重要性，但沒有提及臺灣問題，這樣就使雙方得以自由地對該條約作出自己的解釋。在美國人看來，條約適用於臺灣，但日本人卻不這樣看，因為東亞形勢的變化已使「臺灣條款」失效。確實，日本人認為，中美和解實際上已消除了北京方面武力解放臺灣的前景，使用美軍去保衛臺灣的問題因而也就變成了沒有實際意義的空談。

田中角榮規避了臺灣問題，並爭取到尼克遜贊成他訪問中國以進一步緩和亞洲的緊張局勢。作為回報，田中角榮作出了巨大的貿易讓步，同意日本多購買十億美元的美國產品，以幫助美國平衡其貿易赤字。

如果說田中角榮靠慷慨的施與而取得成功的話，那麼他派往臺灣的特使卻遠沒有那麼幸運。椎名悅三郎一行在9月17日抵達臺北。他們立即遇到了幾百名抗議者，抗議人士堵截了他們的車隊，用棍棒捶打他們的汽車。他們與國民政府領導人進行了長達三天的會談，其間他們極其耐心，不停地責備自己，但會談毫無成效。日本人主動提出要援助臺灣的經濟發展，包括建造一座價值4,000萬美元的核電廠和一條價值1,700萬美元的公路，但他們的提議遭到了拒絕。椎名問行政院長蔣經國臺灣想從日本得到甚麼，蔣經國的回答是，日本應該停止出賣朋友，避免自己被赤化。如果日本承認北京政府，臺灣決心與它斷絕關係。椎名沮喪地返回日本，但許多日本人接受這樣的觀點：在意氣用事淡化之後，臺灣將不得不遷就形勢，因為它嚴重依賴於對日貿易和與日本的經濟合作。²⁸

田中角榮的第三項任務——安撫保守派分子——比較容易完成。自民黨接受了右派的以下建議：「應予考慮延續以往我國同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但這個建議對自民黨沒有約束力；它只不過是讓右翼勢力得以保全其支持臺灣的信譽，而又不妨礙與北京恢復邦交的一種策略。

在消除了三個障礙之後，田中角榮準備踏上他的中國之旅。

²⁸ Gene T. Hsiao, 113.

田中角榮在北京 日本代表團於1972年9月25日午前抵達北京，開始了為期五天的訪問。代表團共有五十名成員，為首的是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和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機場上飄揚著日本國旗，這是自二十二年前日本投降以來的第一次。周恩來和其他中方要員舉行了一個簡短的歡迎儀式，陪同來賓檢閱了儀仗隊——一切安排都讓人聯想起尼克遜訪華的情景。隨後忐忑不安的日本人被帶到了國賓館。午後，他們與周恩來進行了嚴肅、坦率的談判。晚上，田中一行出席了歡迎宴會，席間，中國軍樂隊演奏了一首流行的日本歌曲「櫻花」。此時田中角榮似乎比較放鬆了。周恩來首先致辭，簡要地談了一下日本的侵略，強調「中國人民嚴格地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者與日本的人民大眾」；並宣稱「現在是我們完成恢復外交關係這一歷史性任務的時候了」。

田中在致辭中強調未來關係的重要性，並為過去的錯誤道歉：

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中，日中關係有過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對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中關係停留在不正常和不自然的狀態上。我們只能坦率地承認這個歷史事實。

田中的「深刻反省」博得了中國人的掌聲，雖然他為了安撫自民黨內仍然批評他對華政策的右翼勢力，非常謹慎地選擇了表達遺憾和懺悔的措辭。但是，在最後的聯合聲明中，道歉就比較明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在歡迎宴會之後，毛澤東在擺滿圖書的書房接見了田中角榮約一個小時。從前當過關東軍騎兵軍官的田中角榮顯得很緊張。毛澤東覺察到了他的拘謹，便半開玩笑地說：「那麼，你們（田中和周恩來）打架打完啦？」田中禮貌地回答說會談很友好，毛澤東馬上回答說：「不打不行啊。不打不成交嘛。」毛澤東送給了田中一套《楚辭集解》、兩隻大熊貓和一把摺扇。田中向毛澤東贈送了一幅現代畫，向周恩來贈送了一幅絲織掛毯，向北京人民贈送了兩千棵櫻花樹和大批樹苗。

誠摯的氣氛反映在談判中間。中國人放棄了一切戰爭賠償要求，

而且不再堅持讓日本人在共同聲明中寫進廢除1952年日臺和約一條。日本人接受了以下的條文：²⁹

1. 自本聲明公佈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
2. 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3. 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³⁰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6. 兩國政府同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
7. 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針對第三國的。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當周恩來在告別宴會上提議乾杯時，田中錯舉起一杯日本米酒而不是中國的茅臺酒。周恩來不落痕迹地提示了他。田中自責地拍了一下腦門，立即更換了酒杯。73歲的周恩來與54歲的田中角榮之間的遭遇，與中國甲午戰敗後的談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年，73歲的李鴻章前往日本馬關，在55歲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52歲的外相陸奧宗光面前哀求和平。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傲慢、自大和不妥協的態度，與田中角榮對周恩來的謙遜、悔悟態度及他對毛澤東的敬畏之情截然相反。

²⁹ 中日聯合聲明的全文刊登在*The New York Times*, Sept. 30, 1972; *Peking Review*, 40:12-13, Oct. 6, 1972.

³⁰ 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確認了1943年開羅宣言關於臺灣在戰後歸還給中國的聲明。

據稱中日聯合聲明顯示出中國取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勝利，³¹ 儘管如此，日本人還是很欣慰。在臺灣問題上，日本得以宣稱它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對該島的權利，而沒有直截了當地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日本人還獲得了繼續與臺灣和南朝鮮保持經濟往來的絕對權利。此外，日本並沒有在聯合聲明中正式廢除日臺和約，雖然大平外相在北京的記者招待會上宣佈，日臺和約已經過時，因而予以取消。大平外相聲明的合法性是值得爭論的，但國民政府在獲悉了中日聯合聲明後斷絕了與日本的關係，這就使形勢明朗化了。

從國際的角度來看，日本保全了它與美國的安保條約，且加強了它在日後與蘇聯進行領土及和約談判中的地位。³² 日本將得到中國的支援，雙方都承諾將反對蘇聯或者美國在亞太地區稱霸的努力。

在國內，勢力強大的日本左翼「中國游說團」不再能夠強迫政府向中國政府承擔義務了。對中國的正式道歉消除了多年的負罪感，反省的時期結束了。日本可以不受美國的控制，與中國開展一種前景廣闊的新關係了。

中國得到了大部分它想得到的東西，只作了一些細小的讓步。日本的承認對其他國家、尤其是對亞洲國家具有巨大的心理影響。中日之間的新型關係加劇了臺灣的孤立，制止了日本保守派勢力支持台獨的任何企圖。中日和解也使日本的投資和技術援助，開始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³³ 並加強了中國在與蘇聯對抗中的地位。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新協定標誌著日本剝削中國的一個世紀之結束，也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其中，擺脫了外來束縛的中國能夠按自己的意願來處理它的事務。

受中日復交最不利影響的一方是臺灣。國民政府先是被尼克遜與

³¹ Scalapino, 13.

³² 日本想讓蘇聯歸還北方諸島：齒舞、色丹、國後和擇捉。參見Elizabeth Pond, "Japan and Russia: The View from Tokyo," *Foreign Affairs* (Oct. 1973), 145.

³³ 1972年，日本向中國出口了6.09億美元，從中國進口了4.9億美元，淨出超1.19億美元。1973年8月30日，東京和北京相互給予了最惠國待遇。1973年，雙方貿易總額達到了18億美元，而1972年只有11億美元。

北京的和解震驚，現在又被田中的行為氣得暈頭轉向。他們譴責田中角榮背信棄義、不忠於條約義務、對戰後蔣中正的寬大態度忘恩負義。日本駐臺北的大使館受到抗議者的威脅，不得不由三百名警察和便衣來保護。國民政府立即斷絕了與日本的關係，重申它堅定不移的反共立場。³⁴ 臺北政府號召要依靠更緊密的團結和更堅定的自力更生，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中爭取生存。但是，在最初的狂怒和被出賣感漸漸平息之後，國民政府回到了務實的態度上。臺灣這樣一個小島需要靠與日本的巨額貿易來生存，而且有許多華人生活在日本，也有數千名日本人生活在臺灣，他們都需要得到保護。此外，許多對臺灣友好的日本人希望保持某種形式的文化、經濟、技術和科學交流。由於這些原因，1972年12月1日，日本的親台派人士在東京成立了一個「日本對外交流協會」，在臺北設有一個主分會，在高雄設立另一個分會。一天以後，臺北也成立了一個類似的團體「亞東關係協會」，在東京設立一個主分會，另在大阪和福岡設有分會。這兩個組織的宗旨都是為了照顧生活在對方管轄權範圍裏的本方僑民，並促進文化、經濟和科學交流。這些組織雖然是「非官方」的，但卻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其工作人員俱是一些隱蔽身分的官員，享有准外交官的地位，履行著正規的領事職能。³⁵ 這樣，日本與臺灣之間的官方關係雖然斷絕了，但半官方聯繫仍然保持完好。

日本是第七十八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此後，其他國家紛紛仿效日本：西德在1972年10月斷絕了與臺灣的外交關係，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分別在1972年12月和1973年1月、西班牙在1973年3月、馬來西亞在1974年5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相形之下，臺灣越來越孤立。到1988年10月，它只同二十三個國家保持著外交關係。

³⁴ 當1974年4月東京與北京簽訂一項航空協定時，國民政府禁止所有的日本航班飛抵臺灣或飛越臺灣上空，也取消了它自己的中華航空公司的抵日航班。

³⁵ Gene T. Hsiao, 118–20. JIA主席板垣治是前駐臺北大使(1969–71年)，其臺北分會的主任伊藤洋典在1972年9月前一直在日本駐臺北使館任職，而其高雄分會的主任則是一名日本的前任總領事。至於「東亞關係協會」，它的東京分會主任馬樹禮是一名負責華僑事務的國民黨高級官員。

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大構想相當靈驗，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和第三世界的代表人獲得了在聯合國中的永久席位，並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國家元首和領導人絡繹不絕地來訪。北京成了國際交往的一個樞紐。中國不再孤立，它已經成功地打破了蘇聯和美國的包圍。中國再一次進入國際大家庭，這一次不再是一個虛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而是一個地位優越、備受尊敬的大國。

參考書目

- Alsop, Joseph, "Thoughts Out of China — (I) Go versus No-go,"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1, 1973, 31, 100–108.
- Bachrack, Stanley D.,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China Lobby" Politics, 1953–1971* (New York, 1976)
- Barnds, William J. (ed.), *China and America: The Search for a New Relationship* (New York, 1977).
- Barnett, A. Doak,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1960).
- Brandon, Henry, "The Balance of Mutual Weakness: Nixon's Voyage into the World of the 1970s," *The Atlantic*, Jan. 1973, 35–42.
- Brodine, Victoria, and Mark Selden (eds.), *Open Secret: The Kissinger-Nixon Doctrine in Asia* (New York, 1972).
- Buss, Claude A.,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ichard Nixon* (San Francisco, 1974).
- Caute, David, *The Great Fear: The Anti-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 (New York, 1978).
- Clark, Ia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Soviet Perspective," *Orbis*, XVII:2:480–92 (Summer 1973).
- Cohen, Warren I.,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78).
- ,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1971).
- Davis, Forrest, and Robert A. Hunter, *The Red China Lobby* (New York, 1963).

- Dulles, Foster Rhea,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69* (New York, 1972).
- Fleming, D. F., *America's Role in China* (New York, 1969).
- Friedman, Edward, and Mark Selden (eds.), *America's Asia: Dissenting Essays on Asian-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1971).
- Garver, John, *China's Decision for Rapproch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968–1971* (Boulder, 1982).
- Gladue, E. Ted, Jr., *China's Perception of Global Politics* (Lanham, Md., 1983).
- Griffith, William E., *Peking, Moscow, and Beyond: The Sino-American-Soviet Triangle* (Washington, D.C., 1973).
- Hinton, Harold C., *China's Turbulent Quest: An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9* (New York, 1972).
- Hsiao, Gene T. (ed.), *Sino-American Detent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New York, 1974).
- , “The Sino-Japanese Rapprochement: A Relationship of Ambival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57:101–23 (Jan.–March 1974).
- Hsiung, James Chieh, *Law and Politic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 Study of Attitude and Practice* (New York, 1972).
- Hudson, Geoffrey, “Japanese Attitudes and Policies Towards China in 1973,” *The China Quarterly*, 56:700–707 (Oct.–Dec. 1973).
- Iriye, Akira,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1974).
-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1979).
- Kalicki, J. H.,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i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s in the 1950's* (New York, 1975).
- Kintner, William R., *The Impact of President Nixon's Visit to Peking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hiladelphia, 1972).
- Kissinger, Henry 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ree Essays* (New York, 1969).
- Lampton David M., “The U.S. Image of Peking in Three International Crise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XXVI:1:28:50 (March 1973).
- Levine, Laurence W.,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1972).
- MacFarquhar, Roderick,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71* (New York, 1972).

- May, Ernest R., and James C. Thomson, Jr. (eds.),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 Survey* (Cambridge, Mass., 1972).
- McCutcheon, James M., *China and America: A Bibliography of Interactions, Foreign and Domestic* (Honolulu, 1972).
- Nixon, Richard,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Building for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971).
- ,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971).
- , *A New Road for America* (New York, 1972).
- Overholt, William H., "President Nixon's Trip to China and Its Consequences," *Asian Survey*, XIII:7:707–21 (July 1973).
- Parker, Maynard, "Vietnam: The War that Won't End," *Foreign Affairs*, LIII:2: 352–74 (Jan. 1975).
- Pfaltzgraff, Robert L., Jr., "Multipolarity Alliances and U.S.–Soviet–Chinese Relations," *Orbis*, XVII:3:720–36 (Fall 1973).
- Pollack, Jonathan D.,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Nuclear Weapons, 1964–69," *The China Quarterly*, 50:244–72 (April–June 1972).
- Pond, Elizabeth, "Japan and Russia: The View from Tokyo," *Foreign Affairs*, 52: 1:141–52 (Oct. 1972).
- Pye, Lucian W.,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New Phase," 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02:97–106 (July 1972).
- Quester, George H., "Som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Sino-American Deten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 XXVIII:2:236–50 (Spring 1973).
- Ravenal, Earl C., "Approaching China, Defending Taiwan," *Foreign Affairs*, 50:1: 44–58 (Oct. 1971).
- Rhee, T. C., "Peking and Washington in a New Balance of Power," *Orbis*, XVIII: 1:151–78 (Spring 1974).
- Rice, Edward E., "The Sino-U.S. Détente: How Durable?" *Asian Survey*, XIII:9: 805–11 (Sept. 1973).
- Robinson, Thomas, "The View From Peking: China's Policies Toward the U.S., and Soviet Union and Japan," *Pacific Affairs*, XLV:3:333–53 (Fall 1972).
- Scalapino, Robert A., "The Question of 'Two Chinas'," in Ping-ti Ho and Tang

- Tsou (eds.), *China in Crisis: China's Heritage and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Chicago, 1968), 109–20.
- , *Asia and the Major Power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tanford, 1972).
- , “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52:2:349–85 (Jan. 1974).
- Schaller, Mich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0).
- Schwartz, Benjamin I, “The Maoist Image of World Order,” in John C. Farrell and Asa P. Smith (eds.), *Image and Real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68), 92–102.
- Sidney, Hugh, “The Visit to Mao’s House,” *Life*, May 17, 1972.
- Snow, Edgar, “Talks with Chou En-lai: The Open Door,” *The New Republic*, March 29, 1971.
- ,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Life*, April 30, 1971.
- , “China Will Talk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Life*, July 30, 1971.
- Solomon, Richard H., “America’s Revolutionary Alliance with Communist China: Parochialism and Paradox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II:12: 832–50 (Dec. 1967).
- Starr, John B., “China and the New Open Door,” in Alan M. Jones, Jr., (ed.), *U.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1969–73* (New York, 1973), 67–82.
- Steele, A. 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New York, 1966).
- Syed, Anwar Hussain, *China and Pakistan: Diplomacy of an Entente Cordiale* (Amherst, 1974).
- Thomas, John 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 (Seattle, 1974).
- Thomson, James C., Jr., “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50:220–43 (April–June 1972).
- Van der Linden, Frank, *Nixon's Quest for Peace* (Washington, D.C., 1972).
- Van Ness, Peter,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1973).
- Weng, Byron S. J., *Peking's UN Policy: Continuity and Change* (New York, 1972).
- Wilson, Francis O. (ed.), *China and the Great Power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New York, 1974).

Wu, Fu-mei Chiu, *Richard M. Nixon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1978).

Yahuda, Michael, "Kremlinology and the Chinese Strategic Debate, 1965–66,"
The China Quarterly, 49:32–75 (Jan.–March 1972).

Zagoria, Donald, "The Strategic Debate in Peking," in Tang Tsou (ed.), *China in Crisis: China's Policies in Asia and America's Alternatives* (Chicago, 1968), II: 237–68.

國民政府在臺灣的統治

與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對抗的是在臺灣的國民政府，雙方都自稱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曾經是大明遺臣抗清基地¹的臺灣，成了一場新的抵抗運動的堡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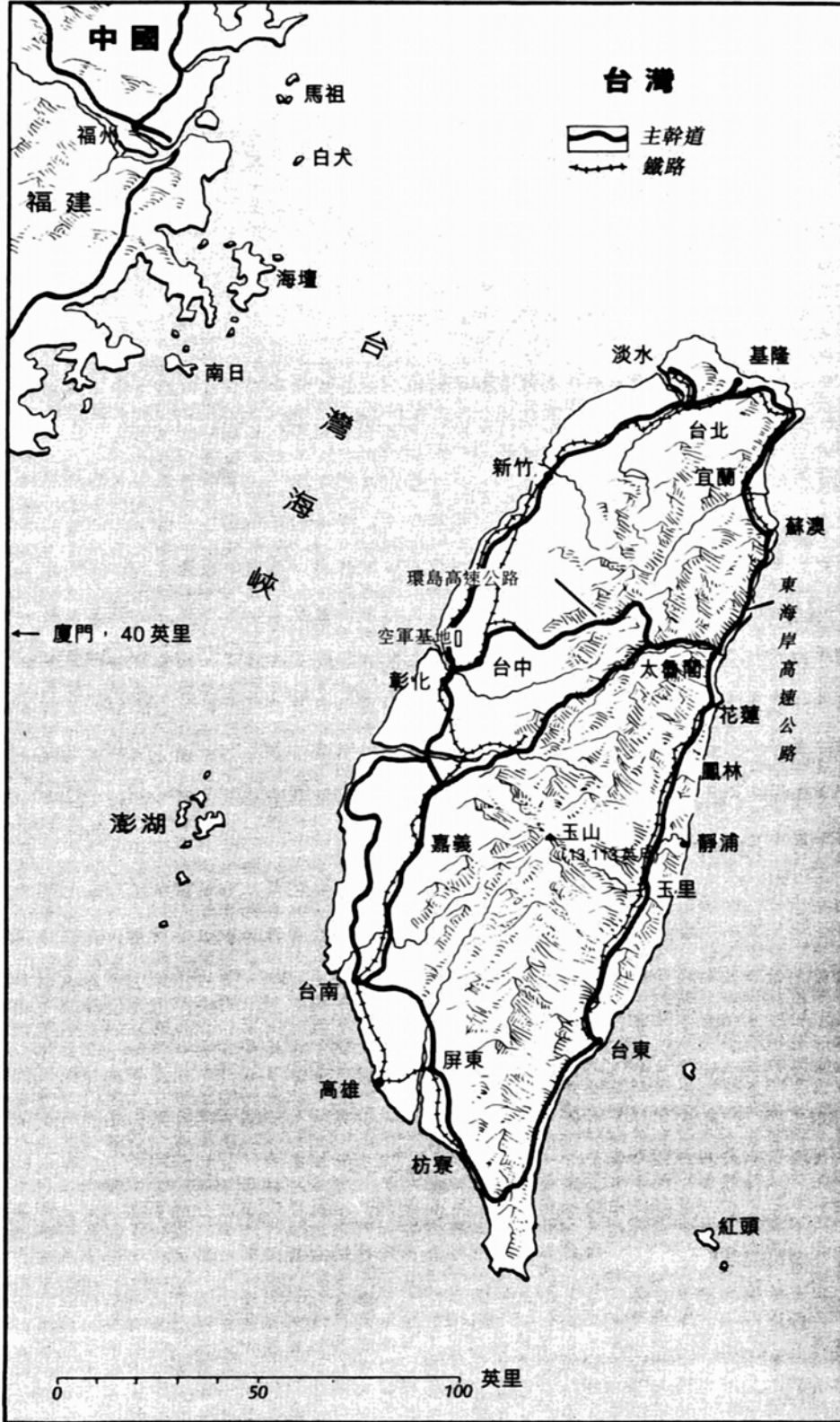
臺灣又稱「福摩薩」，葡萄牙語中是「美麗」的意思。臺灣坐落在亞洲大陸以東約一百英里、日本以南695英里處。以最寬點計算，這座島嶼長240英里，寬98英里，總面積13,844平方英里——大於荷蘭，略小於瑞士，大約相當於美國麻薩諸塞 (Massachusetts)、羅德島 (Rhode Island) 和康乃狄格州 (Connecticut) 的總和。² 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將臺灣割讓給了日本。在1943年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同盟國許諾，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將在日本戰敗後交還給中國，據此，臺灣在1945年回歸了中國。

隨著1948年底國民政府軍事處境的迅速惡化，蔣總統把眼光轉向臺灣，把它看作是一個避難的去處。為做好這個最後打算，他於1948年12月29日任命心腹幹將陳誠出任臺灣省主席。蔣於1949年1月21日辭去總統職位，隨後他就隱退到寧波附近的老家，³ 為撤退到臺灣島制定應急方案。他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正式辭去了政府職位，卻仍然保留著國民黨總裁之位，並控制著政府的軍隊和資金。隨著1949年4月南京的陷落，國民政府崩潰指日可待。為了建立一個新的抵抗基地，蔣命令將政府軍和軍事裝備，以及價值三億美元的黃金儲

¹ 首領是國姓爺鄭成功和他的兒子，從1661年持續到1683年。參見第二章。

² Chiao-min Hsieh, *Taiwan: Ilha Formosa* (London, 1964), 3-6.

³ 溪口。



備和外匯撤運到臺灣。雖然代總統李宗仁名義上仍然是大陸上的國家元首，蔣卻在臺灣擔負起實際的領導。當國民政府最終於1949年12月遷到臺灣時，李宗仁去美國「就醫」。蔣於1950年3月1日重新出任民國總統一職。

為了支撐臺灣的防禦，蔣從幾處前哨陣地進行了「戰略」撤退。1950年4月和5月，政府軍撤離了海南和舟山群島，1953-54年間，流落在北越和滇緬邊境地區的國民政府游擊部隊撤了回來。1954年1月，14,209名在朝鮮戰爭中被俘的中共軍隊戰俘參加了國民政府軍隊，加強了國民政府的軍力。一年以後，即1955年1月，位於浙江附近海面大陳島上的大批平民和部隊撤回臺灣。由於這些軍隊的回撤，加上一些新的訓練和招募計劃，臺灣建立了一支六十萬人的可觀的軍隊，其中的五分之一駐紮在離大陸僅幾英里外的金門島和馬祖島。

美國的對臺政策

美國對臺灣國民政府的政策轉了一個大圈子：從漠不關心到積極支援，又退回到適度的忽視，最終發展到1979年1月的撤銷承認。在1949年下半年，華府看到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崩潰，打算聽任臺灣的陷落。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宣佈了一項不介入政策：

美國對臺灣或其他任何中國的領土沒有侵佔意圖。美國此刻根本不想在臺灣獲取特殊利益或權益，也不想在那地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也沒有動用其武裝力量去干涉當前局勢的任何意圖。美國政府不會執行一項將導致捲入中國內戰的方針。

同樣，美國政府將不會向臺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建議。⁴

但是，在1950年6月25日北朝鮮對南韓發動進攻之後，這一政策轉變了。杜魯門在6月27日宣佈，「共產主義已經越過了靠顛覆征服獨

⁴ 轉引自Joseph W. Ballantine, *Formosa: A Problem for United States Policy* (Washington, D.C., 1952), 120.

立國家的界線，現在它將使用武裝入侵和戰爭。……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軍隊佔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⁵他命令第七艦隊保衛臺灣，阻止任何共產黨軍隊的入侵，並敦促國民政府停止進攻大陸，以防止戰事的擴散。隨著這一政策轉變，華府於1950年7月28日派遣了一名代辦前往臺北；三天後，麥克阿瑟將軍拜會了蔣中正，討論聯合防禦計劃。8月4日，麥克阿瑟的副參謀長⁶抵達臺北，建立與國民政府的常駐性聯絡。

因此，朝鮮戰爭標誌了美臺關係的一個轉捩點。為了使臺灣「中立化」，同時防止它成為共產黨的戰利品，華府的「撒手」政策被拋棄了。當1950年10月中共「志願軍」參加朝鮮戰爭之後，美國的立場更加堅定不移。華府抵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承認，反對接納它進入聯合國。與此同時，美國重新向臺灣運輸軍事裝備，並開始提供經濟援助，從1950年6月1日到1951年6月30日，美國的援助總額達9,800萬美元。⁷此外，在1951年4月，一個由116人組成、以蔡斯(William C. Chase)將軍為團長的軍事援助顧問團進駐臺北，到1952年5月，該顧問團人數增加到四百人。臺灣在美國的防禦計劃中獲得了新的戰略重要性。麥克阿瑟將軍稱臺灣島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供應艦，位置十分理想，它既可用來完成進攻戰略，同時又能挫敗駐紮在沖繩和菲律賓的我方友軍發起的防守或反攻行動。」⁸1952年4月28日，日本決定與中國國民政府而非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和平條約，這進一步促進了國民政府的事業。鑒於國民政府對整個中國聲稱擁有合法管轄權，日本在條約中聲明，該條約條款適用於目前以及「將來可能」由國民政府控制的所有領土。

⁵ Ballantine, 127.

⁶ 福克斯(Fox)少將。

⁷ 美國經濟援助的額度如下：1951-52年，8,100萬美元；1952-53年，1.05億；1953-54年，1.16億；1954-55年，1.38億；1955-56年，7,900萬；1956-57年，9,000萬；1957-58年，6,100萬；1958-59年，7,400萬；1959-60年，7,000萬；1961-62年，1.34億。

⁸ 轉引自Ballantine, 153.

臺灣地位的改善反映在美國的駐臺代辦於1953年1月升格為大使⁹級別，以及1954年12月臺灣與美國簽訂的一項共同防禦協定上。中共在1954年秋和1958年試圖攻佔金門和馬祖，但國民政府在美國的鼓動下堅決抵抗，挫敗了中共的企圖。艾森豪威爾總統接受了國民政府的觀點，即無論這些近海島嶼的軍事價值如何，放棄這些島嶼就等於是屈膝投降。甘乃迪總統宣稱，如果對這些島嶼的進攻在美國看來構成進攻臺灣的前奏，華府就將採取適當的行動來保衛臺灣。這樣，臺灣的安全就受到了美國的保護。在1971年之前，國民政府一直在聯合國中代表中國。

然而，1971年7月15日尼克遜總統宣佈他將訪問北京的聲明，導致了一系列損害臺灣國際地位的外交行動。第一個重大的打擊是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及隨後國民政府代表團撤出聯合國以示抗議。接著是中美和解，隨後是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並廢除1952年日本與臺灣簽訂的和平條約。這些事件在其他國家中引發了一種趕時髦的心理，一個又一個國家拋棄了臺灣，轉而支持北京聲稱代表中國合法政府的主張。1969年，臺灣同六十五個國家保持著外交關係，到1974年10月，臺灣只同三十二個國家有外交關係，而且，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數目還繼續下降。美國也逐漸朝這個方向挪動，這表現在1973年5月北京和華府之間相互設立聯絡處。最後，在1979年1月，美國承認北京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到1988年，承認臺灣國民政府的國家只剩下二十二個，雖然與它保持商務關係的國家有一百五十一個。

政治結構

隨著日本在1945年8月戰敗投降，臺灣回歸並成為中國的一個省，由陳儀¹⁰出任行政長官。選擇陳儀是很糟糕的決定，因為他不是

⁹ 首任大使是Karl L. Rankin.

¹⁰ 不能將此人與中共外交部長陳毅混淆，這兩人的名字不是同一個字，但發音相同。

一個認真踏實的行政長官。他的任期內腐敗盛行，大搞歧視，充斥著無數醜聞，包括公開拍賣充公的日本財產大獲其利，並蠻橫地歧視臺灣人，把他們當作殖民地居民對待，不准他們在政府和大企業中擔任行政和管理職位。那些原本歡迎國民政府接管的臺灣人，很快便對陳儀的統治喪失了信心，逐漸認為他比日本的殖民統治還要糟糕。最後，公眾的義憤無法遏制，1947年2月28日，一場暴力起義爆發了。陳儀為爭取時間假裝妥協，同時請求大陸增派援兵，當援軍抵達後便對臺灣人大肆殺戮。儘管陳儀隨後被撤職¹¹多少緩和了局勢，但他的錯誤統治大大損害了國民政府的基業，刺激了臺灣人反對大陸人。¹²一直到1949年1月陳誠出任主席之後，雙方之間的怨恨關係才開始改善，主要原因是越來越多的臺灣人參與了省和地方的政府，當然，中央政府中的高級職位仍然是不對他們開放的。到1974年，大部分省政府職位中，有三分之一的內閣職位和幾個重要城市的市長全由臺灣人擔任。

臺灣的國民政府以總統為首腦，由一名秘書長和一名參謀總長協助他處理軍政事務。五院制結構保持了下來，但幾個院的職能和法律地位有了變化。立法院的權力增加了，而行政院의 權力則相應縮小。行政院長的任命要由立法院同意，立法院還擁有質詢權。立法委員由選舉產生，再由他們相互遴選產生總統和副總統。立法院可以倡議立法，質詢部長，審查財政預算，進行獨立的調查——與訓政時期的立法院相去甚遠，訓政時期的立法院只不過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法律起草部門而已。

司法院的構成也有了較大改變。它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1)「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法律和法令，由十七名成員組成，均由民國總統經監察院的同意任命；(2)「最高法院」；(3)「行政法院」；(4)「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¹¹ 後來，他在1949年1月因與中共代表密謀勾結而被槍決。

¹² 1950年，臺灣人與大陸人的比例是680萬比524,940人，1968年大致是一千萬比三百萬。1992年2月，臺灣行政院發佈了一份《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李登輝總統正式向死難者家屬表示道歉。

監察院委員由省市議會選舉產生，任期六年，監察院院長和副院長在該院委員中選舉產生。考試院設一名院長、一名副院長和十九名委員，均由選舉產生，任期六年。

臺灣省省政府完全仿照五院制機構，只是沒有外交部和國防部。省政府有自己的內政、財政、教育、農林、交通、公共衛生、公安等部門。從行政效率的角度來看，臺灣存在兩套並行的政府班子有點奢侈，讓這樣一個小島來供養也有點困難。但是，這種機構重疊是一種政治需要，因為設立一個中央政府不僅可以證明它所聲稱的對全中國的管轄權，而且也代表著它最終要回到大陸去的希望。

儘管中華民國宣稱自己是一個立憲制民主政府，但它沒有給與人民像美國那樣完全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理由是，在一個全民動員以進行「反共戡亂」的時期，必須做出一些限制。國民政府嚴格控制出版和傳媒，不允許任何人散發馬克思主義書刊，也不准任何人閱讀共產主義讀物，除非是經過特別准許。批評蔣及其家族和國民黨統治的人，還有那些鼓吹臺灣獨立運動的人，都有可能被秘密警察拘捕。反攻大陸的軍事準備與對中共滲透的高度警惕，使臺灣島處在戒嚴法管制之下，在民眾當中造成了一種緊張和謹慎的情緒。國民政府剝奪公民自由的做法遭到了國外人士的批評，但它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對自己的限制措施作辯護，並提請批評者比較一下臺灣和大陸的自由程度。總體來說，臺灣人民似乎接受了這些限制，並且認為這是過相對自由和富足的生活所必須支付的代價。

臺灣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敏感話題是蔣的總統任期。憲法規定總統由選舉產生，任期六年，可以連選連任第二任期。1948年，蔣首次在南京當選為總統，1954年他在臺灣再次當選。在任總統能否第三次當選是個微妙而又從未有過的問題，隨著1960年的臨近，這個問題出現了。由於蔣不贊成修憲，1960年2月的國民大會決定，在「全民動員戡亂救國」時期暫時中止憲法限制總統任期屆數的規定。1960年3月21日，蔣第三次當選為總統，陳誠當選為副總統。1966年他又第四次連任，嚴家淦當選為副總統兼行政院長。

1972年，蔣第五次當選，嚴家淦當選為副總統，而蔣的長子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對中華民國來說，這是一個經受嚴峻考驗的時刻，

政府面臨著一系列的國際困境：國民政府代表團退出聯合國，華府與北京達成和解，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部，86歲高齡的蔣健康狀況惡化，到1974年5月以前一直未在公開場合露面。政府要務由副總統和行政院長掌管；他們認識到，臺灣的前途依賴於同臺灣人達成諒解，臺灣人已經被排斥在高級委員會之外達二十五年之久。行政院長蔣經國時年62歲，注定要做他父親的接班人，他委任一些臺灣人充任政府要職，人數之多前所未有：六名內閣成員、臺灣省省長¹³和臺北市市長。¹⁴ 1972年12月，為選舉立法院五十三個席位舉行的大選，進一步擴大了臺灣人在政府中的代表權。嚴家淦和蔣經國似乎掌握了確保未來臺灣安定的三個重要秘訣：(1) 蔣的接班問題；(2) 接納臺灣人佔據高級職位；(3) 相應地放寬蔣的嚴厲控制，從而使現存政治程序自由化。在他們的領導下，國民政府在國際困境和北京的外交和心理攻勢面前，默默地保持了尊嚴。國民政府號召人民「自力更生」，「以對最後勝利的堅定信念克服」國際上的安撫主義。

中美和解產生了一種意外的結果，使四百萬大陸人和一千兩百萬臺灣人聯繫更密切了。由於北京把國民政府和臺獨運動都視為非法之物，因此，國際孤立就意味著此二者都面臨同樣渺茫的前途。曾經屠殺過臺灣人的大陸人和不滿國民政府統治的臺灣人，突然發現他們的命運交織在一起，他們意識到，聯合起來對雙方都有利。團結能使他們有更好的生存機會，而紛爭則使他們成為北京的俎上魚肉。這種認識縮短了兩個集團之間的政治、社會和心理差距；相互通婚也開始盛行了起來。事實上，除了極少數山區土著人外，臺灣人和大陸人都繁衍自同一個種族，「無論是從其社會和政治觀念，還是從其祖先來看，他們根本上都是中國人」。¹⁵ 在今天的臺灣人中，75%是福建省移民的

¹³ 謝東閔。

¹⁴ 張豐緒。

¹⁵ Sheldon Appleton, "Taiwanese and Mainlanders on Taiwan: A Survey of Student Attitudes," *The China Quarterly* (Oct.–Dec. 1970), 44:56.

後裔，13%是來自華南的客家人。¹⁶ 在台大陸人與臺灣人之間的差別是一種人為的區分，現在，政府和民眾都有意識地努力沖淡這種區別。

根據斯諾的報道，毛澤東把臺灣回歸大陸主權看作是他「統一中國的最終目標」，他堅持，臺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必須予以解放；但他將妥善地處理這個問題，「如果蔣介石希望一輩子待在那裏當省長的話，也許可以給予他某種自治地位。」¹⁷ 在蔣和他的追隨者看來，這個主意是十分荒唐和無禮的；他們頑固地拒絕與中共談判。相反，北京面臨著蘇聯在其北方邊境的威脅，又與美國達成了和解，因此似乎不急於用武力解放臺灣。北京方面相信時間在自己一邊，故試圖通過讓臺灣陷入國際孤立的外交行動，來摧毀國民政府的士氣，並大肆渲染臺灣與大陸統一乃不可避免的趨勢，以震懾臺灣孤島。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似乎執行著一種盡可能長時間地維持現狀的政策，與此同時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並保證國際紐帶不受損害。

經濟和社會發展

在大陸失敗的慘痛教訓使國民政府認識到，他們不能忽視社會和經濟改革的緊迫問題。一當在臺灣立住腳跟，他們就努力在從前失敗的地方爭取成功。依靠美國方面的建議（通過「農村重建聯合委員會」），也依靠高度集中的智囊和技術手段，國民政府以堅定的決心，成功地開展了一場分為三個階段的土地改革運動，從而實現了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這場農村重建運動背後的靈魂人物是省主席陳誠，他在1949年開始了第一階段的改革，強制推行降低地租，將地租從當時盛行的主要作物產量的50-70%降至37.5%。¹⁸ 在現有地租低於37.5%的地方，則

¹⁶ Mark A. Plummer, "Taiwan's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urrent History* (Sept. 1971), 171.

¹⁷ Edgar Snow, "China Will Talk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Life*, July 30, 1971, 24.

¹⁸ 國民黨最早在1930年採納了37.5%的地租率（時稱「三七五減租」），但卻從未實行過。

地租照舊。此外，由於「口頭租耕」的老做法不能給佃農提供任何法律保護，這種做法被勒令取消了，代之以書面的租約，有效租期至少為六年。通過這些措施，三十萬農戶的境況得到了大大改善，收入的增加使他們有能力購置耕牛和房屋，這些物件被冠以「三七五耕牛」和「三七五房屋」的綽號。¹⁹

第二階段的土改開始於1951年6月，銷售四十三萬英畝的公地。這筆地產佔臺灣全部耕地的20%，原來是由日本殖民政府留出來供安置日本移民的。國民政府允許每個農民從這批地產中購買一塊足夠大的田地以供養六口自家：七畝稻田或十四畝旱田。土地的售價定為這塊地主要作物年產量的兩倍半，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形式分作二十個半年期來償還，欠款利息為4%。每一期的付款不得超過當前的地租。第二階段的改革使139,688名農民成為土地擁有者。²⁰

第三階段的土改開始於1953年1月，措施是強行將私田和出租田賣給政府，政府再將之以同樣的價格轉賣給農民，只收取4%的年利。至少有193,823戶農戶從這些措施中獲益，使擁有土地的家庭總數達到了四十萬戶——也即兩百五十萬到三百萬個人。土地改革計劃的完成，將全部農田中的出租率從39%降低到15%。²¹到1968年初，佃農只耕種10%的土地，而90%的土地全由田地擁有者耕種。²²

由於這些田地改革政策，主要作物的產量大大提高了。農民生活的普遍小康反映在他們建造或修繕了大批房屋，擁有了大量自行車和縫紉機。

最引人注目的是工業發展的速度。最初階段(1945–52年)主要是恢復遭受戰爭破壞的工業設施，在這之後，政府貫徹了一項1953–56年的四年經濟發展計劃，優先鼓勵中小型基礎工業，因為這些企業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資本，且可利用當地的原材料。為了提高農村社會的

¹⁹ W. G. Goddard, *Formosa: A Study in Chinese History* (East Lansing, Mich., 1966), 191.

²⁰ Goddard, 192; Chiao-min Hsieh, 285–86.

²¹ Goddard, 193; Chiao-min Hsieh, 286.

²² *Free China Weekly*, Taipei, Feb. 4, 1968.

就業率，政府還鼓勵恢復家庭和手工工業。第一個四年計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依靠的是來自大陸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美國的經濟援助，以及爭取使臺灣成為太平洋地區經濟發展樣板的堅定決心。幾乎各項工業活動都取得了進步：鋁、鹼、紡織、電力、化學、造紙、黃麻、食糖、鳳梨、蘑菇、工藝品，等等。到1956年末，約有兩千家工廠在營業，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在1952年以後建造起來的。在這一時期，工人的數量從274,000人增加到340,000人，而1956年的生產指數比1951年增加了一倍多。1956年的人均收入比1953年增長了42%。²³

第一個四年計劃的巨大成就，鼓勵政府隨後發起了更多的四年計劃，這些計劃都很成功。從1963年到1973年，臺灣的年經濟增長率平均為9.7%。最高的一年1964年高達14.2%，最低的一年1966年也有8.07%，但各年的增長率都超過了最初7%的目標。1973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93.9億美元，而1952年只有12億美元。政府官員在1973年自豪地宣稱，臺灣的年人均收入已達到了467美元，個人每天的卡路里攝入量達2,697，臺灣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亞洲國家中僅次於日本。²⁴ 儘管1965年年中美國的援助停止了，臺灣仍保持了相當的經濟繁榮，1974年臺灣的國民生產總值達141億美元，人均收入達702美元。在1965年到1972年之間，臺灣巨大地得益於美國為進行越南戰爭而開的採購訂單，但即使在越戰結束後，臺灣的經濟仍繼續興旺。1973年的對外貿易增長至82.6億美元，比1972年增長50.2%，其中出口總額為44.7億美元，進口總額為37.9億美元。1973年，臺灣對其他所有國家的貿易都保持著順差，只是對日本的貿易是例外，據統計，對日貿易逆差為6.03億美元。²⁵ 上述數據表明，儘管臺灣的政治前途很不確定，但在經濟上卻是一個相當強大的獨立實體。然而，這也使它成為對大陸政府更具吸引力的爭奪對象。

²³ Chiao-min Hsieh, 309–10.

²⁴ *Free China Weekly*, Dec. 23, 1973, May 5, 1974.

²⁵ *Free China Weekly*, Jan. 20, March 24, 1974.

文化生活

到1967年，臺灣達到了97.15%的高識字率。能取得這樣令人矚目的成就，也許是因為憲法規定，國家預算的15%、省政府預算的25%和縣政府預算的35%要投入教育。從1968年秋季學期開始，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到了九年。1973年，全島總人口中超過四分之一是在讀學生，分佈在2,307所小學、948所中學和99所大學院校中。自日本統治結束以來，臺灣的教育制度得到了巨大改善，突出的是教育機構數量的增加；1946年，臺灣只有1,130所小學、215所中學、一所大學和三所學院。²⁶到1974年年中，臺灣每一千個人中有278名學生，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²⁷

與臺灣教育制度的發展相輔相成的，是臺灣研究機構範圍的擴展和質量的提高。國立臺灣大學是臺灣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設有培養研究生的專業；從1960年起，大學與教育部聯合授予博士學位。在純粹的研究機構中，最孚盛名的是坐落在臺北城外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那裏秀麗的院址和周圍的田園風光，為嚴肅的學者們提供了天堂般的研究場所。研究院設置若干研究所，如數學、歷史語言學、化學、動物學、人類學和近代史等。近代史研究所是最年輕的研究所之一，成立於1955年，已出版了一些有才華的年輕學者撰寫的優秀專著。其他一些值得一提的研究機構，有清華大學原子能研究所和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臺灣學者把臺灣島看作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儲藏地。許多從前收藏在北京和南京的博物院中的藝術珍品現在收藏在臺灣。從北京的故宮博物院運來了231,910件藝術珍品和善本書，從南京的中央博物院運來了11,729件無價珍品。這批中華藝術瑰寶定期在臺北城外莊嚴的故宮博物院展出。

以上對臺灣主要發展情況的粗略評述，表明了這樣的事實：在大陸遭受慘敗的國民政府，在臺灣卻成功地將這座島嶼建設成了一個「模

²⁶ 《中央日報》，臺北，1974年10月24日。

²⁷ *Free China Weekly*, July 21, 1974.

範]省份和亞洲的出色地區。臺灣人民在物質上享受著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普遍小康和高生活水平。然而，儘管有這些外表的繁榮，它終究只是個作為有限的小島。它不是中國的精神之鄉。年紀較大的大陸人感到沒有社會根基，思想孤立，精神空虛。年輕人則因沒有施展才華的餘地而洩氣。許多人的最大願望是移居他處尋求新的生活。雖然大陸人仍然渴望回到大陸，但想法實際的人知道，這只是一個夢想，在他們有生之年很難實現。「回大陸去」的口號已經沉寂了，相反，人們更看重把臺灣說成是一個具有永久價值的「寶島」。臺灣不再是一個最終回歸大陸之前的中轉站，而是成了一個可以逃脫共產黨統治的棲身之地。物質上的繁榮與精神上的焦慮共生共存，這驗證了一條出自《聖經》的真理：人不能僅僅靠麵包生活。他需要有希望才過得有意義的生活。

1975年4月5日蔣的去世，對國民黨的事業構成了一個沉重的心理打擊。長期以來，蔣一直是亞洲反共運動的象徵，他是二戰時期同盟國主要領導人中活得最長的一位。臺灣人懷著深深的失落感哀悼他的逝世，但這對權力結構或政府的政策都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因為政府從1972年開始就為這一時刻做好了準備。根據憲法程序，副總統嚴家淦於4月6日宣誓就任新總統，他只是一個名義上的首腦，而行政院長蔣經國掌握著政府實權。

蔣作於1975年3月29日的遺囑中，要求他的人民不要因他的去世而沮喪，而應獻身於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復興文化遺產，堅持民主制度。他的遺囑在風格上顯得與孫中山先生作於1925年的遺囑非常相似。福特 (Ford) 總統讚揚蔣是「一個正直、勇敢並具有堅定政治信念的人」。在許多西方人看來，蔣的死亡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時代的終結，但對於他在臺灣的追隨者來說，實現他遺囑的任務才剛剛開始。

參考書目

- Ahern, Emily M., and Hill Gates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Stanford, 1981).

- Appleton, Sheldon, "Taiwanese and Mainlanders on Taiwan: A Survey of Student Attitudes," *The China Quarterly*, 44:38–60 (Oct.–Dec. 1970).
- Ballantine, Joseph W., *Formosa: A Problem fo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1952).
- Barclay, George W.,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Princeton, 1954).
- Bueler, William M., *U.S. China Policy and the Problem of Taiwan* (Boulder, 1971).
- Chiu, Hungdah (ed.),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 1973).
- Chiu, Hungdah, and Shao-chuan Leng (eds.), *China: Seventy Years after the 1911 Hsin-hai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1984).
- Chuang, Ying-chang, and Arthur P. Wolf, "Marriage in Taiwan, 1881–1905: An Example of Regional Divers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81–795 (Aug. 1995).
- Clough, Ralph N., *Isl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8).
- Cohen, Jerome Alan et al., *Taiwan and American Policy: The Dilemma i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1971).
- Davidson James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New York, 1989).
- Dickson, Bruce J., "The Lessons of Defeat: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on Taiwan, 1950–52,"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3, 56–84.
-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1992年)。由臺灣中華民國行政院發佈。
- Freedman, Ronald, and John Y. Takeshita, *Family Planning in Taiwan: An Experiment in Social Change* (Princeton, 1969).
- Galenson, Walter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haca, 1979).
- Goddard, W. G., *The Makers of Taiwan* (Taipei, 1963).
- , *Formosa: A Study in Chinese History* (East Lansing, 1966).
- Gordon, Leonard H. D. (ed.), *Taiwan: Studies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New York, 1970).
- Grasso, June M., *Truman's Two-China Policy, 1948–1950* (Armonk, N.Y., 1987).
- Gregor, A. James, with Maria Hsia Chang and Andrew B. Zimmerman, *Ideology*

- and Development: Sun Yat-se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Berkeley, 1982).
- Ho, Yhi-m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1903–1960* (Nashville, 1966).
- Hsieh, Chiao-min, *Taiwan: Ilha Formosa* (London, 1964).
- 黃嘉謨：《美國與臺灣》（臺北，1966年）。
- Huang, Shu-min, *Agricultural Degradation: Changing Community Systems in Rural Taiwan* (Lanham, Md., 1982).
- Huebner, Jon W., “The Abortive Liberation of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110:256–75 (June 1987).
- Jacobs, J. Bruce, “Recent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Trends i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45:120–54 (Jan.–March 1971).
-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A Decade of Rural Progress, 1948–1958* (Taipei, 1958).
- Kerr, George,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1965).
- ,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Honolulu, 1974).
- Kirby, E. S. (ed.), *Rural Progress in Taiwan* (Taipei, 1960).
- Kung, Lydia, *Factory Women in Taiwan* (Ann Arbor, 1983).
- Lai, Tse-han,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1991).
- Lasater, Martin L., *The Taiwan Issue in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Boulder, 1984).
- Lee, Teng-hui, *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 (Ithaca, 1971).
- 連橫：《臺灣通史》（上海，1947年），共兩卷。
- Mendel, Douglas,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1970).
- Peng, Ming-min, “Political Offenses in Taiwan: Laws and Problems,” *The China Quarterly*, 47:471–93 (July–Sept. 1971).
- Rankin, Karl L., *China Assignment* (Seattle, 1964).
- Ravenal, Earl C., “Approaching China, Defending Taiwan,” *Foreign Affairs*, 50:1: 44–58 (Oct. 1971).
- Riggs, Fred W., *Formosa under Chinese Nationalist Rule* (New York, 1952).
- Shen, T. 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n Taiwan Since World War II* (Ithaca, 1964).

- , *The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Twenty Years of Cooperatio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haca, 1970).
- Shieh, Milton J. T., *Taiwan and the Democratic World* (Taipei, 1951).
- Sih, Paul K. T. (ed.), *Taiwan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 1973).
- Simon, Denis Fred, *Taiwa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nationalism* (Boulder, 1983).
- Stolper, Thomas E,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Armonk, N.Y., 1985).
- Tsurumi, E. Patricia,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Mass., 1977).
- Vander Meer, Canute and Paul Vander Meer, "Land Property Data on Taiw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II:1:144–50 (Nov. 1968).
- Wilson, Richard, *Learning to Be Chines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Taiwan* (Cambridge, Mass., 1970).
- Wolf, Margery,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1972).
- Wu, Rong-I,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aiwan* (Louvain, 1971).
- Yang, Martin M. C., *Socioeconomic Results of Land Reform in Taiwan* (Honolulu, 1970).

第七編

毛後中國：追求一個新秩序

第三十二章

粉碎四人幫

1976年對中國來說是個凶年。中華大地的每個角落，都沉浸在失去三位偉大領袖的悲傷之中：周恩來總理、朱德元帥及毛澤東主席分別在1、7及9月先後逝世。一系列自然災害更加重了人們的悲痛之情：7月，一場大地震摧毀了北京東南105英里處的工業城市唐山；在隨後兩個月裏，黃河發生了七次洪水泛濫。伴隨著這些災難和政治不穩定的是，由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及其同夥（即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一夥人）挑起的接班危機。這個動盪不安的年份，真可謂充滿了中國人所說的「天災人禍」。這是一個悲哀的時刻，但正如黎明前的黑暗一樣，它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刻。一種新秩序正努力從混亂中脫胎而出，這個新秩序將帶給人民更加安定、進步和更美好生活的期待。

國家領導人的逝世

周恩來(1898–1976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的去世是一個無可挽回的損失。他是黨和政府的擎天柱，一直在無數的政治風暴中發揮著緩衝作用。周恩來把中國從文化大革命高潮時期的徹底混亂中拯救了出來，並協助阻止了四人幫攫取國家的最高權力。

周恩來在清朝末年出生於紹興的一個鄉紳家庭。他就讀於南開中學，之後前往日本深造。1920年，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在歐洲待了四年。在那裏，他與同學鄧小平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後來的中國共產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以後，周恩來成為毛澤東的忠實支持者。自1949年起一直到去世，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服從毛澤東變

幻無常的領導，默默地掌握政府的運作，不動聲色地緩和毛澤東的某些過激行為。

周恩來渾身散發著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和溫文爾雅的老練。他那精幹的風度和對世界事務的廣博見識折服了所有外國來訪者。尼克遜總統說：「在二十世紀中，就對世界歷史的影響而言，只有很少一些人能夠與周恩來媲美……他的敏捷、達觀和睿智無人能予匹敵，這些都使他成為一位偉大的領導人。」¹

早在1972年，周恩來就備受癌症的折磨，他似乎策劃了讓鄧小平在1973年復出擔任副總理，並推薦他做接班人。激進派報之以發起批林批孔運動，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周恩來繼續工作，即使在1974年夏入院治療後也是如此。他在病床上處理國家事務，接見來賓，偶爾也公開露面。他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十五周年國慶慶典，並在1975年1月的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了主題報告。這份報告為後來被稱為「四個現代化」的運動奠定了基礎。所謂的「四個現代化」就是：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在本世紀末把中國建設成世界前列的強國。

七十八歲的周恩來逝世了，九億中國人無不哀悼這位備受敬愛的護國長者，深切緬懷這位進行革命鬥爭和操勞國家事務的偉人。他長期以來對國家做出的巨大貢獻，尤其是他在「十年動亂」（也即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懈努力，使他當之無愧地贏得了人民的景仰。

華國鋒的崛起 周恩來曾謹慎地推薦鄧小平做他的接班人。在周恩來住院治療的最後一年，鄧小平獲得了相當大的權力，成為實際上的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接見外國領導人。然而，在1976年1月15日周恩來的追悼會上致悼詞後不久，鄧小平就從公眾場合消失了，政府沒有任何解釋。2月6日的《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死不悔改」的當權派。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極力推薦第二副總理張春橋出任總理，但許多黨內和軍隊的高級幹部都不接受張春橋。2月7日，中國政府出人意料地宣佈任命第六副

¹ *The New York Times*, Jan. 9, 1976, 11-12.

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為代總理。無論是激進派還是溫和派都不滿這個選擇，但由於毛澤東的崇高威信，無人對此提出異議。

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受到妻子的壓力，想過要支持中央文革小組，但又不想貿然觸犯高級幹部和軍隊領導人。毛澤東似乎在這樣的兩難境地中選擇了華國鋒。華國鋒是一位思想上可靠的忠實信徒，他將擔任總理之職，直到江青一夥能接管政權。華國鋒是一位農業專家，曾擔任過毛澤東故鄉省份湖南省的第一書記，選擇他顯然是一種妥協，因為他與務實派和激進派都沒有瓜葛。與此同時，毛澤東通過任命華國鋒，巧妙地挫敗了周恩來安排鄧小平接班的計劃。²

在任命華國鋒之後不久的清明節期間，爆發了一個重大事件。清明節是中國人按傳統祭奠祖墳的節日。在3月29日到4月4日之間，數目不斷的人每天前往天安門祭奠已故的周總理，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紀念碑成了周總理的象徵性陵墓。當警察和保安人員搬走花圈時，激怒了群眾。4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十萬名抗議的群眾，高呼「秦始皇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的口號，並張貼支持鄧小平的標語，朗誦讚揚周恩來和鄧小平及影射毛澤東的詩歌。³ 群眾的情緒很快達到白熱化的地步，示威活動無法控制。狂熱的示威者放火燒四輛摩托車，砸碎一座軍營的窗戶，隨後警察、公安和民兵驅散了群眾。

北京市長吳德把這場暴亂與反對「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人聯繫起來。鄧小平遭公開指責為罪魁禍首、走資派和「右傾翻案風的幕後總指揮」。兩天以後（4月7日），經毛澤東提議，中央委員會作出決定，宣佈鄧小平的「問題已經轉化為敵我矛盾」，因此解除他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但允許「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與此同時，正式宣佈任命華國鋒為總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⁴ 4月8日，十萬名群眾到天安門廣場遊行，聲援新誕生的領導集體。華國鋒成為總理接班鬥爭中出人意料的勝利者。

² Ch'en Yung-sheng, "The 'October 6th Coup' and Hua Kuo-feng's Rise to Power," *Issues and Studies*, XV: 10:80-82 (Oct. 1979).

³ 毛澤東曾把自己比作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的秦始皇。

⁴ 中共中央公告的英文譯本載於 *The New York Times*, Apr. 8, 1976, 16.

4月30日，毛澤東給華國鋒寫了三條重要的親筆指示：(1)「慢慢來，不著急」，(2)「按過去方針辦」；(3)「你辦事，我放心」。⁵華國鋒把這些指示看作是表明了毛澤東指定他為接班人的意思。他在政治局會議上當著惱怒的四人幫的面出示了前兩條指示，四人幫一夥現在不再把他看作是一個可能的盟友了，而把他看作是一個新的敵人。華國鋒保持了冷靜，他暗中留下了第三條指示以備日後之用。

唐山大地震 國家領導人的逝世和接班鬥爭的政治動盪似乎還是不足夠的苦難，1976年7月28日，在擁有160萬居民的煤炭中心唐山，又發生了一場里克特制 (Richter) 八點二級的大地震。地震將整座城市夷為平地，並給附近的大城市天津帶來了相當大的破壞，天津是中國的第三大城市，人口有430萬。唐山市化作一堆廢墟。一份政府的秘密報告統計出655,237人死亡、779,000人受傷，但中國地震學會後來公佈的數字要低得多。⁶根據傳統，中國人把這樣巨大的自然災害看作是社會政治巨變的預兆。

毛澤東(1893–1976年) 毛澤東多年來一直受帕金森氏疾病的折磨，這是一種慢性惡化的疾病，引起肌肉僵硬和顫抖。在他生命的最後兩三年裏，他的健康因一次中風而迅速惡化，這次中風影響了左半邊身體，損害了語言機能。他每天會交替出現清醒舒服和神志不清的時刻，因此等候他接見的外國政要會接到奇怪的會見時間和突然的通知。他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只有等待歷史有時間整理他對中國和世界造成的影響之後，才能對毛澤東做出全面的評價；現在則只能作一些初步的評價。對中國來說，毛澤東是集列寧和史太林於一身的人物。他是二十世紀中葉最成功的偉大的革命家。他最大的成就，是創造性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運用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奪取了中國的政權。在李大釗的影響下，

⁵ *Peking Review*, Dec. 24, 1976, 8. 也見Richard C. Thornton, "The Political Succession to Mao Tse-tung," *Issues and Studies*, XIV:6:35 (June 1978).

⁶ 稱有24萬人死亡，164,000人受傷。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1, 1977.

他相信解放農民是解放中國的前奏。他發明了一套組織農民包圍城市的策略，並為第三世界樹立了成功的革命榜樣。他打算把這套戰略運用到國際舞臺上，鼓勵第三世界團結起來，努力奮鬥，最終摧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在他的一生中，毛澤東經受著一種持久的不安分情緒的推動。他造他父親的反，造地主資本家的反，造國民黨統治的反，造蘇聯控制和修正主義的反，最後造他自己的政黨和老戰友們的反。他急不及待地要求變化，想一下子改變國家、社會和人性——「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他在內心是一個追求純真的人，他造就不間斷的變革，努力保持革命的勢頭，使國家和人民疲於奔命。國家的巨大精力都消耗在群眾運動和內部爭鬥之上。他二十七年的統治幾乎沒有給人民的生活水平帶來甚麼改善。

因此，在1949年革命成功後，毛澤東似乎是江郎才盡了。引導他奪取政權的才華，不能引導他成功地治理這個龐大散亂的國家。經過解放後最初的幾年實踐，毛澤東的領導顯得步履蹣跚。反右運動（1957年）對知識分子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傷害，而他們的知識和技術正是中國所急需的。人民公社開展得太匆忙；大躍進倒退了回去；與彭德懷的鬥爭是不明智的；而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組織遭受的毀滅性破壞，則是一場十足的災難。扶植江青做國家領導人和可能的接班人的主意，違背了人民及毛澤東的老同事的願望。在他的最後歲月裏，毛澤東本人越來越深地陷入作繭自縛的境地，對他一向聲稱自己所代表的人民大眾的情感反應遲鈍。他在去世時是一個孤獨、悲哀的人，他那種改造人性、將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強國的夢想沒有實現。我們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歷史的透視，將能對毛澤東的成就和錯誤作出一個全面性的評價。至於現在，我個人對他一生的淺見可以用以下的話來概括：

革命有餘，建國不足。

四人幫

四人幫的陰謀 由於缺乏和平交接權力的憲法機制，當在位的領導人去世時，便會出現接班危機。毛澤東去世後突然爆發的激烈

的權力鬥爭，是由他的夫人江青挑起的。江青期望接毛澤東的班當黨的主席，讓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讓張春橋當國務院總理。已經主管中央宣傳部的姚文元也許會再擔任一些職務，承擔「文化沙皇」的角色。這四個構成中央文革小組核心的人物，勾結起來策劃奪取政權，但他們的主要障礙是華國鋒。作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也作為毛澤東的指示（「你辦事，我放心」）所指的對象，華國鋒有著牢固的接班權利。他還得到汪東興的支持，汪東興是毛澤東的首席警衛，是有兩萬人之眾的8341部隊的首長。

江青依靠的王牌毛澤東已經去世了。她手裏還剩下的賭注是控制著新聞媒體以及上海、北京、天津和廣州等關鍵地方的城市民兵。⁷在毛澤東去世之前，四人幫就已經策劃向上海民兵分發槍支彈藥，建立一個「全國民兵總指揮部」，以圖與北京的中央軍委抗衡。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二天，六百萬發彈藥分發給了上海民兵。⁸

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對江青及其同夥十分討厭，但只要毛澤東還在世，他們就沒有力量反對這幫人。天安門事件之後，他們私下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發動一場反政變才能制止四人幫篡奪政權。他們委託國防部長葉劍英去做微妙的工作，與華國鋒培養友誼，向他保證他們將支持他做毛澤東的接班人。⁹

另一股反江青勢力也在悄悄地行動。4月份被解職的鄧小平遭到四人幫的逼迫，他在葉劍英和許世友的保護下逃往廣州。這三人和另外幾個人，包括日後的總書記趙紫陽，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在會上，他們決定與福州軍區和南京軍區建立聯盟對抗四人幫，並以廣州為大本營。如果江青篡奪了政權，他們將建立一個臨時中央與她抗衡。在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悄悄回到北京靜候事態的發展。¹⁰

⁷ Chien T'ieh, "The Chiang Ch'ing Faction and People's Military Forces," *Issues and Studies*, XII:1:25 (Jan. 1976).

⁸ *Peking Review*, Feb. 4, 1977, 5-10; Andres D. Onate, "Hua Kuo-feng and the Arrest of the 'Gang of Four'," *The China Quarterly*, 75:555-56 (Sept. 1978).

⁹ Ch'en Yung-sheng, 78.

¹⁰ 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的陳述，轉引自Ch'en Yung-sheng, 85-86.

與此同時，四人幫也在策劃暗殺政治局委員，以華國鋒、葉劍英和其他幾個人為主要目標。面對共同的威脅，華葉二人成了緊密的盟友，他們採取了發動政變所需的準備措施，包括籠絡汪東興。這樣，一個三方聯合建立了起來，在其中，葉劍英是策劃者，華國鋒制定行動計劃，汪東興則負責實施計劃。首先必須穩住上海。為此需要有廣州軍區司令許世友的幫助，他在滬寧地區有著廣泛的關係網，通過他可以得到上海警備區司令的合作，在城民兵動手之前就控制住這個關鍵的城市。¹¹ 在北京，華國鋒得到了陳錫聯司令員和吳德市長的支持，並與衛戍區部隊、解放軍總部和8341部隊保持著合作。

在9月18日的追悼會上，華國鋒引用了毛澤東著名的格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暗示他已得到了軍方的支援。華國鋒還引用了毛澤東的「三要三不要」指示：(1)「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2)「要團結，不要分裂」；(3)「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¹² 不能忽視這段引語的意義，因為毛澤東在最早作這些指示的場合，曾警告他的夫人及其同夥「不要搞四人幫」。

十月六日政變 到9月底，政治局舉行了幾次爆炸性十足的會議。江青指出華國鋒不能勝任領導黨的重擔，要求讓她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反駁說他不僅能夠勝任，而且還知道如何「解決問題」——過後想一想，這是一種表明他有意要清除四人幫的預兆。

10月5日凌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參加者有五人：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北京衛戍區司令陳錫聯、副總理李先念(他是鄧小平的同盟者)。他們決定搶在四人幫發動政變之前迅速採取果斷行動，一舉逮捕對方的四個頭目。華國鋒和葉劍英負責各個方面，陳錫聯受命擔負保衛北京的重任，汪東興則負責逮捕四人幫。與此同時，廣州軍區進入警戒狀態，隨時準備接到命令就派兩個師空運到北京。

接著，華國鋒邀請四人幫在10月5日深夜赴中南海出席政治局緊

¹¹ Onate, 556.

¹² 悼詞全文見*Peking Review*, Sept. 24, 1976, 12-16.

急會議。王洪文最先到達。他拒捕時打死了兩名警衛，但自己也受了傷被制服。張春橋和姚文元隨後趕到，兩人都落入了圈套。當前往拘拿江青時，江青還躺在床上。她大叫：「主席屍骨未寒，你們竟敢造反！」¹³ 10月6日清晨，四人幫一夥被一網打盡。這四人隔離關押在北京。

10月7日，華國鋒和汪東興分別向政治局作了兩份報告，葉劍英作了一份報告。這些報告包括了對四人幫的詳細指控，它們肯定事先就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寫好了。四人幫被如此乾脆順利地粉碎，竟然沒有引發任何內部紛爭問題；這場勝利必須歸功於那三位核心人物，他們具備多年的警衛和軍事經驗。政治局推舉華國鋒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兼軍委主席，授權他主管編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¹⁴

10月24日，一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大會。華國鋒在軍隊高級將領的陪同下微笑著出席慶祝儀式，這顯示了軍方在這場「宮廷政變」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也表明了軍隊繼續支持華國鋒。華國鋒被歡呼為黨的「英明領袖」、接毛主席班的「偉大舵手」，幾乎完全具備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優秀品德的卓越領導人。¹⁵ 次日，經過整頓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稍後，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1977年7月）把粉碎四人幫說成是中共黨史上的第十一次重大路線鬥爭，其重要性幾乎同遵義會議（1935年）相等，並讚揚華國鋒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¹⁶

有幾個方面的因素促成華國鋒的勝利。作為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

¹³ 臺北《中央日報》1980年9月23日報道。

¹⁴ 推舉華國鋒一事被推測是在10月7日作出的，但可能要晚一些。10月7日最初發佈的政治局公告沒有提到華國鋒的任命。1976年10月29日的*Peking Review*刊登了「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一文（第14頁），文章在過後宣佈：「根據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的安排，1976年10月7日的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任命華國鋒同志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¹⁵ 「華國鋒同志是我黨的英明領袖」和「偉大的歷史性勝利」，兩篇文章刊登在*Peking Review*, No. 44:14-16, Oct. 29, 1976; No. 45:5-6, Nov. 5, 1976.

¹⁶ *Peking Review*, No. 47, Nov. 19, 1976.

務院總理，他擁有在位領導人的所有優勢。他獲得了軍隊和黨內領導人的支持，贏得了汪東興和8341部隊的合作。他把握住了國家的脈搏，深知人民痛恨江青及其同夥；他通過將四人幫粉碎表達了人民的「共同心願」。最後，他曾擔任林彪事件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因此他明白，林彪倒臺的主要原因就是猶豫不決，所以他果斷及迅速地採取了行動，將陰謀者一舉打垮。

另一方面，四人幫的失敗歸根到底要追溯到毛澤東的去世。在毛澤東的保護下，這四個人用他的名義發號施令，對不合作者肆意揮舞大棒。他們虐待了幾千名德高望重的長者和領導人，利用打砸搶分子和特工人員欺壓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此外，四人幫過著頹廢、特權的資產階級私生活。比如，江青保留一架「銀白色」的噴射飛機供自己專用，享用最昂貴的德國照相設備，穿著絲綢服飾，在奢華的場合招待客人。¹⁷ 儘管這些過分的行為脫離了群眾，玷污了中國革命的理想，但毛澤東的保護卻有效地制止了對他們的批評。

四人幫虛弱不堪的第二個重要原因，是軍事力量與媒體控制之間的不對稱。四人幫控制不了軍隊，只控制新聞媒體，而媒體是缺乏組織和火力的。因此他們非常依賴對媒體和文化舞臺的控制來製造公眾輿論，營造出一種誇大的權力形象。他們聽到了響亮的支援聲，也受到了廣泛的報道，這些東西或許誘使他們認為自己非常強大，而實際上他們並不那麼強大。此外，江青過分相信，身為毛澤東的夫人，沒人敢反對她。但事實是，一當她成為毛的遺孀，她的命運就完了。

四人幫遭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他們被斥責為陰謀家、極左分子、反革命和國民黨的代表。

毛澤東與四人幫

要使毛澤東與四人幫脫離關係是做不到的。因為沒有他就沒有四人幫；沒有他的夫人，四人幫就沒有一個可以安心受保護的首領。江

¹⁷ 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1977), 37-38.

青從前是個左翼電影演員，長征以後來到延安，成為毛澤東的秘書。兩人墮入了情網，毛澤東要迎娶她，令第三任妻子驚愕不已，她強烈抗議，拒絕與毛離婚。高級幹部也不贊成這樁婚事，但兩人還是在1939年結了婚。據說，在結婚之前，高級幹部迫使毛澤東答應，他的這位妻子將永遠不參與政治，或至少二十年裏不從政。¹⁸

毛澤東認識到了江青想當主席的「大野心」，他也聽過她在文革期間冤枉、傷害、逮捕並殺害了無數的人。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警告四人幫一夥：「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1975年5月，他以「三要三不要」的指示警告他們，最後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¹⁹由此看來，毛澤東是察覺四人幫的過分行為，而且完全可以發一道清楚的指令，約束住四人幫的首領。但他卻沒有這樣做，這表明了他作為黨的主席和偉大舵手的失職。

美國劇作家米勒 (Arthur Miller) 在1978年訪問中國期間，會見了中國的作家、藝術家、電影導演和劇院經理。他得悉中國有許多重要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遭到殺害或監禁及折磨。米勒認為，江青不可能在沒有毛澤東支持的情況下做出這些不公正的事情，那是無法想像的。米勒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人可不是韭菜；他們的頭斷了是長不回來的」，米勒總結說：「一個『幫派』沒有得到偉大的舵手的同意，卻能肆意蹂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不能讓人相信的。」²⁰ 米勒認為，毛澤東的失職不能歸咎於他的年老體弱，因為，在六十年代他身體健壯得能暢遊長江6,500米的時候，也有人被關押、殺害。米勒德最後的斷言是：四人幫「僅僅是一塊遮羞布，是用來維護毛澤東神聖的聲望的。」²¹

雖然毛澤東被九億人民奉若神明，但他在日常私生活裏，卻只不過是人家的一個老態龍鍾的丈夫而已。隨著他越來越屈從於江青的壓力，他喪失了關於國家事務的適當觸覺。受裙帶關係玷污的共產主義

¹⁸ Witke, 148–57, 335.

¹⁹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的聯合社論。

²⁰ Inge Morath and Arthur Miller, *Chinese Encounters* (New York, 1979), 21, 40.

²¹ 同上註，7。

顯示出了某種「社會封建主義」的色彩。然而，由於1976年的這些戲劇性事件和極左思潮的垮臺，中國走向更加穩定和繁榮的希望出現了，實現現代化的新的動力也出現了。

參考書目

- Barmé, Geremie R., *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 (Armonk, N.Y., 1996).
- Bonavia, David, *Verdict in Peking: The Trial of the Gang of Four* (New York, 1984).
- Chang, David W., *Zhou Enlai and Deng Xiaoping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uccession Crisis* (Lanham, Md., 1983).
- Ch'en, Yung-sheng, "The 'October 6th Coup' and Hua Kuo-feng's Rise to Power," *Issues & Studies*, XV:10:75-86 (Oct. 1979).
- Cheng, J. Chester, *Documents of Diss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Mao* (Stanford, 1981).
- Chi, Hs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tr. from *The Seventies Magazine*), (New York, 1977).
- Domes, Jürgen, "The Gang of Four and Hua Kuo-feng: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vents in 1975-76," *The China Quarterly*, 71:473-497 (Sept. 1977).
- "Great Historic Victory," *Peking Review*, 44:14-16 (Oct. 29, 1976).
- "How the 'Gang of Four' Used Shanghai as a Base to Usurp Party and State Power," *Peking Review*, 6:5-10 (Feb. 4, 1977).
- Leng, Shao-chaun, with Hungdah Chiu, *Criminal Justice in Post-Mao China: Analysis and Documents* (Albany, N.Y., 1985).
- Liu, Alan P. L., "The Gang of Four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ian Survey*, XIX:9:817-837.
- Morath, Inge, and Arthur Miller, *Chinese Encounters* (New York, 1979).
- Nee, Victor, and James Peck (eds.), *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New York, 1975).
- Oksenberg, Michel, and Sai-choung Yeung, "Hua Kuo-feng's Pre-Cultural Revolution Hunan Years, 1946-66: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Generalist," *The China Quarterly*, 69:3-53 (March 1977).

- Oksenberg, Michel, "Evaluating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Contemporary China*, III:2:102-111 (Summer 1979).
- Onate, Andres D., "Hua Kuo-feng and the Arrest of the 'Gang of Four,'" *The China Quarterly*, 75:540-565 (Sept. 1978).
- Roots, John McCook, *An Informal Biography of China's Legendary Chou En-lai* (New York, 1978).
- Schram, Stuart R., *Mao Zedong, 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 (Hong Kong, 1983).
- Teiwes, Frederick C.,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Armonk, N.Y., 1984).
- Terrill, Ross, *White-Boned Demon: 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 (New York, 1984).
- Tsou, Tang, "Mao Tse-tung Thought, the Last Struggle for Succession, and the Post-Mao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71:498-527 (Sept. 1977).
- Wang, Hsueh-wen, "The 'Gang of Four' Incident: Official Expose by a CCPCC Document," *Issues & Studies*, XIII:9:46-58 (Sept. 1977).
- Wilson, Dick (ed.),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rganized by the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Eng., 1977).
- , *Chou: The Story of Zhou Enlai, 1898-1976* (London, 1984).
- Witke, Roxan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1977).
- Wong, Paul, *China's Higher Leadership in the Socialist Transition* (New York, 1976).

鄧小平和中國的新秩序

四人幫倒臺後，華國鋒主席面臨著三個緊迫的問題：(1) 他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合法性；(2) 鄧小平的復出；(3) 重新調整經濟發展計劃，推動現代化建設。關於接班問題，葉劍英和鄧小平的支持者¹認為，毛澤東給華國鋒的指示（「你辦事，我放心。」）只反映了毛澤東個人的看法，而不代表黨的意願，關於黨中央主席的選舉，黨章有專門的規定。言下之意，華國鋒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看起來不符合黨章；但是，如果華國鋒同意重新起用鄧小平的話，這個合法性問題便可以商量，甚至可以放棄。因此，這兩個問題是可以抵銷的。葉帥和副總理李先念極其希望平穩地過渡到毛澤東之後的時代，他們進行了斡旋，結果，華國鋒原則上同意重新起用鄧小平，並修改五年計劃以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1976年11月下旬，華國鋒宣佈，鄧小平復出的問題將在1977年7月召開的下一次中央全會上討論。作為回報，他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和其他人支持他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

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三項決議，確認了此前政治局的一些決定。第一項決議是追認華國鋒擔任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第二項決議同意華國鋒的建議，恢復鄧小平的原有職務——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這些都是黨政軍部門的高級職務。第三項決議譴責四人幫的反黨活動，批判他們「陰謀打倒周恩來同志」，「瘋狂攻擊並錯誤批判

¹ 如許世友和韋國清將軍，他們是政治局委員；許世友還是廣州軍區司令，而韋國清則是廣東省第一書記。

鄧小平同志」，「極端仇視並大肆反對」毛主席挑選華國鋒同志擔任接班人，並「陰謀推翻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委員會，實行反革命復辟」。四人幫被正式開除出黨。²

鄧小平爭取政治控制權

權力基礎的擴大 鄧小平期望通過為在毛澤東和四人幫統治時期受迫害的人平反來擴大他的權力基礎。他堅決反對那些參與文化大革命並與四人幫勾結的領導人，特別是那些批判他及阻止他接替周恩來職務的人。這些人包括華國鋒（他是在毛澤東的庇護下青雲直上的）、汪東興（毛澤東的警衛頭領）、吳德（北京市市長）、紀登奎（一位教條式的政治局委員）。鄧小平不批評華國鋒，而是批判他的同夥，肅清他的政治外圍，這樣就將中心架空了。與此同時，鄧小平還扶植一些能幹、年輕的擁護者，安排他們擔任重要職務，以便讓他們能夠貫徹他的經濟政策。

但是，鄧小平也不局限於對某些人的批判或任命一些「年輕人才」；他同時挑戰「毛澤東思想」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至高無上地位，以推翻其從前對手的意識形態權力基礎。為此，他在1978年5月和6月宣佈了兩項非常明智的指導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實事求是」。其言下之意是，一項政策或一個行動是否正確，不必再用毛澤東思想作為標準來加以檢驗；事實上，毛澤東思想本身必須接受事實、實踐和真理的檢驗。關於毛澤東的領導，及他對文化大革命和中國的災難所應負的責任等問題，成為四人幫倒臺後政府主要的關注。

「經濟掛帥」：清除反對派和輸入「新鮮血液」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1980年2月23–29日）標誌著從毛澤東去世以後的過渡時期的結束。在這個時期，鄧小平迅速地上升為中國政壇最大權力的人物。

² Richard C. Thornton, "The Political Succession to Mao Tse-tung," *Issues and Studies*, XIV:6:47–49 (June 1978); 《紅旗》雜誌，1977年，第8期，第7–8頁。

中共拋棄了毛澤東的「政治掛帥」，代之以鄧小平的「經濟掛帥」，希望到2000年時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先進的國家。任何不同意這條路線的人都將被清除，任何違背這條路線的活動都將被終止。這樣，雖然一些分歧的觀點得到某種程度的容忍，但像在「民主牆」上張貼批評政府的大字報這類的反對行動卻不被容忍。³黨和政府擔心，過分大的自由會搞亂脆弱的安定局面；但是，他們也決心不去扼殺國家新的目標所激發出來的創造力、主動性和熱情。他們的妥協導致了一種受到適當控制的「有節制的民主」。

消除國內分歧的傾向並不光是針對民主牆。四位對鄧小平及其政策持冷淡或反感態度的政治局委員，也被解除了在黨政部門的高級職務。另一方面，鄧小平的兩位得力門生被任命為政治局常委，他們是能幹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和鄧小平在黨務方面的助手胡耀邦。胡耀邦還出任新改組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主管黨的日常事務。

與此同時，使鄧小平得益匪淺的平反工作繼續開展。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期間曾與鄧小平一起被打倒及蒙受羞辱，為了洗刷他的名聲，中共決定給與他平反昭雪。1980年5月17日為劉少奇舉行了全國性的追悼會，他被稱讚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這個事件被看作是對文革價值觀的批駁和對毛澤東一貫正確觀念的否定。

華國鋒辭去總理職務 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1980年8月29日-9月10日)上，鄧小平一派的人達到了權力的頂峰。鄧小平長期以來一直提倡黨政部門職能分開和廢除幹部任用的終身制。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批准了他的改組計劃，保證要使權力有序地移交給較年輕的實幹家們的集體領導，確保他們在鄧小平和其他年長領導人謝世後，能繼續從事現代化建設的重任。華國鋒辭去了總理職務，提名趙紫陽做他的接班人。鄧小平和其他六位副總理也辭去職務，辭職理由或者是年事已高，或者是另任要職，或者是「自願」讓位。

³ 民運領袖魏京生被囚禁了十五年，1993年9月，他被提前半年釋放。當時中國政府正在全力申請北京舉辦2000年奧運會，釋放魏京生是這項努力的一部分。

必須注意的是，全國人大只審議有關政府的任命。那些引退或辭職的人仍保留著黨內的職務。華國鋒仍然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鄧小平仍然是黨的副主席，其他四位副總理則仍然擔任著政治局委員。隨著趙紫陽出任總理和胡耀邦出任黨的總書記，實幹派牢牢地控制了黨和政府部門。中國似乎做好了以前的在位者仍然健在時進行的有序的權力交接，這為以後的領導人開創了先例，避免以往痛苦的政治動盪。

毛澤東的非神化

在其生命的最後十五年裏，毛澤東作為中國「集列寧和史太林於一身」的人物，被神化為絕對不會做錯事的全知全智的半神。

一當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粉碎，毛澤東的形象立即黯然失色。他對四人幫崛起所負的責任是眾所周知的；但卻沒有人敢於像赫魯曉夫批判史太林那樣揭露他。領導者小心翼翼地引用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說的話來批駁他後來的政策，但非毛化不得不謹慎地加以對待，因為，經1977年的黨代會確認地位的華國鋒，其職位的合法性主要是源於毛澤東的庇護。華國鋒尊重毛澤東的遺產，以便鞏固他自己的地位；同時對毛澤東作重新解釋，以滿足他在新時期和新環境中的需要。

中國面臨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毛澤東對中國近來災難所負責任的問題。在提出答案以前，中共將周恩來提升到與毛澤東幾乎平起平坐的位置，結束了毛澤東獨一無二的崇高地位。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獲推舉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毛澤東的夫人淪為階下囚與周恩來的夫人榮登高位，象徵了一種將毛澤東非神化的全民共識。

毛澤東去世後的第一年中，湧現出一股日益強烈的解脫感和邁向新起點的使命感。毛澤東或四人幫所推行的觀念框架，顯然不再符合現實生活，現在的新秩序是穩定、團結、紀律和發展經濟。革命的豪言壯語和文化上的不寬容，曾經將中國淪為毫無藝術氣息的思想沙漠，現在讓位於某種程度的鬆綁和表達自由。四人幫強加的文化禁錮（即中國只需要八部樣板戲，或「知識越多越反動」），現在被批判為扼

殺創造力的荒謬之舉。曾經是「資產階級腐朽沒落之象徵和帝國主義走狗」的貝多芬、莫扎特和莎士比亞，在1977年中期重新露面了，而所謂「封建舊時代產物」的李白和杜甫等偉大詩人的作品也重新亮相了。

隨著1977年7月鄧小平的復出，對毛澤東的非神化加速了。毛澤東的塑像先是遭到含蓄的批評，後來則受到公開的批判而被陸續搬運掉了。在這年8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華國鋒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就違反了毛澤東的著名宣言，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每隔七八年要來一次。鄧小平的「經濟掛帥」得到勝利，確立為新路線。

1978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五十七周年紀念日，這一天的報紙重新刊登了毛澤東在1962年發表的一份講話，講話表明，毛澤東自己也承認犯了錯誤，對經濟規劃、工業和商業不瞭解：「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就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還是懂得不多……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⁴刊登這份講話的實際用意再明確不過了——毛澤東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神，而是一個會犯錯誤的人。

1978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兩周年的紀念日悄然度過。不久以後，作為毛澤東支持文化大革命之象徵的紅衛兵也解散了；「紅寶書」銷聲匿跡，報紙上的「毛主席語錄」報頭欄也不見了。在整個1978年下半年，大字報和其他文章不停地批評毛澤東的錯誤，這表明人們一致的行動，對毛澤東進行非神化，侵蝕他神聖般的形象。《人民日報》社論逐步地稱呼「毛澤東同志」而不再是「毛主席」，並提出了對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批評，現在文革被稱為是「十年浩劫」。

鄧小平的兩項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實事求是」，擊中了毛澤東思想的要害。確實，通過實踐來檢驗真理是馬克思主義

⁴ 《人民日報》，1978年7月1日。

理論；毛澤東思想在實踐獲得成功之前，也只是理論，而不是真理。⁵毛澤東自己曾說：「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麼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不然就叫做迷信。」⁶

11月22日一張貼在天安門廣場的大字報，運用鄧小平的口號來評論毛澤東的成就：

我們不懷疑毛主席的巨大成就，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犯錯誤……毛澤東是個人，不是神。我們必須給與他應有的地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如果不準確地理解毛澤東，言論自由就是一句空談。現在是全體中國人掙脫強加在他們思想和行動上的枷鎖的時候了。⁷

人們找到一種對毛澤東進行非神化的聰明的方法，即用鄧小平的觀念來評判毛澤東的行動，用馬克思的話和毛澤東早期的話來批駁後期的毛澤東。這種方法也衝擊了一些人的地位，這些人的政治生命依賴於毛澤東的地位。

1979年9月，毛澤東逝世三周年紀念日又了無聲息地過去。到次年的春天，大部分公共場所的毛澤東畫像被清除走，街頭十字路口那些寫著毛主席語錄的標語牌也大多拆除。1980年3月，中共對已經死掉的康生進行批判，此人是毛澤東麾下的特務頭子。到1980年中期，毛澤東珍愛的生產樣板、大寨大隊和大慶油田，喪失了「示範樣板」的地位——大寨被宣佈為是失敗的典型，而大慶則被揭露效率低下，不講科學。甚至是毛澤東的革命搖籃延安（作者曾在1980年5月走訪過那

⁵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的，這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的，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自己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參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日報》1978年5月12日。

⁶ 〈科學和迷信〉，《人民日報》，1978年10月2日。

⁷ 轉載在1979年1月3日的《中央日報》上。

裏)，也處於一種沒有多少人關注的狀態。延安被看作是往昔的革命聖地，而人們當前的注意力已集中在實現四個現代化之上。

這些非毛澤東化的行動，是黨內一直進行著的一場激烈爭論的外在表現，這場爭論涉及的是關於毛澤東領導的性質和對他的責任的評價。中共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仔細地考察了毛澤東思想，並鑒於他在其二十七年的統治時期內未能使中國實現現代化，給與他「抽象的肯定但具體的否定」。另一方面，「凡是派」——即那些完全服從毛澤東指示的人——仍然打著毛澤東的旗幟，並想以革命來統帥現代化。在他們看來，「實事求是」只不過是鄧小平企圖砍倒毛澤東旗幟的又一個巧妙的口號而已。

關於毛澤東日益下降的威信的分歧繼續存在著，在此期間，葉劍英元帥在1979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是對毛澤東的領導及其失誤的一份審慎的責難：

當然，毛澤東思想不止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智慧的產物，也是他的戰友們、黨和革命人民智慧的產物。正如他自己所說，是「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產生的。

葉劍英考察了過去三十年的歷史，明確了在毛澤東的引導下黨所犯的錯誤：

但是，我們在巨大的勝利面前，開始不謹慎了。1957年，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在鬥爭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1958年，在經濟工作的指導上違背了客觀規律，離開了深入調查研究、一切經過試驗的原則，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的錯誤。1959年，在黨內不適當地開展了反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

葉劍英指責文化大革命是「建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受到的最嚴重的挫折」。他接著一針見血地指出：

任何領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沒有缺點，都不應當加以神

化。決不能貶低集體，貶低群眾，任意誇大領導者個人的作用。⁸

中共通過這種方式拋棄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把他從高高的神壇上拉下，恢復他凡人的面貌。不過，一個重要的問題還懸而未決：對毛澤東的批判應走得多遠。1980年2月，葉劍英針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傾向，提出了一項誠懇的建議：

我們可以通過決議承認我黨的錯誤。我們可以為劉少奇洗刷名聲，給與他非常高的肯定性評價。但我們不應該全盤否定毛澤東，挖我們自己的牆腳……蘇聯人遷了史太林的墓，我們就對毛澤東來個鞭屍。這不就刺激人民提問，社會主義對在哪裏、共產主義好在哪裏嗎？我們可以偶爾打自己的耳光，但我們不能也沒有時間完全重新開始。反對毛澤東的那些人不一定全錯，正如支持他的那些人也不一定全對一樣。反對他的人和支持他的人都是他的跟隨者。跟隨他是對還是錯呢？誰把毛澤東擡得那麼高、給與他那麼大的權力？是不是全國人民？那是黨、黨中央和黨領導下的軍隊……如果我們要追根到底，我們將發現，責任不在毛澤東一個人那裏。我們全都有責任。⁹

大部分黨員都抱有與葉劍英一樣的折衷感受，特別是那些農村地區和在文革期間或文革以後入黨的黨員，他們的人數佔三千八百萬黨員中的一半。他們反對苛刻的批判毛澤東；他畢竟是個人而不是神。對他作全面否定將冒否定中國共產黨本身的風險。

無疑，中共既不會否認毛澤東的貢獻，也不會掩飾他的錯誤，特別是他在「十年浩劫」中起的作用。對毛澤東的正式評價將在1981年中期的黨代會上作出。在此期間，由華國鋒負責編輯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將進行修訂，這暗示了對這位編輯者和他所選篇目的不滿。這

⁸ 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

⁹ 轉載在1980年4月30日的《中央日報》上。

樣，不僅是毛澤東的地位，而且連他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的地位也動搖了。

參考書目

- Burns, John P., and Stanley Rosen (eds.), *Policy Conflicts in Post-Mao China* (Armonk, N.Y., 1986).
- Bush, Richard C., "Deng Xiaoping: China's Old Man in a Hurry" in Robert B. Oxnam and Richard C. Bush (eds.), *China Briefing*, 1980 (Boulder, 1980), 9–24.
- Chang, Parris H., "The Rise of Wang Tung-hsing: Head of China's Security Apparatus," *The China Quarterly*, 73:122–137 (Mar. 1978).
- Chi, Hsin, *Teng Hsiao-pi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Hong Kong, 1978).
- Ching, Frank, "The Current Political Scen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80: 691–715 (Dec. 1979).
- Ch'iu, Hungdah, "China's New Legal System," *Current History*, 79:458:29–32, 44–45 (Sept. 1980).
- Cohen, Jerome Alan, "China's Changing Constit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76: 794–841 (Dec. 1978).
- Dittmer Lowell,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Liu Shaoqi's Rehabilit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I:3:455–79 (May 1981).
- Fang, Hsiieh-ch'un, "Teng Hsiao-p'ing: Supporters and Possible Successors," *Issues & Studies*, XV:4:47–60 (Apr. 1979).
- Hua, Guofeng,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Beijing Review*, 27:5–31 (July 6, 1979).
- Jain, Pagdish Prasad, *After Mao What? Army Party Group Rivalries in China* (Boulder, 1976).
- Joffe, Ellis,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Mass., 1987).
- Lampton, David M., "China's Success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China*, III:1:72–79 (Spring, 1979).
- Lee, Leo Ou-fan, "Recent Chinese Literature: A Second Hundred Flowers," in Robert B. Oxnam and Richard C. Bush (eds.), *China Briefing*, 1980 (Boulder, 1980), 65–73.

Lieberthal, Kenneth, "Modernization and Succession in China," *Contemporary China*, III, 1:53–71 (Spring 1973).

"Man of the Year: Visionary of a New China, Teng Hsiao-p'ing Opens the Middle Kingdom to the World," *Time Magazine*, Jan. 1, 1979, 13–29.

McDougall, Bonnie S., "Dissent Literature: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Literature in and about China in the Seventies," *Contemporary China*, III:4:49–79 (Winter 1979).

McGough, James P. (tr. and ed.), *Fei Hsiao-t'ung: The Dilemma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 (White Plains, N.Y., 1980).

Montaperto, Ronald N., and Henderson, Jay (eds.), *China's Schools in Flux: Report by the State Education Leaders Delegation,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White Plains, N.Y., 1980).

Munro, Robin, "Settling Accounts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77–78," *The China Quarterly*, 82:304–333 (June 1980).

"On Policy towards Intellectuals," *Beijing Review*, 5:10–15 (Feb. 2, 1979).

Pepper, Suzanne, "An Interview on Changes in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the Gang of Four," *The China Quarterly*, 72:815–824 (Dec. 1977).

——,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 Two Steps Forward, Two Steps Back and Begin Again," *The China Quarterly*, 81:1–65 (Mar. 1980).

Shambaugh, David L., *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 (Boulder, 1984).

Teng Hsiao-ping and the "General Program" (San Francisco, 1977).

「中國共產黨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全文刊登在《紅旗》雜誌，1977年第8期，第5–9頁。

Thornton, Richard C., "The Political Succession to Mao Tse-tung," *Issues & Studies*, XIV:6:32–52 (June 1978).

Wakeman, Frederic, Jr.,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after Smashing the Gang of Four," *The China Quarterly*, 76:891–911 (Dec. 1978).

中美關係正常化

在1972年尼克遜訪問北京之後，由於中美兩國國內的不利形勢，兩國關係進展甚微。在中國，激進的四人幫勢力處在鼎盛時期，並正計劃搶班奪權；他們的路線是堅定地排外，對與資本主義的美國搞任何和解抱有懷疑。在美國，對中國的承認因臺灣問題而步履維艱，因為北京堅持滿足三項條件：(1) 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2) 廢除1954年的美臺共同防禦條約；(3) 美國軍隊撤出臺灣。從全球角度來看，接受這些條件將被看作是拋棄臺灣，並使美國對盟友所作承諾的可信性受到質疑。臺灣問題成為美國國際形象的一面鏡子，故解決臺灣問題具有了超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之外的附加意義。

據稱，尼克遜總統準備承認北京，但由於水門事件而未能做到。尼克遜的政治前景越來越依賴於國會中保守派人士的支持，這幫人是反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而且，尼克遜能否保住總統職位顯得遠比對中國的外交承認更加迫切。他深深地陷入了為維護其政治生命所作的拼搏，因而未能在對華事務上採取行動。¹

在尼克遜辭職後，過渡總統福特先是面臨了越南局勢崩潰的災難，接著又越來越企盼贏得1976年大選，他因此被捆住了手腳。福特雖然原則上贊成正常化，但他也意識到，需要得到保守派勢力的支持，因而未為承認中國作任何動作。福特的繼承人卡特 (Jimmy Carter) 也在原則上贊同正常化，但在任期的第一年便被以下這些麻煩搞得焦頭爛額：巴拿馬運河條約問題、與蘇聯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問題、蘇

¹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2nd ed. (New York, 1980), 244.

聯—古巴在非洲的活動、中東問題。這些緊迫的問題都需要得到國會中保守派的支持，而這些保守派人士經常自認為是「臺灣的朋友」。

確實，臺灣成為美國國內政治中橫互在正常化道路上的一個敏感障礙。美國的公眾輿論反對與臺灣斷交，但是也贊成承認中國。²擺在美國面前的問題變成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實現正常化，如何來保全臺灣？政治家們同意，要是能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美國就不會顯得是拋棄了一個忠實的盟友，並大大減輕有關美國的信譽及其對其他國家所承擔義務等方面的問題。

在中美雙方感到已作好實現正常化的準備之前，兩國的國內形勢都必須要有所緩和。最後，主要是由於中國政策的改變，僵局被打破了。中方轉而作出了一些微妙的讓步，對這些讓步，美國的三屆總統已等待了將近七年。

外交關係的正常化

在水門事件和尼克遜總統辭職之後的三年裏，中國方面時常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缺乏進展表現出不耐煩。卡特總統看不出有甚麼緊迫的理由要去遷就北京，尤其是當時似乎還找不到一條解決臺灣問題的權宜之策。然而，他感受到了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外交政策班子和開明的民主黨人士對他施加的壓力，這些人強烈要求為承認中國而斷絕與臺灣的正式關係。等待時機的卡特派國務卿萬斯 (Cyrus Vance) 前往北京執行一項「試探性使命」，實際上這是一項沒有任何實質的「接觸」使命。

萬斯訪華 1977年8月21日—25日，萬斯在中國進行訪問。雖然他是卡特政府中第一位訪問中國的高級官員，中國政府的接待卻頗為冷淡。³萬斯建議在北京建立美國大使館，而在臺北設立一個聯絡

²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5, 1978, 8.

³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23, 1977.

處，但中國方面拒絕這個想法，堅持要美國滿足前述的三項條件。關於在正常化之後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問題，連談都沒談。⁴ 中方不願承擔以非武力方式解放臺灣的義務。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次使命投入得很少，獲得的也很少。由於巴拿馬運河條約正在等待國會的批准，華府覺得無需在中國問題上採取「倉促」行動。但是，中國認為萬斯之行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倒退。

布熱津斯基訪華 如果說萬斯在中國得到的接待很不熱情的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訪華 (1978年5月20-22日) 的情形則迥然相異，他成為中方竭力爭取的對象。隨著華府意識到蘇聯對中美軸心的恐懼猜疑，將是美國進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一張強有力底牌，對中國作出讓步便突然被認為是「切實可行」的了。華府表示願意接受中國的三項要求，同時希望中國不用武力去取臺灣，亦不反對在正常化之後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

在北京，布熱津斯基宣稱：「美國總統期待與一個強大的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他決心與貴方一同克服在我們實現關係全面正常化道路上仍存在的障礙。」他評論說，美國擁有與中國一樣的決心，「抵制任何國家尋求建立全球或地區霸權的努力」，並接著稱「我們兩國都不容忍國際侵略者，他們打著不結盟的幌子在非洲推行大國的野心。我們兩國都不尋求通過武力向我們的鄰國強加政治服從。」⁵

為了表明美國的誠意，布熱津斯基向中方透露了兩份秘密文件的內容：第十號「總統評論備忘錄」(美國對世界形勢的評估) 和第十八號「總統令」(總統安全政策實施計劃)。另外一些美國專家與中國的專家就國防、技術和雙邊關係等問題進行了磋商。

儘管沒有公開宣佈正常化事宜，布熱津斯基在私下裏向華國鋒和鄧小平通報，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 (Leonard Woodcock) 準備為實現這

⁴ 此處係根據鄧小平副總理的說法，參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8, 1977, 3。

⁵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1, 24, 1978.

一目標展開認真的談判。⁶ 中方對布熱津斯基的訪問感到滿意，稱之為「向前邁了兩步」。

朝向正常化 1978年10月，卡特作出了有關正常化的最重大決定。卡特總統剛剛在埃及總統薩達特 (Anwar el-Sadat) 與以色列總理貝京 (Manachem Begin) 舉行的大衛營 (Camp David) 談判中成功地扮演了調解人，他覺得自己在政治上比較牢靠了，認定他終於可以廢除美國對臺灣所負的義務，於是確定1979年1月1日為外交承認中國的最後期限。美國方面慎重地考慮到，到那個時候，埃以條約將已簽署，在那樣一個愉快的氣氛中，任何對政府處理臺灣做法的批評都將顯得無能為力。⁷ 另一方面，如果中東協議泡湯，成功地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也將有助於向美國選民證明卡特具備作為一個世界領袖的政治家才能。卡特想要塑造一個勇於決斷的總統形象，希望利用中國來推進與蘇聯人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並超越參議員甘乃迪 (Edward Kennedy) 等一幫鼓吹承認中國的開明人士的風頭。⁸

曾當過聯合汽車工會主席的伍德科克是一位經驗豐富及嫺熟的談判者。11月，他向北京政府遞呈了一份聯合公報的草稿，中方對此的反應是要求作一些澄清。隨後，鄧小平副總理出人意料地宣佈，他願意訪問美國——這是他願意談判成功的一個訊號。12月4日，中方提呈了他們對聯合公報的修改稿，12月11日，鄧小平收到了訪問美國的正式邀請。

1978年12月15日，憂心忡忡的卡特總統作了一次匆忙安排的電視露面，宣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同意在1979年元旦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包括在次年3月1日互派大使，設立大使館。美國將斷絕與臺灣的官方關係，並將根據1954年美臺共同防禦條約所規定的提前一年先行告知的條款，在1980年元旦廢除該項條約。總統保證「不會犧牲」

⁶ Martin Tolchin, "How China and the U.S. Toppled Barriers to Normaliz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78, A12.

⁷ Fox Butterfield, "After Camp David, Carter Set a Date for China Ties,"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78, A12.

⁸ 同上註。

臺灣：美國將通過非正式代表繼續與臺灣保持商務、文化和其他關係，美臺關係將包括出售武器。隨後，他以明顯愉悅的神情宣佈，鄧小平副總理將於1979年1月訪問美國。

大部分美國人雖然對「猛然拋棄」臺灣國民政府感到遺憾，但也覺得很難反對一個簡單的可行性對比：與中國大陸九億人建立關係相對於與臺灣的一千七百萬保持關係。⁹ 通過實現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卡特表現出了一名意志堅定的總統形象，他在政治上所得到的利益超過了他在公眾支持率方面的損失。¹⁰

與此同時，華國鋒主席在北京舉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外記者招待會，發佈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消息。他特別指出，中國不喜歡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並與臺灣保持文化和商務關係，但它不想讓這些問題妨礙正常化。

《聯合公報》的要點如下：¹¹

1. 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2. 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3. 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申《上海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並再次強調：
 - a. 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
 - b.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⁹ 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58%的人贊成總統的行動，而24%的人反對，18%的人不表態。《The New York Times》，Jan. 14, 1979。

¹⁰ Stanley D. Bachrack, "The Death Rattle of the China Lobby," *Los Angeles Times*, Dec. 20, 1978.

¹¹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lected Documents No. 9: *U.S. Policy Toward China, July 15, 1971–January 15, 1979*, Office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Jan. 1979, 45–46.

- c. 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定或諒解。
 - d. 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認知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 e. 雙方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僅符合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事業。
4. 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及建立大使館。

美國方面就臺灣問題單獨發佈了一份聲明：¹²

1. 同日，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堅合眾國將通知臺灣，結束外交關係，美國和中華民國之間共同防禦條約也將按照條約的規定予以終止。美國還聲明，在四個月之內從臺灣撤出美方餘留的軍事人員。
2. 今後，美國人民和臺灣人民將在沒有官方政府代表機構，也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保持商務、文化和其他關係。
3. 美國深信，臺灣人民將有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未來。美國繼續關心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並期望臺灣問題將由中國人自己和平地解決。

顯然，主動打開臺灣問題僵局的是中國一方，而鄧小平則是主要的發起人。正常化將使他取得毛澤東和周恩來未能取得的成就，將使他得以訪問美國，使中國擴大貿易，並使中國得以獲取美國的科學、技術、資金和貸款。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就相對不那麼重要了。無論如何，中國非常清楚，它缺乏對臺灣島發動攻擊的海軍力量，並且，它正埋頭搞四個現代化，顯然不會想對臺灣進行一場代價高昂的、困難的且已經拖延良久的戰爭。接受現狀是權宜之舉，因為這使中國得到了美國承認它對臺灣擁有主權，雖然並不是立即佔有它。¹³

¹² 同上註，48。

¹³ Linda Mathews, "Is the U.S. About to Take a Dragon by the Tail?" *Los Angeles Times*, Feb. 11, 1979.

北京接受了新的觀念，即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中，中美關係比臺灣更重要。1978年11月的蘇越條約含有很強的軍事同盟的意味，可能刺激了中國人尋求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紐帶。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對兩個昔日盟友越來越深的擔憂，或許促使了它與從前的西方敵人和好。中國甚至有可能已經在為日益惡化的柬埔寨局勢而考慮與越南進行軍事行動，它或許指望利用一個友好的美國來遏止蘇聯的捲入。無論如何，蘇聯的報紙對中國尋求與美國和西方勾結的動機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與臺灣的關係 為了緩和對臺灣的打擊，卡特於1978年12月27日派了一個高級代表團前赴臺北，率團的是副國務卿克里斯托佛 (Warren Christopher)。¹⁴ 他帶來了以下的口信：儘管終止了正式的關係，美國希望商務和文化聯繫將繼續發展。美國代表團遇上了一萬名憤怒的抗議人群。

蔣經國總統對代表團稱，他的政府和人民對華府在與北京達成協議前沒有事先與臺北磋商感到憤慨。他堅持，未來的臺美關係應在政府對政府的基礎上進行，他的政府應被承認為實際控制臺灣的政府，它將繼續表現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但是，美國只準備討論一項非官方、非政府接觸的框架。兩天的談判努力沒有結果，代表團無功而還地回國了。

美國與臺灣的聯繫是極其複雜的。除了共同防禦條約外，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保持著五十九項次要一些的條約和協定。這些條約和協定保護雙方在農產品、原子能、航空、產權、藥品控制、經濟和技術合作、教育、投資擔保、海事、郵政、稅收和商務貿易等方面的特殊關係。¹⁵

美國在臺灣的投資是相當可觀的。在臺灣經商的美國大公司包括像Bank of America, Chase Manhattan Bank, Citicorp, American Express, Ford, RCA, Union Carbide, Zenith, and Corning Glass等商界巨頭。1978

¹⁴ 隨訪的有法律顧問Herbert Hansell和美國太平洋駐軍司令Maurice Weisner上將。

¹⁵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78, A10.

年，220家美國公司在臺灣擁有5億美元的投資。¹⁶ 1978年，臺灣繁榮的外貿總額達237億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一（73億美元）是對美國的貿易。顯然，美國與臺灣的經濟紐帶是不會輕易被削弱的；如果有甚麼變化的話，那便是人們期望這些聯繫將繼續發展，而不管甚麼外交承認被撤銷。

在最初的氣憤發作之後，臺灣領導人平靜了下來，以尊嚴、勤職和自立經受住了這場政治風暴。他們意識到自己擔當不起過分觸怒美國，因為與美國的聯繫，雖然是非官方的，對臺灣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東西。¹⁷

由於美國駐臺北大使館和中華民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將如期於1979年3月1日關閉，因此就必須指定替代機構來處理繼續下去的美臺關係。國民政府竭力爭取某種官方地位，而美方談判者則堅持非官方關係。1979年2月15日，雙方終於商定，在臺北設立一個美國在臺協會代替大使館，在華盛頓設立一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照料臺灣的利益，該委員會在九個城市設立類似於領事的分會。美國在臺協會的職務將由美國國務院和其他政府部門的「退休」人員擔任，他們將不具備任何官銜。

與此同時，國會發表了幾個決議，以表達對臺灣前途的關注。1979年3月10日，參眾兩院以絕大多數通過了兩個文本稍有不同的法案（《美中關係法》或《與臺灣關係法》），批准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並同意保持與臺灣的非官方關係。法案表達了美國決心維持與臺灣人民的廣泛關係，並「認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運來決定臺灣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脅，並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統一這項法案的兩個版本需要由參眾兩院聯合委員會進行協調，法案的最後定本於3月28日在參議院（85對4票）和眾議院（339對50票）得到了通過。

越南入侵柬埔寨 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一個得不到公開承認但

¹⁶ Ross Terill, *The Future of China* (New York, 1978), 201.

¹⁷ *Los Angeles Times*, Dec. 25, 1978.

極有可能的反響，是越南在蘇聯庇護下入侵柬埔寨。越柬關係一直在惡化。1978年11月，越南與蘇聯簽訂了一項實際上的軍事同盟。在美國宣佈承認中國的十天以後，越南入侵了柬埔寨。1979年1月7日，經過半個月驚人有效的閃電戰之後，越南軍隊攻佔了柬埔寨首都金邊，推翻了中國支持的波爾波特 (Pol Pot) 政權。柬埔寨呼籲聯合國安理會實施干預，而中國則把這場入侵看作是蘇聯在亞洲謀取霸權的證明，並迅速將部隊調往中越邊境。

儘管美國承認中國與越南入侵柬埔寨這兩件事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不可能得到證實的，但許多人私下都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確實刺激了蘇聯和越南對柬埔寨採取行動。¹⁸ 中國面臨著如何對待這場入侵的困難抉擇。鄧小平對美國的訪問肯定將有助於中國人評估美國的態度。

鄧小平訪美 短小精幹的鄧小平副總理於1979年1月28日飛抵華府，進行為期九天的訪問。這是三十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級官員第一次訪問美國，這使華府安排了比通常更豪華、更正式的接待規格。雖然鄧小平在中國的正式官銜僅位居第三，但他毫無疑問是中國權力最大的領導人。華府急於想讓他看一看美國，感受一下這個國家的創造力和多樣性，並理解國會在美國國家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美國政府私下希望鄧小平在臺灣問題上講話和緩，且不要發表甚麼刺激蘇聯的聲明。

在抵達後的第二天，鄧小平在白宮出席了正式的歡迎儀式，儀式上鳴放十九響禮炮，並由來賓檢閱儀仗隊。卡特總統歡呼這次訪問是兩國「重新修好和嶄新開端的時刻」，稱「這是長久關閉的窗戶重新被打開的和解的一天」。鄧小平在答詞中表示感謝，但也不失時機地對蘇聯進行了不指名的抨擊：「今天的世界遠不那麼平靜。不僅存在著對和平的威脅，而且引發戰爭的因素正明顯地增加。」在正式的歡迎儀式之後，兩位領導人及其隨員作了四個小時的會談。

幾百名公司總裁、國會議員和其他美國要員出席了白宮的歡迎晚

¹⁸ CBS radio broadcast by Marvin Kalb, Jan. 9, 1979.

宴。在宴會上，鄧小平對蘇聯威脅世界和平作了又一次含蓄但明白無誤的激烈抨擊：「在建交公報中，我們雙方都莊嚴地承擔了不謀求霸權的義務，並將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在豪華的晚宴之後，賓主前往甘乃迪中心觀看美國音樂舞蹈表演和哈林隊 (Harlem Globetrotters) 精彩絕倫的籃球表演。但晚會的中心卻是鄧小平。他既是觀眾，也是光彩照人的表演者。他登上舞臺，與演員們親切握手，並親吻合唱團小演員的前額，這完全是美國政治家競選公職的風格。副總統蒙代爾 (Mondale) 調侃說：「幸虧您不是美國公民，不然您是會當選上您想得到的任何職位的。」¹⁹

在會見美國參議員和眾議院時，鄧小平震撼了國會山莊。關於臺灣問題，他指出中國不再使用「解放臺灣」的說法，而是改稱「統一」祖國：

我們將充分尊重臺灣的實際情況，直到達成臺灣回歸祖國、實現中國的統一。我們將允許臺灣的現存制度和它的生活方式保持不變。我們將允許臺灣的地方政府與日本和美國等國人民保持民間關係。通過這種政策，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實現和平統一。我們中國人是有耐心的。但是，中國不能承諾不使用其他手段。

這些話使參議員傑克遜 (Henry Jackson) 等國會議員感到放心，他們當然希望能得到更明確的不使用武力的保證，但他們尊重鄧小平在行使中國的選擇權力時的謹慎做法。

至於蘇聯，鄧小平的批評非常尖銳。雖然他不反對美國將與蘇聯達成的任何戰略武器協議，但他強調「你們不能相信俄國人」。議員們聽了都點頭表示同意。但單獨會見新聞記者時，鄧小平更激烈地譴責蘇聯，敦促建立一條由美國、日本、西歐和中國等組成的聯合陣線，遏制俄國在全世界的擴張。他指責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建議美國應譴責這兩個國家，或至少應譴責越南。鄧小平堅持稱，越南是「東方的古巴」，「必須好好教訓教訓他們」。

¹⁹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 12, 1979, 26.

鄧小平精彩地扮演了親善大使的角色。他與卡特培植起了熱情的友誼，並以他的機智、幽默和適度的自信傾倒了美國國會。他那機敏的儀態舉止——握手、擁抱、親吻、微笑、大笑和玩笑——贏得了美國公眾的喜愛，讓他們覺得，這樣一個戴牛仔帽豪放的人，即使是個共產黨人，也是很難叫人恨得起來的。中國人則通過電視衛星跟隨了鄧小平的每個行蹤，心中無限自豪、開心。以前傳說鄧是一個直率、好爭、容易發怒的人，但現在許多記者到處看，都找不到這樣的一個人物。鄧小平把自己的形象塑造為一個熱情洋溢的普通人，而不是鬥志昂揚的革命者。他極力地表明，雖然中國貧窮落後，但它決不是國際乞丐。它需要外國的技術和資金，但也能為美國的產品提供一個廣大有利的市場。由於鄧小平極具感染力的人格和他對公眾心理的瞭如指掌，亦由於美國人喜歡新鮮並崇拜新的名人，鄧小平的傑出表現使美國人在心靈上嚮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次訪問還有一個具備同等建設性的成就，那就是鄧小平親眼目睹了美國民主制度的運作和現代化經濟的運行。行政部門雖然權力巨大，但卻有限制，鄧小平看到了國會在國家政策制定中的獨特作用。在參觀福特公司的一個裝配工廠、休斯機械公司和約翰遜太空中心時，鄧小平認識到了美國企業管理的高效率，它能運用太空時代的技術和勤奮的員工提高顯然舒適的美國生活水平。鄧小平學到的許多東西很有可能在設計中國的未來時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鄧小平對自己美國之行的結果很滿意。他和外交部長黃華與卡特和萬斯簽署了科學技術、文化交流和領事關係方面的三項協議。最後一項協議規定中國在舊金山和休士頓設立領事館，美國則在廣州和上海設立領事館。在致卡特的告別辭中，鄧小平稱這次訪問「完全成功」，並表示他相信中美關係「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取得巨大的進展」。中美兩國人民的興奮和希望甚至超過了鄧小平的樂觀情緒，他們現在能夠公開地自由地相互了解對方，這是三十年來的第一次。

中國入侵越南 1979年2月17日，在鄧小平回國後剛過了一星期，中國軍隊大規模侵入了越南。入侵的名義是對越南人無數次侵犯

中國領土實施報復，但實際上，這是中國對越南入侵柬埔寨，與越南在接受了二十五年多中國的援助後公然忘恩負義的懲罰。

早在1950年，毛澤東就向胡志明提供了軍事、政治和經濟援助——著名的奠邊府戰役(1954年)，就是越南人主要用中國的武器、在中國人的指導下進行的。在美國介入越南的鼎盛時期(1964-1971年)，中國派遣了三十萬技術人員和部隊前往越南，幫助他們開展防空、工程、鐵路修築、道路修復和後勤設施等工作；其中約有一萬人獻出了生命。1950年到1978年間，中國對越南的經濟援助總計約在150億到200億之間，這清楚地表明中國人做出了巨大的犧牲。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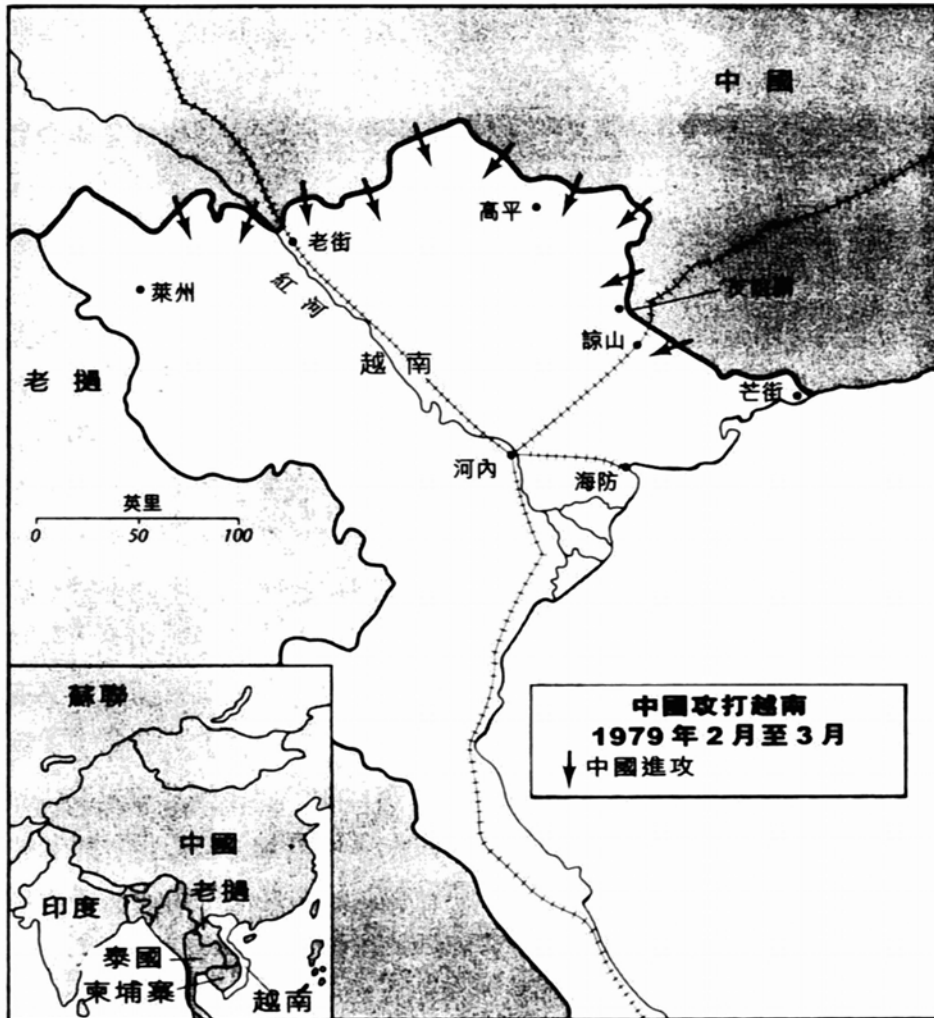
做出了這麼多友誼的舉動，中國指望越南能表示出感激和善意，但一當河內控制整個越南，它便對中國無所表示了。或許是擔心中國的巨大影響，越南拒絕對中國的依賴，反而轉向蘇聯尋求幫助。居住在越南的華僑和華裔越南人逐漸受到越來越嚴重的虐待，接著發生了迫害浪潮，約有十六萬華人被迫逃難。極度侮辱的是越南與蘇聯締結了一項為期二十五年的友好和共同防禦條約，這項條約的意圖是使蘇聯包圍中國，也表明了越南狠毒地抵制中國。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老撾及隨後中國支持的波爾波特政權之垮臺，令中國忍無可忍。

鄧小平在逗留華盛頓期間，公開說要「教訓教訓越南」，但他沒有點明中國將採取甚麼樣的行動。中國人想打一場快速的戰爭——像1962年入侵印度一樣——輕鬆取勝，並在蘇聯能作出適當反應的決定之前迅速撤退。這是一場鄧小平認為值得進行的合算的冒險。他預計，由於中國新近獲得的國際聯繫，蘇聯不會作武裝干預。為了平息世界輿論，中國在入侵一開始就宣佈，這將是一場時間短暫的有限行動，中國絕對沒有意圖侵佔越南領土。

中國的入侵投入了25萬部隊、數百坦克、戰鬥機及火炮，沿450英里的戰線分十個方向展開。這樣的規模表明這是一次精心籌劃的軍事行動。中國軍隊在一開始推進神速，進展順利，一星期內攻克了邊境附近越南的四個省會城市。²¹然而，他們的推進不久就大大遲緩

²⁰ 臺北《中央日報》，1979年7月31日、12月7日，1981年10月15日。

²¹ 老街、萊州、高平和芒街。



了，主要是由於缺乏現代武器。中國人曾希望吸引敵軍投入決戰，聚而殲之，但越南人有意避免直接較量。在60萬越南軍隊中，約有三分之二駐紮在柬埔寨和越南南部執行「佔領任務」。越南方面不想抽調這些部隊而冒危及這些地區安全的風險，它的計劃是只動用地方部隊和民兵來與中國軍隊作戰，從而將它的精銳部隊保全下來免遭圍殲。

隨著戰爭的拖遝，中國迅速取勝的前景暗淡了下來，而蘇聯報復的危險也相應增加。3月1日，中國提出和談建議的同時，加強了對諒山的代價高昂的進攻。人們普遍相信，甚至希望，中國方面一當攻佔諒山，就能宣稱得勝而凱旋回國。3月2日，諒山城幾乎完全被夷平，

越南人撤離該城，部署到周圍山地。中國兵終於佔領了諒山，但這個勝利來得很艱苦，也不怎麼顯眼——離中國人夢想的速戰速勝目標有很大的距離。在攻佔了越南北疆幾乎所有的重要城鎮和省會城市之後，中國宣稱已完成了它的目標，宣佈停火。3月5日，北京宣佈中國軍隊經過十七天的戰鬥之後開始撤退，次日，河內同意舉行和談。至3月16日，中國完成了撤軍。

西方軍事專家很困惑，中國為甚麼要為了很小的收穫而冒這麼大的風險，其中包括蘇聯的軍事干預。他們沒有理解，當中國被從前乞求它幫助的國家拋棄時，它有了被羞辱和被出賣的雙重感受。而越南對待中國和其他弱小鄰國日益傲慢的態度以及它與蘇聯的結盟，更加深了中國的被出賣感。中國感到，這樣一種公然的敵對必須予以回擊，否則中國的信譽就完了。鄧小平還想向世界顯示，中國不害怕戰爭，也不畏懼蘇聯干預的威脅。

如果說中國教訓了越南的話，它自己也得到了一個教訓：如果不好好整頓軍備的話，中國就無法有效地打一場現代戰爭，另外，戰爭的經濟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在十七天的行動中，中國遭受了46,000人的傷亡，損失了四百輛坦克和裝甲車，共耗費13.6億美元。國家貧瘠的資源經受了一次嚴重的打擊，這直接對四個現代化建設造成了負面影響，迫使1980年度的軍費預算削減了19億美元。同時，軍事上的科學技術現代化也日益成為必不可少的目標。

商務和其他關係的正常化

在中國獲得外交承認之後，中美雙方展開了一系列談判，以促使貿易、文化、科學關係，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軍事關係正常化。中國尚未取得最惠國待遇，這使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極難有競爭力。要讓華府授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首先必須解決被沒收的美國在華資產和被凍結的中國在美資產問題。

債務協定和商務協議 在1979年3月1日美國駐北京聯絡處變成正式大使館之後的第二天，年輕時曾在上海生活過的美國財政部長

布盧門薩爾 (Michael Blumenthal) 與中國財政部長張勁夫草簽了一項協定，解決了關於「被凍結資產和被沒收產權」的糾紛。這些糾紛可追溯到1950年朝鮮戰爭初期，其時，杜魯門總統為回應中國的參戰，凍結了價值8,050萬美元中國在美資產。中國對此實行報復，沒收了由美國教會、公司、學校和個人擁有的在華財產，價值1.969億美元。事實上，自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起，這些有爭議的美國財產就已經在中國控制之中了。總共有384份美國的產權，其中最大的產權是由Boise Cascade Corporation擁有的。

在北京草簽的協定使中國得以保留美國的財產，但要支付8,050萬美元來償還全部的美方產權——大約相當於用4角1美分償還1美元。中國將在1979年10月1日支付3,000萬美元，餘款採用分期付款，每年10月支付1,010萬美元，到1984年付清。美國方面將「解凍」價值8,050萬美元的中國資產，但其中有多少屬於中國政府，多少屬於在中國境內外的銀行、公司、學校和個人，就不得而知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的付款雖然與它被凍結的資產金額相等，卻不與凍結資產掛鉤——美國產權人將立即得到他們的賠款。這在國際協定中是很少見的。與其他一些這類的國際協定相比，這顯得是一項很有利的協議，中國的賠償比美國人曾期望的更有利些。²²

這項草簽的協定只需由兩國政府的代表正式簽署就能生效，無需提交各自的議會批准。為了簽署這項協定並談判一項新的商務協議，華府派貿易部長克雷普斯 (Juanita Kreps) 前往中國。1979年5月11日，她與中國財政部長張勁夫簽署了關於「被凍結資產—被沒收產權」的協定，最終解決了長期存在的糾紛。

此時，談判一項商務條約的道路掃清了，這項商務條約將相互給與對方最惠國待遇，允許商人在對方國家設立辦事機構，對專利、商標和版權提供相互保護，並將使按章開展銀行儲匯交易成為可能。這

²² Anthony M. Soloman, "When 41¢ on the dollar is a good deal,"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28, 1979. Mr. Soloman 當時是美國財政部主管貨幣事務的副部長。與蘇聯達成的一個類似協定是12美分支付1美元；與匈牙利的是30美分；與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是40美分。

些問題每一項都要求得到詳細的討論，一直到克雷普斯訪問的最後一天，雙方才達成並草簽了一份協議。

兩個月後，這項商務協議正式簽署了，但部分是由於美方擔心中國紡織品的大量湧入，國會的批准被耽擱了。

不可能那麼快就總結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好處——它們永遠在發展著，對它們的評估受著評估人的不同立場和政治信仰的不同而異。但是，所有人都能同樣地領悟到一些非常基本的好處。首要的是，一個穩定的中國最能符合美國和世界和平的利益。雖然人們極為關注臺灣的安全，但相比於美國承認大陸政府之前，臺灣島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並沒有受到被武力佔領的更大威脅。中國不斷呼籲臺灣與大陸統一，這種姿態緩和了許多人感覺到的極度的緊張局勢。中美文化紐帶的擴展，使中國得以謹慎地選擇現代化的模式和實現現代化的手段，同時也使抱著濃厚興趣和欣賞力的美國得以從容地走進中華民族智慧、技藝和藝術的巨大寶庫，其中既有傳統的珍寶，也有現代的事物。中國得以更便利地接觸到西方科學技術的進步，這將有利於它進行邁向四個現代化的「新長征」；而正當美國需要增加出口之時，美國的商品獲得了一個日益擴大的（儘管仍是有限的）市場。最後，中國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將能捍衛亞洲的現存和平，而中美之間的聯繫構建了一個新型的、更加均衡的三角力量，這使世界得以從動盪不安的美蘇兩極格局中解脫出來。

參考書目

Alexiev, Alex, "Prospects for Accommodation," *Contemporary China*, III:2:36-46 (Summer 1979).

"An Interview with Teng Hsiao-p'ing: Calling for Stronger U.S.-China Ties and a United Front against Moscow," *Time Magazine*, Feb. 5, 1979, 32-33.

Barnett, A. Doak, "Military-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ffairs*, LV:3:584-597 (Apr. 1977).

Bellows, Thomas J., "Normalization: Process and Prognosi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V:3:11-21 (Autumn 1979).

- Butterfield Fox, and William Safire, "China: Unraveling the New Mysterie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19, 1977, 32–34, 48–59.
- , "After Camp David, Carter Set a Date for China Ties,"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78, A12.
- Chang, Jaw-ling Joanne, *United States–China Normalization: An Evaluation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Denver, 1986).
- Chay, John (ed.), *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Boulder, 1977).
- Chiu, Hungdah (ed.), *Normalizing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blems, Analysis, and Document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Occasional Papers, 1978).
- Cohen, Jerome Alan, "A China Polic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Foreign Affairs*, LV:1:20–37 (Oct. 1976).
- Cohen, Warren I.,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2nd ed. (New York, 1980).
- Copper, John Franklin, *China's Global Role* (Stanford, 1981).
- Department of Stat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Future Relations with Taiwan" (Washington, D.C., Dec. 1978).
- , *U.S. Policy Toward China, July 15, 1971–January 15, 1979*, Selected Documents No. 9, Office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1979).
- Garrett, Banning, "The China Card: To Play or Not to Play," *Contemporary China*, III:1:3–18 (Spring 1979).
- , "Explosion in U.S.-China Trade?" *Contemporary China*, III:1:32–42 (Spring 1979).
- Gurtov, Melvin, "China Invades Vietnam: An Assessment of Motives and Objectives," *Contemporary China*, III:4:3–9 (Winter 1979).
- Harrison, Selig S., *The Widening Gulf: Asian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1978).
- Hsiao, Gene T., and Michael Witunski, *Sino-American Normalizatio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New York, 1983).
- Johnson, Chalmers, "The New Thru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LVII:1:125–37 (Fall, 1978).

- Kim, Samuel S.,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Princeton, 1978).
- Kim, Se-jin, "American Moral Psyche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VI:1:8–18 (Spring 1980).
- Larkin, Bruce D., "China and Asia: The Year of the China-Vietnam War," *Current History*, 77:449:53–56, 83 (Sept. 1979).
- Lawson, Eugene K.,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New York, 1984).
- Lieberthal, Kenneth, "The Foreign Policy Debate in Peking, as seen through Allegorical Articles, 1973–76," *The China Quarterly*, 71:528–54 (Sept. 1977).
- Luttwak, Edward N., "Against the China Card," *Contemporary China*, III:1:19–31 (Spring 1979).
- Martin, Edwin W.,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The End of Containment* (Boulder, 1977).
- Mendl, Wolf, *Issues in Japan's China Policy* (London, 1978).
- Middleton, Drew, *The Duel of the Giants: China and Russia in Asia* (New York, 1978).
- Nathan, Andrew J., "Prospect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Effects on Korea," *Contemporary China*, II:4:14–22 (Winter 1978).
- Okita, Saburo,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Relations & Prospects," *Foreign Affairs*, LVII:5:1090–1110 (Summer 1979).
- Oksenberg, Michel, "China Policy for the 1980s," *Foreign Affairs*, LIX:2:304–22 (Winter 1980/81).
- , and Robert B. Oxnam,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1978).
- Ray, Heman, *China's Vietnam War* (New Delhi, 1983).
- Rothenberg, Morris, "The Kremlin Looks at China," *Contemporary China*, III:2:25–35 (Summer 1979).
- Segal, Gerald, "China and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The China Quarterly*, 83:490–509 (Sept. 1980).
- Solomon, Richard H., "Thinking Through the China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LVI:2:324–56 (Jan. 1978).
- Sutter, Robert 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7* (Boulder, 1978).

——, *China-Watch: Towards Sino-American Reconciliation* (New York, 1978).

——,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Development After Mao* (New York, 1986).

Tretiak, Daniel, "China's Vietnam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 *The China Quarterly*, 80:740–767 (Dec. 1979).

Yu, George T. (ed.), *Intra-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1978).

第三十五章

四個現代化

如果中國存在某種全民共識的話，那便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抱負——即農業、工業、科技和國防的現代化。這項公開宣稱的目標是到2000年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先進的現代國家。四個現代化被寫進了黨章（1977年8月18日的第十一次全國黨代會）和國家憲法（1978年3月5日的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這項規劃就不會受領導人更替的影響。

十年規劃

在1978年2月的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華國鋒主席宣佈了一項1976–1985年現代化十年規劃；由於已經過去了兩年，它實際上是一個八年規劃。它詳細地規劃了應該在四個部門實現的重大目標。

工業部門 工業基礎建設的投資將等於或超過此前二十八年的投資總額，據統計是4,000億美元，年工業增長率設定為10%。華國鋒提出要完成一百二十個大型項目，包括十大鋼鐵基地、六大油田、三十個大電站、八大煤炭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七條鐵路新幹線和五個重點港口。政府希望，到本世紀末，中國主要部門的工業產量將「接近、達到或超過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產量」。¹

鋼鐵 1952年的鋼產量（155萬噸）已經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點，1960年增長到1,867萬噸。大躍進降低了鋼產量，1961年僅800萬噸，

¹ 《人民日報》，1978年3月9日，第1–5頁。

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抑制了鋼鐵生產。一直到1970年，鋼鐵生產才得到恢復，1973年達到了2,550萬噸。然而，在四人幫掌權時期，產量再度下降——1976年僅生產了2,100萬噸。總之，在1960–1976年間，只取得了很小的進展。

十年規劃號召到1985年鋼產量增長到6,000萬噸，1999年增長到1.8億噸。為取得這樣巨大的增長，計劃與德國公司合作，耗資140億美元，在冀東(河北省東部)建立一個年生產能力達到1,000萬噸的大型鋼鐵基地；另外計劃與日本公司合作，投入啟動資金20億美元，在上海郊區的寶山興建一個600萬噸年生產能力的基地。還將在其他一些地方興建一些較大規模的鋼鐵廠，並對現有的鋼鐵廠進行更新。

石油 1957年以前，中國的石油生產微不足道(每年生產146萬噸原油)。六十年代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在東北發現並建成了大慶油田，在山東建成了勝利油田，在天津港區興建了大港油田。1960年到1965年間，原油產量翻了一倍，1969年又翻了一倍。到1978年，原油產量達到了1.04億噸。十年規劃號召要建設十個新的油氣田，耗資600億美元。²

煤炭 中國能源供應的70%靠煤炭，但大部分煤礦規模都很小，設備很簡陋。十年規劃提出建設八個新煤田，同時對現有煤礦進行更新，以期使煤產量翻一番，達到每年9億噸。這意味著平均年增長率將達到7.2%左右，而1970–1977年間的年增長率是6.3%。

電力 令人驚訝的是，電力生產是現代化規劃中最薄弱的環節。1978年的總發電量為2,566億千瓦小時，使中國位於世界電力生產國家的第九位，但人均耗電量卻仍遠遠低於印度和巴基斯坦。十年規劃提出興建三十個大電站，其中二十個為水電站。最大的項目有位於湖北宜昌附近長江上的葛洲壩水電站，總裝機容量為270萬千瓦，以及青海省西寧附近黃河上游的龍羊峽水電站，總裝機容量為160萬千瓦。這三十個新的電站將使年發電量提高600萬到800萬千瓦——這遠遠低於維

² Chu-yüan Che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 in Richard Baum (ed.), *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oulder, 1980), 26.

持10%的年均工業增產率所必需的13%-14%增長率，更不用說增加個人的耗電量了。

農業部門 農業是中國經濟的基礎。然而，自1949年以來，農業所獲得的投資始終少於工業和國防。農村集體化和人民公社沒有提高多少農業產量。1963年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只不過是一場宣傳伎倆而已，而文化大革命則把農業推到了崩潰邊緣。1977年8月8日，《人民日報》坦白地宣稱：「只要出現自然災害，就會發生巨大減產；小災害則小減產；即使氣候良好時也沒有多少增產。」³ 一位中國領導人承認：「1977年，全國的人均口糧與1955年的水平一樣；換句話說，糧食產量的增長只大致等於人口的增長加上工業和其他用途對糧食需求的增長。」⁴

華國鋒在宣佈十年規劃時號召要通過機械化、電動化、水利灌溉和更有效利用化肥來最大限度地提高農業產量。具體地說，目標包括：

1. 每年增長4-5%的農業總產值。
2. 到1985年將食品產量提高到4億噸（1977年是2.85億噸，故年均增長率是4.4%）。
3. 使85%的主要農活實行機械化。
4. 發展水利工程，以保證每個農業人口佔有一畝（1/6英畝）良田或一畝確保灌溉的農田，耕田總面積達到8億畝（1.21億英畝）。
5. 在全國建立十二個商品糧基地。

為了提高自1957年以來農業生產每年2%的緩慢增長率，政府確立了幾條新的指導原則。以前一直是自負盈虧的基本計量單位「生產小隊」，現在被更大的「生產大隊」取代。其次，採納「按勞分配」的原則以

³ 《人民日報》，1977年8月8日，「在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上的報告」。

⁴ Hu Ch'iao-mu, "Observe Economic Laws, Speed Up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Peking Review*, 47:8 (Nov. 24, 1978).

刺激農村的創造性和勞動熱情；這樣，「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便成為一條基本的農村經濟政策。此外，對家庭「副業」的鼓勵將有助於補充集體經濟。農村家庭不擁有公社分配的「自留地」，但有權耕種它們。農民不能出租、出售或轉讓土地，但擁有自留地的產品。「副業」生產佔農業和農副產業生產總額的25%。最後，政府希望通過密集開發，使公社和隊辦企業能支援大工業和出口貿易。

科學現代化 科學技術被看作是其他三個部門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基礎。在1978年3月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方毅副總理遞呈了《全國科學技術發展綱要(草案)》，號召：(1) 在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達到或接近1970年發達國家的科學水平；(2) 把專業科學研究人員的規模擴大到80萬人；(3) 發展最先進的科學實驗中心；(4) 完善全國性的科學技術研究制度。《綱要》把27個領域裏的108個項目列為重點研究項目。⁵ 中央希望，到1985年，中國將只比最先進國家落後十年，並擁有到本世紀末趕上先進國家的堅實基礎。

軍事現代化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常規武裝力量，人數約為432.5萬人。其中僅陸軍就擁有325萬人，而中國的海軍和空軍在數量上也位居第三。⁶ 但是，除了在戰略部門集中發展的武庫(即核炸彈和彈道導彈)外，中國的軍事技術仍落後於西方約二十到三十年。部隊訓練有素、鬥志高昂、政治覺悟高，但武器裝備卻極其不相稱。經

⁵ 這27個領域包括自然資源、農業、工業、國防、運輸、海洋學、環境保護、醫學、金融、貿易、文化和教育，另外還有一些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學科。

⁶ 根據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Lawrence Freedman所做的研究，《The West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London, 1979)一書，第5頁，中國的武裝部隊包括以下這些主要單位：

戰略部隊：中程導彈：30-40枚CSS-1型導彈，射程為六百到七百英里。中程彈道導彈：30-40枚CSS-2型導彈，射程為1,750英里。(遠程彈道導彈：若干在1976年首次試驗的CSS-3型導彈，射程為3,500英里，還有數量更少的CSS-X-4型導彈，射程為6,000-7,000英里，1980年5月首次試驗——作者)
陸軍：325萬人，10個裝甲師，121個步兵師和150個獨立團。

費缺乏和技術落後所造成的狀況，因毛澤東強調精神勝過武器而更加惡化。他的「人民戰爭」的想法是，運用大量經過政治動員和嚴格訓練的游擊隊騷擾入侵者並將其趕走，這基本上是一種防禦觀念，缺乏進攻活力。1979年中國不甚出色的入侵越南行動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卓越的戰略家、前總參謀長粟裕宣稱，毛澤東的觀念「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阻礙了軍事思想的發展。」⁷

在五十年代蘇聯的援助下，中國建立起了幾乎自給自足的國防工業，一些產品(如AK-47步槍)位列世界最精良武器。⁸但是，總的來說，中國的軍事技術落後二、三十年。真正迅速的現代化要求大量購買外國武器和儀器，但這樣的代價太大了，將使中國聽由外國供應商宰割。中國長期軍事規劃中的最優先考慮仍然是控制本國的生產能力，因此，中國計劃通過專門的訂單，有選擇地購買高技術系統和武器生產設備以幫助本國的武器生產。

中國領導人認識到了大規模更新陳舊裝備的迫切需要，但也看到這樣做的驚人代價。雖然中國的國防預算是國家機密，但西方估計它在1976年為328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三。⁹一份英國的資料稱中國1978年的國防開支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7%–10%，或大約350億美元。¹⁰新式裝備的生產、設備及維修佔該數據的58%。哪怕只是讓中國軍事的一部分實行現代化，那麼，到1985年，所花費用也將高達3,000億美元，這是不可能支付得出的。¹¹由於這樣一筆開支要求大量投入外國

海軍：3萬人；另有3萬名海軍航空兵，岸基飛機700架；38,000萬名海軍陸戰隊；23艘大型水面作戰艦艇；還有相當大數量具有導彈發射能力的潛水艇和驅逐艦。

空軍：40萬人，5,000架作戰飛機，包括4,000架米格-17和米格-19型飛機，以及數量不多的米格-21型和殲-9型飛機。

⁷ 引自Lawrence Freedman, 6。

⁸ Jonathan Pollack,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in Baum (ed.), 247.

⁹ Jonathan Pollack, 243.

¹⁰ Lawrence Freedman, 19–20.

¹¹ 同上註，19。

資本和設備，因此軍事現代化在中國領導人的考慮次序上只佔較次要的位置。

最根本的諷刺可能是，中國竭盡全力去獲取目前最先進的技術和武器，然後將花五到十年時間使如此新式的裝備與現存機制整合起來，到那時，更先進的國家將已經採取了更新的裝備，中國仍將落後十年到十五年。雖然這可算是現有能力的改善，可它也必須被看作是未能達到真正的現代化目標。

緊縮和調整重點

最初的十年規劃是一種政治願望而非一項經濟藍圖，因此缺乏可行性方面的謹慎研究。在這個規劃的第一年中，政府啟動了十萬個基建項目，耗資400億美元；加上軍事和科學方面的採購，總支出達到1978年1,980億美元國民總收入的24%。一些大型的對外合同也在談判之中，包括寶山鋼鐵基地（20億美元）、冀東鋼鐵基地（140億美元）和一項與美國國際旅店公司洽談的旅店建設項目（5億美元）。此外，地區機構也與外國供應商簽訂了大量相當規模的協議，這些加上基層基建項目，使1978年的投資總額達到國民收入的36%，接近大躍進年代40%的比例。如此過度的超支顯然是無法承受的。¹²

經濟現狀不久引發了批評性檢討。最高層內就投資的範圍和重點問題展開了一場爭論。1978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提出應對農業生產給與更多的重視，這反映了最高領導層重新評估的結果。¹³ 同樣的情緒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會議（三中全會）上得到了表達。

中國有限的財政和科學資源迫使領導人重新檢討十年規劃。中央決定，優先發展的重點應該是作為經濟基礎的農業，其次是能夠滿足

¹² Chu-yüan Cheng,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Current History*, Sept. 1980, 24.

¹³ *Peking Review*, No. 47:17-21 (Nov. 24, 1978).

國內需求並掙取外匯的輕工業，然後才是重工業。對農業的資金投入從260億美元(400億人民幣)增加到了500億美元(900億人民幣)，輕工業和出口工業也獲得了新的撥款。在重工業方面，鋼鐵生產指標從6,000萬噸削減到了4,500萬噸；但煤炭、電力、石油和建築工業的投資比例保持不變。¹⁴ 能夠立即完成並掙得外匯的項目得到鼓勵，而以後的投資項目則計劃依靠銀行貸款而非政府撥款。另一方面，那些需要巨額資金以及在資源、原材料、選址、交通、技術能力或能源供應等方面遇到麻煩的項目或是推遲上馬，或是乾脆取消。

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1979年6月)上，華國鋒宣佈國民經濟進行為期三年(1979–1981年)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緊縮政策的直接後果是停止了348個重工業大項目(包括38個鋼鐵廠和冶金廠)和4,500個小項目。1979年的資本投入削減到國家開支的34.8%。具體來說，鋼鐵、機械和化工工業方面的投資削減幅度最大，1979–1980年度它們的投資配額減少了30–45%。¹⁵ 基建投資也大受影響，上海削減33%，內蒙古削減了40%。與此同時，農業投資從1978年國家預算的10.7%提高到1979年的14%和1980年的16%，而紡織業和輕工業的投資從1978年的5.4%上升到1979年的5.8%和1980年的大約8%。

緊縮政策勢在必行，不僅是由於中國的外匯存款、財政資源和消化能力都很有限，也因為1979年入侵越南的代價出乎意料地高昂。此外，最初對石油產量及其出口能力的估計也太樂觀，能源部門不盡人意的表現，使中國利用石油出口來為現代化籌措資金的設想落空了。1978年的預算赤字為65億美元，1979年上升至113億美元。¹⁶ 顯然，中國需要有經驗、更精確的經濟規劃。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會長、日本經濟奇蹟的設計師大來佐武郎受邀前來中國擔任顧問。

¹⁴ Chu-yüan Cheng, in Baum (ed.), 41; *Los Angeles Times*, May 10, 1979.

¹⁵ Chu-yüan Cheng,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Current History*, 25.

¹⁶ John Bryan Starr, "China's Economic Outreach," *Current History*, Sept. 1979, 50–51.

由於緊縮政策，1985年國民經濟應達到的指標大大降低了，下表顯示的是降低後的新指標和1985年五大工業行業的實際產出：¹⁷

	1978年	1979年	1985年 (十年計劃)	1985年 (修改後計劃)	1985年 (實際產出)
鋼鐵(百萬噸)	31.8	34.5	60	45	46.66
煤炭(百萬噸)	618	635	900	800	850
原油(百萬噸)	104	106.2	500	300	125
電力(十億千瓦)	256.6	282	不詳	不詳	407
水泥(百萬噸)	65.2	73.9	100	100	142.46

應予注意的是，兩種主要的能源煤炭和原油的產量增長很小。煤產量在1978年增長了12.5%，但1979年只增長2.75%。原油產量在1979年增長了1.9%，相比之下，1978年卻增長了11%，而1957年到1977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是22.5%。這一巨大的落差或許表明，當時開採點的石油出產量業已過了頂峰，因此表示必須作新的勘探。發電量增長率也從1957年到1978年間13%的年均增長率下降到1979年的9.9%和1980年的2.9%。¹⁸

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交通和能源仍然是現代化規劃中的主要障礙。石油、煤炭和電力生產遠遠不能滿足新的需求。儘管貨運量從1950年到1978年增長了9.7倍，鐵路里程卻只增長了1.4倍——交通道路的負荷達到了極限。除非能源和交通的瓶頸能夠緩解，否則中國的現代化將被捆住手腳。石油產量的小幅度增長，已經巨大地削弱了中國賺取外匯為購買外國高新技術籌措資金的能力。

或許可以從紡織業和輕工業中獲取一些附加的收入，這些行業能夠比較容易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掙取外匯。由於國家投資和銀行貸款的增加以及較優質的原料，1980年第一季度的紡織品產量比1979年同

¹⁷ Chu-yüan Cheng,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Current History*, Sept. 1980, 26; James T. H. Tsao,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Foreign Trade* (Lexington, Mass., 1987), 151.

¹⁸ Cheng, 27.

期增長了30%，而輕工業則增長了21%。¹⁹但這些資源能否產生有力加速現代化進度所需的足夠資金，卻是大可置疑的。

快速現代化的後果

正如實現現代化會產生問題一樣，現代化的加速實現也會產生問題。首要的是通貨膨脹，這在以前時期幾乎是完全不存在的，那時政府有意識地推行一種低工資、低物價的政策。當民眾購買能力很小的時候，對貨物的需求保持在較低水平，物價也比較穩定。隨著工資的提高和政府購買農產品的價格上漲（1977-1979年間上漲了20-50%），國家相應地提高了各種商品的銷售價格，從而引發了通貨膨脹。1979年官方統計的通貨膨脹率為5.8%，但實際可能達到了15%。物價毫無節制地一路飆升，1980年的年膨脹率達到了15-30%，而輕工業的增長僅為9.7%。當物價上漲快於生產力增長時，便產生了一種漲價心理，引發了黑市和投機倒把。政府預算也反映出赤字的不斷增加：1979年為113億美元，1980年為100到120億美元，1980年可能為60億美元。為了減少赤字，財政部在1981年春計劃發行33億年息為4%的十年期國庫券。政府企業、行政機關、人民公社和軍隊被責令根據能力購買這些債券，但個人似乎可以自願決定購買。²⁰國庫券的發行表明了中國正面臨財政困難。

通貨膨脹和過度超支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1981年決定削減40%的大型基建項目。許多有外國公司參與的大項目被突然終止了。較早進入中國市場的日本遭遇最慘：日本損失的總額估計達15億美元，其中包括寶山鋼鐵基地和三個石油化工項目。德國的損失要小一些，而較晚步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則損失最小。中國人坦率地解釋說，他們目前沒有錢繼續搞這些昂貴的工程，他們同意賠償由此造成的損失，但他們不提確切的數額。²¹外國人理解中國的財政困境，但當中國單方面

¹⁹ 同上註，27。

²⁰ *Far East Times*, San Francisco, Mar. 10, 1981.

²¹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0, 1981. 據報道，日本公司三菱重工要求得到8,400萬美元的賠償。

取消談妥的協議時，他們必然對這個國家的國際信譽提出了懷疑。毫無疑問，中國作為一個可靠交易者的聲譽受到了損害。

基建工程的下馬導致了無數工人被解雇，加劇了已經很嚴重的失業問題。中國曾經誇耀，它的社會主義制度保證每個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有工作，自豪地宣稱中國沒有失業——只有待業！

現代化的另一個異常現象是，在一個所謂的無階級社會中湧現出了一些新的階級。現代化使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工廠經理、作家、藝術家和其他知識分子獲得了新的威望，他們將帶領中國「騰飛」。社會上存在這樣一種新的觀念：「萬般皆下品，唯有科技高」。科學工作者、知識分子和高幹現在形成了一個特權的高級階層；城市企業工人和基層幹部構成了第二階層，而農民和生活在農村的人則構成最低等級。一些學者和學生被選派出國進修，他們中許多人是高幹的直系親屬，這進一步加強了精英主義傾向，擴大了社會分層。

另一個不斷加深的問題產生於城市與農村之間和各種工礦企業本身之間日益擴大的差別。由於政府採取了一種「飛地」策略，把一些重要的工業落戶到經過選擇的城市地區，這些地區於是就較便利地享受了現代化的果實——更高的工資、更大的向上流動性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城市中一個普通產業工人每月大約掙40美元，外加獎金，而一個農民每月平均的現金收入只有5-7美元。一個城市工人收入超過一個農民六到八倍是很平常的事，而科技人員則比農民多收入十幾倍。在工業部門內部，效益也大不均勻：1978年，石油行業享受40%的利潤幅度；電力行業是31%；冶金行業13%；煤礦行業則只有1%。效益不僅決定投資水平，也決定獎金和福利的額度，因此，深刻地影響了工人的生活方式。獎勵的差異導致了工作熱情的程度差異。

在所有這些快速現代化的不利後果背後，隱藏著稱得上是中國最嚴重的難題——信任危機。經過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國仍然貧窮落後。以往的成就報道經常被揭露出是純粹的宣傳，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喪失了信心。人們的思想中還存在對實現真正現代化的明顯不信任。年輕人對黨員幹部的特權地位和他們的官僚主義作風尤其反感，根據這些人以往的表現，人們懷疑他們是否有執行現代化計劃的能力和誠意。確實，許多擔任中下層職務的黨

員幹部缺乏一技之長，他們受到了現代化新要求的挑戰，私下反對、抵制或延緩與他們的利益相抵觸的新舉措。²² 現在流行這樣一句話：「兩頭熱，中間冷」——意思是國家領導人和人民都想要現代化，但中層官僚卻反對變革。中國的報刊公開討論中國的三重危機：對黨和政府缺乏信念、信心和信任。²³

外來價值觀和中國文化精髓

現代化一直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目標。但是激進的中國共產黨覺得借鑑西方和日本有失體面。1975年9月，四人幫的一名代言人宣稱：

「全盤西化」，在政治上就是喪權辱國，全盤出賣祖國的獨立和主權……「全盤西化」，在思想上就是頌洋非中……「全盤西化」，在經濟上就是散佈對西方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迷信，使中國經濟完全變成帝國主義的附庸。²⁴

因此，毛澤東主義派提倡自力更生。毛澤東認識到中國的落後，同樣也知道中國的資源有限。他擔心，現代化會對諸如收入分配、工人地位和精英主義及官僚主義復辟等敏感問題產生副作用，從而犧牲他的平均主義。但二十年間(1958–1976年)的自力更生和排斥外國技術，卻使中國處在落後貧窮的深淵，而在此期間，其他國家則通過技術革新大踏步地向前躍進了。

隨著毛澤東的去世和四人幫的垮臺，開創一個新的起點以彌補時間損失的道路掃清了。一項現代化的應急計劃已經啟動了，鄧小平是騰飛的主心骨。中國領導人設想，科學技術和技術更新的動力基本

²² 《紅旗》雜誌，第14期，第25–27頁(1980年)。

²³ 《人民日報》，1980年7月1日；1980年11月11日；1981年2月24日；《光明日報》1981年3月28日。

²⁴ 梁效：〈洋務運動和洋奴哲學〉，《歷史研究》，第5期(1975年10月20日)。

上是中性的、無階級的，它們可以無害地植入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制度。²⁵

中國領導人宣稱，他們不想模仿西方，而是要鍛造一種「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然而，與外國的技術聯繫在一起的知識和技能，將不可避免地影響獲取這些東西的人的思維和行為。晚清時期的「體用」之爭又以另一種形式再現了。在中國的西方科學家和在發達國家受訓的「歸國」留學生，無疑將對中國人的生活和思維發揮新的影響。

雖然中共一再告誡不要受外國文化的影響，但與國外意識形態、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接觸所帶來的文化後果是無法完全遏制住的。一種期望是，中國人將能夠得到一種折衷方法，通過這種方法，他們將確實在思想和專業上現代化，同時又不失去他們中國血統的獨特性。雖然中國的現代化不能確保完全按一張特殊的時間表來進行，但中國領導層日益務實的目標似乎都指向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最終成功實現——或許要到廿一世紀三十到五十年代才能大致完成。

參考書目

- Andors, Stephen, *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94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77).
- Baum, Richard (ed.), *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Boulder, 1980).
- Chang, Arnold, *Pain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olitics of Style* (Boulder, 1980).
- Chen, Kuan-I,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Current History*, 77:449: 66-70, 85-86 (Sept. 1979).
- Cheng, Chu-yüan, *China's Petroleum Industry: Output Growth and Export Potential* (New York, 1976)
- 鄭竹園：〈中共近代化的頓挫及展望〉，《海外學人》，1980年9月，第25-32頁。
- Chou, S. H.,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Current History*, 77:449:49-52, 87-88 (Sept. 1979).

²⁵ Genvieve C. Dean, "A Note on Recent Policy Change" in Baum (ed.), 105.

- Dean, Genevieve 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London, 1974).
- , and Fred Chernow, *The Choice of Technology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abrication of Semiconductors* (Palo Alto, 1978).
- Field, Robert Michael, "A Slowdown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China Quarterly*, 80:734–739 (Dec. 1979).
- Freedman, Lawrence, *The West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Chatham House Papers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9).
- Fureng, Dong,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84:726–736 (Dec. 1980).
- Gelber, Harry G., *Technology, Defense, and External Relations in China, 1975–1978* (Boulder, 1979).
- Godwin, Paul H. B., "China and the Second World: The Search for Defense Technology," *Contemporary China*, II:3:3–9 (Fall 1978).
- , "China's Defense Dilemma: The Modernization Crisis of 1976 and 1977," *Contemporary China*, II:3:63–85 (Fall 1978).
- , *PLA-Military Forces of the PRC* (Boulder, 1981).
- Goldman Merle, "Teng Hsiao-p'ing and the Debate ov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emporary China*, II:4:46–69 (Winter 1978).
- Hardy, Randall W., *China's Oil Future: A Case of Modest Expectations* (Boulder, 1978).
- Harrison, Selig S., *China, Oil, and Asia: Conflict Ahead?* (New York, 1977).
- Hu, Ch'iao-mu, "Observe Economic Laws, Speed Up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Pt. I, *Peking Review*, 45:7–12 (Nov. 10, 1978); Pt. II, *Peking Review*, 46:15–23 (Nov. 17, 1978); Pt. III, *Peking Review*, 47:13–21 (Nov. 24, 1978).
- 黃志堅：〈究竟應當如何認識這一代青年〉，《人民日報》，1981年2月24日。
- Huang, Philip C. C. (ed.),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 (White Plains, N.Y., 1980).
- Klatt, W.,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A Statistical Appraisal," *The China Quarterly*, 80:716–733 (Dec. 1979).
- , "China Statistics Up-dated," *The China Quarterly*, 84:737–743 (Dec. 1980).
- Kokubun, Ryosei,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China:

- The Case of Plant Cancellation with Japan," *The China Quarterly*, 105:19–44 (March 1986).
- Lardy, Nicholas R., "China's Economic Readjustment: Recovery or Paralysis?" in Robert B. Oxnam and Richard C. Bush (eds.), *China Briefing, 1980* (Boulder, 1980), 39–51.
- , *Economic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 China* (Cambridge, Eng., 1978).
- (ed.), *Chinese Economic Planning: Translations from Chi-hua ching-chi* (White Plains, N.Y., 1979).
- 李洪林：〈信仰危機說明了什麼〉，《人民日報》，1980年11月11日。
- Myers, Ramon H., *The Chinese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Belmont, Cal., 1980).
- 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 *China: Economic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Dec. 1978).
- , *China's Economy* (Washington, D.C., Nov. 1977).
- , *China: Gross V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 1965–77* (Washington, D.C., June 1978).
- , *China: In Pursuit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Washington, D.C., Dec. 1978).
- , *China: Post-Mao Search for Civilian Industrial Technology* (Washington, D.C., 1979).
- , *China: The Continuing Search for a Modernizatio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April 1980).
- , *China: A Statistical Compendium* (Washington, D.C., July 1979).
- Nelsen, Harvey, *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 (Boulder, 1981).
- Pollack, Jonatha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in Richard Baum (ed.), *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Boulder, 1980), 241–261.
- Prybyla, Jan. S., *The Chinese Economy: Problems and Policies* (Columbia, S.C., 1978).
- , "Feeding One Billion Peopl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Current History*, 79:458:19–23, 40–42 (Sept. 1980).
- Reardon-Anderson, Jam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Mao China," *Contemporary China*, II:37–45 (Winter 1978).
- Segal, Gerald, and William Tow (eds.), *Chinese Defense Policy* (Champaign, 1984).
- Sigurdson, J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7).

- Smil, Vaclav, *China's Energy Achievements, Problems, Prospects* (New York, 1976).
- , "The Energy Cos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temporary China*, II:3: 109–114 (Fall 1978).
- Stavis, Benedict, *Making Green Revolution —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thaca, 1974).
- Stover, Leon E.,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easants Elites in the Last of the Agrarian States* (Stanford, 1979).
- Suttmeier, Richard P., et 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is, 1977).
- ,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hina's Drive for Modernization* (Stanford, 1981).
- 鄧力群：〈共產主義是千秋萬代的崇高事業〉，《光明日報》，1981年3月28日。
- Ullrich, Curtis, *Rural Employment and Manpower Problems in China* (White Plains, N.Y., 1979).
- Volti, Rud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Boulder, 1981).
- Wiens, Thomas B., "China's Agricultural Targets: Can They Be Met?" *Contemporary China*, II:3:115–127 (Fall 1978).
- Young, Graham (ed.), *China: Dilemmas of Modernization* (Dover, 1985).

毛澤東時代的結束

審判四人幫和林彪集團

從1980年11月到1981年1月，中國發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法律和政治大事：審判四人幫和林彪的同夥。過去，在權力鬥爭中失敗的異見者或政治反對派往往簡單地被清洗、關押、清除或被「遺忘」。但是，現在新的領導層急於標榜尊重法律的形象，於是成立了一個特別法庭來審判江青集團和林彪集團對國家和人民所犯的罪行。

在逮捕四人幫到開庭審判之間有四年的間隙，這表明了問題極其敏感和複雜，也表明黨內對這樣做是否明智、將採取怎樣的程式等問題有激烈的爭論。問題的關鍵在於，毛澤東與四人幫的崛起及其活動大有關係。如果毛澤東被牽涉到審判當中，那麼，為了澄清真相，中共就必須對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及以後的作用作一個正式的評價。然而，由於各位領導人所持的意見分歧極大，無法很快達成共識；而等待這樣一個評價將繼續推延審判。此外，由於華國鋒主席在四人幫左右國家政策時期擔任公安部長(和以後的總理)，他的地位就十分微妙了。他完全有可能、甚至可以說是必然地會被當作證人傳呼出庭。因此，使毛澤東和華國鋒完全脫離審判的問題，就成了國家高層人士討論的要點。不經過長久的爭論、激烈的談判和許多妥協，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在1976年10月被捕後，四人幫就不斷受到政府調查人員的傳訊，政府希望透過這樣來收集證據、供詞和其他任何相關資訊，作為正式起訴的基礎。但這四個人都是些老練的政客，他們巧妙地迴避問題，把行動的一切責任全推到了毛澤東身上。1980年5月，中共對四人幫

舉行了一次秘密的預審聽證。江青激烈地申辯自己無罪，堅持執行的每項行動都是根據毛澤東的明確指示，得到了中央委員會的同意。她說，毛澤東的唯一錯誤就是選擇華國鋒當總理，因為這刺激了華國鋒獵取更高職位的胃口；他最終背叛了毛主席的教導，像一個世紀前的李鴻章一樣向資本主義國家屈膝投降。她堅持稱，華國鋒不僅完全知道並支持她的活動，而且事實上(作為公安部長)也深深地捲入了對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事件的鎮壓；因此他必須被傳喚出庭作證。¹

王洪文和張春橋也一樣把行動的所有責任推給毛澤東，他們進一步指出，華國鋒是局內人，他知道一切。姚文元的申辯只是稍有不同，他認為黨中央應負責任，並且批評現任領導層通過與外國資本家合作來搞四個現代化是偏離了毛主席的路線。總之，四個人全都牽連進毛澤東和華國鋒來作申辯。

在中共領導集團內部，很快出現了兩種思路。總書記胡耀邦和黨的副主席陳雲主張，只有先評定毛澤東的貢獻和錯誤，才能恰當地確定四人幫的罪行。要是毛澤東不藐視「黨內民主」，不庇護四人幫掌權，這四個人怎麼能對國家做出如此暴戾的傷害？另一方面，華國鋒和他的支持者主張，在審判以前對毛澤東的責任作任何評判，將減輕四人幫的罪責；必然的邏輯結果將是，毛澤東和黨將負最終責任。他們要求在評價毛澤東之前先評判四人幫的罪行。

為了避免進一步的拖延，領導層最後決定，審判將按宣佈的日程進行，不先對毛澤東的作用作評判。中央通過了幾條指導原則，其中最基本的是，按鄧小平副主席的意見，要分清「政治錯誤或判斷失誤」與謀害、非法拘禁和肉體折磨等實際罪行之間的區別。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被看作是「錯誤」而非「罪行」；因此不能對他提出指控。通過的其他一些原則如下：

1. 正式審訊「四人幫」將在兩、三個月內進行。為顧及保守「國家機密」及維持毛澤東「聲望」，審訊仍將採取秘密方式。

¹ 《中央日報》，1980年11月16日。根據國民黨方面的專家報告。

2. 有關毛與「四人幫」的關係，經協商決定：先定「四人幫」罪行，再正式評價毛功過，如此對於批毛問題可做彈性調整。但強調把握「多講不如少講，少講不如不講」原則，審訊中盡量迴避與毛功過有關的問題。
3. 王、張、江、姚四人罪行雖略同，但錯誤嚴重程度不一，江青因罪大惡極，為四人之首，王洪文因投靠提拔竄升要職，其資歷短淺，屬四人之末，根據預審決定，將四人排名順序為江、張、姚、王。²

一個有三十五名法官組成的特別法庭成立了，分作兩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審判四人幫，軍事審判庭審判林彪的六個同夥。由於林彪集團被指控陰謀反對毛澤東，而四人幫則被指控在毛澤東的庇護下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因此，將這兩個集團捆在一起審判似乎不太符合邏輯。但政府解釋說，這兩個集團在文革期間陰謀勾結，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他們這樣做嚴重損害了國家、人民和當時的領導人。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兩個集團都在這個或那個時期得寵於毛澤東，而且這兩個集團奪取最高權力的企圖都未得逞。

審判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正式宣佈人們等待已久的審判。另外三、四十名法官中有軍人、政治家和著名知識分子；³ 他們中有七個人未受過任何法律訓練，但他們是推選出來表達人民對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譴責的「特別顧問」。外國記者不允許採訪，只有880名從各省和中央黨政軍機構精心挑選出來的代表允許輪流旁聽。

聚焦點自然在67歲的大名被告江青身上，她神氣十足地步入法庭。她穿著一身黑色服裝，這種顏色據說象徵著施加給她的不公平，或許也表示她對曾經由她代表的左傾思潮之沒落的悲哀。四人幫的其他幾個成員，63歲的張春橋看上去萎頓、冷漠，比他的實際年齡老一

² 同上註，1980年8月12日。專家報告。

³ 包括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

些；49歲的姚文元已經發胖；而45歲的王洪文顯得很躊躇，或許是因為他在所謂的「認罪辯訴協議」中與公訴方進行了合作。其他的同犯有76歲的陳伯達，他曾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投靠了林彪，1970年被清洗；還有與林彪勾結的五位將軍。⁴他們坐在罪犯席的鐵柵欄後面，神情萎靡、舉止局促，邇邇、憔悴、蒼老，一看便知已被長年關押。只有江青顯得高傲、倔強，全然輕蔑地直視法官和公訴人。

首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作為特別公訴人列舉了六名已經死掉的人，他們如果活著也將被指控為被告：林彪、他的妻子、他的兒子、在1971年空難中喪命的另一位追隨者、康生（毛澤東從前的警衛頭目）及其繼位者謝富治。明顯地是沒有提及毛澤東的名字，也沒有人覺得他是「五人幫」中「不被起訴的被告」。

隨後，黃火青宣讀了一份兩萬字的起訴書，指控這些被告篡奪國家政權和黨的領導權。他們的主要罪狀分成四類：

1. 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陰謀推翻無產階級專政。
2. 迫害、殺害、折磨大批幹部和群眾，人數超過34,375人。
3. 陰謀策劃等毛澤東去世後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1976年8月王洪文負責向民兵分發三百門大炮、七萬四千枝步槍和一千萬發子彈。
4. 陰謀策劃刺殺毛澤東並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

上述頭兩類適用於所有被告；第三類針對四人幫，而第四類則針對林彪集團。對被告提出了四十八項在法律上很嚴密的具體指控，沒有包括意識形態上或政治上的錯誤。⁵

在審判期間，江青選擇為自己辯護。這位從前的女演員差不多做了她一生中最精彩的表演。她故作無辜和鎮靜狀，其中還夾雜著一種自豪和傲慢，顯示對整個審判程序的「高傲」鄙視。她試圖塑造一種革

⁴ 這五位將軍是：70歲的解放軍前總參謀長黃永勝；65歲的前空軍司令吳法憲；66歲的前海軍政委李作鵬；66歲的前解放軍總後勤部長邱會作；61歲的前南京空軍政委江騰蛟。

⁵ 起訴書全文刊登在《世紀大審判》（北京，1981年），第18-26、149-98頁。

命烈士的形象——一位中國的貞德*——她唯一的過錯是在政治鬥爭中失敗了。她堅持所有的行動都是根據毛澤東的明確指示、經過中央委員會的同意而採取的。不然的話她能做甚麼？許多稱她為「巫婆」和「世界上最可恨的人」的中國人內心也同意她的觀點，甚至私下承認她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得出結論，毛澤東是真正的罪犯，因為，如果沒有他，江青是永遠不可能那樣的。

江青被指控是下述陰謀的主要策劃人：1974年10月派王洪文去見毛澤東，誣告周恩來總理可疑地會見其他一些領導人，試圖阻止周總理提名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她對這個指控輕蔑地回答說：「不，我（對這事）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這事呢？」公訴人隨後叫王洪文來作證。王洪文承認，1974年10月，他們四個人確實在北京江青的住處（釣魚臺國賓館）碰頭，密謀誣陷周恩來和鄧小平。他還補充說，「是江青叫我們去碰頭的，目的是阻止鄧小平當上第一副總理」。王洪文還表示姚文元要求他對毛主席說，現在北京的形勢很危險，很像1970年8月廬山會議上林彪試圖政變時的情形。姚文元不否認他自己做的事，但他強調是江青組織了這項誹謗周恩來和鄧小平的計劃。兩位其他的證人，毛澤東的外甥女王海容（外交部副部長）和唐聞生（毛澤東最寵愛的英語翻譯）也作證，江青曾要她們在毛主席面前說周總理和鄧小平的壞話，但她們拒絕了。

首席法官接受了公訴方的論證，江青集團（現在這個詞代替了「四人幫」一詞）誣陷周恩來和鄧小平，以便為他們自己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創造良好條件，此事證據「充分」、「確鑿」。

四人幫還被指控在1966–1976年間非法迫害75萬人，其中的34,375人被殺。為了證明這些罪行，公訴方在一幅大銀幕上放映了一位前煤炭部部長傷痕累累的屍體的圖片，並播放了一些錄音帶，裏面有一些知識分子的尖叫、嚎叫和呻吟聲，這些人拒絕與江青合作，結果在她的私刑室裏慘遭折磨。⁶

* Joan of Arc (1412–1431)，法國民族女英雄，1920年尊為聖女。

⁶ 煤炭部部長是張霖之。十一名教授和劉少奇的熟人遭受折磨，其中三個被迫害致死。《世紀大審判》，第43–45、56–57頁。

被人們以為在1970年下臺後已經死掉的陳伯達顯得虛弱、衰老。他承認曾在1967年7月與江青和康生密謀策劃了打倒劉少奇並於獄中將他逼死。陳伯達進一步供認曾下令清洗鄧小平（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陶鑄（中共廣東省委領導人）和陸定一（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67年後期，陳伯達甚至對紅軍的創始人之一、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進行了誣告。陳伯達被指控在文革期間總共錯誤迫害了84,000人，導致2,950人喪生。

在不斷的質問下，江青崩潰了，她承認曾寫信給負責迫害劉少奇的小組，指示將劉少奇逼死。她還承認曾說過劉少奇「應該碎屍萬段」。⁷ 這個無可辯駁的認罪證據使公訴方取得了審判中的一大突破。

為證明江青有罪，公訴方採取了最後一個動作，出示了她在文革期間準備的一份予以清洗的中央委員名單：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元帥、北京市長彭真。公訴方強調，後來的事實表明，所有這些人都被搞下了台，而且他們都是由於江青提供的不實指控而被打倒的。

至於林彪集團的六個被告，全部服罪，承認在1971年9月毛澤東視察全國期間，按林彪的命令策劃謀殺毛澤東。他們中最年長的陳伯達稱無話可說，但請求黨給與寬大，這表達了所有六個人的情感。

經過二十七天的審判，加上許多次累計長達近兩個月的休庭，法庭於1980年12月29日完成了工作，但沒有宣佈判決結果。十位被告中有八位服罪，但張春橋始終拒絕合作，而江青則至死全無悔過之意。

公訴人江文請求，鑒於江青「特別嚴重、特別惡劣」的反革命活動，應給與她嚴厲的處罰（雖然不一定是死刑）。他說了以下這些話，接近於譴責毛澤東：「全國各族人民都明白，毛主席要承擔領導責任。他應對他們在文革期間遭受的苦難負有責任。他也應對沒能看清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負責任。」然而，這位公訴人又馬上補充說，毛主席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作出了巨大貢獻，並領導創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在中國開創社會主義事業。這位公訴人援引鄧小平的觀點，稱毛澤東的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⁸

⁷ 同上註，第39頁。

⁸ 同上註，第105頁。

江青還是那樣激動、無悔和傲慢，她在法庭上大叫：「好啊。請便吧！你們不能殺死毛主席了——他已經死了——但你們可以殺死我。我仍然毫不後悔。我是正確的！」她宣稱掉腦袋比向迫害她的人屈服更光榮，她對法庭說：「我量你們也不敢在天安門廣場當著一百萬人民宣判我死刑。」

說到底，正如這場審判是一個政治行動一樣，判決也必須反映當時領導層的想法；因此在三個星期裏沒能達成共識。1981年1月25日，特別法庭宣判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姚文元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陳伯達有期徒刑十八年。其他五名將軍被分別處以十六到十八年的有期徒刑。

只要看一看中國領導人竟花費了那麼長的時間才作出判決，人們就能想到，家長式的毛澤東之影響仍然很巨大。他在生前護佑了他的妻子步步高升，在死後還庇護她免於被立即處死。江青似乎知道，現在的領導層不敢完全否定毛澤東和黨的第九次、第十次代表大會，那樣做必然會嚴重損害黨本身的威信。確實，她進行辯護的主要思路從未遭到控方的直接反駁。但是，她在迫害狂潮和34,375人喪命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她設立私刑室的做法，已經是無可寬恕的罪行，對此，即使判處死刑都太便宜了她。但是，對她的判決和對她的審判本身，都是受政治動機驅使的，因而也就要從政治的角度來決定。毛澤東的幽靈，制止了當政的領導層將她處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場審判可以被看作是對毛澤東的間接審判，江青則充當了毛澤東的替代品。更深一步探究一下的話，人們可以說，這場審判是對整個制度的控告，這個制度允許毛澤東超越於中央委員會之上，並允許他的妻子一夥將國家推向大混亂和經濟災難的邊緣。這場審判的最終效果是進一步侵蝕了毛澤東的形象和他所創制度的效力。

審判引起的一個未曾意料的反應，是對華國鋒主席的日後命運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作為四人幫橫行之時的公安部部長，他簽署了許多授權逮捕、監禁、甚至處決四人幫之政敵的批件，一些人說他應該為此承擔責任。在審判中，對話偶爾超出了預定的範圍，影射他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鎮壓天安門廣場事件中起的作用。鄧小平

派人士馬上利用這種形勢，指責他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搞「個人崇拜」，在現代化計劃中舉措失當，強調革命熱情而忽視踏實的經濟規劃。鄧小平派人士認為華國鋒的領導是毛澤東「錯誤」政策的延續，它將為心懷不滿的極左分子提供一個將來東山再起、反對現任領導層政策的基點。華國鋒受到了要他辭職的巨大壓力。

據報道，華國鋒在1980年11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辭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職務，辭職將在1981年6月的下一次中央全會上正式生效。在此之前，華國鋒雖然仍然是黨的主席，卻淪為一個掛名的人物。黨內實權落到了總書記胡耀邦手裏，而鄧小平則成為中央軍委的實際主席。雖然沒有人否認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但中國的報紙越來越多地宣稱，這樣一個輝煌成就不應該歸功於個人，而應該歸功於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人民大眾的意願。隨著華國鋒的淡出，毛澤東時代接近尾聲了。

對毛澤東的評價

在中國政治中，很少有甚麼事件像對毛澤東的評價那樣引起如此激烈的爭論。作為文革和四人幫犧牲品的實幹派領導人，以及大批年輕人，主張對毛澤東的功過作出公正、嚴格的評價。他們認為毛澤東的遺產不適合現代化的新使命，他未能使中國擺脫貧窮，這可以看作是他的路線不適當的證據。另一方面，有一大批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和幹部是由於毛澤東的革命而獲得了地位，尤其是那些「老一輩人」和在文革中發跡的人。這批人認為，這樣一種評價不啻是詆毀一個領導革命走向勝利、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在中國開創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後一種觀點得到其他許多人的同情，這些人從小就受以下這種不斷的思想灌輸的影響：毛主席把中國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深淵中拯救出來，給了人民新的生活。這些人不能輕易地放棄對偉大領袖的習慣性崇敬。

處在種種這些對立觀點的風口浪尖，共識是很難達成的；最接近共識的是鄧小平副主席的聲明：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中共採取了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區分開來的原

則。毛澤東思想被說成是中國革命實踐的總和：是參加這場革命的所有人作出的貢獻。因此它並不反映毛澤東個人的思維，而是所有中國人的遺產，故他們必須繼續珍惜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毛澤東作為一個領袖，既作出了許多貢獻，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公正地評價他的功過，必須做到實事求是，從過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中共的評價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終於作出了人們長久期待的黨對毛澤東的評價。在領導層的換屆上，全會接受了華國鋒的辭呈，任命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從而打破了以往由一個人身兼這兩個職務的傳統。另一個人事變動是任命總理趙紫陽擔任黨的副主席，與胡耀邦和鄧小平組成了「集體三人團」。華國鋒降為六個副主席中排名最後的一位，雖無實權但地位仍相當高。⁹

六中全會通過了三萬五千字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決議詳細評價了黨在過去六十年裏、特別是1949年以來的成就。但是，這份文件的一個重點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在其中的作用。黨的立場毫不含糊地嚴格：「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

中共聲稱，這場運動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不符合中國實際。確實，從歷史的回顧來看，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反對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文革中充斥著錯誤的指責：被打倒的「走資派」事實上是各級黨和政府的領導人，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力量；所謂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從來就不存在。對「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學者遭到了打擊和迫害。此外，文革以人民群眾的名義進行，但實際上卻既脫離黨也脫離群眾。文件一針見血地宣稱：「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和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他成了狂熱的個人崇拜的

⁹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1981年6月29日通過。 *Beijing Review*, No. 27:6-9 (July 6, 1981).

對象」。毛澤東的明顯錯誤使得對他作一個認真的評價完全有必要，因為「忽視錯誤或粉飾錯誤不僅是不允許的，而且其本身就是一個錯誤」。對毛澤東的結論是：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毛澤東同志……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混淆了是非和敵我……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這份黨的文件也評價了華國鋒；決議雖然對他在粉碎四人幫和某些經濟工作中的建設性作用給與了恰當的肯定，但也批評了他的左傾思想。華國鋒被稱為「凡是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因而使左傾錯誤得以持續。華國鋒參與了「批鄧」運動，在出任黨的主席後又阻止糾正錯案，包括阻撓為受害幹部和天安門廣場事件平反昭雪。他甚至搞「個人崇拜」。更壞的是，在1977年8月的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他阻止檢討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反而利用他的權勢肯定文革；後來，他也對推行冒進的經濟政策負有責任。文件宣稱：「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¹⁰

胡耀邦主席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1981年7月1日）的第一份重要講話中，對毛澤東作了簡明扼要的評價。胡耀邦宣稱，毛澤東最偉大的貢獻是他早先抵制二、三十年代的那種崇拜外國（蘇聯）經驗的「幼稚病」。他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套適合中國形勢的新策略。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人民偉大門爭勝利的紀錄」，它的創造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胡耀邦說，因此，它過去，現在，

¹⁰ 中文本《決議》刊登在1981年7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英文本可見於*Beijing Review*，同上註10-39。

以及將來都是我黨的指導原則。在稱讚了毛澤東之後，胡耀邦進行了正式的批評：

如同很多站在歷史潮流前面的偉大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和錯誤一樣，毛澤東同志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主要是在他的晚年，由於長時期受到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愛戴而過分地相信自己，越來越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特別是脫離黨的集體領導；往往拒絕甚至壓制別人的正確意見，這樣就不能不發生許多失誤，直到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和長時間的嚴重錯誤，給黨和人民帶來了很大的不幸。當然，應該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時間裏和在「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時候，黨沒有能夠阻止毛澤東同志逐漸發展起來的錯誤，而且接受和贊同了他的某些錯誤主張。我們一些長期跟隨毛澤東同志戰鬥的他的學生們，也深感自己對此負有責任，並且決心記取應有的教訓。

雖然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那就十分清楚，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毛澤東同志從青年時代起就獻身於中國革命，並為之奮鬥了一生。他是我們黨的創始人之一。他是光榮的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他在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確道路，制定了正確的總戰略，並且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正確的理論和策略，使革命轉敗為勝。建國以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新中國很快站住了腳，並且開創了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即使毛澤東同志在他一生的最後幾年，錯誤已經很嚴重的時候，他仍然警覺地注視著祖國的獨立和安全，準確地把握住世界形勢的新發展，領導黨和人民頂住了霸權主義的一切壓力，確定了我們對外關係的新格局。在長期鬥爭中，我們全黨同志從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那裏吸取智慧和力量。培育了我們黨的一代又一代的領導者和大批幹部，教育了全國各族人民。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戰略家，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

雄。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偉大功績是永垂不朽的。¹¹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通篇講話中一處都沒有稱呼毛主席，而只是稱他毛澤東同志。「文化大革命」也加上了引號，以表示他不承認它的合法性。

一個歷史學家的觀點 在客觀評價毛澤東時，實事求是的歷史學家們將首先承認他作為一個革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基人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開創者的偉大。但如果他們忽略毛澤東的各種政策錯誤及其後果，那他們將是不稱職的歷史學家。最大的錯誤是他對人口全然不加控制。包括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在內的一些專家¹²對人口爆炸的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後果作了警告，但毛澤東爭辯說人口問題只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蘇聯沒有作任何的人口控制，卻沒有遭受甚麼消極後果——中國為甚麼就不同了？毛澤東用人多力量大的天真信念來批駁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越多的工作意味著越多的產量和越快的經濟發展。結果是人口失控地增長，從五十年代的五億增長到今天的超過十億；而由於全國性的災害、工業用地的增加和窮人砍樹燒火，耕地面積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

為十億人提供衣食住行和職業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地球上沒有其他任何國家背這樣重的包袱。它耗費了大量本可用於經濟發展的國家資源。由於龐大的人口中有80%居住在農村，因此，提高農業生產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所在。但毛澤東卻仿效蘇聯大力投資重工業而輕視農業投入的模式，造成了農業產量的極端低下。毛澤東沒有注意到下列這條馬克思主義的格言：一個社會的基礎在於，農業勞動者的生產率超過勞動者個人的需求，從而生產出剩餘物資來支援國家的其他部門。在三十年裏，中國的農業部門處在被忽視和半自主的狀態，使得必須進口食品來滿足國內需求，因而消耗了大量本來就貧乏

¹¹ 胡耀邦講話的中文本刊登在1981年7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

¹² 其他人有陳達和吳景超。

的外匯儲備。在1978-1979年，農村人均年產值只有50美元——低得太可憐，根本產生不了有可能支援經濟增長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剩餘產值。除非農業形勢得到大大改善，出生率得到嚴格控制，否則，中國向現代化的進軍充其量是緩慢而又吃力的。回顧從前，毛澤東的人口和農業政策造成了對迅速現代化的最嚴重障礙。

第二個重大的政策失誤是加強中國的孤立局面。除了中蘇合作處在全盛期的五十年代之外，中國完全斷絕了與外界的聯繫達二十年之久。在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導下，中國的科學、技術、藝術、教育和其他文化方面損失了借鑑其他國家發展成果的好處。正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西方和日本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恰恰就在此時，中國卻在搞內訌和階級鬥爭。中國為這種孤立付出的代價是無法實際計算出來的。

第三個政策失誤是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左傾盲動主義」和「冒險主義」。在1980年12月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黨的副主席、經濟學家陳雲尖銳地宣稱：「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1957年以前一般情況比較好些，1958年以後『左』的錯誤就嚴重起來了。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這種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¹³ 這種「錯誤思維」的一個明顯觀點是喜歡立竿見影，完全不顧客觀的經濟現實，所以導致了「把空想當作真理，頑固地根據自我意識辦事，在今天做未來才有可能的事」。這種「左傾冒險主義」嚴重損害了經濟結構中的生產關係。而且，不斷革命的信條還導致了「盲動主義」，制定不切實際的經濟目標，這些目標靠超出國家支付能力的投資水平來支撐。由此而來的是上報虛假數據欺瞞領導的浮誇風，冒進主義和盲動主義這對交織在一起的雙胞怪胎，把中華民族推到了崩潰的邊緣。¹⁴

毛澤東的第四大錯誤是自認為在黨內佔據無可置疑的最高地位，破壞了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並開創了「一人統治」的模式。作為革命

¹³ 〈端正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人民日報》的特約評論員撰寫。刊登在1981年4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

¹⁴ 同上註。

領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自封為「家長」，搞「一言堂」。他的行為反映了「家天下」的封建主義觀念。這樣，官方文件開頭經常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詞句，表明了個人凌駕於黨之上，使黨的八大確立的集體領導形同虛設。特務頭子康生之流的奉承者投毛澤東所好，宣稱一部黨史如果提其他領導人的貢獻，將會貶低毛澤東，並製造一個對立的中央。這樣，黨史成了一部偉大領袖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接連不斷作鬥爭的編年史，一直到最後他一個一個地將所有人全部打倒。¹⁵ 像過去的皇帝一樣，毛澤東是個家長、導師、甚至是神，不會做錯事。他泰然自若地「指定」接班人，並護佑妻子上升到她不該佔據的高位上。阿克頓 (Acton) 的名言「權力導致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顯得完全正確！

毛澤東的政治作風，除了給他自己以絕對的控制外，還給各省和各地縣黨委書記們樹立了榜樣；他們在各自的轄區裏像小家長和更小的家長一樣行事。沒有他們的同意，甚麼事也做不了，這樣就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了一個高度官僚化的特權階級。¹⁶

黨怎麼能讓所有這一切發生的呢？中國人自己很難找出一個適當的答案，但他們最終提出了兩種解釋。第一種宣稱，在中國，像在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一樣，革命政黨的領導人在奪取政權期間，被賦予了巨大的決定權和行動自由。一當取得勝利，這種權力集中便有繼續下去的趨勢；而由於領袖人物顯然巨大的貢獻，他的追隨者們願意接受他的崇高地位。他的地位最終成為制度化，得到了終生的領袖地位，並且將其他人的勞動成果算在他自己名下。

流傳更廣的官方解釋則探討中國過去的封建時代對所有人思想和行為造成的深刻影響。官階和等級制度中高下之分以及家長作用的痕跡隨處可見。農民和小生產者不習慣於掌握自己的命運，相反，依賴於作為「救星」的皇帝之仁慈；作為回報，他們向他表示忠誠和感激。因此，由一個人掌握高度集中的權力有著強大的社會先例。即使是中

¹⁵ 同上註，1980年9月18日，第5版。

¹⁶ 《紅旗》雜誌評論員：〈必須改革領導制度〉，《紅旗》雜誌，1980年，第17期，第2-4頁。

國共產黨本身也反映了這種封建影響，造成了無人敢批評家長的情形出現。結果，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成了一句空話：在集體領導中，有一個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而在民主集中制中，集中壓倒了民主。¹⁷

這些解釋無疑都站得住腳，但它們忽略了一個關鍵的因素：毛澤東牢牢控制了軍隊、秘密警察、安全系統、8341部隊、情報網絡和調查機關，這就使與他對抗成為完全不可能的事。那些敢於批評他的人將冒身家性命之險。

總之，歷史學家同意，毛澤東作為一個革命家是極其成功的，但作為一個國家建設者卻令人失望地乖僻無常。他在1957年以前的巨大成就對其他人來說是個靈感源泉，但所有人都應從他以後的嚴重錯誤中吸取教訓。

新的領導層和新的秩序

隨著評價毛澤東的微妙問題最終得到解決及黨的錯誤得到承認，沈重的心理包袱被甩掉了。新的權力結構使胡耀邦、鄧小平和趙紫陽牢牢地控制了黨、軍隊和政府，鞏固了他們為中國的未來設計的藍圖。他們致力於一場現代化的革命。為了消除任何誤解，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向全國強調了以下六點思想：¹⁸

1. 我們全體黨員要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奮不顧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2. 我們要善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推向前進。〔胡耀邦重申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¹⁷ 同上註，第5-8頁。

¹⁸ 全文刊登在1981年7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

3. 我們要進一步健全黨的民主生活，嚴格黨的組織紀律……我們必須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凡屬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過黨委的集體討論，作出決定，不能個人說了算。黨委的決定，所有成員都必須遵守。各級黨委都要實行集體領導……講求質量，講求效率。〔為了加強黨內民主〕，任何黨員有權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內的任何個人甚至中央領導人，不受打擊。〔但任何黨員都不得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
4. 我們要善於經常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塵，在執政條件下永保革命青春。〔胡耀邦非常坦率地承認〕過去我們主要的錯誤是過火鬥爭，結果走向反面，導致人們既不願自我批評，也不敢開展批評。我們要把這種不健康的風氣糾正過來。
5. 我們要把更多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幹部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
6. 我們永遠要堅持國際主義，同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在同任何強國、富國的交往中，都一貫保持我們的民族自尊心，而決不允許有任何卑躬屈節的思想行為。我們決心同全國人民包括臺灣同胞一道，為臺灣真正回到祖國，徹底實現祖國統一的神聖大業而奮鬥。

顯然，毛澤東的政治工作作風和經濟發展方針將不被遵循：不再有甚麼個人崇拜，不再壓制黨內會議上的發言自由，不再對批評領導人施加懲罰。但是，全體幹部都將服從上級命令，開展經濟建設，不得陽奉陰違。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思想、對知識分子和涉外合同的輕視，以及對有限私有企業的反對也都遭到了排斥。

社會主義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場偉大的革命」。為了確保這場革命的成功，胡耀邦號召促進黨內團結和黨群團結，並積極開展經濟、文化、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國際交往，以建設一個「繁榮、富強、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將最終引導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胡耀邦的講話和六中全會的公報和決議，是務實派取得勝利的圓滿體現。根據團結、穩定、和解、務實、民主和切實發展經濟的精神，一個新秩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誕生了。隨著它的誕生，毛澤東時代走向了終結。

中國共產主義：三十五年回顧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歡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多麼洪亮的聲音，多麼吉祥的開端！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反抗已經被一掃而光，中國以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聞所未聞的方式統一了起來。對於具有藝術家氣質的毛澤東來說，中國是一張巨幅空白畫面；他那革命的浪漫主義、想像力、理想主義和平均主義，曾令中國五萬萬同胞充滿了遐想。毛澤東周身散發的才能光環與他對革命勝利所作的貢獻，似乎將保證中國達到國內安全、國際尊重並最終成為世界大國的目標。

顯然，這些目標至少部分地達到了。最大的成就有：中國（除臺灣外）統一在一個中央政府之下，它獲得了國際事務的主要參與者的地位，它消滅了地主制度，為工業化奠定了基礎，改善了公共衛生，有選擇地發展了科學技術（尤其是在原子能和火箭方面），提高了識字率，取得了重大的考古發現，這些發現將能夠對古代中國歷史作新的解釋。為十多億人提供衣食住行和就業是對一個巨大挑戰所作的回應，地球上還沒有其他任何國家遇到過這樣的挑戰。最後，統計數據表明，工農業生產總值和社會服務都有了相當大的增長。

然而，最近的中國領導人公開承認，雖然取得了某些進步，中國仍然處在一窮二白的狀態。國家的物質條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二十年裏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¹⁹ 由於其他國家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的巨大進步，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現在也許比1949年時更大了。是甚麼東西阻撓了中國在解放後的三十年裏取得更大的進步呢？

中國內部的主要障礙是政治不穩定和黨內外民主原則的被破壞。除了洋溢著革命性動力和建設新世界激情的七年（1949–1956年）外，中國最近的歷史一直受著動亂和鬥爭的困擾，以至國家幾乎被拖垮了。政治動盪導致了傑出才能的大量廢置、經濟發展的中斷、思想和藝術創造力的被摧殘。

¹⁹ 此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的觀點。參見他的文章“Observe Economic Laws, Speed Up the Four Modernization,” *Peking Review*, 47:18–19 (Nov. 24, 1978).

關於中國政治不穩定的淵源，人們普遍認為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政治發展中的分水嶺。這次大會與前一次大會一樣，強調黨內民主和自由討論問題。它確認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的集體領導，1956年到1957年初被認為是中共歷史上的「鼎盛期」。

在這個鼎盛期中，毛澤東發起了百花齊放運動，知識分子尖銳地批評黨的某些政策。毛澤東的反應是覺得中國共產主義本身好像受到了批評的威脅，他發動了反右運動，傷害了一百萬人。毛澤東推翻了八大的決定，宣稱「八大關於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決定是不正確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的鬥爭，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此以後，毛澤東就擴大了階級鬥爭的範圍，挑起了不斷的動盪。家長制概念排斥集體領導，佔據了上風，黨中央成了一言堂。當1959年國防部長彭德懷表達對大躍進的看法時，他被撤了職，並被斥責為「右傾機會主義者」。之後，沒人敢說真話了。黨的民主被拖垮了。²⁰

一當毛澤東的「無所不能」表現出來，機會主義者和陰謀家便聚集到他周圍，通過緊跟在他左右來博取權力。他們的權力鬥爭把整個國家推入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和文化大革命。康生、林彪和四人幫的得勢將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法西斯專政，其中還附帶著封建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特徵。²¹

政治不穩定和黨內民主的消失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生活。1979年7月1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評論說：

在過去三十年裏，每當黨內民主相對充分、民主集中制相對健康之時，黨在經濟工作中的領導就比較符合實際，問題出現時比較容易被發現並得到糾正，導致了社會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每當黨內缺乏民主時，就沒有人敢於說真話。盲目服從便

²⁰ 盧中堅：〈三十年的教訓〉，《爭鳴》雜誌，香港，第24期，第8、11頁（1979年10月1日）。

²¹ 同上註，第14頁。

盛行起來，黨的經濟政策往往就脫離實際，脫離客觀規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就出現放慢、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²²

中國方面的統計表明，經濟發展出現了三個增長期(1949-1957年、1963-1965年、1977-1988年)和兩個下降期(1958-1962年、1966-1976年)。在毛澤東的二十七年統治中，只有1952-1957年是真正增長的年份，而1949-1952年代表了從內戰恢復，1963-1965年則代表從大躍進恢復。下列數據概括了過去三十年裏的發展。

恢復和增長期

	1949-52年	1953-57年	1963-65年	1977年	1978-86年
工業	36%	19.2%	7.9%	14.1%	134.3%
農業	14%	4.5%	11.1%		67.2%
國民收入	不詳	不詳	14.5%		

下降期

	1958-62年	1967年	1968年	1974年	1976年
工業	+3.8%	-13.8%	-5%	+0.3%	+1.3%
農業	-4.3%		-2.5%		
國民收入	-3.9%				

數據來自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1979年第3期，第1-8頁；CIA, *China-Econom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1978* (Washington, D.C., 1988).

中國起伏不定的發展表明，擅長政治鬥爭的革命領袖不一定通曉經濟事務。毛澤東尤其不願注意經濟專家的建議，也不根據經濟規律和國家的實際情況辦事。五十年代，他接受蘇聯的發展模式，強調重工業而輕視農業和輕工業，而中國的實際狀態卻表明相反的方針更加合理些。當蘇聯模式被證明不合適時，他陡然轉搞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此後二十年裏便是眾所周知的「左傾冒險主義」經歷，導致了時

²² 《人民日報》，1979年7月1日(原書注日期有誤，故未查到原文，今從英文回譯。——譯者)。

間、精力、資金和才能的浪費。結果，中國的人均收入(300美元)，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位居最後一名，生產能力遠遠落後於香港和韓國。²³

然而，儘管有政治的不穩定和經濟發展的起伏，中國在工農業生產上還是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農業的平均年增長率為2%–3%，工業增長率為9%–10%。在1952年到1987年間，糧食產量從1.639億噸增長到4.02億噸；煤產量從6,640萬噸增長到9.2億噸；鋼鐵產量從135萬噸增長到5,622萬噸；原油產量從44萬噸增長到1.34億萬噸；電力從73億千瓦增長到4,960億千瓦。²⁴但是，生產增長的許多利益，都因人口從5.7億爆炸到10.8億而抵銷掉了。

從過去三十五年中吸取的教訓是很多的。首先，必須要有政治和社會穩定，使政府得以開展有秩序的改革和發展。第二，必須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爭取達到零點增長率。第三，必須在所有領域，包括科學、技術、教育和藝術領域，加強國際合作。第四，必須盡可能避免戰爭，因為戰爭是最浪費財政和人力資源的東西。第五，必須改革政治制度，以防止重新出現家長統治，並確保黨內外民主。對官僚主義、幹部任用終身制和特權，如果不能根除的話，至少應予遏制。第六，經濟發展既不能過「左」也不能過「右」，而應「居中」，要依據實際情況和經濟規律。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黨必須記取阿克頓的格言：權力導致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除非這些嚴重的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否則，黨在人民中的信譽將大打折扣。(參見第四十一章「中國共產主義四十五周年」一節)。

參考書目

《世紀大審判》(北京，1981年)。

「愛國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精神力量」，《人民日報》，1981年3月19日。

Bonavia, David, *Verdict in Peking: The Trial of the Gang of Four* (London, 1984).

²³ Lu Chung-chien, 6.

²⁴ Xue Muqiao (ed.), *Almanac of China's Economy, 1985/1986* (Hong Kong, 1986), 26; 國家統計局數據，北京，1988年2月23日，*Beijing Review*, March 7–13, 1988.

「權力不能過份集中於個人」，《紅旗》，1980年第17期，第5–8頁。撰稿人為該雜誌的一名特約評論員，此人肯定與鄧小平副主席很接近。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1981年6月29日通過，*Beijing Review*, No. 27:6–8 (July 6, 1981).

Hsiung, James C. (ed.), *Symposium: The Trial of the "Gang of Four" and Its Implication in China* (Baltimore, 1981).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81年7月2日。

黃克誠：「如何評價毛澤東主席和毛澤東思想」，*Beijing Review*, 17:15–23 (Apr. 27, 1981).

Johnson, Chalmers, "The Failure of Socialism in China," *Issues & Studies*, XV:7: 22–33 (July 1979).

Kallgren, Joyce K. (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irty Years: An Overview* (Berkeley, 1979).

李洪林：「科學和迷信」，《人民日報》，北京，1978年10月2日。

Li Hung-l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Capable of Correcting Its Mistakes," *Beijing Review*, No. 25:17–20 (June 22, 1981).

Li, Victor H., *Law without Lawyers: A Comparative Vie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oulder, 1978).

「領導制度必須改革」，《紅旗》，1980年第17期，第2–4頁。由該刊特約評論員撰稿。

Liu, Kwang-ching, "World View and Peasant Rebellion: Reflections on Post-Mao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2:295–326 (Feb. 1981).

盧中堅：「三十年的教訓」，《爭鳴》雜誌，香港，第24期，第5–15頁（1979年10月1日）。

魯賓：《〈毛選〉五卷應當重審重編》，《爭鳴》雜誌，香港，第24期，第16–17頁（1979年10月1日）。

Morath, Inge, and Arthur Miller, *Chinese Encounters* (New York, 1979).

Pye, Lucian W.,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1976).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通過，刊登在《人民日報》1981年7月1日上。

邵玉銘：〈試論中共政權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功過〉，《海外學人》，臺北，第99期，第6-20頁（1980年10月）。

〈端正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論經濟建設中的左傾錯誤〉，《人民日報》，北京，1981年4月9日。

Wilson, Dick (ed.),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Cambridge, Eng., 1977).

Witke, Roxan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1977).

Yahuda, Michael, "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80:793-805 (Dec. 1979).

〈要公開地、科學地評毛〉，《爭鳴》雜誌，香港，第24期，第4頁，社論（1979年10月1日）。

第三十七章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次會議標誌著鄧小平上升為最高領導人，並通過了一些加速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關鍵性決定。鄧小平成為新的社會主義改革的設計師，這場改革將使中國擺脫貧窮和發展停滯狀態。

鄧小平的構想

最初，鄧小平並沒有一個總計劃。他只有一種務實意識，為了能使改革取得成功，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有中國的特色，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在這一點上，他與毛澤東不無相似之處。毛澤東早就認識到，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要取得勝利，是必須把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歷史將把毛澤東的革命與鄧小平的建設，當作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兩個最重大的事件。這兩個事件都將得到適當的認同。

在三中全會閉幕後的第二年，鄧小平逐漸把發展中國的未來的計劃更清晰化了。1979年12月，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問：「閣下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是甚麼？」鄧小平立即回答，目標是使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從現在的2,500億美元增加到本世紀末的1萬億美元，人均產值達到1,000美元。後來，考慮到人口不可避免地從十億增長到十二億，他又明確了他的聲明，把2000年時的人均產值降低到800美元，而國民生產總值仍保持在1萬億的水平上。一旦達到這個目標，中國就將具備取得更大發展的堅實基礎。中國隨後就能在三十到五十年裏步

入較發達國家行列。2000年國民總產值1萬億美元的數字很快流行開來，成為全國人民的一個確定概念。¹

當然，要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全國上下的共同努力，需要加速經濟增長，需要吸收外國的資本、科學技術和管理技巧。為此必須採取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相結合的政策。由於80%的人生活在農村，搞活農村經濟、提高農村收入和農民的生活水平就成為首要的任務。在成功進行農村改革之後，將在城市地區開展工業改革。與此同時，將執行一項長期的開放政策以擴大對外貿易，發展旅遊業，吸引外國的資金、技術和管理技巧。鄧小平強調，開放政策對中國的進步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從明朝中葉到1840年鴉片戰爭期間的閉關自守政策和1958-1976年的不幸時期導致了長年的愚昧和落後。²

鄧小平向人民保證，他們擔心開放將意味著資本主義侵蝕社會主義的想法是毫無根據的。中國經濟的主流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將仍然保持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國家將繼續掌握生產手段和所有基本的經濟結構。外資的流入將不會損害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因為與外商的合資企業中至少50%的股份是中方的。開放政策肯定會有一些負面影響，但它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即使人均產值達到幾千美元，也不必害怕產生新的資本家階級。鄧小平反問說：「增加國家和人民的財富有甚麼錯？」³

鄧小平很現實地認識到，全國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因此沒有任何兩個地區之間能同步發展。他願意讓一些地區和人民先富裕起來，為其他的地區和人民樹立榜樣。離上海七十英里遠的蘇州市是一個能給人啟發的地方，因為它已經達到了人均產值800美元的富裕水平。那裏的生活質量可以預示2000年的中國將會是甚麼樣，對此感興趣的鄧小平在1983年視察了蘇州。他發現當地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也比其他地方的人寬敞（人均居住面積達二十平方

¹ Teng Hsiao-p'ing,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5), 35-40, 49-52, 58-59, 70-73.

² 同上註，61。

³ 同上註，62。

米)，且擁有電視，願意投資地方教育；犯罪率較低，當地人流露出一種幸福、自信的神情。他們生活方式的特點是熱愛本地，普遍不想遷居到北京、上海一類的大城市。⁴

鄧小平越來越相信，他的夢想能夠實現。1984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際，他自信地向全國宣佈，1979–1983年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7.9%，1984年的增長率為14.2%，這超過了到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達到1萬億美元的目標所需的7.2%年均增長率。如果繼續保持目前的增長率，中國就能夠達到預計的目標。世界銀行似乎也同意這一點。⁵ 鄧小平的務實策略是「一步走；邊走邊看，保持勢頭」。

農業改革

傳統上，農業是中國國家和經濟的基礎。因此，首先在農業上進行重大改革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在1957年到1978年間的二十年裏，農業一直處在糟糕的狀態下，糧食產量的年均增長率只有2.6%，棉花增長率為2.1%。⁶ 中國不得不進口大批糧食來保證它日益增加的人口有飯吃。農村經濟即使不是死氣沉沉，至少也是有氣無力的。二十年裏，農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甚麼改善，農民幾乎沒有勞動的熱情。

人人都知道，對振興農村經濟最嚴重的障礙是公社制度。由於它是毛澤東農村經濟結構中的支柱，因此只要毛澤東在世，就沒有人敢批評或削弱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體制。現在，人們認識到，只有根本

⁴ 同上註，53。

⁵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5). 世界銀行相信，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是可能的，如果中國 (1) 以其國民收入30%的比例有效投資建設其內部結構，(2) 在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上作適當的改善，(3) 將其人口控制在2000年不超過12億。

⁶ Nicholas R. Lardy, "Overview, Agriculture Reform and the Rural Economy,"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86), Vol. 1,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325, 331.

性的改革才能給僵化的農村經濟注入新的活力，才能重新點燃勞動熱情，釋放農民大眾的巨大潛力，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1978年12月黨的三中全會通過了一些果斷的決定，鼓勵採用更大的物質刺激，放鬆此前一直束縛農業部門生產增長的控制機制。在隨後的幾個月裏，地方和中央政府領導人之間的討論導致了採納所謂的「責任制」或「包產到戶」。在這個制度下，土地仍然是公有的，但每個農戶得到一塊田地用於耕種，並與公社的生產隊或經濟合作社簽訂一份合同。合同上寫明耕種莊稼的產量和上繳給生產隊或合作社以支付土地使用費用的產量指標。這筆支付還包括水利費、衛生費和福利費用等公共開支。每家農戶完全控制勞力資源，並可以留用或在自由市場上出售超出合同指標的產品。農戶對整個生產過程負完全的責任——從選擇種子和化肥、分配勞力、作息計劃、土壤準備直到最後收割的全過程。

責任制開始於1979年，1980–1981年間逐漸擴展到各省，1982–1983年間這個進程加速了。到1984年，約98%的農戶實行了責任制。最初分配給每一農戶的地期限為一個季度或一年。但後來，在1984年，責任期延長到十五年以鼓勵在責任田上作長期規劃和投資。確定更長的合同期限是基於一些生產上的考慮，如耕種強度、莊稼的選擇（特別是生長較慢的果樹）和土壤肥力的培養等。⁷更往後，土地合同被定為可以由耕種這塊土地的農戶繼承，以鼓勵更長期的投資。但是，如果最初的責任規定沒有完成的話，可以出現取消合同的情形。

政府也鼓勵農村勞動者進行莊稼、牲畜、家禽或其他各種副業的專業化生產。這與毛澤東對糧食生產的大力強調截然相對。「專業戶」逐漸出現了，他們並不耕種田地，而是完全從事非莊稼生產。在專業戶與普通農戶中間還有「重點戶」，他們耕種土地，但主要從事非穀物活動，如養魚和飼養動物等。到1984年10月，這兩類農戶約達到2,400萬戶，佔總農戶數的13%。⁸

⁷ Frederick W. Crook, "The Reform of Commune System and the Rise of the Township-Collective-Household System,"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 Vol. I, 362–362.

⁸ Crook, 370.

包乾責任制逐漸取代了公社的職能，最後公社全都滅迹了。今天，只剩下很少一些樣板公社，作為歷史性的里程碑，或作為展覽點供外國訪問者和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人參觀。1984年出現了更重大的調整，單個農戶如果得到當地生產單位的同意，可以將責任田轉讓給另一農戶。根據規定，當一家農戶遭遇疾病、死亡或其他一些麻煩使其無法耕種自家責任田時便允許轉讓責任田。1987年，第十三次黨代會進一步開放了農戶之間土地耕種權的出賣。理論上來說，一家農戶獲得兩、三戶或更多戶鄉鄰的責任田耕種權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一些批評者指出，這種可能性是資本主義擡頭的徵兆，但這種情形很少發生。無論如何，土地仍然是公有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似乎很少。

由於農業改革，農業產量和生產力都急劇提高了。1987年，稻麥產量比公社制度時期的產量增長了50%。更重要的是，農民現在每年平均在莊稼上只花60天時間，而在農業合作化時期，他們一年要在田裏勞動250天到300天。空餘的時間花到了旨在盈利的副業上。現金收入翻了兩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參與改革的農戶蓋起了新的磚房，購置了新的電視和家具，穿著起色彩更鮮豔的新衣服。在四川和其他許多省份，責任田部分佔全省總產值的將近六分之一。而儘管責任田的面積小於一英畝，卻生產出足夠供養每家農戶的食物。農民過起有產者一樣的生活，不少農戶年收入超過了一萬元（「萬元戶」）。⁹

由上可見，公社的解體並不是一下子實現的，而是經歷了五年的過程。現在，一種新型的「鄉一村一戶」農村結構出現了，它擔負起以前公社的一些職能，但有明顯的分工。鄉主要處理政府和行政事務，黨委做黨務工作，村則履行與每家農戶簽訂責任書之類的職責。頗為常見的是，從前公社的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變成了新的經濟合作組（村），而從前公社的若干部門則轉變成為「鄉鎮企業」，從事製造、加工、運輸、農貿和服務業。¹⁰

農村改革的結果完全是個奇蹟。糧食生產的年增長率從1957-

⁹ *Los Angeles Times*, Nov. 25, 1987.

¹⁰ Crook, 364-65, 368-69.

1978年間的2.1%提高到了1979–1984年間的4.9%。1984年獲得了創紀錄大豐收，產量達4.07億噸，而前一年則是3.05億噸。人均糧食產量也超過了1957年取得的302公斤高產，甚至還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峰。莊稼和牲畜總產量在1978年到1984年間增長了49%。¹¹

	主要農產品產量						
	(單位：百萬噸)						
	1952年	1957年	1965年	1978年	1980年	1984年	1987年
糧食	163.42	195.05	194.53	304.77	320.56	407.31	402.41
棉花	1.30	1.64	2.09	2.16	2.07	6.25	4.19
油料作物	4.19	4.19	3.62	5.21	7.69	11.91	15.25
甘蔗	7.11	10.39	13.39	21.11	22.80	39.51	46.85

資料來源：Xue Muqiao (ed.), *Almanac of China's Economy, 1985/86* (Hong Kong, 1986), p. 19；國家統計局數據，1988年2月23日，*Beijing Review*, March 7–13, 1988.

農業產出方面的巨大進展，使中國從一個糧食淨進口國變成穀物、大豆和原棉的出口國。1980–1984年間，中國在農產品上獲得了40億美元的外貿順差，這是三十五年來的最大收穫。¹² 農村人均收入從1978年的人民幣134元提高到1983年的310元和1987年的463元。成功的原因不僅有農民的勤勞和計劃周全，而且還有政府提高了對農產品的收購價（從1978年到1983年間提高了50%），以及牲、魚、林等副業帶來的收入。國家農業投資的減少顯著地成功，從1978–79年度到1981–82年度減少了50%。然而，人民銀行提供的貸款和農機、拖拉機和建房方面私人投資大大增加了，1982年總額達到了人民幣157億元，1983年達到了214億元，這些彌補了國家投資的減少。¹³

¹¹ Frederick M. Surls, "China's Agriculture in the Eighties,"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 Vol. I, 338.

¹² Lardy, 327.

¹³ 同上註，328–330。政府收購價在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提高了7.1%，1981年提高了5.9%，1982年提高了2.2%。參見Nai-Ruenn Chen and Jeffrey Lee, *China's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1981–85* (U.S. Dept. of Commerce, 1984), 6.

公社解散後，大家越來越忽視以前由公社保養的大型項目，如機械化灌溉體系和利用重型拖拉機平整土地等。社會服務、衛生保健和基礎教育也受到了影響。此外，國家背上了新的重負，因為它為農產品支付了較高的價格，但由於擔心通貨膨脹和公眾憤慨，又不能提高商品價格。國家穀物和食油的補貼從1974年的40億元增加到了1983年的200億元。¹⁴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農業問題。首先，艱苦奮鬥和物質刺激是有限度的；過了這個限度，就達到了飽和狀態，勤勞的程度或意志力的大小對產量的高低就沒有甚麼影響了。要提高生產力，就需要政府對農業加大投資，但政府的財政很緊，農業投資的預算額度實際上降低了，從1978年佔國家開支的13.3%下降到1983年的6.8%，1985年的5.6%。第二，集體化的衰落導致了灌溉系統年久失修，機械化減少，以及更多地使用劣質化肥。耕作單位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大減弱。第三，糧食的低價格導致了種田相對於其他生產活動的低收效。1985年，在相對富裕的江蘇省豐縣，一個農民一年掙650元，而一個經營飼養業的人一年收入有2,375元，工廠工人的年收入達4,199元，建築工人4,033元，運輸工人4,762元。平均來說，非農業工人比種田人多掙4.1倍。¹⁵沒甚麼奇怪，一些糧食生產者轉到其他行業以求貼補，或把農活變成純粹的副業活動。第四，由於國家徵用土地用於工業發展，農村建造新的住房，以及發展木材、牲畜和魚業佔用土地，農田不斷減少。僅1985年流失的農田就高達1,500萬畝(250萬英畝)。第五，一些長期存在的問題持續存在，如高文盲率，缺乏農業技術員(每四千農戶只有一人)，以及定期的洪、澇、火災等。

更加深刻的挑戰是正在出現的人口爆炸，它將消耗掉大部分(即使並不是全部)增加的工農業產品，從而抵銷掉改革的成效。為了使人口增長不至失控，政府推出了「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對遵守規定的夫婦給與物質獎勵(如保證職業、晉級、在住房和學校分配方面給與優惠等)，對不遵守規定的夫婦予以懲罰(降級、罰款、停發口糧等)。這

¹⁴ Lardy, 333.

¹⁵ 上海《經濟學周報》，1986年7月20日。關於食品問題的文章。

項政策在1982年大張旗鼓地付諸實施，並在城市地區取得了成功，但在農村地區成效就不那麼大。農民仍然想生男孩，以便日後家裏有幫手和傳宗接代的人。為了再有一次機會生男孩，他們經常虐殺女嬰。再往後，農村經濟的繁榮使許多農民藐視政府的禁令，情願交罰款而故意生第二胎或第三胎以求得子。在今天的中國，獨生家庭的孩子往往備受父母和祖父母的嬌慣，以致變得像「小皇帝」。這些孩子通常是家庭疼愛、關心和各種活動的中心，這些孩子越來越被寵得沾染上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格格不入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追蹤這新一代共產主義孩童發展和成熟的情形將是饒有趣味的。

雖然有各種各樣問題，1986年的糧食產量還是達到了3.9億噸，比1985年增加了一千萬噸；1986年的農村人均收入達到425元人民幣，比前一年增長了7%。1987年，糧食產量繼續上升到4.0241億噸，增長了2.8%。¹⁶

總之，五年的農業改革釋放了農業部門隱藏的巨大的潛能，這鼓勵了政府著手在城市地區開展工業改革。在這裏，問題將複雜得多。

工業改革

1952–1983年間，中國的工業增長相當可觀，平均年增長率為9.8%。¹⁷但是，許多西方經濟學家所稱的「不合理做法」遏制了效率、生產力和工作動力。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初建立的工業結構是模仿蘇聯的制度，最大的特徵是中央計劃和強調發展重工業。國家作為所有人、經營者和僱主，計劃並指導所有的公有企業並為之提供資金。國家也提供土地、廠房、設備、基本材料、啟動資金、管理人員和整個生產過程所需的其他一切。它也確定產品的價格而不管產品的成本和

¹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87年社會經濟發展統計》，1988年2月23日公佈。刊登在*Beijing Review*, March 7–13, 1988.

¹⁷ Robert Michael Field, "China,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dustry," in *China's Economic Toward the Year 2000*, Selected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86), Vol. I,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505. (下作*China's Economy*).

質量。完全不承認「價值規律」或供需原則。國營企業被要求向中央政府上繳它們全部的利潤和折舊資金。

在這樣的制度下，企業不管它們的業績如何都得到國家的支援，職工不管他們工作的質量如何也都得到他們的基本工資。有這樣的說法，「每個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每個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這種體制在最初能夠奏效是由於有革命的動力、愛國主義和人們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奉獻精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或職工的業績如何顯然無所謂了。無論情況怎樣，報酬都是一樣的：工廠將得到同樣的撥款，工人則得到同樣的低工資。所謂社會主義保證充分就業的吹噓，事實上保證了終身職業安全，開除懶惰散漫的工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名廠長如想開除一名工人，將使這名廠長很不光彩，不僅是因為開除工人，還因為人們會說他的領導冷酷無情。同樣，處罰經營不力或負債累累的國營企業的事也是罕見或聞所未聞的。1979-80年度，大約25%到30%的國營企業虧損經營。¹⁸ 價格結構更加「不合理」。國家制定所有商品的價格，不管生產成本和質量。時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種產品的生產成本比它的銷售價格還高，一種低質量產品的價格比高質量的同類產品的價格更高。這套體制雖然不合理，中國卻習慣地運行了三十年。對它的任何部分進行改革，都將打破計劃、管理、生產、銷售和價格一系列龐大連鎖網絡中的平衡。這個過程牽涉了幾百萬幹部，對這個過程的任何階段作改革，都將影響他們的生活。令人擔心的最壞情況是價格失去控制，而引發可怕的通貨膨脹。中央政府想避免任何會引起公眾憤慨和不安的行動，所以採取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試探每一步的反應，評估它的後果，然後，要麼繼續下去，要麼退回來。

第一階段 1978-1984年間工業改革的精神是重新點燃工作熱情，充分發揮工人的潛力，「活躍」工業結構，提高生活水平。所採用

¹⁸ Nai-Ruenn Chen and Jeffrey Lee, *China's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1981-85*,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Washington, D.C., 1984), 13. (下作Chen and Lee).

的方式無非是物質刺激——這是毛澤東統治的革命年代中最受鄙視的價值觀。

1978–1979年間是開始時期。四川和其他一些定點地區搞起了利潤提留計劃的實驗。當實驗取得成功後，它們被推廣到了全國。這項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一種工業責任制，在其中，國營企業與其主管部門簽訂一份「盈虧包乾書」，同意將一定額度的利潤上繳國家，但提留在這個額度以上的「基本利潤」份額。到1980年，大約6,600家國營企業採用這種制度。提留的利潤可用於發放獎金、職工福利和作進一步的工業革新。¹⁹ 公開申令多勞多得、工作性質的不同（熟練與不熟練、腦力與體力）決定報酬的不同。工作熱情一夜之間恢復了。

在1981–1982年間，對利潤提留制度作了進一步的完善，允許企業提留超出指標以上的更大額度的利潤，也允許部分提留降低損虧帶來的預算積餘。提留額度在高利潤行業平均為10%，低利潤行業為30%，其他所有行業為20%。到1982年末，所有工業企業都實行了責任制。按照制度規定，它們要對自己的各種經濟決定及由此帶來的盈虧負責。廠長可以聘用和辭退職工，決定它們的工資和獎金，在國家允許的範圍內制定價格。但廠長本人也不再是終身任職。他們從1985年1月1日起上任，任期四年，可以連任三次。²⁰

責任制的一個直接的效應是國家從企業收取的資金大大減少，企業和地方保留的資金則相應增加，這些資金被用於投入不受中央控制或協調的基本建設，到1982年底，地方基建資金投入達到了420億元人民幣。²¹ 國家遭受了財政赤字和失去對地方投資控制的雙重打擊。一窩蜂的建設導致了建築材料的短缺和價格猛漲。

1983年6月1日，政府推出了「以稅代利」政策。大中型企業要求將其55%的利潤交作稅收，小企業則按照分成八個等級的稅則表納稅，

¹⁹ Barry Naughton, "Finance and Planning Reforms in Industry," *China's Economy*, I, 608.

²⁰ Christine Wong, "The Second Phase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1985, 261, 278.

²¹ Chen and Lee, 13.

這樣就切斷了國營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直接聯繫。²² 此外，將逐步徵收三種不同的稅收，它們在總利潤中所佔的相對份額如下：生產稅，利潤的40%；(2) 所得稅，33%，(3) 調節稅，即對沿海較發達地區徵收的附加稅，12%。現在國營企業提留的利潤總額達到約15%。此外地方一級還徵收其他兩類稅：對使用土地、道路、建房和城市設施徵收的資本使用費和城市建設費。²³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徵收所得稅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在以前，工廠作為公共財產，不需要付土地租金，運轉資金所付的利息很少或完全不用付利息，國家提供的固定資產投資不需分期償還或只需稍許償還。即使許多國營企業經營不力或虧損經營，它們仍保持較高的利潤。現在，工業利潤成了徵稅的對象，而所得稅則暫時起了調整價格扭曲現象的作用——一種價格改革的替代品。²⁴

這些新的措施確實帶來了工業部門的改善，體現為更高的生活水平、新的商業紅利和大興土木的景象；但卻沒有甚麼證據能證實企業的效益有多大改善。中國工業的業績並不像最初預期的那樣變得效率更高。²⁵ 事實上，在1982年，約30%的企業仍然是赤字經營，虧損達4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國家預算收入的4%。在1983-1985年間，約42,000家工業企業被合併或兼併了。²⁶

經濟改革的最顯著結果，也許是在城市和農村地區私營企業和自由市場的層出不窮。私營企業從1978年的10萬家增加到1983年的580萬家、1985年的1,700萬家，它們中的一些用資本主義的方式獲取了相當可觀的利潤。²⁷ 被看作是第三產業的服務業也邁開了大步。它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份額從1980年的18.7%增長到1985年的

²² Field, 532.

²³ Naughton, 612.

²⁴ 同上註，611。

²⁵ 同上註，608-9。

²⁶ Chen and Lee, 14.

²⁷ Sung Ting-ming, "Review of Eight Years of Reform," *Beijing Review*, Dec. 22, 1986, 15.

21.3%。以1985年為例，它給了7,368萬人就業機會。²⁸ 農村自由市場的數目在1985年達到了4萬個，城市自由市場總數約有3,000個。城鄉自由市場加在一起，在1978年佔據了零售總額的6.6%，1979年佔9.5%，1980年佔10.2%，1981年佔11.4%。這些自由市場和私營企業構成了國有企業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頗具活力的孤島。²⁹

城市經濟改革所涉及的最敏感問題，是引進了一套符合現實的價格體系，它將最終排除政府對消費品提供補貼的需要。政府小心翼翼地放鬆了對一些指定商品的價格控制，試圖盡可能地減小這個措施對市場造成的影響。從1979年到1982年間，煤、鐵砂、香煙和酒類的價格提高了，而機械和服裝的價格則下跌了。1983年，價格調整涉及了10萬種商品，總價值達400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化工產品的價格提高20-50%，鐵路運輸價格提高20%，耐用的輕工消費品如電風扇和彩色電視機等的價格提高了8-17%。民眾抱怨漲價，它超出了工資增長和生活費用調整的步伐。官方公佈的通貨膨脹率1979年是4%，1980年是6%，1981年是2.4%，1982年是1.9%，³⁰ 而非官方的估計則認為每年都在15%-20%，甚至更高。1984年10月，當中共宣佈將加速進行城市改革計劃時，人們為對付漲價，紛紛湧向銀行提取存款去購買懷疑是緊絀的商品。中國人經歷過1945-1949年間價格飛漲引起的苦難，他們對那種情形再現的任何徵兆都怕得要命。

1979-1984年的城市改革並沒有指望建立一種自由的市場體系。它們僅僅是一些七拼八湊的方案，旨在用一些現實的經濟想法和市場機制來修補效率低下的舊體制，以圖讓原本僵化的軀體能有點生氣。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拋開以「指令性計劃」為特徵的官僚支配式經濟，轉而採取「指導性計劃」的姿態。到1984年，工業生產中只有30-40%可以被歸為中央計劃的生產，20%是市場經濟，40-50%屬於地方計劃或指導性計劃的生產。

²⁸ Jung-hsia Li, "Tertiary Industry Takes Off in China," *Beijing Review*, Feb. 9, 1987, 18-19.

²⁹ Chen and Lee, 15.

³⁰ 同上註，8。

第二階段 農業改革的成功和工業部門取得的進展使中共得到了鼓勵。1984年10月20日，中共通過了一項新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加速城市改革的步伐。這是一份奇怪的、有意思的文件，因為它不是一份改革的藍圖，而是一項有關樂觀意圖和給4,400萬黨員指導原則的聲明。這份文件是緊接著一連串好消息之後推出的，因此洋溢著對未來成功的自信。這些好消息有：創紀錄的糧食產量（4.07億噸），前所未有的外匯儲備（200億美元），中國運動員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出乎意料的良好表現（32塊金、銀、銅牌）。此外，工農業總產值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突破了一萬億元人民幣的心理界限。³¹

還有一個有利的發展加強了中國新的自信心。這就是與英國進行的關於香港回歸的成功談判。中英兩國已經就中國在十九世紀經不平等條約割讓或租借給英國的三塊領土之前途，進行了兩年多的討論。這三塊領土是：(1) 根據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的香港島；(2) 根據1860年《北京條約》割讓的九龍半島南端部分和石匠島；(3) 1898年租借給英國的新界和235個附近島嶼，它們構成了香港陸地面積的92%；這些租借地的租期為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滿。

鑒於租借地的租期即將到期，中英兩國都期待談妥一項友善的協定。英國方面希望在1997年以後保留某種行政權力，以確保香港的繼續穩定和繁榮。相反，中國方面則堅持完全恢復對所有三塊領土的主權。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之後便按照中國方面的願望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1984年9月26日，中英達成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協議。根據協議，香港在1997年6月30日以後將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將在其司法、教育、和(更重要的)經濟和財政制度方面保持高度自治，包括其自由的企業體制。³² 中國保證將在1997年以後的五十年裏不干預香港的社會經濟制度，從而實際上達成

³¹ 趙紫陽：「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1985年3月27日在第六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³² 關於這項協議的詳細內容，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1984年9月26日。需要提一下，葡萄牙也在1986年10月與中國達成了1999年12月20日歸還澳門的協議。

了一種「一國兩制」的協定，鄧小平也希望有朝一日將「一國兩制」運用到臺灣。

1984年10月這項協議的草簽和同年12月戴卓爾首相與趙紫陽總理正式簽訂該協議，標誌著中國取得了一個劃時代性質的勝利。它標誌著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痕迹的結束。英國首相為了這項協議兩次前來中國，而且，英國女王在歷史上第一次預定將訪問中國，這些使這個勝利顯得更令人滿意。

正是在這樣一種異常愉悅的氣氛中，第二階段的城市改革發起了。現存的經濟究竟有甚麼問題？趙紫陽總理宣稱，經濟的僵化是因為沒有把政府和經濟企業當作獨立的實體分開，政府對企業的控制太嚴。對商業活動、價值規律與市場因素之間的正當關係的忽視引起了一系列失衡，這些失衡必須予以調整。在分配方面，太強調「平均主義」，導致了每個人都吃國家的「大鍋飯」，沒有人想努力工作。企業和工人喪失了主動性和創造性，陷入了普遍的癱瘓狀態。這種不適應狀態的最惡劣之處是從1957年開始盛行的「左傾」思潮，把任何發展商品經濟的努力都斥責為復辟資本主義。趙紫陽承認，需要大膽解放思想，糾正這種僵化的思維：「社會主義的根本職能是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增加社會財富，滿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質和文化需求。社會主義要結束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³³

趙紫陽給經濟輸入活力的方法是放鬆國家對大中型企業的控制。公有制不一定等於國家的直接控制：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兩個不同的功能。趙紫陽感到，在國家支配的框架內，企業應該賦予足夠的自主權，在供應、銷售、資本利用、聘用和解雇、薪水、工資、獎金，以及製成品價格等方面自己作決定。企業應具有法人地位，自負盈虧。

我們必須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

³³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香港，1984年），第4-6、17頁。

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不在於商品經濟是否存在和價值規律是否發揮作用，而在於所有制不同，在於剝削階級是否存在；在於勞動人民是否當家作主。³⁴

趙紫陽認為，逐步放鬆價格控制是城市經濟改革的核心，因為它將使國家能夠取消補貼，並讓價格根據價值規律和市場供需因素浮動。但漲價必須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人民的薪水和工資應該根據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經濟企業的利潤應該來自於更好的管理，而不是靠自己決定漲價來實現，那樣只會扭曲市場形勢。為了肅清「平均主義」的惡劣影響，趙紫陽重申按勞取酬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被大大歪曲了的平均取酬做法，是提高社會生產力的主要障礙。

趙紫陽宣佈，把「共同富裕」與「所有人以同樣速度獲取平等財富」等同起來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將導致共同貧窮。某些地區、某些企業和某些人應該允許先富起來，以便給其他地區、企業和個人帶來鼓舞作用。但中國將不允許一小部分人通過剝削而把大部分人推向貧困。³⁵

最後，趙紫陽贊成繼續發展私有企業以補充公有制，並贊成將中小型國營企業租賃或承包給私人經營，以豐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這種發展將不會損害社會主義的基礎，而應被看作是發展社會主義所必須的步驟。

就在這項決定被通過的同時，經濟繼續向前邁進。1978年到1986年間，工農業生產總值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國民收入以每年8.7%的速度增長。給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國家預算外基礎建設的急劇增長，從1978年在投資總額中所佔的16.7%增長到1984年的57%。到處都可以見到大興土木的景象。資本投入的增長率在1982年為25%，1984年為23.8%，1985年為42.8%。投資水平達到了1958-1960年大躍進以來的最高峰。

³⁴ 同上註，第9-10頁。

³⁵ 同上註，第17-18頁。

然而，這樣的發展速度顯然不能持續，它引起了建築材料的短缺、浪費、混亂和價格飛漲。由於有如此高額の資本投入，工業增長自然很快，1984年增長率為14%，1985年為18%；但1986年費盡力氣才保住了9.2%的增長率。1987年，增長率再次上升到16.5%，工業總產值幾乎達到了14,000億元人民幣。³⁶

過熱的經濟對國家的長遠利益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以下是最明顯的影響：

1. 1978–1985年間國家預算赤字高達一千億元人民幣，主要是由於過分的投資和大量的補貼。
2. 1985年和1986年的貿易逆差達280億美元。
3. 通貨膨脹率高居不下，1985年為12.5%，1986年為7%，1987年為8%，而非官方數字則估計每年為15–20%。
4. 經濟犯罪和腐敗橫行，尤其是發生在高級幹部的子女和親戚中間，他們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搞徇私舞弊和其他違規交易。
5. 1986年耐用消費品發展太快，如洗衣機(900萬台)、電風扇(3,300萬台)、電冰箱(285萬台)等。
6. 基本能源供應增長緩慢(1986年增長率為2.9%)，無法支持迅速增長的工業發展(9.2%)需求，引起了能源緊張，迫使許多工廠一週只開工四天。
7. 鄉村工業發展迅速，1985年達到82萬家，總產值達1,375億元人民幣，佔工業總產值的15.7%。但農村工業產品的質量往往很低。
8. 由於工業用地的增加、新建住房和每年1,400萬人口的增長，耕地面積以每年2,000萬畝或329萬英畝的規模流失。³⁷

³⁶ Chu-yüan Cheng, "China's Economy at the Crossroads," *Current History*, Sept. 1987, 272; 國家統計局，北京，1988年2月23日。 *Beijing Review*, March 7–13, 1988.

³⁷ Chu-yüan Cheng, 272–73.

主要工業的產量

	1952年	1957年	1965年	1978年	1981年	1984年	1987年
煤(億噸)	0.66	1.31	2.36	6.18	6.22	7.89	9.20
原油 (百萬噸)	0.14	1.46	11.31	104.05	101.22	114.61	134.00
天然氣 (億立方米)	0.08	0.7	11.00	137.30	127.40	124.30	140.15
電力 (十億千瓦)	7.3	19.3	67.6	256.6	309.3	377.0	496.0
鋼材製成 品(百萬噸)	1.06	4.15	8.81	22.08	26.70	33.72	43.91
鋼(百萬噸)	1.35	5.35	12.23	31.78	35.60	43.47	56.02
生鐵 (百萬噸)	1.93	5.94	10.77	34.79	34.17	40.01	54.33

資料來源：《年鑒》，第26頁；國家統計局，1988年2月23日，*Beijing Review*, March 7-13, 1988;《每月統計簡報》，中國，1988年3月。

面對迅速工業化的嚴重問題，保守派領導人在經濟改革的方向、速度和規模等問題上與實幹派發生了衝突，他們批評對外開放政策是中國人生活中外來「精神污染」的根源。這場衝突導致了1986年1月的緊縮政策，它強調四個重要概念：(1)鞏固已經取得的成果，充實改革基礎，(2)消化由必需的價格改革和工資調整引起的變化，根據各個單位的財政和實際能力處理改革的問題，(3)補充和修正改革中的不完善和不健康的環節以加強協調，(4)完善微觀經濟控制，達到供需之間的更好平衡。

但是，緊縮政策無法阻止經濟發展的慣性。1987年，農業產值比上年的4,447億元人民幣又增長了4.7%，工業產值比上年的13,780億元人民幣增長了16.5%——都創了歷史紀錄。但發展是不平均的，能源和交通繼續滯後，煤產量只增長了2.9%，原油增長2.6%。能源的瓶頸將制約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並阻止其平衡發展。繼續增長的總趨勢還保持著，雖然有些雜亂無章。

對外開放政策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十年(1949–1959年)中，中國只與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保持外交和貿易關係。中國與美國之間沒有任何商務往來。1960年中蘇分裂以後，中國完全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同時面臨著美蘇兩個潛在敵人。直到1972年尼克遜總統訪華以後，才開始有一些有限的貿易關係。1972年，中美貿易額只有9,200萬美元，但1978年猛增至11.89億美元，1981年達到54.78億美元，1986年增至80億美元，1988年135億美元，接近於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0%。³⁸

1978年以後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是由於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採取的對外開放新政策。它與毛澤東的閉關自守政策背道而馳，閉關政策在1958–1978年間執行了二十年。鄧小平和他的實幹派追隨者認識到，中國不能在孤立中發展，它必須引進國外的科學、技術、資本和管理技術以成功地實現現代化。

日本、香港、美國和西德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1983年，日本的對華貿易份額達97.64億美元，香港達83.41億美元；美國44.25億美元；西德17.43億美元。中國進出口貨物的種類也大大變化了。最初，中國方面始終大量進口原材料，如農產品(主要是穀物)、合成纖維、木材、化學品。但後來，當中國的農業生產能夠自給自足時，進口的重點轉向了工業機械、製成品、技術、辦公室設備、商用飛機和服務設施。

由於地理的接近和某種程度上文化的相通，日本與中國具有一種特殊的關係。這使日本人能夠比其他外商更深刻地理解中國人的心理和中國的直接需要。日本在世界市場上的技術和財政成就，使它能夠提供讓利性的貸款、信貸和一般特惠制下的特惠關稅。香港也在中國對世界貿易開放的過程中佔有特殊的位置，充當了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聯接點。美國和西德不具備這些優勢，但中國人傳統上對美國和德國製造的飛機、機械和科技產品非常崇拜。

³⁸ 美國的統計數據與中國的統計數據不一致，因為美國採用「產地國」方法作計算，而中國採用海關數據，它經常包括了保險費和運費。1987年中國統計的中美貿易額將近85億美元，而美國的數據為105億美元。

外貿計劃的主要目標是積累足夠的外匯以增加現代化所需的資金。為了增強產品的競爭力，中國人使產品多樣化，提高質量水平，讓人民幣貶值，並急切地學習國際商務實踐。在購買時，他們嚴格依據三項標準：好價格、好質量和優惠的付款方式。他們想獲取最先進的技術，但他們也接受一些價格便宜的、不太尖端的工廠，如在1982年經濟衰退時期在美國購買了一家老式的鋼鐵廠、一條半自動生產線和一家紡織廠。³⁹

通過嚴格控制外匯、擴大出口和限制進口，中國穩步地積累起了一筆外匯儲備。當中國遇到西方針對它紡織品的保護主義時，它在中東、拉美、東歐和蘇聯打開了新的市場，雖然在這些地區的貿易額仍然有限。1981年初，中國突破了從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的界線。到1983年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了前所未有的20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十位，排在擁有182億美元的英國之前。一部分外匯收入用於建設長期忽視的能源、交通、通訊和輕工業領域的國內基礎項目。⁴⁰

中國外貿體制的一個持續的困難是它的國內價格體系不合理。中國的國內價格與世界價格脫軌。雖然出口原材料和進口製成品對中國來說是可以盈利的，但按照2.8元人民幣比1美元的官方兌換率，進口原材料、出口製成品就相當虧本了。1981年前，中國的出口普遍虧本而進口賺錢——這是人民幣定價過高的確鑿訊號，它迫使政府需要對出口進行補貼。為了抵銷這些價格扭曲，中國在1984年把貨幣貶值為3.7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但這又造成了對許多進口提高補貼，再一次產生了虧損。⁴¹

外貿盈利的一個不期而然的來源，是通過北朝鮮和埃及向中東國家出售軍火，這項出口從1980年的幾乎零增長到1983年的15億美元，1987年的50億美元。這些武器中最著名的有賣給伊朗的蠶式短程導彈，賣給沙烏地阿拉伯的CSS-2中程導彈(2,000英里)。另外還向伊拉

³⁹ Helen Louise Noyes,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China's Economy*, II, 343.

⁴⁰ John L. Davie,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 II, 311-12, 323.

⁴¹ 同上註，319。

克、約旦、埃及、敘利亞和以色列出售武器。⁴² 旅遊提供了另一個收入來源，在1987年達到18.4億美元，比1986年增長了20.3%。⁴³

除了1981–1983年間的緊縮政策期間資本貨物進口下降以外，中國的對外貿易每年都在增長，進口年增長率達20%，出口年增長率達10–15%。⁴⁴

為了吸引外國資本和投資，中國採取了一些改善投資環境的措施。以下是一些比較顯著的步驟：

1. 1979年在深圳、珠海(靠近廣州的珠江三角洲對岸)、汕頭(廣東省北部沿海)和廈門(福建南部沿海)開放了四個「經濟特區」(享受優惠待遇)。這些特區與臺灣的「出口加工區」不同，而是一些改造中國經濟的「實驗室」。⁴⁵
2. 1984年將沿海十四個地方和海南島向外國投資開放，在稅收和進口關稅方面給與優惠條件。
3. 在國際會議上為一些需要外國諮詢、資本、設備、管理和市場的項目做廣告。
4. 允許地方當局可不經中央政府同意即洽談外國投資事宜，這導致了外國供應的進口驟增——鋼鐵、有色金屬、木材和塑膠等，外匯儲備大量外流。
5. 通過了有關稅收、債務、專利保護和外國商標等事務的法律和規章。
6. 釐定了仲裁程序、勞動力補償、外國利潤返還等事項。⁴⁶

中國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的成功是很有限的。到1983年底，只有188家「股份制」和1,047家「合同制」中外合資企業，契約資金66億美

⁴² *Los Angeles Times*, May 4, 1988.

⁴³ 國家統計局，北京，1988年2月23日。

⁴⁴ Davie, 318.

⁴⁵ Victor C. Falkenheim,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hina's Economy*, II, 348–50; Y. C. Jao and C. K. Leung (eds.),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olic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Hong Kong, 1986).

⁴⁶ Noyes, 340.

元，但實際投入僅23億美元。最大的三家中美合資企業是長城飯店(1,100萬美元)、建國飯店(1,100萬美元)和美國通用北京吉普公司(1,600萬美元)。大西洋瑞奇菲爾德公司在海南島附近參與了油田的勘探和開採，耗資2.5億到3億美元。⁴⁷

外國人發現中國的環境不太有利於投資。繼續不斷的談判和官僚式的拖遝耗盡了人的耐性，商務和居住條件也達不到標準。許多外國公司不得不將辦公室設到旅館，向中國的服務業支付高額的租金和費用。當然，他們的中方雇員只得到國外工資的一個零頭，利潤的大部分都落入了政府的商務部門。許多外國公司因生意受挫和看不到賺錢的希望而撤離中國。

中日貿易 作為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日本是現代化工廠設備以及財政和技術援助的最大提供者。此外，日本為中國的石油和其他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提供了市場。兩國的需求互補。中國方面採取這樣的策略：日本能賣給中國的貨物必須與它能從中國買的貨物相協調。這樣，中國成功地保持了較小的貿易逆差。日本幫助中國發展出口，以賺取購買日本貨物所需的外匯，也向中國提供讓利性低息貸款。1983年，中日貿易達到了100億美元，其中49億是日本的對華出口，51億是中國的對日出口。這種雙邊貿易佔中國外貿總額的22%，佔日本外貿總額的3%。⁴⁸ 1983年，中國最大宗的出口是原油(佔出口總額的40.9%)——佔日本石油進口總額的5.2%——和煤，佔日本煤進口總額的4.4%。中國其他的出口包括輕工製品、農產品、肉、魚、貝類生物、古董、藝術品和煙花。

日本向中國的出口主要是金屬和金屬製品(鐵和鋼)，它們在1983年佔日本出口總額的49.6%；重型機械和機械儀器，佔28.5%；化學製品，佔11%；紡織品，佔5.8%。

日本在中國取得成功的原因有：(1) 地理位置的接近，降低了運

⁴⁷ Davie, 324–25; Noyes, 341.

⁴⁸ Dick K. Nanto and Hong Nack Kim, "Sino-Japanese Economic Relations," *China's Economy*, II, 454, 466.

輸費用——東京到上海比到舊金山近五千英里；(2) 文化的相似，使日本人能夠獲得對中國人的心理和口味的較深理解，使自己的產品更適合於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並依靠豐厚的推銷禮物和免費赴日本旅遊來有效地游說中國的官員；(3) 日本的商人提供有競爭力的價格和銷售培訓，而日本政府則在最惠國待遇之外，根據提供一般特惠制提供優惠的關稅率；(4) 東京提供讓利性的日元貸款和信貸，利息很低，很有吸引力。1979–1983年間對華貸款為3,000億日元(15億美元)，利息3.5%；1984年的貸款額為4,700億日元(21億美元)，利息3.5%。這些貸款為中國的鐵路、港口、電話設備和水電站等重點發展項目提供了資金；(5) 在1978年到1982年間，日元對美元和人民幣的比價下跌了，這使日本產品在價格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1982年以後，日元對美元和人民幣的比價上升，但有吸引力的讓利財政協定仍然給了日本產品很大的好處；(6) 幫助中國開發資源以獲取購買日貨所需外匯的基本政策。⁴⁹

但是，儘管有這些優勢，日本並沒能取得絕對的成功。中國人經常抱怨日本產品「質量較次」甚至很差，與最初的訂單不相符合，也不滿日本人刻薄的做生意手段：只是「示範」商品，不傳真正的「技術」。

中美貿易 美國人沒有日本人那樣的優勢，但他們在中國人中間擁有巨大的好感。中國人喜歡美國製造的飛機、電腦、電子產品、電訊設備和石油鑽探工具，這些產品以質量優異和經久耐用而享譽全球。美國進口大量的中國紡織品、服裝、石油產品、各類手工工具、家用器具、藥劑、家具、古董和藝術品。1981年，中美貿易躍居55億美元的頂峰，佔中國外貿總額的14%及美國外貿總額的3%。在1972年到1983年之間，中國對美貿易始終保持著逆差，累計赤字77億美元。⁵⁰

隨著中國推進現代化進程，需要最新的工藝水平，也需要化肥、

⁴⁹ 同上註，465–66。

⁵⁰ Noyes, 335–37.

1979-92年的中日貿易

(單位：百萬美元)

	中國的出口	中國的進口	中國的貿易平衡
1979年	2,954	3,698	-744
1980年	4,323	5,078	-755
1981年	5,291	5,097	+194
1982年	5,352	3,510	+1,842
1983年	5,087	4,912	+175
1984年	5,155	8,057	-2,902
1985年	6,091	15,178	-9,087
1986年	5,079	12,461	-7,384
1987年	6,392	10,087	-3,695
1988年	8,046	11,062	-3,016
1989年	8,395	10,534	-2,139
1990年	9,210	7,656	+1,554
1991年	10,265	10,079	+186
1992年	17,000 (估計)	12,000 (估計)	+5,000 (估計)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1992 (Washington, D.C.)

中國向日本出口商品分類統計表，1980-83年

(單位：千美元)

貨類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3年份額 (%)
動物製品	297,108	316,311	272,910	262,467	5.2
魚和貝類	181,979	188,042	138,042	131,314	2.6
蔬菜製品	321,623	407,377	377,977	484,236	9.5
礦產品	2,514,233	3,060,980	3,212,072	2,926,877	57.5
煤	116,519	188,676	212,536	212,958	4.2
原油	1,949,172	2,332,960	2,340,918	2,080,959	40.9
紡織品	682,967	691,504	722,582	806,577	15.9
絲綢	171,611	116,587	153,262	158,487	3.1
棉紡織品	92,180	115,865	118,248	140,121	2.8
服裝	230,704	242,748	263,896	270,895	5.3
其他	507,443	815,628	766,876	607,200	11.9
總計	4,323,374	5,291,800	5,352,417	5,087,356	100.0

日本向中國出口商品分類統計表，1980-83年

(單位：千美元)

貨類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3年份額 (%)
化學產品	575,416	559,599	512,139	539,674	11.0
化肥	244,476	213,120	84,712	17,509	0.4
金屬及製品其中	1,686,655	1,255,421	1,355,788	2,434,133	49.6
鐵和鋼及製品	1,618,233	1,197,407	1,292,616	2,253,334	45.9
機械和機械儀器	2,154,309	2,440,450	1,007,491	1,399,656	28.5
普通機械	1,164,226	1,440,696	399,967	545,107	11.1
電機	422,428	554,861	203,868	264,502	5.4
運輸機械	426,746	225,294	309,836	320,580	6.5
光學和精密儀器	140,909	219,599	163,820	269,466	5.5
紡織品	403,900	599,233	368,220	286,567	5.8
手工織品	156,127	201,815	115,869	81,997	1.7
其他	258,055	242,486	197,817	252,304	5.2
總出口	5,078,335	5,097,189	3,510,825	4,912,334	100.0

資料來源：U.S. Congress,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 (Washington, D.C., 1986), II, 460-63.

化學品和木材製品。中國的三十萬家國營工業企業可以採納美國人在工藝改進、管理技術和基礎發展方面的建議。在服務行業也存在巨大的潛力，美國還能夠在植樹、殺蟲劑、水土保養、食物儲備、採煤、貨物裝卸、出生率控制、集成電路方面——以及所有的發展活動方面——提供建議和指導。可能性是無限的。⁵¹

中美雙方肯定都感到貿易中存在不愉快和挫折。美國人不滿的是談判中似乎沒完沒了的拖延，缺乏雙邊投資協議，很難從中國獲取返還資金。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紡織品進口採取的保護主義和限制美國高科技出口的做法讓中國人不高興。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受美國進出口銀行一些規定的限制，如不得獲得超出五千萬美元的借貸。而且，中國還不享受一般特惠制的免稅待遇。此外，美國關於商

⁵¹ Davie, 324, Noyes, 342, 344.

品「產地國」的原則，使中國感到受到歧視，美國對在華投資的拘謹態度也令中國方面失望。如果撇開不愉快，中美貿易有望在未來繼續增長，達到新的高峰。

1972-92年的中美貿易

(單位：百萬美元)

	中國的出口	中國的進口	中國的出超或入超
1972年	32	60	-28
1973年	61	741	-680
1974年	112	819	-707
1975年	156	304	-148
1976年	202	135	+67
1977年	203	171	+32
1978年	324	865	-541
1979年	594	1,724	-1,130
1980年	1,059	3,755	-2,696
1981年	1,875	3,603	-1,728
1982年	2,275	2,912	-637
1983年	2,244	2,173	+71
1984年	3,065	3,004	+61
1985年	3,865	3,856	+6
1986年	4,771	3,106	+1,665
1987年	6,293	3,497	+2,796
1988年	8,511	5,021	+3,490
1989年	11,990	5,755	+6,235
1990年	15,237	4,806	+10,431
1991年	18,969	6,278	+12,691
1992年	25,728	7,418	+18,309
1993年	31,530	8,760	+22,770

資料來源：1972-82年的數據出自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 (Washington, D.C., 1986), vol. 2, 329-30. 1983-92年的數據出自 *U.S. Foreign Trade Highlight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1989 and June 1993.

中國向美國的主要出口

(單位：百萬美元，交貨價)

貨類	1983年		1984年上半年	
	價值	份額 (%)	價值	份額 (%)
總額	2,244	100.0	1,482	100.0
製造品	1,026	45.7	689	46.5
服裝和小飾件	774	34.5	499	33.7
柳條編織品和籃筐	58	2.6	35	2.4
鞋類	34	1.5	24	1.6
燃料	430	19.2	263	17.7
汽油	309	13.8	149	10.1
原油	79	3.5	62	4.2
半成品	390	17.4	272	18.4
紡紗布	241	10.7	184	12.4
化學品及相關製品	131	5.8	79	5.3
煙花	29	1.3	19	1.3
藥劑	25	1.1	13	0.9
食品	112	5.0	78	5.3
罐裝蔬菜	34	1.5	30	2.0
茶葉	10	0.4	8	0.5
原材料	97	4.3	55	3.7
鋇硫酸鹽和碳酸鹽	26	1.2	14	0.9
羽絨和羽毛	8	0.3	6	0.4
機械、運輸設備	42	1.9	29	2.0
雜貨	10	0.5	12	0.8
飲料和煙草	4	0.2	2	0.1
啤酒	2	0.1	1	0.1
動物脂肪/植物油	2	0.1	2	0.1

美國的主要進口

(單位：百萬美元，交貨價)

貨類	1983年		1984年上半年	
	價值	份額 (%)	價值	份額 (%)
總額	2,173	100.0	1,162	100.0
機械和運輸設備	586	27.0	284	24.4
飛機和部件	235	10.8	49	4.2
建築和採礦設備	52	2.4	45	3.9
辦公設備	52	2.4	34	2.9
食品	541	24.9	284	24.4
穀物	536	24.7	283	24.4
化學品	354	16.3	265	22.8
化肥	168	7.7	119	10.2
塑膠	92	4.2	73	6.3
原材料	300	13.8	173	14.9
松木	228	10.5	129	11.1
製成品	220	10.1	61	5.2
鋁製品	87	4.0	3	0.3
紙張	41	1.9	22	1.9
雜貨	172	7.9	94	8.1
電子儀表、遙控器	92	4.2	46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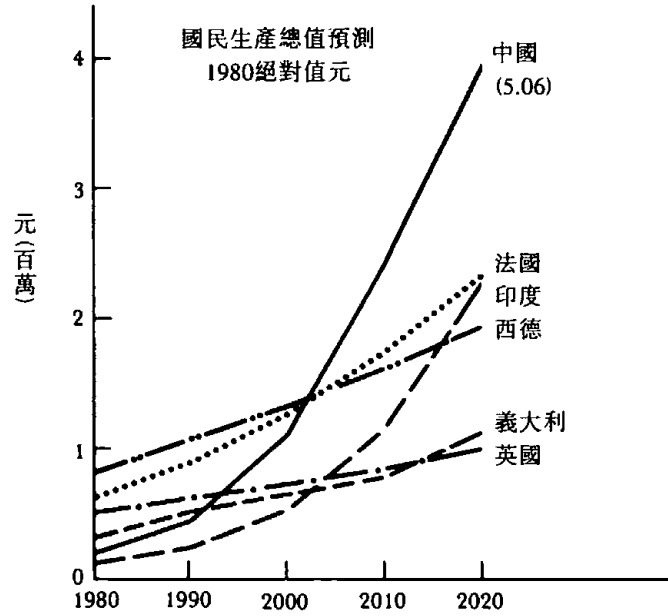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U.S. Congress,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 (Washington, D.C., 1986), II, 336-40.

未來發展前景

改革開放的經濟和技術效益是有目共睹的。農村地區不斷繁榮，農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城市生活越來越豐富、開放、寬鬆，與外國的貿易和科學往來飛速發展。外國觀察家把鄧小平的成功領導與法國的科爾伯(Colbert)、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和日本明治初年的領導人相提並論。⁵² 其他一些人樂觀地預言，如果不發

⁵²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1987), 448.

中國、印度及某些西歐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預測，1980—2020年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Dec. 21, 1985, 69.

生諸如中蘇戰爭爆發那樣的大禍，或者像文化大革命那種規模的大動亂，那麼，以年均增長率8%的速度增長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將在2000年以前超過義大利和英國，到2020年時將超過西德和法國。⁵³

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預言是有道理的。在進入改革十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指數繼續飆升，沒有表現出任何放慢的跡象。但是，不能完全排除前面提到的幾種大災禍。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已經暗暗地出現了，這些因素從統計數據是看不出來的，從長期來看，它們將顯得極其有害。最重要的因素有：(1) 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和對執政黨領導地位的信任不斷被侵蝕；(2) 黨政部門腐敗橫行，它將可能導致公共道德的崩潰；(3) 急劇的通貨膨脹將尾隨價格失控而來，引起大眾的不滿。

隨著改革開放的十年臨近尾聲，出現了一些不祥的徵兆：意識形

⁵³ 同上註，455。

態混亂，經濟失衡，社會不安定，道德淪喪。領導集團既面臨新的機遇，也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參考書目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1984年9月26日。
- Bannister, Judith,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1987).
- Burns, John P., *Policy Conflicts in Post-Mao China* (Armonk, N.Y., 1986).
- Barnett, A. Doak, and Ralph N. Clough (eds.), *Modernizing China: Post-Mao Reform and Development* (Boulder, 1985).
- 趙紫陽：「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1985年3月27日在第六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 Chen, Nai-Ruenn, and Jeffrey Lee, *China's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Washington, D.C., 1984), Dept. of Commerce report.
- China: Econom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1987* (Washington, D.C., 1988). A report by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resented to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s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Congress.
-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Washington, D.C., 1985). The World Bank report.
- "China and India: Two Billion People Discover the Joys of the Market," *The Economist*, Dec. 21, 1985, 65-70.
-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1986), 2 vols.
- Ching, Frank, *Hong Kong and China: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New York, 1985).
- Chiu, Hungdah, Y. C. Jao, and Yuan-li Wu (eds.),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Toward 1997 and Beyond* (New York, 1987).
- Chow, Gregory C., *The Chinese Economy* (Hong Kong, 1986).
- Cremer, R. (ed.),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Hong Kong, 1987).
- Croll, Elisabeth, *The Family Rice Bowl* (Geneva and London, 1983).
- Goodman, David S. G.,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1995).

- Griffin, Keith (ed.),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Hong Kong, 1986).
- Hinton, William, *Shenfan: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1984).
- Ho, Samuel P. S., and Ralph W. Huenemann,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The Quest for Foreign Technology and Capital* (Vancouver, 1984).
- Ikels, Charlotte, *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1996).
- Ishikawa, Shigeru, "Sino-Japanese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09:1-21 (March 1987).
- Jao, Y. C., and C. K. Leung (eds.),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1986).
- Joffe, Ellis,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Mass., 1987).
- Kelley, Ian, *Hong Kong: A Political-Geographic Analysis* (Honolulu, 1986).
- Kirby, Richard J. R.,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 A.D.* (New York, 1985).
- Lardy, Nicholas R.,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1983).
- Lee, Ching Hua (Patrick), *Deng Xiaoping: The Marxist Road to the Forbidden City* (1985).
- Leeming, Frank, *Rural China Today* (New York, 1985).
- Madsen, Richard,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1986).
- Mathur, Ike, and Chen Jai-sheng, *Strategies for Joint Ven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1987).
- Naughton, Barry,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1995).
- Parish, William L.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1985).
- Perkins, Dwight, and Shahid Yusu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ltimore, 1984).
- Perkins, Dwight H., *China: Asia's Next Economic Giant* (Seattle, 1986).
- Perry, Elizabeth J., and Christine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5).

- Rabushka, Alvin, *Forecasting Political Events: Future of Hong Kong* (New Haven, 1986).
- Saith, Ashwani (ed.), *The Re-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Peasantry: Aspects of Rural Decollectivisation* (London, 1987).
- Shaw, Yu-ming (ed.), *Mainland Chi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Reform* (Boulder, 1985).
- Starr, John B. (ed.),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1984).
- Stavis, Benedict,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Ithaca, N.Y., 1978).
- Stephan, John J., and V. P. Chichkanov (eds.), *Soviet-American Horizons on the Pacific* (Honolulu, 1986).
- Tam, On Kit,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Socialist Mechanization Scheme* (Dover, N.H., 1985).
-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北京，1985年）。
-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60 Years On: Transition towards a New Era*, four articles, *The Chinese Quarterly*, 112:541-630 (Dec. 1987).
- Tsao, James T. H.,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Foreign Trade* (Lexington, Mass., 1987).
-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1986).
- Wesley-Smith, Peter, *Unequal Treaty, 1898-1997: China, Great Britain, and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New York, 1984).
- Wik, Philip, *How to Do Busines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 J., 1984).
- Youngson, A. J. (ed.), *China and Hong Kong: An Economic Nexus* (New York, 1985).
- Zweig, David, "Prosperity and Conflict in Post-Mao Rur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05:1-18 (March 1986).

轉變中的中國，1986–1988年： 開放政策對文化的影響

當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最先採納對外開放政策時，中央領導人希望在引進外國科學技術的時候不要將外國的文化和價值觀也放進來。但是，觀念就像風一樣能跨越邊界；靠命令是無法阻擋住它們的。開放政策的文化影響遠遠超出了中共領導層預料的範圍，引起了保守派理論家把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入侵斥責為外來「精神污染」。從正統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這些擔憂和責備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觀事實是，西化是一種無法阻擋的全球性現象。

就中國而言，經過與西方的三十年隔絕之後，國門突然被打開：外國的觀念、消息、電影、戲劇、音樂、文學和大眾文化猶如一場風暴席捲而至。在此後的十年中，六萬名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以及數萬名官員和代表團成員出國學習、訪問，營造了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幾十年未見的國際交往。

西方民主制度的效率和西方人民的自由給訪問西方的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具有啟發意義的是他們目睹了以下種種事物的運作：制度的制約和平衡、政府中的權力分割、司法至上和依法治國、政治多元化、議論、結社和新聞自由等。許多中國人逐漸確信，中國需要把政治民主當作第五個現代化，沒有政治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改革的。大學生們尤其感到，在這個變革中充當先鋒是自己的一種社會責任。

不僅是西方，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臺灣和南韓——也是啟發的源泉。把它們與中國作比較將必然引發以下的問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否是指導中國現代化的合適的思想體系？中國共產黨是不是帶領中國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最有效代表？對這兩點的

疑問持續困擾著一些社會批評家、作家、新聞記者、藝術家、教授、科學家和大學生，雖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選擇保持沈默。

放鬆束縛的需要與保持一定程度正統性的迫切願望，形成了一種矛盾，這種矛盾令中共本身非常不安。許多黨員感到困惑：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應該採納資本主義的物質刺激手段和建立在市場供需和價值規律基礎上的市場機制，是不是應該容納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和私有企業。而其他人則想發問，是不是應該淡化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以便使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和臺灣以另一種發展模式的形象出現，變得相對不那麼危險。

1986-1988年間的中國，正在經歷著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愈益強烈的痛苦和改變價值觀的極度痛楚。學生動亂、意識形態混亂、領導階層危機、普遍的腐敗、高通貨膨脹率、方向感的迷失等種種厄運，折磨著中國社會。如果有一種東西可以代表「痛苦指數」的話，那麼，1986-1988年是文革結束以來這種指數最高的一段時期。然而，在混亂和騷動的深處，隱約閃爍著某種復興和對未來充滿希望。

學生示威

1986年12月，在中國的十五個大城市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學生示威，令黨和政府陣腳大亂。來自一百五十所高等院校的十萬名學生上街遊行，要求言論、集會和新聞自由，並要求進行民主選舉。他們的訊息很清楚：中國的年輕人要求政治自由化。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學生的積極熱情並不新鮮；在1986年12月事件以前就有過許多先例。最著名的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最近時期，1985年9月，學生曾抗議日本的新經濟侵略和中國政府一意迎合日本的態度。這次抗議與九一八事變五十四周年紀念恰好重疊。抗議也成了學生表達其他一些憤慨的渠道，如物價高漲、經濟犯罪、官僚主義不當行為、高幹子女的徇私枉法等。1985年12月9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策劃的一次示威由於政府干預而流產了。但不滿卻繼續存在。

1986年12月的抗議最早於月初在安徽省會合肥爆發。中國科技大學位於該市的選區範圍內，該大學的學生抗議當地黨委不與大學協商就指定了八名將來的全國人大代表。1986年12月1日，校園裏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號召全面抵制預定在12月8日舉行的「偽」選舉。在次日的一次師生大會上，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和大學副校長方勵之號召採取斷然行動，以求在爭取政治民主的鬥爭中取得突破。他重複了他那廣為傳誦的名言：民主不能從上面給與，而必須從下面爭取而來——給與的東西可以收回，但爭取來的東西卻收不回。

當地另外兩所高校¹的學生加入了中國科技大學生的抗議行動。12月5日，總共有三千名學生遊行到市政府前，要求民主選舉、新聞和集會自由、不受打擊報復，並堅持允許媒體報道他們的抗議。他們進一步要求組成高校學生民主聯盟。學生的目標是打破黨對報紙和學生的控制。當地黨委勉強地同意分配給大學選區四個代表席位並將選舉推延到12月29日。²學生進而要求改革選舉，高呼：「我們要民主。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新聞自由。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³

在上海爆發了一場規模宏大的聲援運動。12月19日，約三萬名學生⁴和據估計十萬名工人遊行到市政府。這標誌了這場抗議的高潮。在北京，四千名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焚燒了一捆捆黨報《人民日報》。一名抗議者望著升起的煙霧興奮地說：「亂世佳人！」⁵

這些抗議者申明，雖然他們要求民主，但他們都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真正支持者。這促使《北京日報》諷刺地評論他們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中共措手不及，無法對此採取果斷措施。保守派要求進行強制鎮

¹ 安徽大學和合肥工學院。

² 方勵之教授以3,503票當選；溫元凱教授以2,406票當選；學生領袖沙馬（音譯）以2,164票當選；第四位情況不詳。

³ 《十月評論》，香港，專刊（1987年），第14期，第4-5號、6-8頁。

⁴ 主要來自同濟大學和交通大學，也有少數來自復旦大學。

⁵ *Los Angeles Times*, Jan. 6, 1987. 這位抗議者為自己知道這部著名美國影片的名稱“Gone with the Wind”而自豪。

壓，但總書記胡耀邦採取了開明的姿態，認為對年輕人的理想主義不應打擊，而應將其引向建設性的目標。國家教委副主任⁶自己在年輕時也參加過示威遊行，他稱，示威者佔中國兩百萬在校大學生中的不到2%，他們大多數是愛國的、善意的，但受到了西方自由主義的誤導。他說，「上帝允許年輕人犯錯誤……我們對他們的政策是教育他們，勸告他們，給他們提供適當的指導」。但是他警告，學生決不能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否則，中國艱難取得的安定團結局面就會受到損害。⁷

其他一些要員也採取了緩和的舉動。上海市市長⁸承認學生的行動是「正當的、合法的和愛國的」，是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的。他保證不會採取報復行動。⁹警察和公安便衣保持了克制。他們拍攝了示威者的照片，但避免激怒示威者，以致示威發展到不可收拾。黨的報紙敦促學生珍惜近年來中國取得的物質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包括大學生受教育的權利。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¹⁰請求學生通過現存的渠道表達他們的不滿，以有利於安定團結的方式發表批評，以免把好事變成壞事。中共當局不追究學生的動機，只是擔心他們的行動會妨礙交通或干擾經濟生產！

比較保守的領導人把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斥責為麻煩的根源。少數學生被逮捕，但大部分人很快又被釋放了。但是，有幾個被關押了幾個月。¹¹時間對政府有利。學生不久就埋頭於期終考試，隨後又是寒假。總的來說，官方對學生的態度是先鬆後緊。為了進一步

⁶ 何東昌，中央委員。

⁷ *Los Angeles Times*, Dec. 31, 1986.

⁸ 江澤民。

⁹ *Los Angeles Times*, Dec. 22, 1986.

¹⁰ 費孝通教授。

¹¹ 他們中的一位叫楊偉（音譯），32歲，碩士，1983–1986年間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學習，獲該校的分子生物學碩士。1986年1月在上海被捕，一直到12月才審判。他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進行「反革命」活動，包括參與上海的一次親民主示威，並與中國民主聯盟及其刊物《中國之春》有牽連。中國民主聯盟的總部和刊物設在紐約，嚴厲批評中國缺乏民主。

加強中央對在校學生的控制，政府重新在校園開設了軍訓和政治課，並恢復了在分配畢業生工作之前先送他們到「基層」農場和工廠勞動一年的不得人心的政策。¹² 但是政府對工人的政策從一開始就非常嚴厲：工人被嚴格禁止參加示威。當局下定決心要防止在中國發生波蘭式的工會罷工。

胡耀邦總書記處理動亂的方式激起了頑固保守派的憤怒。他們不能忍受他的開明姿態，越來越不滿他的領導。一大批黨政軍各方的保守派組成了一個大同盟，到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那裏告他的狀。他們指責「美國之音」和臺灣的「自由中國之聲」是動亂的外部鼓動者，但他們更強調地抨擊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滿和不和諧的根源。這個保守集團在12月下半月舉行了幾次秘密會議，到月底，他們贏得了鄧小平的支持。他們決定要嚴厲壓制學生的騷動，嚴肅處理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民日報》的社論宣稱：「是該清醒的時候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確實是一種思潮，它正在毒害我們的青年，危害社會的安定團結，干擾我們的改革和開放，阻礙現代化的進程，難道我們還能夠若無其事嗎？」在新年來臨之際，中央告誡全體黨員要增強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中國擴散的警惕性。¹³ 總書記胡耀邦的命運危如累卵了。

資產階級自由主義 學生的騷動並不是年輕人熱情的孤立、突然的爆發，而是幾年來一直在醞釀的一場運動。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採納了現代化和對外開放的政策，從那時起，國外的新聞、與外國的交往和到國外的旅行就使中國的公眾大量接觸到了曾經被認為是異己的、不可想像的文化和政治觀念。中國人眼前展現出了一幅關於現代社會的全新景觀。人權、民主、自由選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三權分立和「忠誠的反對派」等思想打動了中國人的心坎，贏得了中國人的極度讚賞。特別受到稱道的是這樣一種觀念：新聞媒體的監督、不同政見者的權利和政治多元性，都能發揮制

¹²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6, 1988.

¹³ 《人民日報》，1987年1月6日。採用「自由化」而不是「自由主義」一詞，是為了表示一種正在展開的過程而非一種狀態——其間有微妙的區別。

止政府行為過當的作用；通過這些制動閘門，統治團體可以受到被統治者的監督。在中國人看來，這些觀念代表著民主制度的真正特徵，民主制度將致力於人盡其才的目標。

幾個國際事件有助於公眾形成這種心態：1986年2月菲律賓的馬可斯 (Marcos) 政權被「人民權力」推翻；海地獨裁者杜瓦利埃 (Jean-Claude Duvalier) 被民眾起義驅逐；臺灣政治開禁，反對派成立民進黨；法國爆發反對推行精英教育政策的學生罷課運動。

在國內，知識界和文化界裏也存在著強烈的騷動。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把黨的中心任務從階級鬥爭轉到了經濟建設，從那時起，知識分子就具有了較高的地位，因為現代化需要知識和才能。鄧小平宣稱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既要得到應有的尊重，也應該從國家得到較好的待遇——不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是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臭老九」了。受他們新的地位的鼓舞，具有獨立見識的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和思想家開始表達他們的心聲，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

這些不同政見者經常觸動中共敏感的神經，中共非常警惕地捍衛自己行使統治和被絕對服從的權利。不同政見等同於藐視、不忠於和挑戰黨的權威。在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爆發之後，政府將運動的領袖¹⁴判處了十五年徒刑。1983年，當中共意識到西方的觀念、理論和實踐正在侵入中國人的公眾意識時，它發動了「反精神污染」運動以抵禦「頹廢的」價值觀的入侵。

1984年4月，列根總統 (Ronald Reagan) 訪問中國，他渾身洋溢著一種使命感，要大力宣揚美國的民主經歷、對上帝的信念、自由、個人創造力、自由企業和進步精神。他在人民大會堂向六百名中國社會名流發表的一篇演講中宣佈：

從我們的根上，我們從兩個偉大的動力中獲取了巨大的力量，這就是信念和自由。創建美國的人追求崇拜上帝的自由，相信上帝能以智慧、力量、善和同情來引導他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對自由的激情導致了美國革命，這是第一場追求人權

¹⁴ 魏京生。

和反對殖民統治以求獨立的偉大起義。我們懂得，除非我們願意與其他任何人分享自由，否則我們每個人都不能享受到自己的自由。我們懂得，除非我們受到一套平等對待我們的法律體系的保護，否則我們的自由就不能真正地安全。

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告訴我們，我們將通過自由人的神聖博愛聚集在一起。林肯 (Abraham Lincoln) 定義了美國民主的核心，他說，「沒有哪個人好到足以不經過他人同意就統治他人的地步……」。這些偉大的原則滋養了美國的靈魂，它們因諸如工作的尊嚴、鄰里的友誼和家庭的溫暖等價值觀而更加豐富。

「相信人民」——這四個字不僅是美國歷史的核心和靈魂，而且也是當今世界人類進步的最強大動力……那些在最短時期內取得最顯著進步的社會，並不是最嚴密組織起來的社會，甚至也不是自然資源最豐富的社會。不是的。那是因為那裏的人民被允許創造、競爭和建設，被允許獨立思考、作經濟決定、從他們自己的冒險中獲益，社會才變得最繁榮，最進步，最富有活力，最自由。¹⁵

這是給一個無神論的、專制的社會帶來的強烈而又刺激的訊息。中國領導人顯然把它看作是冒犯，他們決定在後來的新聞報道中刪除那些不能讓中國人民聽到的字句。中國的電視觀眾沒有聽到有關信念和自由的宣傳，也沒有聽到「自由的人民建設促進所有人發展的自由市場」一類的告誡。代理總統新聞秘書斯皮克斯 (Larry Speakes) 聲稱，雖然決定審查是「中國人民可以選擇的內部事務」，但他對剔除「總統關於美國人所珍惜的價值觀之見解的關鍵段落」表示遺憾，「這些段落將使中國人民更好地理解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¹⁶

列根在復旦大學發表的電視演講中重複了同樣的主題，特別強調人權：「我們相信每個男人、婦女和孩子的尊嚴。我們的整個制度的基

¹⁵ U.S. Dep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D.C., "President Reagan,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U.S. and China," April 27, 1984.

¹⁶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8, 1984.

礎是尊重每個人的特殊天賦——尊重他自己作決定和過自己生活的特殊權利」。¹⁷中國人在電視直播時不允許將演講翻譯成中文，但還是有足夠多的人能聽懂列根的話。兩篇演講的全文很快出現在自由市場上，立即被搶購一空。列根終於將他的訊息傳達了出去，中國的聽眾私下讚賞他的大膽和「骨氣」。¹⁸

中國的年輕人通過到國外和列根的來訪接觸到了西方的政治觀念，這些觀念使他們深受影響。他們逐漸感到，任何偏離西方民主制度理想的政治制度都將抑制個人的充分發展，都應該被斥責為落後、專制、與時代格格不入。

隨著1984年城市經濟改革的開始，犯罪、腐敗的事例越來越常見，在培養第三梯隊的幌子下偏袒高幹子女的現象也日益嚴重。大學生們把自己看作是年輕一代的良知，他們感到肩負著抗議這種世風日下狀態的社會責任。他們要人權，要民主，要法治，要言論、集會和出版自由，要求嚴禁專橫的逮捕和其他種種超越司法規範的程式。

不僅是大學生，而且一般的文化界、藝術界和知識界也都受到了西方自由化的影響。作家和藝術家要求有更大的創作自由，開明的知識分子急切地討論自由選舉、三權分立、不同政見的權利和多黨制度之類的話題。上海的一位知名作家寫到：「思想意識應該是自由的、解放的、豐富多彩的……我為我自己樹立了四項基本的思維原則——擺脫意識形態束縛、擺脫盲從和迷信、自主思考、幫助自己的思想意識從必然王國跳躍到自由王國」。¹⁹

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孜孜不倦地倡導人權和民主。他被譽為中國的「薩哈羅夫」，經常到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露面，作巡迴演講。他最喜歡談的話題是法治、自由選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他深信，學者具有對時代的重要問題發表內心看法的社會責任。他稱他不害怕任何人，願意承擔行動的後果。他宣稱，一所大學應該把科學、民主、創造和獨立奉為四條基本信念。他鼓吹應該以這四條

¹⁷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 1984.

¹⁸ *Sino Express*, New York, May 6, 1984.

¹⁹ 沙葉新，轉引自 *Los Angeles Times*, Jan. 7, 1987.

信念取代四項基本原則。他把四項基本原則輕蔑地比作迷信、專制、保守和依附。他充分分享了五四運動的精神和觀念——科學、自由和全盤西化。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這套主義對中國的持續落後並保證中共無所忌諱地行使權力負有責任。他指出，中共的統治建立在軍事征服而非功績的基礎上，它在過去三十五年中的全部表現只能被認為是一場失敗。方勵之鼓勵學生為爭取他們的權利而奮鬥，但他從沒有要求他們上街遊行。²⁰

《人民日報》的採訪記者劉賓雁和作家王若望不遺餘力地揭露官僚主義的陰暗面和官方對文學和出版的控制。他們特別反對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講話宣稱文藝和新聞應該為政治服務。

劉賓雁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他諷刺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質問在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的邏輯。他問道：如果1953–1976年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是正確的，1979–1986年間鄧小平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又是甚麼？這二者之間的區別是如此之大，它們怎麼可能都正確呢？他輕蔑地質問：

極左思潮的根本是甚麼？它是相互厭惡、相互摧毀和相互殘忍。它使人成為非人。它使自由的人變得不自由。它把有獨立人格的人變成馴服的工具。它把人變成野獸。在這個過程中，良知喪失了，自我批評的意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敵視和仇恨，是相互懷疑和殘忍。最後，空氣中充滿了恐懼——對殘酷權力的恐懼，對領導的恐懼，對權威的恐懼……因此，我必須承認，左傾思潮的根本是非人主義。

劉賓雁斥責國人受四種幻想的蒙蔽：(1) 社會主義是完美的；(2) 共產黨是永遠正確的；(3)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永恆的真理；(4)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鴻溝，過去幾百年裏資本主義社會中

²⁰ 方勵之發表的一系列演講的要點：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1986年11月18日在同濟大學的演講，1986年9月27日在安徽經濟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講。

發生的任何東西沒有一樣應該予以適當的承認。劉賓雁聲稱，為了這些錯誤的觀念，中國付出了盲目犧牲和不必要損失的沉重代價。而這一切又換來了些甚麼呢？²¹

另一位批評家王若望是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他在1986年11月直接批評鄧小平本人。鄧小平曾同意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華萊士(Mike Wallace)的採訪，並宣稱中國的社會主義將允許一些人先富起來，但要防止富人和窮人之間出現兩極分化。鄧小平認為，無論如何，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很難有人能成為百萬富翁的，因此不用擔心中國會出現一個新的資本家階級。這段聲明聽起來沒有問題，但王若望對這條思路提出了幾點爭論。王若望主張，在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兩極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與兩極化相對的是平均主義和平等主義(「人人吃一樣的大鍋飯」)，中國已經實行了三十年，一無所獲，只造成了共產主義的赤貧。王若望爭辯說，避免兩極化就是消除實現更大生產力和更多利潤的動力。預言不可能產生百萬富翁就是給一個人的期望值和上進心設置一條界線。王若望表示，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即使有三、五千個百萬富翁也根本不算多，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的產物，他們將不同於馬克思主義所定義的資本家。²²

不僅僅是像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這樣的知識分子表現出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社會上也普遍存在著對西方每一種東西的渴望。時常會有幾千人排隊等候幾小時看一場畢加索的畫展，或是一場皇家芭蕾舞團的演出，或是一場米勒(Arthur Miller)的戲劇；但很少有人去參觀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幾乎外來的任何事物都有吸引力：政治思想、社會理論、未來學、小說、戲劇、藝術、時裝，甚至像可口可樂、麥氏咖啡和肯德基之類的庸俗事物。當時最受歡迎的結婚禮物是

²¹ 中共縣團級以上幹部使用的內部材料：批判方勵之和劉賓雁，轉載於《九十年代》，香港，1987年6月，第37-40頁。

²² 王若望對鄧小平觀點的批評用了這樣的標題，〈兩極分化之我見——與鄧小平同志商榷〉，《工人日報》，深圳經濟特區，1986年11月12日，轉載於《九十年代》，香港，1987年2月，第58-59頁。

一套中文版的《大英百科全書》。中央編譯局局長這樣解釋公眾的熱情：

三十多年來，我們把西方的文化當作禁忌對待，拋棄來自西方的一切事物。結果，我們對西方的瞭解一直是空白。彌爾頓、蕭伯納、盧梭、巴爾扎克、薄伽丘和歌德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音樂，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戲劇，全被當作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不准出版，不准上演。不知道聖經故事的人到底有多少呢？²³

無可否認，西方的影響到處瀰漫，而且日益強烈。

在黨內，對這種新趨勢的反應是各種各樣的。總書記胡耀邦對之採取一種放任自流的态度，他相信，世界性的訊息革命已經使各國相互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檢驗新的觀念並為中國的共產主義創造一種新的形象符合中國的利益。他的開明方法使保守的老一輩人傷心，他們認為西方自由主義具有搗亂性的影響力，是中國人生活中頹廢和精神污染的根源。「的士高」音樂、滑板、牛仔褲、色情電影和鼓吹自由民主的外國出版物日益流行使他們惱火不已。他們認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入侵造成了黨的威信下降，對領導人缺乏尊重，懷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對西方價值觀的盲目崇拜。他們堅稱，如果不及時遏制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的正統思想將沒有立足之地。胡耀邦作為黨內負責意識形態的領袖，領導這場鬥爭太軟弱了。只有堅定的意識形態專家才能捍衛共產主義信仰的純潔。因此，那些參加過長征的七、八十歲的老人自認為肩負著努力反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神聖職責。

正統理論家與進步改革家之間的衝突，只能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來解決。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鄧小平集經濟上的進步主義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於一身，他具有根據政治需要搞平衡的天才。在一個人治高於法治的制度下，他是最高級的仲裁者。在他的心目中，改革開放政策只是引進外國技術、資本和管理技巧的手段。這些東西應該被看作是

²³ Shang Rongguang, "Bridging Ocean-Wide Chasm," *Beijing Review*, Jan. 18-24, 1988, 31. 他的名字是劉尊棋，76歲。

加強共產黨統治的工具，而決不是把中國推向西式民主的步驟。他譏諷三權分立是一個國家三個政府，認為政治多元化完全是胡鬧。只有他在1979年3月宣佈的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保證穩定和秩序，為現代化提供必要的環境。中國不能容忍諸如學生騷亂之類的混亂，也不能出現像西方自由主義這樣的干擾影響。總之，他感興趣的是西方的科學，而不是西方的價值觀。²⁴

在1986年9月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保守派理論家們在鄧小平的默許下，壓倒主張推進改革的人士，制止了關於政治改革的討論。相反，他們通過了一項經過很大改動（八次修改）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決議突出了標題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部分。對民主化事業的一記重拳落下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86年12月爆發了學生示威。

胡耀邦的解職 學生騷動的一個最大後果是總書記胡耀邦的下臺，他太開明了，太直率了。他在總書記職位上坐了五年（1981-1986年），主要是由於鄧小平的支持，鄧小平曾推薦他做自己的接班人，並曾放心地說過，有胡耀邦管黨，趙紫陽管政府，就是天塌下來他也不怕。但現在，黨內、政府內和軍內的保守派紛紛要求鄧小平讓胡耀邦辭職，理由是他在對付學生和制止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入侵的問題上處理不當。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和其他三名理論家及兩名軍方要員帶頭攻擊胡耀邦。²⁵ 作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鄧小平知道同這樣一個強大的聯盟作對是徒勞無益的；此外，他自己對胡耀邦的信賴也已減退了。經過1986年12月下半月的幾次秘密會議，鄧小平痛苦地接受了胡耀邦必須下臺的決定。鄧小平以犧牲胡耀邦來保住保守派領導人的支持。

²⁴ 中央文件，1987年第2及4號，轉載在《潮流月刊》，香港，1987年4月15日，第14-17頁。

²⁵ 彭真和另外三名權力很大的理論家鄧力群、胡喬木和薄一波全是政治局委員，他們有時被說成是新四人幫。兩位軍方領導人是總參謀長楊得志和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

過了元旦，胡耀邦就沒有公開露面了；他的下臺迫在眉睫了。與此同時，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準備工作密鑼緊鼓地進行著，會議於1987年1月16日召開。在當天會議的最後時間，胡耀邦做了一次自我批評，承認自己「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犯有錯誤，違反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從在1987年年初內部傳達的八份黨內文件中，可以一見最高層會議上發生的黨內爭論。胡耀邦的檢討可歸納為六項，既暴露了個人恩怨，也反映了政策分歧：

1. 搞幫派主義，優先提拔共青團系統的幹部，他自己曾擔任過共青團總書記。
2. 在外交場合說話隨意：在1983年訪問東京期間宣稱，如果美國干涉臺灣問題的話，中國將考慮取消趙紫陽總理與列根總統的互訪。
3. 沒有有效地開展平反工作。
4. 推行過快的經濟改革步伐，造成了經濟失衡和對局勢失控。
5. 在主持黨內工作時主張人治高於法治。
6. 沒有遵守組織原則，向外國人和新聞記者洩露國家機密。

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胡耀邦的錯誤如下：

1. 違反黨的集體領導。
2. 在重大政治原則上犯有錯誤。
3. 屢屢地、武斷地干涉政府工作。
4. 屢屢不聽鄧小平的建議。
5. 在重大的外交問題上武斷做決定。
6. 政治工作作風中表現出全盤西化的傾向。

在這些正式指責的背後，存在著對胡耀邦不停地呼籲黨內老一代人退休一事的深深不滿。據稱，他曾打算在預計於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中央委員年滿60歲退休，政治局委員年滿72歲退休。年邁領導人退休的原則肯定得到了黨和鄧小平的認可，但具體實施則留待總書記執行。事實表明，這個問題是極其敏感

的。要是沒有退休制度，職務就意味著權力、政治影響和經濟特權。長征一代的老人對他們責無旁貸的工作權利特別敏感。退休等於一錢不值，為了避免退休，他們願意做任何事情。鄧小平也許也對胡耀邦談論退休感到不快，尤其是因為胡耀邦暗示說，鄧小平應該首先退下來，以便給其他老同志樹立一個榜樣。確實，鄧小平曾屢次抗議說他想退下來，但其他人不讓他退。胡耀邦或許天真地把鄧小平的話當真了，這樣就觸怒了他，導致鄧小平懷疑起胡耀邦政治上是否足夠精明。學生動亂和鄧小平的不快給了老一輩領導人一個趕胡耀邦下臺並保住自身職位的大好時機。

軍方也不為胡耀邦所用，因為他與軍隊關係不密切，在四個現代化中給軍隊分配的利益份額較低。此外，胡耀邦曾提倡削減一百萬軍隊，並坦率地批評過對越南的戰爭。從1986年9月起，軍方就預言胡耀邦將倒臺，並朝這個方向作努力。

頑固的老一代人決定在十三大召開前就拉胡耀邦下馬，這樣就可以不讓他在挑選代表和準備會議議程上發揮作用了。由於有軍方的支持，他們的力量大得驚人；鄧小平在內心是一個政治上保守的中間派，他同意了他們的要求，也許是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思想的正統。

當胡耀邦作了自我批評並提出辭職以後，四十個與會者中有二十一個人發言批評他，包括一些他從前最緊密的同盟者。胡耀邦淚流滿面，但同意「永不翻案」。問題的解決結果是，胡耀邦維持他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地位。對他不作公開批評。事實上，他的名望驟增了。

趙紫陽總理被任命為代總書記，同時兼任他其他的職務。改革派的事業遭受了一記重創，保守派的勢力上升了。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彭真和鄧力群猛烈地發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7年1月國務院成立了新聞出版署，監督新聞媒體和書報刊物的出版。三名主要的批評中共的人士被立即開除出黨：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記者劉賓雁和作家王若望。但是，沒有對他們進行任何肉體折磨。方勵之被解除了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顯赫職務，調任很不起眼的北京天文臺研究員一職。允許他繼續搞研究，出

席國內的——偶爾也有國外的——學術會議，但不得再作公開演講。像其他兩位批評家一樣，他的聲望或許保護了他免受更大的懲罰。還有其他幾個文化界和知識界人士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懲罰，但沒有一個人遭遇文革期間那樣的粗暴對待。²⁶

作為回應，一千名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於1月19日聯名向黨中央和國務院發了一封抗議信。抗議信表達了對胡耀邦被解職、方勵之等人被開除出黨及讓人想起「文革暴行」的左傾思潮之回潮等問題的關心。留學生們重申支持改革、民主和法治，宣稱反對倒退。

鄧小平支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不允許這場運動破壞安定團結。運動將局限於黨政軍機關和城市企業。農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知識分子將不在運動之列。也禁止使用帶有文革遺風的表達方法或詞語。²⁷

從1987年1月到5月，保守派思潮通過激烈的言詞和惡意的影射滲透到思想界、文化界、文學界和新聞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似乎要席捲各大城市，改革派人士顯得被打亂了陣腳，無能為力。強硬派號召要恢復毛澤東時代的老中青三結合的做法，提倡節儉、艱苦、樸素、忠於國家等老的美德，以圖消除西方的影響。毛澤東的「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口號又喊了起來。膽小的人開始把他們的西式服裝收藏起來，換上中山裝。

但是大多數人不想退回到老的日子。一旦接觸到了某些自由和電視、冰箱之類的物質享受，人們就無法忍受退回到毛澤東時代斯巴達式(Spartan)的樸素生活了。強硬派的子女和孫子女也反對這些老人們空洞的道德說教，而全國人民也都希望避免重新出現另一場文化大革命。到5月份，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高潮就過去了。黨內的老一代人痛苦地發現他們是在社會的主流之外遊蕩。他們的聲明被人們置若罔聞；大多數人乾脆在盼他們早點過世。

²⁶ 他們當中有：蘇紹智，哲學家 and 改革理論家，馬列研究所所長；王若水，前《人民日報》副總編；吳祖光，劇作家；還有其他幾個作家。他們被要求退黨。

²⁷ 中央文件，1987年第2及4號。

中共確實是進退兩難。從1949年以來，它一直獨享著權力，而行使統治的權利從來沒有人懷疑過。現在，年輕一代人卻在鼓吹民主化，嚮往其他現代社會中所能見到的自由生活。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失去了感召力，黨本身也正經歷著一場信任危機。如果不同意經濟改革和更大程度的政治寬鬆，將進一步脫離人民，更加把黨帶離時代現實。但允許民主又可能導致社會不和諧，最終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滅亡。最高領導層努力找出一條中間路線，使它既不會不忠於它的意識形態，又不會犯「正統馬克思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它摸索一種將允許市場機制、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並借鑑資本主義管理技巧的理論——所有這些都處在一個靈活的框架內，既可以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的。這樣一種公式，一旦找到，就能夠用來論證改革開放政策的開展，加強改革派的地位，挫折保守派的熱情。

趙紫陽總理內心裏是個專家治國論者，他與強硬派虛與委蛇，避免對立。他只同他們在1987年5月13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抗過一次，試圖約束他們過分的左傾思潮。²⁸ 引人注目的是，鄧小平在整個春天裏保持著沈默，療治他因損失胡耀邦而引起的內心痛楚。他最終明白，問題的關鍵不在誰應該辭職，而在於改革開放政策的前途如何。如果不制止保守派的氣焰，現代化本身就將停滯。沈默不語的悠閒過去了；鄧小平被迫出來擺明自己的立場了。

5月和6月當中，鄧小平在四個場合對外國來訪者強有力地申明，需要制止左傾，擴大改革開放政策的範圍。²⁹ 一直在等候訊號的新聞界立即回應這條消息。這是反對左傾思潮的一個勝利，也是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一個打擊。改革派人士重新獲得了某種程度的凝聚力，他們開始籌劃在7月份即將在避暑勝地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起進攻。

在北戴河，各方代表政治權力的人物之間進行了激烈的爭鬥，最

²⁸ 趙紫陽批評了三名帶頭的保守派理論家鄧力群、胡喬木和薄一波。

²⁹ 外國來訪者中有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 (Brian Mulroney)、新加坡第一副總理、日本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團。

後在四個主要問題上達成了協議：(1) 在預定在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將發佈一項關於未來發展方針的政治報告；(2) 老同志退休，選舉未來的領導班子；(3) 對現階段社會主義建設的性質發表一項正式聲明；(4) 政治改組。這些考慮將暫時保密，直到由十三大最後批准。

中共十三大

萬眾期待的中共十三大於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與會代表1,936人，代表全黨4,600萬黨員。兩百名外國記者，包括一些來自臺灣的記者應邀採訪了開幕式和閉幕式，這是史無前例的。大會的重要意義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重申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制定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並把經濟發展當作全黨的中心任務。第二，通過長征一輩的老同志主動引退，大會實現了領導集體的更新，並確保了較年輕的、受過更好教育的技術專家填補他們的職位。第三，通過了一項關於進行市場導向改革的新的理論框架，這在以前被保守派認為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第四，確定了政治改組的範圍，以便提高行政效率。

代總書記趙紫陽在開幕式上作了一份精彩的政治報告，總結了1978年12月以來九年中的巨大成就。國民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的平均收入都翻了一番，全國十億人口中的絕大部分人都解決了溫飽問題。按趙紫陽的話來說，在鄧小平同志的領導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中國革命六十年歷史上的「兩大歷史性飛躍」之一，另一個飛躍是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言下之意，鄧小平與毛澤東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他們是在中國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位主要貢獻者。許多人現在把目前的現代化看作是第二次革命或新長征。³⁰

人事變動 鄧小平親自導演了九十多位批評市場導向改革的黨

³⁰ *Beijing Review*, Nov. 2-8, 1987, 10, 12, 18-19; *News and World Report*, Oct. 12, 1987, 41.

內元老引退。他們中有彭真，85歲，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陳雲，82歲，中共主要的經濟學家和中央計劃者；胡喬木，75歲，鄧力群，72歲，兩人都是正統理論家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激烈批判者；李先念，78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鄧小平本人也辭去了黨內的所有職務，但根據一條專門的黨章修改規定保留中央軍委主席一職，這條修改規定允許鄧小平可以不以中央委員的身分保留這一職位。大會還安排了總書記趙紫陽出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擔任常務副主席。這些安排可以說暗示了軍方將接受趙紫陽為鄧小平的潛在接班人。

285名新的中央委員中含正式委員175名，候補委員110名。原來的348名中央委員中有150名(佔43%)年邁的委員未能再次當選。有意思的是，1976年接毛澤東班的華國鋒保住了中央委員身分。趙紫陽以壓倒多數票當選為總書記。新的統治集團平均年齡為55.2歲，比上一屆的59.1歲大大下降了。新增87名委員和候補委員，全體中央委員中有209名(佔73%)受過高等教育。³¹

政治局17個委員和一個候補委員基本上是較年輕的改革支持者。上一屆20個政治局委員九個退休了。但前任總書記胡耀邦仍保留委員職位；還有他的親密同事副總理萬里和田紀雲。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63歲，比上一屆低七歲。在新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平均年齡64歲，比上屆低13歲。

在權力極大的常務委員會中保持了觀點的平衡，當選的五人如下：趙紫陽，68歲；李鵬，59歲；胡啟立，58歲；姚依林，70歲；喬石，63歲。人們普遍認為，趙紫陽和胡啟立是市場導向經濟發展的堅定支持者，李鵬和姚依林傾向於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專搞安全的喬石立場居中。實際上，他們全號稱是改革的支持者，他們只是在風格、方法、步伐和範圍上有所不同而已。經濟發展已經成為全國上下一致的強烈願望，因此，沒有那個政治家敢於自稱搞其他東西。

其他一些重要的黨內職務任命有，陳雲擔任兩百人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胡啟立擔任四人書記處的負責人。

³¹ *Beijing Review*, Nov. 16-22, 1987, 6.

隨著保守派的大部分批評被抑制，改革派獲得了全速前進的授權。但是，他們知道，退休的老人沒有放棄他們的影響。他們願意退休或許是因為達成了這樣的諒解：他們支持的人選李鵬將任命為政治局常委，並將在以後出任總理。事實上，在十三大閉幕後剛過了三週，李鵬就被任命為代總理，隨後在1988年3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正式任命為總理。

李鵬是一名早期革命烈士³²的兒子，他在已故總理周恩來的家中長大。李鵬17歲入黨，1948年被派往蘇聯學習電機，六年後回國。他作為一名電力和能源專家扶搖直上，接近黨內元老陳雲、彭真和鄧穎超(周恩來的妻子)等人，得到黨內保守派、政府部門中周恩來的擁護者，以及在各條戰線上佔據重要崗位的五十年代留蘇學生的廣泛支持。李鵬對他的教育背景很敏感，因此他特別申明不贊成蘇聯的經濟制度和中央計劃。在他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後不久，於1987年11月2日宣稱：「認定我支持中央計劃經濟的斷言完全是個誤解。(中國的)經濟體制必須重組。」在他被任命為代總理時，宣佈支持「在繼續保持安定團結並一如既往地執行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同時」執行改革開放政策。³³總書記趙紫陽在十三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的一段話：「國家調節市場，市場指導企業」，可能是李鵬的一個貢獻。³⁴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強硬保守派不斷指責，其他許多人也總是有疑惑，覺得市場導向機制根本上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論調對進步運動來說正是如鯁在喉。然而，做經濟發展工作必須承認市場因素，而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也是現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對改革派來說，最迫切的任務是發展一套理論框架，用來論證他們的工作既非資本主義的也非反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在社會主義的範圍內極其需要也被允許的事物。經過一段長時期在黑暗中的摸索，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們提出了這樣的新概念：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中，

³² 李碩勳。

³³ *Los Angeles Times*, Nov. 25, 1987.

³⁴ *Beijing Review*, Nov. 2-8, 1987, 12.

市場因素、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管理技巧，以及多種所有制為特徵的混合經濟都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套理論支持的鼓勵下，趙紫陽在政治報告中充滿信心地宣佈：「改革只是一個使中國得以振興的過程。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符合人民的願望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趙紫陽提出了這樣的論點：由於中國以前落後的生產力和不發達的商品經濟，中國沒有經過適當的資本主義階段。堅持中國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將是機械的思維，將犯政治上的右傾錯誤。但認為中國可以跳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也將是烏托邦的思維，將犯政治上的左傾錯誤。趙紫陽總結說，「在這個（初級）階段中，我們將完成其他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已經實現的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

趙紫陽宣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場十九世紀的歐洲理論家不可能預見到的實驗。

我們不處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設想的條件下，在他們那裏，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我們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也不一樣。因此，我們不能盲目聽從書本，也不能機械地模仿其他國家〔蘇聯？〕的模式。相反，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這些情況結合起來。我們必須通過實踐找出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趙紫陽敦促國人尋找允許多種所有制並存的方法，以避免經濟結構僵化，發展商品經濟，提高勞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

這套理論沿著以下的思路繼續發揮。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中心任務是結束貧困和落後。它不再是階級鬥爭，雖然階級鬥爭作為一種矛盾仍然存在。要確保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中國必須通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保持安定團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持續一百年，開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其時私有生產手段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它將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中葉，那時將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長期的過程將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在1980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基礎上達到翻一番的水平，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目標已

經基本實現；第二個時期，到2000年使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使人民達到生活小康的水平；第三個時期，到下世紀中葉達到大多數中等發達國家享有的富裕水平。要成功地實現這些目標，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是關鍵。³⁵

持續令中國痛苦的問題是：「改革是不是正在使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性質是不是有一種新的衡量標準？」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傾向於把「市場機制」與資本主義制度聯繫在一起，而把「中央計劃」與蘇聯或社會主義制度聯繫起來。中共領導人現在滿足於這樣的觀點：市場機制和中央計劃都是「中性的手段和方法，它們並不決定一個社會根本的經濟制度」。³⁶ 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允許採納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管理技巧，採用以多種所有制為特徵的混合經濟，並讓普通群眾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事務。一種流行的說法稱：「不管甚麼東西，只要能推動經濟發展便是好的，而妨礙經濟發展便不是好的。」這些觀念聽起來與美國的實用主義何其相似。

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並不意味著一種西式的改革，將不會涉及包含自由選舉、出版自由、三權分立和不同政黨輪流執政等形式的完備的民主制度。相反，它僅僅意味著提高行政效率、精簡臃腫的官僚機構、消除人員過剩現象。改革的主要特徵是將黨與政府部門及企業的日常運轉分離開來。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將由間接控制來取代，並對官僚機構進行從上到下的合理化，建立量才錄用的公務員制度。

按照中共領導層的說法，中國必須保持獨特的政府形式及社會主義民主的鮮明特色。在提高普通群眾參政意識的同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民主集中制、和「多黨」合作將繼續運作。通過發展有效的司法制度，人民的權利將得到保護，不受官員和不合法程序的粗暴侵犯。通過這種途徑，社會主義民主就能建立起來。

³⁵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1987年10月2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³⁶ David Holly, "New Leaders, Reforms to be Weighted at Chinese Party Congress," *Los Angeles Times*, Oct. 24, 1987.

評價 中共十三大之所以值得重視，有以下幾個原因。它有力地將中國推上了加速經濟發展和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的道路。沒有其他哪個共產黨國家的領導層自願將權力交給年輕一代的領導集體。更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發現，傳統的共產主義制度如果不容納市場機制，就無法有效運轉。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似乎發現了同樣的道理，但中國在蘇聯之前就掙脫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束縛。中國已經創造了重要的思想武器——發明了一種符合現實的理論，而不是使「現實適應於理論」。³⁷ 鄧小平將經濟改革變成了一種獲得人民廣泛支持的不可逆轉的義務。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仍然拖著幾乎整個蘇聯官僚體系，「開著低檔吃力地慢慢爬坡」。有識之士相信，中國經濟成功的可能性比蘇聯大。³⁸

但是，中共十三大雖然成就斐然，卻也留下許多問題沒有解決。首先，它的成果並不代表進步改革派的明確勝利，而只是黨內各個不同派別之間的妥協。保守的老一代人退而不休，能夠繼續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來阻撓更加激烈的開禁。³⁹ 許多敏感的問題，如價格放開、通貨膨脹、國有企業租賃給私人經營、破產法、土地使用權（實為私人所有權的委婉詞）的轉讓等，仍然顯得是一觸即發的禁區。尤其是趙紫陽最讚賞的溫州私有制模式，仍然將觸發爭論。

第二，鄧小平安排趙紫陽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但卻絲毫沒有保證趙紫陽能繼承他擔任統帥和最高領導人。在過去，所有被指定的接班人都在掌權之前就下臺了：劉少奇在1966年，林彪在1972年，華國鋒在1978年。任何共產黨國家都天生存在著領導人繼承的不穩定。常識促使人發問，即使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有生之年得到鄧的保護，那麼鄧小平逝世以後又將會怎麼樣呢？就這一點而言，如果要取得穩定的話，就必須使法治取代人治。

³⁷ Henry A. Kissinger, "China Now Changing Rules and Ruling Party," *Los Angeles Times*, Oct. 25, 1987.

³⁸ Joseph C. Harsch, "A New Look,"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5, 1987, and "Fortunes Shift for Leaders of World's Three Powers," *ibid.*, Nov. 6, 1987.

³⁹ Adi Ignatius, "China's Party Meeting Unlikely to Settle Success Issu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23, 1987.

第三，加速的經濟發展和更大程度的對外開放，必然會使「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經久不衰的「體用」之爭等問題再次出現。十三大迴避了這些問題。

第四，黨政職能分離將影響幾百萬人的既得利益。貫徹這一方針會是極度緩慢而艱難的。

第五，四項基本原則的至高無上排除了共產黨以外的任何統治的可能，也排除了共產黨允許範圍之外的任何自由。只有極少數的不同政見者被允許存在——如一位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一位知名記者、一位作家或一位藝術家——那只是為了做做樣子，僅此而已，但寬容的程度是嚴格控制、嚴格限定的。

總而言之，十三大表示了各派領導人一致同意推動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此而言，十三大稱得上是成功的。但探索民主、多元化和人權等更高的目標，則需要有另一次長征。

沿海經濟發展規劃

在1987–1988年間，中國逐漸發展了一套沿海地區的經濟戰略，根據這套戰略，將加速這些地區的發展，並使之與國際市場緊密結合起來。沿海經濟發展規劃有兩個基本的組成部分：(1) 從國外進口原材料，(2) 向世界市場出口加工製成品以賺取外匯。由此積累起來的基金將用於購買高科技現代設備，這意味著幫助為中國的重工業籌措資金。這些反過來又將幫助農業的發展。沿海經濟將主要是出口導向型，生產過程的兩頭——原材料的供應和製成品的銷售——都深深參與世界經濟。外國材料的進口在一開始被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中國的內地省份不能提供這些材料；但隨著條件的改善，中國的西北地區可以提供一些原材料。從長遠來看，全國都能從中獲利。

沿海經濟發展規劃是1978年12月採納的對外開放政策之必然延伸。從1978年12月開始，中國一直在向著更大開放和更密切國際接觸的方向發展，體現在1979年四個經濟特區的建立；十四個港口的開放；再後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區的開放，以及1985年海南島被確定為第五個經濟區。沿海經濟發展規劃表明中央現

實地承認了這樣的事實：中國的各個地區間不可能以同步的速度發展，中國現在應加速沿海地區的發展，以便最大限度地從出口貿易中獲利。

這個規劃的理論基礎由一位34歲的經濟設計師於1987年6月提出。這位設計師有力地解釋了使中國的沿海經濟融入國際市場的好處，它將構成一個循環，進口加工用的原材料，再出口製成品換取外匯，為中國的現代化籌措資金。⁴⁰ 這項規劃提出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為期五到七年，在其中，沿海將建成出口導向型經濟，特別是在紡織、食品、小電器和輕工業產品領域。與此同時，將努力改善沿海與內地省份的交通，但對重工業的投資將必須等到出口掙夠了外國資本之後再進行。第二個階段也是五到七年，其間，內地產品將開始進入國際市場，大大地擴展維持勞動密集型工業能力的對外交往。第三個階段從1996年到2000年，其間，尖端的、技術密集型的工業產品出口將大大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將相應減少。更多的剩餘勞動力將流向高技術生產，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在第一階段中，約有六千萬農村勞動力可以被吸收進出口導向活動，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將吸收1.2億農村勞動力。到本世紀末，中國將能夠每年出口價值1,500億美元的產品，這將要求年出口增長率達到12%。與其他一些國家在其經濟發展頂峰時期的出口增長率相比，中國預期的這個增長率也不過分高：日本當時是17%，巴西是16%，南韓是40%。

沿海經濟發展規劃考慮了自1949年解放以來中國一直存在的獨特的二元化經濟結構。在蘇聯的影響下，重工業得到了優先對待，輕工業則被忽視了；農業更是保持在很低的技術水平上，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被捆在土地上。在這樣的二元化結構中，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更大的工業化解放更多的勞動力，但發展高科技將排除對勞動力的需求。而且，勞動密集型工業趨向於增加消耗，但發展尖端工業則需要資本。從哪裏找資本？到全球市場去尋找！

⁴⁰ 王建：〈選擇正確的長期發展戰略——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經濟日報》，北京，1988年1月23日（原書注日期有誤，該文實刊登在1月5日上。——譯者）。這篇討論文章中的觀點提供了本節中的大部分內容。

中國的沿海地區非常適合於搞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性工業，因為這裏具有豐富的優秀勞動力——聰明、勤勞、素質相對較高但也很廉價。這些地區還具備相當多的科學技術資訊和較好的電訊設施，這些為集勞動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於一體的活動提供了合適的環境。確實，在東部和東南沿海地區，鄉村工業欣欣向榮：廣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區、山東和遼東半島都是如此——簡言之，沿海地區包括了廣州、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和山東等省；遼東半島的南端（旅順和大連）。鄉村工業一向是自力更生、高效和自負盈虧的。在1987年，它們擁有8,500萬訓練有素的勞工，生產出價值4,500億元人民幣的貨物，超過了農業部門的產值。這支龐大的、廉價的勞動力隊伍，如果轉向出口導向的話，將使中國至少在二十年裏處在比亞洲四小龍更有利、更有競爭力的地位上。⁴¹此外，日本、南韓和臺灣的貨幣正在升值，而美元和人民幣則在貶值，這就使中國的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更具吸引力。中國的沿海願意「加工外來原材料」，「根據規格書接受外來訂單」並「組裝外來零部件」；中國政府則願意「補貼與中國產品做交易的外國商人」（「三來一補」）。

沿海經濟發展規劃引起了銳意改革的總書記趙紫陽的注意，並在國務院高層會議上進行了仔細的討論。十三大之後，趙紫陽於1987年11月和1988年1月兩次視察了上海、江蘇、浙江和福建等省，完全相信了這個規劃的可行性。他那份樂觀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問題」報告得到了鄧小平的全力支持。⁴²鄧小平在1988年1月23日對這份規劃的批示為：「完全同意。你們一定要大膽、快速向前走，不要錯過這個關鍵的機會！」⁴³1988年2月6日，政治局正式批准了這份規劃，並指示沿海

⁴¹ 1987年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是臺灣和南韓同類工人工資的五分之一，香港和新加坡工人工資的八分之一。香港《大公報》，1988年2月12日，第1版。

⁴² 這份報告的英文摘要題目為“Chao on Coastal Areas' Development Strategy,” *Beijing Review*, Feb. 8–14, 1988, 18–23.

⁴³ 香港《大公報》，1988年3月21日，第2版。

各省市領導努力完成這項規劃，在各自的管區內歡迎外國投資，興建合資項目，並歡迎外國專家參與管理中國企業。

沿海發展戰略必須被看作是一項改革派們獨創的高超舉措，他們通過這項戰略把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結在一起，與此同時，又阻止了保守派把中國經濟推回到中央計劃和經濟孤立老路上去的任何企圖。但是這項規劃也使中國嚴重地依賴於國際經濟，使它聽憑變幻無常的國際經濟的支配，從而剝奪了中國掌握自己經濟命運的權力。中國的產品必須以高質量來同其他太平洋國家的出口產品競爭，以確保在全球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要爭取到外國的訂單和合同，就必須在外國建立起推銷網絡，這就要求中國培養大批銷售和交易代表，他們應通曉外語、市場形勢和國際商務的做法。此外，要使這項計劃獲得成功，時間是根本。如果在二十或三十年前就做這項工作，中國也許已經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並駕齊驅了。但現在，由於西方和日本日益加劇的保護主義以及九十年代初全球經濟放慢或衰退的隱約威脅，中國將不得不面臨來自西方和日本的更加強硬的抵制。歸根究底，沿海經濟發展規劃的採納證實了這樣一個不受歡迎的事實：共產主義本身無法把中國改造成一個現代國家；它需要資本主義的幫助。

動盪中的社會：通貨膨脹和道德敗壞

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伴隨著高通貨膨脹率，官方宣佈的幅度在1985年是12.5%，1986年是7%，1987年是8%，但非官方的估計是每年20%到30%。所有工薪階層都感受到了漲價的急劇衝擊，他們的觀念、生活方式、行為舉止以及最重要的社會倫理都受到了影響。毫無疑問，在各種改革措施中，價格放開和工資調整是最痛苦也最不成功的。政府下決心實行物價改革，因為以往對副食品、食油、住房以及其他所有東西的補貼制度忽視了價值規律，消耗了國家預算。政府認定，價格放開是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與其將來受苦，不如暫時受點委屈。但是，對人民來說，放開價格導致了總是比工資調整更快的價格上漲。1988年5、6月間，對四種副食品（豬肉、雞蛋、蔬菜和食糖）的控制放開了，大城市中的價格一夜間猛增了30—60%。政府向每個工

人補貼10元人民幣，每個大學生補貼8元，每個中學生補貼7元，但這根本不能抵銷價格的上漲，儘管政府聲稱過去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已經減緩了解控的痛苦。⁴⁴

通貨膨脹加劇了政府中的腐敗、高幹子女的裙帶作風、走後門和黑市交易。一位政府顧問承認：「在今天，不靠賄賂官員要想辦成任何事幾乎是不可能的。」⁴⁵獲利的動機壓倒了其他一切考慮。一種貨物經常標四種價格：國家定價、市場價、議價和外賓價。飛機票和火車票不僅是難買，而且對不同的旅客標不同的價格。要求大學通過搞副業賺錢來補貼教育。有見識的人士擔心中國會變成「全民皆商」。社會上流行起一切「向錢看」的口號。佔便宜、坑蒙拐騙、經濟犯罪等情形到處蔓延；旅店、飯館和國家機關普遍出現了敲竹槓和亂收費的現象。

八十年代普遍的困難似乎降低了人們的自我價值觀，使他們變得脾氣暴躁、心情鬱悶。生活中充斥了冷漠、麻木和粗野。心理學家指出，這樣一種態度反映了人們徹底的沮喪和無奈，而不是他們喜歡粗暴。人們已經在為經濟麻煩苦苦掙扎，漲價給他們焦慮的心情增加了另一個重負。眼看著存款不斷由於漲價而消蝕，人們害怕1945-1949年間的那種價格飛漲會重演，因此拼命想辦法對付這種情形。

在1983年到1988年間，大部分城市工薪階層發現購買能力下降了100%甚至更多；生活水平急劇降低了。1988年在一家好飯店吃一頓飯花的錢是1983年的五倍。1956年，一個大學畢業生每月掙55元人民幣，能夠養活一家四口，但到1988年，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漲到133元，卻還無法維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他每天的工資只夠買兩隻西瓜！按黃金比價來算，1987年他的收入只值1979年的49%，1956年的15.7%。

1987年，一個普通工人家庭要把收入的35%到45%花在吃上，另外25%到35%花在其他生活必需品上。⁴⁶這樣就剩不下多少錢支付其

⁴⁴ *Beijing Review*, May 23-29, 1988, 10; June 20-26, 1988, 7-9.

⁴⁵ *Newsweek*, Hong Kong, June 6, 1988, 25-26.

⁴⁶ Feng Ching, "The Life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Beijing Review*, July 4-10, 1988, 21-26.

他所有的必要開銷了。挫折引起了焦慮、自私、不滿和粗野。社會道德降低到瓦解的地步。價值觀的混亂和管理的無序比比皆是。

放開價格為漲價提供了時機，但通貨膨脹的另外兩個基本原因也不應忽視。一是在1984–1988年間貨幣供應每年增長了20%，導致了紙幣發行的迅速增加。二是銀行儲蓄（3,075億元人民幣）和流動資金中的大量過剩現金——到1987年底約4,200億元人民幣。人們時常衝到銀行提錢，以便趕在新一輪漲價之前購買必需品。當太多的錢搶購太少的商品時，眾所周知的通貨膨脹便出現了。

公眾對漲價的不滿和抗議，促使政治局於1988年7月在北戴河召開了好幾次爭論激烈的會議。總書記趙紫陽繼續主張價格改革是經濟重組的核心，而總理李鵬和副總理姚依林則主張，即使不是停止，至少應放慢價格放開，理由是工資增長跟不上價格增長的步伐。最後，對公眾不滿的關注佔了上風。政府採取了控制信貸、緊縮銀根、約束基建和資本支出等措施，讓過熱的經濟冷卻下來。8月，中央宣佈，在1988年餘下的時間裏和1989年中，不再會有進一步的價格放開。人民歇了一口氣。

但是，有一批人似乎在這段動盪時日裏發跡起來。他們是那些嶄露頭角的個體企業家和個體戶，這些人大都從事手工藝品、小製作、家用器具維修和銷售、運輸和消費服務業等行業。由於他們勤勞、有眼光、善於判斷、勇於冒險和妥善經營而取得了成功——這在任何其他國家也是一樣的。在1988年6月，這些私營企業有225,000家，雇用360萬人。國家承認這些企業合法，理由是它們有助於生產力的發展。許多個體戶成為百萬富翁。遼寧瀋陽的一個農民組織了一個運輸隊，1987年賺了一百萬元人民幣。另一位企業家投資一百萬元建一座軋鋼廠，雇用的在冊員工有一百人。福州市一位31歲的年輕人經營一家柯達膠卷沖印店，控制有53.9萬美元的資產，住在一幢價值10.8萬美元、帶空調的房子裏。一位木雕「大王」雇用三千名工人，積聚了兩千萬美元的資產。北京的一位摩托車頭盔製造商經營極其成功，以致一家外國公司主動提出與他合股，支付他82,000美元的年薪。⁴⁷ 在

⁴⁷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9, 1988; Oct. 4, 1988. *Asiaweek*, Hong Kong, July 1, 1988, 19;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Sept. 8, 1986.

較小的規模上，許多沒甚麼文化的個體經營者——小店舖主、茶農、出租車主——一年掙三萬到十萬元，是教授和外科醫生年薪的十到三十倍。並不令人吃驚的是，一些最缺錢的人轉而犯罪，從事盜挖古墓的勾當，希望立即致富。⁴⁸

追求金錢的瘋狂是不是把中國推向了資本主義？大多數中國的理論家認為不，因為私營企業的總產值幾乎只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⁴⁹然而，企業精神卻抓住了中國人的心。因此，艾柯卡 (Lee Iacocca) 自傳的中譯本竟成了1987–1988年最暢銷的書，也就不讓人吃驚了，這本自傳宣揚的便是個人的創造力。⁵⁰

在這樣的氣氛中，思想意識的首要地位被削弱了，導致了方向的模糊和自我懷疑的興起。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尊重讓位於更加現實的評估。趙紫陽稱毛澤東的最後二十年是「失去的二十年」，鄧小平則在1988年6月勸告來訪的莫桑比克總統「不要搞社會主義」。⁵¹一位中國理論家發問：「誰知道馬克思主義究竟是甚麼呢？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超出馬克思想像的技術世界中。」⁵²另一位理論家稱，馬克思只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列寧「在他活著的時候沒有見到多少真正的社會主義」。還有一些人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相互借鑑對方的長處，中國轉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實際上意味著採納資本主義的一些機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完全正當的。⁵³

1988年的中國處在動盪之中。馬克思主義秩序已基本消逝了，但替代它的秩序尚未誕生。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達到17%，而通貨膨脹率達到26%，它正經歷著一個發展中國家必然經歷的日益強烈的痛苦。在這動盪不安的時日，經濟的活躍、意識形態的混亂、世風的日下和腐敗的普遍，構成了一幅極端矛盾的景象，在其中，一種新的秩序正在掙扎著浮現出來。

⁴⁸ *China Daily*, Beijing, June 28, 1988.

⁴⁹ *Beijing Review*, July 18–24, 1988, 12–13.

⁵⁰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Feb. 8, 1988, 30.

⁵¹ 希薩諾 (Joaquim Chissano) 總統。 *Asiaweek*, Hong Kong, July 1, 1988, 18.

⁵²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Feb. 8, 1988, 30.

⁵³ *Asiaweek*, July 1, 1988, 20–21.

參考書目

- Amnesty International, *China: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London, 1984).
- Benton, Gregor (ed.), *Wild Lillies, Poisonous Weeds: Dissident Voices from People's China* (Dover, N.H., 1982).
-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9).
- 陳希元 (音譯) : 〈從國際大循環到加快沿海經濟發展〉, 《中共研究》, 臺北, 第22卷第7期, 第88–94頁 (1988年7月)。
- Cohen, Robert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Human Rights Exception," *Human Rights Quarterly*, 9:447–549 (1987).
- Chao, Tzu-yang, "Advance Alo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a report delivered to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 of China, Oct. 25, 1987, *Beijing Review*, Nov. 9–15, 1987, 9–15.
- : "Chao on Coastal Areas' Development Strategy," *Beijing Review*, Feb. 8–14, 1988, 18–23.
- Chu, David S. K., *Sociology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79–1983* (Armonk, N.Y., 1984).
- Duke, Michael S., *Blooming and Contend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 (Bloomington, 1985).
- Edwards, R. Randle, Louis Henkin, and Andrew J. Nathan,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1986).
- Goldman, Merle, *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Mass., 1981).
- , Timothy Cheek, and Carol Lee Hamrin (eds.),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ship* (Cambridge, Mass., 1987).
- Goodman, David S. G., *Beijing's Street Voices: The Poetry and Politics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New York, 1981).
- Hamrin, Carol Lee, *China and the Future: Decision Making, Economic Planning,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 1987).
- , and Timothy Cheek (eds.),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Armonk, N.Y., 1986).
- Hayhoe, Ruth, and Marianne Bastid,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Armonk, N.Y., 1987).

- Kallgren, Joyce K., and Denis Fred Simar (eds.),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American Experience* (Berkeley, 1987).
- Kissinger, Henry A., "China Now Changing Rules and Ruling Party," *Los Angeles Times*, Oct. 25, 1987.
- Kinkley, Jeffrey C. (ed.),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Cambridge, Mass., 1985).
- Lampton, David M., Joyce A. Modancy, and Kristen M. Williams,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Washington, D.C., 1986).
- Link, Perry (ed.), *Roses and Thorns: 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 1979–80* (Berkeley, 1984).
- , *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1983).
- 劉賓雁：〈第二種忠誠〉，香港《爭鳴》雜誌，第10期，第48–61頁（1985年10月）。
- Louie, Kam, *Inheriting Tradi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Philosophers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6* (New York, 1986).
- Mosher, Steven W., *Journey to the Forbidden City* (New York, 1985).
- Nathan, Andrew J.,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1985).
- , R. Randle Edwards, and Louis Henkin,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1986).
- Orleans, Leo A.,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Policies, Issues, and Numbers* (Washington, D.C., 1988).
- Rozman, Gilbert,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 (Princeton, 1987).
- 薩空江（音譯）：〈評中共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新戰略〉，《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30期，第11頁（1988年5月）。
- Schram, Stuart R., "China After the 13th Congres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4:177–197 (June 1988).
- Seymour, James D., *China's Satellite Parties* (Armonk, N.Y., 1987).
- (ed.),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 1980).
- Shapiro, Judith, and Liang Heng, *Cold Winds, Warm Winds: Intellectual Life in*

China Today (Middletown, Conn., 1986).

Siu, Helen F., and Zelda Stem (eds.), *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New York, 1983).

Sullivan, Lawrence R., "Assault on the Reforms: Conservativ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1985-86," *The China Quarterly*, 114: 198-222 (June 1988).

Tung, Constantine, and Colin MacKerras (eds.), *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bany, N.Y., 1987).

王建：〈選擇正確的長期發展戰略——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經濟日報》，北京，1988年1月23日。

Wang, Ji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1996).

Wortzel, Larry M., *Class in China: Stratification in a Classless Society* (New York, 1987).

臺灣的「經濟奇迹」及與中國大陸 統一的前景

走上臺北的主幹道，你將看到摩托車、公共汽車和小轎車車水馬龍。街道兩邊則是酒店、現代住宅和高聳入雲的寫字樓。在辦公室裏，是一派成功企業的嘈雜而又不失條理的景象；電梯聲、空調聲、打字聲和電腦聲，時而夾雜著電話鈴聲和打國際長途時提高的噪音，組成了電子化的交響樂。在遠離臺北之喧囂的地方，農民自豪地展示他們的勞動果實；他們吃得好、穿得好，住在舒適的平房裏，顯得對生活很滿足。

這就是現代臺灣，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從一個農業社會變成了一個富強的工業社會。「日本第二」(Little Japan)的稱法激起了一種混雜的反應：表面上不高興，但心裏很驕傲。在東亞，就工業化、對外貿易和生活質量而言，臺灣確實是僅次於日本的。臺灣的成功，是它爭取生存、安全和國際紐帶的鬥爭中最重要武器。走近看一看臺灣的成就，將有助於解釋它目前的地位和未來的發展。

到1988年，臺灣已經享有了超過三十五年的和平、安定和持續的經濟增長。五十年代的年均增長率為7.3%，六十年代為9.1%，七十年代為接近10%。據《歐洲貨幣》(Euromoney)¹稱，在1974-1984年的十年中，臺灣享有世界第二高的增長率，僅次於新加坡。在八十年代，臺灣的發展速度甚至更加快了。1980年，臺灣的國民生產總產值達403億美元，人均產值達2,100美元，外匯儲備達74億美元。1984年，增長率達到了10.52%，國民生產總產值因此達到575億美元，人均產

¹ 一本歐洲的金融雜誌。

值達3,046美元，外貿總額達520億美元，² 外匯儲備達160億美元。1992年，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使國民總產值高達2,110億美元，人均產值10,215美元，外貿總額1,390億美元，外匯儲備820億美元，躍居世界外匯儲備榜首。令人震驚的是，只有區區兩千萬人的臺灣居然佔有了世界外匯儲備總量的10%。³ 臺灣的大部分外匯儲備來自於同美國的貿易順差——1986年為136億美元，1987年為190億美元，1988年為141億美元，1989年為130億美元。如果到2000年之前經濟增長率能一直保持在6.5%上，那麼，到時人均收入將達到15,000美元，外貿總額達到2,900億美元，這將使臺灣成為一個發達國家，位於全球十大貿易國之列。⁴

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財富並沒有集中到少數人手裏，而是由大多數人分享，充分實現了「均富」的古代理想。1952年，受薪階層中工資最高的20%與最低的20%之間收入的比例為15：1，但1964年只有5.33：1了，到1987年更降至4.69：1，比美國的工資差別還要小。⁵ 電視機、雪櫃、洗衣機非常普遍；而失業率在1988年時只有1.69%。臺灣的平均年齡男子為71歲，婦女為76歲；卡路里的日攝入量為2,845，蛋白質的攝入為80克，均超過了國際標準。通貨膨脹率保持在較低水平，1988年僅1.1%。同時保持著高速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財富的平均分配，這是不同尋常的，可以說，臺灣享受著中國歷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臺灣經濟成功的原因

經濟戰略 臺灣的經濟戰略是優先發展農業，其次是輕工業，

² 三百億美元的出口和220億美元的進口。

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Los Angeles Times*, 1988年1月4日和3月7日報道；*The Free China Journal*, Taipei, Feb. 19 and 23, 1993。

⁴ *The Free China Journal*, Taipei, March 24, 1986.

⁵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editorial, July 1980. 在美國，工資差別比例是9比1，墨西哥是20比1。*The Free China Journal*, Taipei, August 11, 1988。

再次是重工業。從1949年到1960年，政策的重點指向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一開始是分作三個階段的土地改革運動，隨後是提高農業產量的勞力與技術革新。政府還採取了一些措施，擴大物質和社會基礎，穩定物價，改革外匯體制，發展進口替代型輕工業。

狹小而資源貧瘠的臺灣別無選擇，只有依靠貿易。經濟規劃者認識到這一點，在六十年代強調工業化和出口。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來增加耐用消費品（輕工業）的產量，鼓勵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組裝產業，使農業生產多元化以利於出口。電子、合成纖維、塑料等工業迅速發展並推進世界市場。臺灣產品因勞動力價格低廉和高度的質量控制而在國外市場上富有競爭力。

七十年代，政策重點轉向了發展尖端工業和重工業，並擴展基本建設。1973年開始了十大建設（其中七項與基礎建設相關），耗資七十億美元：(1) 稱為「中山高速公路」的南北快速幹道，(2) 以蔣中正名字命名的臺北郊外桃園國際機場，(3) 西線鐵路電氣化，(4) 北回鐵路，(5) 臺中港，(6) 蘇澳港，(7) 在臺灣島北端的金山附近，建造配備兩套機組的核電站，(8) 起名為「中國鋼鐵公司」的現代鋼鐵廠，(9) 大型高雄造船廠——中國船舶建設公司，(10) 一個石油化工基地。最後三個工程位於高雄或高雄附近，到1979年，高雄改設為與臺北一樣的特轄市。

隨著這十項建設在1979年竣工，臺灣展現出「富裕發展中國家」的面貌。這些建設向經濟注入了大量的資本，緩解了1974-75年間的衰退。此外，大批參與這些工程的經濟設計師、工程師和技術員獲得了寶貴的經驗；無數工人在其中得到了培養，對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建設一個現代社會的能力有了一種全新的信心。

為了充分利用這些新的技能，進一步使臺灣島現代化，政府立即發起了十二項重點工程，著重建設技術型和資本密集型工業。這些工程包括擴建鋼鐵廠，增添核電廠，修築新的跨島高速公路，完成臺中港建設和環島鐵路系統，延伸快車道，改進區域灌溉系統，興建大型海堤，提高農業機械化，興建新的城鎮、文化中心和住宅房。隨著這些耗資57.5億美元的工程勝利竣工，臺灣成為新興發達地區之一。

1985年，政府開展了十四項重點工程以擴大經濟基礎，預計投入

資金200億美元。這些工程主要由基礎建設和改善現有結構組成，包括中國鋼鐵公司分三階段的擴建，修築新的鐵路，臺北市地下快速交通網絡，電信設備的現代化，開發四大國家公園，增添防洪工程、大壩和垃圾處理場，開發石油和海上資源，保護自然生態。項目預定的完成日期是1990–91年。

現代化的手段 現代化需要資金、優秀的人才和科學的管理。雖然政府和島內私人投資，構成了重要的資本來源，但外國投資和海外華人(新加坡、香港、美國等地的華裔人士)投資也很大，這要歸功於臺灣良好的投資環境。1960年的《鼓勵投資法》規定了資本密集型和高科技工業可蠲免五年的所得稅，而且在免稅期之後所得稅的最高限額為25%，另外還提供了其他一些特權，如免交出口稅、關稅、營業稅等等。1979年，這項法令又作了修改，進一步提供了稅務信貸(tax credit)以吸引外國投資，來自島外的大量投資繼續增長。

六十年代三個出口加工區——兩個在高雄地區，一個在台中附近——的建立，也通過簡化關稅程序和出口管理而鼓勵了外來投資。到1974年，在出口區291個項目上的投資總額達1.56755億美元，出口總額達5.11322億美元，保持了兩億美元的順差。

引進來自島外的新生產技術，也在經濟的迅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技術合作法》，1952年到1974年間達成了總計837項有關技術合作的民間協議。日本遙遙領先，參與了615項，美國其次，151項，歐洲57項，其他國家14項。⁶

臺灣卓越的教育體制提供了有利於投資和現代化的合格人才。所有人都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到1977–78年度，99.6%的學齡兒童都上了小學；50.9%的15到17歲少年都在上高中；25.2%的18到21歲的青年

⁶ *A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mpil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1975. (Taipei, 1975), 79–80, 96.

就讀於101所大學院校。此外，臺灣還派了一大批留學生前往美國深造。⁷ 因此，島內並不缺乏訓練有素的人才。

充足的動力和優惠政策、訓練有素的人才和廉價的勞動力，促使外國和海外華人的投資迅速增長，從五十年代的每年幾百萬美元增長到1978年的2.13億美元。在二十五年裏，這些投資的總額達19.2億美元——其中31%來自海外華人(5.95億美元)，30%來自美國(5.86億美元)，17%來自日本(3.21億美元)，12%來自歐洲(2.27億美元)。較合意的投資項目是電子和電動產品(6.33億美元)和化工產品(2.91億美元)，其次是服務業、機械和工具、金屬產品和紡織品。

1979年1月1日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沒有引起對臺灣經濟發展和外國投資的多大影響。1979年的國民生產總產值增長了20%，外貿增長了31%，外國投資增長了50%。更引人注目的是，通過香港和日本轉口的與中國大陸的非正式貿易在1979年達到了1億美元，1988年達到了27億美元。⁸ 1987年，臺灣的對外貿易排名亞洲第二，世界第十四。

迅速的工業化引起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環境和社會問題，包括交通、污染、工業垃圾、通貨膨脹、少年犯罪等，以及農村居民移居城市，使城市急劇膨脹而務農人口則持續減少。⁹ 一個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是高出生率，1980年達2.064%，造成了1990年時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564人，臺北市達每平方公里10,160人——高於紐約的9,050人和東京的5,388人。¹⁰ 政府歷年控制人口出生，最終在1990年將出

⁷ 在1979-80年度，有17,560名臺灣學生就讀於美國高校，僅次於伊朗的51,310留學生。其他一些在美留學人數較多的國家有：尼日利亞，16,360名；加拿大，15,130名；日本，12,260名；香港，9,900名。參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May 11, 1981, 14. 1985年，臺灣派出了22,590名學生留學美國高校，構成了數目最大的外國留學生團體。

⁸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view of Relations with Taiwan," Current Policy No. 190, June 11, 1980 (Washington, D.C.). *The Free China Journal*, March 30, 1989.

⁹ 農村人口從1953年佔總人口的51.9%下降到1986年的21.6%。*The Free China Journal*, May 12, 1986。

¹⁰ *The Free China Journal*, April 4, 1991.

生率降低到了所希望的1.241%。1993年，生活在臺灣的人口約有2,079萬。

社會變化 在迅速工業化的影響下，社會結構和家庭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中最顯著的是在最近二十年裏中產階級的迅速崛起，到1985年佔據了總人口的50%。他們是一些成分各異、流動性很大的人群，包括小商人、職業人士、技術和管理人員，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可觀的財富。比較突出的有律師、工程師、建築師、醫生、藥劑師、會計、公務員和商界經理等。他們參與政治，對公共事務大膽發表見解。他們通過消費享受生活，而不是像傳統的老一輩中國人那樣一意省錢。他們達到了愜意的生活狀態，因此害怕急劇的社會或政治變動。他們不喜歡共產主義。

家庭關係也發生了具有深遠意義的變化。父母在有關子女婚姻和職業選擇等事務上的權威急劇衰落了。子女選擇他們自己的配偶，或通過朋友或媒人的介紹結識對方；在事後才徵求父母的同意，而且一般也只是做做形式。父母也失去了要求子女繼承祖傳職業的傳統權力。大學教育和工業企業的眾多機會使年輕人比以往更獨立、更自信。他們通過努力工作而非家庭影響在社會上立足；接受調查的人中有74%表示對家庭繼承作為獲取社會承認的手段不感興趣。那些住在家裏的人也不像過去那樣自動將腰包上繳給父母，而那些住在外地的人只是象徵性地匯些錢給父母。傳統社會的價值觀迅速讓位於快速工業化所樹立的新觀念；個人自由和更快的社會流動性是這些變化的標記。¹¹

財富的迅速積累對經濟行為和社會倫理產生了負面影響。長年的貿易盈餘和通常較高的儲蓄率(34%)，使社會充斥著尋找用途的閒置資金。在股票、期貨、商品和房地產上的投機比比皆是，進一步哄擡了物價。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犯罪和欺詐伎倆到處肆虐，損害了社會

¹¹ 賴澤涵：〈社會變遷中的家庭制度〉，《海外學人》，台北，1985年1月31日，第11-15頁。

的道德。其他一些暴發戶行為有肆意揮霍、過度享樂和沉湎於舉辦選美比賽。¹²

當一個社會中舊的價值觀發生改變之時，就需要有認同和保證。美國政治漫畫家盧里 (Ranan R. Lurie) 應邀創作一個臺灣中國人典型的卡通造型。1985年12月，著名的「李表弟」誕生了——這是一個身穿功夫衫的小伙子，長下巴，大耳朵，粗眉毛，一頭蓬亂的黑頭髮，渾身散發著決心、力量和活力。政府當局覺得這是代表臺灣積極形象的造型，表示很滿意。

蔣經國在領導臺灣經濟發展和應付美國與北京和解所引起的危急局勢中，功不可沒。他是一位能幹的行政領袖，周圍聚集著經濟、科學和管理各方面的專家。他熱切關心經濟事務和人民的生計。他在1973年擔任行政院長時發起了十大現代化建設，後來又發起了十二項更大的重點建設。1975年蔣中正去世時，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蔣經國則當選為國民黨主席。嚴家淦在1978年5月任期結束，六十八歲的蔣經國在國民大會上幾乎以全票當選為任期六年的總統。

蔣經國對父親保持著極端的孝順，但父子倆在受業、觀念、脾氣和生活方式上都迥然相異。老蔣的性格較刻板、嚴厲、冷淡，關心軍事；而小蔣較和善可親，關心經濟。蔣經國經常走訪農民、士兵和醫院的病人，他很平等自在地與知識分子、藝術家、作家和壘球手交往。他這樣做頗具「親民」的古風。臺灣人和在臺灣的大陸人都一樣喜歡他，因為他象徵著團結、經濟發展和民生的改善。

蔣經國統治的特點是政治革新、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繁榮，以及整軍備武。他相信個人英雄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敦促所有人把他們最大的力量貢獻給建設美好的未來。他特別關注培養年輕人的才能，促進臺灣本地人融入政府主流。副總統(謝東閔)、臺灣省長、臺

¹² 1988年，「中華民國小姐」大賽在二十四年後第一次恢復，設冠軍獎35萬美元；1988年5月舉辦了「寶島小姐」大賽，冠軍獎兩萬美元；第三十七屆「環球小姐」大賽在臺灣舉辦，冠軍獎25萬美元。臺灣舉辦人為佈置決賽晚會耗費了420萬美元。《The Free China Journal》，April 11, May 9 and 16, 1988。

北市長、多名內閣閣員、大批立法委員和議會議員都是臺灣人。蔣經國的統治表現出越來越強的自由主義，但他頑固地拒絕放棄國民黨對整個中國的統治權，拒絕與北京談判(除非它放棄共產主義)；他也不容忍臺灣獨立運動，不與蘇聯談判，不允許在臺灣搞共產主義宣傳，或攻擊國民黨和三民主義。

蔣經國(1910–1988年)的遺產 蔣經國總統在1984年當選第二任總統，以臺灣出生的農業經濟專家李登輝博士為副總統。雖然蔣經國繼續倡導大型的基本建設(如十四項重點建設)，以鞏固臺灣的經濟基礎，但他年事漸高，糖尿病越來越影響他的健康，因此他越來越多地專注於有關國民黨和臺灣前途的較大和較基本的問題。

到1986–87年，國際形勢和島內激烈的社會變化促使他相信，只有通過政治開禁和加強法治，臺灣才能發展成真正的民主制度，具備經濟繁榮、政治成熟和社會穩定的特徵。他所想像的新秩序應該融西方民主制度的特性與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遺產於一體，造就出一種獨特的政體，這種政體將可充當替代中國大陸之生活方式的樣板。

蔣經國的思維無疑受過去幾年國外和臺灣主要發展趨勢的影響。民主化的浪潮已席捲了好幾個亞洲國家。在菲律賓，人民的力量已經在1986年推翻了馬科斯(Marcos)政權；在南韓，反對全斗煥總統獨裁統治的抗議持續不斷。在中國大陸，學生在1985–86年間抗議示威，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化。蔣經國想要通過採取主動邁向自由化來使臺灣免受類似情形的折磨。

島內迅速改變的社會狀況，使蔣經國關注起新興中產階級日益高漲的抱負。中產階級在經濟上很富裕，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會上非常活躍，政治意識強烈。他們把參與政治看作是現代公民資格的組成部分，毫不猶豫地在諸如人權、經濟犯罪、出版自由、政治多元化、空氣污染和交通堵塞等問題上暢所欲言。國民黨的地位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國民黨最初創立時是一個志在推翻滿清王朝、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的政黨，後來逐漸成為壓倒一切的力量，成為訓政時期(1928–48年)的政府，黨的總裁行使最高統治權。總裁的話就是法律，通過政令進行統治的方式習以為常。但現在，時代改變了；人治

將必須被法治替代。這種結構必須向民主立憲制演進。對臺灣的民主進行制度化並使之擺脫人為因素的時機已經來臨了。

在國民黨黨內，為打破元老對黨的控制，似乎也必須進行內部的民主化和改組。黨內職務必須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任期應該固定；黨綱的關鍵部分，應該像在任何民主社會中一樣，在全國性會議上由選舉產生的代表同意。國民黨內部的公眾意識和開明因素，有利於把國民黨逐漸從一個革命政黨改造成一個正規的政黨——準備放棄權力，如果當真的得不到民眾支持時，願意接受反對黨的地位。¹³

蔣經國總統留意了這些意見，轉而相信，讓人民、政府和政黨擔負起民主政治的更大責任的時刻已經到了。他採取主動行動，為民主立憲制度奠定基礎，這個制度將集中體現法治、和平變革、社會穩定和國民黨的更新。他知道，只有他這個最後一位至高無上、充滿魅力的領袖，才能實施這些根本性的改變，啟動一個無異於爬坡的進程——這個進程將非常吃力，耗費時日，但卻也是振奮人心的。這就是蔣經國真正的貢獻。他自願放棄了蔣氏家族對國民黨的控制，放鬆了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從而為法律和民主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為了實施自己的鴻圖大計，蔣經國於1986年3月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挑選十二人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就下列六個問題進行研究並提交報告：(1) 終止使戒嚴法得以成立的《緊急狀態令》，(2) 使成立新的政黨合法化，(3) 加強地方自治，(4) 實行真正的議會制度，(5) 國民黨內部的改革，(6) 世風日下和犯罪率上升。經過對這些問題的仔細討論，最終作出了一些決定：終止實行了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法(1987年7月15日)，承認「反對派」的合法地位，允許成立新的政黨，允許臺灣居民前往大陸探親(1987年11月2日)。

事實上，在這之前，政黨已經「非法地」存在了；現在，1986年9月28日，六個政黨登記取得合法地位，其中最大的就是民主進步黨(民進黨)。在1986年12月的選舉中，民進黨以18.9%的支持率獲得了

¹³ 國民黨副秘書長馬英九博士的觀點。 *Free China Review*, editorial, March 1988; Alexander Ya-li Lu, "Democratic Values Win Another Round," *ibid.*, October 1987, 8-9; Wei Tsai, "Transformations in the Body Politics," *ibid.*, 14-15.

在國民大會中的十一個席位，以22.17%的支持率在立法院中獲得了十二個席位¹⁴——對一個反對黨來說，這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成果。

蔣經國的另一大貢獻，是他持之以恆地向黨和政府輸入新鮮血液。大多數新黨員都是受過良好教育，且相對年輕——他們擁有國外尤其是美國著名大學的高級學位。¹⁵他們對營造臺灣更開明的氣氛作出了巨大貢獻。確實，國民黨第三、第四代領導人與他們的前輩信仰大不相同。他們中許多是在臺灣出生的，這表明了一種「還政於當地人」的趨向。

1988年元旦過後，蔣經國的健康急劇惡化，於1月13日去世。島內沉浸在重大失落感中，因為他是一位倍受愛戴的領袖。幾小時後，副總統李登輝嚴格按照憲法程序宣誓就任新總統。權力交接非常順利、和平、迅捷；沒有任何接班危機。

李登輝時期 李登輝總統在就任總統時年屆65歲。他是一位學者型的政治家，擁有康乃爾大學的農業經濟博士學位。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眼界開闊，品性純正，行政經驗豐富，曾擔任過臺北市長（1978–81年）、臺灣省長（1981–84年）和副總統（1984–88年）。他是新一代來自基層的領導人的象徵，不依靠任何家族庇蔭，而是憑藉努力工作、管理才能和政治常識上升到最頂層。他發誓要繼續推進前任的未竟之業，特別是在國民黨領導層的本土化、更大力度向中國大陸開放和增進民主立憲三個方面。他的任期表現出高度的務實性。

在1988年7月的國民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李登輝獲確認為國民黨主席，許多臺灣出生的黨員提升到領導崗位。三十一人組成的中常委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臺灣人佔多數（十六人）的情形。在隨後的

¹⁴ *The Free China Journal*, Taipei, Feb. 21, 1987; Peter Chang, "Party Politics Re-defined," 對國民黨副秘書長馬英九博士的採訪,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KMT, *Free China Review*, Oct. 1987, 16–17.

¹⁵ 稍稍提幾個人：連戰，芝加哥大學博士；錢復，耶魯大學博士；馬英九，哈佛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魏鏞，斯坦福大學博士；宋楚瑜，喬治敦大學博士；邵玉銘，芝加哥大學博士。

內閣改組中，十五名新閣員有八人是臺灣人，十三人在國外獲得過高級學位，另兩人擁有臺灣大學的專業學位。¹⁶ 這個內閣無疑是世界上學歷最高的內閣。

國民黨十三大通過了幾項關於臺灣與大陸之間人員接觸的措施，規定：

1. 與大陸開展間接貿易及在大陸投資，這將使臺灣的工業部門確保從大陸獲得原材料，並在大陸重新安置過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2. 臺灣記者經委派自由前往大陸採訪。
3. 允許生活在國外的大陸知識分子和逃避共產主義及追求學術自由的學者訪問臺灣。
4. 允許大陸居民探訪得病的臺灣親戚，或出席在臺灣舉行的葬禮。
5. 文化和體育交流。
6. 設立專門的政府機關負責與大陸的關係，並確保臺灣的安全和社會穩定不受損害。¹⁷

李登輝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推進民主立憲，堅定不移地履行他實行政治多元化和政黨政治的承諾。他清楚地看到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變化——富足、高識字率、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民間組織和工會的數目逐漸增多，這些已造就了一種「參政文化」，把臺灣變成了一個「有追求的公民社會」。

反對派團體，即所謂的「黨外」團體，尤其是民進黨，鼓吹更大的參政程度，要求清除阻止真正民主立憲的一切障礙。他們特別抨擊三個中央代議機構中不公正的代表席位——國民大會、立法院和監察院中的委員大部分是1947年在大陸選舉產生的，經過五十年代初大法官

¹⁶ *The Free China Journal*, July 25, 1988。他們中十人擁有博士學位，一人在美國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另兩人分別獲得西德和日本大學的碩士學位。還有兩人分別在臺灣的大學獲得碩士和法學學士學位。

¹⁷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3, 1988; *The Free China Journal*, July 18, 1988.

委員會的憲法解釋，他們得以不通過再次競選即保留席位。在這四十年裏，他們既不代表臺灣選民的利益和意見，也不代表大陸人的輿情。雖然自1969年起政府已經舉行過補選以增加當地代表在這些機構中的席位，但時至八十年代初，國民大會一千名代表中的九百名和立法院三百名代表委員中的兩百名，仍然是在大陸選出的老代表或老委員。這些人年齡太大了，難以出席正規的辯論和討論會議，他們唯一的作用是在投票表決的最後關頭露面。因此，黨外團體諷刺他們是「投票機器」，並爭辯說，只要他們繼續掌權，就不會有動搖國民黨統治的真實可能性。因為，國民大會是作為選舉團推選總統，修改憲法，而總統則任命省長和臺北及高雄兩大城市的市長。¹⁸

1989年2月，李登輝總統建議讓老代表和老委員逐步退休，並逐步增選新成員。他的計劃號召將三個機構的總席位削減到579個，其中國民大會375個，立法院150個，監察院54個——全部規定在一段時間內完成。例如，國民大會分給新代表的席位將從84個增加到1992年的230個，再在1998年增加到375個；立法院的新委員指標將從98個增加到1989年12月的130個，再在1992年增加到150個；監察院的54個席位將在1992年全由新委員充任。¹⁹

1991年6月，大法官委員會規定，三個機構中所有在大陸選出的成員，必須於1991年12月31日前退休。1991年12月21日，舉行了自1949年以來著名的第一次大選。國民黨在競選綱領中提倡實行憲法改革，以及最終與大陸統一。民進黨主張臺灣獨立，以「臺灣共和國」的名稱取代「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這樣一個大膽的綱領在民進黨一方是一種故意的冒險，但其效果適得其反。北京不斷警告說，如果臺灣宣佈獨立，它將發動進攻，國民黨領導層也譴責台獨運動是非法

¹⁸ Yangsun Chou and Andrew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Occasional Papers / 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3, 1987 (80):21–22.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¹⁹ Wu Wen-cheng and Chen I-hsiu, "Entering the Age of Party Politics," *Free China Review*, April 1989, 52–57; Chen Wen-tsung and Richard R. Vuylstek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OC," *Free China Review*, March 1989, 46–56.

的。許多選民顯然在意這些警告，他們趨向於國民黨倡導的較溫和的方針。國民黨贏得了71%的選票，在325席的國民大會中獲得了254個席位，而民進黨只得到24%的選票和66個席位——大大少於1989年贏得的30%的選票。一些零星的小黨贏得了五個席位。

加上1986年選出的78個代表，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中確保了79%的席位，超過了在第二年通過憲法修正案所需的75%的多數票。此外，根據給「全國」和「海外華人」留設席位的特殊比例公式，國民黨在前一類上又多得了60個席位，在後一類上多得了15個席位，而民進黨只分別獲得了20個和5個席位。通過這些選舉，三個代議機構中臺灣出生的成員成為了多數，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大陸人的後裔。

在1992年12月19日的立法院選舉中，民進黨顯得比以前更強大、信譽更高了，它獲得了31%的選票，相比之下國民黨僅獲得53%的選票。雖然國民黨仍控制著103席的多數——80個地區席位、19個全國席位和4個海外華人席位——但國民黨總體的代表率已從74%降到了63%，而民進黨從14.4%上升到了31.1%。因此，臺灣似乎正在向制度化的兩黨政治體制前進，民進黨將在其中扮演「反對黨」的角色。在1980年到1989年間的所有選舉中，國民黨失去了14.4%的選票，而民進黨則獲得了14.2%的選票，從這個事實來看，民進黨很有可能在十到十五年內成為執政黨。²⁰

新國民大會和新立法院的選舉，標誌著臺灣向民主立憲邁出了一大步。然而，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臺灣省省長和臺北、高雄兩市市長仍然不是公選產生的；總統也非公選，而是由國民大會推選。要讓一個真正的民主立憲制度運作起來，這些要職就必須是公選產生。此外，三大電視網絡必須擺脫政府的控制，還應增添一些為公眾所用的網絡和頻道。臺灣的民主化可以激發大陸的民主激情，迫使那裏的政府向政治開禁邁進。

²⁰ Zhou Xiaomeng, "On the Road Toward Democracy: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Papers of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Vol. 3, No. 10 (Oct. 1992): 14;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2, 1991; *Los Angeles Times*, Dec. 21, 1991.

臺灣對島內的「經濟奇跡」和政治民主化非常自豪，但更自豪的是充當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者的角色。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著三十多萬件中國繪畫、書法、陶瓷、玉器、青銅器和其他一些來自以前皇室收藏的無價珍品。1987年10月，中正公園新建成了國家大劇院和交響樂劇院，那裏頻頻上演中國戲劇和西洋交響樂及室內音樂，極大地豐富了臺灣的文化生活。臺灣人公開宣稱，雖然他們的本島很小，但它充滿經濟活力和輝煌的文化，有著成為「明日之大國」的潛力。

臺灣決心創造一種以自由企業和三民主義為基礎的現代發展模式，使之成為大陸制度的替代品。在大陸，人們密切地關注著臺灣的民主化。臺灣希望，北京將最終承認臺灣模式是通向政治自由化的道路。

統一的前景

中國的統一是國共兩黨的共同願望。臺灣公開表達關心大陸人民的福祉，而內心讚賞臺灣經濟成就的大陸人也為數不少。北京不再談論解放臺灣，而是改稱讓臺灣回歸祖國。臺灣也不再談論光復大陸，轉而宣稱要完成把全中國統一在孫中山三民主義之下的目標。

北京把統一中國看作是八十年代的頭等大事。為了這個目標，北京提出了以三條原則為基礎的統一方案。臺灣應(1)放棄聲稱是全中國合法政府的一切主張；(2)保持目前的經濟和社會制度；(3)保持某種程度的自治，包括維持一支軍隊。為了開啟和解之門，北京於1979年元旦提議與臺灣建立郵政、商務和航運航空關係。在1981年10月1日國慶節，北京又提出了九點建議，提議雙方的統治政黨舉行談判。實際上，北京要求國民黨為了統一大業放棄事實上的獨立和堅持代表全中國的主張，停止在國際政治中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存在，接受與中國其他省份同級的自治特區之地位。

蔣經國總統堅決拒絕和談提議，視之為「笑臉外交」，是中共變相的統戰，旨在麻痹臺灣的警惕性。蔣經國稱，如果北京放棄共產主義，贊成自由企業和三民主義，合作是有可能的。至於目前，臺灣將採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國民黨指出，1924-27年間和

1937-41年間兩次國共合作的經驗已經表明，與共產黨的合作是徒勞無功的。北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目前的形勢更加惡化，這些原則使國民黨不可能真正地參與聯合政府。臺灣也拒絕北京實行「三通」(通郵、通商、通航)「四流」(相互探親、旅遊、學術文化和體育交流)的號召。

在1984年，中國成功地與英國達成1997年香港回歸協議以後，鄧小平自豪地宣佈，他的「一國兩制」理論是統一的途徑。正如中國將允許香港在1997年以後的五十年裏保持其社會經濟制度一樣，中國也將允許臺灣在與大陸統一後保持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制度，只要臺灣接受服從北京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地位。

臺灣覺得這樣一種方式非常不適，而且覺得將臺灣等同於香港的想法也是完全不切實際。臺灣人堅稱，香港和臺灣相對於中國的地位截然不同。首先，英國無意為香港而戰，故不具備討價還價的任何力量。第二，香港沒有自己的軍隊，且靠大陸提供食物和淡水。相反，臺灣人民政治上積極主動，食物能夠自給自足，並且渴望保持他們的生活方式。臺灣擁有一支訓練有素的現代軍隊，時刻準備且有能力抵禦任何入侵者。此外，臺灣受1979年《美臺關係法》的「保護」，根據這項法令，美國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大陸對臺灣的任何入侵都可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和安全的威脅，並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

最根本的是，臺灣領導人把三民主義等同於林肯的「民有、民佔、民享」的理想。他們想讓中國人民把臺灣看作是共產主義的替代品，接受三民主義為統一的基礎。因此，「一國兩制」的構想完全不能為臺灣接受。

臺灣的朋友和島內的開明人士一直在敦促對大陸採取更靈活的政策，他們稱「三不政策」消極、自我限制、缺乏主動。李登輝總統把政治現實主義當作是他的執政期的基石，贊成採取一種靈活務實的外交。在1988年7月的國民黨十三大上，他要求全體黨員「以更堅強的決心、更強的務實精神、更大的靈活性和更開闊的眼界，努力開展主要基於客觀關係的外交政策」。李登輝是一位講究實際的政治家，總是注重實質而看輕言辭。1989年3月他在訪問新加坡時被當地報紙稱為「來

自臺灣的總統]而不是臺灣的「中華民國總統」。他決定不作抗議，解釋說：「我們沒有必要太在意名稱。如果我們老是為這些小問題操心的話，就沒有辦法打破]臺灣的孤立局面。1989年5月，他派財政部長郭婉容博士以「中國臺北」的名義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他在6月3日對此作解釋說：「中華民國外交政策的最終目標是捍衛國家主權的完整。我們有勇氣面對這樣的現實：目前我們沒有能力對大陸行使有效的管轄。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自我膨脹和自我束縛，才能提出與變化的時代和環境相對稱的務實方案。」²¹

李登輝的「務實外交」促使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放棄了自稱是全中國合法政府的主張。它不再宣稱「只有一個中國，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是中國」。它現實地承認，中華民國只管轄臺灣、澎湖列島、金門、馬祖、東沙群島、南沙群島及周圍小島。因此，存在著國民黨控制的「臺灣地區」和共產黨控制的「大陸地區」。1991年4月臺灣終止了已維持四十年的「全民動員剿共戡亂時期」，此時臺灣不再把北京看作是「非法叛亂者」了。由此，臺灣的大陸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對抗和冷戰言辭轉向了和平競爭和培植相互信任。

李登輝拒絕北京的「一國兩制」綱領，認為它把臺灣貶低到了一個省級地位。但是，如果北京同意(1)實行政治民主和自由經濟政策，(2)把臺灣看作是對等的政治實體，(3)取消在臺灣海峽使用武力，(4)不再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中封鎖或孤立臺灣，李登輝將與北京談判。²²北京不會接受任何一個條件，它抨擊李登輝的「務實外交」是製造「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陰謀。臺灣建議說，對海峽兩岸形勢的比較現實的描述應該是：「一個國家，兩個地區，兩個政治實體」。

統一的進程將是漫長艱辛的，不能操之過急。因此，臺灣在1991年2月23日通過了《國統綱領》。這份綱領提出要爭取一個「民主、自由和公平繁榮」的統一的中國——這些條件北京是明顯地不會接受的。

²¹ Fredrick F. Chien, "A View from Taipei,"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92): 97–98.

²² Lee Teng-hui, "Opening a New Era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augural address by the eighth-term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1990, in *Creating the Future towards a New Era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aipei, 1992), 8.

但綱領沒有為這個目標設定時間表。這份文件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堅持和平統一並適當尊重臺灣人民的權利和利益。它建議分成三個階段，讓海峽兩岸自身適應於一個統一的框架。

第一階段鼓勵非官方的交往和交流，以及人員的接觸。第二階段旨在通過開放官方交流渠道建立相互信任和合作。臺灣將幫助大陸開發東南沿海地區，以便縮小生活水平的差距。雙方都將參與國際組織及舉行官方互訪。在第三階段，將建立一個商談國家統一的聯合磋商委員會，以籌備在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公正和軍隊國家化基礎上的國家統一大業。臺灣希望自己的「經濟奇跡」和政治民主化，不僅能夠成為大陸的靈感和抱負之源，而且將能推動大陸發生朝向最終統一的和平演變。²³

李登輝總統相信有可能在六到十年內實現統一，但臺灣的公眾輿論卻不那麼樂觀。只有10%的人堅決支持統一，5%到12%的人主張臺灣獨立，介於兩者之間不發表意見的大多數人則想要「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1992年4月的另一項調查表明，76.5%的臺灣人不急於統一，7.8%的人完全不理會統一的想。法。²⁴ 臺灣越來越民主，1992年的人均收入達到10,215美元，相比之下，大陸繼續實行列寧主義的專制統治，人均收入只有350美元。由此看來，兩者的差距大得難以彌合。還存在著擔心統一會是大魚吃小魚的潛在恐懼。國民黨和民進黨都認為，統一是一個應該「應付」但絕對不能很快「解決」的問題。²⁵

在達到和平統一之前，臺灣將繼續攀登民主立憲的更高臺階，改善生活質量和環境，開展一項為期六年、耗資3,030億美元的基礎結構發展項目，這個項目將使臺灣的國民生產總值到1996年再翻一番，人均收入從10,215美元增加到14,000美元。許多人相信，臺灣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的富足將有助於最終的統一。在此期間，臺灣將小心地捍衛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現狀，同時循序地推進三個階段的統一進程。

²³ Jason C. Hu, "Building Democracy for Unification," an address to the Los Angeles World's Affairs Council, Oct. 26, 1992; Lee, 126-27.

²⁴ Lee, 101; *The Free China Journal*, April 10, 1992.

²⁵ Zhou Xiaomeng, 7.

北京譏諷臺灣要求對等地位的主張，指出國民政府在1949年就丟失了對大陸的控制，因此也就喪失了代表中國的權利。北京政府得到全世界一百五十五個國家的承認，相比之下承認臺灣的只有二十九個（1993年）。臺灣的面積只有大陸的1/266，人口只有大陸1/55，它怎麼能稱是對等的政治實體呢？北京堅持臺灣是中國的一個自治省份，警告說如果臺灣宣佈獨立或與外國勾結，以分裂中國或「過分長久地」拖延統一，北京將發動軍事進攻。²⁶ 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在1992年11月宣佈，北京將進攻臺灣以阻止其獨立，為此將不惜付出自己經濟發展停滯的代價。²⁷

但是，北京歡迎民眾、經濟、商務和文化交流，1988年7月6日頒布了《鼓勵臺灣公司在大陸投資的規定》，對臺灣投資者提供貸款、關稅、稅收和其他的優惠條件。顯然，北京歡迎臺灣的投資、資本和技術經驗，為大陸的經濟發展提供資金並使之加速。1987年到1992年間，約五百萬臺灣居民訪問了大陸，每人平均在禮品、旅遊和住宿等上面花費了四千美元，向大陸市場注入了大約兩百億美元。由於大陸有廉價的勞動力、充足的原材料和土地，約有一萬家臺灣公司將它們的生產設備轉移到了大陸，投資額達一百億美元。²⁸ 臺灣轉口香港與大陸的間接貿易在1992年高達74億美元，1993年或許高達93億美元。

海峽兩岸都越來越感覺到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對大陸而言，臺灣的投資佔大陸國民生產總值中的86億美元，將人均收入提高了7.2美元。²⁹ 另一方面，當世界大部分地區發生經濟衰退的時候，對大陸的間接出口，幫助臺灣保持了1991年7.3%和1992年6.9%的經濟增長率。³⁰ 臺灣享受著對大陸持續的貿易順差——1988年17.6億，1989年23億，1990年25.1億，1991年35.4億，1992年51.6億。³¹ 人們對臺灣寄

²⁶ 中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的聲明，1992年12月9日。

²⁷ 轉引自*The Free China Journal*, Nov. 6, 1992。

²⁸ 臺北中國銀行數據，轉引自*The Free China Journal*, Nov. 27, 1992。

²⁹ *The Free China Journal*, Oct. 30, 1992.

³⁰ 同上註，1993年7月9日。

³¹ 香港政府統計數據。

予希望，貿易順差和中國巨大的市場將推動臺灣經濟出現「第二次奇蹟」，而經濟互惠也能有助於解決一些政治手段所無法解決的難題。

伴隨著經濟上越來越強的相互依賴，學術、科學、新聞、體育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加。比較重大的事件有：1992年10月，中國中央芭蕾舞劇院訪問臺灣；1992年11月，由九名北京經濟學家組成的代表團抵臺訪問；1993年4月，京劇大師梅蘭芳之子、京劇名角梅葆玖作為期兩週的演出。在臺灣方面，1992年6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訪問北京。

隨後，在1993年4月28-29日，人們期待已久的兩岸半官方會談在新加坡舉行，會談的一方是臺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會長辜振甫，另一方是大陸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前上海市市長汪道涵。會談設定為非政治會談，議題集中在一些經濟問題上，如保護臺灣在大陸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聯合打擊走私，相互遣送非法避難者和罪犯，解決捕魚糾紛，掛號信遺失賠償和聯合開發自然資源等。這次歷史性的會談提出了四份文件，並商定以後每年會晤四次。辜汪會談開始了經過四十年敵對後海峽兩岸之間比較密切的關係。這次會談的安排本身就表明了雙方務實的態度。³² 但是，真正的統一仍遙遙無期。

一百多年前，自強運動的領導者以追求「富強」作為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生存的關鍵。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生存需要國家獨立和統一、科學和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再後來，出現了對思想自由和解放個人創造精神的要求。³³ 人民的理想就是建立民主立憲制度。任何政府只要能滿足這些願望，就能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

在四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中國曾無數次地分分合合。假如歷史是有指導作用，而政治是追求最大可能性的藝術的話，那麼，任何人都無需對目前的困難灰心喪氣。中國人民的智慧將找到一條使全體中國人再次統一的道路。

³²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1993;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8 and 29, 1993.

³³ 邵玉銘：〈試論中共政權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功過〉，《海外學人》，第99期，第8頁（1980年）。

參考書目

- Bader, William, and Jeffrey T. Bergner (ed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 Decade of Implementation* (Indianapolis, 1989).
- Brzezinski, Zbigniew,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New York, 1983).
- Carnegie Council 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public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1992).
- Chang, King-yuh, *A Framework for China's Unification* (Taipei, 1987).
- (ed.), *ROC–US Relation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Practice and Prospects* (Taipei, 1988).
- Chang, Maria,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sian Studies Center, Claremont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1990.
- Chen, Wen-tsung, and Richard R. Vuylstek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OC," *Free China Review*, Taipei (March 1989): 46–56.
- Chiu, Hungdah,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the Prospect of Unification." Reprint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5—1991 (106).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Chou, Yangsun, and Andrew J.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Reprint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3—1987 (80).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Clough, Ralph, *Isl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8).
- Cohen, Marc J., *Taiwan at the Crossroad* (Washington, D.C., 1988).
- Cohen, Myron L.,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1976).
- Copper, John F., *A Quiet Revolu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anham, Md., 1988).
- , *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 (Boulder, 1989).
- , "Taiwan's Recent Elections: Fulfilling the Democratic Promise." Reprint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1990.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 *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 (Boulder, 1992).

- Chu, Yungdeh Richard (ed.), *China in Perspectives: Prospects of China's Reunification* (Hong Kong, 1987).
- Damrosch, Lori Fisch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fter Ten Years* (Baltimore, 1990).
- Faurot, Jeannette I. (ed.),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Bloomington, 1980).
- Gold, Thomas B.,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1986).
- Gregor, A. James, and Maria Hsia Chang,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Persuas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2:4 (1985):363–91.
- Ho, Samuel P. 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1978).
- Jing, Wei, "Overstretched: Taiwan's 'Elastic Diplomacy'," *Beijing Review*, April 3–9, 1989, 7.
- Knapp, Ronald G. (ed.), *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Honolulu, 1981).
- Kuo, Shirley W. Y., *The Taiw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Boulder, 1983).
- Lasater, Martin L., *Policy in Evolution: The U.S. Role in China's Reunification* (Boulder, 1989).
- Lee, Teng-hui, *Creating the Future: Towards a New Era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aipei, 1992).
-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of Technocracy,"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0, 1–35.
- Li, Dahong, "Mainland-Taiwan Economic Relations on the Rise," *Beijing Review*, April 3–9, 1989, 24–27.
- Li, Jiaquan, "More on Reunification of Taiwan with the Mainland," *Beijing Review*, Jan. 16–22, 1989, 26–30.
- , "Taiwan's New Mainland Policy Raises Concern," *Beijing Review*, May 22–28, 1989, 23–25.
- Long, Simon, *Taiwan: China's Last Frontier* (London, 1991).
- , "Taiwan's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2, 216–28.

- Myers, Ramon H. (ed.), *A Uniqu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tanford, 1989).
- (ed.),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Stanford, 1991).
- 彭懷恩：《臺灣政治變遷四十年》(臺北，1987年)。
- Political Trends in Taiwan since the Death of Chiang Ching-Kuo*.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1989.
- Schive, Chi, *The Foreign Fact: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1990).
- Senese, Donald J. and Diane D. Pikcunas, *Can the Two Chinas Become One?* (Washington, D.C., 1989).
- Silin, Robert H., *Leadership and Values: The Organization of Large-Scale Taiwanese Enterprises* (Cambridge, Mass., 1976).
- Sutter, Robert G., *Taiwan: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Lanham, Md., 1988).
- Tien, Hung-mao,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1987).
- Ts'ai Ling, and Ramon H. Myers, "Surviving the Rough-and-Tumble of Presidential Politics in an Emerging Democracy: The 1990 Elec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2, 123–48.
- Tsai, Wen-hui, "In Making China Modernized: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 Reprint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4 — 1993 (117).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Vogel, Ezra F., *The Four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1991).
- Wu, Wen-cheng, and Chen I-hsin, "Entering the Age of Party Politics," *Free China Review*, April 1989, 52–57.
- Wu, Yuan-li, *Becoming an Industrialized Nation: ROC Development on Taiwan* (New York, 1985).

第四十章

天安門廣場的武力鎮壓 1989年6月3-4日

1989年，蛇年。新年伊始，就出現了不祥的徵兆，預示中國行將爆發的動盪。國家面臨著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世風日下、普遍的腐敗、官員瀆職、少數特權階層與普通群眾之間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以及人們對共產主義信念的日趨淡薄。確實，這些現象在前幾年就已經存在（參見第三十八章），但潛在的不滿浮現到了表面，現在到達爆發的邊緣。全國許多地區充滿了沮喪和不安的情緒。

民主和自由化的力量不停地與壓制和專制的勢力發生衝突，或是公開或是隱蔽，但緊張局勢始終存在。鑒於國際政治中的兩大趨勢，這種衝突具有更深層的意義。這兩大趨勢是：在波蘭、匈牙利和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自由民主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而共產主義卻不斷退卻。即使在蘇聯，透明度和公開化也都正在改變共產主義的面貌。不穩定、動亂和妥協退讓似乎成了共產主義世界的特徵，一些政治學家預言，共產主義的滅亡是歷史的推動力。¹

1989年也是意義巨大的一年，因為這一年是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949年10月1日）四十周年，五四運動（1919年）七十周年，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兩百周年。任何一項紀念，都可能爆發要求民主的示威，喚醒那些兩年前曾經追求政治民主化但遭阻止的大學生。政府感到惶恐不

¹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9).

安，號召黨員和軍隊加倍警惕，防止動亂，嚴防波蘭式的團結工會運動在中國發生。

黑雲壓城

新年剛過，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便於1月6日向鄧小平發出一封公開信，呼籲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際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年之際實行大赦。方勵之特別提出釋放魏京生，此人是一名電工，1979年因宣揚民主為「第五個現代化」及警告說鄧小平有可能變成另一個毛澤東而被判處十五年監禁。方勵之的信得到了五十一名海外著名華人學者和三十九名中國主要知識分子的聯名簽署。被激怒的鄧小平和政府拒絕回應。

1989年2月下旬布殊 (George Bush) 總統訪問北京期間，民主事業遭遇挫折。按照列根總統前一年夏天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招待一批蘇聯異見人士的先例，布殊邀請四名主要的中國自由化分子於2月26日星期天出席國宴，這些客人包括方勵之及其夫人李淑嫻和另外三人，² 他們都是積極支持總書記趙紫陽的改革，嚴厲批評保守派領導人。大多數中國人把這個邀請看作是美國支持中國民主和自由化的公開表示。國家主席楊尚昆和總理李鵬威脅稱，如果方勵之夫婦出席的話，他們將不參加宴會。但是，他們最終接受了這樣的妥協：布殊總統將不走到方勵之夫婦桌前與他們乾杯。但即便是這樣安排，對中共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侮辱。在最後時刻，中國領導人改變了主意，派警察前往阻止方勵之夫婦出席宴會。布殊對這個意外一無所知，整個宴會期間一直以為客人中有方氏夫婦兩人。

政府的行為激怒了中國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等待機會發洩怒火，重新發起兩年前遭到阻止的民主示威。4月15日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胡耀邦在1987年1月因對待學生的態度溫和而被解職，他在許多人眼裏成為坦率和政治開明的象徵。學生們希望鄭重其事地悼念他，也計劃利用這個機會來堅持為他昭雪正名，

² 這三個人是馬列主義理論家蘇紹智、劇作家吳祖光和政治學家嚴家其。

並進而提出言論、集會和新聞自由及大力整治腐敗的要求。北京大學貼出了歌頌胡耀邦和嘲諷保守派領導人的標語：「不該死的死了，該死的還沒死」、「誠實的人去了，但虛偽的人還在」。

中共拒絕為胡耀邦正名，因為這樣做等於承認所有將他解職的人都有錯，包括鄧小平和其他強硬派分子。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靜坐，高呼「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打倒腐敗！」的口號。4月22日，三名學生做出諷刺政府的舉動，他們跪在人民大會堂前的臺階上，其中一人將一大卷寫著他們的要求的紙軸高高舉過頭頂，高喊：「這是向皇帝請願的方式。現在是甚麼時代？我們還必須用這種方式，這意味著我們沒有自由。」學生們紛紛罷課，在廣場上持續進行了六個星期的示威，喚起了各省大學生和北京及外省的工人、知識分子、新聞記者、教授、研究人員、音樂家、演員、普通市民，甚至一些黨員和軍人越來越強烈的聲援。到5月中旬，民主抗議的隊伍人數超過了一百萬，在其他二十三個城市也爆發了規模較小的示威。這百萬之眾已成為跨越階級的抗議巨浪，引起了國內外電視觀眾的關切注視。5月30日出現了對中國領導人的徹底侮辱。這一天，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樹起了一尊三十英尺高的民主女神像，塑像大致模仿了美國的自由女神像。這尊塑像安放在天安門廣場的北部，正對著故宮的大門，傲然注視著毛澤東的巨幅畫像。

黨的分裂

總書記趙紫陽與他的前任胡耀邦一樣，表現出對示威活動極度的寬容和對學生動機相當的同情。作為改革和現代化的倡導者，他希望把共產黨導引向更大程度的開放，逐步向政治自由化的方向轉變，然而不一定要搞資本主義的民主。他與總理李鵬和其他一些強硬派元老如陳雲、彭真和國家主席楊尚昆等人發生了衝突。趙紫陽受他在中國社科院的顧問和四個「智囊團」³的影響，希望把日益增長的學生力量

³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信託國際關係研究院。

拉攏過來，加強他對抗保守派的地位，並用來推進改革事業。另一方面，保守派曾在兩年前打贏了第一回合的對抗，說服鄧小平以錯誤對待學生示威的罪名將胡耀邦解職。現在，他們又策劃影射趙紫陽是示威活動的秘密保護人，試圖將他從總書記的職位上拉下來。這樣，示威學生就不知不覺地成了黨內激烈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強硬派把學生示威看作是鎮壓民主運動和阻撓經濟改革的良機。如果能巧妙地加劇學生與趙紫陽之間的衝突，將使強硬派起到一箭雙雕的效果。經濟專家陳雲和副總理姚依林暗中制定了一個計劃，據此，總理李鵬將對學生的要求採取斷然的不妥協立場，從而刺激學生變得更加好鬥。與此同時，趙紫陽將被指責是示威群眾的暗中支持者——黨內的叛徒。這樣學生們的日益傲慢無理以及趙紫陽對他們的同情，將逼使鄧小平發怒，促使他採取激烈的反應。那時鄧小平就會被操縱，從而一舉擊垮學生和趙紫陽，就像兩年前勸說他把胡耀邦趕下臺一樣。因此，成功的關鍵是激怒示威者和鄧小平，以便讓對峙升級到一定的程度，使軍事鎮壓能夠有充分的理由。⁴

4月24日，北京市委書記⁵在保守派元老的指使下向中央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戰報」。報告稱，根據學生的大字報、口號和國家安全局匯總的秘密報告，這場示威顯然已經醞釀了兩年，公開的目標就是否定社會主義事業，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政治局常委會和國家主席楊尚昆都同意，示威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次日，鄧小平宣佈，示威已演變成一場必須予以鎮壓的「陰謀」和「動亂」。在他的指示下，兩位曾與文革和1986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關係密切的黨內作家⁶為4月26日的《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標題是「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文章的實質是，政府正處在一場反對「動亂」的偉大政治鬥爭中，這場動亂的目的是根本否定黨的

⁴ 這些是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和前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主任蘇紹智的觀點，臺北《中央日報》1989年9月10日和香港《明報》1989年9月6日報道。

⁵ 李錫銘。

⁶ 陸仁和徐惟誠。

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文章警告說，向學生的要求讓步，將會把一個有希望的國家搞成一個毫無希望、動盪不安的國家。社論的內容電傳給了正在北朝鮮訪問的趙紫陽，並得到了他原則上的同意。

顯然，正如兩年前一樣，強硬派拉攏鄧小平到他們一邊。中共將對示威者採取更堅決的立場。李鵬拒不見學生領袖，從而失去了一個可在較早時緩和局勢並開展對話的時機。而當他最後在5月18日同意接見他們時，他又態度生硬地教訓學生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不留一點對話和交心的餘地。與此同時，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人江澤民解除了《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原因是他採取支持民主的立場。

4月29日趙紫陽出訪回國後，他在顧問⁷的建議下，批評4月26日的社論，極力肯定學生的行動是自發的、愛國的，並且與政府的反腐敗政策相一致。他試圖修改4月26日的社論，但未獲成功。隨後，5月4日，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趙紫陽在講話中暗示黨內存在分歧，但他明確表示，政府將採取「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立場，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強硬派怒不可遏，他們指責趙紫陽在一份事先沒有得到黨內同意的聲明中暴露領導集團的分歧。李鵬宣佈，趙紫陽的講話只代表他個人的見解，黨的觀點只能由鄧小平來代表。李鵬成功地挑起了鄧小平反對趙紫陽。

進一步的對抗出現在5月16日。當天，趙紫陽告訴來訪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自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以來，中共的所有重要的決定都必須得到鄧小平的同意，這即暗示是鄧小平而不是趙紫陽對一切關鍵的決定和錯誤負責。鄧小平和強硬派對趙紫陽向外賓透露「國家機密」惱火萬分。

在戈爾巴喬夫三天的訪問期間，上百萬人佔據天安門廣場，令中國領導人丟盡顏面。歡迎儀式不得不從廣場轉到機場進行。由於大批人群聚集在故宮進口處，戈爾巴喬夫參觀故宮的節目因而被取消，他和夫人賴莎(Raisa)向廣場中央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的計劃也不得不取消。他的新聞發佈會從人民大會堂改到了他下榻的釣魚臺國賓

⁷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和農村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

館。除了時間很短的一次以外，他喜歡的散步也因安全原因被迫取消。這些臨時的變動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中國領導人優柔寡斷，沒有能力控制局勢。這就迫使鄧小平愈發下定決心，等客人一走，就狠狠教訓這些年輕人。作為擴大的中國大家庭的家長，鄧小平也許感到，學生們對他的經濟改革帶來的所有好處，包括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和學生生活的改善忘恩負義。犯上不尊的代價將是毫不手軟的責罰。

強硬派堅持認為學生動亂的根源在中共黨內，正是趙紫陽及其前任胡耀邦對經濟的處理不當，才導致了高通貨膨脹、經濟失衡和混亂。也正是這兩人對學生的縱容態度和馬虎應付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只持續了二十天）和1986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才導致了目前的麻煩。進一步的證據表明，趙紫陽支持和煽動示威者，他公開同情示威學生和向他們洩漏重要情報。學生們經常在其他人之前獲悉政治局的決定。由於有趙紫陽及其自由派顧問的庇護，學生們原來已消沉的士氣受到激勵，他們的膽子越來越大。趙紫陽的兩名智囊⁸遭指控起草了措辭「極其激烈、極其惡毒」的「五·一七宣言」，在這份宣言中，他們公然宣稱：「由於獨裁者控制著無限制的權力，政府已經失去了它自己的責任和正常人的情感……雖然滿清王朝在七十六年前已經垮臺，但現在中國仍然存在著一個無名有實的皇帝，一個年邁昏庸的獨裁者……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下臺。」矛頭所指很明顯，鄧小平就是「老邁的獨裁者」。⁹一些示威者焚燒鄧小平的假人像，高呼「鄧小平下臺」、「李鵬下臺」和「趙紫陽萬歲」的口號。

事態的發展進一步使強硬派相信，趙紫陽及其智囊陰謀利用不受控制的學生力量來分裂黨。趙紫陽對示威者採取不同於鄧小平的方針，事實上在黨內樹立了另一個司令部，用另一種聲音混淆黨和人民

⁸ 嚴家其，政治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前所長；包遵信，哲學家，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⁹ 北京市長陳希同在1989年6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次會議上的講話，題目是「關於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報告」，*Beijing Review*, July 17-23, 1989, 12-13.

的視聽。除了這個嚴重的罪行外，趙紫陽還有其他一些錯誤，包括以前就指控的那些錯誤，如試圖反對4月26日社論；在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擅自發表聲明，向戈爾巴喬夫洩漏國家機密；允許他的兩個兒子投機經商、牟取暴利。曾經親自指定趙紫陽做接班人的鄧小平現在稱他是「叛徒」。分裂完全形成了，現在只剩下實施懲罰了。

5月17日前後，中共最高層召開了一次「戰備會議」，只有七、八個對黨和國家作出過重大貢獻的資格最老的黨內元老出席會議。¹⁰他們的用意是決定對示威和趙紫陽採取甚麼措施。他們把首要議題簡化為決定黨是不是應該在學生威脅面前退卻。隨著抗議者的隊伍越來越壯大並贏得公眾的廣泛支持，學生的威脅一天天加劇了。退卻意味著接受學生的民主和自由要求；不退卻則意味著強行鎮壓動亂。

這些元老輩的領導人處在沮喪的境地。天安門廣場上一百萬示威者日復一日地遊行、唱歌、喊口號、揮舞巨幅大旗的景象令他們感到無能為力。此外，其他二十三個城市也爆發了示威，呈現出一種無法控制的民眾起義的景象。這幾位元老經過分析後最終斷定，當前形勢是一場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戰爭。讓步將導致領導集團的垮臺，社會主義秩序被推翻，最終像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曾希望的那樣，出現資產階級政府統治的資本主義復辟。他們推論說，學生要求改變的願望是無法滿足的，而且會得寸進尺。到甚麼程度才會滿足？他們擔心，學生們不推翻共產黨和四項基本原則（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不會罷休的。也許是想讓所有在場的人感到恐懼，年屆85歲的老經濟專家陳雲作了一篇激動的發言：「我們經過了幾十年的奮力拼搏奪取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過程中，我們的千百萬革命英雄丟掉了生命。我們難道僅僅為了滿足學生就放棄這一切嗎？」與會者經表決，一致同意反對退卻，立即解除趙紫陽黨的總書記職務。¹¹

¹⁰ 這八個人是鄧小平、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家副主席王震、經濟專家陳雲、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也許還有經濟事務專家薄一波。

¹¹ 國家主席楊尚昆在1989年5月24日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顯然，這些元老們希望不惜一切代價保住他們的政治權力和經濟特權；只有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維持他們的特殊地位。殺一些示威者無關緊要，因為他們都是一些「反黨反革命分子」，被消滅是罪有應得。這麼做雖然存在著喪失旅遊收入、外國投資、貿易、信貸和貸款的威脅，但從保持共產黨領導地位延續下去的更廣泛角度來看，這些威脅也就無足輕重了。

鄧小平宣佈他不怕國內外輿論，也不怕任何對抗中的流血犧牲。5月19日他前往武漢，召集了一次軍委擴大會議，目的是為他的鎮壓政策爭取支持；並且，一旦北京局勢惡化，就可能在這裏設立「第二司令部」。據稱，鄧小平還作好了萬一所有手段都失敗，就秘密飛往國外的準備。在武漢，鄧小平得到了海軍、空軍和實際上所有軍區司令的支持。在得到這樣的穩固保證之後，他於5月19日晚下令李鵬總理宣佈在北京實施戒嚴令。不久，鄧小平還得到了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對他政策的支持。軍事鎮壓的序幕拉開了。

老人政治的心態

中共元老的心理在決策中起了關鍵的作用。他們是長征一代僅存的碩果，長年經歷了破壞、階級鬥爭、內戰、外戰、這種或那種沒完沒了的群眾運動。他們已對安定、安全，以及最重要的生存變得高度敏感。在長期的權力糾纏之中，他們接受這樣的單向思維：權力就是生命，沒有權力活着也沒有意義。他們相信，在任何鬥爭中，絕不容許有仁慈和人道。如果要生存就必須堅定、殘酷，甚至狠下心腸。還有就是，先下手為強。鄧小平曾滿不在乎地贊同這種觀念，他宣稱：「不管是誰，只要在政權鬥爭中獲勝，就可以坐上最高的位子。現在是這樣，過去也是這樣；中國是這樣，國外也是這樣。」¹² 由於黨內元老的性命、地位和特權，都依賴於社會主義秩序的延續，因此他們將不惜一切地去捍衛它。

¹² 轉引自Fox Butterfield, "Deng Is Said to Link Fear to Safety of Part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89, p. A4.

保守派領導人面對民眾對他們的年邁體弱、精力不濟和脫離主流社會的普遍批評，越發急於證明自己是有能力作出果斷的決策並採取有力的行動。然而，他們的不安全感和對變革的恐懼依然如故。正是在這樣一種混亂矛盾的心態下，在作判斷時傾向於反應過敏、衝動和輕率。

鎮壓政策根源於對學生的企圖有意或無意的誤解。學生們要求與政府一道採取反腐敗的措施，與政府領導人討論民主、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前景，這些東西是大多數現代文明國家中基本的權利。當政府拒絕傾聽他們的心聲時，受挫的學生叫喊要李鵬、鄧小平和楊尚昆下臺。但學生們既沒有方法也沒有力量趕他們下臺或推翻政府。學生們缺乏目標綱領、行動計劃，也缺少一個經驗豐富、魅力超群、能夠代表他們的意願並將各個零散團體團結起來的領袖。雖然廣場上的學生和廣場外的聲援者宣稱，政府如此腐敗、如此不負責任，已經喪失了進行統治的道德權威，但這樣一種看法，缺乏真正威脅的力量。決定採取武力鎮壓示威的政策，使領導者錯失了寶貴的機會，明智而負責地回應民眾的願望，並將人民巨大的能量引向它所希望達到的建設性目標。

在宣佈戒嚴令後，政府領導人便不再露面，一直到鎮壓之後才重出。但是，趙紫陽在5月19日作了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他去探望廣場上飢餓的絕食者，並為自己的姍姍來遲而道歉。稍後，他就遭到撤職。6月24日，江澤民被任命為新的總書記。

屠殺

從5月19日宣佈戒嚴令到6月4日的血腥鎮壓之間，有整整兩個星期，鄧小平和楊尚昆有足夠的時間精心策劃軍事行動。國家主席楊尚昆是史太林時期蘇聯培養的職業軍人，他是一個大權在握的軍方人物，在軍隊指揮序列中僅次於鄧小平。楊尚昆家裏有人被安插在重要的軍事崗位上，組成了中國人戲稱的「楊家將」。楊尚昆本人是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同父異母兄弟楊白冰是總政治部主任。鄧小平本人的軍戎生涯和政治鎮壓經驗足以使他從容應付時局。他在

1948年後期曾在內戰中參與指揮淮海戰役，用坦克和大炮消滅國民政府敵軍。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期間，鄧小平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負責迫害五十多萬知識分子，他辦事認真、一絲不苟，贏得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

鄧小平和楊尚昆從全國各地十個軍¹³中調集了三十萬部隊，以及一個裝甲師、一個空降師和其他一些特種部隊。他們調防到北京郊外，不是對付學生，而是防止趙紫陽和他的軍方支持者搞任何宮廷政變。當然，規模如此龐大的軍隊也能震懾住學生，並迫使政治局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轉而支持鎮壓政策。

在兩個星期的歇息平靜期中，「佔領」了天安門廣場達六個星期的學生逐漸疲憊不堪。許多本地學生回家或回校休息，但來自各省的學生繼續蜂擁而至。他們長途跋涉而來，自然不願那麼快就離開。當地市民表現出了關愛，向他們提供食物、住處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許多市民幫助學生在交通要衝建起了路障，以阻止前來的部隊。第一批部隊抵達時沒有攜帶武器，待人和善，也接受市民提供的食品和飲料。人們普遍相信，部隊不會向自己的人民開槍。然而，戒嚴令已經發佈，沒有人能確定結局如何。很少有人懷疑第一批部隊的和善可能是一種迷惑人的煙幕。一些教授悄悄地力勸學生疏散，因為他們已經達到了目的。但學生不願離開。他們預定6月20日為撤離的日期，這一天將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時間一天天過去，對軍事進攻逼近的恐懼感與認為不會發生暴力的放鬆感交替出現。但每個人在心底裏都知道，流血是不可避免的。

6月3日晚，危機逼近的不祥之徵變得很明顯了。一名政府的電視播音員鄭重地警告北京市民遠離天安門廣場，因為人民解放軍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恢復秩序。北京大學的學生再一次把這個警告當作是虛張聲勢。為了表示他們的關切心情，他們徑直前往廣場。

天安門廣場本身充滿了末日來臨的緊迫感。6月3日星期天下午四點，一個匿名電話打到學生領袖的指揮部，警告說軍隊就要發動進

¹³ 十二軍、二十軍、二十四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三十八軍、五十四軍、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和六十五軍。

攻。高自聯請求所有人離開以避免流血，但四、五萬名學生和十萬名其他市民誓死決不離開，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願意為民主和自由的事業而死。他們仍然相信，部隊不會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

晚上十點，總理李鵬下令部隊全速趕赴廣場，掃射一切頑固不化的示威者，在黎明前清場。坦克、裝甲車和攜帶自動武器的士兵按照預先計劃，從三個方向沿街道進攻。一路人馬從離廣場四英里遠的中國軍事革命博物館發起攻擊，沿長安街西段向廣場行進，開槍射擊面前見到的所有人。另一路從長安街東段發起進攻，第三路從北向南行進。三路人馬全向廣場匯攏。在部隊和坦克抵達廣場之前就發生了許多槍殺。

午夜以前，兩輛裝甲車全速駛進了廣場，車上的高音喇叭播送一份聲音尖銳的警告「通知」。6月4日凌晨，三十五輛重型坦克向主帳篷營地衝擊，碾死了還在裏面的學生。凌晨四點，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高音喇叭再一次勒令剩下的示威者離開。隨後四名絕食的示威者，其中有臺灣流行歌手侯德健，從幾位部隊軍官那裏獲得了讓剩下的學生安全通過的保證，但在學生尚未得到通知以前，士兵們便對人民英雄紀念碑發動了攻擊。四點四十分，一排紅色訊號燈劃過頭頂，示意發動再一次的攻擊。士兵和武裝警察從人民大會堂衝了出來，手中的自動步槍發出噠噠聲響的子彈，使用了電棒、橡皮警棍和其他各種特製武器，而坦克和裝甲車則在嚇呆了的示威者人群間穿插橫行。十一名學生——兩個來自北大、九個來自清華——手挽著手做出保護民主女神像的象徵性姿態，他們與塑像一起被推倒了。到清晨六點，能夠逃走的人逃離了，而一些死者和重傷者則零落地散佈在這片淌滿鮮血的殺人場各處。士兵們趕忙用推土機將屍體推成數堆就地焚燒，或是把它們裝進塑膠袋送往郊外八寶山火化，那裏不准洩漏任何登記的情況。屠殺在七個小時內完成了。¹⁴

¹⁴ 參見兩份關於1989年6月3-4日天安門廣場所發生事情的感人的目擊記載：一份是出自一位20歲的清華大學學生 (*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 June 11, 1989, 及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2, 1989)，另一份出自23歲的學生領袖柴玲 (*The Free China Journal*, Taipei, June 15, 1989)。

精確地統計傷亡人數是不可能的。西方資料估計有三千人死亡，一萬或更多的人受傷，但《紐約時報》後來改正稱死亡人數在四百到八百人之間。¹⁵ 6月16日，中國政府發言人袁木告訴NBC新聞播音員布羅考 (Tom Brokaw)：「在整個清場過程中，沒有發生任何傷亡〔原文如此〕。沒有人被打死或被裝甲車的車輪碾死。國外稱血流成河和許多人被壓死的報道是不正確的。」但是，政府承認，有二十三名學生在廣場外面被意外打死，同時有五千名戰士受傷，其中一百五十人死亡。¹⁶

沒有人能質疑政府保衛自己的權利，也沒有人期望政府在受到垮臺威脅時交出政權。然而，這裏的問題並不是生存或者滅亡，而是與學生領袖見面，討論反腐敗措施和政治自由化。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有沒有正確、誠懇地判斷挑戰，並設計適當的應對措施。回答是「沒有」。在大多數文明國家，對大規模公眾示威進行控制的手段，都是採用非致命器械——水龍頭、催淚彈，雖然防暴警察也裝備警棍和盾牌，但絕沒有坦克和槍砲。歸根結底，1989年5—6月間對中國領導人的威脅，很大程度上是捏造出來的，但最終卻給政府一個藉口，將和平的示威者當作「反黨反革命分子」殺害。如果那些八十幾歲的老人再多一點耐心，不那麼衝動的話，示威將在兩三個星期裏自己消逝，因為學生已經宣佈將在6月20日撤離。一切的流血就可以輕易地避免。

許多評論家都有一種傾向，把1989年的動亂事件與文革作比較，但這兩者之間存在根本的差別。最重要的是，文革是由毛澤東從上而下直接指揮的，利用紅衛兵學生來打垮他的政敵。這些政敵像毛澤東一樣，也都是久經考驗的革命家，完全認同黨內鬥爭的規則和危險性，可說是一場強硬派之間的鬥爭。相反，1989年的示威是由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學生自下而上發起的一場自發的愛國運動。政府用坦克和槍砲摧毀了和平的抗議者。這次較量——如果你可以把它稱作為較量的話——是一場殘酷的、完全不對等的較量。

¹⁵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2, 13, 21, p. A6;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ne 14, 1989.

¹⁶ *Beijing Review*, June 12–25, 1989, 9, July 3–9, 1989, 15–16.

重寫歷史

研究專制制度的學者都明白，在權力鬥爭及清洗政敵時，謊言是司空見慣的。暴行越大，就越需要歪曲真相來改寫歷史。史太林清洗他的布爾什維克同夥的藉口，是他們與托洛茨基勾結，陰謀把他趕下臺。希特拉的宣傳部長戈培爾 (Joseph Goebbels) 是「大謊言」理論的發明者，他宣稱，謊言越大，人們相信它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前不久的中國，當江青做毛澤東接班人的圖謀未能得逞時，她被中共指控為犯有各種罪行，包括充當國民黨的秘密特務！

像天安門大屠殺這樣醜惡的災難，需要最大膽、最不可思議的謊言來掩蓋。在鎮壓發生後不久，鄧小平對一幫軍方領導人說，必須「大造輿論，讓人民理解到底發生了甚麼」。¹⁷ 黨的宣傳機器隨後開始編出故事，聲稱從未發生大屠殺，外國記者的報道都是基於錯誤的資訊和對中國實際情況的誤解。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鎮壓的不是學生示威，而是由一小撮暴徒、地痞、惡棍和一些「善良而天真的」學生煽動的「反革命暴亂」，這些煽動者得到了美國、英國、香港和臺灣反動勢力的金錢支援。¹⁸ 一些誤入歧途的黨內領導人¹⁹ 暗中向他們提供支援和鼓勵，企圖利用他們來發動一場顛覆政府的政變。這些階級敵人的陰謀完全應該被粉碎，即使他們逃脫了最初的鎮壓，他們也必須在隨後的清查中像「過街老鼠」一樣被緝拿歸案。他們中的任何人都必須繩之以法，決不姑息；只有徹底地追捕逃犯才能防止抗議再起。

大逮捕幾乎在血腥鎮壓之後立即就開始了。中央發佈了一份追捕二十一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鼓勵群眾檢舉他們。到7月17日，已逮捕了大約4,600人，囚犯中有29個人經簡單審訊便被處決。這種景象使

¹⁷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89, p. A4; see also Harrison E. Salisbury, "China's Peasants Get the Bad New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89, p. A15.

¹⁸ 「美國之音」特別被誣衊為虛假報道中國的局勢，向中國公眾提供所發生事情的假資訊。它的兩個駐北京報道站負責人 Alan W. Pessin 和 Mark W. Hopkins 被驅逐出了中國。

¹⁹ 趙紫陽和他的開明顧問。

人想起了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及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76年)出現的「白色恐怖」。

1989年6月的中國，簡直就像奧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的故事一樣，*到處是「老大哥」(Big Brother)。母親檢舉兒子或姐姐檢舉哥哥的事例屢見不鮮。人們走在街上互不交談；他們在自己人之間悄聲議論，偶爾對路過的外人眨眨眼睛。笑聲、歡樂和爽朗從日常生活中消失了。政府的報紙連篇累牘地刊登有關天安門廣場上所發生的事情，但大多數城市居民不相信這個「彌天大謊」，然而相當一些與城市生活隔離的農村居民也許接受了官方的說法。香港和其他外國資料向城市裏的人提供了大量資訊，而「美國之音」承擔了廣播資訊的任務。在一個長途電話、傳真機、電腦網絡和衛星接收電視到處充斥的時代，中國政府是不可能完全把國家封閉起來的。最終引發資訊革命的晶片，²⁰將有可能擊敗專制主義對資訊的過時控制。著名作家魯迅在1926年寫過以下這段話：「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²¹

鎮壓及隨後的大規模逮捕所引起的反響非常巨大。中國政府曾表現為國際社會中一個越來越負責的成員，對世界事務具有潛在的穩定作用。但現在，這個形象遭受了無法修補的損害。鎮壓招致了全世界幾乎普遍的譴責，還有種種經濟和軍事制裁。另外，中國還明顯地被排斥在重要的外交會議之外。與香港和臺灣的關係更是遭到了嚴重的打擊。一百萬香港居民示威遊行，抗議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並表示不信任北京允許香港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在1997年以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至於跟臺灣的統一，前景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遙遠了。最可悲的是，中國人民的精神受到了致命的傷害，他們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無法忘記鎮壓的痛苦經歷、也不會寬恕任何人。

* 譯者注：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50年)，英國作家。著有《一九八四年》等諷刺小說。

²⁰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4, 1989;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4, 1989.

²¹ 引自魯迅《華蓋集續篇·無花的薔薇之二》。

參考書目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liminary Findings on Killings of Unarmed Civilians, Arbitrary Arrests and Summary Executions Since June 3, 1989* (New York, August 1989).
-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9).
- Cheng, Chu-yuan,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erment in China* (Boulder, 1990).
- Fang, Lizhi, *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 Writings on Science,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 1991). Ed. by James H. Williams and tr. by him and others.
- Gargan, Edward A., "Beijing Diary: Eyewitness at Tian An Men Square," *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 July 16, 1989, 6–20, 37–39.
- Gold, Thomas B., "The Class of '89," *California Monthly*, Sept. 1989, 18.
- Hayhoe, Ruth, "China's Universities Since Tiananmen: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3, 291–309.
- Hicks, George (ed.), *The Broken Mirror: China After Tiananmen* (Essex, Eng., 1990).
- Kristof, Nicholas D., "China Update: How the Hardliners Wo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 12, 1989, 39–41, 66–71.
- , "Escape from Tiananmen Square: A Chinese Odyssey,"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5, 1991, 28–31, 49–51.
- Lin, Nan, *The Struggle for Tiananmen: Anatomy of the 1989 Mass Movement* (Westport, Conn., 1992).
- Liu, Binyan, with Ruan Ming and Xu Gang,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New York, 1989). Tr. by Henry L Epstein.
- Lukin, Alexander, "The Initial Soviet Reaction to the Events in China in 1989 and the Prospects for 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1, 119–36.
- Mann, Jim, "China's Lost Generation: After Tian An Men, the Best and Brightest Say They Can't Go Home Again," *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 March 25, 1990, 10–19, 38–39.

- Oksenberg, Michel,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c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 Y., 1990).
- Rosen, Stanley, "The Effect of Post-4 June Re-education Campaigns on Chinese Students,"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3, 310–34.
- Saich, Ton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eijing People's Movement,"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July 1990) : 181–208.
- Salisbury, Harrison E., "China's Peasants Get the Bad New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89, A15.
- Simmie, Scott, and Bob Nixon, *Tiananmen Square* (Seattle, 1989).
- Tsao, Hsingyuan, "The Birth of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California Monthly*, Sept. 1989, 16–17.
- Walder, Andrew G.,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Beijing Upheaval of 1989," *Problems of Communism*, 38:5 (Sept.–Oct. 1989):30–40.
- ,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 1992, 467–92.
- Whyte, Martin King, "The Social Sources of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23 (Spring 1991):16–22. Chinese translation by Lo Wen-fu.
- Williams, Daniel, "China's Underground Presses Seized as Crackdown on Media Continues,"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0, 1989, Part I, 10.
- Yang, Winston L. Y., and Marsha L. Wagner (eds.), *Tiananmen: Chin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2–1990 (97).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第四十一章

中國的發展模式：獨裁政治下的 準資本主義

1989年6月天安門鎮壓之後僅僅六個月，民眾抗議共產統治的浪潮席捲東歐，出乎意料地造成共產政權的崩潰。1991年底，蘇聯也解體了。在這樣的巨變之後，中國的未來會是怎麼樣？

鄧小平的策略

天安門鎮壓不僅令中國備受全世界的譴責、在經濟和軍事上遭到嚴厲的國際制裁，而且在外交上也受到排斥。鄧小平斷言，今後三至五年，對中國共產主義生死存亡至關重要，中國要力求社會穩定，並且不必介入國際事務。在這一關鍵的歷史時刻，鄧認為「一動不如一靜」，政治經濟政策的爭論、重要的人事變動和政治方針的改變，對中國都是百害而無一利。他對西方國家的態度是：「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井水不犯河水。」

與天安門鎮壓差不多同一時間，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總統夫婦在動亂中暴死。中國領導人夜不安寢，嚴厲譴責戈爾巴喬夫把社會主義從內部搞垮了。戈爾巴喬夫對東歐的不干涉態度被指責為放棄了對華沙條約組織的領導。戈爾巴喬夫於1990年2月5日至7日在蘇共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所做的報告，更遭貶斥為對馬列主義的背叛（報告中提出放棄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答應建立多黨制和「總統」制；提倡一種「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中國認為戈爾巴喬夫否定階級鬥爭，積極推行西方議會民主，從而背棄了共產主義的根本原則。¹

¹ 中共中央文件：對蘇共二中全會的批判。原件（機密）。重刊於《中國之春》1990年5月，第64—65頁。

東歐和蘇聯的結局會在中國重演嗎？本來，北京對中國的獨特性相當自信，堅信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忠貞，並且有雄厚的群眾基礎。但到了1991年底，蘇聯共產黨，這個完全不借助外力而成長壯大的最老的政黨解散了。遭到西方和蘇聯兩方面變革之風的衝擊，北京一方面痛恨戈爾巴喬夫「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因為它搞混了「真正社會主義」的界限，擾亂了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則確信導致蘇聯解體的西方勢力，將會借助同樣的「和平演變」，陰謀顛覆中國。為防止這一局面發生，中國決定加緊意識形態控制和軍備，以抵制西方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同時用親切平和的面孔示人。北京這種雙重姿態，就是所謂的「內緊外鬆」（對內加緊控制，對外表現寬鬆）。

中國領導人作出一些堅強的決定。第一，永遠不主動放棄對權力的壟斷，就像蘇聯領導人愚蠢地幹下的那樣。對此，他們堅信可以成功，因為民主勢力幾乎已鎮壓殆盡；西藏人總的來說相當順從，反抗只是個別的；中國各民族並不尋求獨立。總之，與蘇聯不同，中國有著長期的統一傳統。第二，經濟必須持續發展，而人民生活必須改善。第三，官方媒體要經常不斷地突出蘇聯人生活的艱難，例如生動描繪他們如何糧食短缺，以及急速增加的通貨膨脹、黑市、政治鬥爭、經濟混亂、對前共產黨領導人的鄙視和仇恨等等；而且還要告訴人民，如果在蘇聯發生的事情在中國重演，就會引起大亂。只要人們與政府保持一致，當局就能保障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

和平演變

中國領導人接受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反對社會主義的陰謀永遠不會停止。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剛剛成立九個月，北京宣稱西方干涉這場戰爭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搞亂及推翻新中國政府，但因為未能得逞，轉而求諸以和平方式滲透，從內部破壞社會主義。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被認為是這一戰略的設計者。在五十年代，他力主開放所有管道和場所，努力與共產國家接觸，採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傳播西方的

思想、價值、宗教、文學、藝術和生活方式。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和生活水準低於西方國家的時期，這種心理戰被認為是有效的，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年輕人很容易在西方的誘惑面前動搖。²

從中共方面看，蘇聯共產黨垮臺後，中國唯一的選擇是堅守「社會主義鋼鐵長城」，抵抗西方「和平演變」的陰謀。中國的領導人宣稱：「過去我們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如今是：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顯然，對追求民主、經濟自由、貿易開放、保障人權這樣的全球大趨勢，他們視而不見；對香港、新加坡、臺灣、韓國這「亞洲四小龍」通過和平演變而實現的經濟繁榮，他們不願意承認；當然更不願意接受美國和英國的社會福利遠遠高於蘇聯、古巴、東歐和中國這一令人不安的事實——在這些國家，政府只維持基本生計（「鐵飯碗」），但這一保障助長了懶惰和懈怠之風，以致民眾生活水平相當低。³

保守的中國領導人對此並不關心，並且陶醉於「延安心態」中，堅持認定「國外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他們對美國人的意圖心懷戒備，儘管美國國務卿貝克 (James A. Baker) 坦言：「美國對中國的方針政策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中國人和美國人見到的都是一樣。我們想要保護人權，推動自由；我們反對核武器和導彈的擴散；我們渴望對兩國和整個地區都有好處的自由公平的貿易……我們的理想和價值觀必定成為與中國打交道的基礎。我們當然會與政治壓制和宗教迫害作鬥爭。」⁴但保守派批評鄧小平和他的開放政策的調子越來越高，說這些政策是有毒的、腐蝕青年的資產階級思想敞開大門，並導致1989年的學生抗議運動。陳雲手下強硬保守派理論家鄧力群曾暗地裏說：「黨內存在著走資派，不過我指的不是鄧小平。」⁵確實，鄧小平的改革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可以算作和平演變的變種。

² 劉學民，〈和平演變救中國〉，《探索》，1991年6月，第35-36頁。

³ 劉鍾祥，〈夜行人的口哨：和平演變救中國〉，《探索》，1991年11月，第54頁；千家駒，〈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問題〉，《探索》，1992年4月，第13頁。

⁴ James A. Baker, III,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92, 15-16.

⁵ 引自《探索》，1992年4月，第19頁。

甚至布殊總統也曾說過，他不知道一個國家怎麼能從全世界進口貨物和服務，卻把外國的思想擋在國境之外。

蘇聯的解體對鄧小平而言像是服下一帖清涼劑。作為一名實用主義者而非空想家，他要借助資本主義的某些東西來拯救共產主義。他公開說，沒有他的改革開放，中國將難逃東歐和蘇聯的命運。這實際明白表示——雖然沒有公開承認——和平演變救了中國。鄧作好了發動一場新反擊的準備，再次將中國拉回改革開放的軌道上。在87歲高齡之際，他將這一步驟看成是確立自己歷史地位的最後機會。他來到經濟繁榮的南方，帶著這樣的資訊：加速經濟發展和穩定政治局面，是今天的頭等大事；現在不是清除精神污染和搞世界革命的時候。

鄧小平南巡

1992年1月，鄧小平在萬眾注目之下，到過去十年經濟獲得最大增長的南方視察。廣東在1991年實現了驚人的21%的增長率，有可能是全世界發展最快的地方。在家人的陪伴下，鄧訪問了深圳經濟特區、珠江三角洲和廣州，「熱情讚頌了這個充滿高樓大廈、廣告、投資機會的勇敢新世界。」⁶他容光煥發，向全世界表明還有足夠的精力去完成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從而把中國推向準資本主義。這無疑是一場新的經濟革命。

鄧的講話往往含混不清，但卻是實話而且不無諷刺，有時需要女兒鄧榕的翻譯。但其意思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要點：

1. 發展經濟是政府的中心任務，改革和開放是發展經濟的兩個基本點。
2. 穩定是經濟發展的根本。
3.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以由國家經濟的改善體現出來。

⁶ Richard Holme, "China: Tiger's Gilded Cage," *New Statesman & Society*, England, Jan. 22, 1993, 19.

4. 鼓勵股市投資；歡迎引入更多的國外資本、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歡迎更多合資企業。⁷
5. 1997年香港回歸後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一百年不變。
6. 廣東省應力爭在二十年內成為「亞洲第五小龍」——繼香港、新加坡、臺灣和韓國之後——而中國，則應成為超級巨龍。⁸

鄧小平對一場改革開放新躍進的鼓動，把他推到與其最重要的對手陳雲直接衝突的地位。每當鄧小平堅持政府的中心工作是發展經濟，陳雲就大力提倡強化意識形態控制和對和平演變的堅決抵制。1992年3月1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議：中國應該防「右」（即轉向資本主義），但更重要的是防「左」（激進的共產主義）。政治局對鄧的路線採取一種得體而圓滑的肯定。

但這並不表明他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鄧小平認為，批評他的是一些看法狹隘偏激、對世事一知半解的人。1992年1月15日，他在上海說：

有些黨員腦袋裏一團糲糊，卻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大師。他們對周圍的一切批評、指責、設置障礙，反對這樣，反對那樣，將一些枝節問題看成主流。這也算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嗎？我相信資本主義社會正在變，整個世界都在變。但我們的同志沒有改變，他們仍死守自己的正統教條。這樣能推動社會進步麼？如果在過去的十年裏我們沒有實行改革開放並採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我們的情況可能要比蘇聯還要糟。⁹

經濟成長統計數字支持了鄧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十年中，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達8.9%，是世界平均增長水平的三倍。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7,000億元人民幣。鄉鎮企業飛速發展，已達

⁷ 原本是三資企業，代表三類外國投資：(1) 外國獨資；(2) 中外合資；(3) 中外合作經營。

⁸ 中共中央二號文件，中發〔一九九二〕二號，1992年2月28日。全文重刊於香港《爭鳴》雜誌，1992年4月，第23-27頁。

⁹ 王維新，〈鄧小平路線的觀察〉，《探索》，紐約，1992年5月，第41頁。

1,888萬家，產值950億元人民幣，佔整個農業產值的58.5%。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國際上，亞太地區正以經濟為契機而崛起。在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裏，這個地區看來已作好完成一次驚人飛躍的準備。鄧已經下定決心置身於這一飛躍，絕不錯過歷史賦予中國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他相信自己正融入世界經濟大潮，而他的對手陳雲則死守在一個水量有限的小泥潭裏。¹⁰

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

1992年10月12日以後的一周裏，黨的十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代表有1,991名。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同意將經濟改革作為黨的工作中心，選舉出新一屆領導人，並允許適度放鬆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控制。

總書記江澤民作了政治報告，號召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他說：「『改革』也是一場革命，是一場以解放生產力為目標的革命，是中國現代化的唯一道路。如果我們繼續思想僵化，安於現狀，我們將一事無成……。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直到1993年1月，國務院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出解釋：它是一種多元的經濟結構體，由公有經濟、家庭作坊、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組成。實際上，這一新的結構意味著擺脫中央計劃模式，不再對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予以排斥，逐步放開價格控制，承認私有財產和私人企業，承認股票市場、外資與合資企業，並重建經濟的公共部分。

政治報告也再次肯定黨領導一切，重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以及鎮壓政治動亂的必要。報告號召對和平演變保持警惕，並宣佈「改革的目標是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絕不是西方的多黨議會制」。

在獨裁政治體制中建立市場經濟，儘管聽起來很矛盾，但鄧小平

¹⁰ 同上註，第41-42頁。

認為在權威主義政治秩序下推行準資本主義經濟卻順理成章。在十九世紀後期，明治時代的日本和俾斯麥時代 (Bismarckian) 的德國就非常成功地做到了這點。而更近的時候，新加坡、臺灣和韓國都是在權威主義的統治下創造了經濟奇蹟。¹¹ 李光耀總理的新加坡模式對鄧小平的觸動尤其大。這個國家城市清潔、秩序井然、富裕，政府對社會實行嚴格的管治。在那裏沒有街頭示威、色情行業和毒品，沒有人在公共場所嚼口香糖，或對人權說三道四。鄧指出：「我們應該學習他們的經驗，應該比他們做得更好。」¹² 他還認為通過加速發展南方和沿海地區的經濟，中國就可以成為亞洲的超級巨龍。而在一個高效集權政府領導下，實現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政府可以為經濟起飛提供必不可少的穩定環境，這比處在一個軟弱的民主政府的管治下強多了。那樣的政府會因意見分歧而四分五裂，因局勢動盪而羸弱無能。

蘇聯解體後，鄧小平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篤信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在獨裁政治體制下發展準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贏得了不少俄國因循守舊者和前共產黨人的讚許，而這些人正為自己國家的物資短缺和混亂所困擾。曾長期擔任安德羅波夫 (Andropov) 和勃列日涅夫 (Brezhnev) 助手的沃爾斯基 (Arkady Volsky) 說：「中國人自己養活自己，十二億人過著的，是我們在夢裏才見得到的生活。」¹³ 在東歐，有一種對舊時代穩定生活的懷念，也希望能找到一條介於共產黨中央計劃經濟和西方民主自由及市場經濟之間的「第三種道路」。¹⁴

人事安排 鄧小平著手培植新一代的領導人，貫徹經濟改革和獨裁政治的配套方案。新的中央委員會由189名正式委員、130名候補

¹¹ Maurice Meisner, "What Beijing Leaders Know That Critics Won't See: Repression Can Be Profitable," *Los Angeles Times*, Oct. 25, 1992, M2.

¹² Nicholas D. Kristof, "China Sees Singapore as a Model of Progress," *The New York Times*, Aug. 9, 1992; see also Richard Holme, 19–20.

¹³ William Safire, "Vision in Collisi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3, 1992, A25.

¹⁴ Roger Cohen, "An Empty Feeling Is Affecting Eastern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93, E3.

委員組成，其中47%是第一次當選。他們中多數人是技術官僚，並擁有大學學歷(佔84%)，平均年齡為56歲。這些技術官員清楚知道，靠革命實施民眾動員已經是過去的事；若想繼續掌權，並保持黨的合法性，只能依靠經濟成就。

僵化強硬保守派在選舉中處境淒涼，三名大將(高荻、王忍之、賀敬之)丟了中央委員席位，從傳媒、宣傳和文化領域的崗位上給撤換下來。¹⁵ 這一變動預示了藝術、文化和智識生活中比較自由的氣氛。被稱為「太子黨」的高幹子弟們，這回也頗不順心。陳雲的兒子陳元未能當選中央委員。他們當中許多人改弦更張，選擇棄政從商。

有二十名成員的政治局，也出現大規模的重組。兩位新改革派加入——副總理鄒家華和外長錢其琛；另外兩位連任的改革派成員——農業問題專家田紀雲和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和前二者一道形成一個「自由派」。此外五名新成員來自各省。政治局看起來較前自由了一些，更傾向於市場為主導的改革，包括將放開價格、擴大股市和重組國有企業，完全推入市場。

真正有權的位置是政治局常委，其中有四位連任，三位新當選。前者包括66歲的總書記江澤民、63歲的總理李鵬、68歲的喬石和58歲具有改革派觀念的李瑞環；後者包括副總理朱鎔基，64歲，鄧的經濟主管和門徒；上將劉華清，76歲，軍委副主席，以及胡錦濤，49歲，前西藏黨委書記。在1993年3月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這七名常委都被安排了重要的政府職務。¹⁶

明顯失勢的是「楊氏兄弟」，曾幾何時，對鄧小平而言，他們是過於炙手可熱了。85歲的國家主席楊尚昆，因年齡原因一退到底；他73歲的異母弟楊白冰，名義上獲得「提升」進政治局，卻丟了他在中央軍委和中央書記處的職務。

¹⁵ 高荻，《人民日報》總編輯；王忍之，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賀敬之，文化部代部長。

¹⁶ 江澤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鵬，總理；朱鎔基，第一副總理；喬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李瑞環，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

從整體上看，改革派在這次權力分配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優勢，但江—李領導體制依舊，表明很難在新的方向上有所突破。

從歷史的角度看，鄧的戰略也許能避免共產主義在中國破產於一時，但共產主義經濟理論的許多基本觀點已經被徹底否定了。經濟體制和社會制度的本質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共產主義剩下的，將只是一個靠軍隊和秘密警察支撐著的空殼。

中國共產主義四十五周年： 獨裁政治下的準資本主義

在最近十年間，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生了如此深刻的和影響深遠的變化，如果毛主席回來看看，準會大吃一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變得毫無價值，很少有人認真看待了。利潤至上的企業精神充斥社會，金錢成了人民追求的目標。沿海地區生活的脈搏隨種種經濟活動而搏動：股票交易、地方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外資引進、合資企業與進出口貿易，以及消費享樂。與此同時，社會和文化控制明顯放鬆，資訊革命使政府對思想傳播的控制幾乎成為不可能；而數以千萬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直接挑戰黨對人口流動和戶籍管理的控制。然而，儘管共產主義關於社會和經濟的基本支撐已臻衰落，但政治結構並沒有變。準資本主義出現於列寧主義獨裁體制下，真是前所未見。

意識形態衝突 對引進市場經濟，鄧並非高枕無憂。因為市場經濟從來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結構的一部分。在毛澤東時代，市場經濟還被冠以「頭號資本主義敵人」，屬於要消滅的事物。從改革的最初階段，鄧對市場經濟的真正本性即不予深究，只將其藏在社會主義術語裏邊，讓他的追隨者們欣然接受。他把市場經濟稱做「一種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並要求做到兩者的「內部統一」。直到1992年，他才打破禁忌，公開宣稱政府的中心任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等於宣佈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核心部分——公有制及中央計劃體制——

的拋棄。將社會主義一詞加到市場經濟前面，是為這一「背叛」做些許修飾。在他的對手看來，這說法簡直就是「矛盾百出，莫名其妙」。¹⁷

黨的新使命：錢與權 蘇聯共產主義垮臺和中國的經濟繁榮讓許多中國人相信，靠革命起家的時代已經過去，有錢才有權、才有地位、才能過上好日子。這一新的生活態度已瀰漫於整個社會，從黨的最高層領導到街頭的普通男女。黨的各級領導的兒子孫子，已無意於政治接班而轉向經商。他們把這類一頭栽進商業活動之行為，俗稱「下海」。

與此同時，黨本身正靜悄悄地實現著微妙的轉變，從一個清心寡欲的革命組織轉為精英政治工具——不再致力世界革命、不再為第三世界兄弟作奉獻、不再埋頭於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烏托邦，而是考慮如何永保獨裁統治，讓自己黨員的骨幹及其家族富起來。國有企業被近水樓臺者廉價瓜分：一夜之間，他們成了董事長、總裁、副總裁、股東和有賺頭的大企業經理，控制著相當規模的國內金融資產和實業，以及相當數量的國外投資和房地產。

中、下層黨員也學著樣兒一頭鑽進企業經商賺錢。緊隨他們之後，中國社會上每個人都跟著動了起來。連政治異見人士也組成基金會，為他們未來的民主奮鬥事業籌措資金。這種對財富的狂熱導致了民族能量的大爆發，釀成了前所未有的追逐暴利浪潮。突然之間，一個過去為貧困所困擾的共產國家，一下子變成一部巨大的經濟機器，在資本主義世界公開競爭，獲取財富、體面和認可——而這些東西正是過去馬克思主義者發誓要摧毀的。¹⁸

企業私有化 由於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處於虧損狀態，政府急於擺脫這一沉重包袱，為此提出過幾種方案。其一是將沒有盈利的

¹⁷ 冷橫眉，〈十四大為大陸埋下了動亂的禍根〉，《探索》，1992年12月，第35-36頁。

¹⁸ 老貝，〈從變革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未來〉，《探索》，1993年1月，第76-77頁。

企業私有化：與個人簽定承包合同，承包者可得到超過約定部分的利潤。另一個方案是將淨值在一千萬元以下的中型國有企業賣給那些表現好的黨員，他們必須有即時付出總額10-15%款項的能力，具有三年以上經營盈利企業的經驗，並能在五年內付清全部餘款。第三種方案是將企業租給私人投資者，他們與國家利潤五五分成。這些「私人」中的大多數都是有特別關係的黨員：原班子成員，或原管理層核心人物。這一系列做法使許多人積累起巨大財富。數年前，一個年收入一萬元的家庭即被視為富有。到1993年，家財百萬才算有錢。而在廣東省，這樣的闊人已達四萬。據說在全中國，百萬富翁已有五百萬之眾。¹⁹

住房所有權 五十年代初開始，中國人的住房一直由本人所在工作單位分配，而工作單位全都控制在黨的手裏。如今政府開始將這些單元套間和房子看成是商品，認為應按市場價格出售或出租。在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大城市，政府向已經住在裏邊的人提供優惠，允許他們購買現住房，兩居室的單元需要3,100美元，先付三分之一，其餘按十五年無息抵押貸款，每月付12美元。到那時，據估計這套房將增值十倍以上。

這項措施最初看起來不很吸引人，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很節儉，他們對經過大大的補貼之後每月兩美元低房租已經習慣。但在南方和沿海地區，有大量城市流動人口，是潛在的住房購買者。據香港一家外國顧問公司麥肯西 (McKinsey) 估計，有5%的中國人，也就是五千萬人，已經習慣了西方的消費模式。²⁰

臺灣和香港的資金點燃了南方和沿海地區的房地產熱。新規定隨即推出，允許外國人和私人投資者租用土地七十年，捷足先登者由此

¹⁹ 李小明，〈中國南方的資本主義熱〉，《中國之春》，1992年10月，第6-10頁。

²⁰ Nicholas D. Kristof, "A New Class of Chinese Is Emerging: Home Owners,"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2, 1992; Holme, 19; 楊漫克，〈「有房階級」崛起大陸〉，《中國之春》，1993年3月，第47-48頁。Sheryl WuDunn, "China Sells Off Public Land to the Well-Connected," *The New York Times*, May 8, 1993.

大獲其利。在廣州—深圳—珠江三角洲，地價一路飆升，從每平方米五十元上漲到一千元，30%的頂級空地很快便被香港投資者搶到手。深圳一間100平方米中檔住宅的售價，已與洛杉磯一間間格差不多的公寓房相仿，為人民幣50萬元(美元95,000)。確實，深圳已經成為香港郊區；福建則成了臺灣投資者的遊樂場：他們已在房地產上扔了十億美元。有人挖苦說，福建成了臺灣的新殖民地。而海南島的土地投機則更為瘋狂。

股票市場 儘管股票市場在大多數共產國家被貶為腐朽的西方資本主義的象徵，而今在中國，卻成了撩動人心的美夢。上海股票市場1989年12月開張，深圳是1991年7月。上市股票分為兩種類型：A股針對中國國內投資者，B股資產是外國人。A股的表現非常好，有時會在一天內上升20%，創下146這個天文數字般的市盈率。相比起來，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市盈率只有20或30。然而，B股一直不景氣。也許因為這兩個市場的市值僅在十一億美元的水平，資本盤子不夠大，難於承受國外大的買單和賣單。外國人更喜歡通過香港股市進行交易，因為香港的資本市值達2,500億美元。

大多數中國人天真地相信股市只升不降，因為政府需要這項試驗獲得成功。在平均儲蓄率38%的情況下，到1991年年底中國人手裏已積攢了一萬億元。當深圳發展銀行的股票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就上漲了80倍時，所有的人都希望能搭上這班車，迅速致富。1992年8月，上百萬想要購買股票的人在深圳股票交易所外排起了長龍，等待領取購買股票的申請表。消息傳來，半數的申請表在腐敗官員與交易所工作人員的串通下，已被搶先賣掉。小百姓們在街上鬧了起來。因資本主義的熱潮而出現在共產主義國家的抗議高潮迭起，成為華爾街的談資。

到1993年5月，中國已經有了二百萬股民，這一隊伍還以每周五萬人的速度在增加。上海市場在1992年上漲了167%，交易額的增長也是驚人的。假以時日，最終可能會超過香港和東京市場，成為亞洲最大的一家。香港CEF投資管理公司的經營主管蒙特(Duncan P. F. Mount)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有大約三十萬家具

有法人地位的公司，其中約七十家已列入上市計劃。總有一天它要成為亞洲最大的股票市場，比日本的還要大。」美林公司的董事長、65歲的施萊伊爾(William A. Schreyer)，1993年4月在上海開設了分行，並且說：「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是本世紀最激動人心的奮鬥之一，我們願意加入到他們中間，成為其中一部分。」他接著又補充了一點個人想法：「如果我能年輕25歲，我一定學習漢語，並要求美林派我到這裏任職。」

股市買賣對轉變中的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確立了整個經濟向準資本主義的靠攏，迫使國有企業警醒起來，提高自己的效率並努力賺取利潤，立志於經營而不要一味追求權力和地位。總而言之，股市造就了股民和投資者這一新群體，在一個即將出現的公民社會中，他們很快會成為都市中產階級的核心。²¹

企業家的樂園 曾有人說過，共產主義在蘇聯凡七十五年，阻礙了企業家精神的成長；而共產主義在中國四十五年，卻刺激了人們經營賺錢的胃口。²² 確實，沒有任何一個個別的共產主義國家如此公然承認對金錢的崇拜。自1980年以來，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達9.5%，與日本、韓國和臺灣在類似發展階段相似。實際上，9%的年增長率可以在十九年中讓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五倍。到2000年，中國計劃將1980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四倍的目標可以提前實現。²³

今天的中國成了隨心所欲的企業家的天堂。一個普通的小鎮成了全世界的鈕扣之都，僅1992年一年就出產了120億枚鈕扣。一名工廠主的銷售額達50萬美元，另有一位達20萬美元。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的信用卡、金手鐲、鑽石表、珠寶首飾，成了中國人的新時尚。乘坐著奧迪汽車、由專職司機駕駛的當地黨委書記，對自己新角色的認識

²¹ Nicholas D. Kristof, "Don't Joke About This Stock Marke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9, 1993.

²² Nicholas D. Kristof, "Entrepreneurial Energy Sets Off a Chinese Boom,"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4, 1993.

²³ 同上註。

也變成：「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好經濟。這兒的人都說：『經濟上去了，你就是好領導，要不然就不是。』」²⁴

成功的事例不勝枚舉。一對二十來歲的兄弟成立了天龍飛機租賃公司，在1992年淨掙200萬美元。一名女店主銷售從歐洲進口的鞋，每雙賣到200美元，顧客不斷。溫州是一座「狄更斯式資本主義」的城市，90%的經濟已經私有化。一位鞋廠的老闆雇用了100名工人，日產鞋500雙，1992年毛利達100萬美元。他住在地面為大理石的「宮殿式」的房子裏，裏邊裝著空調，屋頂上架著碟形衛星天線，直通室內的松下牌 (Panasonic) 電視和健伍牌 (Kenwood) 音響設備。這樣的生活在清簡的毛澤東時代，可謂聞所未聞。²⁵

另一個更大的創業成功故事的主角是52歲的牟其中。1979年，他借了55美元，成立了南德經濟集團。如今他已在五個國家設立了辦事處，經營著旅遊、投資、製造和易貨貿易。他當前正做著的一檔交易是以滿滿五百個車皮現貨(包括60萬雙鞋襪、罐頭食品及熱水瓶)，交換俄羅斯四架164個座位的圖-154噴氣客機，然後以7,500萬美元的價格將這些飛機賣給中國民航，淨賺2,500萬美元。他是中國2,100萬個企業家中的一個，他們之中有十萬人擁有(或經營著)大型私有企業。²⁶

外國投資 經濟繁榮使中國奢侈消費的人數增加到6,000萬至3億。²⁷ 為抓住這「神話」般的中國市場，所有的外國公司都希望能佔到先機。把來這裏設代表處的美國公司羅列出來，就像《財富》五百強的

²⁴ Nicholas D. Kristof, "Poor Chinese Town Bets Its Shirt on Making Buttons and Bingo!"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8, 1993.

²⁵ Nicholas D. Kristof, "Backed by China, Go-Getters Get Rich,"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7, 1993.

²⁶ Nicholas D. Kristof, "A Tycoon Named Mu: Product of Old China Leading the New,"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92. (譯者注：牟其中1999年因信用證詐騙，判處無期徒刑)。

²⁷ 根據前哈佛法學院助理院長及現任美國商界在中國的利益的代表Jerome A. Cohen。

排名表：通用汽車 (GM)、福特 (Ford)、佳仕那 (Chrysler)、美國電報電話 (AT&T)、通用電器 (GE)、萬國商業機器 (IBM)、數位設備 (Digital Equipment)、摩托羅拉 (Motorola)、寶潔 (P&G)、雅芳化妝品 (Avon)、坎貝爾速食 (Campbell)、大漢堡 (Big Mac)、肯德基炸雞 (Kentucky)、可口可樂 (Coca Cola)、亨氏嬰兒食品 (Heinz)、帕布斯啤酒 (Pabst)、耐克 (Nike)、力士香皂 (Lux)、美林 (Merrill Lynch) 等等。²⁸ 耐克公司在廣州的經理布朗 (Charles D. Brown) 說：「我並不認為我們是在做夢，這是實實在在的經濟繁榮，很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²⁹ 1993年，外國投資者在中國的總投資達到一千億美元，他們特別看好中國就業大軍的低工資 (每天2-4美元) 和高素質——其中通曉電腦人員的比例相當高。中國外資企業的增長非常迅速，1992年註冊資本已達1,656.3億美元，第一次超過臺灣。1992年中國對美貿易實現了183億美元的順差，外匯儲備超過400億美元。

鄉鎮企業 自從八十年代早期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農業產量迅速攀升。家庭、農村和鄉鎮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在一夜之間破土而出，通過對農產品的加工而獲得了相當的利潤。1988年該類企業為1,888萬家，平均產值人民幣五萬元。從1979年到1988年，它們以年均27.9%的速度擴展，產值從1980年佔全國農業總產值的23.5%上升到1988年的58.1%。1990年它們出口了125億美元的商品，佔全國出口總額的五分之一。鄉鎮企業因此而成為整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成了向市場經濟邁進和促進企業私有化的強大推進力量。這1,888萬家企業散佈在主要城市周邊的最佳種植區內，改變了中國的景色。它們的觸角伸向各個領域：工業產品69.73%、建築12.73%、商業8.24%、運輸7.28%、農產品1.78%。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村多餘勞動力為它們所吸納。(見下節)

²⁸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5, 1992; Feb. 24, 1993。然而，三藩市著名服裝製造商 Levi Strauss & Co.，因為中國的人權紀錄欠佳而決定撤離中國。

²⁹ Sheryl WuDunn, "Booming China Is Dream Market for West,"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5, 1993;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8, 1993.

然而，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對環境的破壞。這些企業處在城市管理界限之外，很少理會城市和政府有關污染限制、化學品排放、土壤侵蝕、廢物處理和生態方面的通告及規定。結果，中國許多城市的空氣污染程度比紐約市嚴重七、八倍，肺病和癌症死亡的人數不斷上升。³⁰到2000年，鄉鎮企業的產值將佔到全國工業產值的50%、國營和私人企業各佔25%。到那時，很難再說中國的經濟仍屬於社會主義性質。

處於流動狀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 經濟的發展引發了農村勞動力歷史性地湧向城市。據《中國人口》報道，截至1990年，大約有5,000萬勞動力離開農村輾轉流徙到城市。在上海，外來人口已達183萬，佔全部居民的26%；在北京為115萬，佔22%；廣州有88萬，佔33%。³¹儘管從歷史上看，大批流動人口的出現意味著動盪、騷亂、甚至朝代的覆亡，但這一次的人口流動卻是好徵兆。他們當中，男性青年佔93.1%，其中25歲甚至更年輕的佔到70.4%，35歲以上的只是少數(7.5%)。這些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也不算差，受過初中教育的佔67.3%，而高中教育的有15.4%。他們一個個雄心勃勃，充滿個人創業精神，一心想著怎麼在一個激動人心的環境裏過上好日子。³²

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同時意味著黨對人口的控制和戶籍政策的破產。早在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政府就抓住「工作分配」和「單位住房分配」，以此將人們的生活掌握在手中。如果你沒有戶口，你就得不到住房，不能享受公費醫療，沒有糧票、油票和各種票證，也不能隨便旅行。如今，流動的勞動大軍按照自身的意願，冒著受罰和失去原有

³⁰ 達寧，〈中國大陸鄉鎮企業農業和農業環境問題〉。現代中國中心論文，1992年2月，第16期，第2-7頁；Sheryl WuDunn, "Chinese Suffer from Rising Pollution as Byproduct of the Industrial Boom,"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8, 1993. See also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s Countrysid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orts from Rural Industry,"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1, 717-18.

³¹ 承濟，〈當前中國大陸的流民問題〉，《探索》，1993年1月，第40-41頁。

³² 根據對五百名遷入北京的農民的調查。同上註，第42-43頁。

一切的風險流入大城市，向政府的這些政策挑戰。雖然他們住地狹小雜亂不堪，溫飽、健康乃至性命都沒有保障，只能得到沒人願意幹的「下賤」活兒，且收入非常低，但經過一段時間，因為他們甚麼都肯幹而且拼命幹，他們的境況得到改善。接著，逐漸地，他們為社會所接納，並為當地的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

大中華經濟區 近年來，急速發展的貿易、投資和旅遊業將中國沿海、香港和臺灣逐漸連在一起，「大中華經濟區」的想法順理成章地出現在人們的腦海。雖然仍處於萌芽狀態，但一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相仿的三角區域市場很有可能形成。³³ 在1987年至1992年五年間，通過香港，中國與臺灣的貿易不斷增加，三方經濟的互補性已有目共睹。

臺灣與大陸通過香港的間接貿易

(單位：百萬美元)

年度	臺灣向大陸出口	大陸向臺灣出口	臺灣的順差
1987	1,226.53	288.94	937.59
1988	2,242.22	478.69	1,763.53
1989	2,896.49	586.90	2,309.59
1990	3,278.25	765.36	2,512.89
1991	4,667.15	1,125.85	3,541.30
1992	6,287.93	1,118.97	5,168.96

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中國地域遼闊，有豐富的資源、充足的勞動力和大量的生產設施；臺灣則資金充足、技術工藝先進；而香港的經營管理和市場營銷經驗豐富，三者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性越來越大。到1992年，大約有12,000家臺灣公司在大陸設立了工廠，投資額達到110億美元。同一時

³³ James A. Baker, III, 16; Allen Pun, "Galbraith Supports China Sphere Idea," *The Free China Journal*, Taipei, Nov. 17, 1992.

間，中國也在香港的貿易、房地產和金融業中投入了同樣多的資金。中國銀行成了香港的第二大銀行。八成左右的香港製造商在大陸設立了分行，投資達300億港幣(40億美元)，雇用工人數目達300萬。隨著中國和臺灣可能於1995年獲准「入關」，即GATT(關貿總協定，不久將更名為WTO，世界貿易組織)，兩地和香港間的貿易還會加速，關稅更會降低，進一步推動市場一體化，促進「竹網」誕生。³⁴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歡迎大中華經濟區的出現。日本由於擔心競爭加劇，或許沒懷甚麼好意，並不喜歡這一發展趨勢；而臺灣海峽兩岸各自的內部政治阻力也不容忽視。保守的共產黨領導人擔心，伴隨著更大的開放，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必然湧入；業已存在的北方與南方、沿海與內陸的巨大經濟差異必然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臺灣的一些領導人也擔心，與大陸越來越緊密的經濟聯繫會使共產黨的統治更牢固，使臺灣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結果更容易被大陸吞掉。³⁵然而，密切的經濟聯繫所帶來的好處是無庸置疑的，中國巨大的市場形成，臺灣賺到了錢，享受了對大陸的貿易盈餘(1991年為35.4億美元，1992年為51.6億美元)。因此，儘管有政治上的躊躇不前，經濟現實正成為「大中華經濟市場」逐漸形成的最重要動力。

上一個十年出現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如此之大，以致一些人認為這可稱得上是一次「白色革命」，³⁶婉轉的說法就是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歷史的角度看，鄧小平的經濟革命所具有的意義或許已遠大於毛澤東的政治革命。

中美關係：最惠國待遇

中國對冷戰後的世界的認識是深刻而現實的，就算美蘇超級大國

³⁴ Murrey Weidenbaum, "Rising Chinese Economy Creates Prime Opportunity for U.S. Investors," *Los Angeles Times*, June 6, 1993; *The Free China Journal*, Oct. 15, 1993. (譯者注：大陸和台灣相繼於2001年11月正式加入WTO。)

³⁵ 李茲祥，〈共創大中華經濟共同圈〉，《探索》，1992年3月，第35-38頁。

³⁶ 李小明，第6-10頁。

間的敵對可能已經結束，國家之間依然會按照各自利益進行競爭、合作、妥協和鬥爭。為求生存，任何國家首先要考慮的是對自己的自然資源、經濟和軍事力量的絕對控制。

兩股強大的力量在冷戰之後的時代出現，這就是已經形成並日益強化的經濟競爭和新的政治均衡——世界將不會為任何單一個國家所控制。儘管美國目前依舊被看作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在巨大的國債、驚人的預算赤字和嚴重的國內問題面前，其實力已大打折扣。它不再是西方盟國對抗不復存在的蘇聯的唯一領袖，而是眾多參與競爭的國家中的一員。雖然其稱霸野心不容忽視，但已經是一個略微衰落的超級強國。

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增強。它在國際事務中往往採取低姿態，拒絕接替蘇聯擔當共產主義的核心，也不想與美國在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對抗。相反，中國集中精力於國內的經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並設法加強政治控制。儘管在美、中、俄三角關係中，中國失掉一些戰略優勢，但從地域政治的角度看，它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國家——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具有核能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還有聯合國的否決權，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益增強，而且所有這一切都在有效控制之下。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局面下，外國的投資和國際貿易越來越看好這塊地方，而中國也正從這些方面得到的好處，以為其現代化計劃籌集資金。因此，獲得美國的最惠國待遇，其意義絕不僅僅是一般的貿易利益，簡直就是支撐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搖錢樹。冷戰後的時代為中國的發展並且最終變得富裕與強大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而富裕與強大是這個國家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夢想。這一歷史良機絕對不能輕易錯過。³⁷

³⁷ 王陽敏，〈從「建設性」交鋒與「田忌賽馬」看中美關係的新走向〉，《探索》，1992年9月，第74–77頁；Nicholas D. Kristof, “As China Looks at World Order, It Detects New Struggles Emerging,”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1992; Gen. John Galvin, “America’s Asian Challenge,” *U.S. News & World Report*, Oct. 19, 1992.

布殊在中國和最惠國待遇問題上的立場 中國希望美國對其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及盡快融入全球市場的政策持肯定態度，並把它政治穩定看成是對世界和平的貢獻。1991年7月，布殊總統宣佈了他對中國「積極接觸磋商」政策。這是因為美國並不想孤立中國；相反，它希望加強與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接觸。布殊相信通過這些接觸，在促使中國改善其人權記錄、釋放政治犯、參加國際軍備控制、防止核擴散和軍火交易、遵守國際貿易慣例、尊重知識產權、禁止服刑勞工產品出口、開放中國國內市場等一系列問題上，溫和有禮的敦促是有可能奏效的。³⁸

中國在一定程度上認同布殊的方式，因為中國急於結束天安門鎮壓事件後國際社會對自己的孤立。鄧小平知道需要做生意和高技術，因此採取了不與美國對抗而是進行有選擇的合作，例如在柬埔寨和臺灣戰爭事務上。中國方面還認為必要的時刻釋放一些政治犯，可以顯示與外國的壓力無關。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逐年增加，1991年為120億美元，1992年為183億美元，1993年為227億美元。在1991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業已超過400億美元，這一切都表明最惠國待遇是多麼重要。為了國家的復興，北京會竭盡全力。

實際上最惠國待遇並不是甚麼特殊的優惠。在美國約160個貿易夥伴中，包括利比亞、敘利亞直到最近期的伊拉克，都享有最惠國待遇。但中國，作為一個共產國家，一直沒有得到這一待遇，直到1979-1980年，卡特總統實現了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並簽署了一系列外交和貿易協定，雙方才相互給予了最惠國待遇。1974年通過的傑克遜—范尼克修正案 (Jackson-Vanik Amendment) 要求總統每年向國會作證：任何一個共產國家只有允許自由移民才能得到最惠國待遇。由於來自香港和臺灣的人都被認定為中國人，中國的移民額度總是用得光光的。總統在為中國作證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難。但由於天安門鎮壓、人權踐踏、軍火貿易和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許多人提出要重新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資格予以審核。

中國對美貿易並不是一直享受順差。從1972年至1982年，每年的

³⁸ James A. Baker, III, 15-16.

對美貿易幾乎都是逆差，總計加起來達到81.96億美元。在1983到1985年間，雙方的貿易或多或少處於平衡狀態。此後，順差便開始迅速倒向中國。³⁹

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單位：美元)
1983年	7,100萬	
1984年	6,100萬	
1985年	600萬	
1986年	16.65億	
1987年	27.96億	
1988年	34.90億	
1989年	62.35億	
1990年	104.31億	
1991年	126.91億	
1992年	183.09億	
1993年	227.7億	

這一迅速增大的貿易赤字讓許多人警覺起來，尤其是那些國會議員。一些人提出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以減少逆差，也就是將中國商品的平均進口稅率從8%提高到40%；還有一些人提出在每年討論延長中國最惠國地位時要附加一些條款。經常被提到的條款是：中國人權記錄的改善、取消服刑勞工產品的出口、減少出售軍火和對巴基斯坦、伊朗和阿爾及利亞的核援助、停止在西藏的鎮壓、中國國內市場的開放、知識產權保護(尤其是在電腦軟體和醫藥方面)。曾幾何時，例行的延長審議變成了美國一年一度的激烈政治交鋒，政府贊成無條件地批准，而國會堅持有條件地延長。

加州女議員佩蘿西(Nancy Pelosi)是最積極主張用貿易手段迫使中國讓步的人。她得到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切爾(George J. Mitchell)、參議員霍爾姆斯(Jesse A. Helms)和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理格法爾德(Richard A. Gephardt)的支持。關於北京的領導人，佩蘿西說：

³⁹ 美國商務部數字，國際貿易管理，貿易及經濟分析，1989及1993年6月；以及 *Los Angeles Times*, May 4, 1991。

「他們可能不喜歡資本主義，也可能不喜歡人權，但他們喜歡錢。」⁴⁰由她發起，眾議院在1991年11月以409票對21票通過了一項議案：如果中國想得到1992年的最惠國待遇，就需要釋放所有在天安門事件中被捕的約一千人，停止向敘利亞和伊朗出售遠程導彈，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國內和西藏的宗教自由方面表現出「進步」，並「保證」不出售核技術，以及停止向美國出口服刑勞工產品。

1992年2月，參議院以59票比39票通過了有條件地延長中國最惠國地位的法案，但不足以推翻總統即將對此提出的否決，因為沒有達到必須的三分之二多數。因此布殊可以重複他過去三年的一貫做法，無條件地繼續給予中國1992年的最惠國待遇。

中國的抗辯 為獲得無條件延長其最惠國待遇，中國從上到下積極活動。從北京的高層到駐華盛頓大使朱啟禎，再到中國延聘的向美國政府和國會進行游說的公關和法律事務所。他們所圍繞的是四個精心策劃的題目：(1) 中美的地緣政治關係要比其他東西都更重要；(2) 必須承認中國的人權概念，這一概念的重點在於，滿足自己人民的物質需求，比放開西方式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3) 如果中國失去最惠國待遇，德國或日本有可能取代美國在中國的位置；(4) 美國統計的貿易赤字是基於「原產地國家」得出的，這樣計算並不公平，因為它將中國出口香港後轉口美國的商品算到了中國身上。而美國產品通過第三國進入中國便沒有統計為美國對中國的出口。⁴¹ 1981至1990年間，中國對美出口佔到其總出口額的8%，而中國從美國的進口提高到佔總進口的10-13%，這表明美國對中國的進口是在不斷增加的。⁴²

中國對「原產地國家」統計法的抗辯切中要害。因為自1987年以來，許多香港和臺灣的製造商將生產廠房遷往工資和原材料價格低廉的中國大陸。這些工廠的製成品通過香港出口到美國後，實際上被劃

⁴⁰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91.

⁴¹ Keith Bradsher, "A Hard Line From China on Trad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91.

⁴² 石柳子，〈最惠國待遇的角力〉，《中國之春》，1991年6月，第45頁。

在中國出口的名下。這就是為甚麼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急速擴大，而同時對香港和臺灣的貿易逆差卻在縮小。實際上美國對所有這三地——大中華區——的貿易逆差處於相對穩定狀態，每一年都在220億至290億美元之間。⁴³

(單位：億美元)

	中國	香港	臺灣	大中華區(所有三地)
1987	-27	-65	-190	-282
1988	-34	-51	-141	-226
1989	-62	-34	-130	-226
1990	-104	-28	-112	-244
1991	-127	-11	-98	-236
1992	-183	-7	-94	-284

為取得和解，北京表示願意與外國的代表討論人權問題。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謝夫特 (Richard Schifter) 應邀訪問了中國；美國駐華大使李傑明 (James R. Lilley) 獲准到西藏參觀；前總統卡特出訪中國時，中國人有禮貌地傾聽他要求寬容所有政治異見人士的談話。1991年5月，副國務卿吉米特 (Robert Kimmit) 訪華，公開討論了人權、防止核技術和導彈擴散、雙邊貿易及有關中東和柬埔寨的問題。

1991年11月，國務卿貝克 (James A. Baker III) 到北京，再次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作為回應，中國向美國提供了他們所關心的八百名中國政治犯的情況，但卻拒絕釋放他們中的某些人，也沒有同意國際紅十字會到獄中看望他們的要求。不過中國確實答應給那些沒有未決罪案的異見人士發放出國簽證，並同意在貝克訪問後的某個時刻允許他們中的一些人出國。⁴⁴

關於軍火貿易和防止核擴散問題，北京沒有作出明確承諾，只是保證「遵從」1987年的「導彈技術管制條例」，以換取華府放寬向中國出

⁴³ 美國商務部數字，引自Nicholas D. Kristof, "China Is Making Asia's Goods, and the U.S. Is Buy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93.

⁴⁴ 異見人士包括記者戴晴、侯曉天、王有才及韓東方。

售高速電腦和導彈零部件的限制。同時他們也表示年底前會簽署《核武器不擴散條約》。基於這些保證，1991年12月華府放寬了向中國出售大型電腦和導彈零部件的限制，儘管並沒有證據表明北京真的會遵守導彈條約或核不擴散條約。事實上，美國的情報部門並未停止監測中國向巴基斯坦和敘利亞運送M-9和M-11型彈道導彈，以及向阿爾及利亞運送核武器這類事情。更有甚者，在1992年9月布殊政府同意向臺灣出售150架F-16型戰機後，美國通過外交途徑獲悉，中國的態度激變。中國認為美國的行為是背離列根政府於1982年草擬的議定書。在這項議定中，美國保證會逐步減少對臺軍售。作為報復，北京恢復向巴基斯坦出口導彈零部件。因此，軍火貿易仍然是華府與北京摩擦的根源，它對中國實在是利益巨大，無法放棄。

中國在美的留學生、學者和異見人士，對於使用經濟壓力促使北京改善人權的做法一般持贊成態度，但他們不願看到由此而使得中美貿易、中國企業、改革者們，包括與出口貿易關聯的工人們受到損害。他們擔心，取消最惠國地位正中那些反對改革開放的頑固保守派的下懷。⁴⁵

克林頓的決定 曾於1975–1976年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大使級）的布殊總統，自認是中國問題專家；無奈他多次無條件地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卻遭到了許多人批評，還給罵成「無恥」。在1992年的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克林頓（Bill Clinton）攻擊他「縱容」中國領導人，忽視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⁴⁶ 克林頓當眾譴責「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並提出要用貿易手段迫使中國在人權侵犯、軍火交易、不正當貿易、宗教迫害、西藏鎮壓等方面有所收斂。中國領導層緊張了，決定不能陷入與美國的貿易戰。中國玩具佔了美國該項進口的30%、鞋佔40%、紡織品和服裝佔26%。如果因為人權和知識產權問題使得這一大好局面遭受破壞，實在可惜。⁴⁷

⁴⁵ Li Xianlu and Lu Mai, "Renew China's Trade Statu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3, 1991.

⁴⁶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0, 1992.

⁴⁷ 何新，〈中共對人權問題會作出回應嗎？〉，《探索》，1993年2月，第16–18頁。

中國外交部的一份保密文件警告說，貿易上的任何倒退對中國的傷害要大於對美國的傷害。南方和沿海地區的出口型企業，尤其是那些由港資和臺資企業專門生產出口美國的產品，將會遭到毀滅性打擊。對中國的直接後果將會是：(1) 在沿海地區造成一百萬人失業——那裏，大量的農村流動人口有可能釀成社會和經濟混亂；(2) 無法從世界銀行獲得低息貸款和借款；(3) 外國投資者和貿易商的信心大受打擊。在「經濟起飛」的關鍵時刻，這種倒退是中國承受不起的；中美關係的惡化都可能嚴重衝擊改革開放的根本政策。該報告建議，中國應公開抗議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但私下裏將政治犯作為「人質」，從美國那裏換取到更大的經濟利益。這份文件這樣寫著，「政治上退一步，經濟上進兩步」——這可算是一個雙贏計劃。

對此，鄧不僅贊同，並就經濟考慮第一、其他都要讓路的實用主義方針講了話，因為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發展經濟。確實，經濟增長就是最好的政治，「人質交易」遂成為可接受的方案。⁴⁸ 一系列指導方針被制定出來，對於那些表現較好、刑期較短、未曾對其施用過暴力的政治犯，可給予優先考慮。但這不是減刑，也不是承認錯捕，更不是迫於國外直接的政治壓力而釋放他們，這是出於「革命的人道主義」讓他們就醫治病。

如此看來，釋放政治犯並不是對國際人權標準的接受，而是精打細算的政治賭博，至多可以看成是中國承認人權問題是國際上關心的一個正當問題。⁴⁹ 結果一連串知名的政治犯在適當的緊急時刻獲得釋放，以便贏得美國的善意對待。包遵信，55歲，哲學家，1989年民主示威活動中的領袖，被判刑五年，提前於1992年11月初釋放，准許他出國就醫；王丹，1989年示威的學生領袖，被判入獄四年，1993年2月提前四個半月釋放；徐文立，49歲，八十年代初著名的民主鬥士，被判十五年，服刑十二年後於1993年5月被釋放。還有其他一些人獲允許出國。最後，為全力贏得2000年奧運會北京的主辦權，中國

⁴⁸ 這個詞語令人聯想到Oliver North上校在伊朗門事件中所用「軍火交易」的公式。

⁴⁹ 陸民聲，〈對美經濟勒索：中共用大陸的政治異見人士當肉票〉，《探索》，1993年2月，第77-80頁。

政府在1993年9月中旬釋放了最知名的政治犯魏京生，十五年刑期提前了一年半。

為表達縮小貿易不平衡差距的真誠願望，中國向美國派出了採購團進行大規模採購。1993年上半年，他們與波音公司簽定了價值八億美元的合同，購買21架噴氣客機，並附帶在今後幾年購買或租用不少於215架的價值90億美元的協定。中國向通用汽車、福特和佳士那每一家都訂購了4,600輛汽車，價值達1.6億美元。從德克薩斯州、路易斯安那州、華盛頓州的多家公司購買了價值兩億美元的石油鑽井和勘探設備。從休斯宇航公司 (Hughes Aerospace) 購買了八億美元的衛星。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採購，如：糧食、磷肥、電氣機械、電話和科研設備等。美國商人估計，中國這次採購可為美國創造十五萬個工作崗位，而未來的中國市場簡直無法估量。美國電報電話公司希望今後幾年每年為中國安裝750萬部電話，這個數字是它目前每年1,500萬部的一半。該公司副總裁托比亞斯 (Randall L. Tobias) 說：「我們正在洽談在中國的業務。這項業務，如果不說超過我們在美國的業務量的話，也絕不比它小。」他希望用發展電話通訊的方式讓中國開放，軟化它的高壓手段。⁵⁰

克林頓當選為總統後，對中國的態度變得溫和起來。他認同布殊在減少中國違反人權和貿易規則方面的成績，而不承認自己曾有過任何孤立中國的企圖。就在他仔細考慮今後的最佳方案時，他受到了來自298家大公司和37個貿易團體的強大壓力——這些機構都與對華貿易相關聯。其中包括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總商會。1993年5月12日，他們聯合致函給總統，要求不要將人權或任何其他條件附加到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否則美國將失去中國市場。這些公司強調，他們已經進入中國，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正當交易、改革開放和民主進程的推進。⁵¹

來自國外的請求也證明了上述立場。香港總督彭定康 (Christopher

⁵⁰ Calvin Sims, "China Steps Up Spending to Keep U.S. Trade Statu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7, 1993.

⁵¹ *The New York Times*, May, 7, 13, 14, 1993.

Patten) 雖然為香港未來的民主制度正在和中國拉鋸，但他仍敦促克林頓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地位，因為這麼做可能就像握住一個平和而有效的武器，對改變中國發生影響，同時保住香港十五萬個就業職位。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問白宮時，則請求美國幫助保護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傳統，因為大量漢族人正在移居西藏。

克林頓竭力要找出一個一攬子的方案解決，包括貿易逆差、軍火交易、人權、服刑勞工和藏人受迫害等一系列問題。他知道如果提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方案，國會可能會通過一項令中國人很難接受的關於中國的法案。1993年5月28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一項延長中國最惠國地位的行政命令；但他明確指出，1994年年中對它的再次延長將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中國在人權記錄方面，包括釋放政治犯或說明他們情況等等，要有「全面的、重大的進步」。至於1994年7月3日以後是否繼續延長，將由國務卿克里斯托佛根據中國在下列領域的表現，提交報告：

1. 釋放政治犯或說明政治犯的情況。
2. 保證所有犯人受到人道的對待，並允許國際人權組織如紅十字會視察監獄。
3. 保護西藏獨特的宗教和文化傳統。
4. 允許國際廣播和電視節目進入中國。
5. 禁止服刑勞工產品出口美國。
6. 停止對美國企業的歧視。
7. 遵守國際上有關限制導彈技術和核材料轉移的條約。⁵²

中國指責美國將貿易問題政治化，並說這違反了中美建交的基本原則。北京堅持人權是內政問題，不允許外國干涉。在1993年11月西

⁵² 1993年8月25日，美國對於中國售賣24枚M-11地對地飛彈給巴基斯坦，實施有限度制裁。華盛頓方面禁止在未來兩年售賣價值十億美元的高科技器材給中國。M-11飛彈射程190英里，載重1,100磅，而M-9飛彈射程300英里，兩種飛彈都超過1987年武器技術限制條約規定的射程185英里，載重1,100磅極限。中國並未簽署限武條約，但於1991年11月時答應觀望有關發展。美國採用出口限制的法例對任何違反限武條約的國家實施制裁。

雅圖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斷然拒絕了與克林頓總統就人權和軍火交易問題舉行公開對話的建議。相反他作了一個15分鐘的「自話自說」，談到不得干涉其他國家內部事務的重要性。普遍流行於中國官員中的感覺是：美國自己的人權記錄遠非完美，其立場從而是虛偽的。財政部長劉仲藜不無嘲諷地說：「美國持有三重標準，對自己的人權問題視而不見；對有些國家的人權問題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中國的人權問題他們睜大雙眼、緊盯著不放。」⁵³ 對中國人這種起來勇敢面對美國、反對將西方價值強加於中國的做法，大多數亞洲國家表示贊同，還有一些國家暗地裏為中國喝彩。

克林頓政府內，對如何更好地促進美國在華利益歧議紛呈。財政部和商業部遭到美國公司的請願炮轟，要求關注在興旺的中國市場上擴大貿易和投資機會的必要性。在承認人權問題重要性的同時，財政部長本特森 (Lloyd Bentsen) 和商業部長布朗 (Ronald Brown) 指出，商業投資、貿易、導彈出售、軍事合作、地區安全也是制定國家政策時應充分考慮的因素。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居世界第三位，到2015年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從現在起到本世紀末中國所計劃的5,750億美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將使美國的公司得到數目龐大的訂購合同，外加美國工人難以數計的就業機會。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魯賓 (Robert E. Rubin) 和總統經濟政策副助理吉特 (W. Bowman Cutter) 更進一步認為，每年都威脅取消最惠國待遇的這一做法已經過時，只會起到反作用。用取消最惠國的做法懲罰中國，對美國造成的傷害同中國的一樣巨大。

相反，如果採用更加溫和及微妙的方式——通過貿易和投資的不斷接觸——卻可以使中國逐漸演變：開放的程度越來越大，對西方的商業慣例和思想也越來越不予排拒，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最終實現民主。它會使中國的改革者受益，也能減少保守派的戒心。看看中國那些激增的衛星天線、傳真機、手提電話、彩色電視、股票市場、外國報紙、銀行和金融服務就可以感到，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已經走了

⁵³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1994.

多遠。確實，商品的出口決不比思想的出口次要，因為經濟的進步肯定會導致政治的自由。⁵⁴ 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應建立在經濟實用主義、貿易、實業投資、國家安全考慮，以及人權與貿易分離的基礎上。

對於這番議論中的邏輯，克林頓並非不知道，只是他受制於自己下達的嚴格行政命令。為了重新獲得外交上的主動權，他制定了一項「加強磋商」計劃。按照這一計劃，一個接一個的高官將被派往北京，敦促中國人改善他們的人權、貿易和武器銷售方面的記錄，同時設法開創更好的雙邊整體關係。1994年1月第一個踏上征途的，是農業部長艾思比 (Mike Espy) 和財政部長本特森，兩個人都受到了熱情款待。接著在3月，輪到國務卿克里斯托佛。事後證明這次出訪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克里斯托佛曾經公開對中國侵犯人權提出批評，這次帶著敦促中國改善人權記錄，以便克林頓有理由延長其最惠國待遇的訊息去出訪。在他到訪中國的前一周，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沙塔克 (John Shattuck) 先走一步，為這次訪問作準備。令中國官員們感到錯愕不解的是，2月27日，他跑去見頭號異見人士魏京生，會面時間長達90分鐘。魏呼籲克林頓保持對中國政府經濟施壓，督促釋放政治犯。同一時間，另外七名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也向江主席呼籲結束鎮壓，釋放所有政治犯。政府對此的回應是將魏和十餘名呼籲民主的領袖人物再度抓起來。這是擺下陣勢，給即將來訪的國務卿好看。

在正式會談中，總理李鵬明白告訴克里斯托佛，中國永遠不會屈服於美國的壓力，也永遠不會接受美國的人權觀念。李警告說，如果克林頓取消最惠國待遇，美國在華的商業利益將會受損。外交部長錢其琛也指責沙塔克會見「假釋犯人」違反了中國的法律。他駁斥了美國

⁵⁴ Thomas L. Friedman, "New Tack o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3, 1994; Stephen Robert, "In China, Let Free Markets Aid Libert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1994; Bill Bradley, "Trade, the Real Engine of Democracy,"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94.

關於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達227億美元的說法。他指出，對美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到香港、臺灣和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企業，也包括中美合資企業。如果華府取消最惠國待遇，中國可以重新向亞洲市場出口，損失不會超過10%，這樣做將不會對中國9%的年增長率造成多大影響。由於主要是自給自足，沒有最惠國待遇對中國來說也可以過得過去，就像1972年尼克遜訪華前那樣。

美國的企業界站在中國政府一邊。在北京的二百名美國企業界領袖，責怪克里斯托佛有關貿易與人權掛鉤的「誤導」政策，令美國企業在與日本和歐洲各國企業競爭時處於劣勢。美國電報電話公司執行經理瓦利克(William Warrick)警告說，取消最惠國待遇有可能將美國的企業逐出巨大的中國市場。克里斯托佛耐心地為自己辯解，說美國並不需要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而只是要堅持對世界人權宣言的承諾。然而實際上，人權問題涉及到的正是中國政治體制的核心。

中國的策略 中國的敵對態度令美國人迷惑不解，但從中國自己的政治看卻是順理成章。在一段時期，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當時他已經89歲)，北京的政治人物爭相表明對共產主義體系的忠誠，對美國的強硬立場則成為今後爭奪繼承權鬥爭中的資本。這一政治氣候注定了克里斯托佛訪問的結果，更要命的是他的到訪時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召開。

任何對中國人權立場的分析，都先要對共產主義體制的本質有所了解。列寧主義的獨裁建立在秘密警察、軍隊和「黨領導一切」的高壓手段之上。思想控制和勞動改造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人權在這裏完全沒有位置。即便在今天較為開放的中國，政府依舊把政治異見和民主啟蒙看成是反革命威脅。政治多元化和權力共享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辭彙。知識分子的不安分被看成是政治動亂和社會動盪的前奏——它會攪亂經濟增長，使現存秩序難以為繼。不管是真的還是出於想像，如果共產主義體制在中國已危若累卵，最惠國待遇問題便成為次要的了。

在中國當局看來，沙塔克跑去見魏京生，無疑是與罪犯串通，是給反政府運動打氣，提高了魏京生的國際聲望，為異見人士壯膽。從

魏京生傳達給朋友們的資訊裏看到，他們認為克里斯托佛訪問期間，可能會有「重大事情」發生。政府本能地擔心魏在想辦法見這位官員，而異見人士們會利用這個機會來發動一次大示威。官方的第一個反擊是拘捕主要異見人士，或者把他們遷移到北京之外，禁止所有的知識分子與外國使節會面。他們的做法是根據鄧小平慣常使用的命令：在打擊抗議活動上絕不能有半點遲疑，也不能顧及國際上的反應。

另一樣令政府寢食難安不敢稍有懈怠的，是一浪高於一浪的社會和經濟緊張，這方面包括有人數達一億的「流動」富餘勞動力；高達26%的城市通貨膨脹，使得蔬菜價格上漲54%、糧食上漲40%、肉類上漲30%；以及農民的不滿，他們把糧食賣給政府時，只收到「白條」而拿不到錢。工人們的不滿和毫無緩解趨勢的下崗，使得中國僅在1993年一年，就爆發了6,000次罷工和200次騷亂。實際上，政府對組織起來的工人和農民的恐懼不亞於對異見人士。為了保持「社會穩定」，甚麼極端的手段都使得出來。

在這種擔心和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下，美國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干涉便被看成是製造混亂，是一項更大的搞垮中國陰謀的先擊排炮。本來，黨以發動「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來對抗外國影響；如今美國自己找上門干涉起中國內政來了，黨對它的報復是把克里斯托佛當成是克林頓的替身來加以羞辱。

其次，由於數百家美國企業競相獲取在中國投資的機會，眼睛盯住高達5,75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此外，由於中國每年9%的進口增長率，北京確信美國不會甘冒被逐出這一巨大市場的風險。它算定最終美國的經濟利益會戰勝人權問題上的考慮，使得克林頓別無選擇，只有繼續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地位。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最惠國待遇取消對美國的傷害要大於對中國。

第三，北京知道聯合國需要中國的合作，以便對北朝鮮進行制裁，因為北朝鮮不允許聯合國對其核設施進行視察。這使北京更加確信，美國會以延長最惠國待遇作為酬謝。此外，沒有一個歐洲或亞洲國家將貿易與人權掛鉤，美國為甚麼非得這樣做？日本首相細川護熙1994年3月訪問北京時說過，西方的人權觀念不應不分場合地套用到所有國家身上。

最後，克林頓陷入了兩難之境，即在人權問題上與中國交鋒的同時，希望與中國改善經濟和軍事關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樣重要的矛盾是應該充分利用的。中國於是採用「分而治之」的戰術，曲意勸誘美國企業，讓他們狀告自己的政府。中國人還在小心培植與美國財政部、商業部良好關係的同時，對國務院持強硬態度，總是用經濟利益來對抗人權。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他們不怎麼擔心，並且斷定克林頓不敢取消，因為克林頓不能承受惹惱美國企業界的後果，他需要這些人在未來選舉中的支持。中國人很懂美國政治，所以成功地讓華府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之中。

美國政策的逆轉 克林頓總統在1993年5月簽署行政命令時，曾受到普遍稱讚，說這一出色舉動表現了政治家的風範。但實際上他只不過是將難辦的對華決策向後推遲了一年，讓自己在行動上多少有一些轉圓的餘地。當中國人看穿了他的威脅不過是虛張聲勢之後，克林頓便面臨著痛苦的抉擇：一是取消最惠國待遇，一是讓貿易與人權脫鉤。他知道前者對兩國都將造成災難性的經濟後果，而後者則會嚴重損害他的個人聲譽。同時他的批評者——人權組織也在其中——堅持認為，只要美國堅守自己的原則，便沒有商量的餘地，中國是會屈服的，因為中國需要美國的市場來完成現代化，彌補總額達128億美元的貿易赤字。

奇怪的是，在克林頓政府中沒有一個人真的想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國會中想這樣做的人也沒有幾個。緊迫的問題是，怎樣找到一個能保住面子的方法，挽救克林頓的對華政策。顯然，華府需要中國的合作。這看起來很有希望，因為李鵬總理宣佈說中國願意盡「最大的努力」改善同美國的關係。1994年4月23日和5月14日，北京釋放了兩名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袖——35歲的王軍濤和41歲的陳子明——讓他們保外就醫。中國與瑞士紅十字會達成一項協定，允許該會到預先選定的監獄視察。1994年4月，二百人的中國採購團與美國企業簽定了價值110億美元的合同。最後在5月18日，北京同意接待美國的技術小組，共同討論停止對「美國之音」的干擾問題。

在中國的人權狀況只取得有限進步的情況下，克林頓本來可以或

全部、或部分、或有選擇地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國會的態度傾向於貿易與人權問題脫鉤，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切爾 (George J. Mitchell) 和眾議員佩蘿西提出了「針對性制裁」方案。按照這一方案，中國國有企業和軍工企業的產品進口美國時將會被取消關稅優惠，而對私營企業仍維持優惠。然而，這一複雜程式執行起來將是一場噩夢，況且北京明確反對任何附帶條件的新的最惠國待遇。

5月24日克里斯托佛向總統報告說，中國已經滿足了兩項必須的要求：停止了服刑勞工產品的出口，並且允許了某些異見人士和他們的親屬移民國外。然而，在其他五個方面，中國並沒有做出「整體性的可觀的進步」：信守國際人權協定；釋放或說明政治犯的情況；允許國際紅十字會視察監獄；停止干擾國際向中國廣播電視節目；保護西藏宗教和文化傳統。

在決定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上，克林頓飽受折磨。5月26日，他以一種辯解式的、幾乎是痛苦的聲調宣佈，雖然中國在「繼續嚴重地侵犯人權」，但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讓他在附加象徵性條款的情況下重新給予中國最惠國地位。這個附帶條款就是禁止進口中國生產的槍械和彈藥——估計每年達2億美元，而中國進口貨的總值是310億美元。在這個聲明中，克林頓正式表達了要將貿易與人權問題脫鉤的想法。總統說：「這種掛鉤在過去那些年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我認為，從前幾個月我們努力與中國的接觸看，這項政策的作用已不復存在了。現在到了採取新方式實現我們長遠目標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將我們的關係放到一個更大的和更具建設性的格局中。」

這種令人震驚的政策轉變等於默認了克林頓發佈了錯誤的行政命令，而「布殊是對的」。更有甚者，它向全世界傳達了這樣的訊息：對美國也可以公開藐視而不怕受懲罰。克林頓的信譽受到巨大打擊。參議員米切爾和女眾議員佩蘿西威脅要通過立法來推翻總統的決定，並對中國實行更多的制裁。但許多國會議員和外交政策專家都認為，總統的決定也許在政治上會有些麻煩，但是站得住腳。除非國會兩院都反對，否則他的決定不會被推翻。

促使克林頓這樣做的背後原因，是他對美中整體關係、美國企業

在華利益和美中貿易帶來的就業機會等一系列問題的考慮。更重要的是他感到還有一些原因使他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決定，那就是在地緣政治上需要中國的合作來處理北朝鮮的事情；還有中國改革運動的未來。他確信變革的趨勢會使中國不得不接納一種平穩的、最終改變成一個更自由更開放社會的道路。

從更大的視角來看，總統的行動反映了新時代的精神，在這個時代中經濟利益支配著外交政策的決定，最重要的是利潤而不是原則。這種轉變標誌著天安門事件主導外交時代的結束，一個提升國際商業交往、重視科學、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時代開始了。

中國自然對克林頓的決定持歡迎態度，並且預測與美國的關係將會改善。大多數亞洲和歐洲國家都鬆了一口氣，圍繞著最惠國待遇一年一度的爭鬥終於結束了。

鄧小平在歷史上的地位

鄧小平是1979年以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1997年2月20日去世，享年92歲。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一個地主家庭，他在歷史中的第一次亮相是1920年16歲時到法國勤工儉學。在那裏，他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回國後成為忠誠的共產主義者。1935年，鄧小平以《紅星報》編輯出席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並在會上支持毛澤東，此後得到快速提升。1957年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曾指著鄧小平對赫魯曉夫說：「看到那邊那個矮個子了嗎？他聰明絕頂，前途無量。」⁵⁵ 毛澤東的話具有前瞻性。就在毛澤東去世後不久，鄧小平於激烈的繼任鬥爭中脫穎而出、青雲直上，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

鄧小平能夠在歷史上佔一席位，最重要的一點就是1979年勇敢徹底地改變了毛澤東的路線。他宣告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並將中

⁵⁵ Nikita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1974), 253. Tr. and ed. by Strobe Talbott.

國帶進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經濟掛帥」取代了毛的「政治掛帥」。他推出兩個新口號——「實事求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扯去了罩在毛澤東身上半人半神的神秘面紗，告訴人們毛澤東思想需要經過事實、實踐和真實世界的仔細檢驗。將毛澤東從神壇上請下來以後，鄧小平單槍匹馬地推行起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大膽政策。這是他消除共產主義缺陷和局限的方式。三十年來，正是這些缺陷和局限一直將中國拖拽在貧窮與落後之中。

鄧小平只是借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強共產黨的統治，而從沒有想過讓中國走西方議會式的民主道路。對他來說，三權分立就好像一個國家內有三個政府，每一個都爭著要在國家事務中有更大的發言權，相互爭執攻擊。他討厭政治多元化，因為這種政治模式鼓勵爭吵、妥協、相互掣肘，結果是軟弱無力。鄧小平認為中國經受不住像學生示威和西方自由主義思潮泛濫這樣的折騰。只有強有力的政府所實施的絕對服從和無條件的忠誠才能確保國家的穩定，而這也是實現給中國帶來富裕強大的現代化的基礎。

鄧小平認為在經濟進步和政治保守之間沒有甚麼矛盾。但這兩者本質上是不協調的，只有一時平衡，而沒有可能長期共存。最終，經濟繁榮和社會富裕會淡化革命信念，侵蝕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基礎。因此，鄧小平用準資本主義來挽救共產主義，很可能已埋下了使共產主義在不知不覺間消滅的種子。最初也許感覺不到，實際卻正向著政治自由化的最終目標行進呢。

鄧小平揮之不去的遺憾，是他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中作出下令鎮壓學生的痛苦決定。反對使用武力的總書記趙紫陽，最終也沒有被判入獄，可能是鄧事後覺得他自己做得「過火」了。但是，像許多政治家一樣，鄧不承認自己的錯誤。

無疑，在歷史排序上，鄧的分量要低於毛，但他的經濟革命對中國和整個世界的影響要大於毛的政治革命。實際上這兩者是互補的。毛澤東摧毀了舊社會；而鄧小平卻為建立一個經濟繁榮、採用西方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新中國打下了基礎。可惜他的偉大因無力改變列寧主義的獨裁政治而減色。只有實現了政治自由化——第五個現代化——中國的改革才算是完成。

參考書目

- Baker, James A., III,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92, 1-18.
- Barmé, Geremie, "Traveling Heavy: The Intellectual Baggage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No. 26 (Winter 1992): 3-20.
- Borthwick, Mark, "A Hard Line from China on Trad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91.
- Brugger, Bill and David Kelly, *Chinese Marxism in the Post-Mao Era* (Stanford, 1990).
- Brzezinski, Zbigniew,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1993).
- Catton, Chris, "Great Leap Backward," *New Statesman & Society*, England, Jan. 8, 1993, 28-30.
- Chai, Joseph C. H., "Consump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 1992, 721-49.
- 承濟，〈當前中國大陸的流民問題〉，《探索》，1993年1月，第40-44頁。
- Ch'i, Hsi-sheng, *Politics of Disillusionm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Deng Xiaoping* (Armonk, N.Y., 1991).
- Chien, Frederick F., "A View from Taipei,"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92, 92-103.
- China: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Washington, D.C., 1990). The World Bank.
-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Daedalus*, Spring 1993.
-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1991), 2 vols.: Study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 千家駒，〈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問題〉，《探索》，1992年4月，第11-16頁。
- Chinese Communist Central Committee, *A Critique of the Soviet Central Committee Second Plenary Session*. Confidential. Complete text reprinted in *China Spring*, May 1990, 64-65.
- , Document 2, Feb. 28, 1992。全文重刊於《爭鳴》，香港，1992年4月，第23-27頁。

- Cohen, Roger, "An Empty Feeling Is Affecting Eastern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93, E3.
- Copper, John, F., and Ta-ling Lee, *Tiananmen Aftermath: Human Righ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0*. Occasional Papers/ Reprint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4-1992.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達寧, 〈中國大陸鄉鎮企業農業和農業環境問題〉。現代中國中心論文, 1992年2月, 第16期, 第1-10頁。
- "Deng Xiaoping: An Assess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 1993, 409-572.
- Galvin, Gen. John, "America's Asian Challenge," *U.S. News & World Report*, Oct. 19, 1992.
- Garver, John W., "China's Push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Interaction of Bureaucratic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2, 999-1028.
- ,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llapse of Soviet Commu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3, 1-26.
- Greenhouse, Steven, "New Tally of World's Economies Catapults China Into Third Plac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0, 1993.
- Harding, Harry,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1992).
- 何新, 〈中共對人權問題會作出回應嗎?〉, 《探索》, 1993年2月, 第16-18頁。
- Holley, David, "Beijing Wants Open Market but Closed Society," *Los Angeles Times*, May 9, 1992.
- , "The New Religion Is Money," *Los Angeles Times*, Jan. 15, 1993.
- Holme, Richard, "China: Tiger's Gilded Cage," *New Statesman & Society*, England, Jan. 22, 1993, 19-20.
- Hsu, John, C., *China's Foreign Trade Reforms: Impact on Growth and Stability* (Cambridge, England, 1989).
- Kallgren, Joyce K., *Building a National-state: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Berkeley, 1990).
- Kristof, Nicholas D., "China Sees Singapore as a Model of Progress," *The New York Times*, Aug. 9, 1992.

- , “Looking Beyond Deng, Leaders Find Chinese Looking Beyond Them,”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1, 1992.
- , “A New Class of Chinese Is Emerging: Home Owners,”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2, 1992.
- , “Entrepreneurial Energy Sets Off a Chinese Boom,”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4, 1993.
- , “Don’t Joke About This Stock Marke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9, 1993.
- , “Chinese Communism’s Secret Aim: Capit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9, 1992.
- , “Poor Chinese Town Bets Its Shirt on Making Buttons and, Bingo,”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8, 1993.
- , “Backed by China, Go-Getters Get Rich,”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7, 1993.
- , “A Tycoon Named Mu: Product of Old China Leading the New,”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92.
- , “As China Looks at World Order, It Detects New Struggles Emerging,”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1992.
- , “China Is Making Asia’s Goods, and the U.S. Is Buy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93.
- , “China: The Conglomerate, Seeks a New Unifying Principle,”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1, 1993.
- Kuch, Y. 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 1992, 637–90.
- 老貝, 〈從變革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未來〉, 《探索》, 1993年1月, 第76–77頁。
- Lardy, Nicholas R.,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1978–1990* (Cambridge, England, 1992).
- , “Chinese Foreign Trade,”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 1992, 671–720.
- 冷橫眉, 〈十四大為大陸埋下了動亂的禍根〉, 《探索》, 1992年12月, 第35–39頁。
-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of Technocracy,”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0, 1–35.

- 李小明，〈中國南方的資本主義熱〉，《中國之春》，1992年10月，第6–10頁。
- 李茲祥，〈共創大中華經濟共同圈〉，《探索》，1992年3月，第35–38頁。
- Li, Xianlu, and Lu Mai, "Renew China's Trade Statu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3, 1991.
- 劉學民，〈和平演變救中國〉，《探索》，1991年6月，第35–38頁。
- Liu, Yia-ling,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2, 293–316.
- Lord, Winston, "China and America: Beyond the Big Chill,"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9, 1–26.
- 陸民聲，〈對美經濟勒索：中共用大陸政治異己人士當肉票〉，《探索》，1993年2月，第77–80頁。
- McCord, William, *The Dawn of the Pacific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Three Worlds of Development* (New Brunswick, 1991).
- Meisner, Maurice, "What Beijing Leaders Know That Critics Won't See: Repression Can Be Profitable," *Los Angeles Time*, Oct. 25, 1992, M2.
- Nathan, Andrew, *China's Crisis: 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1990).
- Rocca, Jean-Louis, "Corruption and Its Shadow: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f Corrup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2, 402–16. Tr. From French.
- Safire, William, "Vision in Collisi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3, 1992, A25.
- Saich, Tony,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A Programme for Authoritarian Rule,"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2, 1136–1160.
- Salisbury, Harrison E.,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1992).
- Shen, Tong,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2, 1992.
- Solinger, Dorothy J.,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 1980–1990* (New York, 1992).
- Tsai, Wen-hui, "New Authoritarianism, Neo-Conservatism, and Anti-Peaceful Evolution: Mainland China's Resistance to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ssues & Studies*, Taipei, Vol. 28, No. 2, 1992, 1–22.
- "The People's Republic After 40 Year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9, Sept. 1989, pp. 420–630.

- Tucker, Nancy Bernkopf, "China and America, 1941–1991,"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92, 75–92.
- Vogel, Ezra,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Mass., 1989).
- , *The Four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1991).
- 王維新，〈鄧小平路線的觀察〉，《探索》，1992年5月，第40–42頁。
- Weidenbaum, Murrey, "Rising Chinese Economy Creates Prime Opportunity for U.S. Investors," *Los Angeles Times*, June 6, 1993.
- WuDunn, Sheryl, "Economy Is a Pawn in China's Power Gam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5, 1992.
- , "Booming China Is Dream Market for West,"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5, 1993.
- , "Chinese Suffer from Rising Pollution As Byproduct of the Industrial Boom,"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8, 1993.
- , "As China Leaps Ahead, The Poor Slip Behind,"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3, 1993.
- 楊漫克，〈大陸現代化騷動〉，《探索》，1992年11月，第43–45頁。
- 楊漫克，〈「有房階級」崛起大陸〉，《中國之春》，1993年3月，第47–48頁。
- Zweig, David,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s Countrysid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orts from Rural Industry,"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1, 716–41.

第四十二章

中國的崛起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國際地位被認為已達到十九世紀初以來之顛峰。長時間的內憂外患讓位於社會活力勃發和國家民族的新生。長達一個世紀的追求國家富強及獲取國際尊重，看來將可取得。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的巨大勢力，贏得了國際公認為亞太地區超級大國地位，以及有可能在2020年時成為雄踞世界的超級大國之一。¹

當前的世界格局有利於中國的崛起。蘇聯解體和隨之而來的俄羅斯的混亂、歐洲各國的相對衰落，以及日本的經濟失衡和對軍事力量的限制——這一切都使中國得以填補空白，並在世界政治舞臺中扮演重要角色。已經無力再一手遮天擔當「世界警察」的美國，需要中國成為亞洲一支穩定的力量，而且已經把它認作自己的「戰略夥伴」。

中國取得這一新的地位，有三件事情發揮了重要作用：英國歸還香港、中美恢復正常關係，以及和平統一臺灣的前景。在某些人看來，二十世紀後期中國的崛起可與一個世紀前美國的崛起相提並論。

香港回歸

按照1984年12月19日簽定的《中英聯合聲明》，英國同意於1997年6月30日午夜將香港、九龍和新界歸還給中國。這一時刻標誌著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終結，也標誌著大英帝國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

¹ The World Bank, *China: 2020* (Washington, D.C., 1997), 97–104; John Nasbitt, *Megatrends Asia* (New York, 1996), 232–235.

隨著1961年葡屬果阿 (Goa) 回歸印度和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中國，始於五百年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代的歐洲向非西方世界擴張，從此就結束了。今天，亞洲沒有一塊地方依舊處於外國勢力統治之下。

七十年代，離新界租用期滿 (1997年6月30日) 日趨臨近，英國人變得不安起來。1979年3月29日，香港總督麥理浩 (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 前往北京，提出了延長租借期的申請。基於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鄧小平拒絕了這一要求，因為中國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再次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重申這一觀點。1983年9月2日，英國表示同意歸還香港主權，但作為交換，他們要求繼續保持對香港的治理。中國則堅持要求兩者必須同時歸還。經過十四個月的反覆爭論和討價還價，英國最終答應放棄所有三個地方——香港、九龍和新界——而鄧小平則向英國外相賀維 (Geoffrey Howe) 保證：「維持香港 (現行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1984年12月19日，戴卓爾夫人和中國總理趙紫陽共同簽署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其中英國同意於1997年6月30日午夜將香港全部三個地區歸還中國。中國方面則由鄧小平宣佈了「一國兩制」的方針，即：賦予香港「高度自治」，並且保證「其社會經濟制度五十年不變」。此外，香港將由港人自己治理。這些方針將體現在《香港基本法》中。這部法律於1990年4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規範了未來治理香港的具體細節，包括：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2.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3.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4. 除國防和外交事務外，香港由香港人治理。

5.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6. 終審法院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最高法院。
7.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每屆60人，由選舉產生，到2007年間接選舉將逐步變為普選。
8.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
9. 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
10.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²

實際上，「變」是香港的本質，她每一天都在變。所謂「五十年不變」的真正含義，是指五十年間，香港人對這一區域有管理並促進發展的權利，同時享有高度自治。到了二十一世紀，在中國變為超級強國的過程中，香港的輔佐不容忽視。³

英國的殖民統治 在1842–1997年的一百五十六年間，香港一直作為英國殖民地，由擁有絕對權力的總督實施全面治理。香港的法律不得違背英國議會頒佈的決定。直到1985年，英國議會通過了《香港法案》，才賦予香港立法機構有修訂或拒絕英國法案與決定的權利。在實踐中，總督對香港的統治是相當寬鬆的，他不干預社區的事務，對傳統風俗、宗教活動、社會習俗相當尊重。總督的職責是維持高效率的管治、法律制度、司法獨立、良好的公共秩序、公民權利，以及公平和合理的競爭精神。這是一種仁政的殖民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對經濟繁榮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² 《香港基本法》。亦見 *Los Angeles Times*, June 30, 1997。

³ Ambrose Y. C. King,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wenty-First Century*, June 1997, 14.

在政治上，英國從來沒有將民主制度賦予香港，直到殖民統治的最後幾年，才開始改變這種情況。從香港人自身方面看，他們不曾有過民主訴求，對自己主要致力於追求經濟成功、過著「世界公民」式的生活感到滿意。中國人的生意頭腦和英國人的嫻熟治理相得益彰，將香港造就成亞太地區和東南亞主要金融和經營管理中心。這裏的人們過著富裕的生活，享受著言論、集會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與大多數文明社會沒甚麼區別，儘管沒有政治民主，然而人人都清楚自己是生活在「借」來的時間、生活在「借」來的土地上。⁴

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966年的686美元飆升到1997年的27,500美元，超過了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⁵英國認為香港成功的秘訣在於法治、公務員制度、經濟自由和自主的生活方式。戴卓爾夫人多次提到英國的「道義責任」，但避免提及香港人的民主問題。⁶英國最為關心的是，維持它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如果可能的話，則盡量採取溫和寬厚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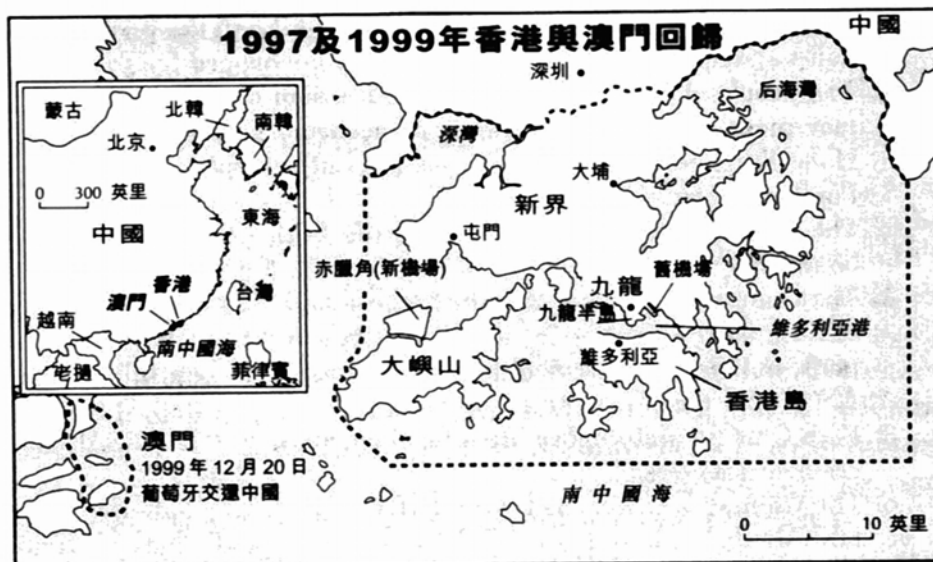
1989年英國和中國協議在1997年7月1日政權移交的那一年之內，香港可以舉行首次立法會選舉。⁷1990年，北京同意立法會的60個議席中有20個由直接選舉產生。到1991年9月，大約18位支持民主的人士當選。總督衛奕信(David Wilson)委任了另外18名親北京的保守人士，其餘名額由「功能組別」選出，分別代表金融、地產和製造業的利益。

⁴ Ting Wai, "The Exter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No. 2, 1997, 12.

⁵ Brian Hook, "British Views of the Legacy of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7, 576; Liu Shuyong, "Hong Kong: A Survey of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150 Years," *ibid.*, 590.

⁶ Ming K. Chan, "The Legacy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A View from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op cit.*, 580.

⁷ Chas. W. Freeman, Jr., "Hong Kong and False Alarm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1997.



英文原著內之地圖改編自1997年6月3日*The New York Times*。

1992年，前英國保守黨主席彭定康被任命為香港第二十八屆、也即最後一屆總督。彭定康上任後，為使民主進程加快，儘管沒有提出完全的普選，但他提出立法會的大多數議席均應由直接選舉產生。這個選舉改革方案於1994年6月30日在立法局以一票的優勢獲得通過。1995年9月選舉正式開始，當選議員可以在1997年政權移交後兩年多的時間裏繼續保持議員身分——即所謂坐「直通車」——以確保已成定局的民主制度。中國指責彭定康在時間表和基本法有關條款上背離了以前達成的協定。彭定康則為自己辯護說，他的做法是出於香港人的利益，保證香港經濟今後能持續發展，反映普遍的民意。北京誓言在政權移交後立即解散立法會，並以一個新指定的立法機構代替它的職能，直到重新選舉。有四年之久，北京拒絕與彭定康對話，但彭卻大受港人愛戴，成為捍衛人民權利和民主的鬥士。許多英國外交部的官員和老牌中國問題專家，如前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都在私下裏覺得彭定康的對抗政策有些過分，難以真正保證香港的最大利益。⁸

政權交接儀式 香港在1842年割讓給英國時，只是一個小漁

⁸ Brian Hook, *op cit.*, 562-563.

村。到1997年回歸時，她已經變成一個國際金融貿易的繁華大都會，用英國前外交大臣賀維的話形容，香港是「一樽名貴的明代花瓶」。1997年6月30日午夜，移交儀式正式舉行。查里斯王子 (Prince Charles) 代表英國女王首先致辭：

我很高興向香港市民為他們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裏所取得的所有成就表達我的敬意。香港的輝煌成就需要——也應該——得到保持。香港讓全世界看到，活力和穩定是如何成就一個成功社會諸般特徵的。它們共同造就了令世界羨慕的偉大的經濟……作為一個蒸蒸日上的商業和文化的交匯處，她……豐富了我們所有人的生活。1984年的《聯合聲明》在全世界面前鄭重保證，香港的生活方式將會延續下去。我很樂意代表女王陛下和全體英國人民，向全體香港市民表達我們的感謝、欽佩、熱愛和祝福。一代又一代，作為朋友你們一直是如此可信賴和非同一般。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當你們在自己輝煌歷史的新篇章中前進時，我們將以最大的關切注視著你們。⁹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630萬同胞回到「祖國的懷抱」表示歡迎，並且保證：

香港回歸後，中國政府將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保持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法律基本不變。……

香港特別行政區將逐步推行符合香港實際的民主制度……香港將繼續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繼續發揮國際金融、貿易和海運中心的作用，維持它與其他國家、地區和相關國際組織的經濟、文化聯繫。所有國家和地區在港的合法經濟利益將會受到法律保護。¹⁰

⁹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 1997.

¹⁰ 同上註。

來自全球各地的八千名記者和傳媒工作者前往報道。隨著儀式的進行，英國光榮地結束了在香港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統治，中國則驕傲地洗刷了令人痛心的國家民族屈辱。遍佈各地的中國人，無論政治信仰如何——不管是共產黨人、國民黨人、還是無黨派人士——無不為這一歷史時刻歡呼。值得指出的是，在應邀出席這個儀式的四千位貴賓中，有一個是由海基會主席辜振甫率領的臺灣官方代表團。

交接儀式後，新當選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宣誓就職。接著，他主持了由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帶領的政府主要官員的就職宣誓，大約有一千名英籍的公務員選擇了繼續留任。¹¹ 李國能繼續擔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大多數重要的香港社會機構在新時期中將仍舊保留。回歸前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局被立即解散，由一個臨時立法會接替。臨時立法會的委員是由一個四百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而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則由北京挑選，主要由親中的商人把持。香港終審法院裁定，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擁有權委任臨時立法會，凌駕於香港基本法之上。這就像當初英國議會可以推翻香港法院的裁決一樣。在香港禁止組建一個共產黨；也禁止一切鼓吹西藏和臺灣獨立的活動。

董建華是一位航運業巨賈的後裔，雖然曾在英國就讀六年、在美國生活十年，但依舊具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氣息。如今他優先考慮的是在教育、住房和老年人福利上的改革；盡力成為「他自己」，而不僅是北京的喉舌。董建華既要顧到香港的利益，又須顧到北京的利益。在就職宣誓中，董建華仔細地闡述了他的治港理念：

每個社會必須有自己的價值，以產生其共同的目標和一致的觀念。我們將繼續鼓勵我們社會的多樣性，但也必須同時重申並且尊重中國優秀的傳統價值，包括孝順老人、眷顧家庭、謙虛、正直和不斷更新的願望。我們重視多樣性，但不贊成公開對抗；我們爭取自由，但不能為此而犧牲法治；我們尊重少數人的意見，但也要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保護個人利益，

¹¹ Edward A. Gargan, "Hong Kong Still Carries Britannia's Indelible Mark,"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9, 1997.

但同時承擔著集體責任。我希望這些價值會為我們社會統合提供堅實的基礎。¹²

政權移交前，西方的媒體、政治人物和人權活動家都擔心，中國能否真正實踐它對香港的保證：保障由「高度自治」這個短語所涵蓋的香港的政治和經濟自由、法治、司法獨立、專業公務員制度，以及出版自由和公平自由競爭等。《財富》雜誌甚至刊登了一篇標題為《香港之死》的文章。¹³ 前不久，美國還一直覺得香港是屬於英國管轄而採取不干涉政策。但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它對香港的自由和自治越來越關心了。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案》，規定總統應須就香港的政治自由狀況向國會匯報。

對於香港的平穩過渡，中國有自己的想法。最基本的一點是，中國想向全世界證明，對香港的治理，如果不說更上一層樓的話，起碼也要與帝國主義者一樣好；其次，中國可以從香港吸收人才、資金、科技知識和管理經驗，幫助實現現代化；第三，平穩過渡可以成為一個象徵：在改革開放方針指引下，一個寬容和進步的新時代開始了，由此贏得國際上的信任，願意「接納」而非「抵制」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的崛起；¹⁴ 第四，香港的成功交接可以為最終統一臺灣樹立榜樣；第五，香港的平穩過渡有助於江澤民秋天的訪美；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國際金融界可以對中國的行為舉措起到有力的監察作用。外國在港的投資已達一千多億美元，中國對香港事務的任何干涉，都可能損害香港的投資氣氛與環境，把外國資本嚇跑，導致股市下瀉、地產崩盤。穆迪和標準普爾等國際評估機構會隨之降低香港的信用評級，這一結果對香港的金融業將是災難性的。美國、英國、歐洲和日本的投資公司，如美林、柏克萊 (Barclays)、富達 (Fidelity)、凡卡德 (Vanguard)、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和三菱實業等，會因

¹²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 1997.

¹³ Louis Kraar, "The Death of Hong Kong," *Fortune*, June 26, 1995, 118–132.

¹⁴ Patrick E. Tyler, "China Issue for the Post-Deng Era,"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9, 1997.

此而撤離。北京領導層的信譽指數竟然與恒生指數連繫在一起，實在是一件具有諷刺意味的事。¹⁵

回歸後的香港 儘管有許多可怕的預言，但在回歸後的日子裏，香港並沒有出現人才大量外流、社會動盪、或對媒體的粗暴干涉，以及警察對異見人士的鎮壓等事情。四千名中國解放軍駐紮在他們的軍營內，共產黨組織也沒有建立。日子一天天過去，看起來與往常並沒有甚麼不同。

但在平和表面之下，人們的內心深處總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在一些地方，生活漸漸變得不那麼國際化，中國的成分越來越多。這是一種微妙的、難於覺察的過程。驟眼看去，不會引起注意。教科書重新修訂，以反映中國對各種事務的態度；作家和出版商開始「自律」，避免觸及中國的敏感之處。其實在英國統治的最後三年，這種變化就已經悄悄開始。在火車站和機場，如今已經使用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進行廣播。公務員在開會和寫報告時要用中文，而不再像過去那樣用英語。董建華希望港人能掌握「兩文三語」，從而傳達出香港在中國統治下的新形象。在教學中，英文開始被中文替代。四百所中學裏只有一百所（絕大部分是天主教會學校），經特許使用英文教學三年，其餘的學校在1998年必須改用中文教學。

立法會的新選舉法相當複雜。60個議席中，20個由民選產生，其餘40名中有10名由選舉委員會選出，剩下的30名由「功能界別」，如商業機構、專業團體等選舉產生。為了阻止民主黨及其同盟而設計的比例代表制，使選民數目由1995年的270萬銳減至18萬。選舉委員會由800名經過挑選的投票人組成：包括所有臨時立法會的成員、香港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還有順從的公司領導人。¹⁶

¹⁵ Thomas L. Friedman, "Mighty Saviors of Hong Kong: Greed and Ego,"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Hong Kong, July 5–6, 1997; Chas. W. Freeman, *op ci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1997.

¹⁶ Robert Stone and Esther Lam, "Stifling Democracy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9, 1997.

回歸後，香港遭受了兩次與回歸沒有直接關聯的嚴重危機的打擊。第一次是1997年7月起始於泰國，後來波及到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韓國的金融危機。雖然香港受到的影響較小，但恒生指數從8月份的16,673點暴瀉至12月份的8,700點。很多商人損失慘重，旅遊業下降30-50%。房地產泡沫爆破；住宅價格暴跌40%；商業大廈比起高峰的1997年下跌了30%。失業率在1998年10月達到5.3%。消費水平、零售、進出口水平都大大下降。1998年前三季度香港生產總值分別跌落2.8%、5%及7%，全年統計為負增長5.1%。香港遇到了自1961年政府開始掌管統計以來第一次全面衰退。¹⁷

第二個危機是1997年秋天爆發由H5N1病毒引起的「禽流感」。導致130萬隻各類家禽被宰殺。雖然這次感染得到成功抑制，但對香港的商業，特別是餐飲業來講，仍然是一次巨大打擊。

在這一經濟災難的背景下，期待已久的立法會選舉終於在1998年5月24日舉行。投票者人數達創紀錄的水平。選民冒著傾盆大雨前往投票。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代表了香港人對未來民主制度的一次全民公決。

在全部合資格的選民中，參加投票的選民佔53.3%，大大超過了英國統治時期1991年的39%和1995年的35.8%。那些在1997年7月1日回歸後被剝奪了立法會席位的民主派領袖，這一次重新當選，分別有民主黨的李柱銘、前線的劉慧卿、民權黨的陸恭蕙。李柱銘領導的民主黨贏得了13席和43%的選票，加上其同盟者所贏得的席位，民主派得到了60個立法會議席中總數20個選舉席位和大約70%的選票。但這一情況仍然比回歸前的27席要少。在這次選舉中，親北京和親商團的人士所得支持甚差，但他們在另外兩項「選舉」中——10名由選舉委員會選出、30名由功能界別選出——卻相當得意，所以在立法會中他們的人數仍超過民主派。民主人士的再次當選，被看成是對北京任命立法會做法的抗議，也表明公眾對經濟狀況的不滿。興高采烈的李柱銘

¹⁷ Mark Landler, "Sanctuary Lost: Hong Kong Can't Hide From Asia's Woe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0, 1998; *Ming Pao*, Hong Kong, August 28, 30, 1998; *Los Angeles Times*, Nov. 28, 1998.

勇氣倍增，呼籲加快全面民主化的進程，並且要求在2000年，而不是基本法規定的2007年，舉行特首的選舉和全部60名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根據法律規定，2007年以前實行全面民主，需得到特首董建華的贊同和全國人大的批准，而這兩者都絕對沒有可能。

回歸一年後，香港政府竭盡全力以維持住原狀，而中國政府也一直信守不干預香港事務的承諾。香港居民在中國統治下所享受到的自由，與在英國統治下沒有甚麼不同，日常生活中所享有的民主大致都保持下來。

中美關係

在國際關係史中，一個新的重要國家崛起，總會打亂國家間已有的平衡及破壞既定的國際行為模式。與這個命題相關的一個例子就是二十世紀臨近時威廉時代的德國。它的出現，極大地打亂了以大英帝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如今，中國的崛起無疑是對美國為首的國際體系的挑戰。德國與中國無法相提並論。中國在領土、人口、悠久的文化力量和崛起後可能產生的影響上，都要比德國大得多。新加坡元老李光耀在1994年說：「中國在世界中地位更替的作用如此之大，恐怕須經過三、四十年才能找到新的平衡。僅僅將它看成加進來一個大國是不行的。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個。」¹⁸

對西方而言，這種局面的出現完全出乎預料，需要以一種全新的思維來面對。中國太大，無法對它實行孤立；太強，無法進行抑制；太重要，又無法疏遠它；其市場太有錢可賺，則更是無法無視。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將會怎樣對待這個新崛起的潛在對手？就像美蘇關係決定了上半個世紀的世界格局一樣，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想來會決定今後半個世紀的格局。¹⁹

¹⁸ 引自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6), 231.

¹⁹ Richard Haass, "Fatal Distraction: Bill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Fall 1997, 120. Haass 是布殊總統特別助理(1989-1993年)及國家安全部高級主管。

對中國來說，目前正處在歷史上的有利時期。中國經過了一個半世紀的內憂外患，富裕、強大和獲取國際尊重似乎已唾手可得。中國人在精神上重新獲得自信，很多人認為國運正在往上走，該是中國宣稱自己「天命所歸」的時候了。

顯然，中國在發展經濟和實現現代化的時候，是需要一個持續和平的環境與大量的外國資金和現代技術。為此，與美國和平共處、友好合作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政策。華府與北京都清楚，合作可以給雙方帶來巨大好處，而對抗卻會帶來巨大損失。

基於這樣的共識，一種和平的夥伴式的中美關係浮出水面，儘管雙方在意識形態、文化、政治制度、社會習慣、地理和戰略考慮等方面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差異。兩國領導人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在容許分歧和緊張的同時，應盡力不讓雙邊關係脫離了互惠互利的軌道」。²⁰ 爭執、利益衝突及艱難的討價還價都會出現，但最終的結局不會是戰爭。相互間的警惕和提防，將是今後二十或三十年間雙邊關係的特點。2020年，將是非常關鍵的時刻，其時中國將成為一個超級大強國。

「中國威脅」論？ 在1990–1995年間，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迅速壯大。1992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3.25%，1993年增長了13.4%，1994年增長了11.8%，到1995年，按照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採用的購買力等值計算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達到了35,350億美元，處於世界第二位，僅低於美國的73,970億，卻高於日本的28,850億、德國的16,480億、法國的12,480億、英國的11,500億和義大利的11,870億。²¹ 中國用十年時間(1980–1990年)使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翻了一番，而同樣的結果，英國用了58

²⁰ “U.S.–China Summit Stirs Winds of Pragmatism,” editorial,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31, 1997.

²¹ 陳子明、王軍濤：《解除中國危機》，(Ontario, Canada, 1996), 210. CIA,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1997* (Updated Jan. 12, 1998), Table 7.

年(1780–1838)、美國用了47年(1834–1981)、日本用了33年(1880–1913)。²²到2020年，中國的經濟實力可望與美國一較高下。

從1988到1993年的帳面上看，中國的軍費翻了一番，實際增加為50%。1993年的軍事預算按官方匯價估計為220–370億美元，按購買力等值計算法估算可能是900億美元。²³中國一直在穩步改進它約300萬兵員的強大武裝力量，而且已經擁有眾多先進的飛機、導彈、潛艇。雖然它的9,000輛坦克、5,000架飛機和1,150艘艦船還都不夠先進，核武力量也不大——大約相當於法國的規模——但它擁有17枚以上洲際彈道導彈、70枚中程彈道導彈和12枚潛艇發射導彈。洲際導彈的射程範圍達8,000公里，可以打到莫斯科和美國西岸。²⁴

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迅速增長與對美貿易順差高速增長是同步的。1994年為295億美元、1995年為337.9億美元、1996年為395.2億美元、1997年為497億美元、1998年為568.9億美元。到1997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1,399億美元，僅次於日本的2,120億美元，卻高於德國的740億美元和美國的330億美元。²⁵財富往往被看成是勢力和地位的象徵，而成功令人充滿自信和感到尊嚴。許多中國人感到祖國成為一個偉大的並受到國際重視的國家的時刻終於到來。

但實際上，中國到底有多麼強大？衡量一個國家的實力有八條或九條標準：(1)人口和領土；(2)自然資源；(3)經濟實力；(4)軍事力量；(5)戰略和地理重要性；(6)科學和技術成就水平；(7)國際組織的參與情況和投票權；(8)文化與教育水平；以及(9)在困難的情況下堅決貫徹國家政策的意願和決心。前六個標準可以看成是「硬實力」，後

²² Kishore Mahbutani, "The Pacific Way," *Foreign Affairs*, Jan./Feb. 1995, 103.

²³ Huntington, 230。事實上，很少人知道中國軍費的預算數字是多少，因為大部分的費用隱藏在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煤炭工業、採礦、鐵路、通訊，以及郵政服務。中國軍費預算的估計為400億到1,400億美元(價格購買力等值計算法)。

²⁴ *The New York Times*, Dec. 3, 1996.

²⁵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5, 1997.

三個可以看成是「軟實力」，但兩者同樣重要。²⁶ 根據上述標準，一位著名的中國軍事和科學問題專家判定九十年代中國的國家實力位居世界第六，到二十一世紀初可能會升至第五。在2000年，他對中國整體實力的實際評價指數是437.53，美國是816.85。²⁷ 許多中國專家認為，直到2020年或2030年，中國才可能成為真正的強國。但中國政府目前正朝著實現偉大的強國目標而全力奮進。

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實力的評估要比西方偏嚴、偏緊和更加苛刻。中國西部和西北地區有三億居民長期生活在貧困中；從內陸省份流動到沿海地區的臨時工人有1.2億；貧富差距、南北差距和城鄉差距日益擴大；大型國有企業長期虧損的局面難以解決。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制約性因素，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對此十分清楚，但外國人眼裏看到的只是中國正在成為超級大國。這是由於：(1) 中國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2) 中國是核大國；(3) 按購買力等值計算法標準，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世界第二，儘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屬最低之列；(4) 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最快；(5) 中國享有巨額貿易順差並有龐大外匯儲備；(6) 中國國內對自己未來必定強大的命運擁有共同的信念。²⁸

基於這些因素，西方人認為中國是亞太地區的區域性強國，到2020年，會成為世界級的超級大國。

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 從傳統上看，美國不能容忍任何一個國家主宰歐洲或亞洲。美國曾兩次參戰以阻止德國征服歐洲，及另一次參戰以阻止日本在亞洲稱霸。²⁹ 美國將如何對待正在崛起成為新的東亞強權、並最終在更大的地緣政治區域發生影響的中國？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弄清楚中國會否步日本和德國的後塵去侵略別的國家，並因此而對美國的利益造成威脅。中國的目標是甚麼？在二十一世紀它會怎樣在世界中給自己定位？

²⁶ Joseph S. Nye, Jr., "Still in the Game," *World Monitor*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onthly), March 1990, 42-47.

²⁷ 黃碩風，《綜合國力論》(北京，1992)，第36-38, 106-111, 218-226, 231-232頁。

²⁸ 陳子明，第200-202頁。

²⁹ Huntington, 228-229.

按照美國的分析主要大國的實力對比(1990年)

	硬實力				軟實力		
	基本資源	軍事	經濟	科技	國家凝聚力	整體文化	國際機構
美國	強	強	強	強	強	強	強
蘇聯	強	強	中	中	弱	中	中
歐洲	強	中	強	強	弱	強	強
日本	中	弱	強	強	強	中	中
中國	強	中	中	弱	強	中	中

資料來源：Joseph S. Nye Jr., "Still in the Game," *World Monitor*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onthly), March 1990, 47.

中國對主要大國實力對比的分析(1989–2000年)

排序	國家	1989年綜合		2000年綜合
		國家實力	年均增長(%)	國家實力
1	美國	593.33	2.7	816.85
2	蘇聯*	386.72	4.4	648.34
3	德國**	378.10	3.3	558.23
4	日本	368.04	3.2	537.39
5	中國	222.33	5.8	437.35
6	法國	276.35	2.8	384.93
7	英國	214.08	2.3	281.24

* 基於解體前的蘇聯數位統計。

** 包括東、西德兩方。

資料來源：黃碩風，《綜合國力論》(北京，1992)，第220–221頁。

歷史上，中國曾與許多鄰國進行過戰爭，但從未長期佔領、或將他們置於殖民地地位。與此做法相反，中國的傳統做法是向他們傳播儒家思想，用自己的教化改造他們。有些人說這種做法是中國式的文化帝國主義，而這一傳統在當今時代並未中斷。在過去的五十年裏，中國參加過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和1979年的中越戰爭，但在敵意對峙結束後即撤回全部軍隊。今天中國在國外沒有一兵一卒。1995年11月16日出版的中國軍事《白皮書》明確宣

佈：中國「不會在國外派駐軍隊或設立基地，因此不會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

儘管中國軍隊將美國當成假想敵，但它對美國的軍事力量卻從來不敢掉以輕心，並盡可能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對抗。³⁰ 一位著名的軍事家曾警告說，侵略戰爭不會有任何收穫：歷史已經證明，從拿破崙到三、四十年代的納粹黨、法西斯分子和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全都以可恥的失敗和自我毀滅而告終，並給無數無辜百姓帶來巨大災難。³¹ 人們不應被一時的軍事勝利所帶來的短暫榮耀所誘惑。因此，儘管常有虛張聲勢、氣勢洶洶和措辭強硬的聲明見諸報端，但中國的軍隊基本是謹慎的，不魯莽冒險。

強大的中國似乎並不會步德國和日本的後塵，但它要求鄰國能夠採「尊重」、「友好」與「合作」，並奉行不與敵人結盟的政策。中國也會在中國海和南中國海施加影響，以保護其石油資源利益；並會繼續維護對菲律賓附近的南沙群島 (Spratley Island)、帕西爾島 (Parcel Island) 和美濟礁 (Mischief Reef) 的主權；及宣告擁有印尼納塔納島 (Natuna Island) 附近的天然氣田。³² 然而中國似乎沒有意思成為貪得無厭的侵略者。³³

1995年中國的軍事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在1995年11月16日發表的一萬五千字的軍事《白皮書》中，北京提出要建設一支能夠打贏一場局部戰爭，包括對臺灣的戰爭的超現代化及高科技軍隊。受到美國在海灣戰爭表現的啟發，江澤民迫切希望建立起一支高度機動的部隊，能在最短的時間裏以最小的代價打贏一場高科技戰爭。為了將軍隊從兵員密集型轉變成技術密集型，他提出裁軍50萬，強調把質量擺在數量之上，並且駁斥美國所說的「中國威脅論」是毫無根據的。

³⁰ Ross H. Munro, "Eavesdropping on the Chinese Military: Where It Expects War, Where It Doesn't," *Orbis*, Summer 1994, 356.

³¹ 黃碩風，第231-232頁。

³² Huntington, 230; Ross H. Munro, 358-360.

³³ 平可夫，〈華府在東亞戰略中的兩岸因素〉，《中央日報》，台北，1997年5月8日。

然而，中國確實有最終取代美國而成為亞太地區盟主的野心。在1997年8月的東盟汶萊會議上，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指出：「我們不承認美國所說的它是保持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力量。」他要求美國不要再將自己當作是「東方救星」而四處活動。而美國的立場早經其國務卿克里斯托佛明白闡明：「美國在軍事、經濟和政治上現在是、並願意繼續是一個太平洋強國。」³⁴ 美國在亞洲駐軍10萬人，包括在日本的47,000人和南韓的37,000人。對中國的日益強大感到不安的一些亞洲小國，對美國在亞洲的立足表示歡迎。

遏制論與磋商論 美國想要擬訂一個現實的對華政策是很困難的，部分原因是這一挑戰本身沒有先例，也因為華府在這個問題上有「遏制」和「磋商」兩派。前一派認為，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增長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更為緊張的對峙，這局面是對亞太地區安全和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的威脅。為防止這樣不利的後果，美國必須增加其在亞洲的軍事力量，並加強與中國鄰國的同盟關係。美國必須採用冷戰時曾經對蘇聯做過的那種策略，對中國進行遏制，最終使共產主義在中國垮臺。記者白禮博 (Richard Bernstein) 和孟儒 (Ross H. Munro) 在《即將來臨的對華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一書中認為：「在過去的大約十年裏，中國為自己制定了直接與美國利益針鋒相對的方針，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傲視亞洲的強國。」中國受到過的「歷史屈辱」，把今日的反對大美國主義，成了「事關民族尊嚴的大事」。他們認為：「北京的統治者甘願冒與美國開戰的風險，不會是為國家利益，而是因為事關他們統治小集團的利益。」因此及時「遏制」中國是絕對必要的。³⁵

³⁴ Jim Mann, "A Confident China No Longer Wants America's Military Muscle in Asia,"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7, 1995;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eal China Threa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27, 1995.

³⁵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1997), 5, 11;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7, 18-32; Gerald Segal, "East Asia and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96, 107-135.

另一方面，贊成「磋商」的人則認為，「遏制」只會煽動中國的民族情緒，引發極端主義，加劇緊張和敵意，最終可能導致戰爭爆發。這項政策不僅不會得到美國亞洲盟國的支持，而且會使所有在中國推進多元化和人權的努力毀於一旦，同時毀掉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前途。「遏制」中國無疑是孤立美國，然而增加對話和接觸則可以促成中國共產主義者逐漸「和平演變」；假以時日，發自內部的潰敗終將導致其整體消亡，就像蘇聯曾經發生的那樣。³⁶

積極支持「磋商」派的人裏邊，有前國防部副部長、現任哈佛甘乃迪政府學院院長小尼耶 (Joseph S. Nye, Jr.)。他警告說，過去在對待德國和日本崛起時，由於各國處理失當，導致了世界大戰的爆發。如今若在處理中國的問題上再犯同樣的錯誤，美國是承擔不起的。美國有太多的角色牽扯進來——人權和反對核擴散的鼓吹者、工商界人士、臺灣和西藏(獨立)的游說者——所有這些人都要求懲罰中國。但從大的戰略意義上講，首先要考慮的則是如何將中國整合進國際體制，使它成為負有責任的一員。這樣美國就可以避免一場新的冷戰，並在處理重要的全球事件時能有中國的支持。通過發展經濟、增進與外部世界接觸、中產階級社會的成長壯大，以及地區選舉付諸實施，中國正在向一個更開放的社會邁進。美國必須要避免與中國發生戰爭。³⁷

1996年春臺海危機發生後，第三派別，所謂「軟遏制」派開始擡頭。中國的導彈試驗，雖說是精密而準確，但卻暴露出其軍事技術還

³⁶ Kenneth Lieberthal, "A New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Nov./Dec. 1995, 35–49; Robert S.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7, 18–32;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7, 42–51; David Shambaugh,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6, 180–209.

³⁷ Joseph S. Nye,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5, 90–102; "We Can't Afford to Lose China Again,"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29, 1996; Jonathan Clark, "Tame the Bull in Clinton's China Shop,"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30, 1996.

停留在七十年代而未達九十年代的水平。因此，很難把中國說成是一種「威脅」。儘管中國的防衛力量很強大，但在二十一世紀初期，也只能算是二流的軍事強國。不過，忽視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是不明智的。美國一定要保持住軍事和技術力量的絕對優勢，才可以確保其堅不可摧的地位。與中國進行磋商，會將它慢慢導入國際社會主流，最大限度地減小其潛在威脅，建立起建設性的夥伴關係。

在全球力量對比中，美國是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擁有第一流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隊，而且具有最先進的技術和最現代化的資訊系統。但與世界上別的國家相比較，它的力量稍有下降，因為其他國家國力正迅猛增長。對華的戰略制定，須借助美國與盟國的關係：(1) 與日本簽定更新版本的安全條約；(2) 與韓國維持牢固的同盟關係；(3) 與北朝鮮展開對話；(4) 與越南和柬埔寨建立外交關係；(5) 向臺灣出售150架F-16戰機；(6) 加強與印度的友好。

美國的對華政策可以總結為：在軍事和技術絕對優勢的基礎上進行親切友好的磋商——這就叫做「軟遏制」。

《美日安全條約》 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利益的保障是靠《美日安全條約》，原本在1978年的指導方針是以蘇聯為假想敵。蘇聯解體和1996年3月發生的臺海危機，使條約的修訂成為必然。由於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當可觀的國防預算(每年多達500億美元)，在緊急情況下，它可被委予重要角色。1997年9月24日新推出的指導方針特別強調：如果美國的軍事力量捲入到一場發生在「日本周邊地區」的危機中，美國將會要求日本提供非戰鬥性的支援，並為美國開放港口、海灣和機場。如果中美因臺灣問題而交戰，這一新寫入的責任就將日本推到了一個敏感的位置上。「日本周邊地區」的準確定義是甚麼？它是否包括臺灣和韓國？在蘇聯不復存在的情況下誰是新的假想敵？這些有意製造出模稜兩可的語言，不僅在日本，也在臺灣和中國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宣稱，新的指導方針並不是針對哪個「具體國家」的，其他美國官員也強調它不是「地理性的，而是局勢性的」，它所涉及的是功能，而不是所涵蓋的地

域。³⁸但北京確信這個條約隱密的目標是中國。如果戰事爆發，中國同時面對的，將是美國和日本兩個國家。

按嚴格的說法，指導方針涉及的只是美國和日本兩家，並不包括臺灣，因為它不是條約簽署國，不應將其包括在內。但如果臺灣受到攻擊，戰火延伸到臺灣海峽，海上通道的安全就會受到影響。這時，對指導方針的解釋就會視情況而定了。對華府而言，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全，跟對華貿易以及維持美中友好一樣重要。對日本而言，貿易和海上通道的暢通對它的經濟生活至關重要。新的指導方針的主要目的，是警告中國不要過度挑起事端，而不是要對臺灣提供防衛保障。³⁹

佩里的作用 在美國改變對華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是克林頓政府的國防部長(1994年2月-1997年)佩里(William J. Perry)。他認為磋商並不是為了撫慰或支持中國的共產主義者，而是一種現實的保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做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所採取的孤立主義政策，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之一。所以佩里認為，與中國積極磋商的政策可以起到避免未來戰爭爆發的作用。

在佩里的全球戰略構想中，美國應始終保持最高度的軍事戒備和最大的技術優勢，要做好同時進行兩場局部戰爭的準備及在最小犧牲的情況下迅速贏得勝利。在這一戰略構想中，國家防務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步是將麻煩消滅在萌芽狀態，不讓它長大。通過推動民主、鼓勵自由的市場經濟、加強政治磋商等做法減少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同時，相關國家軍事領導之間建設性的交換看法和互訪，將有助於增加了解和信任，減少因疏忽或誤斷釀成事端的可能性。「戰爭行動需要的是保密和突發，而和平方動需要的是公開和信任。」因此，佩里提倡

³⁸ Robert A. Manning, "U.S., Japan Deepen Defense Ties — and China Gets Nervous,"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8, 1997; *Los Angeles Times*, Editorial, "Tension Over U.S.-Japan Pact," September 28, 1997.

³⁹ 陳鴻瑜，〈美日安保對臺海安全影響深遠〉，《中央日報》，臺北，1997年9月25日。

「軍事透明」說。若將這一哲學應用到亞洲，美國在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結成緊密同盟、參與東南亞國協(ASEAN)的同時，必須將中國完全拉入到「戰略夥伴關係」中。

如果麻煩不能先行化解，美國接下來要使用的政策，就是說服、勸阻，甚或不惜以軍事威脅的辦法防止衝突發生。如果這樣仍不能制止戰爭發生，美國應毫不猶豫地使用具有絕對優勢的軍事和技術力量實施打擊，速戰速決，以最小的人員和物資損失贏得戰爭，就像海灣戰爭那樣。這一「預防—抑制—擊敗」三重戰略，還有待於不斷的改進和提高。⁴⁰

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將軍於1996年12月5日至18日應邀訪美，就是佩里的「軍事透明」和「開放性」政策的結果。面對如此精微的武器系統、先進技術、訓練條例和軍事條令，遲浩田不可能看不到兩國軍事力量間存在的巨大差距。

美國國防機構的結論是，按照美國九十年代的標準，中國尚不具備強大的攻擊能力，在今後的二十至三十年裏，也不會構成真正的威脅。而到那時，美國在軍事技術領域將更遙遙領先。從本質上講，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是冷戰時期列根對付蘇聯戰術的延伸，也就是：一方面保持軍事技術優勢，一方面在建設性磋商的外表下實行遏制，最終導致對手內部發生變革。

1996年中期，隨著圍繞中國問題所引起的爭論結束，克林頓政府終於將「對抗」轉變為「建設性磋商」。1996年7月，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萊克(Anthony Lake)被派到北京，轉達這一政策上的變更。

中美關係中的棘手問題 從華府的角度看，三大問題嚴重制約了美中關係的發展，分別是人權、貿易逆差和防止核擴散。在這三個問題中，人權問題是觸及西方與中國價值體系的核心。美國人認為，西方的民主和價值體系經過二千年的發展，代表了人類最高成就，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因此應屬普世準則，放之四海而皆準。在蘇

⁴⁰ William J. Perry, "Defense in an Age of Hope," *Foreign Affairs*, Nov./Dec. 1996, 64-79.

聯解體和海灣戰爭勝利後，布殊總統宣佈了以美國民主和資本主義制度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的誕生。國會政策企劃小組副組長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歷史的終結」一文中大膽提出：在征服了世襲的君主體制、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以後，我們終於有機會看到「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最終結果和西方自由民主式的政府組織形式得到普遍接受」。西方的人權概念、民主原則和市場經濟體制將會在新的「進步」浪潮推動下席卷全球。⁴¹

雖然西方價值的推行在原則上得到了許多亞洲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認可，但在實踐中還是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大約在1994年初，一些東南亞的領導人受到經濟成就的鼓舞，開始對西方的觀念提出挑戰，倡導他們自己所謂的「亞洲價值」。這種價值觀主要是建立在儒家的禮教、紀律、責任、節儉、中庸禮讓、家族觀念、家國天下這類觀念之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這一思想的主要倡導者。他提醒說，美國人不應該「不分場合地將他們的制度強加給別人，因為(這樣做)根本不起作用」。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 (Mahatir Mohamad) 在1996年對歐洲的領袖們說：「亞洲價值是普遍適用的價值，歐洲價值是歐洲專有的。」

北京曾經一度不承認中國存在著人權問題，但最近幾年它的策略卻有所改變，反而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更基本、更重要，甚至比「抽象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後者可以以後再談，但當十二億人等著吃飯、穿衣、居住和受教育的情況下，中國的優先安排要由它的特殊國情來決定，美國不應將自己的價值體系強加到中國身上。⁴² 中國的立場得到了許多非洲、中東國家和拉美發展中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礎上，中國進一步為自己進行了積極的活動，用自己利潤豐厚的市場拉攏一些歐洲國家，要求他們在1997年4月的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大會上不要加入美國發起的對中國的譴責。結果德國、法國、西班牙和

⁴¹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3-18.

⁴² 《1996年中國人權白皮書》摘要，重印於《中央日報》，1997年4月1日。兩篇有關白皮書的評論刊於同一報刊，1997年3月29日，1997年3月30日。

義大利沒有加入到譴責的隊伍中，只有英國、丹麥、挪威和瑞士支持了美國的立場。投票結果是27票對17票，譴責提議遭到了否決。⁴³ 然而美國公眾對中國糟糕的人權記錄依舊持強烈批評態度，許多知名人士都要求釋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異見人士。

1997年10月，聯合國人權高級委員會新任主席、愛爾蘭前總統羅賓遜夫人 (Mary Robinson) 宣稱，與那些來自「歷史上充滿壓迫、暴力、飢餓和貧困的國家」的人一樣，她理解一個國家在社會和經濟發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進步之間保持平衡的必要性。她說：「按照這個尺度，應該對那些特別大的國家給予更多的信任，例如中國。它已經在教育、食物和住房等基本權利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他們所取得的一切是不尋常的……他們覺得……沒有得到足夠的承認。」⁴⁴

嚴格地說，「亞洲價值」是一個神話。亞洲包括三十多個國家，文化種類繁多。這些文化不僅建立在儒家倫理上，還有神道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其他許多小的地方原始文化和價值體系。將所有這些文化捏合成統一的「亞洲價值」體系的共同要素並不存在。⁴⁵ 1997年下半年，亞洲許多國家出現經濟危機，使「亞洲價值」的提法沉寂下來。⁴⁶ 其實許多要素，無論是在西方價值還是在亞洲價值中，都發揮著根本作用。將這兩種價值明智地融合到一起，對未來才是大有裨益的。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集中出現在九十年代。1994年為295億

⁴³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1997.

⁴⁴ Barbara Crossette, "At the U.N. a New Voice Stresses Balance in Approaching Human Right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1997。1997年10月中國簽訂《國際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並於1998年10月簽訂《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但兩項公約仍未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September 8, 16, 1998;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6, 1998.

⁴⁵ 蕭新煌，〈亞洲民主價值：衝突與對話〉，刊《中央日報》，1997年8月31日；Martin Lee, "Testing Asian Valu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1998.

⁴⁶ David E. Sanger, "The Stock of 'Asian Values' Drop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1997.

美元、1995年為337.9億美元、1996年為395.2億美元、1997年為497億美元及1998年為568.9億美元。

順差高速增長的部分原因，是中國在1994年將人民幣貶值，從5.8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變為8.7元人民幣兌1美元；也有部分原因是美國的「原產地國家」統計法造成了數值虛高。因為中國的勞動力便宜、資源豐富，許多臺灣、香港、韓國甚至日本的公司都將自己的生產基地遷到中國。當地工人的每月工資很低，只有52美元；相比起來，雇用臺灣工人要用1,224美元、韓國要1,584美元、日本要4,156美元。這些公司的產品通過香港出口到美國，全部被美國海關算到中國對美出口上，使得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總是高居不下。另一方面，美國對香港、臺灣、新加坡和韓國的總貿易赤字卻在相應下降，1994年為120億美元、1995年為80億美元、1996年為65億美元。考慮到通過香港轉運附加值低，中國對美貿易順差1994年可能約為200億美元、1995年為220億美元及1996年為265億美元。中國反駁這些數字還是過高，並認為1995年應是86億美元、1996年應是100億美元。華盛頓布魯克林研究院 (Brooking Institution) 的著名經濟學家拉迪 (Nicholas Lardy) 相信，美國的計算誤差達50%。⁴⁷

人權和貿易逆差不只是造成美中關係緊張的二個問題，其他問題還有：中國向巴基斯坦和伊朗出售核武器問題、侵犯知識產權問題、西藏和臺灣問題，以及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活動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都會導致與美國的摩擦，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據中國人的理解，美國對中國主辦2000年奧運會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上所進行的種種阻撓，是在處心積慮地阻止中國走向強大。然而，儘管存在著這樣的根本分歧，美國和中國的領導人都明白到保持友好關係的重要性。

克林頓的友好示意 1997年10月24日，克林頓總統透過「美國之音」發表了與中國和解的重要演講，解釋了他的磋商政策對美國國家

⁴⁷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4, 1997;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2, 1996.

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單位：億美元)
	美國對華出口	美國對華進口	平衡
1994	92.82	387.87	-295.05
1995	117.54	455.43	-337.90
1996	119.93	515.13	-395.20
1997	128.05	625.52	-497.47
1998	142.58	711.56	-568.98

來源：US Foreign Trade Highlight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Also: U.S. Aggregate Foreign Trade Data 1991–1998, Tables 6, 7, and 8 [on line]. 見 www.fedstats.gov/index20.html [15 April 99].

利益所具有的根本意義。他打算使美中關係比前一段更「積極」、更「穩定」、更具「建設性」。這個講話闡述了用合作與磋商政策代替對抗和遏制政策的必要性，全球一億多聽眾收聽了這個廣播。

克林頓指出傷害美中關係的四大問題，即：人權、貿易逆差、武器擴散和臺灣問題後，隨即宣佈：

美國人都擁有這樣的基本信念：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有權受到尊重，有權發表他們的見解、選擇他們的領袖、崇拜他們想崇拜的東西……(美國)一定會而且願意去支持爭取人權的活動，對中國和世界任何地方的侵犯行為直言不諱。不這樣做就是與我們美國人所信奉的一切背道而馳……我們的目標不是遏制和衝突，而是合作。

我知道有人並不同意這樣做，他們堅持中美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因此他們認為，在中國變得更強大之前我們必須盡全力遏制甚至對抗他們。

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孤立中國不可行，只會起到反作用，並且蘊涵著危險。這樣做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都很難得

到我們世界的盟友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甚至得不到要爭取更大自由的中國人民本身的支持。⁴⁸

這篇講話的內容建立了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基礎，並促成了1997年至1998年江澤民主席與克林頓總統的正式互訪。

臺灣與中國：統一的前景

在華盛頓、北京和臺北的三角關係中，最令美國頭疼的就是如何在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的同時又不傷害或犧牲臺灣。臺灣的領導人很清楚，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必須現實地對待中國的崛起，不能將其排除在美國的全球戰略考慮之外。但臺灣希望自己的地理位置——北接日本與琉球群島，南連菲律賓和印尼——可以在西太平洋形成一條切不斷的鏈條，實際上把太平洋變成美國的一個湖。用麥克阿瑟將軍的話說，臺灣是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對美國和日本具有積極的戰略意義。臺灣海峽為日本99%的原油和鋼鐵、91%的煤炭、90%的小麥進口提供了海上通道，總運量達每年七億噸。臺灣確實是日本經濟至關重要的生命線。⁴⁹

臺灣的現狀 臺灣是一個富庶的島嶼，擁有2,150萬人口，人均年國內生產總值達13,663美元，外匯儲備900億美元。與之相比，1997年底大陸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793美元，外匯儲備1,399億美元。⁵⁰ 經過「十年靜悄悄的革命」，臺灣已經變成了一個由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軍隊保衛的民主制政體。其兵員為50萬，擁有150架F-16戰鬥機、60架幻影2000和130架臺灣自產的IDF現代化戰鬥機，還有相當

⁴⁸ John M. Broder, "Clinton Defends Engagement with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1997.

⁴⁹ 李福鐘，〈臺北、華府、北京三角關係細部結構〉，刊《中央日報》，1997年9月28日。

⁵⁰ *The Free China Journal*, Taipei, June 27, 1997；中國1,399億美元的數字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提供，引自*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1998。

數量的導彈，包括「愛國者」。儘管臺灣對自己的防衛能力很有信心，但在安全防務上還是要依賴美國在1979年通過的《臺灣關係法》。該法案除了保證向臺灣提供防衛性武器外，還規定了美國有權認定中國對臺灣的任何侵略行為是對「西太平洋的安全，也即嚴重關乎美國的安全」構成了損害，因此有權採取相應行動。

中國歷來不承認臺灣存在著一個中華民國，堅持認為臺灣只是一個叛變的省份，所以應該像香港那樣，按照「一國兩制」的方式重新由大陸統一過來。北京認為在國家統一問題上臺灣應從大局上看，自稱代表著全中國的說法，是不合情理的，應該徹底拋棄，並接受自己只是一個省及只能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存在的地位，然而臺灣可以保持現存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包括保有軍隊，但國防和外交事務必須由北京掌管。

臺灣直截了當地拒絕了上述說法，因為它不是香港。英國不想為香港而戰，而且沒有大軍在那裏駐守，食物和水的供應也需要依賴中國。臺灣則擁有強大的軍隊，並且有決心也有能力保衛這個在食物、水和日常必需品方面完全自給自足的島嶼。

臺灣堅持認為，自1949年以來中國已分裂成為兩個相互獨立的政治實體：臺灣的中華民國和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都在行使著自己的主權，誰也不在誰的統治之下。將臺灣稱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既不符合事實也不能為人所接受。臺灣的中華民國宣稱，它的合法性源於對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的繼承，因此是一個有著八十多年歷史的獨立主權國家，根本用不著再次宣佈獨立。

北京拒絕這樣的論調，堅持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1972年中美聯合聲明已經確認過的。臺灣如果不同意北京所提出的在「一國兩制」的方式下成為中國的一個自治的行政區，就等於宣佈臺灣獨立；稱臺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也等同於臺灣獨立。⁵¹ 這兩種情況都可能招致中國的軍事入侵。

⁵¹ 辛在台，〈重申主權獨立絕不等於臺獨〉，刊《中央日報》，1997年11月12日。

從原則上講，臺灣也承認「一個中國」，但這指的是臺灣的中華民國，而不是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堅持認為，統一是可以的，但必須是中國放棄共產主義，贊同臺灣所實行的自由、民主和對財富的公正分配。八成臺灣人擁護繼續維持現狀，而不是統一。簡而言之，就是保持與大陸分離，但又不宣佈臺灣獨立或建立臺灣共和國。⁵²

臺灣的最大優勢是它的民主體制和發達的經濟，而最大弱點便是外交上的孤立。臺灣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便失去了與世界所有主要國家的外交關係，至今只得到29個小國的承認，儘管它在90個國家中保持了130個經濟、貿易和外事辦事處。為打破外交上的孤立，臺灣決心樹立更高的、與自己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相配合的國際形象——臺灣現在是美國第六大貿易夥伴，在世界貿易排名上處於第十五位。臺灣正在不斷地尋求按照兩個德國和兩個朝鮮的模式重返聯合國，但一直沒有成功。

「江八點」對「李六條」 由於雙方都不肯妥協，辜振甫領導的臺灣海基會和汪道涵領導的北京海協會的多次協商討論，一直沒有甚麼進展。為了給談判注入一些活力，1995年1月30日，在中國舊曆新年除夕，江澤民主席提出了八點主張：

1.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與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任何製造「臺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都應堅決反對；主張「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國」等等，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也應堅決反對。
2. 對於臺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不持異議。但反對臺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

⁵² *Washington Post*的Keith B. Richburg訪問李登輝總統；*Asiaweek*總編輯Ann Morrison訪問蕭萬長，兩篇報道見《中央日報》，1997年11月8日、1997年11月10日及1997年11月14日。

3. 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是中共一貫主張。在和平統一談判的過程中，可以吸引兩岸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人士參加。至於政治談判的名義、地點、方式等問題，只要早日進行平等協商，總可找出雙方都可以接受解決的辦法。
4.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絕不是針對臺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臺灣獨立」的圖謀。
5. 大力發展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應採取實際步驟加速實現直接「三通」。
6. 五千年文化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
7. 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做主的願望，保護臺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
8. 歡迎臺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往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臺灣方面的邀請，前往臺灣。⁵³

這八點主張代表了中共第三代領導人較溫和的觀點。江澤民第一次提出以中華民族文明作為和平統一的精神基礎，並表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同時還將參加談判的隊伍擴大到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但從根本上講，這些主張仍屬於對原有的前提做一番新描述，即中國大陸是本土，而臺灣只是一個地方省份。⁵⁴

經過三個月的研究，1995年4月8日，臺灣總統李登輝提出了自己的六點主張。呼籲雙方在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基礎上進行交流和談判，再次重申了他在1991年2月23日提出的逐步走向統一的三段論：⁵⁵

1. 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
2. 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

⁵³ 中文全文見《中央日報》，1995年2月4日。

⁵⁴ 俞雨霖，〈後鄧時期對臺政策指導原則確立〉，刊《中央日報》，1995年2月4日。

⁵⁵ 見頁955。

3. 增進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
4. 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
5. 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
6. 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⁵⁶

雙方的主張帶有根本性的分歧，看起來無法協調：(1) 北京堅持「中央與地方」或「父與子」的關係，而臺灣要求平等及一種「兄弟式的關係」。 (2) 中國不放棄使用武力攻臺，而臺灣堅持要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3) 中國不允許臺灣加入國際組織，臺灣要求雙方平等參加國際組織。⁵⁷ 由於雙方都不肯做絲毫讓步，統一的前景依然十分暗淡。

李登輝出訪康奈爾大學，1995年6月 有兩件事情使業已緊張的中國與臺灣的關係雪上加霜。1995年2月，康奈爾大學校長羅德斯 (Frank H. T. Rhodes) 邀請李登輝總統作為傑出校友 (李1968年獲該校農業經濟學博士) 和國際領導人，於6月9日至11日訪問該校，作為 Spencer T. and Ann W. Olin 系列講座的貴賓，並向學生和教員做演講。由於美國與臺灣沒有外交關係，簽證問題便成了一個敏感問題。

自1979年以來，美國一直信守「一個中國」的政策，已有十五年沒有給國民黨領導人發過入境簽證。克林頓政府不想惹惱北京，特別是在他尋求北京的支持以迫使北朝鮮凍結核計劃這一時刻。國務院向中國大使作出了不給李登輝入境簽證的保證。然而，1995年5月2日眾議院以396票對0票，5月9日參議院以97票對1票同意邀請李登輝來訪。由於克林頓必須就預算方案與國會討價還價，所以在國會強大的壓力下，克林頓屈服了，並批准給李登輝簽證。北京指責美國口是心非、背信棄義，要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中國威脅式地警告：

毫無疑問：如果美國政府屈從於某些親臺灣勢力的壓力，全然

⁵⁶ 中文全文見 *Press Freedom Guardian*, April 14, 1995；英文見 *The Free China Journal*, April 14, 1995。

⁵⁷ 楊力宇，〈打開兩岸關係的死結〉，刊《中央日報》，1995年4月10日。

不顧十二億中國人民的感情，侵害中國的根本權利和利益，中美關係只能倒退。⁵⁸

臺灣希望四天的訪問能給予盡可能高調的安排，克林頓政府卻盡量反著做。李的飛機未能安排在紐約降落——因為在那裏，他會受到親臺勢力的熱烈歡迎——而是被引到了設在希拉克斯的一個較小的邊遠機場。從這裏，他只能乘車赴康奈爾。6月9日，李登輝做了題為《常在我心間》的演講，回憶了1965至1968年，作為農業經濟博士生，他在康奈爾過的愉快生活，講述了美國的民主制度如何影響到他在臺灣所成就的事業。在後冷戰時代，李宣稱：「共產主義已經死亡或正在消失。」⁵⁹

中國對美國給予簽證一事發出了憤怒的譴責。中國駐美大使李道豫告訴克林頓總統，這次訪問「嚴重地傷害」了美中關係。官方的新華通訊社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

臺灣問題就像一個會爆炸的火藥桶。給它加熱是十分危險的，不管加熱的是美國還是李登輝。這種不負責任地加重中國感情傷痛的做法，只會使中國人民更清楚地認識到美國是甚麼樣的國家。⁶⁰

北京指責美國秘密策劃製造「兩個中國」，通過支持臺獨和臺灣重返聯合國而「分裂中國」。

對於李登輝和臺灣來說，這次訪問是一次輝煌的勝利。他的講話被CBS和CNN轉播，《時代》雜誌1995年6月19日那一期更將李登輝作為封面人物。李登輝提升了臺灣的國際知名度，加強了他自己在臺灣內外的地位。

⁵⁸ Patrick E. Tyler, "China Demands U.S. Withdraw Consent from Taiwan Chief's Visi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4, 1995.

⁵⁹ 李登輝英文講辭見 *The Free China Journal*, June 16, 1995；中文見《中央日報》，1995年6月11日。

⁶⁰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95.

北京指責李登輝偷偷背棄了「一個中國」的原則，想使世界承認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為了對他進行懲罰，中國在臺灣海峽進行了一次軍事演習，從江西樂平的軍事基地向臺灣北部85英里的海面發射了四枚「未裝炸藥」的地對地導彈。1995年8月，中國又在臺灣海峽進行了第二次規模更大的軍事演習，這次演習除了有實彈的導彈和火炮發射外，還有機動的空軍和海軍部隊參加。演習的目的是想削弱李登輝的影響並希望能將他趕下臺。但李登輝卻因此而變得比以前名望更大。

1996年臺灣總統大選 第二件敏感的事情，是1996年3月的臺灣首次總統大選。李登輝是國民黨唯一的候選人，連戰是他的競選伙伴。他們的競選建立在一種模糊的「一個中國」基調上，實際傾向於繼續維持現狀。李登輝善於玩弄政治上的模稜兩可，知道怎樣能使自己的本色不為人所知。沒有人說得清他對統一立場究竟如何。一位知名的出版商張作章指出：「在他的心裏，是想要獨立的，但他一直沒能說出來。他並不想與大陸統一，也從沒能說出來。」⁶¹ 在尋求臺灣更大的「國際生存空間」及追求加入聯合國的過程中，他有意讓北京和全世界去猜測。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他的總體目標，但大多數選民似乎感覺到了他的秘密企圖，所以都支持他。

李登輝的競爭對手來自另外兩個政黨，還有一些獨立候選人。彭明敏是由臺灣第二大政黨民進黨提名，該黨公開主張臺灣獨立，得到了絕大多數本土出生的臺灣人的支持。林洋港則由新黨提名，該黨主要由前國民黨黨員組成，主張與中國重新和解。除他倆之外，還有一些獨立候選人。

為了破壞李登輝、打擊他悄悄將臺灣推向獨立和在美國幕後支持下公開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曖昧立場，中國掀起了大規模的「文功武嚇」活動。北京警告說，如果臺灣宣佈獨立或有外國勢力插手臺灣事務「分裂」中國的話，中國將不會放棄使用武力。如果說北京對李登輝的動機表示懷疑，那麼新黨副總統候選人郝柏村，這位前國民黨將軍和行政院長，也同樣懷疑李登輝的動機。他說：「我是第一個

⁶¹ 同上註，March 22, 1996。

發現李先生內心深處確實擁護台獨的人」，儘管李登輝從來沒有公開表示過。⁶²

中國決定給李登輝一個教訓。就在選舉進入高潮時，中國在臺灣海峽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海軍演習，並向指定的目標區發射了導彈。美國害怕這次海軍演習成為入侵臺灣的前奏，於是派遣了由七艘軍艦，包括「獨立號」航空母艦，組成的航空母艦群開赴臺灣海峽，但游弋於中國指定的區域之外。同時將「尼米茲號」航母群由印度洋調往西太平洋，停泊在離臺灣海峽有一段距離的菲律賓附近。

隨著緊張局勢的加劇，1996年3月8日，中國國務院外事辦主任劉華秋作為秘密使者，被派到維珍尼亞會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萊克。經過九小時的會談，雙方達成諒解：中國的軍事演習不會導致對臺灣的入侵，而美國保證不插手到當前的危機中。危機過去了，沒有任何事情發生；軍事演習也於3月25日結束。

中國軍事演習的目的是想恫嚇選民不要去投李登輝的票，但事與願違，這樣做的結果反而將選民們趕到了李登輝的周圍：李登輝得到了全部1,100萬張選票中的54% (5,813,699張)，佔絕對多數。民進黨只得到21%、新黨得15%及獨立人士得10%。中國的武力恫嚇招致了相反的結果，並且在亞洲其他國家面前暴露出它是一個具有侵略性、衝動性和潛在危險性的巨大威脅。但最出乎意料的發現是，這個軍事演習儘管給人印象深刻，任務執行得一絲不苟，但不過是七十年代老式的軍事技術，根本不是九十年代的。對弱者來說，它是一次武力炫耀，對強者來說，它不過是一些過時東西的演示。許多美國的觀察家認為這次軍事演習是一次代價極高的失誤。然而北京卻宣稱，至少目前在阻止臺灣獨立活動上取得了勝利。民進黨的支持率下降了，只得到21%的選票，而1995年選舉時他們的支持率是33%，1993年的地方選舉中得到的支持是41%，這個結果被認為是選民們厭惡台獨的證據。⁶³

⁶² 同上註，March 24, 1996。

⁶³ 同上註。

軍事進攻臺灣將是中國最後的和最壞的選擇。為甚麼它要冒遭到失敗、冒打一場無結果之戰、冒內部發生崩潰的風險？為甚麼要冒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的風險？此外，因為《臺灣關係法》的存在，中國還要冒與美國交戰的危險。

按照孫子和克勞塞維茨 (Carl von Clausewitz) 的理論，最高形式的勝利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人在談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話，這表明通過協商和平解決問題是唯一明智之舉。但如果做不到這點，戰爭也有可能爆發。中國軍方多數人都想避免一場有可能使美國捲入其中的高科技戰爭，但在用盡一切其他辦法之後，最後的選擇將還會是軍事攤牌。但許多中國的軍事領導人都認為這是「非常不明智的決定」。⁶⁵

按照臺灣情報和安全負責人殷宗文的說法，中國在五年內攻打臺灣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或者非常非常小」，除非臺灣宣佈獨立或允許外國插手內部事務。李登輝總統確信至少在八年內不會有攻打的事情發生。據報道，江澤民主席的「智囊團」要求他在臺灣的事情上慢慢來。據說他自己希望臺灣問題能用十年的時間解決。⁶⁶

美國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臺灣獨立，也反對中國攻打臺灣。它敦促兩岸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統一。但如果中國一旦攻打臺灣，受與《臺灣關係法》約束的美國會如何作出反應？明顯有兩種可能存在。⁶⁷ 一些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認為，儘管美國口氣很大，最終它不會為了臺灣而甘冒與中國交戰的風險。當然，沒有人能肯定。在不發生臺灣獨立或外國介入的情況下，中國最大的可能是等下去，直到統一可以和平實現，最後像接收香港那樣將臺灣全部接收過來。臺灣

⁶⁵ Ross H. Munro, *Orbis*, 358, 367–368.

⁶⁶ 《中央日報》，1997年7月23日，1997年11月9日。

⁶⁷ 有關中國大陸及臺灣加強軍備的比較研究，見David Shambaugh, “Taiwan’s Security: Maintaining Deterrence Amid Political Ambiguity,” *The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1996, 1284–1318; 有關北京和臺北之間談判解決問題的前景的研究，見Thomas W. Robinson, “America in Taiwan’s Post-Cold War Foreign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1996, 1340–1361.

同樣認為，在未來五至十年內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案中最好的一個就是維持現狀，希望時間會促使中國內部發生民主化的變革。⁶⁸ 因此，在1998年元旦，副總統連戰宣佈了臺灣的立場：「不獨、不統、不對抗」。臺灣贊成兩岸實行「和平、交往、雙贏」的政策。⁶⁹

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專家、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薩莫斯* (Lawrence H. Summers) 以展望歷史的方式評價中國的未來。他說：

很可能在一百年以後，當人們書寫二十世紀後期這段歷史時，最有意義的事件就是中國所發生的革命性的變革，它很快使共產主義變得只具有修辭學上的意義……一個多世紀來，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到了下一代，唯一有機會在絕對規模上超過美國的國家就是中國。⁷⁰

根據購買力等值計算法，1996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將中國的經濟實力排列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見右表)。

如果中國經濟按年增長率8%的速度持續下去，到2020年它的經濟力量可能變成世界第一。在政治上，中國政府正在尋求用一種統合的哲學取代行將就木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種哲學看起來應類似一種包含著傳統儒學、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少許反映歷史上王朝觀念的「大中華主義」所組成的混合體。與此同時，為了保持經濟勢頭的強勁，政府積極推進市場經濟體制，並實施那種新型買辦式的、以利潤為中心的準資本主義。對於不能盈利的國有企業，政府將出售給私人

* 2001年起，任哈佛大學校長。

⁶⁸ Peter Kien-hong Yü (ed.), *The Chinese PLA's Perception of an Invasion of Taiwan* (New York, 1996).

⁶⁹ 《中央日報》，1998年1月4日。

⁷⁰ 引自Nicholas D. Kristof, "Entrepreneurial Energy Sets Off a Chinese Boom,"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4, 1993.

1996年主要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情況

	1996年(十億美元)	人均(美元)
1. 美國	7,576	28,500
2. 中國	3,878	3,200
3. 日本	2,991	23,800
4. 德國	1,670	20,000
5. 印度	1,432	1,500
6. 法國	1,267	21,700
7. 義大利	1,195	20,800
8. 英國	1,174	20,100

來源：CIA,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1997, updated Jan. 12, 1998. Table 2,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and Table 3, Big Emerging Markets。國內生產總值是以購買力等價計算法衡量。這個計算法是以國內貨幣的購買能力而不是以國際市場上的交易數值來計算。

股東；為鼓勵個人購買住房，政府通過抵押貸款予以資助。軍事上的投入也一直在穩步進行，使中國在國際政治中不失為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革命組織變成了執政的政黨。它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提高民眾生活水平，並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它不再宣揚自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也不再推崇第三世界的立場，而是渴望將中國提升到第一世界的前列。的確，追求財富、權勢和國際尊敬，已經取代了對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的理念。

經由十五屆黨代會(1997年9月)和全國人大(1998年3月)所選定的黨和政府領導人，大部分都是年紀更輕、教育程度更高的都市化的技術官僚。前四位領導人：國家主席江澤民、副主席胡錦濤、總理朱鎔基、人大委員長李鵬，都是大學畢業的工程師，他們將毫不猶豫地在二十一世紀將中國帶入科學和資訊新時代。

黨對人們生活的控制已大大放鬆，但依舊戒心十足地保持著它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任何異議都是不允許的。一些異見人士在經過了長期刑罰後以「保外就醫」的理由驅逐到國外；宗教迫害依然存在。

民眾對此有何看法？他們對缺乏政治自由感到遺憾，但還是接受

了這是為換取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代價。他們覺得生活總的來說要比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任何一段時期都自由得多。他們有了選擇工作、夥伴和居住的自由，可以購買汽車、旅行，生活水平確實得到大大提高。在過去，許多休閒享受被禁止，現在則聽憑自便。他們普遍持有樂觀的看法，認為自己的國家注定要起飛，明天的生活會更美好。他們渴望像其他文明國家居民那樣生活。⁷¹ 由於政府不再負責畢業分配，大學畢業生面對著更多的經濟上的選擇。他們變得更實際，忙於謀劃自己的事業，夢想著賺錢或出國深造。他們沒有時間為政治原因去參加遊行和示威。⁷²

人們憎惡任何社會大動亂，例如文化革命，或導致社會和經濟的大混亂的秩序破壞，就像共產黨垮臺後俄羅斯所出現的那樣。他們不主張在中國以暴力推翻共產主義體制，但主張內部和平變革，使它能更清醒、更敏銳地應付時代的挑戰。⁷³ 通過微小進步的累積過程，一個更自由的政治制度最終一定會出現。他們希望中國融入到世界主流之中。

他們對香港回歸、中國成為區域強國，以及到2020年將成為令人刮目相看的世界強國而感到驕傲。他們贊成與臺灣和平統一，但不要設時間表。他們相信時間會站在他們一邊，最終這兩者會變為一體。

中國社會已變得越來越富裕，尤其是在大城市、沿海地區和南方。領導層將會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來自日趨文明的社會裏那些新生中產階級的壓力。新的富裕階層——企業家、金融家、投資人、電腦大亨、公司經理和商業巨頭——會要求更大的政治參與和法治，同時也會要求立法和預算上的發言權。政府將被迫在一定程度上給予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和宗教信仰、創作、藝術表達及地方選舉的自由。通過靜悄悄的和平演變，一種中國式的、有節制的民主政體將應運而

⁷¹ Seth Faison, "China Lets 100 Flowers Bloom, in Private Life,"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98.

⁷² Elisabeth Rosenthal, "China's Leading University Celebrates and Ponder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5, 1998.

⁷³ Shen Tong,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2, 1992.

生。如果它是某種類似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學者和政治家們所追求的那種政體——中西文化精華的結合，完全現代化同時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一定會為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

參考書目

- Baldwin, Frank (tr.),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New York, 1991).
- Bernstein, Richard,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1997).
- Brown, Lester R., *Who Will Feed China? 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 (New York, 1995).
- Bullard, Monte R., *The Soldier and The Citize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aiwan's Development* (Armonk, N.Y., 1997).
- Buruma, Ian, "Taiwan's New Nationalist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 1996, 77–91.
- Cabestan, Jean-Pierre,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Normalization, Yes; Reunification, Later,"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6, 1260–1283.
- Chan, Ming K. "The Legacy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A View from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 1997, 567–582.
- Chang, David Wen-wei, and Richard Y. Chuang, *The Politics of Hong Kong Reversion to China* (New York, 1998).
- 陳子明、王軍濤：《解除中國危機》(Ontario, Canada, 1996)。
- Cheng, Joseph Y. S., and Jane C. Y. Lee, "The Changing Political Attitudes of Senior Bureaucrats in Hong Kong's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 1996, 912–937.
- China: 2020* (Washington, D.C., 1997).
-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14 articles on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6.
- Ching, Frank, "Misreading Hong Kong,"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7, 53–66.
- Cooper, John F., *The Taiwan Political Miracle: Essays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Elections, and Foreign Relations* (Lanham, Md., 1997).
- Chu, Yik-yi, "Tung Chee-hwa and His Challenges: A Look at Hong Kong's Last Colonial Days, December 1996–June 1997," *Asian Perspective*, Vol. 22, No. 2, 1998, 169–191.

- Glough, Ralph, *Reach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Boulder, 1993).
- ,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Lanham, Md., 1998).
- Cohen, Warren I., and Li Zhao (eds.), *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Reversion* (New York, 1997).
- Davis, Michael C. (ed.), *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Values: Legal,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Hong Kong, 1995).
- Deng, Yong,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8, 308–329.
- ,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China Views the World* (Lanham, Md., 1999).
- Dimbleby, Jonathan, *The Last Governor: Chris Patten and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London, 1997).
- Ding, X. L.,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China: Legitimacy Crisis, 1977–1989* (Cambridge, 1994).
- Erlanger, Steven, "China Payoff: New Respect, New Status," *The New York Times*, Oct. 31, 1997.
- 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Stanford, 1996).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3–18.
- Gallagher, Michael G., "China's Illusory Threa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4, 169–194.
- Gilley, Bruce, *Tiger on the Brink: Jiang Zemin and China's New Elite* (Berkeley, 1998).
- Gold, Thomas B., "Taiwan Society at the *Fin de Siècle*,"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6, 1091–1114.
- Goldman, Merle,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ss., 1994).
- Haass, Richard, "Fatal Distraction: Bill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Fall 1997, 112–123.
- He, Baoga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1996).
- Hood, Steven, J.,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Boulder, 1996).

- Howe, Christopher, "The Taiwan Economy: The Transition to Maturit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ts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6, 1171–1195.
-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台北，1993），共2冊。
- 黃碩風：《綜合國力論》（北京，1992）。
- Hughes, Christopher,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1997).
- Hunt, Michael H.,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96).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6).
- Kemenade, Willem van, *China, Hong Kong, Taiwan, Inc. The Dynamics of a New Empire* (New York, 1997).
- Kristof, Nicholas D., "The Real China Threa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 27, 1995.
- :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Nov./Dec. 1993, 50–74.
- ,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1997).
- Lardy, Nicholas R.,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1998).
- Lau, C. K., *Hong Kong's Colonial Legacy* (Hong Kong, 1997).
- Lees, Francis A., *China Superpower; Requisites for High Growth* (London, 1997).
- Leng, Tse-kang, *The Taiwan-China Connectio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oulder, 1996).
- Lewis, John Wilson, and Xue Litai,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 1994).
- Li, Cheng, *Rediscovering China: Dynamics and Dilemmas of Reform* (Lanham, Md., 1997).
- Lieberthal, Kenneth,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1995).
- Liu, Shuyong, "Hong Kong: A Survey of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150 Years,"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 1997, 583–592.

- Mann, Jim, "A Confident China No Longer Wants America's Military Muscle in Asia," *Los Angeles Times*, Aug. 7, 1995.
- , "Clinton's Asia Policy Puts China First,"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8, 1998.
- Marsh, Robert M.,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Social Change in Taipei, Taiwan Since the 1960s* (Armonk, N.Y., 1996).
- McLarren, Robin, *Britain's Record in Hong Kong* (London, 1997).
- Meyers, Ramon H., "A New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The Chia Quarterly*, Dec. 1996, 1072–1090.
- Munro, Ross H., "Eavesdropping on the Chinese Military: Where It Expects War Where It Doesn't," *Orbis*, Summer 1994, 355–372.
- Naisbitt, John, *Megatrends Asia* (New York, 1996).
- Nathan, Andrew, *China's Transition* (New York, 1997).
- Nye, Joseph S.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ne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 1995, 90–102.
- Overholt, William H.,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1993).
- , "China After Deng,"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6, 63–78.
- Patten, Christopher, *East and West: China,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 (New York, 1998).
- Pei, Minxin,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1994).
- Perry, William J., "Defense in an Age of Hope," *Foreign Affairs*, Nov./Dec. 1996, 64–79.
- Porter, Jonathan, *Macau the Imaginary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1557 to the Present* (Boulder, 1996).
- Robinson, Thomas W., "America in Taiwan's Post-Cold War Foreign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6, 1340–1361.
- ,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1994).
- Ross, Robert 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7, 18–32.
- Salisbury, Harrison E.,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New York, 1992).

- Shambaugh, David,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1993).
- ,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6, 180–209.
- , “Explor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ntemporary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6, 1045–1053.
- , “Taiwan’s Security: Maintaining Deterrence Ami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6, 1284–1318.
- Shipp, Steve, *Macau,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Colony’s Transition to Chinese Rule* (Jefferson, N.C., 1997).
- Sutter, Robert G., *U.S. Policy toward China* (Lanham, Md., 1998).
- Thorton, Arland, and Hui-sheng Lin,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Chicago, 1994).
- Tien, Hung-mao, and Yun-han Chu, “Build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6, 1141–1170.
- Tsang, Steve,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1997).
- ,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Since 1949* (Honolulu, 1994).
- Tucker, Bernkopf,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 1994).
- Tyson, Laura D’Andrea, “Trade Deficits Won’t Ruin U.S.,”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4, 1997.
-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slo, 1995).
- Wang, Shaoguang, “Estimating China’s Defense Expenditure: Some Evidence from Chinese Sources,”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 1996, 889–911.
- Welsh, Frank, *A Borrowed Plac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New York, 1996).
- White, Gordon, Judy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1996).
- Whiting, Allen 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5, 295–316.
- Wilson, Dick, *China, the Big Tiger: A Nation Awakes* (London, 1996).

Wu, Harry, with George Vecsey, *Troublemaker: One Man's Crusade Against China's Cruelty* (New York, 1996).

Wu, Hsin-hsing, *Bridging the Strait: Taiwan, China and the Prospect for Reunification* (Hong Kong, 1994).

Yahuda, Michael, *Hong Kong: China's Challenge* (New York, 1996).

Zhao, Quansheng,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Micro-Macro Linkage Approach* (Hong Kong, 1996).